目　　录

第一版前言

本书如书名所示，叙述奥地利境内从最初的垦殖时代直到当今的历史，内容不限于奥地利国家制度的沿革，尽管不断变换形式的国家制度理应成为叙述的主要对象。在陈述时，笔者力求兼顾政治和文化两个方面。如果说文化史一般地已另立篇章，那么这样做时曾注意行文力求概括明晰，一目了然。我深知文化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具有各种各样的紧密联系，并相信这种联系在陈述时已得到适当的表达。

本书面向专业史学工作者，同样也面向历史爱好者。在选定的范围内，作者力求提供一幅尽可能深入的与当前研究水平相适应的图景。看来恰当的作法是，避免广泛的论证，以便对史实进行较为深入的描述。因此，风格也以婉约洗炼为宜。我希望，本书不至于显得过于堆砌材料。

作者如过分强调自己偏爱的领域和题目，就达不到对奥地利进行全面论述的目的。反之，作者倒是应该尽可能均衡地安排章节，对于那些作者也许兴趣不大的东西亦应相应地予以论述。我曾特别致力于均衡地处理材料。垦殖和移民的历史通常都叙述得比较简略，看来完全应当予以较此类著作通常所作的更加详尽的考察。

本书的性质决定了不能在脚注中逐一注明资料和文献的出处；然而，我已附上一个相当详尽的参考文献目录，这也可以视为一份供研究奥地利史用的书目选。

最后，我十分愿意并且理应向下列人士表示谢意，如安娜·考瑞斯，弗里茨·费尔纳、路特维希·耶德里卡、阿尔方斯·洛茨基、鲁尔夫·内克，里查德·皮蒂奥尼，赫尔曼·魏特尔斯，雷纳特·瓦格纳以及康拉德·维歇，他们或审阅本书不同章节或为本书提供文献，助益尤多。本书的附图系汉斯·施劳塞尔所制。威廉·瓦格纳为本书提出了宝贵的意见。索引是沃尔夫狄特尔·比尔和多罗特娅·玛格尔制作的。审阅校样时得到了海因利希·科勒尔的支持。本人对卡尔·科尔尼德斯博士先生以及历史政治出版社对本书细心周到的关切，对印刷厂R·施皮斯公司诸同人认真仔细的工作亦致谢忱。

埃里希·策尔纳

1961年10月　　于维也纳

第四版前言

如同本书第三版一样，这个第四版仅对文字作了若干小的修改。作者力求从有关新出版物中选用更多的文献资料并考虑到其广泛的代表性。同事们的各种提示减轻了我这个新版本的工作；对他们，尤其是威廉·阿尔青格、瓦尔特·莱奇以及格拉尔德·施图尔茨谨致衷心谢意。海德·丁斯特代阅校样，给了作者以支持。

埃里希·策尔纳

1969年10月　于维也纳

拉丁文地名对照表(见地图1)

Adjuvense(Yebbs) 阿朱芬塞(伊布斯)
Aelium Cetium(St. Pölten) 埃利乌姆·塞蒂乌姆(圣珀尔滕)
Aguntum(Lienz) 阿贡图姆(利恩茨)
Ala Nova (Schwehat) 阿拉·诺瓦(施维哈特)
Aquae(Baden) 阿蒯(巴登)
Aquicum 阿昆孔(在今布达佩斯附近)
Arelape(Pöchlarn) 阿雷拉佩(帕希拉恩)
Asturis(Klosterneuburg) 阿斯图里斯(克洛斯特新堡)
Augusta Vindelicum(Augsburg) 奥古斯塔·温德利孔(奥格斯堡)
Boiodurum(Innstadt) 博伊奥杜鲁姆(因施塔特)
Brigantium(Bregenz) 布里甘蒂姆(布雷根茨)
Brigetio 布里杰蒂奥
Cambodunum(Kempten) 康波杜农(肯普滕)
Castra Batava(Passau) 卡斯特拉·巴塔法(帕绍)
Castrum Maiense(Meran) 卡斯特鲁姆·迈恩塞(美朗)
Celeia Cilli(Celje) 切莱阿,齐利(塞利耶)
Comagenaie(Tulln) 科马盖内(图恩)
Cucullae(Kuchl) 库库莱(库赫尔)
Emona Laibach(Liubliana) 埃莫纳,莱巴赫(卢布尔雅那)
Esseg Mursa(Osjek) 埃塞格,穆尔萨(奥西耶克)
Faviane(Mautern) 法维阿纳(毛特恩)
Flavia Soliva(Eibnitz) 弗拉维阿·索利瓦(埃布尼茨)
Forum Julium Cividale 尤利姆·齐维达勒镇
Juenna bei Globasnitz 尤埃那(在格洛巴斯尼茨附近)
Julium Carinicum(Zuglio) 尤利姆·卡里尼孔(楚格利奥)
Juvavum(Salzburg) 尤瓦富姆(萨尔茨堡)
Lauriacum Enns(Lorch) 劳里阿库姆,恩斯(洛尔希)
Lentia(Linz) 伦蒂亚(林茨)
Matreium(Matrei) 马特雷姆(马特赖)
Mediolanum (Meiland) 梅底奥拉农(米兰)
Namara(Melk) 纳马拉(梅尔克)
Ovilava(Wels) 奥维拉瓦(韦尔斯)
Parthanum(Garmisch-Partenkirchen) 帕塔农(加米施-帕滕基尔兴)
Poetovio Pettau(Piuj) 珀托维奥 佩陶(皮乌依)
Regina Castra(Regensburg) 雷吉那·卡斯特拉(雷根斯堡)
Santicum(Villach) 桑蒂孔(菲拉赫)
Savaria Steinamanger(Szombathely) 萨瓦里亚 施泰纳曼格(桑博特海伊)
Scarabantia(Sopron) Ödenburg 斯卡拉班蒂亚(索普隆) 厄登堡
Teriolae(Zirl) 特里奥拉(齐尔)
Teurnia(St. Peter im Holz) 特伊尔尼亚(林中的圣彼得)
Veldidena(Welten) 魏尔底戴纳(韦尔滕)
Vindobona(Wien) 文多波纳(维也纳)
Vipitenum(Sterzing) 维皮泰农(施特尔青)
Virunum(Zollfeld) 维鲁努姆(措尔费尔德)

导言　地理基础

奥地利历史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它的发展节奏与世界历史完全 9 合拍，其它国家的历史似乎没有这种情况。拜恩-法兰克边区，巴奔堡家族统治以及哈布斯堡家族“对奥地利的统治”和中世纪的三个主要时期相当。当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地理大发现开辟了一个新时代的开端时，“奥地利家族”的权势已扩大并形成了自己的世界地位，并使奥地利、波希米亚和匈牙利诸国得以联合成为多瑙河君主国。这种联合的趋势在中欧的较狭窄的范围里曾一再表现出来。当乌得勒支和拉施塔特和约结束了争夺西班牙王位的世界战争时，1713 年的国事诏书却保证了多瑙河君主国的继续存在。在二十世纪又发生了世界范围的巨大灾难，多瑙河君主国在这场灾祸中瓦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及战后战胜国之间的关系紧张的局势下，疆域变小了的奥地利又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问题。尽管震撼世界的危机一再牵动奥地利的生命线，然而奥地利的此类矛盾却每每产生了相反的结局。只要举出刚过去的几桩事例就可说明问题。试回想一下 1914 年萨拉热窝的刺杀案，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最后还有发生在 1938 年 3 月的事件，以此为肇端，许多事件接踵而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自愿落籍在奥地利的赫贝尔在他那言之中肯并常被引用的诗句里表述了这些事件的相互作用。他称奥地利是一个小天地，“在那里，大世界进行着演习”。历史学家的职责在于探究根源：根源首先应从奥地利的地理位置中去寻找。我们对于地理位置固然不能过分强调，认为这种

位置已先天地不可更改地决定了奥地利的命运。然而人类历史确实是一再与气候、地形、四邻关系等自然状况所提供的条件和可能性错综交织在一起的。此外，重要的还在于人类文化如何按照其本质去克服自然造成的各种困难。

* * *

10 在欧洲大陆的五大地区即北欧、西欧、中欧、东欧及地中海欧洲中，中欧地区大都缺乏人们所说的“自然界线”。在北部，在北海和波罗的海以及连接这两者的石勒苏益格地峡之间，指明这种界线最为容易；在南方则比较困难。阿尔卑斯山的主脉几乎从来没有用来作为民族的或政治的分界线，气候上的分界线明显地仅仅沿着它的南坡延伸。东西两面的分界线，就自然地理的实况来看，不无主观武断之处。这里，人们习惯于采用政治单位和国家边界。中欧的内部划分也很不统一，尤其是分为日耳曼中欧和多瑙河中欧。一条海拔不算很高的分水岭将水流注入北海和波罗的海的地区与多瑙河集水区分开，奥地利共和国即属于多瑙河流域，最西部的福拉尔贝格邦不在此例，它的水流注入莱茵河。

多瑙河地区严格说来，只是奥地利国家和疆域中的较小部份，然而多数的居民和经济的重点也都位于这里，因为阿尔卑斯山区域人烟比较地稀少，同时多瑙河自远古以来即为最重要的交通动脉。这条多瑙河通道将欧洲中部地区与东南地区联接起来。多瑙河流入黑海，而黑海是交通量较少的地中海侧的一个支海。同样，从经济地理的角度看来，多瑙河是“逆流的”，这个事实也降低了它的重要性。将中欧的优质货物运往东南方并不困难，但将东南欧数量较大的农产品在汹涌的河流中逆流运往中欧就殊非易事了。今天，多瑙河在奥地利境内的交通职能大都已转由公路和阿尔卑斯山山前区的铁路承担了。多瑙河上的诸渡口中，林茨、克雷姆斯

和图尔恩三处长久以来就比较重要，而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则位于多瑙河河道与古代远程道路网相交叉之处。这一道路网越过摩拉维亚山口将维也纳盆地与奥得河和维斯杜拉河河谷连接起来，东北方直抵波罗的海海岸，直至涅曼河入海口一带。这种远古的所谓“琥珀之路”①穿过多瑙河以后继续分为一束通往亚得里亚海的道路。较早时期，沿阿尔卑斯山东缘的道路采用越过厄登堡—施泰纳曼格(Ödenburg-Steinamanger)一线，中世纪以后，穿过东阿尔卑斯山斜谷(ostalpine Schrägfurche)的塞默林大道则更受人们重视。主要受政治疆界变动的影响而产生的这种向西推移，使跨 11 越多瑙河的渡口由加尔农通转移到维也纳。于是维也纳便成为奥地利境内的多瑙河流域最重要的居民点，甚至可以说是沿河最重要的居民点。

这里，在维也纳地区，东阿尔卑斯山的余脉一直绵延到多瑙河谷。东阿尔卑斯山遍布于今日奥地利国境内的绝大部份地区，因此人们径直把奥地利说成是东阿尔卑斯国。人们惯常把从博登湖穿过施普吕根山口至科摩湖进而通向后莱茵河谷的那条线划为奥地利的西部边界。和西阿尔卑斯山相比，东阿尔卑斯山海拔较低，也比较开阔，呈扇形，地质构造清晰，有山隘通道，易于越过。在这些山隘要道中，有两条对于南北交通具有重要意义：其一通过埃伦贝格山峡、费恩山口和雷申沙伊德克山口，第二条通过沙尔尼茨和勃伦纳山口，这一条更为重要。通过这两个山口的路线是德国通往意大利的最短路线，沿途要通过埃奇河谷或者更往东延伸至皮亚韦河。这些山口和道路组成的交通网以若干横的线路为补充，不仅有经济价值，也有政治意义。它几乎构成了历史上的蒂罗尔邦

① “琥珀之路”(Bernsteinstrasse)，相传为向南欧运输琥珀，以交换黄金、食盐的道路。——译者

赖以形成的重要的自然条件。再往东去，一条长得多的经过萨尔茨堡山口和克恩滕山口的路线曾被利用过，从那里人们还可经由运河河谷(Kanaltal),必要时还可以通过普勒肯山口和塔利亚门托河谷到达弗里奥尔和威尼斯城。

阿尔卑斯山区内部的东西向交通比较简单，这是由地形结构所决定的。顺着这个方向,阿尔卑斯山被一道道纵谷分割成带形地带，这些纵谷大都沿着不同岩区的边界延伸，它们本身又由山隘通道互相沟通起来。这类情形在中阿尔卑斯山与北部石灰岩阿尔卑斯山之间的因河、萨尔察赫河及恩斯河上游尤为显著。在南边,在中部山脉与南部的石灰岩区之间,由普斯特尔河谷和德劳河谷形成了两条平行的深堑,而穆尔河的上游河道,在结晶岩区的两山脉之间,固然与任何地质界线并不吻合,但仍不失为第三条重要的东西向联络线。上述诸河流继续向前流去，由环带状的东阿尔卑斯山区进入山前的平原区,这样一来,它们的河谷也就变成了阿尔卑斯山与邻接地区的重要交通线。北部河谷伸向阿尔卑斯山的前麓地区,埃奇河流入意大利平原,德劳河和穆尔河则流入潘诺尼亚平原。阿尔卑斯山的河谷间或扩展而成为盆地，那里的气候条件和植物生长情况与四邻的高地迥然不同;克拉根福盆地最宽阔，因其交通条件使然，也最为重要。其次应当提到的是塔姆斯韦格盆地和犹登堡盆地。

阿尔卑斯山区内部的盆地和河谷，除了因为有着过往交通的便利,长期垦殖的可能性,以及后来以农业为基础的高山垦殖条件以外,还有丰富的矿藏,自古以来就促使经营者涌入山区。金、银、铜、铅、菱镁矿、锑、石墨、特别是盐和铁（现在贵金属除外）一向蕴藏丰富,值得开采。采矿业在东阿尔卑斯山区域的经济史上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此外，对于国民经济同具重要意义的是大面积

的森林，主要是针叶林，以及在较低的山坡上生长着的阔叶林，都提供了丰富的木材。今日，虽几经砍伐，奥地利国土三分之一以上仍为森林所覆盖。

在阿尔卑斯山环带以北，阿尔卑斯山前区向前伸展，向东渐趋狭窄，它是施瓦本—巴伐利亚高原的延续。这一地区的景物尚属平常，然而尽管土质各异，却农产丰饶，是一个很重要的种植区，是奥地利最重要的谷仓。特别在地势低洼的盆地，例如埃弗丁盆地的农业产量较奥地利境内其它地区为高，更加以地近多瑙河支流和多瑙河汇流处，对形成城镇居民点亦颇为适宜。

阿尔卑斯山东缘的风光景物的特点不大一致，是一个典型的过渡地带。维也纳盆地的交通位置非常重要，正处于有许多分支和台地的"东阿尔卑斯断裂线"与驼原（Bucklige Welt）①、罗萨林—莱塔山脉的下倾丘陵地之间。这里诚然有着明显的景观特色，但在气候和地质结构上已呈现潘诺尼亚平原的若干特征。布尔根兰北部的自然风貌带有强烈的草原特色，其南部在构造方面则完全属于施蒂里亚丘陵地带。这个丘陵地带更接近森林茂密的山区，而与东部毗连的平原相去甚远，尽管格拉茨弧形地（Grazer Bucht）的气候受此平原的影响极大。

多瑙河以北的奥地利，即所谓上奥地利的米尔菲特尔（Mühlviertel）和曼哈茨贝格上方和下方的下奥地利区（瓦尔德菲特尔 Waldviertel 及魏因菲特尔 Weinviertel）与奥地利境外的各邦同样联系紧密。米尔菲特尔和瓦尔德菲特尔属于波希米亚山脉的花岗岩与片麻岩地区的南部，这里开发较晚，森林茂密。魏因菲特尔具有喀尔巴阡山前麓丘陵地带的若干特点，一片不毛的黄土，始终没

① "驼原"(Bucklige Welt)，地名，在下奥地利的南隅，属于中央山脉，多牧场和森林，谷地丰饶。——译者

有森林，这里就是奥地利最为古老的一直有人居住的垦殖区。现今，魏因菲特尔又因石油的开采使得奥地利的阿尔卑斯矿藏更加齐备。它作为谷物和葡萄输出地所起的农业职能则渊源更早。多瑙河平原的富饶的河套即马希菲尔德的各个部份也全是这种情况。

13 气候方面的差异与奥地利境内地形区划的多样相适应。奥地利的气候与中欧的一样，介于西欧海洋性气候与东欧平原的大陆性气候之间。在奥地利境内，阿尔卑斯山雨雪丰沛，经常处于较长的冬夏之交的过渡时期之中。阿尔卑斯山麓前地区的情形颇类于此。与此相比，多瑙河以北的花岗岩高地的自然条件就严峻得多了。奥地利东部山地边缘区的气候表现为雨雪稀少，气温升降剧烈，尤其是喀尔巴阡山的麓前区和诺伊齐德尔湖区域，这里已经属于潘诺尼亚气候区范围。相应地，这些地区的植物也与阿尔卑斯山区迥异，和蓬特地区的植物更为相近，植被逐渐向东过渡到蓬特地区。阿尔卑斯山中部盆地的特点是气温变化剧烈，冬季湖水结冰，夏有酷暑期。

尽管各个地区的气候条件有这些差别，如果把冰河期、间冰期的上古时代气候迥异的情形排除在外，那么，作为全貌，就呈现尽管气候适中，但并不太温和而且变化多端这样一个特点。这种气候条件和土质特性加在一起，既向在这里垦殖的人们提出了相当严格的要求，同时也激起人们体力和智力活动的兴趣，人们以此获取生活所需品并使他们在垦殖地区坚持下来。

* * *

前文业已指出，和邻近地区的关系和联系是多种多样的，这在历史上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如果试对奥地利各邦的建筑风格进行一番粗略的考察，即不难看出，几乎没有什么独立的奥地利区域之

可言，尽管东阿尔卑斯山脉在奥地利的地形构成中具有明显的特征。奥地利在其历史进程中一再深深地受到毗邻地区的政治、民族、文化诸方面的影响，相形之下，直接由西阿尔卑斯地区来的影响要算最少，尽管在这里，在罗马帝国时代以及在哈布斯堡家族与瑞士人发生争执时期，联系也是相当密切的。罗马人曾越过上意大利平原，涌入东阿尔卑斯山和多瑙河地区，从这里，罗马文化以最便捷的途径长驱直入而来，延续数百年之久。另一方面，东阿尔卑斯山地区国家的建立也一再影响到南面的毗邻平原，甚至影响到亚平宁半岛。与喀斯特地区及其腹地的联系更紧密，也更为持久。这 14 里是奥地利通海的最短途径。在这个伙伴关系中，奥地利在政治和文化方面都发挥了决定性的和更为积极的作用。这里我们已进入多瑙河君主国的地理范围，东阿尔卑斯、苏台德、喀尔巴阡以及喀斯特诸地区应视为多瑙河君主国的核心地区。在上述各区中，人们经常把喀尔巴阡地区视为一个特殊的、轮廓分明、自成一体的单元。这样说肯定是不错的，虽然确定无疑的是，在这些地区的历史中，除了如象阿尔帕登、昂儒① 以及后来哈布斯堡治下的匈牙利国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统一以外，在罗马时代、中世纪初期、土耳其纷争时期，以至二十世纪，分裂局面也不应忽视。这种情况再一次表明，地理因素不能一成不变地决定政治疆界的形成。

联接喀尔巴阡山弧形地带与东阿尔卑斯山的豁口，以普雷斯堡—海因堡隘口最为重要，其次，厄登堡和布鲁克隘口也很重要，这些都是在奥地利境内维也纳附近交会的道路的入口，它们都是名副其实的军运要道。开阔的匈牙利低原自远古以来就对欧亚大陆的草原游牧民族具有特别的吸引力。匈奴人、阿瓦尔人和马扎

① 阿尔帕登(Arpaden)王朝，在十、十一世纪时曾统治匈牙利；昂儒(Anjou)王朝，曾于1206—1435年统治过匈牙利。——译者

尔人选择这里作为移居地，蒙古人和突厥人则穿过这里而直抵东阿尔卑斯山的边缘地区。由喀尔巴阡盆地通往外地的门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阶段，显示出巨大的战略意义，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数百年来，它们不大引人注目，其原因仅仅在于东阿尔卑斯山地区、喀尔巴阡山地区以及苏台德地区在哈布斯堡帝国内部实行了国家联合。

同样对维也纳盆地敞开的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地区，也象匈牙利地区那样，较东阿尔卑斯山地区更加广阔，轮廓也更加清晰。波希米亚作为“欧洲城堡”的重要意义常常被人们所称誉。其北面、西面和南面森林茂密。早先难以通行的山区作为天然屏障。地形决定了波希米亚内部交通道路交会于一点，从而确保了布拉格作为该区政治中心的不可争辩的地位。邻近的摩拉维亚的边界和划分就不那么明晰。与奥地利接壤的开阔的南部边界有利于重镇维也纳和布吕恩之间的交往。波希米亚与摩拉维亚之间的分水岭高度适中，并不难越过。“琥珀之路”所越过的马尔希河与奥得河之间的内摩拉维亚分水岭亦不难越过。

奥地利与巴伐利亚之间的交通主要依赖多瑙河水路，更往西去，阿尔卑斯山山谷各个向北的谷口也承担了这种职能。巴伐利15 亚(推而广之，德国)地区与奥地利地区的接壤大大促进了两者之间的政治和移民方面的紧密关系。这种悠久的休戚与共的关系，有时强些有时弱些，其最引人注目的结果就是语言相同。哈布斯堡家族想获取巴伐利亚，进而把散处德国西南部的王朝的属地与奥地利诸邦之间的宽阔空隙填补起来，从而把整个上、中多瑙地区拿到手，他们的这种努力，尤其在十八世纪所作的这种努力，说明奥地利方面对巴伐利亚是何等重视。第三帝国的扩张则沿着相反的方向进行。

如果试就影响奥地利历史的奥地利境内及中欧地区的地形和土壤、地理位置和气候关系作一概括性评价，则由于可以视为能起作用的诸种因素之纷繁复杂而难以得出结论性的答案。然而某些远景还是历历可见的。毫无疑问，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即对外来事物的接受，以及由于受外来的力量和观念的影响而带来的风险，而不论对这些力量和观念持肯定抑或否定的评价。此外，奥地利也清楚地显示出自己有能力作为积极活动的中心而对四邻发生影响。第三点，奥地利还可以充当四面八方各种货物和贵重产品的过境中转站和媒介国。最后奥地利还发挥作为介于更广大的精神的和政治的权力集团之间的一个边区的作用。所有上述诸种可能性都已在奥地利历史中实现，而且往往是在急剧变迁中实现的。

一、上古史

从人类移民的开端到伊利里亚和凯尔特民族文化

16　在奥地利区域，人类活动的踪迹可以追溯到十八万年以前，一直追溯到洪水期，这是地球史上一个以长期而显著的欧洲气候变异为特征的时期。在寒冷期出现了巨大的冰川；北极的冰冻向南一直达到德国的中部山脉，而在奥地利境内，阿尔卑斯冰冻决定了自然景观和生存条件。强烈的阿尔卑斯冰冻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它们之间有三个气候条件远为相宜的间冰期。东阿尔卑斯地区出现的人类活动的最初证据应归属于冰河纪第三和第四期之间的温暖期，即所谓"维尔姆罅隙间冰期"① (Riss-Würm-Interglazial)。这较在其它地区发现的最早考证材料要晚得多，这些材料应确定为四十多万年以前。这种巨大的差异是由于我们发现的材料不足所致。关于早期石器时代，我们几乎缺乏完美可靠的发现材料，关于中石器时代，材料也相当可怜。材料主要出自两个发现地，即下奥地利克雷姆斯河谷里面哈尔腾施坦附近的古德努斯岩洞的底部，另一个为施蒂里亚的米克斯尼茨的蛟龙岩窟。这些发现地（尚有另外几个施蒂里亚岩洞提供了补充材料）透露出，那些早期人类是怎样进行狩猎的。在缺乏有计划的贮存食物或者对野生鸟兽进行驯化饲养的占有经济时代，猎取大型动物和采集果实，成了人们的

① "维尔姆罅隙"(Riss-Würm)一词中的维尔姆指维尔姆河，源出维尔姆湖，在达豪附近注入安佩尔河。最后一个阿尔卑间冰期曾一直达到这里，故此间冰期因此得名。——译者

生存基础。经过敲击(用石锤)和砍击(用石刀)加工出来的燧石用作工具和武器,天然的隐蔽所,首先是岩穴,被人们用作栖身之地。17 凭现有资料很难对人们想象中的世界作出进一步的推论,人已经有了完善的语言则是无庸置疑的。对死者表示崇敬的标志同样也不应忽略。

晚石器时代的文化,因为处于最后一个("维尔姆")冰河期的开端,气候日趋恶劣,所以呈现千变万化的景象。古德努斯岩穴上层及黄土区的一系列其他发现地,主要在多瑙河以北的下奥地利,在瓦豪和魏因菲特尔(维伦多夫、韦森多夫、克雷姆斯、施蒂尔弗里德等地),即属于这一时期(约为纪元前十万年到一万年)。在经济方面,注重了进一步的安排考虑,在移居方面也相应选择猎物较丰富的地方。在制造器具的技术方面,可以看出地区上的差别;由此可以断定,欧洲窄石刀文化的种种特征在奥地利境内汇集在一起了。在绘画、雕刻、或壁画里清晰地反映出那一时期的宗教观念和人的艺术要求,令人印象深刻。维伦多夫的维纳斯女神象可以为此佐证,那是以石灰石雕塑成的女神像,象征丰收;在同一地点发现的第二个小雕像为象牙制品,加工程度较差。

最晚期石器时代(在旧术语为中石器时代,时间大约为纪元前一万年到五千年)的气候特征为冰冻结束。在这个日渐和暖的时期里,人们的居住地逐渐趋于比较地固定,能为人们活动提供证据的发现地在奥地利境内为数寥寥,例如霍恩附近的加尔根贝格及格拉特科恩附近的茨冈洞。估计那时的人已建立起可供居住的窝棚,并且开始有计划地种植野草,开始栽培小麦、大麦、谷子。这时的人仍然主要是猎人、渔人和现成果实的采集者。然而,他们已有了一种家畜,即狗。他们使用的工具往往小巧玲珑。除了这些细石器之外,斧子可以算是一种新的、具有特色的形式,它使木材的加工

劳动大为减轻。这一时期人们已开始用陶土来制造陶器。

陶器是陶器时代的主要标志，这一时期亦可称作新石器时代，时间约为纪元前五千年到一千八百年。当东方开始兴起城市文化，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开始形成最初的大帝国的时候，我们在中欧所看到的则是一种农民村落。奥地利和南德意志、苏台德地区和喀尔巴阡山地区大部分属于多瑙河地区文化。在这个文化中，陶器又可区分为线条陶器和彩绘陶器两种特殊形式。它们的地理范畴部分地交错重叠。最重要的发现地在下奥地利东部和布尔根兰。北方文化在奥地利境内的最重要分支为巴登文化和蒙德泽文化。西欧文化的光芒亦可在奥地利境内找得到，即指广为流传的钟形杯文化，容器具有一种独特的形式，该文化由此而得名。还有和它相近的，根据其莱茵河发现地而得名的米歇尔斯贝格文化。这些文化之间的时间划分难以确指，迄今未得到满意解决。毫无疑问最早的是多瑙河流域的诸文化，上与石器时代相连接。从北方的文化可以推知曾有一种新的、大概是印度日耳曼的民族移入。在他们的区域内，我们首先发现建于木桩之上的建筑物这一特别的移居形式。这是否为一种海滩的或水上的建筑，有时难以断定，因为自古迄今水平面已大为改观。最后，西欧文化似乎已经深入奥地利境内。

早在陶器时代就扎根于某一地方的居民乃是西欧农民的原型，这类居民由于长期和动植物打交道，便进而驯养牲畜和种植庄稼。他们收留并饲养牛、绵羊、猪和山羊，最后也懂得了把马用作家畜。人们使用一种四轮车和一种简陋的犁。稼穑耕作使有计划的储备食物成为可能；对于植物纤维的深入了解又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如纺织业。在石造工具方面也可看出技术上的进步；石器经过研磨而有光泽，更加美观的造形与更高级的应用性能相适应。

从远方引进的原料，例如琥珀，说明贸易关系的深远广泛。这一时期的末尾，萨尔茨堡和蒂罗尔的硬砂岩区已着手开采阿尔卑斯铜矿。在利用铜矿石方面，由近东传来的知识和技能想必起了一定的作用。

随着铜的使用，起初是冷煅的，以后是青铜即铜锡合金（有时为铜锑合金），这些大约同样是由近东首先制成的，在人们眼前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寻找金属矿藏使人们的活动及移居范围发生了相当可观的扩展。长途贸易的距离大大增加。另一方面，地方文 19 化越来越悬殊，已经可以判明。在阿尔卑斯山内，那些没有矿藏和远离五金贸易商路的地区，文化上仍然比较长时期地保持着石器时代的特点。

在青铜器中，武器和饰物以造型特别精美以出类拔萃，这种器物的制作在手工和艺术上要求有相当高的技巧。这时问题已经不在于制造家庭手工业制品，而在于要求高度发展的冶锻术的产品了。矿山建设亦要求实现专门化，特别是当人们着手开采埋藏更深的矿藏时，情形尤其如此，例如，在比朔夫斯霍芬附近的米特尔贝格或在基茨比海尔附近的克尔希阿尔佩。矿石的精炼是一个更复杂的过程，需要具有专业知识。随着社会职业的趋于专门化，贫富悬殊亦趋于加深。在囤积金属器物的地方，以及积存按重量论值并起着实物货币作用的金属条棒的地方，在已多次发现的货物堆栈原址，往往能透露出大量财富来。有丰富的陪葬品的墓葬也证明了这一点。

早期青铜器时代的平墓文化在奥地利境内的东部主要是与巴登文化相关连，在西部则与钟形杯文化相关连。多瑙河流域的地方文化最主要的是奥恩耶梯茨文化和维塞尔堡文化，这种文化因其在波希米亚和西匈牙利的主要文物发现地而得名。前者由东苏

台德地区延伸到魏因菲特尔，后者主要是在多瑙河以南的东部下奥地利和布尔根兰可以了解到。奥地利西部受南德意志发展所影响(施特劳宾类型)，和以前时代的联系在这里尤为显著。陶磁比较地简朴。该时期临近结尾时，石器已经弃置不用。青铜器具为各种各样木器所补充。武器和器具的装饰显示出抽象的几何图案。

中青铜器时代的特点是墓葬采取了新形式，要求也更高，陪葬品很多，这种就是冢墓式，亦有个别火葬的。多半出自多瑙河流域的发现材料为数不多，仅能为了解移居状况提供有限的线索。

晚青铜器时代因将死者火化后置入大骨灰坛里埋葬，被称为骨灰坛墓地文化。由中青铜器时代向晚青铜器时代的过渡时期与欧洲大规模的民族移动有连带关系，这种移动影响所及，在东南欧改变了巴尔干半岛的民族结构，并且动摇了东方的一些大国。在这个“大迁徙”时期，当蒂伦斯和密肯内①的宫殿化为一片瓦砾，而航海民族威胁着埃及海岸时，原始凯尔特人则蜂涌进入南德意志，东阿尔卑斯山和喀斯特则成为原始意大利人，即拉丁高级文化的持有者的祖先的过境地。与此同时，可以认为在东奥地利和巴尔干地区，早期伊利里亚民族已在形成之中。据推测，所有这些集团都受到了威尼特部族的劳西茨文化的影响。下奥地利的骨灰坛墓地文化无论如何可以视为是劳西茨文化向南的扩展。在摩拉维亚—下奥地利的“拜尔多夫—费拉蒂茨集团”以西，兴起了属于同一来源的另一个推动力，它经由波希米亚，几经变化之后，对上奥地利、萨尔茨堡和蒂罗尔发挥着作用(赫廷—莫尔茨格集团)。哈尔施塔特的两个最古老的分支② 亦属于骨灰坛墓地文化这一西奥地利特

① 蒂伦斯(Tiryns)和密肯内(Mykene)，在希腊阿戈利斯，有公元二百年前的古文物发现，如城堡设施、天然石城墙、狮门、墓穴及金银财宝等。——译者

② 哈尔施塔特文化分成东西两分支：东支为东奥地利和巴尔干半岛，西支为东法兰克和南德意志。这个文化的最大贡献是引人铁作为有用金属。——译者

殊形式。属于这一时期的发现物异常丰富，可以认为与居民数目增长有关。

公元前九世纪末年，在中欧再次发生了一种新的文化转变。铁开始代替青铜，成为最重要的制作材料。同一过程在西亚诸国完成于六百年前。据说，质地较软也较易于锻冶的铁首先仅在海提特人和亚述人的大帝国里使用，再由他们传到埃及和希腊。在意大利，铁制的工具和兵器约于公元前一千年造出。铁也由南方和东南方输入到东阿尔卑斯山诸国，在克恩滕和克赖因开采了新的铁矿。铁仅限于制造武器，饰物和容器仍由青铜制成。

较早期的铁器时代(公元前 800 到 400 年)在奥地利的主要发现地哈尔施塔特，对研究上古史有很大意义，因而被用于命名整个时代，即所谓哈尔施塔特时代(在地域上不限于东阿尔卑斯山)而有助于上古史的研究。对于哈尔施塔特来说，在稍差的程度上对哈莱因也是如此，其重要性在于制盐。制盐大约在陶器时代即已开始，到了早期铁器时代才开始大规模进行。伊利里亚的盐工尚未采用溶盐法，而是径直开采盐块。为数众多的发现材料，诸如木锨、盐桶、火把、照明用的木片、衣物和食物的残余使我们得以窥见当年哈尔施塔特矿工们的劳动条件和生活状况①之一斑。人们鞣制皮革和纺织羊毛以制做衣物；某些出土的衣物里夹有彩色的样品，可见当时已谙熟染色技术。供住宿用的木屋，其样式类乎现代的高山牧场上的茅舍。

哈尔施塔特墓地的出土文物数量甚多，该处有墓葬两千多个，21 其中部份已属于拉泰尼时代。这里既有火葬墓，也有尸葬墓和半尸

① 上古时代埋葬的矿工，其尸体因渍盐而保留下来，1573 年在哈莱因，1734 年在哈尔施塔特均有发现。可惜对这些古尸的外观及衣著等，在哈莱因发现的描述不详，在哈尔施塔特的竟毫无记载。

葬墓。十九世纪上半叶进行的外行发掘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陪葬品中有许多青铜器，就其风格样式来看，是由哈尔施塔特的匠人据南方的样品仿造而成的。可以明显地看出人们喜欢显眼的装饰物。关于哈尔施塔特时代的艺术，在其它地方的发掘也取得了值得注意的成果。可以举出的有莱普尼茨附近克莱因—克莱因地方的邦君墓，墓中有青铜甲胄和还愿用的手，以及犹登堡附近的施特雷特威格的青铜祭祀车。动物的形象表现则很常见。哈尔施塔特时期的陶器的特征是带有石墨饰图，容器的形式则多种多样。陶业工人使用的旋转板，他们当时还不知道使用。尤其重要的是，哈尔施塔特发现物也提供了了解当时医学的若干线索。

凯尔特人的侵入严重动摇了伊利里亚的哈尔施塔特文化。公元前400年以前，凯尔特人集团从高卢方面涌入西班牙，并且越海到不列颠群岛，另外一些则移向南方和东南方。上意大利被凯尔特化。公元387年，罗马人在阿利亚河畔遭受到严重失败。公元279年，德尔非遭到蹂躏，同时，凯尔特人的军队越海进入小亚细亚，并在那里建立了加拉特诸侯国。据推测，凯尔特人既从南德意志，同时也从上意大利向东阿尔卑斯山地区推进。相对地说，被凯尔特人占去土地较少的地区是福拉尔贝格和蒂罗尔。这里的古老民族里提亚人(Räter)保住了自身的存在，它的名称就表明他们是早期印度日耳曼民族的组成部份，其中首先包括伊利里亚的哈尔施塔特居民的残余部份，或许也还包括分散了的埃特鲁利亚人。凯尔特地名在这里也并未完全消失。在萨尔察赫河和恩斯河的山谷地带，在上穆尔河，在克恩滕盆地以及阿尔卑斯山麓前区一带，凯尔特的风尚尤为盛行，一般来说，占主导地位。主要的部族是诺里孔人和陶里斯克人，在多瑙河以北和苏台德地区的则是博伊尔人。诺里孔族的名称(起初为 Nori，后来为 Norici)，如同里提亚族

以及在弗里奥尔—克赖因地区定居的卡尔纳族一样，都是源出于非印度日耳曼族的，陶里斯克人则渊源于伊利里亚族，这说明在奥地利中部也还继续存在着更古老的居民层。在这里，凯尔特文化无论是语言上或者在政治上都曾得势，处于东克恩滕的拉托比克人的部族名称也是凯尔特的。在阿尔卑斯山东缘的丘陵和盆地，伊利里亚成份重又占优势。

在公元前最后几个世纪里东阿尔卑斯山诸国语言和民族上的 22 不统一，无疑为以后的罗马化减少了困难。这种不统一性反映在罗马时代前的地名和水域名称上，它们为罗马人所接受，变更而且继续流传下去。

这里我们发现的地名有：里提亚人的地名，如萨鲁尔纳耶（Salurnae，即Salurn），斯卡兰提亚（Scarantia，即 Scharnitz），魏尔底德纳（Veldidena，即 Wilten）；伊利里亚地名，如阿基斯塔（Agista，即 Aist），阿雷拉佩（Arelape，即 Erlauf），卡尔农通（Carnuntum），阿贡图姆（Aguntum，在利恩茨附近），马特雷姆（Matreium 即，Matrei），特尔格斯特（Tergeste，即 Triest）；凯尔特的地名，如博伊奥多鲁姆（Boiodorum，即 Innstudt-Passau），埃斯卡拉（Escala，即 Ischl），劳里亚库姆（Lauriacum，即 Lorch），伦蒂亚（Lentia，即Linz），特拉吉萨穆斯（Tragisamus，即 Traisen），文多波纳（Vindobona，即 Wien）。名称的构成受语言的影响，使用这些语言的人们定居在东阿尔卑斯山各区，尤其是在边缘交界地带，或者和这些地区有所接触。阿尔卑斯这个名称本身可以视为利古尔的，多瑙河（Donau）的名称则是斯基蒂的，它和东欧一些河流如德涅斯特河、德涅伯河和顿河（Danastris，Danapris，Tanais）等名称有联系。产盐地的名称，凡带“hall”这一名称成分的，恐系源出色雷斯语（Hallstatt，Hallein 等）

尽管大多数较小部族使用各种各样的语言和方言土语，在公元前二世纪期间，凯尔特人的建国力量还是做到，将东阿尔卑斯山范围内的比较广大的地区集合在诺里孔人部族首领的领导下，建成诺里孔王国。该国的边界现已无从辨明其变迁过程，但确曾屡经变迁。其东部边界与当今的奥地利国界在某种程度上相符，南面大约及于阿尔卑斯山边缘，在北面于相当时期之后达到了多瑙河畔，西部至少部分地及于因河边界线。可以说国家领土已具中等规模。当然，该国从它建立之日起，就处于正在崛起的大国罗马的威胁之下。罗马人对于在意大利面前的阿尔卑斯山斜坡建立井井有条的秩序颇感兴趣，这一兴趣可能促进了诺里孔国家的建立，并使它感觉到要争取体面的承认。在必要的时刻，罗马人坚持自身的要求，态度十分强硬。当公元前186年凯尔特人由东阿尔卑斯山向弗里奥尔平原推进并且着手在伊松佐河建立城市居民点时，罗马的外交人员和士兵便出面干涉；凯尔特人撤回。罗马在阿奎莱阿建立殖民地，显然旨在防止类似的入侵事件的重演，同时也加强了诺里孔与罗马之间的贸易交往。

其后的数十年间，还发生过多次这类事件。公元前170年，阿尔卑斯凯尔特人，据推测当为诺里孔人，成功地抵御了罗马统帅盖尤斯·卡修斯(Gaius Cassius)的入侵。在该世纪中期，由罗马来到陶恩和当地人一起开采贵重金属的采金者被陶里斯克人驱逐了出去。性质极其严重的事件是日耳曼各部族向东阿尔卑斯山的首23 次推进。由位于日德兰北海岸的家乡为洪水驱赶四散的基姆贝尔人、条顿人和安布罗南人，以及他们的凯尔特族随行者，试图在博伊尔人地区占领土地，但遭到失败，遂于公元113年出现在诺里孔并试图取得享有过境权的条约保证。与诺里孔人友好结盟——具体时间不详——的罗马派出了一支由执政官珀皮里库斯·伽波率

领的军队。这位执政官一方面与日耳曼人举行谈判，旋即向他们发起背信弃义的突袭。在作战过程中，罗马军队在移民地诺瑞亚①遭到惨败。胜利者由于疏忽没有立即挥师向意大利展开稳操左券的进攻，当基姆贝尔人于 102 年翻越蒂罗尔山向上意大利进军时，这一游牧民族在维切利遭到了覆灭。

中欧和西欧的凯尔特人，在下一个世纪里，面对两个占优势的扩张势力，处境异常凶险，即日耳曼部族由北面施加的压力和来自南面的罗马国家的扩张。当特别受到胁迫的赫尔维蒂人设法撤离他们在瑞士阿尔卑斯山的驻地时，博伊尔人便从苏台德区和多瑙区蜂拥尾随而至。在穿越诺里孔地区时，他们包围了诺瑞亚人，但未获成功。此外又因达克尔人由东部尾随压境而来，诺里孔王福齐奥便向他最强大的邻邦寻求支援。他的妹妹嫁给了日耳曼部族首领阿里奥维斯特。然而数年之后，他却转而支持阿里奥维斯特的在内战中获胜的对手凯撒（公元前 49 年）。在罗马帝国的国内争端结束后，罗马何时长驱直入占领东阿尔卑斯山诸国，就只是一个短期内的问题了。

关于阿尔卑斯山凯尔特人的对外关系已经有不少文字资料，但对于研究其移民聚居情况和经济状况却主要是依据上古的史料。出土文物大都具有晚期铁器时代的特征，这个时期依据诺恩堡湖（西瑞士）畔内容极其丰富的出土文物发现地而被称为拉泰尼时期。拉泰尼时期分四个阶段，标志其最早阶段的出土文物自然比

① Norcia，战场的确切位置不详。但毫无疑问，它位于今天奥地利国境内多瑙河以南的内阿尔卑斯山地区。根据后期罗马帝国时代的罗马军事道路图（Tabula Peutingeriana）所透露，还有几处地方叫这一名字。据推测，这次战斗的战场在克恩滕区。一说诺瑞亚即为马格达伦山上的凯尔特人的城邑，此说迄无材料可资证实。瓦尔特·施密特提出的地点在上施蒂里亚的诺伊马克特，这是完全不足凭信的。

较稀少。凯尔特文化只是经过一个相当的过程才逐步取代了哈尔施塔特文化。这一点尤其在哈尔施塔特当地的出土文物里得到了证明。拉泰尼时期的工具和武器从外表看来，有一部份还不如早期铁器时代的那样生动。在陶器方面，已证明采用了圆盘制陶法，使用的陶土含石墨量很高。扁嘴壶作为陶器的典型式样而引人注目。在武器中，我们发现有双刃长柄剑、砍刀、长矛和盾牌。拉泰尼时期的平顶墓既有土葬的，也有火葬的。

在拉泰尼时期的晚期，地中海地区的高度文化的影响十分明显。凯尔特人正在向城镇定居过渡。凯尔特人的城邑随处可见，均设于有防护的高坡上，并筑有城垣以资防守。为自卫目的而营造的这些城邑也是诸侯驻地、市集和宗教活动的中心。在奥地利境内，应举出的城邑共有三处：海因堡附近的布劳恩斯贝格、上莱赛尔贝格，最重要的是克恩滕地区的马格达伦斯贝格，后者在罗马时期扩建得十分壮观。

地中海地区的影响在凯尔特人铸的金、银币里也清晰可见，铸币方面首先师法于希腊—马其顿，嗣后则效仿于罗马。钱币上的文字为我们留传下来若干个博伊尔人和诺里孔人的君主以及若干铸币主的名字（如 Gesatorix, Nonnos, Biatec, Adnamat, Nemet 等等），关于这些人物，除名字以外其他情况均付阙如。钱币上镌刻的是拉丁文，其它出土文物透露出某种埃特鲁斯克文字的影响。在内高附近发现一个头盔，可能是基姆贝尔人的卤获品，上面的日耳曼文献词使用的是北埃特鲁斯克字母。

通过供奉的祭品和罗马记载，我们对于阿尔卑斯山的凯尔特人的宗教亦有所了解。例如，为了对诺瑞亚女神（Isis Noreia）表示崇敬，在克恩滕的乌尔里希茨贝格修筑了一座奉献给她的庙宇。我们还了解到后来与阿波罗相当的贝莱努斯（Belenus）和罗马人

称之为拉托比乌斯（Mars Latobius）的战神。还在罗马人侵占诺里孔地区之前，阿奎莱阿的商人就在马格达伦斯贝格地方建立了那个著名的雕像“海伦娜贝格的少年”，献给他们的战神。

二、罗马时代的奥地利

(公元前 15 年至公元五世纪末)

25

对多瑙河流域诸省的占领、巩固和治理

屋大维·奥古斯都在内战中获胜后,内战结束,年青的罗马帝茵继续奉行共和国时代的扩张政策。人们在设想:把边界线由莱茵河扩展至易北河,由阿尔卑斯山南缘跨过多瑙河地区扩展到苏台德地区并直达马尔赫河谷。这一规模宏大的计划仅部分得以实现。公元前 15 年,罗马军队从高卢和意大利进攻里提亚,军队在奥古斯都的妻子带来的前夫之子德鲁苏斯和提比略率领下经过苦战才攻占该地。有相当一部分居民被放逐,该地始平定。萨尔察赫河畔诺里孔的安比松特人参与了里提亚人的反抗活动,否则,进占长期受罗马影响的诺里孔王国是无须动用武力的。原来可能用缔约方式加以解决。数年之后,提比略又占领了潘诺尼亚,即介于南边的德劳河和北、东两边的多瑙河之间的地区。

由于伊利里亚人揭竿起义,奥古斯都被迫放弃了进攻苏台德地区马尔科曼人的行动(公元后 6 年),而且嗣后不久,在托伊托堡森林遭到惨败,结果导致撤离莱茵河与易北河之间的地区(公元后 9 年),于是奥古斯都的计划告吹,未能继续推行。这样,诺里孔依然是一个边疆地区。较之其它毗邻诸省,诺里孔最初受害显然要轻微得多。对于罗马的占领,诺里孔人民一般说来没有进行反抗,因而它被视为是可靠的,所以它可以向罗马军队的辅助部队,在必要时还可以向罗马的民防部队提供服务。北部边境上罗马派出小

舰队监视多瑙河水面，加以北岸有着几乎无法通行的森林，安全显然有了足够的保障。奥古斯都的占领计划遭到失败以后，该地区的边界状况变得比较固定，促使克劳迪乌斯皇帝在公元一世纪中叶改变了诺里孔的法律地位。诺里孔由王国变成一个行省，取代凯尔特王公的是一名出身于骑士的总督（Procurator）。到那时为止属于诺里孔的阿尔卑斯山边以东的地区，首先是维也纳盆地，归并入潘诺尼亚省内，这一地区在军事上因有罗马军团驻守而得到 26 加强，其驻地为文多波纳（维也纳）和卡尔农通（介于德意志—阿尔滕堡与佩特罗内尔之间）。这里有重要的河流渡口，大河对岸则有着开阔的开发已久的地区，受到正面攻击的危险性较大。在图拉真皇帝治下，潘诺尼亚省被割裂，卡尔农通被选定为西边的上潘诺尼亚省的军事总部所在地。

在卡尔农通和文多波纳，后来又在诺里孔驻屯地，罗马军团的营盘布置，除了多半微不足道的、随地形而异的特点外，采用了罗马正规军驻屯地都普遍采用的划一格式。营盘为长方形，筑有城垣、壕沟、角楼、坚固的门楼，自成一体，安全可靠，敷设有垂直交叉的干道，中间除了供士兵住宿的营房外，尚有司令部、行政管理处、军官宿舍、浴室、医疗所、军械厂、货栈和随军教堂。军团驻屯地还有一个特殊的补充，即设于驻地不远之处的随军村。该村的房舍简陋，居住着小商贩，手工匠以及士兵们的妻子。自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皇帝即位以来，军团的士兵获准于工余闲暇在这里逗留。老兵们在这里居住下来。这里也有和普通城市相仿佛的行政管理机构，但其组织则按照军法的原则来配置。

公元后 16 和 17 年在诺里孔西部设置了相邻的里提亚省，该省包括凯尔特族的温德利孔人聚居的比较平坦的多瑙河地区以及里提亚的山区部族所占据的阿尔卑斯山地区。奥古斯塔·温德里

孔就是里提亚的一个军事的和民政的自然中心，同样由一名总督来治理。在潘诺尼亚一开始就设有军团常驻营盘，而在里提亚和诺里孔，只是在马尔科曼战争之后才由军团担任卫戍勤务。在此之前，由辅助部队警戒着边防，这些部队多半驻扎在多瑙河边界线上较小的要塞里。这类要塞设在克洛斯特新堡、图尔恩、特赖斯毛尔、珀希拉恩、乌尔河畔的毛尔、洛尔希、林茨、施勒根和帕绍—因施塔特。这些要塞护卫着诺里孔的设防边境，联络用的大道使军队得以迅速移动。

省内的地方行政单位按城市（civitas)划分，包括原来的城市居民点和四周附属于它们的大片郊区。城市的行政机构有较低级的审判权，高级审判权大抵归总督所有。征收在帝国初期数额并不算高的赋税亦由城市的受托人员办理，这一征税制度后来构成了防卫制度的基础，一旦发生战事，即可从省内居民中征兵。安全警卫事宜由退役兵中招募来的警务部队(beneficirii) 负责。

27

城市和道路，贸易和交通

罗马人将为数众多的大半是凯尔特人的城邑扩建为更加讲究的城市居民点，此类城邑在诺里孔以及里提亚和潘诺尼亚与之邻接的地区随处可见。旧的地名以拉丁文形式移用到新城址，尽管某些新城址已稍微偏离了原址，如维鲁努姆、劳里阿库姆或是伦蒂亚。从当地的那些较老的居民点经过奥古斯都的辅助要塞及其屯兵村，扩展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城市(municipium)。最早的城市法颁布于克劳迪乌斯皇帝执政时期(公元后 41 年至 54 年)。在以后属于奥地利土地上的唯一的里提亚城市布里甘蒂姆(布雷根茨)获准实行克劳迪乌斯城市法，接受该法的城市还有阿贡图姆（靠近林茨)、特伊尔尼亚(德劳河畔施皮塔尔的林中圣彼得木村)、维鲁努

姆(措尔费尔德附近)和尤瓦富姆(萨尔茨堡)。在弗拉维亚的诸皇帝治下，弗拉维亚·索尔瓦(莱布尼茨附近的瓦格纳)演变而为城市。对于城市发展意义最大的莫过于哈德良皇帝(117—138)。在他治下，文多波纳、卡尔农通、塞蒂乌姆(圣帕尔滕)和奥维拉瓦(韦尔斯附近)获得建城权。在马尔科曼战争停止后，劳里阿库姆在卡拉卡拉皇帝治下也实现了城市自治(211—217)。从城市的格局可以看出是以意大利城市为样板，维鲁努姆城的矩形建筑群和笔直的街道尤能说明这一点。弗拉维亚·索尔瓦的城市格局亦大体相似。

城市住宅通常仿意大利—罗马的建筑方式，经常采用圆柱门廊的形式，也有采用源出希腊的周柱式的。城市里的小住屋，特别是诺里孔人的农舍则保持着当地的形式。宗教建筑物效法于地中海，规模大都较小，具体而微。城市交通中心为广场，即矩形的市场，四周环绕着建筑物。挨近城市边缘可以见到一至数个半圆形的露天剧场，那是围猎和斗兽的场所。某些城市，如在维鲁努姆，也有专供上演戏剧的舞台。所有罗马城市的公共浴场(温泉)规模均较宏大。

根据大量铭文记载，“honestiores”，即居民中的富裕阶层，对于公共建筑的建立和保存，对于市民的其它福利事业都作过贡献。市政机构的人选由此阶层中招聘，市议会，以及作为最高市政机关的四人执政团(quattuorviri)也是如此。城市贵族享有若干荣誉权利，这些权利大都可以世袭。教士阶层无疑占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当他们提倡帝王崇拜 (augustales)时情形尤为明显。城市里的手工业者都组成行会，但对于诺里孔人和西潘诺尼亚人的行会组织形式，我们不甚了然，这一点和在达金 (Dakien)有所不同。各省的行会组织形式各异，五花八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某种宗教信仰和家族关系的背景，例如对死人的崇敬，或者至少是对丧葬的

28

重视等。青年人同样也被组织起来接受军事和政治训练。这种社会的和文化的形式即为居民实行罗马化的模式。罗马化的进程在城市里肯定要比乡村里快得多。乡村在经济方面把地中海传来的一些形式和技能接受下来，诸如可用土地的布局、工具器械的制造和利用。由意大利移来的人数倒并不很多，不必担心；然而毫无疑问，由帝国各地涌来的士兵和商贾相互之间使用通俗拉丁语，和当地土著交际时亦操这种语言。由大量流传下来的碑文里的名字可以推知，久居当地的居民还长期保存着他们的伊利里亚一凯尔特人的特点，但不久之后也开始用拉丁文说话和进行写作了。

诺里孔的城市通过帝国公路网不仅相互联系，而且还和邻近省份，以及意大利本土连结在一起。罗马人进行的规模宏伟、目标远大的公路建设属于罗马人在整个帝国时代最重要的技术成就。我们既可从古代的道路目录和道路图，也可以从存留下来的，往往只是些在野外难以追寻其踪迹的路段的残迹和线路标记而得知此事。在图舆资料中具有重要价值的是“Itinerarium Antonini”（安东尼路程纪要），即在第二或第三世纪绘制的干道和邮政驿站目录，以及根据一世纪绘制的蓝本制成的“Tabula Peutingeriana”（珀蒂格里阿那图）。然而，必须指出，这些图表是有误差的，面积情况与实际不尽相符。若干个罗马时代的里程碑也保存下来了，它们原来所在位置往往已经无法确定。国道铺设得十分仔细，基础牢固，在选定线路时巧妙地适应了地形特点。在主要干道之外，还敷设少数简易的行车道和支线，其踪迹自然就更难于确切辨识了。

29 最重要的东西交通要道是多瑙河诸省和高卢之间的大路，该线大都循多瑙河南岸，与河流并行，较重要的驿站为：卡斯特拉·雷吉纳（雷根斯堡）、卡斯特拉·巴塔法（帕绍）、伦蒂亚（林茨）、劳里

阿库姆(恩斯)、阿朱芬塞(伊布斯)、阿雷拉佩(帕希拉恩)、纳马拉(梅尔克)、埃利乌姆·塞蒂乌姆(圣珀尔滕)、科马杰内(图尔恩)、文多波纳(维也纳)、阿拉·诺瓦(施维哈特)、卡尔农通(佩特罗内尔)。这条线路越过阿拉波纳(拉普)和阿昆孔(奥芬)向东延伸到下多瑙区。与这一条边防要路相连接的有一系列南北方向的大路，这些大路在意大利境内直通交通枢纽维罗纳和阿奎莱阿。值得提出的是维罗纳和奥古斯塔·温德里孔之间的道路联系。这条路分为东西两段,西边的一条越过瓦利斯·韦诺斯塔(芬奇高)通往雷申沙伊德克山口和费恩山口;更为重要的是东边的一条线路,越过布伦纳山口，通向魏尔底戴纳(维尔滕—因斯布鲁克)进而延伸到泽费尔德山间凹地。人们亦可沿着因河河谷往下,沿因河河谷公路到达卡斯特拉巴塔瓦。由阿奎莱阿开始的大路，一条穿越普勒肯山口达于特伊尔尼亚，由此前进，越过卡奇贝格山口和拉德施塔特·陶恩山口而达于尤瓦乌姆，然后经过奥维拉瓦达于顺着多瑙河修筑的边防线。第二条线更靠东面，沿运河河谷达于桑蒂孔(菲拉赫)，然后经过维鲁努姆、诺伊马尔克特凹地、罗滕曼·陶恩山口和皮尔恩山口同样达于奥维拉瓦。东线使用率最高，它环绕东阿尔卑斯山并通过埃莫纳(莱巴赫)——切莱阿(齐利)——斯卡拉班蒂亚(厄登堡)达于卡尔农通，并且再经过往西的一条岔路达于文多波纳。

多瑙河诸省稠密的公路交通网使得远近交通和繁忙的贸易成为可能,和意大利本土以及境外邻邦都开始了活跃的货物交流。从意大利输入油类和酒类。在帝国时代的晚期，各省也自己种植葡萄。比较考究一些的家用器俱则至少部分依赖输入；陶器制品大多敷有深红色的釉面(terra sigillata),根据盖在上面的厂印，乃是由意大利和高卢输入进来的。起先意大利的商品居大多数，后来

则让位于莱茵区的产品。玻璃产品也来自西方。由邻近的日耳曼人和萨尔马特人那里取得皮张、皮革、蜂蜜和蜡，以及死的和活的猎物。估计各邻国之间也进行奴隶贸易。卡尔农通在罗马时代尤其因为是琥珀产品的主要水陆转运站而驰名遐迩。境内各省份本身也拥有并生产若干可供输出的产品。当地的矿产中最重要的是盐和因质量优异而被人称道的诺里孔铁，此外尚有铜、铅、贵重金属。牧羊业提供了羊毛，毛料成为一种重要的商品。诺里孔出产的牛声誉甚佳，因此，牲畜也供出口。多瑙河诸省的食用谷物则仅能自给。

30

省与省之间的贸易由罗马商人经营，他们在东阿尔卑斯被占领之前已在境内出现。在帝国时期，他们又在帝国境外，如在多瑙河以北的马尔波德的宫廷里，从事活动。根据文物记载，罗马钱币在自由的日耳曼人那儿也可作通常货币流通使用。罗马国家对于对外贸易保留一定的控制权，武器输出一向不许，油类和酒类则有时禁止输出。在马可·奥理略皇帝与康茂德皇帝的和平协议中还进一步将过境贸易限制在一定的过境地点和贸易季节。

尽管如此，军事和政治的考虑已经在起作用。罗马人在安排公路网时，固然考虑到平民的贸易和交往的需要，但战略考虑则起着决定的作用。当帝国的防卫力量足够强大时，罗马的道路可供部队迅速长距离地调运，因而起着加强防务的作用。反过来说，如果帝国的军事力量衰微或者它的军队羁留于别的战场，那时，罗马人修的道路亦能被帝国的敌人用作军事通道，便于长驱直入帝国腹地。这一点在多瑙河上游和中游早在二世纪时就已十分清楚。

日耳曼诸邻邦　马尔科曼战争与阿拉曼人的入侵

诺里孔的多瑙河边界的另一侧，自从罗马占领时期以来，就主

要成为日耳曼各部落的移民居留地。纳里斯特人(或法里斯克人)的移民区域由上普法尔茨越过巴伐利亚森林一直延展到米尔菲特尔西部。从北波希米亚到奥地利境内的花岗岩高原地带是马尔科曼部族的势力范围,他们在日耳曼各族中人数上恐怕最为众多,至少在军事上最为强盛。这些部族由君王马尔波德引向波希米亚,他们对于四邻俨然居于霸主地位。这种地位直到奥古斯都率领的对马尔科曼人的征战讨伐中止以后,仍对罗马构成严重威胁,以致使罗马人支持马尔波德在当地的敌手。这一行动最终迫使马尔波德转移到罗马人地区以内。在一世纪后半叶,似乎发生了马尔科曼部族国家与同属日耳曼族的夸登族广泛融合。夸登族当时正居留在摩拉维亚、魏因菲特尔和西斯洛伐克一带,其生活方式受到萨尔马特邻族的强烈影响,特别是受到多瑙河与蒂萨河之间的善于骑射的雅齐根人的影响。斯洛伐克山区里的潘诺尼亚的奥森人和凯尔特族的科蒂人属于夸登族的保护民。 31

马尔波德的后继者与罗马保持和平达数十年之久。到多米蒂安皇帝当政时又重开战端(公元 89 年和 92 年),这次战争中罗马的军队没有取得什么胜利。反倒是内尔瓦皇帝取得了对夸登族的同族近邻多瑙河斯威本人的胜利(公元 97 年),边境遂得以巩固一段较长的时间。罗马人继续在它的藩属国中起决定性影响,尤其在任命通常是非本族人为国君方面。

在第二世纪的后半叶,东日耳曼各部族,如哥特人、勃艮弟人和汪达尔人向黑海推进,对多瑙河流域的日耳曼人的北部边境形成了一种压力,而多瑙河流域的各部族则威胁着罗马的边界。诺里孔的边防力量配置不足,仅驻有辅助部队,此外,疫疠流行又使地方军民严重减员,因而后果为害不浅。在 166 至 180 年间进行得时紧时缓的马尔科曼战争中,罗马人大都与多瑙河边界附近的

日耳曼和萨尔马特各族的联盟为敌。170年，诺里孔和潘诺尼亚因日耳曼人的入侵遭到了可怕的蹂躏。里提亚、达金，乃至上意大利也均蒙受其害。尤法富姆和弗拉维亚·索尔瓦被破坏，阿奎莱阿被围困。马可·奥理略皇帝在击退敌手后转入了反攻（公元172年），斗争甚为酷烈，皇帝保持了胜利。后方也因将雷吉纳和劳里阿库姆两处要塞扩建为罗马军团的驻兵营盘而得到更好的保障(176年?)。马可·奥理略皇帝于180年3月在文多波纳临终时，曾认真考虑过建立马尔科曼省，幅员大体上包括多瑙河以北的奥地利地区以及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他的儿子和后继者康茂德则满足于重建多瑙河各族人民对于罗马帝国的依附关系，并迫使日耳曼人在多瑙河以北腾出一条宽约七公里的边防带。罗马的军队也退到了多瑙河后面，并放弃了一度占据的马尔赫河畔莱塞尔贝格和施蒂尔弗里德一带的屯兵地。最终的结局和作出的努力不大相称。而且，在远离边界的后方城市如阿贡图姆增砌围墙，也表明人们对于新的入侵感到惴惴不安。发掘出的马尔科曼战争后的文物一般质量欠佳，使人感到当时居民的生活水平，也许连人数都有所下降。

32

公元193年，屯驻在卡尔农通的第十四军团的士兵拥立上潘诺尼亚的总督、原籍非洲的卢齐乌斯·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为王。被拥立者顺利地贯彻了自己的主张，并公然表明要继续作士兵之王，将行政管理加以军事化，用武力镇压了诺里孔平民的反抗(196年)。在这位统治者治理下，防卫组织发生了重大的变革。罗马军团大多数的成员变成了相当固定的屯驻军队，其眷属过起边境农民的生活并耕作他们的土地，只有少量的、由主力军(vexillationes)分出的流动部队被派往距驻屯地较远的地方去担任值勤。

马尔科曼人和夸登人在马可·奥理略皇帝进行的战争之后，

数十年间相安无事。甚至夸登人的国王加维奥马鲁斯被卡拉卡拉皇帝处死一事，似乎也并未酿成武力冲突。然而，这时在更远的西方，崛起了一个新的强有力的对手，即属于斯威本族的阿拉曼人，他们自 213 年起就开始威胁边境防线。卡拉卡拉皇帝似乎对此没有做出什么成绩，尽管他曾下令为他庆祝过凯旋；那个非洲人王朝的末代帝王亚历山大·塞维鲁在抵挡敌人方面完全失败，从而导致了自身的垮台（235 年）。嗣后的岁月里也并不太平，亚历山大的后继人马克西米努斯·特拉克斯屡战屡胜。但侵扰仍无止无休。从受害地区看，西部比较严重，一般来说，后来属于奥地利国土的东南部受害较浅。公元 268 年阿拉曼人的军队越过布伦纳山口涌入埃奇兰，继而又涌入上意大利，在其后的年月里，这些部族与坚强果敢的奥理略皇帝麾下的部队展开了剧烈的战斗。他的后继者普罗布斯经常与阿拉曼人兵戎相见并取得战果。然而，始终未能收复失地。后来便以莱茵河、博登湖、伊勒尔河和多瑙河为界。莱茵河与伊勒尔河之间的德库马滕兰终未收复，布雷根茨则成了一座经常受到威胁的帝国边境城市了。

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皇帝对行省的改组

达尔马提亚人戴克里先，如同他的前任们一样，一方面和阿拉曼人顽强鏖战，同时还必须向夸登人、马尔科曼人大动干戈。他的军事行动进展顺利（299 年）。戴克里先采取措施，重整行省建制，较之于抵御日耳曼人，对多瑙河诸国的影响更为重大。改革的原则在于划分行省，以及将若干个省组成为更大的行政单位——大区（Diözese）和总督辖区。里提亚省被划分为一个西部的新省份——第一里提亚省，和一个东部的新省份——第二里提亚省。北蒂罗尔也属于此省。诺里孔分别被划为一个位于多瑙河与阿尔卑

33

斯山主脊之间的北方省(Noricum ripense)和一个南方省(Noricum mediterraneum)。奥维拉瓦(后来也许还有劳里阿库姆?)维鲁努姆以及后来的特伊尔尼阿分别为滨河诺里孔和内诺里孔的行政机关驻在地。上潘诺尼亚被划分为北面的第一潘诺尼亚省和南面的萨维阿省。边界线顺着德劳河南岸伸展。所有上述省份都属于意大利长官辖区(Präfektur),两个里提亚属于意大利大区。然而,两个潘诺尼亚,以及直到提奥多西一世统治时期为止,诺里孔诸省则仍为潘诺尼亚大区的组成部分;后来,诺里孔诸省归入意大利大区,它被视为防卫亚平宁半岛的屏障并非没有道理。平民的治理和军事指挥,戴克里先是严格区分的。Praesides 和 rectores 代替了作为总督的 Prokuratoren。税务工作大大加强。在军事方面,奥地利的多瑙河边境区由第一潘诺尼亚兼滨河诺里孔长官(dux Pannoniae primae et Norici repensis)管辖,它负责从博伊奥多鲁姆(帕绍-因施塔特)到阿拉博纳(拉包)的一段河道。再往西,从帕绍到上莱茵是里提亚长官(dux Raetiarum)的管辖范围。边境上的要塞得到加强和重建,军队增多了。新设的第一诺里孔军团开往法维阿纳和阿朱芬塞驻屯。但这批边防部队(limitanei)仅执行警戒和监督任务。在不断完善塞维鲁皇帝的军事准则的过程中,比较能打仗的军队(comitatenses)被部署在后方的战略要地,以便在情况吃紧时能随时投入运动战之中。

在戴克里先时期,多瑙河诸省重获休养生息。卡尔农通作为君主会议的场所又一次在帝国政治生活里起了重要作用(308年):在业已卸职的戴克里先的影响下,由他创建的政府体制,由于将李锡尼升格为西部的奥古斯都①,而得到巩固。戴克里先的帝

① 奥古斯都(Augustus),原义为可敬的,威严的人,后成为对罗马皇帝的尊称。——译者

国改革实际上是由君士坦丁继续予以推行的。在卡尔农通会议上，人们企图迫使他退位。在取得对马克森蒂乌斯和李锡尼的胜利以后，君士坦丁变成了帝国的主宰，他对戴克里先皇帝在税收政策、行政管理和军事诸方面的措施加以补充改善。从此之后，日耳曼雇佣兵在军队内，尤其是在帕拉丁(Palatini)近卫团中占了压倒多数。由于引进金币，铸币业的新规章一直沿用到西罗马帝国衰亡以后。经过若干踌躇之后，皇帝改奉基督教，并且将教会彻底 34 纳入罗马法律和国家管理之中，特别是这两项措施给罗马帝国史的最后篇章增添了新的内容。

古代晚期的基督教

诺里孔人最初信奉基督教的经过若明若暗，仅见于传说之中。关于试行传教及其成就的陈述充满了幻想色彩，而且时间上也很晚，在使徒传教时期已经难以认真看待。关于信奉基督教的士兵参加马可·奥理略的马尔科曼战争的说法也大可怀疑。罗马城的马可廊柱上有一组“神雨图”的画，描绘在公元 173 年，罗马军队在酷暑里作战遇雷雨得救的故事，教堂长老德尔图良把这归之于教徒祈祷耶稣显灵的结果。有一点倒是勿庸置疑的，即在公元 313 年，皇帝君士坦丁和李锡尼皇帝由于订立米兰条约，对基督教正式表示宽容，早在这以前，在多瑙河两岸诸省已有了零星的基督徒，大概也已存在人数不多的基督教区了。在军队里面，除了原来笃信波斯太阳神的信徒外，基督徒仅占少数。关于前者有相当多的祈祷场所为证。从根本上说来，这首先是一种东方式的神秘主义的宗教，对于彼岸世界有着自己的独具特色的概念，基督教曾对之展开论争。这一宗教不大能够归入包括当地的凯尔特-伊利里亚神灵在内的希腊罗马的多神世界。但是，最后的决斗却是与世俗势力进

行的。在戴克里先治下(304年)，罗马帝国对基督徒的宗教信仰和教会组织有计划地进行了极其严酷的迫害，使诺里孔的基督徒同遭苦难。阿奎利努斯总督委派的行政长官弗洛里阿努斯，据劳里阿库姆的可信记载，被人扔进了恩斯河里。卡罗林时代后期流传下来的手稿有关于弗洛里阿努斯的传说，我们借此才了解到若干有关罗马的官职名称、法律程序和地方风土方面的知识，可以透过那些传奇性的记述获取历史的内核，这个内核还得到哲罗姆著《殉教者列传》中的类似提法的证明。

自君士坦丁执政以后，教会组织在多瑙河诸省公开在国家支持下得到扩充；诺里孔向在塞尔迪卡举行的研究阿里厄斯教义的宗教会议派出了代表。四世纪的诺里孔基督徒的墓碑流传了下来。同样，我们也发现有四世纪末年袭击庙宇风潮的证据。该世纪的异教建筑，凡未改为基督教堂及礼拜堂者均损毁殆尽。

35

这类破坏的痕迹大约在以下地方的寺庙里可以看到，如维鲁努姆的多利开·朱庇特神庙、瓦贝尔斯多夫的戴头巾的守护神寺庙(在克拉根福附近)以及拉凡特河谷里圣保罗附近的罗马战神拉托比乌斯庙。在罗马帝国统治多瑙河的后期，在第五世纪，在罗马化了的各省居民中，基督教几乎成了独一无二的宗教，只在偏僻的山区才有古老信仰的残余。就是在进入罗马领域的日耳曼各族中，信仰基督教的人也占了多数。这里通常指的自然是那些被当作阿里厄斯教的异教观点的代表。这种宗教观点与那种被尼西亚宗教会议贬斥的阿里厄斯教教义固然不能等同视之，然而也为正统教义所拒绝。

晚期基督教在奥地利国土上有为数众多的教堂建筑的遗迹，已为考古学家清理出来。其中有些是修建在原来的世俗建筑里面的，例如，设在劳里阿库姆的军营中没有神龛的佈道厅，这是由其

半圆形的僧侣席位辨识出来的，再如加尔农通市民城的椭圆形露天剧场的南门中的设施。其后，人们还建起了规模更大、艺术性更强的教堂，如特伊尔尼亚的公墓教堂或是利恩茨附近的拉凡特主教教堂、格洛巴斯尼茨(克恩滕)附近的黑马贝格施洗处和教堂，还有林茨的马丁教堂中的最古老的建筑。

据早期基督教宗教会议的决定，教会组织应与国家行政组织相联系。由这一点可以推断出，曾有过小面积的与城市市区规模相当的主教辖区。在第五和第六世纪被提到的有下面这些地方的主教：特伊尔尼亚、维鲁努姆、阿贡图姆和劳里阿库姆。各省首邑的主教可能提出过谋取大主教职位的要求。由此也许可以找到中世纪早期和晚期关于洛尔歇传说的某种历史依据，然而找不出可以确证此事的可靠资料。终于无法搞清楚，诺里孔的主教是否隶属于阿奎莱阿或西尔米乌姆的大僧正的领导之下。后者可以说与第四世纪的世俗组织相符，然而就是这一点，我们的史料也缺少含意明确的说明，就连那部杰出的文献《圣徒塞维里林传》也不例外。这部著作已经把我们直接引进诺里孔多瑙地区罗马统治正在分崩离析的混乱之中。

罗马统治的结束和东日耳曼人的过境

在精明强干的君士坦丁当政时期，甚至在他死后的若干年内，多瑙河诸省皆安享太平。在第四世纪中叶，康斯坦蒂乌斯重又对夸登人、萨尔马特人、大约还有马科曼人用兵，这些军事行动虽然得手，但未引起边界的变更。瓦伦蒂尼安一世试图长期占据多瑙河以北地区，导致了与日耳曼邻国的严重磨擦。当瓦莱里阿省罗马驻军总司令马赛利阿努斯谋杀了应邀前往谈判的夸登族国王加比尼乌斯之后，在罗马帝国的邻族里引起强烈反响。加尔农通被 36

夸登人占领和破坏。这次打击使得加尔农通再也没有能够完全复原，到世纪末年时更趋衰落。瓦伦蒂尼安一世感到这块地方已成“荒凉和污秽的巢穴”，他曾率军成功地越过多瑙河征讨敌人，并且关心无数个遭到破坏的军事设施的修复。在他去世(375 年)后，与帝国毗邻的各族日耳曼人在匈奴的威胁之下，重又骚动起来。西哥特人在亚得里亚诺佩尔击败瓦伦斯皇帝 (378 年)一事影响所及仅限于巴尔干诸省。但是，他们越入罗马国土，使结成联盟的各族日耳曼人纷纷移居帝国境内，不象以前那样处于边界以外，从此局面开始彻底改观。在遭受这一灾祸后，马尔科曼军队移屯滨河诺里孔省和上潘诺尼亚省，受一名护民官指挥，多瑙河舰队司令部由加尔农通迁往文多波纳。在 395 年，国境上的界墙再次被冲破。在军事首领拉达盖斯的率领下，哥特人和其他东日耳曼人的军队由匈奴统治区奔袭而来，使诺里孔—潘诺尼亚一带受害最深。弗拉维亚·索尔瓦，以及文多波纳当时都受到了冲击。在这场浩劫之后，日耳曼军队在腓萨利被帝国摄政王斯蒂利科击溃 (406 年)，事情方告了结。自此以后，匈奴人的威胁又日渐严重。公元 433 年，西罗马帝国不得不将第一潘诺尼亚省正式让给匈奴人。可以假定，相当大部分的罗马化居民已撤离这一地区，但是帝国设施(维也纳营地也在此列) 范围内估计也会残存一些移民点。哥特人征得东罗马的同意，于匈奴统治崩溃后占领潘诺尼亚(455 年)，其权力管辖范围，根据一百年之后从事写作的约尔丹内斯的记载，为从西尔米乌姆到文多米纳 (Vindomina 即维也纳)。在诺里孔地区的北面，同属东日耳曼族的鲁吉尔人定居了下来，他们移居于瓦尔德菲特尔和西魏因菲特尔；他们还试图把多瑙河南岸的孤立无援的罗马居民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西罗马帝国的各级组织分崩离析，再也不能够为各省居民提供保护，部队大部后撤。描写圣徒塞维

林生平的那部杰作向我们叙述了当时的情景，写得生动感人。 37

塞维林的弟子奥伊吉皮乌斯于公元511年撰写的《圣徒生平》一书描绘了这位圣徒的活动。这位高僧来自东方，其母语为拉丁语。书中还描写了他如何关怀被帝国遗弃因而遭受鲁吉尔人、阿拉曼人、图林根人和哥特人威胁的滨河诺里孔居民。塞维林的主要活动场所在法维阿尼斯(法维阿内、毛特恩)，恐怕这就是当时诺里孔多瑙河地区的最重要的居民点，不过，塞维林的影响还扩大到里提亚和内诺里孔。日耳曼的统治者，尤其是统治鲁吉尔人的公侯家族，由于受塞维林影响对待各省居民变得比较仁慈一些。塞维林晚年与迁往意大利的斯基里王子鄂多亚克相遇，曾预言他将获得成功并执掌统治权。

鄂多亚克于公元476年举行政变成功。至此，西罗马帝国实际上已寿终正寝，尽管日耳曼雇佣军首领在形式上还以东罗马皇帝的摄政王的身份出现。鄂多亚克最初成功地保卫了诺里孔，但鲁吉尔王国在连续两次越过多瑙河的征战中被消灭。情况十分危急，致使鄂多亚克不得不命令诺里孔的罗马人撤回意大利。该省居民，至少是那些将有所失的有产者服从了这一命令，带走了塞维林的遗体。这位圣者在那不勒斯附近的鲁库拉努姆找到了自己的第二个安息之地(488年)。阿拉曼人在几年以前就已占领了第二里提亚省的绝大部分。

鄂多亚克的王国在撤离诺里孔后不久就遭到受鲁吉尔人残部支持的特奥德里希及其率领的东哥特人的攻击。自493年开始，东阿尔卑斯山即归属于他那个治理得井井有条的王国，在民族大迁徙期间，他是东日耳曼诸王中地位最为重要的国王。在阿拉曼人打败克洛德威格统治下的法兰克人(496年)之后，鄂多亚克将其统治扩展到里提亚的阿尔卑斯山中的阿拉曼居民区以外。民间

的和经过学者整理的传说使人们长期地保存直到中世纪后期奥地利各邦历史中的哥特人的这段插曲。人们往往假定，在查士丁尼的坚韧不懈的一再进攻之下，东哥特帝国复灭时(552 年)，残留在东阿尔卑斯各地区的哥特族居民始终定居在那里。这并非不可能，但还没有得到证实。

在奥地利的北部和东部，第五世纪临近结束时又崛起了一个新的民族伦哥巴人①。他们有一段时间暂时受另一个日耳曼流浪民族黑鲁勒尔人管辖。据部族的传说，他们和国王鲁道夫打过一场大仗，解放了自己(509 年)，并在国王瓦霍(约 511—539?)执政时在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奥地利多瑙河区以北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将近六世纪中叶，伦哥巴人将他们的垦殖范围扩展到了潘诺尼亚平原，于是便和居住在东喀尔巴阡山地区的格皮登族发生了冲突。经过激战之后，伦哥巴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们在此之前，曾与蒙古族系统中的好战游牧民族阿瓦尔人结盟，以确保自身的安全。伦哥巴人在获胜后不久又迁往意大利(568/569 年)，因为迄今属于他们的垦殖区割让给了以前的盟友，与他们为邻，关系自难融洽，这肯定和伦哥巴人的迁徙有关。

和阿瓦尔人一起涌进伦哥巴地区的还有斯拉夫人。这些民族在进入时和一个西日耳曼族拜恩人冲突起来。拜恩人自己又依附于起领导作用的日耳曼族的法兰克人。在第六世纪后半叶开始的斯拉夫——阿瓦尔人与日耳曼人之间的争端，构成了下一个历史时期即奥地利中世纪初期的历史的主要内容。

---

① 伦哥巴人 (Langobarden)，日耳曼民族的一支，原居易北河下游，五世纪起移居潘诺尼亚，568 年征服意大利北部(即伦巴底)，774 年伦哥巴国被查理曼大帝合并于法兰克帝国。——译者

三、拜恩人的部族公爵领地和法兰克人的边区

（六至十世纪）

拜恩人的来历和殖民定居

对于拜恩人[①]的来历、部族形成和占地定居，至今都还没有进行过足够的研究。我们的文献、古代晚期著作家们的记述、考古发现、地方名称、拜恩人的部族传说、民间语言和方言的证据都还不足以有把握地对拜恩人的民族形成，一如对他们移入的时间和方向作出结论。关于拜恩部族最古老的可靠记述，我们应归功于分别在551年和568年写出作品的东哥特人历史学家约尔丹内斯和意大利诗人维南提蒂斯·福图纳图斯。从他们简短的记载中我们得知，当时拜恩人已经移居阿尔卑斯山的山前地带和他们至今在东阿尔卑斯山长期居留的地方。更早的文献记述的可靠价值是有争论的。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在其著作中早已讲到潘诺尼亚的多瑙河以北的一个"拜安诺伊"(Baianoi)民族（公元150年），挪威的卡尔斯塔特附近一块日耳曼文的石碑上提到一个"拜恩的外国人"的名字（约公元200年到400年），这可能是碰巧同名或者名字相近。拉文纳的世界志学者更为古老的草稿（七世纪末）中关于拜阿斯（"Baias"，Baiahaims?）地区所说的也很不明确，大概要在苏台德 39

① 拜恩人(Baiern)，从地名"拜恩"(Bayern)而来，Bayern，在我国有人译为"巴威略"，在英文中称为 Bavaria(巴伐利亚)。在我国，地名巴伐利亚一词久已盛行，按约定俗成的原则，故采用之。——译者

地区或喀尔巴阡地区里去找。

尽管史学文献欠缺，但长期以来可信的一点是，人们认为拜恩人是从波希米亚来的马尔科曼人的后裔。有人提出拜恩人的民族名字里就包含着这个地区的名字(Boiohaemum)，不过是换了母音而已。但是，看来马尔科曼人在四世纪时再没起什么特别作用，因而在他们的古文物与拜恩人的古文物之间也就不能确定什么关系。此外，博伊恩的名称(Boiernname)在古代晚期不仅与波希米亚联系在一起，而且有时也和西潘诺尼亚地区联系在一起。因此，大多数研究者放弃了马尔科曼人假说。在新近关于拜恩人的来历和定居的许多假说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有两种，这两种实际上比最初看起来的要一致得多：一是认为是从东方（潘诺尼亚和喀尔巴阡地区）迁入，并认为是不同的日耳曼民族分支，或者也有少量非日耳曼人的成分(萨尔马特人和匈奴人？)相互结成一个新的共同体。有些拜恩地名使人想到黑鲁勒尔人和斯基伦人。民间传说吸收了东日耳曼的许多历史及神话故事；二是注意那些仍然相信从波希米亚地区迁入说的学者们的意见，因为恰恰是在波希米亚核心地区，在六世纪初以前，可以证实有日耳曼人的发掘物。可以认为这些发掘物与随后那个时代拜恩人的排墓是有关系的，这些排墓是在奥地利土地上，例如在林茨的工业区(齐茨劳附近)进行土方工程时挖出来的。从波希米亚向南挺进的日耳曼人与那些来自东方、数量不会很大的迁入者，以及留下来的老居民融和在一起，形成一个新部族，大概就象几个世纪以前日耳曼诸民族曾经结合成法兰克人和阿拉曼人那种更大的联盟那样。所以，拜恩人这个名字想必是和波希米亚有关系。预料将来考古学的发现将会给我们一幅更加清晰的图画，来说明五、六世纪之交殖民和人口情况的重大变化。

在中世纪中期和晚期，雷根斯堡、萨尔茨堡、特格恩湖、格特威格和克雷姆斯明斯特都记载有拜恩部族的种种传说，试图对它们作出历史评价的种种努力都没有取得切实可用的成果，而企图说明大主教领地洛尔希(Lauriacum)的光辉历史的帕绍主教区的传说，对拜恩的早期历史也同样没有多大的意义。

殖民定居以后，拜恩人最古老的移民区是阿尔卑斯山前地带和里提亚与诺里孔的多瑙河平原。稍后，仍在六世纪，拜恩人进入了阿尔卑斯山。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在拜恩人的古区(gau)① 名称中我们遇到一个北区(Nordgau，雷根斯堡以北)、一个西区(Westgau，伊萨尔河右岸)和一个南区(Südgau，位于阿尔卑斯山北部边缘，在施塔恩贝格湖和基姆湖之间)，但没有遇到东区，虽然往常日耳曼人在各个方位里，最喜欢用东方来标志位置的。很可能东区得在恩斯河以东、六世纪时就已斯拉夫化了的地区里去找，也许它与上奥地利的特劳恩高(Traungau)就是一回事。

六世纪末，拜恩人就已经依附于东法兰克王国了，大概在国王托伊德贝特一世时期(536—548年)，拜恩人就沦落于这种依附关系。这个东法兰克的统治者在致皇帝查士丁尼的信件中，甚至把潘诺尼亚说成是他统治下的一个邦。阿吉洛尔芬格亲族中出身的 41 一个公爵领导着拜恩人的部族。最先被提到的是加里巴尔德第一(约555年)，稍晚些时候被提到的是塔西洛，他的名字在这个家族中还出现过两次。阿吉洛尔芬格家族不属于拜恩本土的家族，也不是法兰克的家族，而是如比较各种文献得出的结果所说明的，起源于勃艮第。勃艮第的某些传说，主要是勃艮第的英雄们在与

① gau，原指森林、水草丰茂的地区，后指某一日耳曼部落的垦殖区，如 Breisgau，Rheingau；十九、二十世纪，为行政区。gau，据《世界地名译名手册》，已音译为"高"，下文中的 Traungau 就译为"特劳恩高"。——译者

匈奴人战斗中灭亡的传说，与拜恩-奥地利各邦的联系，也可以说与拜恩公爵家族的传统有联系。除了阿吉洛尔芬格家外，拜恩民族法中还讲到五个显贵家族（胡奥西、德罗扎、法加纳、安尼奥纳、哈希林加），这五个家族的特权也许就说明了与拜恩民族合在一起的一些小部族最初的特殊地位。但是，这一点我们只能依靠臆断。于是人们就把豪西（Huosi）与塔西陀所说的依附于夸登人并住在潘诺尼亚的奥森人混为一谈。

拜恩人从殖民定居以来，住的是独立院落、小村子和大村庄，他们也部分地接收了罗马人的设施。农民的垦殖村占绝大多数，小村子和大村庄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由亲族纽带中享有充分政治权利的自由民建立的，其余的则是由贵族地主们建立的。公爵的地产，尤其是在多瑙河地区的产业，是非常广大的。关于殖民定居时代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状况都缺乏资料。不过从八世纪和九世纪的文献中可以推断，那个时候除了自由人以外，依附的人口（部分是罗马出身，后来也有斯拉夫人战俘和其他战俘，但是也有拜恩人奴隶）在数量上是很大的。经营大地主庄园，不可缺少奴隶和奴仆。

有些村镇的名字以～heim 或～ing(en)收尾，可能都是日耳曼人最古老的新移民区。在包括蒂罗尔、萨尔茨堡和上奥地利在内的古拜恩人的殖民地区和阿拉曼人的福拉尔贝格都有这类名字。但是在拜恩人的垦殖地上，我们也见到有这类名字，因为在加洛林王朝末期、奥托时期以及以后的时期里，都很普遍地起这种名字。这种地名的第一部分，就其较老的形式而论，通常都由人名构成。在奥地利土地上这种名字很多，举例说就有：盖森哈姆(Geisenham, Gismoutesheim)、胡默茨哈姆(Humertsham,Humbrechtshaim)、皮森哈姆(Piesenham, Puosinhaim)、西岑海姆(Siezenheim, Suozzin-

heim)，以及阿德尔曼宁(Adelmanning, Adalmuntingin)、巴赫曼尼希(Bachmannig)、埃格尔丁(Eggerding, Ekkihartingin)、贡普雷希廷(Gumprechting)、霍赫霍尔丁 (Hochholding, Haholtingen)、伊尔恩普雷希廷(Irnprechting)、伊茨林(Itzling、Uzilingin), 奥斯特米廷(Ostermieting,Ostirmuntingin)，西格尔廷(Siegerting, Sigehartingen)。不过一般说来，在解释这类地名的时候，归结到作为城镇创建人或领主的某人或某家族，那就很成问题了。只有当同一地区的若干地名足以说明某一家族的渊源的时候，才有可能得出进 42 一步的结论。例如布鲁内克地区的地名格赖因瓦尔德(Greinwald, Grimolting), 迪滕海姆 (Dietenheim)、特塞尔贝格 (Tesselberg, Tessilinperch)和乌滕海姆(Uttenheim)就是这样，这些地名中含有阿吉洛尔芬格家的人名 Grimoald, Theodo, Tassilo 和 Utta，所以，它们是拜恩人到南蒂罗尔的这一地区来殖民的那个时代的有力证据。

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

阿瓦尔人是来自中亚的一个骑射民族。他们的使节于 558 年出现于查士丁尼的宫廷，所以，他们进入古代末期我们的见证人的视野时，不比拜恩人晚多久。关于这个民族更早的历史，当时的人们就有种种推测。不过，阿瓦尔人大概就是中国文献中称之为 žuan-žuan 的游牧民族。他们的国家被他们从前的臣仆突厥各部族所属的人于 522 年所灭。欧洲阿瓦尔人坟墓里的骸骨表明，如同主要是对头盖骨的测量所表明的，它们有明显的蒙古人种特征。在当时的文献中讲到欧洲的阿瓦尔人或者 žuan-žuan 人时，都把留着辫子的男子的发式当作特征来提起。六世纪下半叶，阿瓦尔人从东欧平原向西扩大了他们的统治范围。他们在 561 年到 562

年，后来又在565年到566年同东法兰克国的国王西吉贝特在易北河上交战。567年，他们占领了西本比尔根的格皮登兰。接着，伦哥巴人向意大利方面移动，他们又占领了原属伦哥巴人的潘诺尼亚地区和诺里孔地区。阿瓦尔人当时一定曾把势力范围伸展到了拜恩邦的边界上，因此，诺里孔的大部分连同苏台德地区和喀尔巴阡地区一起，都属于阿瓦尔察汗（Awarenchagane）的辽阔领地。据认为，在七世纪初的几十年里，当这个政权处于鼎盛时期时，他们的无上权威甚至达到了波罗的海的南岸地区。阿瓦尔人在他们的帝国里全都属于上等人。受他们保护的则有形形色色的、大都是以保加利亚人这个集体名词命名的（后来斯拉夫化了的）突厥部族、日耳曼系的格皮登人的残余，以及尤其是许多斯拉夫民族。

六世纪开始后不久，斯拉夫人的军队便向巴尔干推进。拜占庭人就利用阿瓦尔人的援助来对付他们和杂乱的匈奴人，这些阿瓦尔人成功地征服了巴尔干的斯拉夫人，以及他们在中欧的同族人。阿瓦尔人的统治虽然很残酷，但对传播斯拉夫文化却是作出43 了贡献的。一些斯拉夫人氏族和部族因逃避阿瓦尔人，也进入了东阿尔卑斯山区，它们后来成了阿瓦尔人的附庸。这些斯拉夫人在这里与拜恩人发生了冲突。拜恩人的公爵塔西洛第一（Tassilo I.）于592年“在斯拉夫人之地”取得了胜利。610年加里巴尔德第二（Gabribald II.）统治下的拜恩人在阿贡图姆附近被打败，不过，后来他们又击退了斯拉夫人。626年，阿瓦尔人与波斯人合作，发动一场强大攻势，试图夺取君士坦丁堡。这两支进攻希拉克略皇帝的军队失败以后，沉重的挫折就开始了。斯拉夫人发动叛乱，保加利亚人在喀尔巴阡地区对阿瓦尔人的统治进行了挑战。

所谓弗雷德加尔编年史（Fredegarchronik）就讲到一个进入斯

拉夫土地的法兰克商人萨莫(Samo)，他非常成功地支持了斯拉夫人反抗阿瓦尔人的起义，后来当上了一个独立的斯拉夫国家的国王。这个王国顶住了阿瓦尔人、国王达戈贝特第一(Dagobert I.)辖下的法兰克人、以及与他们结盟的阿拉曼人和伦哥巴人的侵犯。但到萨莫死后不久，这个王国重又崩溃了。关于这位有趣而又神秘的君主人物的文献资料使我们多少得知，萨莫既统治着苏台德地区的斯拉夫人(捷克人、摩拉维亚人)也统治着阿尔卑斯山的斯拉夫人(卡兰坦人，Karantanen＝斯洛文尼亚人)。萨莫死后也还有奥地利的部分多瑙河领土曾属于萨莫的短命王国。萨莫国王的国都的位置完全没有肯定下来。有人曾在埃格尔河谷(Egertal)寻找这个国都，也有人谈到多瑙河谷里发掘出七世纪的多种物品。底比斯(Theben)城堡附近的发掘令人印象最深。一些考古遗迹使人们可以断定，在维也纳的罗马兵营残垣废墟以内有一个较小的移民区。萨莫死后，苏台德的斯拉夫人又沦于阿瓦尔人的统治之下。阿尔卑斯山的斯拉夫人至少是害怕遭到与此相似的命运的。卡兰坦人的名字使人想起那块土地上的古老居民，他们在八世纪前半叶都臣服于拜恩的奥迪洛公爵，因为，和阿瓦尔人的卷土重来相比，由拜恩-阿吉洛尔芬格家来统治，显然是更为可取的。但是，拜恩人的统治也不是没有阻力的。772年塔西洛第三公爵不得不镇压一场卡兰坦人的暴动。那个时代的人都把这次暴动看作是异教徒对拜恩的斯拉夫人开始传教所作的反应。700年左右，多瑙河地区在清除掉萨莫的国家之后，就开始了拜恩人与阿瓦尔人之间的战争纠纷。在这场战争纠纷中，恩斯河地区变成了荒野，那一带的移民村特别是洛尔希，遭到了毁灭。

斯拉夫人的移民活动向西推进最远时，大概是在七世纪的前半叶(或者还有八世纪初?)，在奥地利境内达到了与拜恩部族地区 44

相邻的一条如下的边界线：最西边包括东普斯特尔河谷。769年伊尼申寺建成，它成为在斯拉夫边界附近的拜恩民族土地上、为使斯拉夫人改宗而设立的修道院。再往东，高陶恩山脉构成民族性的边界，这条边界随后在恩斯河谷以东穿过拉德施塔特，再往前通过萨尔茨卡默古特进入特劳恩河谷，顺着这个河谷走向多瑙河。在多瑙河以北，哈泽尔格拉本以东，可以估计到，移居在一片浓密林区里的斯拉夫人是相当稀疏的。斯拉夫民族聚居区的西部突出地带都过早地放弃了，对利恩茨峡口以西的东蒂罗尔和特劳恩河谷来说，尤其是这样。特劳恩河谷至迟在772年又回到拜恩人的手里，而且在700年以前至少下游是属于拜恩人的。当时以及后来直到780年，恩斯河都被视为界河。当然我们不能设想有什么完整的民族界线。斯拉夫人在他们所占领的土地上遇到了一批居民，这些居民给他们流传下来大量比较古老的地名和水名。不妨认为他们是伦哥巴人或者鲁吉尔人的残余，大概也可认为是罗曼语系的居民。此外，除了较强的斯拉夫成分以外，还有阿瓦尔人的上层人士。

关于中世纪早期阿尔卑斯山斯拉夫人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结构情况，较之关于拜恩人的情况，我们知道的更少。就象日耳曼民族大迁移时亲族所起的作用那样，大家族的居住共同体（zadruga）成了斯拉夫人部族组织的基础。后来只有个别的文献证据讲到在斯拉夫各民族中早已证实了的千人团、百人团和十人团。所谓楚潘①是起法官作用的，后来失了本义，转为表示基层政权的一种机构。这种机构可能是维护斯拉夫人，使之不受阿瓦尔人侵犯的，在当时人的文献中及后来的民间传说中，都说阿瓦尔人的统治是异乎

① 楚潘（zupan），是斯拉夫族的氏族或地区的首领，最初掌有法官职能。——译者

寻常的残酷，而实施的方式又几乎到处都不一样。按照所属的部族，在奥地利境内斯拉夫人又可分为不同的群。多瑙河以北称之为波希米亚人和摩拉维亚人，这条河以南主要是斯洛文尼亚人，其中也有其他斯拉夫部族的人移居进去，如杜尔耶本人（Dulje-ben)和克罗亚地人，有些地名可以为此作证。这里可举出一个区Chrowati(在格兰河边的圣法伊特周围)和一个伯爵领地 Dudleipa(大概在拉德克尔斯堡附近的穆尔河谷里)。克罗亚地人和塞尔维亚人七世纪时大概曾越过东阿尔卑斯的支脉进入巴尔干，并且在那里组成不依附于阿瓦尔人的部族侯国。偶而也有人说到卡兰坦的克罗地亚人在斯拉夫人反抗阿瓦尔人的战斗中起过特殊作用，但缺少文献证据。阿尔卑斯山斯拉夫农民中享有特权的集团最后 45 形成了克恩滕、施蒂里亚和克赖因的贵族(Edlinger),(中世纪中期和晚期的文献证明）他们是享有自治和独立裁判权的。有人想从人种学上找理由说明这种特殊地位，并把他们的起源追溯到阿瓦尔人、克罗亚地人、伦哥巴人或罗曼人，但他们或许是加洛林王朝殖民者的后裔。所以，阿尔卑斯山斯拉夫人的早期历史，犹如拜恩人的早期历史一样，还有一大堆尚未解决的，而且也许简直是不可能解决的问题。

斯拉夫语地名构成奥地利中世纪早期移民史的一种重要史料。这种地名数量很大，其中有些可能就是斯拉夫人以前的地名的翻译或模拟。总的说来，地理名称占绝大多数，它们表现了土地性质、地方位置、特别象征或周围的风光景物，以及象邻居日耳曼人那样，借助人名来构成一些地名。我们常常见到根据河流命名的例子：Feistritz (斯洛文尼亚语 bistrica 意为湍急的流水)，Flattnitz (blatnica 意为沼泽积水)，Liesing(lesnica 意为林中小溪)，Glogg-nitz(klokotnica 意为潺潺流水)，Perschling, Ferschnitz (bercinica

意为桦林溪），Opponitz（sopotnica意为瀑布、水花四溅的小溪）。在Görach，Görtschach（gora 意为山，gorica 意为丘陵）和 Döllach，Dellach（dolje 意为山谷）等地名中都表现了靠近山脉和在山谷中的位置。Rafing 则根据它在平原（捷克语，raven）的位置而得名。Friesach，Fresach，Friesnitz（斯洛文尼亚语 breza，桦树），Ferlach（bor，一种松树），Edlitz（jedla 枞树），Gaflenz（jáblan，苹果树）等地方都因森林和树木而得名。Der Jauerling 是个槭树山（javornik）。用人名做地名的例子可举出拉德克尔斯堡（Radegoysburg），施塔默斯多夫（Stammersdorf，Stoymirsdorf），克罗伊岑施泰因（Kreuzenstein Kirzanesstein）。这些名字的混合组成本身就说明了斯拉夫居民成分的融和。

阿瓦尔人在东阿尔卑斯诸邦中，而且即使在他们所统治的范围内，也仅仅是少数。对移民区特别是对墓葬的发掘取得了有意义的器物（青铜壶器、三翎式箭镞、马鞍蹬和骑士长剑，原始陶器），首先足以为维也纳森林中的下奥地利菲利尔地区和布尔根兰作证。地名海姆堡（Haimburg）说明阿瓦尔人在克恩滕的一块殖民地（从前曾叫 Heunburg，Hunnenburg 或 Awarenburg。斯洛文尼亚语 Vobre意为“属于阿瓦尔人”）。拜恩-法兰克地区和阿瓦尔-斯拉夫地区之间经常有友好的和敌对的接触。有趣的是，在中世纪早期拜恩人的文件和传说笔记中所提到的大量日耳曼人名当中，也有少数几个说明受到了东方的，估计是阿瓦尔人的影响。例如：Chagan，Ilchagan，Tarchanat，Zotan，Huno。坟墓的随葬品也表明东西方的相互影响。

46

罗马文化的延续问题

在阿拉曼人和拜恩人，斯拉夫人和阿瓦尔人占领的地区里，罗

曼语居民及其物质文明与精神文化表现出来的情况很不一致。因此，对于从古代晚期到中世纪罗马的和罗曼的文化成分的延续问题，对于中欧地区就不能作一概而论的回答。有一种看法，认为“野蛮的”邻居占领了国土，必定使各省的罗马人极为痛苦、异常厌恶，是绝无仅有的一场大得无可估量的灾难，这种观点在人文主义时代，以及后来在启蒙运动时代，几乎成为共同的知识财富，极为普遍，但是，早已被人们所抛弃。日耳曼人和其他征服者，如阿拉伯人，都完全有能力鉴赏罗马的和希腊的文化成就，并逐渐掌握它们，而且结合自己过去的文化遗产去创造出新的文化。对于斯拉夫人来说也是这样，即使亚洲的骑射游牧民族在欧洲也不只是进行了破坏，虽然他们进行战争和统治的方式比其他民族更为残酷一些。

在保存古代文化遗产方面，因区域而有所不同，这在西方地区内表现得至为明显。在罗马和拉文纳等城市及其周围，在象库尔里提亚（Churrätien）或拜占庭所属的南意大利等范围狭窄的地区里，确实在古代和中世纪之间存在着生活方式上的一致。普罗旺斯和阿基坦的情况也相似。而在伦哥巴人的意大利和高卢北部，情况就完全不同。这些地方虽然还保持着语言上和文化上的罗马特色，但在法律、艺术、移民和民间语言方面都显示出了重大的日耳曼影响。还有一个地带，我们认为是莱茵兰和沿多瑙河上游诸省，也就是界墙区及与其紧邻的腹地。在这个地带里，罗曼文化的残存状态——越往东越少——虽然还清晰可辨，但是日耳曼的成分却占主要地位。在这里，由西向东持续程度的逐渐减少是很清楚的，而在从日耳曼移民区到斯拉夫—阿瓦尔人移民区的过渡地带中，以奥地利境内表现得最为明显。

罗马的—罗曼的（römisch-romanisch）文化形式与生活方式的

持续，有各种不同的表现。罗曼居民在阿拉曼人、拜恩人，可能还有斯拉夫人的环境中继续生存，令人印象非常深刻。格劳宾登的里提罗曼人（Rätoromanen），南蒂罗尔的拉定人，以及弗里奥尔人[①]，都从一度分布极广的阿尔卑斯山罗曼语居民成分中，取得了他们的语言，并一直保存到今天，他们的语言离意大利语已经相差甚远。除此之外，我们还在福拉尔贝格以南，在瓦尔高及蒙塔丰山谷，局部地，还在北蒂罗尔，在萨尔茨堡周围，以及在多瑙河南边上奥地利的某几处地方都发现有中世纪初期的罗曼移民。尤其是在八世纪和九世纪萨尔茨堡的死亡登记簿上和传说笔记中，我们看到有大量的罗马人名，其写法当然和古典的拉丁文写法相去甚远（Tonazanus, Ursinus, Vivolus, Savolus, Sambazolus, Fidolius 等等），但是也概括地讲到交付地租的罗曼农民（Romani tributales）。德意志人在自己的民间语言中把罗曼人称作瓦尔欣人（Walchen 或 Welsche）。这个词在诸如 Walgau、Walchenbach, Walchensee, Seewalchen, Straßwalchen, Wals 等名称中保存了下来。除了由邻居的日耳曼人起的这些"Walchen 名字"以外，也还有一些具有罗曼特色的地名。在他们聚居的地方，尤其在较小的地名上，人们同样会联想到罗曼民族性的延续。这类名字在萨尔茨堡周围特别多。除了 Wals（790 年，Vicus Romaniscus），这里还应提到 Anif（Anua），Gmain(Muona)，Gnigl（Glanicle, janiculum），Grödig（Crethica），Kuchl（Cucullae），Marzoll（Marciolae)和 Morzg（Marciaco)。很多多瑙河城市和城堡的名字经过民族大迁移时代以后保存了下来。Castra Regina, Castra Batava,

① 里提罗曼人(Rätoromanen)，是罗马化了的里提亚人(Räter)的遗民，共分三个族群：1.里提罗曼人，分布在上莱茵河和因河河谷。2.拉定人（Ladiner），在南蒂罗尔。3.弗里奥尔人(Friauler，又名 Furlaner)在意大利的东北部的弗里奥尔(Friaul)。——译者

Lentia, Lauriacum, Trigisamum，固然没有 Vindobona (Vindomina)但大概有凯尔特-拉丁文的 Veduna,还有 Arrabona,都以德语名字的形式保存下来或进行了改造,即雷根斯堡(Regensburg)、帕绍(Passau)、林茨(Linz)、洛尔希(Lorch)、特赖斯毛厄尔(Traismauer)、维也纳(经过其过渡形式 Venia, Wiene)和拉布(Raab)。其他如 Joviacum,Cetium,Fevianae,Carnuntum 等名字大都随着移民区一起湮没无闻了。不过在中世纪初期,人们对其中的 Cetium 和 Carnuntum 等几个名字还有些了解，但不大确切。在八世纪末,萨尔茨堡既叫老名字 Juvavum(Juvavia)，也叫新名字萨尔茨堡。这就显然表明罗曼移民与拜恩移民的同时并存。有些地方在继续使用罗马移民区的墙垣和建筑。雷根斯堡和萨尔茨堡的情况无疑就是这样。别的地方,比如维也纳和特赖斯毛厄尔,都可从考古发掘中或后来的城市外表中看到这种情形。有时候移民区搬迁了,但是人们还沿用它的名字,如林茨和齐尔(Zirl, Teriolis)就是这样。稍晚，有时候我们会遇到颇具特色的罗马式的方形地产，地中海各国常见的百米地产① 则要比小得多的方块地产更少。直到如今,在蒂罗尔的因河河谷、萨尔茨堡和上奥地利都还保存有这种地产的残迹。此外,农业耕作方式在民族大迁移以后还在流行,这点更为重要。葡萄种植和高山牧场就是这样。这些行业的专用术语都是从拉丁文中借来的(地窖、压酒器、果汁、桶塞、酒;乳酪、高山放牧)。在养蜂业中,罗马人的范例也很有启发作用。

罗马大道在中世纪早期是最重要的陆上交通道路，起过重大作用,对它们的保护,当然没有做过什么工作。罗马大道常常被叫做“大道”(Heidenstraßen)或“国道”(Hochstraßen)。人们一再指出, 48

① 百米地产(Zenturienflur)，其面积实际大于百米。Zenturiè 为古罗马丈量单位,实际面积应为714×710米。——译者

中世纪的行政边界看来是沿袭罗马时代的行政边界的，很可能这种历久不变的地理条件在当时也起了作用。古代和中世纪的教会的与世俗的管辖界线的一致性，在奥地利比在莱茵区更难以确定。

古代基督教诚然经受了严重的震动，遭到了许多损失，但还是站住了脚跟，这点尤其重要。古基督教的支柱是在当地留下来的罗曼人。七世纪和八世纪的传教活动就是和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有些地方的教堂建筑得到了保存、翻修或重建（例如拉凡特的主教教堂、洛尔希的劳伦齐乌斯教堂和玛丽亚-阿姆-安格尔教堂，以及上奥地利克雷姆斯塔尔的格奥尔根贝格附近的教堂），而且人们也回想起古老的护神节。圣劳伦齐乌斯（大概在洛尔希）、赫尔马戈拉斯（原为赫尔毛根内斯，在克恩滕）、策诺、诺诺祖斯、西辛尼乌斯（主要在蒂罗尔）的护神节，在有些地方可能都是从罗马时代流传下来的。以使徒主教彼得的名字和殉道者瓦伦丁与埃米利安的名字举办的一小部份护神节，可能也是如此。就自然条件来讲，保持固定于一地的老基督教的持续性，在有掩蔽的山区，特别是在阿尔卑斯山地区的南部、在克恩滕和南蒂罗尔倒是可能做到的。在靠近拜恩人与拉定人移民区边缘的泽本（Säben），有一个较小的主教城得以从古代晚期一直保全到十世纪末，这是完全可信的，那个主教城大概就是奥格斯堡的第二里提亚（Raetia secunda）主教区的退却点。以后主教驻地迁到了布里克森（992 年）。其他主教辖区大概在六世纪以前都已衰落了，如切莱亚（Celeia, Cilli）、特伊尔尼阿（Teurnia）和阿贡图姆（Aguntum），它们出席格拉多宗教会议的代表曾被提到过（在 572 年到 577 年之间）。591 年我们还在阿奎莱亚首府各主教致皇帝毛里提乌斯的呈文中看到有 Ecclesia Tiburnensis（特伊尔尼亚），Breonensis（Birunensis？维鲁努姆？）和 Augustana（奥格斯堡）。这就表明处于困境中的各主教辖区已倒

向法兰克帝国。但是，此后不久，特伊尔尼亚和维鲁努姆都成了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入侵的牺牲品。

处境维艰的阿尔卑斯山残存的罗曼居民，由于处于退却地位，单靠自己的力量再也不能对迁来的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的基督教化予以推动。这就需要外来的动力，需要爱尔兰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法兰克人以法兰克帝国的世俗政权为后盾，热情地进行传教。

法兰克帝国和中世纪早期基督教的传教活动

49

关于六世纪和七世纪东阿尔卑斯地区与法兰克帝国的关系，我们知道的很少。慓悍的国王托伊德贝特曾经计划与格皮登人和伦哥巴人结成联盟进攻拜占庭，在他死后，帝国东部在他的继承人托伊德巴尔德统治时期已经遭受到了种种损失。利用东哥特人与拜占庭人之间的斗争，以便在意大利北部定居的尝试，只是取得了暂时的成功。562 年法兰克公爵黑明攻打拜占庭的元帅纳尔赛斯遭到失败，结果法兰克在意大利的阵地完全被清除掉。当时拜占庭人企图通过在南克恩滕广泛布置的防御工事，来抵挡北方的入侵。伦哥巴人在意大利的殖民定居，以及随后进逼的阿瓦尔人与斯拉夫人的压力，继续损害了法兰克的实力地位。七世纪初，拜恩的部族国家几乎是独立的。最后一个精明强干的墨洛温王朝的国王达戈贝尔特第一（625 年至 639 年）才重新加强了法兰克的势力。就在这个时期，最初从西方来的传教尝试取得了成功。

这个法兰克的最早传教活动的中心位于高卢。爱尔兰僧侣和勃艮第僧侣都从当地的吕克瑟伊修道院前往东方。他们的目的地首先是阿拉曼人的部族地区。吕克瑟伊修道院的创建者、爱尔兰人哥伦班，不得不对诺伊斯特罗亚勃艮第宫庭（neustroburgundi-

schen Hof)的抵制作出让步，随后就在阿拉曼人中开始传道。他游访了博登湖边之地，并在古老的布里甘蒂乌姆城范围内进行活动（约在600年前后）。他有两个成就卓绝的弟子：加卢斯在湖南边继续对阿拉曼人传教，那里后来不久修造了一所修道院（圣·加仑）来纪念他的活动；同时奥伊斯塔修斯却从事对拜恩人的传教活动。他的随从人员阿吉卢斯可能属于拜恩公爵家族的勃艮第亲属。奥伊斯塔修斯死后，其他传教者一直活动到国王达戈贝尔特第一执政的末期。不过，这一代传教者在拜恩邦还没有取得持久性的成就。大约同时开始的、西方对斯拉夫人传教的最初尝试更是如此。斯卡尔佩河（法兰德尔）旁的埃尔农修道院的创建人阿曼杜斯曾冒险到"多瑙河彼岸"的斯拉夫人中间去。当时那里还缺乏传教的一切条件，而在拜恩却总算已经有了几处根据地。除了罗曼人的老基督教徒外，公爵家族也皈依了基督教。拜恩公爵的女儿特奥德琳德在与阿里厄斯教的伦哥巴国王奥塔里结婚（589年）后，就成了天主教在伦哥巴王国的先锋。有时人们还会想到，在拜恩部族中阿里厄斯教仍在继续活动，不过这个近乎情理的假设却缺少有力的文献依据。

50

七世纪末期，法兰克王国的势力在东方暂时有所衰落，传教的劲头也就随之不足。到了世纪交替时，也就是到了加洛林的权臣们，首先是矮子丕平着手改组国家体制的时候，传教才又继续着力地进行。三名使徒带着大批随从人员在拜恩人部族地区工作得很出色。埃梅拉姆大概是阿基坦人，他前往雷根斯堡公爵的宫庭，有一段时间工作得很有成效，但是，后来他卷进了阿吉洛尔芬格的家族纠纷之中，被公爵的儿子害死。莱茵兰人鲁佩特是罗贝尔廷伯爵家族的同族人或者近亲，他到了萨尔茨堡。据通常认为翔实可靠的最早传记，他是沃尔姆斯的主教（或许只是个副主教），出

身于皇族（墨洛温或加洛林皇族的亲属?）。奥地利最古老的萨尔茨堡圣彼得修道院就是由于他的活动而建立的。同时他的侄女埃伦特鲁迪斯修建了诺恩贝格附近的修女院。由于特奥多公爵赠予萨尔茨堡这块地方，传教活动就在罗曼人基督教徒居民中有了一个可靠根据地。后来拜恩的各代公爵都很支持萨尔茨堡教堂的创建，并继续赠予丰厚的地产。鲁佩特在萨尔茨堡是作为爱尔兰式的修道院主教还是作为教区主教进行活动，现在还弄不清楚。晚年，他回到他的莱茵兰故乡死去，他的遗骨在八世纪时还埋在萨尔茨堡。在埃梅拉姆和鲁佩特以后不久，科尔宾尼安也在拜恩活动，他也来自西方。弗赖辛主教辖区的成立可以追溯到他，他也在南蒂罗尔开展活动，常常在美朗附近的马伊斯居留。

除了法兰克的帝国政权和传教活动外，拜恩人还有一个办法巩固本地急待援助的基督教，这就是直接与罗马教皇建立关系。特奥多公爵去了一趟罗马，他要求派遣一个大主教。我们知道罗马教皇给选定的候选人马丁尼安发了训令。帕绍的主教维维洛是由罗马教皇或教皇代表任命的，或许这就是拜恩的第一个盎格鲁撒克森人的大主教。此后，拜恩有四个大主教辖区，就是萨尔茨堡、雷根斯堡、弗赖辛和帕绍。此外，在阿尔卑斯主山脊以南，还有那个古老的泽本，它与阿吉洛尔芬格公爵领地的关系还完全不清楚。

鲁佩特及其同代人所建立的教堂机构存在了多久，以及后来的主教区界线当时在多大程度上有效，我们简直不能判断。牧师的工作是既要劝说异教徒改宗，也要巩固长期没人照管的老基督徒的信仰。后来，下一代的传教士继承了鲁佩特及其助手们的工作，创建出永久性的成果来。这里主要是指，在特奥多的孙子胡贝尔特公爵执政期间(725 年至 737 年）进行活动的盎格鲁撒克森传

51

教士们的成果。首先应提到卜尼法(温弗利德)。他在拜恩不只是进行了传教士的活动——那时他的先驱者们已经完成了主要工作——而且首先是进行了组织家和教会政治家的活动。719 年，卜尼法第一次到拜恩作短期逗留。但，733 年他作为讲道者和视察者的活动却更为重要。738 年他到罗马逗留以后，带回罗马教皇的全权委托书。举行了一次宗教会议，迄今所有的主教们——卜尼法怀疑他们的神职的合法性——都不得不让步，唯独维维洛例外。卜尼法给萨尔茨堡任命了一个盎格鲁撒克森人约翰内斯。平时他还袒护自己的同胞。后来他的一个对手也成长起来了，这就是爱尔兰人维吉尔。约翰内斯死后，他就在奥迪洛公爵的支持下，从圣彼得教堂领导萨尔茨堡主教区。但是到卜尼法死后，他才接管主教的圣职。他有计划地实行卡兰坦尼亚的基督教化，因而立下了汗马功劳。该地的居民已经归顺胡吉贝特的继承人奥迪洛公爵(737 年到大约 748 年)。第一批教堂在老特伊尔尼亚（“Liburnia”)的旧址上，随后又在玛丽亚-萨尔(Maria-Saal)和因格林湖附近建立。在卡兰坦尼亚，传教活动继续取得良好的进展。奥迪洛的儿子和继承人塔西洛第三(约 748 年到 787 年)建立的两个修道院，即修造普斯特尔河谷里的伊尼申(769 年)和上奥地利的克雷姆斯河谷里的克雷姆斯明斯特(777 年)，都有助于支持对斯拉夫人的传教活动。当时持异端的斯拉夫人的一次暴动尝试失败(772 年)。圣珀尔滕修院是否象后来传说的那样，作为特格恩湖的分修道院而建成于阿吉洛尔芬格时代，现在还不能确定。克雷姆斯明斯特在修建时，在特赖森(格鲁恩茨维提区)一带无论如何已有房地产，当时那个地区仍处在阿瓦尔人的影响下。

修建的修道院当然不限于在斯拉夫人地区完成传教任务。古拜恩土地上的寺院数量相当大。贵族和主教们都和公爵家族竞相

创建新修道院。在奥地利境内，还应提到的有阿吉洛尔芬格家修建的蒙特泽寺（748 年）和马特泽寺（784 年），以及胡奥西贵族修建的沙尔尼茨寺（763 年）。沙尔尼茨寺象绝大多数贵族修道院一样，变成了主教的财产，并于 772 年迁往施勒多夫；平茨高的湖边的策尔寺（建于 790 年以前）搬往萨尔茨堡。在这些修道院里，可能有过爱尔兰僧侣制与本笃会僧侣制之间的竞争和斗争。无论如何，本笃会的会规在阿吉洛尔芬格时期的拜恩修道院里有据可 52 查。在其他修道院里，人们还动摇于本笃会的习惯与哥伦班派的习惯之间。很可能蒙特泽寺和克雷姆斯明斯特的情况也是这样，尽管据传说，蒙特泽寺的第一批僧侣是从本笃会的卡西诺山修道院来的。拜恩的修道院与法兰克的教堂保持经常的联系。其他联系甚至远达意大利的伦巴底和罗马。

古拜恩教会所属的大量人员进行了宗教的、教育的和写作的活动，对于它在精神史上的意义给予怎样高的评价也不为过。出身于美朗地区的弗赖辛主教阿尔贝奥曾编过一部古高地德语词汇手册（“Abrogans”）。对这部书的翻译和修订反映出了民间语言与基督教概念体系的斗争。他为圣徒埃梅拉姆和科尔宾尼安写的传记，是我们了解拜恩地区传教活动的重要文献。萨尔茨堡的维吉尔爱好自然科学。他主张地圆说，并以假名（Aethicus）作掩护，写了一本世界志，在书里他含蓄地暗示他的观点与卜尼法相对立。由维吉尔发起修建的萨尔茨堡的第一座大教堂是一件巨大的工程。萨尔茨堡的阿恩主教（后来任大主教）已经属于加洛林时代的人物，他与查理曼大帝周围的学者，特别是与盎格鲁撒克森人阿尔昆，过从甚密。创建克雷姆斯明斯特的那个公爵捐献给该教堂的塔西洛圣餐杯，表明了萨尔茨堡错综复杂的文化关系和艺术关系，以及法兰克的，而且特别是盎格鲁撒克森的影响。我们所知道的

文献几乎完全是神父们编著的，以宗教和教堂为内容的作品、圣徒列传、关于礼拜仪式和神学的论著，以及法律文献和公文档案制度均莫不如此。现存的手稿，如萨尔茨堡的库特贝尔希特抄本、克雷姆斯明斯特的米勒纳利乌斯抄本和蒙彼利埃的蒙特泽赞美诗集，在内容上和装璜艺术上都证明阿吉洛尔芬格的文化，以及与其有关的加洛林教会和僧院文化的水平之高。

阿吉洛尔芬格公爵领地的衰亡

阿吉洛尔芬格公爵领地的最有魄力的代表人物努力争取独立，加洛林王朝的权臣和(从 751 年起)国王想在东南方扩大和巩固法兰克王国的阵地，这两者之间的纷争决定了八世纪拜恩的历史。矮子丕平和卡尔·马特尔成功地贯彻了法兰克王国的这一政53 策。在对拜恩民族重建法兰克权力的时期，编纂了民法典，这就是Lex Baiuvariorum（拜恩法律），内有关于国王、教会和公爵的权限，贵族的称号和权势，以及关于保持国内和平、保护部族成员的财产、自由和人身安全的条款。法律是用拉丁文写成的，偶尔出现有古高地德语的法律语汇。这个法律一直沿用到十二世纪。不少现存的手稿都出自奥地利的修道院图书馆。西哥特人的成文法律，特别是邻居阿拉曼人的部族法律，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成为拜恩法律的榜样。Lex Alamannorum（阿拉曼法律）是在拜恩法律制订前不久，在兰德弗里德公爵统治时期制订的。

据揣测，亲法兰克的公爵胡格贝尔特的继承人奥迪洛可能出身于阿吉洛芬格家族的阿拉曼支系。743 年，他再度起来反对法兰克的统治。教皇的特使调解失败以后，奥迪洛在勒希河边被年轻的丕平所领导的法兰克人所打败，并被迫臣服。在丕平去世，以及从母系方面来看出身于阿吉洛尔芬格家族的、丕平的异母兄弟

格里福企图篡权失败之后，奥迪洛的小儿子塔西洛第三得到拜恩公爵领地作为自己的采邑。但塔西洛承认丕平为自己的监护人。丕平加冕为法兰克国王并与罗马教皇结盟(754年)，这都进一步加强了法兰克人的地位。756年拜恩人参与丕平向伦哥巴地区的胜利进军。次年，塔西洛在贡比涅对丕平及其儿子们作了效忠宣誓。此外，不久塔西洛便趁法兰克国王忙于其他事务之机，设法把拜恩人从依附于法兰克王国的地位中解放出来。763年，他拒绝随军征伐阿基坦。后来他和伦哥巴国王的女儿柳特贝尔加结婚，并通过与伦哥巴国王德西德留斯的合作加强了自己的地位。772年，塔西洛镇压了卡兰坦人的暴动，又进一步巩固了他的政权。但是，在拜恩的贵族中和在教会中，有一派倾向于法兰克。所以，当查理曼大帝于774年征讨德西德留斯并占领了伦哥巴国时，塔西洛宁愿保持中立。781年，拜恩公爵向窝姆斯的胜利者作出了效忠宣誓，并提交人质以表诚意。但是，法兰克国王似乎仍然感到他的地位还很强大，所以，787年有一支法兰克军队迫使公爵完全臣服。一年以后，公爵受到起诉，罪名甚多，其中说到他对丕平不忠，还有与阿瓦尔人相勾结，被判死刑，最后被减刑为修道院幽禁。阿吉洛尔芬格家的世袭公爵领地就这样结束了。

谴责塔西洛与异教的阿瓦尔人合作，当然也不是全无理由的。54 公爵灭亡以后，拜恩边界上出现了阿瓦尔人的军队，但是，后者在伊布斯菲尔德和第二次在多瑙河上的遭遇战中，均被拜恩人和法兰克人击退，对弗里奥尔的进攻也同样失败。788年，查理曼国王委任他的内弟、即出身于施瓦本家族的王后希尔德加德的兄弟格罗尔德为拜恩行政长官。同时军事占领阿瓦尔王国的计划也已成熟。关于边界问题的谈判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791年，有三支军队越恩斯河进入阿瓦尔人地区，进行集中攻击，夺下了维也

纳森林和坎普河畔的要塞，成功地插入敌方的纵深地区。在随后几年里，出兵不多的征战也都取得了成功。阿瓦尔王国早已丧失了它那旧日的权势。部族首领间的内部纷争继续削弱这个王国。然而，还要打硬仗，才能使阿瓦尔人屈膝(803 年)，因为他们的拖延战术不是那么易于被人所破。被从前的臣民斯拉夫人陷于困境的残余阿瓦尔人被指定居住在菲沙河与莱塔河之间。查理曼大帝在东南方占领的新土地可供拜恩-法兰克人和斯拉夫人进行移民活动。

东南方的加洛林边区

被占领地区的政治组织，采取建立边区行政长官制的方式来进行，这种方式在查理曼大帝及其继承人统治时期，在边境地区是很常见的。其他较小的伯爵领地和当地部族领主控制下的地区都归边区行政长官管辖。格罗尔德第一除了管辖拜恩以外，还受托管辖多瑙河畔的阿瓦尔人边区。799 年，他在东部的一次战斗中阵亡。当时对边区的行政管理和对拜恩的行政管理是分开的。多瑙河上的马尔克①(德文中的“Ostmark”一词还没有造出，相应的拉丁文词汇“marchia orientalis”以后才得到确证)大约包括恩斯河与维也纳森林之间被占领的土地。“上潘诺尼亚”由此往东直抵拉布河，再往东南则是“下潘诺尼亚”，其幅员经巴科尼尔森林和普拉滕湖，直抵辽阔的匈牙利低原。后来法兰克的统治一直伸展到西尔明②。这个边区联盟与恩斯河以西的古拜恩的特劳恩高之间，有过某种短期的联系。卡兰坦酋长们也都隶属于这个最高的边区

① 马尔克(Mark)，在德文中含义为“边区、边界”，其统治者即为“边区行政长官”(Markgraf)。——译者

② 西尔明(Syrmien)，现属南斯拉夫的一个平原，位于德劳、萨瓦和多瑙三河的下游，盛产小麦、玉米、葡萄酒和水果。——译者

长官。弗里奥尔边区行政长官和他同级。他负责守护萨瓦河与德劳河之间的南边区，后来还监护伊斯特里亚，以及达尔马提亚地方 55 的克罗地亚人的公爵。边境领土上的安宁未被干扰，这种情况是罕见的。斯拉沃尼亚人的公爵柳德维特极其危险的起义(819—823年）失败后不久，卡兰坦的斯拉夫人失去了大多数本地的酋长，从此便归拜恩的行政长官管辖。起义者与保加利亚人的王国建立了关系，促使德意志人路德维希、即虔诚者路德维希的儿子和副国王，去清除多瑙河畔的阿瓦尔人保护国的，就是保加利亚人的威胁(822年以后)。事实上，保加利亚人曾一度挺进到萨瓦河与德劳河之间的地区（827年），但是，德意志人路德维希收复了失地(838年)。保加利亚人的继续进攻遭到失败(853年)。后来，路德维希得到保加利亚汗博哥里斯(米夏埃尔)的有力支持，以对付他的叛逆儿子卡尔曼。864年，保加利亚的诸侯与路德维希在图尔恩举行了会晤。

当匈牙利低原的东南部被属于突厥部族的、但已处于斯拉夫化过程中的保加利亚人统治着的时候，在摩拉维亚的法兰克边区和西斯洛伐克的北部，另一个地地道道的斯拉夫人的国家巩固了。九世纪下半叶，莫伊米尔、腊斯蒂斯拉夫和斯瓦托普卢克等诸侯从他们所居住的城堡里对摩拉维亚和西斯洛伐克地区实行统治。他们的城堡现已为令人印象深刻的考古发掘所证实。在他们统治下，这个“大摩拉维亚”王国成为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这支力量在与法兰克人和保加利亚人闹纠纷时能够立于不败之地，直到匈牙利人侵袭时为止。它有时候，主要是在好战的斯瓦托普卢克统治时期，对加洛林王朝的边区构成严重的威胁。莫伊米尔把他在诺伊特拉的前任普里比纳赶走。普里比纳逃进边区。边区行政长官拉特博德友好地接纳了他。于是，普里比纳在特赖斯毛厄

尔接受了洗礼。几年之后，他成了一个以普拉滕湖旁莫斯堡(Moosburg，即 Zalavár）为中心的、依附于法兰克帝国的潘诺尼亚斯拉夫人的国家的君主。斯洛文尼亚人和德意志人的移民象潮水似的涌进了这个地区，该地区在宗教上由萨尔茨堡兼管。除了因边界问题而引起的短暂冲突外，普里比纳与法兰克王国的关系是融洽的。他在一次摩拉维亚人入侵时牺牲，继位的是他独立行事的儿子科策尔。

在九世纪的三十年代，边区的组织发生了变化。弗里奥尔和伊斯特里亚从东南边区联盟中分离了出来。而这块留下来的地区便归一位大官管辖，即东部地方长官。这位地方长官监督着东方边区(marchia orientalis)、上、下潘诺尼亚、卡兰坦尼亚和萨瓦河与德劳河之间地区里的各个长官。地方长官的权势地位往往激起暴动，也常常造成私通帝国敌人的叛逆行为。在边区行政长官拉特博德和贡达克尔执政期间，我们看到这些现象。但是，德意志人路德维希的儿子卡尔曼一再造他父亲的反。个别长官之间同样也发生过严重的纷争，摩拉维亚人曾干预过威廉与恩格尔沙尔克两边区行政长官的儿子们与阿里博伯爵之间的争执纠纷。土地荒芜了。抵御外敌的力量也大为削弱。九世纪末，奥地利境内多瑙河畔和卡兰坦尼亚的边区行政长官在边区组织中似曾占主导地位。卡尔曼的儿子、卡尔曼在边境地区和在东法兰克王国政府中的继承人、克恩滕的阿努尔夫在做国王时，对东南方的安全也很关切。

在九世纪时，被占领的边区的世俗组织与拜恩故土上的世俗组织相脱离。在教会管理方面，萨尔茨堡于 798 年升格为大主教辖区以后，该边区仍然与萨尔茨堡教会省中的古拜恩地区合并在一起。在选择萨尔察赫城[①] 这件事情上，查理曼大帝对那时萨尔

① 即指萨尔茨堡城，该城位于萨尔察赫(Salzach)河畔。——译者

茨堡主教区的负责人、当时最杰出的教会人物之一阿尔恩个人的信任显然起了决定性作用，因而没有选择雷根斯堡、弗赖辛和帕绍。但是在东南部到拉布河为止的多瑙河流域却是由帕绍前往传教的，卡兰坦尼亚和潘诺尼亚则是由萨尔茨堡前往传教的。拜恩人的传教活动无疑也伸展到了摩拉维亚。萨尔茨堡和阿奎莱阿两大首府间的界线曾有争议，它是811年根据皇帝的裁决，沿德劳河划定的。大量教堂修建起来了。在奥地利境内，有许多加洛林王朝的教堂建筑艺术品，但保全下来的只有林茨的马丁教堂和卡恩堡教堂。还有几处经过发掘，我们从残存的基础中找出一些建筑平面图，其中就有普拉滕湖旁扎拉堡教堂的建筑略图。查理曼大帝创建维也纳彼得教堂的说法，只是根据维也纳人文主义者沃尔夫冈·拉齐乌斯的一种学术上的推测。实际上，圣彼得教堂和圣鲁普雷希特教堂都可追溯到加洛林时期。护神节的选择可从它暂时属于萨尔茨堡主教辖区一事得到说明，或者从大主教阿尔恩到潘诺尼亚作传统的巡视旅行时授予僧职一事得到说明。拜恩的高僧团和修道院都在新占领的土地上得到了丰厚的地产。赫里登、马特泽、蒙特泽、莫斯堡、下阿尔太希、克雷姆斯明斯特、圣埃梅兰(雷根斯堡）和特格恩湖都部分地占有面积很大的田产。萨尔茨堡和帕绍在九世纪时由于皇家的多次封赠而积聚起来的地产更为可观。雷根斯堡和弗赖辛两主教辖区也都参与了对东方的开拓和殖民。主要是在靠近多瑙河的葡萄种植区，其次在维也纳森林以东 57 以及潘诺尼亚的平原上，都可以看到广大的教会地产。确切地找出原始文献中所列举的田庄的地点，当然并不都是办得到的。

归根到底，在边区里，教会的和世俗的地产都要追溯到皇家的封赠，因为被征服的土地都属国王所有，所以要由他作为财产或采邑转赐他人。世俗领主中有的是东方的伯爵家族的成员和古拜恩

的贵族，他们都曾大力促进过殖民事业。在边区的地名中一再出现教会显要和世俗官宦的名字（阿恩斯多夫、恩格尔沙尔克斯多夫＝恩策尔斯多夫、格罗尔丁、威廉斯堡、拉波滕施泰坦）。基姆高和维也纳附近的地名惊人地一致，说明有一个在基姆高定居、在创建特格恩湖和圣珀尔滕时就已积极参与的家族：基姆湖畔的地名奥特克林、西弗林和希清与维也纳地区同样相邻的村镇奥塔克林、西弗尔林和希清相当。但，又如哈京和本青等其他地名，既在下拜恩出现也在边区里出现。遇到这种情况，对移民们的地方来源可以作出推论。奥地利的方言也表明拜恩人的迁入。可能有数量不大的阿拉曼人移民和法兰克移民也进入了东方，因为边区的贵族和教会同那些部族有着多方面的关系。

关于东南边区移民的社会状态的材料得到证实和可资利用的都很少，但从中可以看出，全靠没有自由的奴隶和半自由的佃农经营的大田庄为数颇多。自由的小地产比在旧区更为少见。不过农村居民的状况似乎相当不错，只要他们作为防卫农民应召参加军事操练。奥地利境内的“贵族”(Edlinger)有一部分可以追溯到加洛林时代的可服兵役的屯垦者。多瑙河边区里较大的移民区（如圣珀尔滕、图尔恩和维也纳)周围的乡村居民都被视为防卫农民。到加洛林朝末期，贵族的骑兵勤务已经占了优势，情况也就随之恶化，更不必谈保加利亚人、摩拉维亚人和匈牙利人入侵所造成的荒芜。在古拜恩的特劳恩高和在边区里，巴尔沙克人的特权等级阶层显然人数很多，他们是有遗产的纳税居民，残余的罗曼人集团在其中起过一定的作用。有几处地名，特别是在上奥地利(因菲特尔的帕尔沙伦，阿特尔湖旁的帕尔沙勒恩，西尔宁附近的巴尔沙勒恩）和在施蒂里亚(巴赫斯多夫，据文件，1126 年时为莱布尼茨附近的帕尔沙尔希斯多夫)、还有在下奥地利的(波特沙尔，波特朔拉赫，

1233年出现的帕尔沙里希，以及1314年出现的波尔沙利希），都 58
可追溯到他们的移民区。九世纪中叶，由于普遍的发展，相应地减少了巴尔沙克人的权利（848年雷根斯堡的审判会议）①。

九世纪下半叶，对加洛林王国东南方的边区危害愈来愈甚的，不只是敌对的武装势力。自该世纪的中叶以来，萨尔茨堡大主教辖区的有力地位和拜恩-法兰克教堂的文化事业，都因拜占庭世界推进传教活动而受到严重威胁。特萨洛尼克（萨洛尼卡）人基里尔（或康士坦丁）和梅托德这两学识渊博的兄弟，从前在黑海边进行传教活动时已积累了宝贵经验，此时把传教活动转入喀尔巴阡山地区，在那里，他们完全脱离了法兰克王国及其教会组织，在分属不同部族的斯拉夫人中间进行工作。用民间语言翻译《圣经》和做礼拜仪式，既方便了传教，也容易取得君主腊斯提斯拉夫和科策尔所提供的援助。罗马教皇哈德良二世委任梅托德为西尔明大主教，这样就使潘诺尼亚的传教事业合法化。萨尔茨堡因其大主教区的权力受限制而提出强烈抗议。为这件事写成的关于拜恩人和阿尔卑斯山斯拉夫人改宗的备忘录（Libellus de conversione Bagoariorum et Carantanorum）保存下来了。对我们来说，这是那个时代教会史和移民史的极其宝贵的文献。梅托德在拜恩的一次宗教会议上被捕（基里尔于869年死在罗马），但在教皇约翰八世的干预下，又被释放。他便投奔腊斯提斯拉夫的继承人斯瓦托普卢克的大摩拉维亚王国。这时候用斯拉夫语做礼拜仪式在罗马引起了疑虑。梅托德得到一个德意志人主教维欣作副手。但这位斯拉夫使徒死了以后，他的事业在摩拉维亚人和潘诺尼亚人中也就

① 据卡尔·勒希纳猜测：十六至十八世纪流行的奥地利人绰号“帕沙勒”（Paschaler），大概表示他们是一贯庆祝复活节（Pascha）和其他节日的民族，这个绰号归根到底是与Barschalken（巴尔沙克）这个等级名称有关。

彻底崩溃。梅托德的弟子都转移到保加利亚，他们在那里进行活动的条件较好。

这次教会纷争的最后阶段已经孕育着新的危险。862年，兰斯大主教欣克马尔的年报中第一次报道在潘诺尼亚出现了一个从来不知道的新敌人马扎尔人。四十年稍多一点以后，加洛林在东南方的边区就成了这个新来敌人的牺牲品。

59

加洛林的边区在匈牙利人的侵袭中瓦解

九世纪末，法兰克编年史家关于匈牙利人活动的报道多了起来，他们往往把匈牙利人简称为"匈奴人"。这个名字反映出新来者唤起的不愉快印象和回忆。东法兰克人和摩拉维亚人相互谴责对方曾把危险的敌人，即把部分渊源于芬族、部分渊源于突厥族的部族联盟当成了盟友，而把通往潘诺尼亚的道路指给了他们。说匈牙利人在喀尔巴阡地区找到了大平原，认为这就是欧亚草原地带的最后延伸地，说他们象在他们以前的匈奴人和阿瓦尔人一样目标非常明确，这肯定是不对的。与他们的先行者相同，他们也不是自愿的。克里米亚和黑海东北草原上的突厥民族的哈萨尔人王国，由于受到俄罗斯人和佩舍内根人(另一个突厥部族)的两边夹击而动摇时，哈萨尔察汗的这个受保护的匈牙利民族就往西方退避。据马扎尔人后来记载的部族传说，他们是从"Lebedien"(顿河边之地)迁往"Etelköz"(比萨拉比亚"河峡")去了。零星的部队摸索着开往潘诺尼亚，独立地或者作为雇佣兵，投入了东法兰克人与摩拉维亚人之间的战斗。881年，他们在维也纳附近(apud Wenian)与法兰克的军队发生了冲突，于是维也纳在间歇许多世纪之后第一次重新被人提到。896年左右，在与更为强大的佩舍内根人斗争的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这个民族的大部份才在潘诺尼亚定

居下来。马扎尔人从新占领的潘诺尼亚根据地出发，沿途进行破坏和骚扰，搅得保加利亚人、拜占庭人、东法兰克人和麐拉维亚人十分不安，连意大利北部也受到了严重的侵害。906 年，他们消灭了摩拉维亚人的王国。斯瓦托普卢克的儿子们的彼此不和加快了王国的复灭。拜恩人最初进行了几次成功的防御。900 年，柳特波德伯爵在多瑙河以北战胜了匈牙利军队。其他军队则于一年之后在菲沙河畔被打败。恩斯堡的建立确实说明，从此可以认为古拜恩地区受到了威胁，虽然另一方面，拉菲尔施泰滕关税条例(906 年以前）好象表明在多瑙河畔的边区里活跃而正规的贸易仍然继续存在。匈牙利人造成的危险必然排除了大规模的经营。拜恩军队于 907 年夏天向东方发动进攻，但是 7 月 4 日在普雷斯堡附近的战役中，几乎全军覆灭。在这次战役中阵亡的有边区行政长官柳特波德、许多其他贵族、萨尔茨堡的大主教以及泽本和弗赖辛的主教。多瑙河流域的边区就这样丢失了，恩斯河又成了(极不稳定的）边界。匈牙利军队实行大迂回，一再越过这条边界向西方推 60 进。拜恩人的新公爵，柳特波德的儿子阿努尔夫逐渐地重新组织起防御，短暂的停战使全国得到了休息。阿努尔夫在与国王康拉德一世的一次冲突中，甚至还逃到匈牙利人那里去避难 (916 年)。后来又打起仗来，943 年，阿努尔夫的兄弟贝特霍尔德在韦尔斯附近重创匈牙利人。但是，955 年 8 月 10 日，国王奥托第一在奥格斯堡附近取得决定性胜利，消灭了一支与拜恩起义者们合作的匈牙利进攻部队，才开始发生重大的转折。从此以后对于奥托王国，从而也是对于拜恩人的故土来说，危险是排除了。而且几年之后就能着手收复边区。

毫无疑问，匈牙利人的统治对边境地带的居民来说，是一场严重的考验。关于马扎尔人在征战中蹂躏劫掠、关于屠杀男人和奴

役妇女的材料，很难视为编年史家的夸大其词而不予理睬。但是，把他们所碰到的居民在臣服后就消灭，那是不符合占领者的利益的。进贡对马扎尔人是很有利的。许多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丧了命，其余的逃跑了，国内剩下的人仍很可观。因格洛克尼茨附近主要发掘地得名的德意志-斯拉夫人的克特拉赫文化的出土文物把匈牙利人统治的时代衔接起来。加洛林的地名和护神节的继续存在也证明了某种连续性。在宗教方面，马扎尔人象大多数草原民族一样，是宽容的。如果说他们对教堂和修道院进行了抢劫和破坏，那么，驱使他们这样的是对教堂财宝的贪欲，而不是宗教的狂热信念。他们可以接受传教活动，所以，在被占领的地区里，允许继续过宗教生活。926 年，弗赖辛的主教德拉库尔夫沿多瑙河到恩斯河口以东的地区作了一次旅行，中途在格赖因险滩上遇难丧命。或许在后来传奇式人物边区行政长官吕迪格尔的材料中（最后见于《尼贝龙根之歌》）也有对德意志贵族在处于马扎尔人管辖下的东方地区进行活动的回忆。匈牙利人自己在下奥地利和施蒂里亚地区定居的为数不多。只有施塔茨附近靠近塔雅河的很少几个地名（其中有翁格恩多夫和法尔巴赫，文献上为 Valwa; falva，马扎尔文为“村庄”）表示有个别的马扎尔人移民村。在莱塔河和马尔赫河以西的地区，马扎尔人的插曲没有在人种或文化上留下经久不衰的影响。

四、巴奔堡家族和奥地利诸邦的形成

(976年至1246年)

收复边区和巴奔堡家族在奥地利的起源

勒希费尔德战役之后，似乎还没有立即采取收复多瑙河畔的 61 旧边区的大规模行动。国王奥托第一的弟弟、拜恩公爵海因里希已于955年死去，海因里希的同名儿子还未成年。但，在随后的岁月里，国王把主要的注意力转向意大利。962年，奥托在罗马加冕称帝，于是便形成了延续几个世纪并在奥地利历史上打下烙印的德意志王权与罗马帝国思想的那种结合。六十年代末才进攻匈牙利，很快取得了成功。970年后不久，任命了一个边区行政长官布克哈德，他或许有点象《尼贝龙根之歌》中的吕迪格尔那样，驻节珀希拉恩，而且大概还与拜恩公爵沾亲带故。所以，"争吵者"海因里希公爵对他的堂兄奥托第二皇帝造反的时候，这位边区行政长官便参加了反抗。这件事使布克哈德失去了官职，就是到了海因里希公爵与王室达成谅解，并且在985年收复拜恩和在989年收复卡兰坦尼亚的时候，他再也没得到这个官职。

976年，任命了边区行政长官柳特波德到边区去接替布克哈德。巴奔堡家族从柳特波德起，在奥地利进行了二百七十年的统治。根据弗赖辛的主教奥托的范例，对这个家族历史所作的研究得出"巴奔堡"这个名字，主教本人就出身于这一家，他把这个家族追溯到巴奔堡的阿达尔贝特，此人是国王康拉德一世的仇敌，于

906年被处决，但在传说中却被赞扬。要说清楚家世和亲属关系，当然还得继续进行研究。这不是单纯为了族谱学细节上的乐趣，而且还因为了解巴奔堡的家族史和领地史是深入理解中世纪早期奥地利君主家族形成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前提。毫无疑问，巴奔堡家族和阿努尔芬格尔家族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在十世纪时还很少见的柳特波德的名字就说明了这一点。此外，还有以下这种体验：在那个时代委任显要官员是要考虑是否与前任官员有亲属关系。62 最后，阿努尔芬格尔家族和早期的巴奔堡家族一样，具有政治上对抗萨克森王朝的拜恩支系的特色。但是如果有谁把柳特波德看成是阿努尔夫公爵的小儿子，那就是言过其实。也有人想联系到阿努尔夫的兄弟贝特霍尔德，但缺乏具体的证据。边区行政长官柳特波德的一个兄弟也叫贝特霍尔德，他管辖着拜恩的诺德高，这个地区大概是907年阵亡的柳特波德的遗产。关于边区行政长官柳特波德之妻里歇察，我们知道她是奥托第一的孙女，是勒希菲尔德战役中阵亡的"红脸人"萨利尔公爵康拉德的女儿。柳特波德和里歇察生下的儿子海因里希继他的父亲当了边区行政长官。海因里希的继承人就是他的儿子阿达尔贝特。阿达尔贝特在族谱中的地位还不大能肯定。弗赖辛的奥托和中世纪奥地利的其他著作家都是从阿达尔贝特开始叙述这个家族的族谱的。所以，我们重现巴奔堡家族的早期历史时，常常要依赖猜测。①

在布克哈德时期，他们往东已经到达特赖森。在柳特波德时

① 巴奔堡人的著名外号（例如威严者柳特波德、常胜者阿达尔贝特、善战者弗里德里希等等）最初都是由拉迪斯劳斯·宗特海姆系统地运用到克洛斯特新堡世系表（Tabulae Claustroneoburgenses, 1491）中。有一部分，例如圣者利奥波德或海因里希二世·雅索米尔戈特（Jasomirgott）等，受到了从前的编年史家们的影响。大概在1510年左右，有一位不知名的抄写人员把巴奔堡家族的外号加到托马斯·埃本多弗尔的奥地利编年史中。后来这些外号便成了编写奥地利爱国史书同人的共同财富。

期，格赖芬施泰因附近有“悬崖”的维也纳森林山脉已经成多瑙河以南边区的东部边界。在多瑙河的北边，人们最初局限于一条十分狭窄的滨河地带，这个地带往东达到坎普河口。991 年拜恩公爵海因里希第二取得了对匈牙利的胜利。能够越过维也纳森林带，也许就是这场武功的结果。1002 年维也纳的近郊肯定已在德意志人手里，因为在那一年，海因里希第二皇帝这位 973 年谋叛者和 991 年胜利者的儿子，给边区行政长官海因里希封赠了一块领地，即位于利辛和特里斯廷之间、以及多瑙河北边坎普河与马尔希河之间的二十胡弗① 的土地。也许人们当时已经到达莱塔河。

对马扎尔人的进击并未局限于多瑙河地区。就在柳特波德第一次被确证为边区行政长官的 976 年，卡兰坦尼亚作为独立的公爵领地克恩滕从拜恩分离了出来，划归阿努尔夫的兄弟贝特霍尔德的儿子阿努尔芬格·海因里希。从克恩滕出发，在克赖因（933 年初次被提起）和后来的施蒂里亚境内夺取了并建立起了一些边区。被命名的有穆尔河畔的卡兰坦尼亚的边区（970 年）、桑河畔的边区（连同齐利）以及佩陶的边区（980 年）；除此之外，十一世纪时弗里奥尔、伊斯特里亚和韦罗那等边区也都置于克恩滕公爵领地管辖之下。从此罗马德意志帝国在东南方有了行之有效的边区机构。 63

奥地利的名字

边区行政长官柳特波德于 994 年中暗箭身死，凶手本来是要暗杀另外一个人的。在他的儿子和继承人海因里希执政期间（994 年至1018 年）出现了足以证明奥地利这个名字（Ostarrichi）的最早证据，这个名字原指沿多瑙河的巴奔堡统治区（也许只是其中的一

① 胡弗（Hufen），德国古代的农田面积单位，其大小因地而异。——译者

部分），最先见于996年和998年奥托三世的文件中，其中的第一份到了海因里希二世皇帝时才在文字上完善起来，并加盖了印章。很可能在加洛林时期就有一个相应的名称，用于称呼那个多瑙河畔的边区，所以在九世纪的一个德文一拉丁文的注释中，把“oriens”和“Ostarrichi”等同起来，当然那时还没有明确地提到后来奥地利这个地区。当时整个东法兰克王国间或也被称为“Ostarichi”。在中世纪中叶，“国”（rîche，rîchi）这个词不一定与广袤的领土联系在一起，而在现代语言中却不由得不联系在一起。它只表示一个或大或小的统治范围。十一世纪的作品里，“东方国”（Osterlant）的名称，较之“奥地利”（Osterreich）这个词，更为人们所乐用。不过，后者逐渐通用，终于只有它独占优势。Austria 这个词儿最早在国王康拉德三世于1147年为克洛斯特新堡颁发的文书中得到印证，它无疑是参照法兰克人或伦哥巴人对帝国东部的称呼（Auster，Austria，Austrasia）而制定的，它终于排除了比较古老的、很不确切而又质朴无华的形式“oriens，terra orientalis”，以及其他类似的词儿，最后得到了完全的胜利①。“奥地利”这个名字的出现当然并不意味着奥地利历史方才开始。然而，它关系到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实，它宣告了那些自己把自己的国土称为奥地利，并且不久自己也被邻居们称为“奥地利人”（Osterreicher）的人们的某种休戚与共的关系。国家意识的开始产生是可以预期的了。后来在十二世纪前半叶，最早的具体文字证据可以为这种意识作证。

---

① “Ostmark”这个德文名词，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历史术语和政治术语中，起过重大作用，然而，在中世纪的史料中，很少用来指巴奔堡家族的边区（Mark），正如它也很少用来指加洛林王朝的边区那样。

巴奔堡边区的巩固

巴奔堡家族诺德高支系的亲属于十一世纪初对王权徒劳无功 64 地进行了对抗和造反,因而损害了自己的地位,巴奔堡王室的另一子孙施瓦本公爵恩斯特第二在反对他的继父康拉德二世皇帝的战争中灭亡(这个事件已为民间传说所采用)。这时,奥地利的巴奔堡人却加强了自己的地位,尽管他们并非没有遭到挫折。于是,对匈牙利边界不得不给予主要的关注。1000 年过后不久,爱尔兰的朝圣香客科洛曼,凯尔特人的一个小公侯的儿子,在施托克劳附近被当作匈牙利间谍抓起来杀死,这说明奥地利居民的猜疑心理。当(为时已晚地)证明科洛曼无罪的时候,他的尸体便被送到了梅尔克,那里很快产生了一种对科洛曼的崇拜。这位爱尔兰的殉难者后来简直被当成奥地利的护国神。在北方也需要保护边界的安全。边区行政长官海因里希参加了征讨一度占领摩拉维亚并从那里威胁奥地利的、武力强盛的波兰公爵博莱斯拉夫·赫罗布里的战斗,并获得成功。匈牙利和摩拉维亚同样是接壤的邻邦,海因里希的儿子和继承人阿达尔贝特(1018 年至 1055 年)不得不对他们用兵。1030 年,皇帝康拉德第二最初率领德国军队直抵拉布河边,对匈牙利发动一次战役,受到重大挫折。康拉德由于缺乏粮秣而被迫撤军,在维也纳附近(或市内)被围,后被迫投降。在这次变故以后,从摩拉维亚边界上的特拉赫特向南到达多瑙河上菲沙河口的对面处,然后在多瑙河以南顺着菲沙河划一条线,该线以东的地区都割给了匈牙利国王斯特凡。马尔希河至莱塔河的边界暂时消失了。皇帝和巴奔堡家族间显然关系不甚友好可能是造成失败的原因之一。总的来说,萨利尔人奉行的是一种支持小领主反对大领主的政策。奥地利也是采取这个态度的。在十一世纪四十年

代，做到了把边界重新推向摩拉维亚和匈牙利，在新获得地区，其他家族的地位似乎超过了巴奔堡。1041年，康拉德的儿子和继承人、国王海因里希第三终于镇压了进行叛乱的波希米亚公爵布热蒂斯拉夫。边区行政长官阿尔布雷希特的儿子柳特波德占领了一个设防的移民区，可能就在莱赛尔贝格附近。但是，关于北魏因菲特尔的这个新攻克地区的下一个消息(1055年)就说明，这个"波希米亚边区"已归阿达尔贝罗伯爵所有，此人并不属于巴奔堡家族。65 正当国王对受他保护而又很不可靠的彼得和一名匈牙利本民族的候选人萨穆埃尔·阿巴之间的匈牙利王位之争进行干预的时候，阿达尔贝特和柳特波德又一次出人头地。这位边区行政长官的儿子得到的领地是在东魏因菲特尔直抵马尔赫河、在多瑙河以南则在菲沙河与莱塔河之间所收复的失地上建立起来的"新边区"。但是他夭逝(1043年)之后，这个"新边区"又被授予边区行政长官西格弗里德，国王曾经两次赏赐，给了他大量地产(415胡弗)。西格弗里德的家世是不大了然的，但他与巴奔堡家族毫无关系，则可以肯定。边区行政长官阿达尔贝特大概也得到过多次颁赏，拥有了特里斯廷和皮斯廷之间(1035年)、皮拉赫河畔(1043年)以及扎雅与塔什尔巴赫之间(1048年)的新地产。毫无疑问，巴奔堡家族的地产，就范围和价值而论，都不及其他家族的领主。

老早定居的几个家族显然拥有加洛林时代的遗产，如泽姆普特-埃贝斯贝格家的伯爵和韦尔斯-兰巴赫家的伯爵，这些老家族都在十一世纪中期断子绝孙，但是，继承他们地产的并不是巴奔堡家的人。埃贝斯贝格家的财产大概使来自基姆高的西格哈德家族，即后来被称之为沙拉-派尔施泰因-布格豪森诸伯爵原先就已经颇为重要的地位变得更加强大。就在这个时期与巴奔堡家的边区相邻的韦尔斯-兰巴赫家的伯爵领地皮滕转移到了福姆巴

赫尔家。西格哈德家和福姆巴赫尔家在多瑙河两岸，特别是在维也纳附近，都广有地产。在多瑙河以北，前一时期在古拜恩人的阿特高，普莱因家（和哈尔德格家）的诸伯爵比较突出，再往西，波伊根（在霍恩附近）和雷布高的诸伯爵的赫显家族，以及开拓马赫兰的佩尔格领主们也都比较出类拔萃。与巴奔堡家族沾亲带故的哈德里歇家族也很重要。在维也纳森林以西的地区里，应该提到在卡兰坦尼亚边区里牢牢扎下了根的特赖森的领主们，其次是作为雷根斯堡的大教堂执事而颇有影响的伦根巴赫的领主们。在这些家族里，有些较小的贵族的亲属也属于这些贵族之列，它们不仅都拥有广袤的地产，而且有自己的采邑、专用教堂、庇护权、行政权、高级的和较低级的裁判权。他们修建城堡、尽力促进移民和垦荒活动，而这些活动又增长了佃户的数量，增加了收入，扩大了权势和声望。

边区最后还杂居着一系列享受豁免权的教会领主。萨尔茨堡、帕绍、弗赖辛和雷根斯堡，不管在老移民区还是在边区的土地上，都拥有很可观的田产。所以，大移民区恩斯、圣珀尔滕、赫尔措根堡、阿姆施特滕和毛特恩大都因为皇家的封赏而属于帕绍高僧团，另外，主教辖区由于康拉德第二的馈赠而拥有多瑙河以北地区的十分之一。萨尔茨堡的地产主要在瓦豪，弗赖辛的地产主要在伊布斯河谷和马希费尔德，雷根斯堡在埃尔劳夫的地产则稍为少些。在拜恩的各修道院中，特格恩湖和下阿尔太希在整个边区就地产的范围与价值而论，凌驾于所有其他修道院之上。 66

由于这种局面，人们也许会说，尽管被史家称之为“常胜者”的阿达尔贝特在位时间长而且成绩斐然，但是，在十一世纪中叶时还根本不能确定巴奔堡家族是否会战胜与之进行竞争的宗教势力和世俗势力。在阿达尔贝特的儿子和继承人恩斯特统治下，当巴奔

堡家在边区行政长官阿达尔贝罗和西格弗里德死后,掌握了波希米亚边区(该区的一部份,即哈尔德格伯爵领地除外)和新边区的领导权的时候,这个家族的地位才巩固起来。前领主们的私产则是另一种情况,我们看到边区行政长官西格弗里德的产业后来落入沙拉和派尔施泰因的手中。边区行政长官恩斯特和他的前任一样,在对匈牙利的战斗中颇为突出,1060年左右,这场战斗进行得并非一帆风顺。当然,1074年以前,帝国的东部边界就已向前移过莱塔河。国王海因里希第四在1074年至少曾把莱塔河和诺伊齐德尔湖之间的领地授予弗赖辛的僧侣团体,同时采取了巩固城市维泽尔堡城防的措施。但是,此后不久又放弃了占有和统治的要求。自从匈牙利国家在国王圣斯特凡统治时期(997年至1038年)皈依了基督教以后,向东扩张时期基本上结束。但是,这个王国有一个独立于帝国教会的格兰大主教辖区,在世所公认的西方基督教国家之林中,作为一个自主的王国维持了自己的独立,尤其是这个国家拥有一个能够切实保障边界安全的体制,特别是它还拥有一支很可观的军事力量。由于多次王位争夺以及异教徒对此所作的反应尝试招致了外国的干涉。斯特凡国王的事业在随后的几个世代里都未能完全实现,但是德意志王权的力量自海因里希第三死后也遭到了削弱。到了1075年,僧侣政治和帝国之间延续几乎达半世纪之久的斗争终于爆发,从此帝国的势力长期不能成其为支配东南边界的有力因素。就在1075这一年,国王海因里希第四的忠实臣仆、边区行政长官恩斯特讨伐起义的萨克森人,在翁斯特卢特的战役中阵亡。一年以前,国王还以拉布河地区的大面积馈赠地扩充了巴奔堡家的财产。

在国王海因里希第四和教皇格列高利第七之间开始发生授爵封地之争的年代里,恩斯特的儿子和继承人、边区行政长官利奥波

德第二奉行的是一种变幻无常的政策。动摇于皇帝与教皇之间，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一直是巴奔堡政策的特征。首先，在忠于国王的阵营中，利奥波德于 1076 年得到一次较大的地产赏赐，而且又是在拉布河地区。这大概是巴奔堡家从德国统治者那里得到的最后一次馈赠。无主的生荒地当时已经绝大部分封授完毕。利奥波德于 1078 年第一次站到教皇一边，经过短暂的屈从后，他在格列高利阵营中一位宗教上和政治上的领袖人物、萨克森贵族出身的帕绍主教阿尔特曼的影响下，重新站出来反对海因里希。国王把边区奥地利授予了可靠的波希米亚公爵弗拉蒂斯拉夫，此人大概是为了旷日持久的塔雅河畔的边界纠纷而与奥地利人结下了仇，遂出兵进攻这个边区。波希米亚的军队，在雷根斯堡主教的兵勇的支援下，在迈尔贝格战役中战胜了奥地利人（1082 年）。多瑙河以北地区被蹂躏破坏，利奥波德不得不屈服。失去茨奈姆和特拉赫特以南、塔雅河沿岸的土地，大概就是那次战败的必然结果，但是仍然允许利奥波德占有边区。现在边区行政长官避免公开偏袒某一方，但是后来却被视为宗教改革运动的拥护者。这次改革运动，由于革新派修道院的活动，首先是格特魏格修道院的活动，在国内的居民中获得了进展。

边区行政长官利奥波德第三和国君地位的形成

父亲反抗皇帝失败，促使继任奥地利边区行政长官职务的儿子利奥波德第三（1095—1136 年）在行事上比较谨慎。但是，随着皇帝与教皇间斗争的持续下去，帝国的诸侯们逐渐都认识到，海因里希第四本人是签署和约的主要障碍，这时利奥波德却投向反叛的皇太子海因里希第五。边区行政长官娶了他的妹妹阿格妮斯为妻（1106 年）。与皇帝联姻无疑提高了巴奔堡家的威望。可以设

想，阿格妮斯结婚的时候带来了在奥地利的皇家地产。规模宏大的克洛斯特新堡教堂，教堂附近修建的大行宫，奥地利第一所西迪斯显教团所属的圣十字修道院的创建，如同给当时已被视为巴奔堡家的梅尔克修道院大宗地产的馈赠一样，说明边区行政长官从此所拥有的财力。当然，利奥波德本人是很善于扩张权力和领地的。在维也纳森林修建克莱因玛丽亚策尔教堂时，他排除了和他沾亲的家族的捐助，在与格特魏格和帕绍主教发生的多次争执中，这位边区行政长官顽强地维护了自己的要求。但，当他在与教会对手发生纷争而不得不满足于妥协，并且自觉地避免把冲突推向极端的时候，巴奔堡人却成功地击退了享有高度自由的家族。因此，到他执政的末期，他也统治着维也纳市，该市可能原是西格哈德家的地产，但克劳洛特新堡仍然是首府。在奥地利的成就把帝国各诸侯的注意力引向利奥波德，以致到萨利尔王朝随着海因里希第五死去(1125 年)而灭绝的时候，利奥波德被认为是有权继承王位的人。这位行政长官采取了拒绝的态度，在祖普林堡的洛塔尔当选后，国王和施陶费家的兄弟(利奥波德之妻阿格妮斯与施瓦本公爵弗里德里希第一次婚姻所生的儿子)爆发了一场斗争，利奥波德采取了完全中立的态度。这样作首先是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这种对奥地利关怀备至的态度、对教会捐赠丰厚的产业，都使得这位君主受到人民和教士们的爱戴。因此，1136 年利奥波德逝世的时候，教皇英诺森第二赞颂了他对罗马教廷的忠诚。利奥波德死后一个世代之久，他就被直接了当地称为“虔诚的边区行政长官”，接着他在克洛斯特新堡的坟墓就成了受人景仰的圣地。到十四世纪中叶，有人要把利奥波德封为圣徒，这件事到 1485 年终于实现。从 1663 年起，利奥波德就成了下奥地利的邦保护神。实际上，这个伟大的边区行政长官四十多年的统治意味着奥地利国君地位形

成过程中的一个决定性阶段。利奥波德作为第一个巴奔堡人，在公文上使用了独特的词儿 “principatus terrae”（邦国）。在他那个时代，在一件文字资料，即帕绍主教阿尔特曼的传记中，第一次提到了“邦法”(“ius illius terra”)。在这部作品中，已经显示出一种正在形成的奥地利国家意识。

奥地利公爵领地

出人意外的是，继承边区行政长官利奥波德第三统治国家的，不是两个大儿子阿达尔贝特和海因里希中的任一个，而是老三利奥波德。他表现出是一个很有才干的政治家。德国的诸侯于1138年选举他的异母兄弟施陶费尔家的康拉德(第三)为国王，这对利奥波德第四的地位是很有利的。由于巴奔堡家与施陶费尔家之间的亲属关系紧密，在新一代国王与占有巴伐利亚(Bayern)和萨克森两大公爵领地的强大的韦尔芬家之间的斗争中，奥地利 69 国君的家族站在施陶费尔家一边，就是容易理解的了。康拉德第三进攻巴伐利亚，并把巴伐利亚公爵领地转交给了边区行政长官利奥波德。由于韦尔芬家在萨克森站稳了脚跟，在巴伐利亚也有拥护者，所以，巴奔堡家自然就在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斗争中被卷了进去。再者，边区奥地利很容易地沦为巴伐利亚的一个无足轻重的附属国。利奥波德第四在短暂的强有力的统治之后，死于1141年10月。继位人是才智似乎不如他的弟弟海因里希第二“雅索米尔戈特”。本想通过这个巴奔堡人与韦尔芬族公爵、骄傲者海因里希的遗孀格特鲁德的联婚来消除几个争夺巴伐利亚的家族之间的冲突，但是这个企图由于婚后不久格特鲁德即告死亡而未果。海因里希公爵在卷人匈牙利的王位纠纷的时候，在莱塔河受重创（1146年）。与萨尔茨堡和雷根斯堡的纷争也毫无成果。

这位公爵在参加第二次十字军远征时，和他的弟弟弗赖辛主教奥托都被卷进普遍的灾难。虽然如此，东征还是增加了公爵和他的家族的威望，因为他在东征期间与拜占庭公主特奥多拉·科姆年娜缔结了婚姻。这大概又是一个政治上的结合，大概与德意志帝国和东罗马对匈牙利的钳形攻势计划有关。这件婚事给巴奔堡宫廷，也许还给更广大的阶层引进了宝贵的拜占庭文化成份。

不久，巴奔堡政权出现了一个危险的转折。红胡子弗里德里希一世皇帝(1152 年至 1190 年)在执政之初，就想解决与韦尔芬人之间的冲突,因这个冲突对帝国的组织有损害。所以,他决定把巴伐利亚移交给雄狮海因里希，即被废黜的骄傲者海因里希公爵的儿子。这个措施必然意味着大大削弱海因里希·雅索米尔戈特的地位,因而受到了巴奔堡人长期的抵制,这是可以理解的。由于诸侯们于 1156 年秋在雷根斯堡帝国议会上的斡旋,经过长期谈判以后，达成一项对奥地利后来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妥协。海因里希·雅索米尔戈特放弃了巴伐利亚，而和他的妻子特奥多拉一起得到奥地利作为采邑,这时皇帝就把奥地利升格为公爵领地。那个时候巴奔堡的那对夫妇交给皇帝七面旗，他们取回其中的两面作为奥地利君主领地的象征。在辉煌的帝国大会上依法进行了放弃仪式和封赠仪式。值此时机，皇帝(1156 年 9 月 17 日)颁发了一道诏书,即所谓 Privilegium minus (小特权书),它与后来公爵鲁道夫第四的内容丰富的赝品相反。文件的文字只有抄本保存了下来。那里边写道,公爵的爵位可由男系或女系继承；此外,海因里希公爵及其夫人,如遇无子嗣之情形时,准许他们有自己指定继承人的权利(ius affectandi)。未经公爵同意，不得在他的国土里行使裁判权。这种条款肯定也有其财政上的意义。最后出席国王召

70

见日① 典礼的义务仅以巴伐利亚为限，而参加帝国军队出征的义务仅以奥地利东部边界上的征战为限。关于确定女性继承权及自定继承人的规定，人们估计有可能受了拜占庭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妇女同受采邑方面也有所表现。就是在君主伉俪的晋级（或保留级别）上也都看得出，照顾拜占庭人的情绪是起了作用的，虽然反匈牙利的联盟当时已经放弃。裁判条款并不是从前人们所设想的那样，是针对皇帝的裁判权的，倒可以说是针对裁判权的任意扩大，以及贵族和主教的其他权力的任意扩大。然而，由于条款的规定相当广泛，也由于对特权的主观和客观的理解发生显著的变化，所以，在公爵弗里德里希二世时期，即当1245年进行谈判把奥地利升格为王国的时候，人们就想到窜改红胡子的证书(弗赖辛的奥托的佐证)，以证明该证书的存在。在进行了许多研究，从各个方面探讨了这个问题之后，整个文件被确认为真实，特别是从前常常发生争议的关于女性继承人和 ius affectandi（自定继承人）的规定。然而，另一个问题则是几乎解决不了的，即，弗赖辛的奥托报告中说，皇帝把边区奥地利，连同自古以来属于它的“人们所提到的那三个”伯爵领地升级为公爵领地。关于这些伯爵领地的位置，以及关于它们与拉菲尔施泰滕关税章程(约903年)里已说到的三个伯爵领地是否一回事，人们已经提出了许多论文和假说。其实，这“三个郡”(tres comitatus)倒是应该在多瑙河以南，恩斯河与特赖森河之间去寻找。

在评价小特权书的历史意义时要防止两种极端，即要防止对有关规定所产生的影响贬得过低或估计过高。不久以后，波希米亚的弗拉蒂斯拉夫和雄狮海因里希在某些方面还得到了广泛的特

① “国王召见日”(Königliche Hoftage)：国王在宗教的盛大节日往往召见各地的贵族和诸侯，商讨国家大事，寻求援助和宣布决定。——译者

权。过了两代人之后，诸如此类的特权就不再成其为特权了。但是，重要的是，奥地利一时居于首位，鲁道夫第四根据小特权书勇敢地提出了他的要求，这些要求到十五世纪都成了帝国的权利。71 最后，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权上一再出现的关于女性继承人的条款，也于1713年在国事诏书中终于得到了实现。我们当然不能相信弗里德里希第一愿意把奥地利从帝国里分离出去，但是，如果没有小特权书作前提，这个国家后来的特殊地位简直是难以想象的。我们不可忘记，中世纪中期另一个有决定性的宪法即英国大宪章，在起草的时候，也没有人想到后来当人们从英国近代议会制意义上去解释它时它能起到的那种作用。1156年，涉及到的只是解决巴伐利亚的问题。只有随后的发展才同似乎在准备完全独立的那种开端衔接起来。这样一来，特权就成了形成独立国家实体的出发点之一，就我们所知，1156年时，没有一个参加者曾经表示过希望这样。

海因里希公爵有两个重大措施与1156年的事件在时间上有密切联系：第一，把首府从克洛斯特新堡迁往维也纳，在当时人们喜欢把维也纳与从塞维里尼传中得知的法维阿尼斯(Favianis)等同起来；其次，在新首府创建苏格兰人修道院。公爵把雷根斯堡雅各修道院的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僧众都召到这个修道院里来。

公爵在长期统治之后和他的夫人都埋葬在这里(死于1177年)。在他统治的后期，他不得不就弗里德里希一世皇帝与罗马教会的纷争表态。公爵最初站在施陶费尔一边，到后来则采取广泛的中立态度，甚至可以说是消极的态度。

巴奔堡奥地利的兴盛时期

海因里希的儿子利奥波德在奥地利执政——一个弟弟海因里

希只好将就着统治默德林——的时候，皇帝弗里德里希一世和罗马教皇亚力山大三世缔结了威尼斯和约，这个和约将给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地区以比较安宁的日子。但是，利奥波德颇象他的父亲，也卷进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普热米斯利德家族的王位之争。最后得势的是他所支持的弗里德里希公爵。奥地利与其北方邻居争吵不休的边界问题于1178年得到解决。接着是弗里德里希皇帝与实力强大的韦尔芬公爵雄狮海因里希之间的公开冲突。海因里希失败，利奥波德公爵参加了诸侯裁判法庭，剥夺了这位韦尔芬人的巴伐利亚和萨克森两处的公爵领地(1180年)。趁此机会，奥地利在西边得到了哈泽尔格拉本与大米尔(在西米尔菲特尔)之间的地区，很可能从前他们就对这个地区提出过要求。也很可能特劳恩高的一部分已属巴奔堡家所有。维特尔斯巴赫继韦尔芬人之后掌握了巴伐利亚的公爵领地的统治权，巴伐利亚的权势由于施蒂里亚作为一个独立的公爵领地分离了出去，而受到削弱。在这里，巴奔堡家不久便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扩张权力的机会。奥塔卡尔家的最后一个施蒂里亚君主得了不治之症，不可能希冀有任何子嗣。所以，为了避免在国内发生一场争夺王位的斗争，就订一个章程来解决继承问题。1186年8月17日在恩斯附近的格奥尔根贝格举行了奥托卡第四与奥地利的利奥波德第五之间的会议，会上达成了关于巴奔堡家在施蒂里亚继承问题上的各项协议。施蒂里亚和奥地利的许多贵族人士和寺院的代表都参加了谈判。当时颁发了许多文件，其中有两个保存了下来，一个是，范围广泛的"格奥尔根贝格权利书"保证了施蒂里亚贵族家臣的权利；第二个文件是关于国内修道院的地位。奥地利公爵得到了施蒂里亚君主的无数修道院的管辖权，以及在特劳恩高的私有地产的继承权。最后，明确规定了奥地利和施蒂里亚永远由同一个君主统治。皇帝当然是了解

72

格奥尔根贝格权利书中的广泛规定的，一年之后他便正式予以批准。1192 年继承开始，红胡子弗里德里希的儿子和继承人海因里希第六把施蒂里亚授予利奥波德第五。当时正是那个巴奔堡人和法国的菲利浦第二及英国的理查德第一一起参加第三次十字军远征回来。率先出征的弗里德里希皇帝于 1190 年在小亚细亚的萨列夫河上遇难身亡。此举最重大的成就是征服了阿孔。当时在英国国王与利奥波德公爵之间出现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英国的史料也提到了这场争论。英王让人从一座攻下的城楼上取下奥地利的战斗标志（一个盾形徽章或一面旗帜），公爵便立即退出了十字军。所以说阿孔事件具有历史性意义。然而，与攻城有关的、关于公爵选择红—白—红色的锦带盾牌作为徽章的传说就不是这样，据说公爵的白色战袍除了挂剑的宽腰带以外都沾满了斑斑血迹。实际上，奥地利公爵弗里德里希第二的玉玺上就有这样一个锦带盾牌。或许它就是从继承了利奥波德第六的波伊根-霍亨堡-维尔德贝格的伯爵的徽章而来的。彼得·冯·埃布洛的徽章集刊（1197 年）有一个图形，也许可以说明锦带徽章的更早的起源。那个图形关73 系到一件意义极为重大的事件：英国国王被拘留在奥地利。

1191 年，年轻的皇帝海因里希第六的处境十分艰难。韦尔芬人的党羽似乎占了上风。那时韦尔芬党的保护人、英国的理查德从圣地回国途中，企图穿越巴奔堡的领土，在维也纳郊区埃德贝格被人认出并抓了起来。理查德最初被公爵看管在迪恩施泰因，后来遵照协约转交给了皇帝。理查德国王为获得最后释放，必须交付一大笔赎金。其中付给公爵的份额可能相当高。这笔赎金用于增加新设施，扩建和加固城市，特别是资助维也纳铸造货币，铸币由被公爵授予特权的“共营社”（“Hausgenossen”）来进行。维也纳分尼币取代了巴奔堡以前在克雷姆斯铸造的钱，而且压倒了萨尔

茨堡大主教辖区弗里扎赫地方的分尼币。由于对待十字军战士理查德不当，公爵被逐出了教会，他在1194年年底因骑马失事身死时，才恢复了教籍。理查德赎身金未交的余额被免除，但是显然没有退钱。公爵最后采取的措施是为了巩固他在施蒂里亚的地位。维也纳往南方去的大路是意大利工人扩建的，而且为了保卫它在匈牙利边界上的安全，修建了维也纳新城。

利奥波德第五亲自安排了儿子们的继承。与格奥尔根贝格条约的规定相反，他对巴奔堡各国实行分治。长子弗里德里希第一是个很有教养的公侯，得到了奥地利；他的兄弟利奥波德得到了施蒂里亚。1198年，弗里德里希在十字军远征中死去，于是利奥波德便得到了全部遗产。他的统治(1194/98—1230年)一般地可以说是巴奔堡时代最成功最突出的时期。

与拜占庭公主——皇帝伊萨克·安格洛斯的孙女也叫特奥多拉——的结婚重新修复了奥地利王室与东南方的老关系。第四次十字军远征(1204年)占领了君士坦丁堡，这当然减轻了这场联婚的政治意义。在利奥波德的帝国政策中，对施陶芬的同情占着优势，这也是符合皇室的传统的，因此，他是施瓦本的菲利浦家的党羽，并参加了弗里德里希第二反对韦尔芬皇帝奥托第四的暴动(1212年)。这位巴奔堡人对教会很是热心，证据是：他创建而且富丽堂皇地装饰了西斯迪显教团的利林费尔德修道院(约1206年)，重修了查尔特勒派的盖拉赫寺院(1209年)，以及对在奥地利各地蔓延着的异教徒运动所作的严厉处置(卡塔尔人、瓦尔登斯人)。前往法国南部征讨阿尔比教派和前往西班牙征讨回教徒的远征(1212年)，以及前往圣地和前往埃及的远征，都是遵循了这个方针。在埃及，他在达米特城下参加了十字军(1217年)。他也同样支持德意志骑士团和托钵僧教团。这位君主的种种措施似乎都 74

是以建立本国教会为目的的。他企图为奥地利建立一个维也纳总主教区，这就是鉴于帕绍主教区过分扩张而采取的计划，这个计划肯定是合情合理的，但并未得到实现，尽管他能够指出这个欣欣向荣的城市的意义，而且毫无疑问他也继承了维也纳的法维阿尼斯(Favianis)传统。帕绍，特别是萨尔茨堡的抵制是比较强烈的。大主教埃贝哈德第二建立了萨尔茨堡的泽考（1218年）和拉凡特(1225年)两个特别主教区，以此来防范针对施蒂里亚的类似计划。另一方面，公爵成功地、有计划地扩大了国君对修道院的管辖权。

公爵的贵族政治在某些方面令人想起了圣徒利奥波德的行事。利奥波德第六清除了国内无数声势一度颇为浩大的领主。他继承了阿斯佩恩-法尔肯贝格的各个领主（1205年）和拥有地产的波伊根伯爵（1210年)，还没收了佩尔内格家族的财产（约1216年）。他从维茨堡的主教手里买到了兰巴赫和韦尔斯(1216年)，从豪恩斯贝格家族手中买到了林茨城(1211年)，从乌尔利希·冯·克拉姆手中买到了米尔菲特尔的自由市(1217年)，此人后来把自己在马赫兰的世袭家产遗赠给他。在这里，国君掌握了一条通往波希米亚的大道。公爵对十三世纪初兴盛起来的城市特别偏爱。在他执政时期，维也纳得到重大的扩展，达到这个城市进入近代很久仍然保持着的那种规模。无论如何，在1208年以前，他就给维也纳颁发了城市法，1221年，他又再次颁授。他曾短期返回克洛斯特新堡，后来，便选定维也纳为首府。恩斯至今还保持着利奥波德的城市法(1212年)，其中对图尔恩、施太尔、塔雅河畔的拉城(Laa an der Thaya)的特权都有相当明确的说明。国君的领地就这样一直不断地得到扩大和加强。凡在外来统治者面前能保持独立而不依附巴奔堡(后来为哈布斯堡)宫廷的封建君主领土外的采邑(feuda extra curtem)，只不过是粉饰从前贵族享有的自

由权的一点残余而已，这种残余对于公爵领地再也不成其为危险。此外，又有新地区划归巴奔堡管辖。1229 年，利奥波德公爵收买了归还给安德克斯家诸伯爵在克赖因的弗赖辛采邑。这样一来，皇室的权力就接近亚得里亚海滨。在弗里奥尔新取得的土地为商业上提供了宝贵的前沿阵地。贵族领地波尔德诺内尤其重要，那是利奥波德从卡斯特洛家的领主们那里买到的(1222 年以前)。

75 虽然根据巴奔堡家的传统，利奥波德所关心的主要是自己的领地和邦国，但是，他却也丝毫没有疏忽帝国的政策。他的女儿玛加丽特与弗里德里希第二的儿子、德意志国王海因里希(第七)结婚，显然证明了这位君主及其家族的声望。这种声望由于皇帝弗里德里希第二和教皇格列高利第九在亚浦利亚的圣日耳曼诺签订了和约（1230 年）而大为增高。德意志国王海因里希第七为了讨好利奥波德，把他女儿与英王亨利第三的结婚计划搁置一边。但是，取得这个成就以后不久，利奥波德便死于缔约城，遗体运往他所创建的修道院利林费尔德。

巴奔堡君主国的危机及其终结

这个具有明确目标的君主和眼光远大的政治家的死亡，使得奥地利的政局发生了不利于这个国家的变化。这不仅仅因为二十岁继承父业的老三弗里德里希（他的两个哥哥利奥波德和海因里希都比他父亲死得早)，尽管为人有魄力，作战时很英勇，但显然缺乏政治眼光。国君威势急剧上升，这一令人印象深刻的景象掩饰不了别的、有时甚至是敌对的势力。官吏贵族，即家臣和骑士，都还保持着明显的法律依附性，这种依附性在关于各类领主的家臣成员的婚生子女的硬性规定里有所表现——但是，这些新贵族已经很强大，能够追求自己的政治目标了，这样，他们也就成了君

主们的对手了，就象从前贵族自由陪臣的家族那样。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贵族的壮大当然是人们始终都觉察到的。市民阶层也和家臣们一样，迄今都与国君合作。但是，现在外来的范例，如直属帝国管辖的雷根斯堡的范例，具有引诱人们冲破君主在城市里的统治的力量。此外，在估定税收和提高税收时可能发生了一些磨擦，或者，在和犹太侨民的关系中也可能发生磨擦。教士们也同以邦统治者或总督的名义提出的要求严重地对立。这种要求遇到国家发生灾荒时特别着力地予以贯彻，为此还有有争议的领地权问题。最后，罗马教皇与皇帝之间一再爆发冲突，也妨碍了教会与邦君之间的合作。还有各个邻邦的君主们都在随时准备利用巴奔堡公爵各个领地的内部困难。

76 弗里德里希与尼西亚的残余的希腊皇室后裔拉斯卡里家族的公主（据传说名叫苏菲，不大可靠）的初婚破裂之后，早在利奥波德第六未死以前，又与安德克斯-美朗的阿格妮斯结了婚，由于新娘的陪嫁加强了他在南方巴奔堡所属诸邦中的地位。从这时起他自称为“克赖因的主人”（dominus Carniolae)，此外，阿格妮斯给他带来的陪嫁还有舍尔丁和里德两处领地。这样，那时奥地利便第一次进入后来的因菲特尔。但是，弗里德里希亲政后不久，发生了一起在屈恩林家的兄弟俩、即奥地利邦元帅海因里希和弟弟哈德马尔领导下的巴奔堡官员们的密谋叛乱。暴动者大约控制了这个国家在多瑙河以北的重要部分，但是抵挡不住公爵采取的有力的反措施。公爵攻破了阿格施泰因、迪恩施泰因和魏特拉等城堡，便把暴动镇压下去。哈德马尔在战斗中阵亡，海因里希固然保住了邦元帅的头衔，但是，屈恩林格家族的地位从此衰落。后来的传说歪曲了这些战斗的真相，把国君与贵族之间内政上的斗争说成是公爵针对拦路抢劫、无恶不作的骑士采取的行动（很可能是把

中世纪晚期的现象加到了屈恩林家的人身上)。屈恩林家有争议的关税权可能起了某种作用,但是,我们却不可把这个对邦国的扩大作出过如此重大贡献的家族与平时就腐朽不堪的靠拦路抢劫为生的贵族这一很成问题的概念联系在一起。

在这以后的年月里,公爵对其邻邦巴伐利亚、波希米亚和匈牙利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斗争,其中大多数都没取得什么成果。但是,与皇帝弗里德里希第二的关系也大大紧张起来,尽管当时文献材料曾经暗示他的内兄、即德意志国王海因里希曾两次反抗皇帝,但是,这位巴奔堡人都没有积极参加。不过,公爵一定是同各个方面的人都发生了冲突,无论如何,他在国内外的敌人,各城市的代表,以及贵族、教会和邻近的诸侯、甚至他的逃往波希米亚的母亲特奥多拉,都在美因茨的召见日(1235年)提出了对这位巴奔堡人的起诉,他没有应传出席。正如他回避在皇帝召见日出头露面那样。皇帝在一份生动地概括了罪状的长篇文告中宣布公爵不受法律保护,这位施陶费尔人自己也参与了这一决定的执行。尽管不顾一切地动用了一切可使用的手段,特别是教会财产,弗里德里希公爵还是迅速丧失了土地,并且只能呆在维也纳新城和施塔海姆贝格要塞里。转到对手手中的维也纳得到了皇帝册封的帝国直辖市的地位(1237年)。皇帝也认可了施蒂里亚官员的权利,还答应不再把他们的邦与奥地利一起置于同一统治者之下。这时与伦巴底联盟和教皇政权的战斗重又爆发,这位施陶费尔人被战斗召唤到意大利,于是巴奔堡人不久就收复了他的邦国。当时他似乎是为了管理上的方便而把特劳恩高与施蒂里亚分开的,但是,这样就创造出了独特的"恩斯河上游的(奥地利)邦"[1]存在的前提。后来这个邦简称为"上奥地利"。这第二个名称最初很可能指的是伊布 77

[1] "Land ob der Enns","恩斯河上游之邦",即"上奥地利",下文同。——译者

斯河和恩斯河之间的地区，那里自中世纪末期以来一直是被算作下奥地利的。于是奥地利就分裂成两个邦。林茨市很快取得了恩斯河上游之邦的领导地位，而维也纳则理所当然地仍然是下奥地利的首府和公爵驻节地。根据德意志帝国的采邑法，恩斯河两岸的奥地利还是一个统一体。当时,——或者在 1236 年时已经——书面确定了较老文本中的奥地利普通法,即所谓诸侯法,但也照顾到了贵族的特殊地位。

当蒙古人灭了俄罗斯的鲁里基登各诸侯国进而威胁中欧的时候，巴奔堡所属各国都面临一种新的令人不安的危险。波兰和匈牙利已经受到蹂躏。弗里德里希公爵趁邻邦遭遇危难之机，占据了大部分原是德意志移民开拓的三个边境郡,即维泽尔堡、厄登堡和艾森堡(1241 年),但是,在蒙古人出乎意料地撤退后,巴奔堡人却未能长期据守这三个郡。

皇帝与教皇的斗争再度变得激烈起来，弗里德里希公爵最初靠近帝党一边。因此，根据狂热的教皇特使阿尔贝特·贝海姆的动议，暂时把弗里德里希公爵逐出了教会。但是教皇英诺森第四却倾向于因公爵疏远了皇帝而给公爵以适当的报酬。而他的儿子重新采纳利奥波德第六关于建立维也纳主教区的老计划，实际上表示和教会关系得到了改善。不过,巴奔堡的祖护对皇帝来说也是重要的，双方在维罗纳举行了谈判。由于弗里德里希公爵没有子嗣,施陶费尔想到了巴奔堡所属各邦归还给帝国的可能性。所以，他觉得以下办法是可行的：可以把奥地利和施蒂里亚升格为一个王国,由巴奔堡的男系来世袭相传,而克赖因则成为公爵的采邑。皇帝本人为了把施陶费尔在继承权上的要求固定在邦的统治权上，想和公爵的侄女格特鲁德结婚。施陶费尔的其他要求可以和玛加丽特与国王海因里希结婚所生的一个儿子弗里德里希联系起

来。当要起草关于奥地利诸邦升格的文件时，谈判失败了，其原因可能是由于教会加强了对格特鲁德的拒婚的支持。所以国王的计划仍然是一个没有实现的规划①。这就是人们极为重视的在奥地利各邦巩固皇室政权的尝试，它附带的一个明显目的是使奥地利各邦都成为皇帝政权的新支柱。奥地利后来的地位似乎已经定下来了。

在那些年里，公爵大力进行了活动，修道院和贵族得到了特权，城市也是如此。对维也纳、维也纳新城及海因堡颁发的公告的原文都流传了下来。给奥地利的犹太人颁发了对他们颇为有利的保护证书。而且它的内容还被波希米亚、匈牙利和波兰的犹太人法所采纳了。结局却是来得非常意外：弗里德里希公爵在塔雅河以南施塔茨附近成功地袭击了波希米亚的军队之后，于 1246 年 6 月 15 日在莱塔河边一场奥地利军队攻打匈牙利人颇为顺利的战役中阵亡。弗里德里希一死，巴奔堡家族的男系也就断绝(默德林旁系已在 1236 年死绝)。如当代的人所感觉到的，奥地利历史上一个总的来说还算幸运的时代结束了。

中世纪中期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各邦的政治史

甲、施蒂里亚

在东阿尔卑斯诸邦中施蒂里亚是第一个与巴奔堡的奥地利建立密切联系的。匈牙利人的入侵极为严重地动摇了加洛林王朝在施蒂里亚地区的殖民事业，使它的国家结构遭到了破坏。勒希菲尔德战役之后的反攻成了在那里重建边区机构的前提。970 年第一

① 我们知道把奥地利升格为王国的计划还有四个：弗里德里希第三时期(据人文主义者卡斯帕尔·布鲁席乌斯的一个在别处未得到证实的材料)；马克西米利安第一时期(特别在 1515—1517 年)；费迪南第一时期 (1520—1521 年)；费迪南第二时期(1623 年)。

次提到的穆尔河中游的卡兰坦尼亚边区的统治中心，最初位于在维尔东附近的亨基斯特堡。这个亨基斯特堡在十一世纪中叶匈牙利人入侵时一度沦陷，在收复时被毁。那个时候，格拉茨还是最初由斯拉夫人兴建的一个小殖民村。政治中心已向北方转移。这时已经有了四个伯爵领地，即在恩斯河谷、犹登堡附近、在莱奥本周围和在米尔茨河谷，都与卡兰坦尼亚边区紧密相连。在十二世纪里，人们把这个地区总称为“上边区”。公元 1000 年前后，卡兰坦尼亚边区和四个伯爵领地一样，都受阿达尔贝罗·冯·埃彭施泰因管辖。阿达尔贝罗这个家族是用他们在犹登堡附近的城堡来命名的，它来自恩斯河西的乌弗高。现已查明，阿达尔贝罗的父亲马克瓦德就是施蒂里亚地区的边区行政长官。在 1012—1035 年间，阿达尔贝罗把他在恩斯河、米尔茨河和穆尔河的地位与克恩滕的公爵头衔联在一起。皇帝康拉德第二的萨利尔家族由于与埃彭施泰因家多次发生严重冲突而结成了仇敌。在他撤了阿达尔贝罗的职务以后，卡兰坦边区就转入阿诺德手中，阿诺德出身于同属巴伐利亚的韦尔斯及兰巴赫伯爵的家族，卡兰坦边区的命运则与上述的四个伯爵领地相同。阿诺德的儿子戈特弗里德于 1042 年在皮滕取得了打败马扎尔人的胜利。最迟到那个时候，位于塞默林、魏克塞尔、驼原、皮斯廷之间的地区就与施蒂里亚的领地连接在一起。1050 年前后，韦尔斯-兰巴赫的伯爵家族在一场与姓氏不详的敌人，也许是特劳恩高的奥塔卡尔家的斗争中衰落了。老伯爵家族的最后一个成员、维茨堡的阿达尔贝罗主教，在这个家族原先的地产上修建了兰巴赫修道院。奥塔卡尔也是一个在基姆湖地区广有地产的家族，大概与加洛林时代更古老的奥塔卡尔家族在世系上有密切关系。他们继任韦尔斯-兰巴赫人的职务，当然皮滕伯爵领地不包括在内。这个伯爵领地连同韦尔斯的家产的大部分都落入

韦尔斯-兰巴赫的戈特弗里德的女婿、埃克贝特·冯·福姆巴赫伯爵的手里。到1158年，福姆巴赫家死绝了的时候，皮滕地区才和中心城市诺恩基尔兴以及寺院总监处管辖地格洛格尼茨一起，归奥塔卡尔家治理。实际上，正是奥塔卡尔家在施蒂里亚的边区及伯爵领地中完成了巴奔堡家在奥地利取得成功的那种统一事业。但是，奥塔卡尔家给这个新邦起了个名字，也就是他们在恩斯河畔的主要城堡施泰尔的名字，他们就根据这个名字自称为 marchiones de Stire①。

要在施蒂里亚建成公国，就得克服与奥地利类似的困难。奥塔卡尔家靠的是他们的边区行政长官之职，才取得他们的其他伯爵家族所没有取得的权限。此外，他们还取得了对许多修道院的管辖权，其中有阿德蒙特、加尔斯滕、赖因、格来因克、圣兰布雷希特、福劳、盖拉赫和赛茨，而这正是巩固他们的地位所非常需要的。奥塔卡尔家最初在财产条件方面较之分支繁衍的阿里博家的亲族本来就大有逊色。阿里波家的亲族在世系上的地位和依从关系，迄今还未能完全弄清。它也赶不上在阿达尔贝罗垮台以后拥有大量田产的埃彭施泰因家。福姆巴赫家的财产，最后也象个边区行政长官家的财产一样，无所不有。 80

奥塔卡尔家在授爵封地之争中没有采取一致的态度。在边区行政长官奥塔卡尔第一的两个儿子中，阿达尔贝罗属于亲帝派，奥塔卡尔第二属于亲格列高利派。阿达尔贝罗在同室操戈的斗争中丧生之后，奥塔卡尔第二取得了优势。1122年，忠于皇帝的埃彭施泰因家死绝，他们的财产大部分落到了奥塔卡尔家，于是奥塔卡

① "Steirmark"（施蒂里亚）这个名称最初仅通用拉丁文写法。(Marchia Styriae)，而在德意志民间语言中，曾经长期采用"Steier"或"Steierland"这两个词。

尔家一跃而成为凌驾于所有竞争对手之上的大地主。边区行政长官"坚强者"利奥波德（1122—1129），特别是他的儿子奥塔卡尔第三（1130—1164）把阿里博家的亲族排挤掉，特赖森的强大领主、即泽考修道院(1141 年)的创建者都属于这个亲族。大量高级特权贵族都当了边区行政长官的家臣。另外重要的是，他越来越多地把经营金属矿和开采盐矿的权利攫为己有。奥塔卡尔自己铸币，自己征收关税和捐税。但是，他的舅舅施潘海姆-马尔堡伯爵贝恩哈德象许多施蒂里亚人一样，参加第二次十字军远征没有回来，1147 年，他继承了舅舅的职位和财产，从此他的权力向南方大大地扩张。这时，穆尔河以南和德劳河两岸的低地，连同萨尔茨堡的领地佩陶行政区全都成了奥塔卡尔家所有。最后一个福姆巴赫人、埃克贝特第三于 1158 年在米兰城下死于弗里德里希第一的大军中。于是伯爵领地皮滕也落到奥塔卡尔手中，他修筑了越过塞默林山口的大道，并在山口旁建立了一个收容所（1160 年）。从此，奥塔卡尔第三无论在那一方面都感到自己是一邦之主。在随后的年代里（在边区行政长官夫人玛蒂尔德的一个文件中）也讲到"我们管辖的省份"(Provincia nostrae ditionis)，一个新建的城市起了个很有特色的名字菲尔斯滕费尔德[1]。高级特权贵族世家都被广泛地消灭了，只有很少几家，如佩高家和后来成为齐利伯爵的萨内克的自由民，还能长期维持下去。在贵族中，邦君的家臣占优势，首先是施图本贝格尔家，稍次的是维尔多尼尔家、列支敦士登家和佩陶家。

施蒂里亚公国的创建人死于 1164 年，只遗留下一个一周岁的同名儿子(奥塔卡尔第四)。不久，部份地与亚历山大第三和红胡子弗里德里希之间的纷争有联系的贵族内讧震动了这个邦。当施

① 菲尔斯滕费尔德(Fürstenfeld)，德文，其含义为"公侯所属之地"。——译者

蒂里亚国君的家族公开站到了亚历山大一边时，奥地利公爵就与克恩滕公爵发生了冲突；不过，到1176年就缔结了和约。1180 81 年，施蒂里亚历史发生了一个新的转折点。那时，红胡子弗里德里希在经过长期的踌躇之后，采取了攻击雄狮海因里希公爵的态度，并剥夺了这个与皇帝竞争的韦尔芬家的首领所辖下的巴伐利亚和萨克森两处公爵领地。奥塔卡尔第四趁这个机会当上了施蒂里亚公爵。*当时的问题不大可能仅仅是提升奥塔卡尔的国君级别，如同有人鉴于几种文献所作的繁琐说明而认为的那样，实际上，当时的问题是要创建一个新的公爵领地施蒂里亚，并把这个领地从采邑法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按照采邑法，他所属的部分地区与克恩滕和巴伐利亚是联系在一起的。包括故乡施太尔在内的特劳恩高和皮滕伯爵辖区，都属于奥塔卡尔的管辖范围，无论如何也属于奥塔卡尔的公爵领地。这两处行政区到了十三世纪才划入奥地利公爵领地。而关于皮滕（以及1194年兴建的城市维也纳新城）的情况，不同文献的相互矛盾的说法都表明，那块领土的归属在很长时期里还没有确定。奥塔卡尔家族死绝（1192年）之后，根据格奥尔根贝格协定（1186年），奥塔卡尔第四公爵的领地都归巴奔堡家所有。但是，这个地区的主要部分仍然是一个独特的邦“施蒂里亚”。这个邦的名字使人想起它从前作为边区所具有的宪法地位，也使人想起现在已不属于这个邦的奥塔卡尔家的主要城堡施太尔。

乙、克恩滕

中世纪后期的公爵领地克恩滕，如同今天的联邦州一样，远远小于古代的卡兰坦尼亚，古卡兰坦尼亚包括后来的施蒂里亚、克赖因、甚至还有下奥地利的某些部分，如皮滕地方。与位于它前面的

边区相反，克恩滕的核心地区在马扎尔人入侵时期是守得住的；克恩滕在奥托的和萨利尔的帝国政治中起过不可忽视的作用。十世纪末和十一世纪前半叶，相继任公爵职务的是柳特波德家、萨利尔家、柳特波德家巴伐利亚一支的亲属（奥托家）以及埃彭施泰因家的人。克恩滕的政治史在这个时期动乱频繁，不易明了。在 976 年，即巴奔堡家的人第一次被任命为奥地利的边区行政长官的那一年，作为独立的公爵领地的克恩滕从巴伐利亚分离了出来，并被授给了柳特波德家的海因里希（第一）。海因里希第一暂时不得不对萨利尔人奥托让步（978—983年），但是后来在皇宫中又得到了恩宠。十世纪末，还提到过三个伯爵领地的名字，它们包括今天的克 82 恩滕地区在内，但是大大越出了现今的边界：在西边，东蒂罗尔地区也属于卢恩伯爵领地（上克恩滕）；中间是弗里扎赫伯爵领地，东边是胡安伯爵领地（后来叫霍伊恩堡）。德劳河以南的维拉赫地区在十一世纪里暂时还被看作是弗里奥尔的一部分。海因里希公爵死后，克恩滕有一个时期归属于巴伐利亚公爵领地，这样它就隶属于皇室的旁系。但是，后来在回国的萨利尔家的奥托，即皇帝奥托第三的一名坚决拥护者治理下，克恩滕被当作特殊的公爵领地来管辖。皇帝为克恩滕公爵的儿子布鲁诺铺平了一条通往教皇职位的道路，使他做了第一个德意志人的教皇（格列高利五世）。但是，萨利尔公爵家族在国内扎根不牢，显然还得克服一些阻力，并且也失去了最后一个萨克森皇帝海因里希第二的信任。因此，在奥托公爵的儿子和继承人康拉德（1004—1011 年）之后，克恩滕公爵领地和位于它的东边的边区，就被授给了在东阿尔卑斯最富有地产的家族的一个成员，即阿达尔贝罗·冯·埃彭施泰因。德意志王国和罗马帝国落入竞争劲敌萨利尔家族手中，对阿达尔贝罗来说是灾难性的。但当公爵设法巩固自身的地位的时候，人们就说他从事

重大的叛逆活动，他被皇帝宣布放逐，而且尽管对皇帝康拉德第二进行了激烈的反抗，结果还是丢掉了官职。后来，克恩滕又有一个萨利尔家的公爵（康拉德第二，1036—1039年），此后迅速地轮番登上公爵宝座的有一个韦尔芬人，一个洛林人和一个策林格尔人。当贝托尔德·冯·策林格尔授爵在封地的纠纷中依附了教皇方面的时候，海因里希第四把公爵领地授给了柳特波德·冯·埃彭施泰因，1090年他的兄弟海因里希继承了他。由于埃彭施泰因家也统治着边区维罗纳，而阿奎莱阿的大教长也倾向于皇帝，所以，海因里希第四在德意志和意大利之间的边界地区拥有一个可以退守的坚强阵地。反对势力当然是以萨尔茨堡的大主教格布哈德和依附于萨尔茨堡的古尔克主教辖区为代表。这个主教辖区拥有很可观的地产。伯爵夫人黑玛·冯·弗里扎赫-策尔特沙赫最初曾决定用这些地产办一个女修道院。原籍莱茵区的施潘海姆家族倒可以说是倾向教皇的，这个家族的地产主要在拉凡特河谷，曾一度对萨尔茨堡行使过管辖权。但是，政治上的联合克服了与埃彭施泰因家刚刚发生的对立。海因里希公爵没有子嗣，他的死（1122年）使埃彭施泰因家绝了后。据说，海因里希公爵曾亲自把他的教子海因里希·冯·施潘海姆推荐给皇帝海因里希第五作为公爵职位的继承人。那时穆尔河边的卡兰坦边区和与之相邻的伯爵领地已脱离了公爵的势力范围。维罗纳边区在一段时期里仍然是在克恩滕公爵的管辖下，但这种联系到1152年也中断了。在伊斯特里亚有施潘海姆的一个旁支一直维持到1173年。在克恩滕本土，这个家族比较幸运些，但是在这里他们的任务也不轻松。班贝格和萨尔茨堡的特权统治，以及邦内贵族的强大地位都阻碍着某种程度上统一的邦国的形成，这个邦国到了十三世纪才得以建立。在上克恩滕的贵族世家中应当提到的有，早就死绝的（1124年）卢 83

尔恩家伯爵及其继承人，即影响远远越出国界的格尔茨伯爵，以及奥尔滕堡伯爵。在下克恩滕，霍恩堡家的重要性超过了所有其他家族。

施潘海姆家一取得公爵地位之后，就在帝国政治中得到了他们的前任们所得到的那种忠于皇帝的前列地位，尤其是公爵海因里希第五（1144—1161 年）和公爵赫尔曼（1161—1181）。特别是赫尔曼，他就象巴奔堡家和奥塔卡尔家那样，也卓有成效地促进了邦国的发展，他把格兰河边的圣法伊特建成市场移民点，这个移民地很快繁荣起来，成为克恩滕邦的首府，他也是克拉根福的真正建立者。施潘海姆家虽然采取了亲施陶费尔家的态度，但仍然是创建教会机构的伟大促进者。早在封授公爵职位之前，他们就在拉凡特河谷创建了本笃会的圣保罗修道院，该修道院的僧侣就是从参加宗教改革的希尔绍修道院来的，后来，它在克恩滕的教会史和文化史上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恩格尔贝特公爵的弟弟、贝恩哈德伯爵，把从魏勒-贝特纳赫（维拉尔）召来的洛林的西斯迪显教团的人都安置在他的维克特林修道院中去。公爵的儿子海因里希的宗教生涯为此创造了条件，他是洛林修道院的院长，后来又是特鲁瓦的主教。施潘海姆家的人和帝国西部有密切的家族关系，还和法国王室结了亲。

继久病夭折的公爵乌尔里希第二(1181—1202年)之后，还有一个重要的君主贝恩哈德(1202—1256年)。他严然以一邦之主（princeps terrae）自称，并在造币、关税制度及城市政策诸方面都坚决地行使了统治权。这期间他和他的家臣们合作得很好，他们的主要家族都担任了公爵的宫庭官职。贝恩哈德的强有力的政策使他与伊斯特里亚的边区行政长官海因里希以及广有地产的安德克斯-美朗家族的其他成员处于相对立的地位。最后在光辉的弗里扎赫

诸侯会议上调解了一场纷争(1224年)，但是，以后关系仍然不无紧张。贝恩哈德公爵由于执行一项聪明的、自然也是不屈不挠的经营策略，占有了或者控制了通往南方的大道和关口。同时他在运河河谷还必须克服长期以来就有产业的班贝格主教辖区的顽抗。为了确保通过洛易布尔山口到克赖因去的道路畅通无阻，设置了克拉根福市场，并由哈列格公爵的家臣们守卫。在贝恩哈德的儿子和继承人乌尔里希(第三)看来，和好斗者弗里德里希的孀妇阿格妮斯·冯·安德克斯结婚以后，对克赖因的统治权似乎就稳固了。 84

如果说贵族和教会适应了中世纪中期国家组织的结构，在政治史上起了首要的作用，那么，这个邦的历史对人民在君主政权的建立和行使方面所起的作用就提供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说明。这里指任命公爵时那种著名的仪式。这类事例大约早在九世纪的拜恩人和卡兰坦人的萨尔茨堡改宗史上已略有所表现，到了中世纪晚期的文献资料中才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如在施瓦本法典[①]的奥地利版本里，在施蒂里亚的韵文编年史里，以及修道院长约翰·冯·维克特林的史学著作里。从部分相符的材料中可以断定，那种风习是“自古以来”就已通行的，可分成三部分：首先举行最古老最重要的仪式，由一个贵族农民(Edelingerbauer)代表人民在卡恩堡的君主石(Fürstenstein)旁边接受国君。这时国君必须答复各种各样的问题，从而证明自己是慈爱为怀和维护法制的领主。然后，贵族代表让国君走上那块石头，君主就站在上面举剑向四面八方砍去，象征性地显示他的保卫和庇护权。接着，便在玛丽亚萨尔举行宗教庆典。最后是公爵和普法尔茨法官[②]（在我们的文献

① 施瓦本法典(Schwabenspiegel)，1274—1275年由奥格斯堡一位不知名的神父所撰，其蓝本为德意志法典。施瓦本法典在德国南部和瑞士流传颇广。——译者

② 普法尔茨(Pfalz)原为德国国王或皇帝的行宫或驻跸之地，Pfalzgraf 是国王或皇帝驻普法尔茨的代表，行使司法权，即为皇家法官(Königl. Richter)。——译者

所源出的那个时代，是冯·格尔茨伯爵）站在措尔菲尔德[1]的公爵石椅旁向贵族颁赠采邑。关于君主石旁的这种主要仪式的起源众说纷纭。有人把它说成是接纳君主加入斯拉夫-卡兰坦部族联盟；也有人说是纪念从阿瓦尔人压迫下得到的解放；还有人说是君主与享有特权的贵族人士之间的联盟。总而言之，这种主要仪式，在中世纪中期和晚期，被理解为君主和人民在建立与行使统治权时合作的象征。在君主石旁举行的这种仪式实行到1414年，在公爵石椅旁举行的仪式则沿用到十七世纪。因为这种仪式，比起在君主石旁把君主权力和"卑下的"民众联合在一起，更接近采邑制度的传统形式，所以，人们把它保存得更久。

丙、克赖因

从巴奔堡时代起，几世纪来克赖因一直与奥地利结合在一起。该邦的形成需要作简单的说明，虽然从1918年起，克赖因已不再85 属于奥地利的国家范围。象奥地利一样，克赖因边区的成立全靠奥托-拜恩对马扎尔人的进攻；后来的名称，如"Krain und die Windische Mark"（克赖因和温迪施边区）等用两个名字表示一个邦的模式说明，人们首先是在两个概念之间进行区分，这就是旧克赖因（狭义的克赖因）和边区（下克赖因）。两者之间的界线穿过一个林区直达匈牙利边界。象后来属于施蒂里亚的齐利一样，索特拉和克赖因的古尔克山谷都属于用桑河命名的绍尼安边区。绍尼安在萨瓦河以南的部分到1036年之后就划归克赖因边区行政长官。这个邦的双重名字把两个边区合并这一事实固定了下来。十一世纪初期，巴伐利亚的泽姆普特-埃贝斯贝格尔家的人当了克赖

[1] 措尔菲尔德(Zollfeld)，地名，在克恩滕，该地确有一石椅，名为"公爵椅"(Herzogstuhl)。——译者

因边区行政长官。继他们之后的是乌尔里希·冯·魏玛-奥尔拉明德，他出身于在奥托时代由德国北部到奥地利境内来定居的一个家庭。最后，在授爵封地纠纷中处于困境的海因里希第四给忠诚的阿奎莱亚大教长波波颁授了领地，而这个邦就属于波波教长的教省。大教长由于自身太软弱，无法同强大的贵族和其他教会显贵们竞争，不能维持直接统治，所以，在十二世纪里把边区行政长官职位作为采邑授给了强大的安德克斯家的伯爵。这些伯爵总是惯于按照他们在夸内罗周围的海滨地带所得的份地（而不是根据同名的蒂罗尔城！）自称为美朗公爵。好斗者弗里德里希在与安德克斯家出身的女伯爵阿格妮斯结婚之后，如前边已经说过的，从安德克斯家接受了克赖因君主的称号(1232 年)，后来这个称号转到了施潘海姆家。

在中世纪中期的克赖因历史上，我们看到奥地利领土史的许多特殊现象。在中世纪中期，克赖因很少受到德意志移民的影响。它始终是一个斯洛文尼亚人的农业国，境内有德国的贵族和教士，在小城镇的市民中既有德意志的影响，也有部分意大利的影响，在小城镇中居首位的是莱巴赫。

丁、萨尔茨堡

在东阿尔卑斯地区中世纪的统治结构里，还有一个教会君主国，即萨尔茨堡大主教区。萨尔茨堡大主教在其教区的核心地区取得了世俗的权力地位。萨尔茨堡从一开始就拥有大量的私产，主要是在萨尔茨堡高和庞高。在中世纪早期和中期，由于公爵和国王的封赠，这些私产又有了很大的扩充。此外，还从别人手里购置了无数小地产。对于这些土地，大主教都享有查理曼大帝和历代的奥托所特授的豁免权。森林繁茂地区里的猎场也有其特别意 86

义。996年哈特维希大主教得到了造币权和市场保护权。当然挫折也不少。萨尔茨堡世俗统治权的发展就是在奥托-萨利尔的帝国教会体制的范围内完成的。它的危机势必发生重大的影响。如同德国南部的其他领土一样，由于封爵授地的争执，萨尔茨堡也受害极大。大主教格布哈德第一(1060—1088年)首先与年轻的国王海因里希第四合作，并得到海因里希第四及教皇亚历山大第二的赞同，建立了萨尔茨堡的独立主教辖区和副主教辖区古尔克，以照管卡兰坦传教区的一部分(1072年)。封爵授地之争爆发的时候，格布哈德站到了格列高利第七一边，并修建了各种要塞，其中如霍亨萨尔茨堡，来巩固自己的势力。但是，在大多数忠于皇帝的世俗贵族面前，他不得不退出大主教辖区。敌对的莫斯堡大主教贝托尔德在军事上也凌驾于格布哈德的继承人蒂莫(1090—1101年)之上，并且在萨尔多夫取得了胜利。甚至萨尔茨堡改革派的教会诸侯中最有魄力的大主教康拉德第一(1106年至1147年)也多年陷于严重的窘迫之中。封爵授地之争结束后，康拉德第一把奥古斯丁教派的正式僧职人员聘请到大教堂的教士团中来(1122年)，又重新派人住进寺院或新建寺院，来加强萨尔茨堡教会的地位，为此他还利用了年轻的西斯迪显教团。康拉德的继承人埃贝哈德第一奉行了康拉德的教会方针和政治方针，所以，在教皇亚历山大三世与红胡子弗里德里希发生冲突期间，他支持了教皇。在巴奔堡家的大主教康拉德第二任职期间(1164—1168年)发生了一场大灾难，忠于皇帝的普莱因伯爵侵袭了萨尔茨堡，并且放火烧了这个城市(1167年)。第二场其毁灭性不亚于前者的大火，是在1200年即大主教阿达尔贝特(也是亚历山大第三的一个党羽)死前不久降临这个城市的。十三世纪杰出的教会诸侯之一的大主教埃贝哈德第二(1200—1246年)与其前任的政治传统决裂。他一贯支持皇帝弗

里德里希第二，象奥地利的利奥波德一样，他也参与了圣日耳曼诺和约的签订。最后，他被教皇宣布逐出教会，后来死去。到1288年，他的遗骸才安葬在萨尔茨堡大教堂。埃贝哈德建立基姆湖、泽考和拉凡特等独立主教区，在其中保留了大主教区对一切僧职的任命权，以此来大大加强萨尔茨堡的教会地位。他还通过有意识的活动来巩固了他的世俗政权。萨尔茨堡邦作为一个法律单位，到中世纪晚期才有案可查，到十三世纪末，在大主教辖区里还通行着巴伐利亚邦的法律。但是，萨尔茨堡拥有世俗贵族无可比拟的广大地产。派尔施泰因和勒贝瑙伯爵死绝以后，世俗的管辖权力才成功 87 地被清除(1225年)。此外，大主教辖区还拥有伯爵领地的权利，特别是裁判权，在核心地区不必特别授予特权，在皇帝海因里希第二一度封赠过大批地产的隆高，则由皇帝授予特权（1213年），在平茨高则通过巴伐利亚公爵方面的转让(1228年)。

奥古斯丁会的寺院总监处贝希特斯加登位于萨尔茨堡城的近郊，几乎完全为大主教的地产所包围，通常依靠巴伐利亚保持了独立。另一方面，在被包围的领土之外，还有大都享有豁免特权的萨尔茨堡地产，如在巴伐利亚公爵领地的基姆湖和因河畔、在奥地利的多瑙河畔(瓦豪的阿恩斯多夫、再往东的特赖斯毛尔)、在施蒂里亚的恩斯河畔（阿德蒙特）、在穆尔河、米尔茨河和德劳河畔（莱布尼茨以西的一条宽阔地带，以及边境城镇佩陶和弗里道)、在克恩滕（玛丽亚-萨尔、阿尔特霍芬、弗里扎赫、萨克森堡、格明德）和东蒂罗尔(德弗雷根塔尔)；甚至在弗里奥尔、萨尔茨堡都保有几处阵地。在这些分散各地的地产上，萨尔茨堡到处都有裁判权、还有采矿权、造币权和税收权。长期以来，在弗里扎赫铸造的萨尔茨堡分尼币是东阿尔卑斯地区最重要的通用硬币。萨尔茨堡的管理人员和官员管理着各地主庄园和城堡。

戊、蒂罗尔

在后来称之为蒂罗尔的邦里，如同在萨尔茨堡地区一样，中世纪早期伯爵领地的划分长期地保全了下来，这种划分法部分地与日耳曼划分为Gaue（“高”，即区）的做法相一致。因河河谷里有三个伯爵领地：上因河河谷，从芬斯特明茨隘地直到梅拉赫河口；接着便是直到齐勒尔的下因河河谷；最后是第三个因河河谷伯爵领地（后来也称之为“山区诸侯领地”），它的政治命运在中世纪晚期与其说是在蒂罗尔邦史的范围内，不如说是在巴伐利亚邦史的范围内进行的。库夫施泰因、拉滕贝格和基茨比海尔等领地都属于这个伯爵管辖区。在中世纪早期，诺利塔尔的伯爵领地曾达到因河河谷，后来人们认为，诺里塔尔主要指直到克劳森以南的南蒂罗尔的艾萨克谷地。在这里伯爵领地的边界与教区的边界是一致的。因为博岑伯爵领地虽然是古巴伐利亚的固有地区，却是属于特兰托教区的。芬奇高和普斯特尔河谷也都是独立的伯爵领地。博岑低洼地属于埃潘和乌尔滕伯爵领地，这个伯爵领地最初不是由巴伐利亚公爵领地管辖而是由伦哥巴的特兰托公爵领地管辖，但后来的东蒂罗尔就成了克恩滕卢恩伯爵领地的一部分，而奥斯菲恩地区① 则属于施瓦本公爵领地。

88 在阿尔卑斯山主脊两侧的蒂罗尔地区在统治结构中最初居于领导地位的是教会里的显贵，他们早在十世纪就已拥有重要的豁免权和广大的地产。1027年，康拉德第二皇帝把特兰托、博岑和芬奇高等伯爵领地都转交给了特兰托的大主教乌达尔里希。同年，他又把诺利塔尔伯爵领地和齐勒尔以西的因河河谷授予布里克森的大主教哈特维希。南德意志君主们搞了一次危险的阴谋，迫使皇

① 奥斯菲恩地区（Ausferngebiet），即蒂罗尔的东北部。——译者

帝采取了这样的措施：让可靠的大主教们来保证通往意大利的要道畅通无阻。这样特兰托的权力地位就更重要了。但是，当海因里希第四的一个忠实党羽，布里克森的大主教阿尔特温于1091年也从国王手里得到普斯特尔河谷的伯爵领地时，于是协议就达成了。这样，特兰托和布里克森两个邦好象就要形成，而在实际上，到了十二世纪末或更晚的时候，“邦”(terra, provincia)这个词才用于指这两个主教中的每一个人的辖区。这就标志着开始脱离巴伐利亚。从此，这两个主教辖区与帝国的关系一直很好。在帝国与教会分裂期间，蒂罗尔的主教们也都支持皇权，发生封爵授地之争以后，情况仍然如此。唯独卓越而又博学的布里克森主教哈特曼(1140—1164)站在亚历山大第三一边，当然，他还尽可能保持对红胡子弗里德里希的忠诚。反过来，这位皇帝也支持特兰托主教镇压他的市民力图与伦巴底诸城结盟从而争取独立的活动。从此之后，特兰托便被看成德意志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就脱离了 regnum Italiae (意大利王国)。1202年，特兰托主教与布里克森主教间签订的关税协定促进了这两个伯爵领地之间的贸易来往。此外，各种材料都证明，主教们行使了德意志君主们授予他们的矿山开采权。

虽然中世纪中期蒂罗尔的政治发展显示了若干与萨尔茨堡的历史相应的特征，但结果却大相径庭：世俗的权力得到了实施，尤其是以行使教会诸侯授予他们的豁免特权来实施的。当萨尔茨堡在排挤行政官的时候，特兰托和布里克森却对他们无可奈何。

有三个显贵家族在财产和影响方面都超过了他们本阶级的伙伴。这就是安德克斯家的伯爵、埃庞家的伯爵，以及还有蒂罗尔的伯爵。在很多地方拥有地产的安德克斯家，在十二世纪时，得到了

布里克森的下因河河谷和普斯特尔河谷的伯爵领地作为采邑。此外，他们都是管理享有豁免权的布里克森和弗赖辛领地的行政官。如前文已经说过的，安德克斯家忠于皇帝的态度使他们名义上得89 到了伊斯特里亚的“美朗”公爵领地。但是，由于他们大概不公正地被牵连进谋杀施瓦本国王菲利浦的诉讼案里，他们在蒂罗尔的地位受到了影响。他们虽然收回了自己的伯爵辖区，但是，仍然失去了相当于艾萨克谷地的伯爵权力的布里克森行政区。作为蒸蒸日上的因斯布鲁克的促进者，安德克斯家继续起着重要作用。因斯布鲁克从安德克斯家的奥托第二手里得到了城市法（1239年）。随着奥托的死，安德克斯家的男系死绝，这个家族的财产转到别的家族手中。

韦尔芬家的亲属，埃潘的和乌尔滕的伯爵都定居在埃奇兰。他们以特兰托主教的采邑享受者的身分行使着伯爵的权力。一个以特尔兰附近的格赖芬施泰因城堡命名的旁系拥有博岑伯爵辖区，同样把这个伯爵辖区看成是特兰托的采邑。十二世纪中叶，在埃潘家与蒂罗尔的诸伯爵之间爆发了一场流血斗争，斗争最后是蒂罗尔人占了上风。结果，在格赖芬施泰因家死绝之后，博岑伯爵辖区就落到蒂罗尔人手里（1165年）。埃潘诸伯爵一直维持到十三世纪中叶，后来他们的家族，随着埃格诺主教（布里克森的，1240—1250；特兰托的，1250—1273）去世，男系就断绝了。

在美朗上方的埃奇兰，有蒂罗尔伯爵的祖传城堡。伯爵家族消亡之后，城堡的名字就成了蒂罗尔邦的名字。这个家族出了芬奇高伯爵，特兰托的行政官，如前所述，自1165年以后还出了博岑的伯爵。他们象埃奇兰大多数显贵家族一样，在意大利的斗争中都支持施陶费尔家族，并且也开展了有力的政治活动。特别是这一家族的最后一个成员阿尔贝特伯爵是个精明强干、成就卓著的

政治家。1210 年他当上了布里克森的行政长官。他以这个身份在同康拉德主教的一场冲突中维护了自己的地位。安德克斯家完结之后，下因河河谷和普斯特尔河谷的诸伯爵辖区，也都落到了蒂罗尔家的人手里。由于 1253 年阿尔贝特死时没有男嗣，另外一个家族，即格尔茨家族当然就成了蒂罗尔伯爵的统一事业的坐享其成者。

在蒂罗尔地区，君主邦的形成到十三世纪中叶仍然没有结束，但已经上了轨道。这时伯爵家族，最后为蒂罗尔家族，已明显地凌驾于布里克森和特兰托主教之上。

己、福拉尔贝格

福拉尔贝格邦位于今天奥地利国家版图的最西部，它是在一个极其漫长的、出现过多次反复的过程中形成的，这个过程到十九世纪才告结束。在中世纪中期，人们似乎在一个可以妥协的领土范围内暂时接近了统一，然而，重新统一整个施瓦本公爵辖区的倾向毋宁说只是明显可见而已。这种努力最后也没有取得成功。在十世纪中，这个地方的敌对势力之间，即宗教的和世俗的势力之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库尔主教区和康斯坦茨主教区的利益，圣加仑修道院和强大的显贵家族，其中首先是布克哈德家族与乌达尔里希家族的利益，彼此相互对立。一个时期担任过施瓦本公爵的布克哈德家于 973 年死绝；于是，乌达尔里希家就成为博登湖地区，特别是在后来构成福拉尔贝格大部分地区的莱茵高和瓦尔高中成为无可争议的首要家族，这个邦只有一些边境地区属于阿尔根高和阿尔卑高。历代奥托完全根据平时帝国政策的需要多次进行封赠，这时就加强了教会的地位，特别是库尔教堂的地位，同时也就破坏了伯爵的权利。同样，乌达尔里希家分成了布雷根茨和布赫霍恩

90

(腓特烈港)两支，对统一的统治的形成也是不利的(1043年)。当时布雷根茨这一支统治了几乎相当于今天福拉尔贝格幅员的全部地区。在封爵授地之争期间，乌达尔里希家的两支采取了相互对立的阵线。布雷根茨系不久创建了本笃会的梅雷劳修道院(1093年)，从而表现出与教会改革有联系，它属于格列高利派；而布赫霍恩家是属于亲帝派。但是，1089年布赫霍恩这一支死绝，获利者并不是布雷根茨家的亲属，而是强大得多的韦尔芬家。为遗产而争斗的布雷根茨家的伯爵在战斗中失败，还丧失了部分原先占有的财产。有才干的布雷根茨家的鲁道夫伯爵总算成功地保持住自己的地位。他第二次结婚娶的是韦尔芬家的女人、骄傲者海因里希的妹妹武尔夫希尔德，这说明两个家族的和解。当韦尔芬家与施陶费尔家之间爆发战斗的时候，鲁道夫巧妙地保住了皇室的信任。鲁道夫的同名外甥，红胡子弗里德里希的一个近亲和忠实的家臣，接受了一笔极为可观的遗产，他把这遗产合并到了自己的丰厚地产中去。不久之后，这个小鲁道夫便被根据他享有的种种官职和领地，称为布雷根茨、拉姆斯贝格、林道、施魏因斯胡特的伯爵，特别是还有，普夫伦道夫的伯爵，此外他还带着皇宫里的人过着地道的流浪生活，所以，关于他本人的身份和世系地位长期以来都没弄清楚。普夫伦道夫没有留下男嗣，他把财产赠送给了施陶费尔家。但是他的女婿蒂宾根的胡戈得到了布雷根茨的伯爵领地。尽管韦尔芬家占据优势，他暂时处于劣势，他毕竟还是保住了这块伯爵领地。胡戈把他的首府迁到了费尔德基尔希，而这就意味着，91 几百年来的主要移民区迁往阿尔贝格山前之邦①。从此(约1206

① 阿尔贝格山前之邦(Land vor dem Arlberg)，位于阿尔贝格山之西，为奥地利最西边的一个邦，即为现在的“福拉尔贝格”(Voralberg)邦，首府为布雷根茨。——译者

年),他就自称为蒙福伯爵,从而接受了一个从十一世纪起就定居到本邦来的祖籍罗马的家臣世家的称号。蒂宾根-蒙福的徽章,上有一面战旗(后来被看作是教堂的旗帜),先被费尔德基尔希,晚近又被福拉尔贝格邦接受了下来。事实上,蒙福家由于修筑了通过阿尔贝格山口的道路,使新城市费尔德基尔希和布鲁登茨得益非浅,对于移民和交通事业的发展作了非常多的贡献。较大的移民区内手工业和商业的兴旺,使阿拉曼人的因素增强,罗曼的文化萎缩。后来,由于1220年通车的戈特哈德大道的竞争,结果又引起某些损失。另外,在十三世纪中叶,随着施陶费尔家族的败落,施瓦本公爵辖区就瓦解了。这次瓦解本来可以为一个有实干精神的领主世家打通自行掌权的道路。但是,蒙福家在1235年,后来,又在1260年由于分割领地而彻底放弃了上升的可能性。从此,蒙福系与韦登贝格系(此支系以瑞士莱茵河谷里的扎尔干斯附近的城堡而得名)常常处于相互敌对的状态。在其他家族中,霍恩埃姆斯家的领主,即从前施陶费尔家的家臣们,最有成效地维护了自己的权利,他们的城堡曾为皇帝海因里希第六用来拘留重要的国事罪犯。总的来说,到了中世纪中期结束时,福拉尔贝格已经适应小规模统治结构的组成状况,小规模的统治结构曾经是阿拉曼人世袭地区的显著特征。

中世纪中期的殖民事业

在东阿尔卑斯山区和多瑙河诸邦建立主权统治乃是诸侯国的事业。这个发展没有在中世纪中期完成,但却构成了那个时代奥地利境内的政治史的主要内容。这个期间,同样重要的是实实在在地发展自己的邦国,由它的居民并为它的居民完全开发殖民区。中世纪中期的殖民就以这项各阶层居民都最广泛地直接参与的成就

意义深远地与前一个时代相衔接。他们继承了前几个世代已经开创了的事业，以及在我们祖国东部还没有被毁掉的那些东西。中世纪中期的殖民运动，就某些方面来说，还具有另一种不同于阿吉洛尔芬-加洛林时期的殖民运动的性质：新的殖民是在比较狭小的地区里进行的，因此，它进行得比较紧凑，它使开放地区里的垦殖事业更加密集。它经过开荒取得了新的土地，它寻找地势较高、平时难以到达的地方，它发展了新的殖民形式，并且主要从小规模的开端创造出意义重大的市政制度来。

92

君主、贵族和教会领导了殖民制度的执行。国王只是在封赠土地时才起作用。在上升到君主的家族中，主要应提到巴奔堡家和奥塔卡尔家，但也应提到埃彭施泰因家、施潘海姆家和安德克斯家；开荒工作往往在老殖民中心之间建立起可以利用的联系来，对于东阿尔卑斯地区正在崛起的诸侯权力来说，它是形成和巩固主权统治的根本前提。在贵族中，自由贵族陪臣(Edelfreien)在垦殖运动中逐渐落后于官吏，在官吏中，屈恩林家在奥地利作出了特殊的贡献；骑士和小贵族的作用则是次要的。教会的显要人物几乎毫无例外都出身于贵族，教会在殖民事业中起了颇为重要的作用。萨尔茨堡和帕绍都极力维护旧日的所有权，都企图在边区重新补回匈牙利时期的损失。弗赖辛和布里克森也都十分活跃。在僧侣团体中，本笃会最初居于领导地位。在多瑙河南北两岸的下奥地利的所有修道院中，格特魏格完成了主要工作，阿德蒙特在施蒂里亚的恩斯河谷垦殖，在阿尔贝格山前之邦，梅雷劳参加了布雷根茨森林的开发，起了重要作用。在农业上，西斯迪显教团和普拉蒙施特滕会教士①所作的先锋工作是人所共知的，当时已经被人们所

① 普拉蒙特莱会教士(Prämonstratenser)，属天主教，因寺院建筑在法国拉昂附近的 Prémonstré 而得名，该会由圣诺贝尔(Norbert von Xanten)于1120年兴建，遵从圣奥古斯丁的教规，亦称诺贝尔僧，穿白袍。——译者

称道，如奥塔卡尔家就称道过赖因僧侣们的活动。茨韦特尔、海利根克罗伊茨、格拉斯和鲍姆加滕贝格，在殖民事业中都很活跃。但是，不可忽视的是，西斯迪显教团教士有时可以得到已开垦的土地。最后，传教组织的扩大与邦的发展之间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托钵僧团在殖民活动中的作用再也觉察不出来。实际从事劳动的自然是在教会和世俗领主手下象服役似地种田的农民。在奥地利境内，我们只在特殊情况下才看见自由农民，越往东走，遇到的就越少。在上奥地利，豪斯鲁克有自耕农，在下奥地利，在伊斯佩尔河谷有自由区镇，而在瓦豪谷地，自由权不很显著。在西部，在开荒时代末期，自由的瓦尔泽人，即从阿拉曼人九世纪就从事殖民活动的罗纳河谷迁来的人，开展了一种重要的影响深远的殖民活动。

十世纪和十一世纪，在比较易于到达的地区建立了大量新垦殖区之后，肥沃的铲除了森林的土地就再也不足以养活增长无已的居民。于是人们便寻求自然条件较差的环境。广大的林区由于垦荒而变得稀疏了，但是，在这里出现了新移民村。开辟出新移民区的典型例子是，在奥地利境内，瓦尔德菲特尔和米尔菲特尔、上施蒂里亚和下施蒂里亚、平茨高和布雷根茨森林。垦殖区的地名就反映出了开发活动来，即森林的砍伐、火烧、“焚草”、“掘根”；这个时期移民区的名字也常常显示出活动的领导人、村子的创建人以及乡绅地主等。此外，能说明问题的是以下的形式：人名（都是第二格）保留了，但是语根（例如～dorf）都省略了；如：泰希曼斯、狄特曼斯、沃尔夫格斯、（大、小）格隆斯、佩尔托尔茨（＝贝希托尔茨）、普赖因赖希斯（普鲁恩里希斯道夫，1166 年）之类等等。一般说来，这种构成名词要略早于奥滕施拉克、明尼希赖特、罗伊特、埃普费尔格施温特等真正垦殖名称。在这些写法中，大概最古老的是施蒂里亚的、数以百计的带罗伊特（～reut）的名字。又如，罗

93

滕沙亨（沙亨＝林块）、艾比斯瓦尔德等等，都表明从前森林存在过。有些垦殖地的出现不是由于农业移民，而是由于中世纪中期和晚期矿山建设需要使用木材和需要建造住所。

至于说到移民村的形式，那么，中世纪中期乡间建筑的特征是大量的独家院落，特别是在老移民区的山谷地带和从前用过的高山牧场地区之间的阿尔卑斯山林区。但是，与广泛的见解相反，一般说来，我国的独家院式的垦殖比最初的集体垦殖要晚些。当然，在罗马时期和斯拉夫时期也不是完全没有独家院落，而且我们也知道加洛林时代也有大型的皇家庄园。在中世纪中期的移民村里，我们看到有奥托时期的和巴奔堡前期的教堂墓地移民区。但是垦荒时代的主要形式是草地村（Angersdorf），就是一个在三角形的或扁豆形的草地（Anger）四周有计划地修造起来的移民村，草地后来就成为村里的空场。和房舍相连接的花园通常都围以灌木丛，和外边隔开。这种“Hag”（树篱）对村庄起了一道保护墙的作用，教堂一般都在村子外边较高的地方。在中世纪中期末尾，即1200年之后，在利乔和海登赖希施泰因地区都出现了林区狭田村①，这是些松散的集体移民村，在那里，已经废除了全村居民尽可能平分良田的原则，而农民的耕地总是直接与庄院相连。但是，除了较古老的不规则块田以外，规则的长方块田主要见于奥地利东部。这两种形式大都有三块大田，按三年轮耕法的节奏进行耕种。挨得很近的私田和开垦田都属于独家农庄所有，开垦田在整个东阿尔卑斯地区都有。

在中世纪中期，奥地利境内的移民村已经有很多逐渐发展而具有城市的规模和重要性，这一点多半也表现在法律地位上。其

① 林区狭田村（Waldhufendörfer），多见于德国中部山区，这种村子的农户每家后面都有长条形的狭长田地或草地。——译者

他村镇被有计划地扩建为城市，或者重新布局。在这个时代，奥地利南部和东部城市的数字要大于古拜恩土地上的城市数字。如前所述，部分地可能同罗马人的建筑物有联系，人们还沿用移民村的名称。维也纳自罗马时代后期以来，继续保持着殖民并仍然具有某种重要性，这一点是长期被人们误解了的。当然，直到十二世纪中叶为止，中世纪的移民仍然没有填满罗马军营的范围，但是，由于海因里希公爵、利奥波德第五和利奥波德第六扩展了城市，维也纳就突破了原有的范围，取得几百年来大体上不变的幅员（郊区不算在内）。一般说来，多瑙河上的城市，由于河流运输的重要性，比其他城市繁荣得更早些。雷根斯堡可称之为中世纪拜恩—奥地利地区的第一大城市，后来到了十三世纪就被维也纳所超过。

在城市方面，我们通常可以发现两个生长核心，一个是城堡移民点，一个是商人居留地，这一点在林茨、克雷姆斯和韦尔斯都很明显。只是在城堡领主赞同的前提下，地形上和行政上的融合才产生了真正的、有城墙的市民城市。商人法（ius mercatorum）成了城市法的基础。在这个过程中，一种特有的低级裁判权的形成是很重要的。在稍晚的时期里，奥地利的发展与罗亚尔河和莱茵河之间的西欧地区相同，在西欧地区最早出现了中世纪中期城市的特征。从西方来的商人和熟练手工业工人当然是起了一定作用的。在维也纳，就提到过佛兰德尔的染布匠，他们在1208年从利奥波德第六那里得到了一项特权。大概还有瓦隆地区的商人、瓦隆人大街这个名字大概就是指他们。

在阿尔卑斯地区，在小城市兴起时，以及在与城市总是难以严格分开的集市的发展中，地方的条件往往比远程贸易的要求更为显而易见，尽管在位于从东阿尔卑斯地区到弗里奥尔或威尼斯去的要道上的菲拉赫的发展过程中，或者在犹登堡的发展过程中，这

95 种远程贸易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正如安德克斯家的因斯布鲁克或者后来穆尔河畔的布鲁克一样，班贝格家的菲拉赫也属于桥梁城市一类。不少城市首先是设防的要塞；其中最重要的是德罗森道夫、海因堡、塔雅河畔的拉城、菲尔斯滕费尔德和拉德克尔斯堡等边境城市。其他城市都是或大或小的领地的行政中心，如瓦豪地区的屈恩林家的迪恩施泰因，拉凡特河谷里的班贝格家的沃尔夫斯贝格、奥塔卡尔家的首府施太尔、作为哈德格伯爵辖区重镇的同名城市哈德格。要使城市具有某种重要性，除了行政上的和军事上的作用以外，还得有一些其他的特性；如，弗里扎赫就是萨尔茨堡在克恩滕所有地产的行政管理中心、副主教的驻地和通衢关卡，但是由于附近有采矿业，所以也成了重要的造币城，此外，还是过境贸易的中转站；由于该城领主的显赫地位，也经常成为富丽堂皇的诸侯集会之地。

有计划地建立或搬迁城市时，诸侯们的领土政策常常表现出来，如公爵利奥波德第五在他的两个邦奥地利和施蒂尔之间的要冲之地设置了维也纳新城，又如克恩滕的公爵贝恩哈德新建了克拉根福。在不同的城市里，尤其是在至少一度作过首府的维也纳、施太尔或克洛斯特新堡等城市，贵族的影响也反映在骑士平民阶层中。此外，城市里的名门望族与第一流的城市领主的家臣间也可能存在着种种联系。最后，在奥地利的城市里，即使在更古远的时代里，犹太人的因素已经显出并非不重要。比如在犹登堡这一例子中，城市的名字就表明了这一点，在古卡兰坦尼亚的其他城市，如格拉茨、弗里扎赫及克拉根福等城市的附近就有犹太村。

在讨论中世纪中期的国家发展时，也需要对由于殖民而引起的民族变迁问题明确表态。毫无疑问，新移民绝大多数祖籍都在拜恩，一部分来自奥地利境内的旧移民区，一部分来自1156年和

1180年以后仍留在拜恩公爵辖区内的各个地区。奥地利的方言清楚地说明了他们的家世起源，理所当然地，从原籍拜恩的显贵家族、拜恩的主教辖区和修道院对殖民事业的率先参与中，也可以看出他们的家世起源。参与殖民事业的还有其他德意志家族的成员。在福拉尔贝格，邦内的阿拉曼人由于瓦尔泽成份加入而增强，他们进入了山区和该邦南部的三分之一地区。在东南边区所收复的失地的殖民中，法兰克人参加到什么程度争议很大。巴奔堡和施潘海姆都同法兰克人有很紧密的联系。班贝格主教辖区在克恩滕有广 96 大的地产。所以，不妨设想，法兰克的移民也来到了奥地利境内。但是，他们在方言上没有留下明白无误的痕迹，而对法兰克人殖民形式和居住形式所作的探讨尝试，也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诸如克恩滕的弗兰肯贝格和弗兰肯施泰因，下奥地利的弗兰肯赖特和弗兰肯霍夫等地名，或许都可以看作是拜恩人的天地里的法兰克人殖民地。不过，象弗兰科（Franko）这样一个人名也可以解释这一种或那一种起源。在奥托时代，无疑是有过萨克森影响的。奥地利的贵族在北方有不少家族关系，因此推断屈恩林家的祖籍在萨克森。象萨克森多夫和萨克森布龙（下奥地利），萨克森冈（维也纳邦）和萨克森堡（克恩滕）等地名都能说明萨克森人的垦殖区。

最后令我们感兴趣的是德意志居民与非德意志居民之间的移动。下奥地利的多瑙河地区早在加洛林时代已经基本上变成了德意志人的。在阿尔卑斯山前地带，微小的斯拉夫人的残余在巴奔堡时代之初便已消失。除了不因民族而异的教名以外，原始文献和传统记载中的见证人名单几乎全是德意志出身的人名。在离殖民运动大道稍远的阿尔卑斯各邦中，斯拉夫人坚持得长久一些，在上施蒂里亚作为地方少数民族一直存在到十三世纪，在格拉茨周围的个别村庄里，则一直存在到中世纪晚期。在克恩滕，在上菲拉赫

和马尔尼茨周围有一个较大的斯洛文尼亚语言岛。此外，在后来的语言分界线以北，还有些零碎的小群一直存在到 1400 年左右。当然，斯拉夫人不只扮演了被动的脚色，他们也参加了开垦活动，如不同的地名所说明的，如拉辛、拉斯尼茨（斯洛文尼亚语 Laz，意为开垦、沼泽地）或特雷夫宁、特雷夫林（斯洛文尼亚语 trebiti，意为垦殖）。但是，神职人员、贵族和市民阶层几乎是清一色的德意志人，同时还有德意志农业垦殖者流入。因此，斯拉夫人在他们那人口往往不多的殖民区里逐渐被同化。北蒂罗尔和萨尔茨堡最后残存的罗曼人早在十世纪就已经放弃了他们的语言，福拉尔贝格的瓦尔高在十三世纪成了德意志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南部边缘地区有一部分是由奥地利来人开垦的。在大约同一时期，德意志农民在该地占了上风。在斯拉夫环境中，越过正在逐渐形成中的语言界线，到处都有德意志人作为享有特权的市民存在着。在南施蒂里亚和克赖因，以及在苏台德区的中心地带都是如此。

我们要是追问中世纪中期殖民取得惊人成就的原因，那么，答案是不难找到的：殖民事业给了农民以新的土地，新的庄院，往往 97 还提高了他们的法律地位，成就足以酬报劳动。对于贵族和教会的上层人士来说，殖民开辟了新的财源，所以，殖民不仅为他们的地位增强了经济基础，还提高了权力和威望：殖民者及其领主的利益在发展国家方面是一致的。由于好处十分明显，在一个决不是没有民族矛盾的时代里，邻族的君主和贵族也都雇用拥有先进农业技术的德国移民（德意志人的铧犁远较斯拉夫人的钩犁（radlo）优越），因此，他们的活动会带来较大的收益，并且还能对自己的人民起示范作用和刺激作用。城市殖民比农村殖民更令人难忘，外表上也更为可观。由此可以说明为什么诸侯和教会在建立城市、发展城市、颁布市场法和城市法时都别有抱负。新农民和城市市民

通过终生劳动，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子孙取得了在国境线两侧定居的权利。殖民运动就这样在和平的文化工作方面做出了令人难忘的、永久性的业迹。没有殖民运动就没有奥地利民族，如同没有诸侯的政治统一事业，就没有各个邦、就没有奥地利国家一样。

中世纪中期的经济生活

除了家庭以外，农民村社和地主庄园就是中世纪农民在其中进行耕作活动的决定性共同体。村社有多方面的基础；亲戚关系（“友情”）和邻居关系、同村人之间互相磋商和互相帮助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基础。此外，在中世纪中期，宗法上的联系大概已经显著衰退。耕种田地时调整邻居间的合作是最为重要的。根据三年轮耕制的需要遵守强制性的耕作规定，共同定期地轮番交换播种和休耕，在使用森林和草地方面相互照顾。当开垦时期森林的原始财富已经减少时，就需要细心地经营森林。村社负责保护水井、道路和桥梁，负责确定和警戒田地的边界。这里常有需要调解的争端，对法律问题所作出的决断常常使我们偶尔可以看到中世纪中期村社及其十分有限的裁判权是如何运用的。

在文献中，地主统治比村社更为突出。这里涉及的是中世纪的、但也是近代的、十九世纪以前的农村法律关系和经济关系等中心概念。地主权不仅是一种超越农村关系的农业经营形式，不仅是大地产，而且，正如那个名称所说明的，也是对土地和人的统治[1]。地主把土地交给多少有点自由的农民，农民有义务根据常变的法律条件交租。地主留一部分土地自己经营，让奴仆去耕种。在中世纪中期，这种自给经济在许多地方受到了限制，使租地制得 98

[1] 这里是按德文的字面含义来说明 Grundherrchaft（地主、地主权）这个词。——译者

到了发展。地主、管理人、管家的庄院自然都比通常的农家大。贵族的大庄园是由城堡来管理的。平均的农田单位是胡弗(Hufe)，多半根据产量而很少根据土地来计算。在下奥地利，勒亨(Lehen，半勒亨，Halblehen) 这个名称更为常用。在这里，土地的面积是决定性的。勒亨通常包括三十约赫① 的农田，此外还有足够的可用森林。

佃农的地租在中世纪中期大都还是用实物交付的。地租的数量在那个时代还是适度的，受得了的。在一个叫做奈德哈特·冯·罗伊恩塔尔的看来，巴奔堡时代晚期的奥地利农民是很富裕的。奈德哈特当然是个无所偏袒的观察家。根据在土地册里，也就是关于地主庄园权利和收入的记载里所提到的地租来推断，燕麦最为重要，居第二位的应该说是黑麦。小麦和大麦在最古老的文献中很少提到。斯拉夫黍子种得越来越少。亚麻的种植相当普遍。荚豆类中常见的是菜豆和豌豆，罂粟也很受重视。已经证实，约自 1200 年起，奥地利境内已经种植忽布。在文献中提到，葡萄种植的范围很广，收获量也很大，甚至在今天根本不种葡萄的地区，如上奥地利和克恩滕，情况也是如此。拥有广大的葡萄园的，主要是教会庄园，不过，奥地利公爵也是如此。由于自然上的原因，南蒂罗尔、南施蒂里亚和下奥地利的葡萄区在葡萄种植方面居于领先地位。最后，我们的文献还证实，在“果园”里果树栽培得很细心。在园圃植物中，常常提到在中世纪中期和以后用作香料和染料的番红花。据说，畜牧业在那个时代还不如后来的好。地主对经营畜牧业比小农更为注重。养猪最经常被提到。养牛是后来的文献讲到给地主交纳奶制品时得到证实的。养牛主要在西阿尔卑斯地区占重要地位，那里有古老而丰美的高山牧场。高山放牧

① 约赫(Joch)，古代德、奥田亩单位，约为二头牛一天所耕的土地。——译者

并榨制乳酪是畜牧业的一种特殊形式，自十二世纪中叶以来，特 99 别在蒂罗尔、萨尔茨堡和上克恩滕常常被提到。那里在高山饲养牛羊用的单个院落中均有常设殖民点。地主庄园提供若干头牛羊，高山牧舍就得交纳较多的乳酪作为回报。此外，养羊主要盛行于阿尔卑斯山前地带，那里有很多宜牧草地。目的主要是为得到羊毛和对羊毛进行加工，而不是为的利用羊肉。还有养禽业是非常普遍的。封斋节前夕常吃的鸡，在中世纪中期及晚期的文献中，曾多次作为典型的向官府的捐献而被提到过。捕鱼和养鱼的经济意义也不是微不足道的。中世纪中期末尾，在靠近波希米亚的边界林区里就已经有了养鱼池。多瑙河畔和湖畔的修道院就给他们的官吏交纳过鱼。狩猎对营养起着近代无可比拟的重大作用。同时，狩猎也是骑士们和男人们的运动。罗马人和斯拉夫人早就经营过的、传统悠久的养蜂业在经济上的作用比较小。

在中世纪晚期才完全发展起来的阿尔卑斯采矿业，当然应该是除农业之外，第二个生产原料的经济部门。盐矿开采业逐渐又达到了罗马时代的重要性。对盐矿业，我们掌握的资料还是比对其他矿业要多一些。盐在人的食用和牲畜饲养上都是不可缺少的。在更早的时期，就已着手开采干燥的岩盐，但是，在中世纪中期就过渡到盐水提炼法，也利用了含盐的水源。我们常常发现多种办法并存。在巴伐利亚一奥地利地区，中世纪最早的制盐业的证据出自古来就属拜恩公爵领地的赖兴哈尔。在其余的采制场所中，应提到因河边的哈尔，哈来因，克累姆斯明斯特附近的(巴德)哈尔和阿德蒙特附近的哈尔。十二世纪，在萨尔茨卡默古特也还有一个采盐场。奥地利的邦君们在那里都有自己的盐场，其中最重要的是奥斯泽。施蒂里亚的奥塔卡尔、赖因修道院和巴奔堡家（自1211年起）都相继在那里经营采矿场和煮盐场。小规模的“合伙煮盐

场”受到了排挤。由于从制盐场到多瑙河有舟楫之便，所以，盐在多瑙河的商业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很长的时期里，航运货物主要是盐。

中世纪中期，铁在东阿尔卑斯的矿产品中居第二位。在炼铁上也必须克服因民族大迁移而引起的长期中断。在中世纪初期，又有斯拉夫矿工小规模经营的原始开采业。在中世纪中期，施蒂里亚的铁矿山掌握在奥塔卡尔家手里，1164 年皇帝弗里德里希第一授予采矿特权以前情况就是如此。奥塔卡尔家，其后是巴奔堡家，都把铁矿山的股份赠给了许多修道院，如阿德蒙特、格斯、赛茨、泽考和盖拉赫等，产权的演变就和采盐业完全不同。自古以来，其他采矿场都落后于施蒂里亚的铁矿山；应当提到的尚有许滕贝格和克恩滕的其他矿场。在开采工艺上，我们已经看到坑道开采与露天开采的并存，这种并存以后仍然是颇具特色的。金属冶炼最初用通风炉进行，从十二世纪起改用风箱。中世纪中期末尾，锻铁工厂与熔解炉分开了。显然是由于木材开始缺乏，人们只好把锻工场迁到森林多而且有必要的水力的地方。

贵金属的开采也很重要。在加斯泰因山谷和劳里斯山谷都采出了黄金。这里的矿主都是普莱因的伯爵。银矿的开采对于铸币尤其重要。施蒂里亚在蔡林和施拉德明附近都占有银矿坑，在弗里扎赫地区也有银矿山。在这里，1036 年的矿工暴动曾导致策尔特沙赫伯爵夫人赫玛的儿子们的死亡，在这场暴动中矿工早就作为革命分子而崭露头角。后来矿山转成了教会的财产。在当时的蒂罗尔银矿中，应提到基茨比埃勒矿。这里和别的地方都同时开采银矿石和铜矿石。矿山在诸侯和城市的财政经济中起着决定性作用。阿尔卑斯地区的银矿开采为弗里扎赫、克雷姆斯、以及最后，为维也纳的硬分尼币的铸造和它的成功创造了前提。到了中世纪

中期的末尾，在邦君的收入中，特权，特别是造币和税收的特权所得的收入大大超过了地主庄园里的收益。

奥地利境内各城市的经济力量和经济作用，就个别而论，差别很大。在大多数情况下，到了十二世纪末，我们才有比较深入的材料。大多数小城市和集镇的人口都不到或稍多于一千，对于周围农村产品起着市场的作用，而且就其居民结构而论，都没有表现出显著的社会差别。中等的业主、商人和手工业者在居民中占大多数。在中等大小的城市，如施太尔、维也纳新城、圣珀尔滕、双城克雷姆斯和施泰因[①]、弗里扎赫和博岑等地，居民都不完全是清一色的。商业和出口行业为垦殖的经济意义创造了基础。中世纪奥地利境内唯一的大城市维也纳既有打短工的人、又有市郊葡萄园工人、搬运工人和家务仆役，无产阶级在人数上比较多。另一方面，在有地产的和从事商业的世居市民和铸币社团"共营社"的成员中间，还有异乎寻常的大财主。利奥波德第六的皇家领地总管和造币厂长迪特里希，在他的维也纳同乡看来，可谓是"富得出奇"。据记载，他是肉市和鱼市的业主，是市内和市郊许多院宅的主人，还是教堂的创建人，政治势力很大。除了铸币共营社成员以外，布匹商、皮衣制作商、屠宰商和酒商都属于最主要的有产阶级。负责市政管理的核心咨议会的成员就是从他们中间选出来的。据报道，后来的巴奔堡家曾经以大宗的现金贷款资助过维也纳市民的经济活动。虽然宗教法典禁止放债收息，妨碍了放债收息的勾当，人们还是没有不屑干这些勾当。教会的担心至少促使犹太成份在从商业本身被广泛地排除出去时，得以在银钱业中保持极大的份额。相

101

① 双城克雷姆斯和施泰因(Doppelstadt Krems und Stein)，在下奥地利多瑙河边，该城由克雷姆斯和施泰因两镇组成，现在仅称克雷姆斯市，施泰因为该市的一部份。——译者

应地，皇帝和公爵颁布的犹太人特权（1238年至1244年），除了涉及人身安全和保护宗教设施的措施以外，首先处理的就是典押权和信用权的问题。

总的说来，文献上先讲到原料加工业和手工业，然后才到商业。但，我们还是看到有巴奔堡家为弓箭匠订定的手工业条例。优待侨居维也纳的佛兰德尔染布匠的特权状的原件保存了下来。“艾森武尔岑”（“Eisenwurzen”）的炼铁工人和锻铁工人都有很好的声誉，而且早在十二世纪就被匈牙利的国王召到西本比尔根去。

货物堆存法的颁布对城市的经济地位有重大意义。在奥地利，1221年的维也纳特权状第一次证实颁布过这种法。当时规定，上德意志[①]的商人、雷根斯堡人、帕绍人和施瓦本人都得把他们的货物卖给维也纳的贸易商，使这述商人继续前往匈牙利去的道路被杜绝。于是，到匈牙利去的合法的多瑙河贸易就为维也纳商人所垄断。很明显，不这样办就不能消除雷根斯堡人过分强大的地位。1192年，公爵利奥波德第五曾书面确认，给他们以重要的裁判权和商业权。由于货物堆存法而不费吹灰之力获得的转口贸易，对于维也纳商界人士的惰性当然应当负责。

巴奔堡家和奥塔卡尔家的邦君对奥地利的和拜恩的修道院实行大量免税，证明了多瑙河航道对商业，尤其是对于经营酒、盐、铁和布匹的商业具有重要意义。税卡的所有者从纳税中得到利益，税卡过多势必妨碍商业。关于中世纪中期奥地利的多瑙河贸易总额还没有记载。不过，有一点总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来自上德意志的输入，主要是盐和布，大大超过了奥地利向多瑙河上游的输出，而与匈牙利的贸易结算肯定对奥地利有利。

102

① 上德意志，指德国南部巴伐利亚、施瓦本一带，因该地多山，地势高。相对地，下德意志指德国北部萨克森和下萨克森一带，因该地近海，地势低。——译者

关于从北到南的阿尔卑斯山大道和山口隘道上的贸易资料，特别是关于德国和意大利之间过境贸易的资料多半与税收制度有联系。在皇帝康拉德第二和皇帝红胡子弗里德里希给布里克森主教颁发的特许状(1027 年; 1179 年)中，关税权起了重要的作用。蒂罗尔伯爵与阿奎莱阿大教长之间的关税协定（1234 年）所处理的就是巴伐利亚人、施蒂里亚人和蒂罗尔人与意大利贸易往来所得的收入。在巴奔堡家取得施蒂里亚以后，奥地利的多瑙河各邦都参加了重要的对威尼斯贸易。这一点在维也纳新城的关税税率表中看得很清楚。多瑙河各邦也与北方发生重要的贸易联系。在奥塔卡尔和巴奔堡为恩斯订立的市场条例中特别提到俄国贸易——到鲁特尼亚[①] 的东加利曾去的贸易；无盐的波希米亚是巴伐利亚、萨尔茨堡和奥地利的盐场产品的重要顾主。如果某种货物缺少，就设法制止某种货物出口。所以，公爵弗里德里希第二于 1235 年颁发了禁止从所属各邦出口谷物的命令。萨尔茨堡的编年史家的抱怨使我们知道了这道禁令。撇开这种临时性的措施不谈，自巴奔堡时代开始以来，由于人口的增长，城市的繁荣，生活水平的上升，国内、外贸易都大为增加。

教会文化和宫廷文化

在中世纪中期开始的时候，传教活动在奥地利境内已基本上结束。照料灵魂的组织工作当然还需要付出重大的人力和财力；除了他们最重要的、狭义的神职上的任务之外，教堂先是参加殖民事业，后来进行基本的培养工作和教育工作，从而做出了令人起敬的文化成就。学制是由教会制订的，而且是由神职人员执行的。

① 鲁特尼亚 (Ruthenen) 指前奥匈帝国所辖下的乌克兰民族居留地区，即东加利曾、匈牙利东北部和布科维纳(Bukowina)。——译者

萨尔茨堡和帕绍大教堂的附设学校卓有成效地继承了古老的传103 统。从十世纪末起，布里克森也有一所优良的教堂附设学校。在修道院的学校中，格特魏克的修道院学校，由于修道院长哈特曼(1094—1114 年)办学有方而负盛名，所以，许多贵族子弟都在这里上学。赛滕斯泰滕和克洛斯特新堡也有好学校。在克累姆斯明斯特，修道院长阿尔拉姆被视为学业的促进者。在教区总监格霍(1131—1169年)领导下，赖歇斯贝格的教堂学校办得欣欣向荣。在施蒂里亚，阿德蒙特拥有一些优秀教师，其中如戈特弗里德和伊里姆贝特·冯·费明根。在克恩滕要提到圣保罗。在蒂罗尔则有诺伊施蒂夫特、因尼申和格奥尔根贝格。恰恰是这些规模较大的修道院，除了为教士们办的"内部"学校外，还办有"外部"学校，学生大都是世俗贵族子弟。偶尔也发生同学生的冲突，特别是十三世纪游荡学生越来越难以管束的时候。1242 年，泽考的主教海因里希采取了严厉的措施对付游荡学生。在教区学校中，维也纳的圣斯特凡教区学校可以追溯到十二世纪。大概在公爵海因里希第二"雅索米尔戈特"时期，法国早期经院哲学家彼得鲁斯学士曾在那里工作过，保守的象征主义的代表人物赖歇斯贝格的好斗的教堂总监格霍曾和这位彼得鲁斯进行过一场激烈的学术论战。该校的重要性从下列事实中可以看出：皇帝弗里德里希第二在 1237 年占领维也纳期间，为自己保留了校长的任命权，而这项任命通常属于奥地利公爵。我们还有同一年博岑市立学校的资料。在比较小的地方也有些教区学校，关于这一点，有偶尔提到的某些乡村教师或学生的名字为证。

教学的内容和方法都很保守。教材按传统分为三科(语法、修辞、辩证法)和四科(几何、算术、天文和音乐)。用作教材的都是古代晚期和中世纪初期作者的作品，如伯提乌斯、马蒂阿努斯·卡佩

拉、贝达·维纳拉比里斯、多纳特、普里西安或阿尔昆等，在诗作中，人们喜欢读的主要是维吉尔、贺拉斯、奥维德、卢侃①、阿拉图②等。在修道院的图书馆里藏有经院哲学家安泽尔姆、阿贝拉德、吉尔贝特、胡戈·冯·圣维克多等人的著作，但是，很难供学生们使用。那个时代的教育学采用严峻的方法。在书籍稀少的情况下，背诵起了很大作用，惩罚是很严酷的。瓦尔特·冯·德尔·弗格尔魏德就对过分的鞭笞提出过抗议。

在大教堂僧侣会和修道院里，人们都研读神学文献、写宗教诗、特别是撰述历史著作。奥地利修道院的编年史给我们介绍的近代史重要资料，大都很简略，偶尔才作详细的叙述。同时，地方史的记载逐渐重要起来。梅尔克、茨维特尔、海利根克罗伊茨和克雷姆斯明斯特在撰述这类史学著作中居于领先地位。各个修道院的年鉴之间的关系尚需作某些澄清。在萨尔茨堡（Annales sancti Ruperfi，圣卢佩特事历）和在蒂罗尔的修道院中，或许就是在格奥尔根贝格，发展起一种独立的编年史学。对圣徒列传和对乡土历史的兴趣都融合在下列感化性的生平记载中，如格特魏克的《真福阿尔特马尼传》(Vita beati Altmanni)、梅尔克的《柯罗马尼蒙难记》(der Passio Colomanni)和克洛斯特新堡的《虔诚的侯爵事迹》(Chronicon pii marchionis)。中世纪中期德国最重要的历史学家、弗赖辛的大主教奥托，就其出身和生涯的开端来说，也应归于编写奥地利教会史的人士范围之中。他的著作，根据对奥古斯丁的思想作新的理解而写出来的世界编年史和关于皇帝弗里德里希

104

① 卢侃(Lucan，拉丁文名: Lucanus)，拉丁诗人，(公元39—65)，著有长诗《内战》，在中世纪和近代初期影响极大，但丁和歌德均曾受其影响。最后为罗马暴君尼禄逼而自杀。——译者

② 阿拉图(Arator)，公元前三世纪时希腊诗人，著有格言诗《天象》(Phaenomena)。——译者

第一的事迹的书，也提供了有关奥地利史和巴奔堡家族史的宝贵史料，奥托自己就出身于这个家族。关于奥托的修道院的历史以及关于弗里德里希第一时期的教会纠纷，赖歇斯贝格的马格努斯都写过很简略。

修道院的文献不只用教会拉丁文作为表达的工具。德语中有价值的作品得以产生应归功于修道院文化。梅尔克就是一个德语的宗教和道德著作的中心。最早的以笔名著称的德语女作家阿娃夫人大概与死于1227年的同名的梅尔克的女隐士是同一个人。她写过一本韵文体的耶稣传、一篇“反基督徒”和一首关于最后审判的诗。在修道院长埃尔汉弗里德主持期间，居士海因里希写过一首警告死亡的训戒诗。在这个修道院的一份手稿中，还传下来了一首《梅尔克的玛利亚之歌》，诗中充分表现了十二世纪极为流行的对玛利亚的崇敬。我们还知道圣兰布雷希特修道院的一首歌颂玛利亚的诗，在这个施蒂里亚修道院的一块地产上出现了奥地利境内最重要的玛利亚圣地，早在中世纪中期末尾，这里就成了人们常去朝拜的名胜，即所谓玛利亚·采尔施恩教堂(Gnadenkirche von Maria Zell)。

修道院文化虽然原则上是逃避尘世的，却保持着与自然的联系。宗教的自然象征式(Natursymbolik)表现在，以《动物志》[①]这一共同名称著称的关于动物生活的著作中，这些著作可以追溯到古代晚期的蓝本。十一世纪时，在格特魏格有人把《克莱斯托论兽性》(Dicta Chrysostomi de natura bestiarum)改写成德文，该书属于《动物志》一类著作，与此同时，在克恩滕，大概就是在米尔施塔特，有人把《动物志》译成了韵文；这个主题在米尔施塔特教堂

① 《动物志》(Physiologus)，指以基督教的象征法去描写动物习性的古代文献，它所写的动物有的确有，有的则仅为传说中的动物。——译者

的十字回廊里得到了造型艺术的表现。宗教剧终于在外界流行起来，它显然起源于中世纪中期的复活节游艺活动。十二世纪的复活节庆祝活动与礼拜仪式联系得很紧密，许多来自维也纳及其郊区的手稿可以为此作证。除了这种庆祝活动以外，首先要提到十三世纪初克洛斯特新堡的复活节游艺活动，在这种活动中，除了大量的拉丁文警句外，还有德语歌曲«基督复活了»的最古老的形式流传了下来。继这种还算虔诚的宗教戏之后，不久就出现了对这个题材通俗的、但却更为粗鲁的处理。 105

修道院独创的文学活动是值得注意的，此外，孜孜不倦的修道院誊写家们主要的贡献在于保存和传播了前几代人的许多作品。他们的手抄本异常的细致，在艺术上往往装潢得极其精美出色；修道院记载和撰述的年鉴、编年史、死亡登记簿、原始文件和传说记录，给后代传下来大量历史证明材料。

尽管教会僧院对中世纪中期奥地利精神文化的贡献，在成绩的质量和数量上都很重要，但是，骑士和宫廷界的创作对它作了价值相近的补充。当然，教会和贵族连同他们的作品，彼此既非陌生，关系也很密切。高级教士大部分是贵族出身，另一方面，骑士等级的伦理学在天主教的道德观中有其最坚实的基础。贵族，即广义的"骑士阶级"，包括诸侯及其家族，以及上层自由贵族陪臣、官吏、骑士和高级奴仆。他们之间尽管有某些政治矛盾，但还是形成了一个集团。在十二世纪里，这个集团对于下层自成一个等级，彼此隔绝，但是，在他们中间却由于骑士的生活方式和鲜明的阶级意识而结合起来。这种立场的基础是由于对贵族青年所进行的教育造成的，这教育当青少年从骑士侍从提升为骑士时就告一段落，随着这种提升，青少年就被庄严地吸收进有战斗能力的骑士团体之中。在公爵弗里德里希第二结婚的时候，有二百二十五名骑士

侍从被晋封为骑士。比武也是贵族威势的表现。1224年弗里扎赫的比武大会参加的人数很多。列支敦士登的乌尔里希记述过1227年他在克洛斯特新堡举办的一次刺杀大比赛；但，这里大概有诗人的夸张。此外，骑士的教育除了包括骑马、击剑和狩猎等体育训练外，还包括演剧和唱歌方面的艺术培养，其文化修养的深度差别很大。我们还是看到象埃姆斯的鲁道夫那样学问渊博的骑士等级的成员，但象列支敦士登的乌尔里希那样机智活泼的才子竟然完全不会读书写字。对诸侯的子弟的教育特别细心。巴奔堡家的106 弗里德里希第一和弗里德里希第二所受的教育显然都是如此。妇女在贵族家庭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介绍骑士习俗和风尚方面，她们起一种重要的教育者的作用。在法兰西-普罗旺斯的榜样影响下，妇女在社交中的荣誉优先地位得到了确认，这表现在求婚和结婚的礼仪中，爱情诗歌中，还表现在中世纪中期末尾向妇女献殷勤这种偏差上。

那个时代的宫廷诗作品使我们对贵族界的理想和思想有了一个很好的了解，在这些宫廷诗作品中可以看到最重要的文学成就和艺术成就。在这方面，奥地利地区是很突出的。第一个成名的德意志抒情诗人屈伦贝格出身于一个骑士家族，这个家族以林茨附近的世袭城堡而得名。屈伦贝格的青年农民艾斯特·冯·迪特马尔来自米尔菲特尔，他在自己的诗歌中对民间形式和宫廷形式都能运用自如。哈格瑙的领主（“老”）赖因马尔大概是圣珀尔滕地区的哈根瑙人，而不是亚尔萨斯人。他与巴奔堡宫廷的关系很密切。他的作品都是专写“崇高的”爱情的，都是对没结婚希望的妇女的敬仰。中世纪中期德意志杰出的抒情诗人和政治格言作者瓦尔特·冯·得尔·福格尔魏德的爱情理想有力而富于幽默感。关于瓦尔特的故乡有各种猜测，人们大都在南蒂罗尔的莱恩附近的艾萨

克谷地寻找他用来为自己命名的福格尔魏德霍夫。奥地利至少是他自己选择的故乡。照他自己的话说，他是在这里学“唱歌和说话”的。1198年以前，还有1203—1208年间，他曾在维也纳公爵的宫廷里活动，在这其间，他还为皇家服务过。瓦尔特作为政治发言人，挺身反对过“韦尔施的”[①]罗马教皇政权的优越地位，此外，他还对教士阶层作了尖锐的批评。另一方面，他还反对异教的潮流并深刻地表现了真正的宗教情感。因此，他的作品极其活泼地反映出他那个时代的伟大思想和冲突，博得了广泛的赞许。他的竞争对手托马辛·冯·齐尔克拉勒曾证实，他的作品使数以千计的人着了迷。在瓦尔特之后不久来到奥地利的巴伐利亚人奈德哈特·冯·罗伊恩塔尔逼真地描述了农事活动，农民的求婚和娱乐；同那个有时被辛辣地嘲弄的农民发生的独特的冲突，使奈德哈特在后代看来简直成了真正民间的人物，后代人往往把他同十四世纪的滑稽家混同起来。施蒂里亚官吏乌尔里希·冯·列支敦士登在《向妇女献殷勤》和《妇女书》[②]两部作品中，以过分奇异地向妇女献殷勤的代表出现。乌尔里希假借妇女维纳斯的名义所描写过的著名骑士旅行，如在《向妇女献殷勤》里所描写的，实际上他当然没有做过，再说，他也没有写好这部作品的本领，但，他的作品里包含有许多令人感兴趣的传记材料和文化史材料。坦豪赛尔也许出身于萨尔茨堡的隆高，象奈德哈特和乌尔里希一样，也和公爵弗里德里希第二的宫廷有联系。他从公爵手里得到了在维也纳近郊的 107

① 韦尔施(Welsch)，意为属于韦尔施兰(Welschland)，原指意大利及其邻国法国和西班牙。此处指“意大利的”，“外国的”。——译者

② 乌尔里希·冯·列支敦士登(Ulrich von Liechtenstein, 1200?—1275)，中世纪中期施蒂里亚爱情诗人，其著名的诗体小说《向妇女献殷勤》(Frauendienst)揭露了宫廷文化的腐朽没落，他的《妇女书》(Frauenbuch)则控诉了当时社会道德的败坏。——译者

地产；他的恩主死后，这位坦豪赛尔就过着很不稳定的流浪者生活。他哀叹自己的弱点是顶不住美酒和女人的诱惑。关于他死于“维尔特夫人”① 的传说与此有联系。下奥地利的乌尔里希·冯·萨克森多夫（埃根堡附近）也属于弗里德里希公爵的宫闱。乌尔里希写过几首充满虔诚感情的轮舞歌和抒情歌。蒂罗尔也出了几个抒情诗代表作家，其中布里克森的官吏鲁宾和麦茨的领主瓦尔特就曾效法瓦尔特·冯·德尔·福格尔魏德的榜样。

宫廷叙事诗在奥地利只有一个模仿者，就是福拉尔贝格的官吏鲁道夫·冯·埃姆斯，他是个受过基本教育并具有惊人创作力的诗人。他的历史知识使他能够写出一本韵文体的世界编年史。为处理一个喜爱的题目，他写了一部描写亚历山大的小说。他的诗体小说《善良的格哈德》的主题取材于一个犹太人传说，在这部小说中一个商人作为长诗的主人公出现。但是，在《巴尔拉姆和约扎法特》中，鲁道夫模仿一个拉丁蓝本，在基督化了的外衣下表现了印度的佛教传说。

在奈德哈特和鲁道夫·冯·埃姆斯的作品中，偶尔也在瓦尔特·冯·德尔·福格尔魏德的作品中，题材早已突破了贵族和教会的框框；但是，人民有时也在自己的行列中和自己的事业中找到自己的发言人，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因非特尔诗人、园丁韦恩海尔的《迈尔·黑尔姆布雷希特》。这位诗人以质朴的笔调，描述了一个年轻的农家儿子的生平，他想到外边去出人头地，盲目模仿贵族，终于堕落成剪径盗贼而身亡。这个针织工人大概出身于市民阶层，是个莱茵河的法兰克人，曾在奥地利居留，他的剧本大多在这里演出，他的作品也在这里流传了下来。除了写历史的作品以外，他

① 维尔特夫人（Frau Welt），中世纪一种象征淫妇的人物。据说，此女人从前面看娇艳而迷人，背后却长满脓疮，爬满害虫。——译者

还描写农家生活的欢快场面。他的《阿米斯神父》也可被看成是对诗中的主人公所属的世俗教士阶层的讽刺。这个主人公欺骗自己周围的人，但是最后进了修道院。《水草地上的群鸡》描写农民成功地抵制了领主们的要求。

英雄史诗是中世纪中期奥地利诗歌中最重要的作品。除了冰岛以外，没有别的地方保存着这么丰富的日耳曼传说遗产。十三世纪初，一个奥地利人记下了最重要的德意志民族史诗，这个奥地利人与巴奔堡宫廷和帕绍的主教大概都有密切的关系。从前人们把屈伦贝格看成是《尼贝龙根之歌》的作者，近来又认为作者是辅助教士康拉德·冯·鲁斯巴赫。这部作品表明，作者对奥地利的风土 108 人情都有很深入的了解。故事的主要情节都发生在奥地利的多瑙河边，埃策尔和克里姆希尔特的婚礼是在维也纳举行的，边区行政长官吕迪格尔·冯·贝歇拉恩(即珀希拉恩)被写成骑士道德在男子的忠诚与朋友的忠诚的纠纷中的最高代表人物。匈奴国(Hunnenland)有相邻的匈牙利的某些特征。如果说勃艮第的其他传说也和巴伐利亚-奥地利地区联系在一起，那么，更为古老的勃艮第传说肯定在以前的时代里就已使这个题材在奥地利扎了根。除了《尼贝龙根之歌》以外，应首先提到《古德龙》，题材取自北海的海滨地区，但是在奥地利，它是在《尼贝龙根之歌》的内容与形式的影响下被人记载下来的。这本《古德龙》只是靠后来由马克西米利安第一发起整理的一部手稿才得以完整地流传下来。

正如《尼贝龙根之歌》与奥地利联系在一起那样，十三世纪中叶记录下来的关于比特罗尔夫和他儿子迪特莱布的叙事诗也与施蒂里亚联系在一起。书中以雄辩的语言描写了施蒂里亚的优点。瓦尔特和希尔德贡德合写的诗歌的两个残篇中关于奥地利的那个片断则为时略早。比特罗尔夫和瓦尔特的诗中的主人公都是。哥

特人的英雄传说，在奥地利人人皆知，家喻户晓。在中世纪中期和晚期，邦名或者如格特魏格等个别地名，人们认为起源于哥特人，在这里，经过学者整理的和民间流传的传说结合在一起。所以，大量短小的英雄史诗，其中心人物都是伯尔尼的迪特里希，即反映历史上的特奥德里希的诗体形象，如«玫瑰园»、«迪特里希的逃亡»、«乌鸦大战»、«艾肯之歌»、«劳林»等，要么是由奥地利艺人记录的，要么是发生在奥地利地区，尤其是发生在蒂罗尔地区，这就不足为奇了。

在造型艺术领域里，中世纪中期的奥地利本身也创造出一些伟大的作品，对外来的优异成就也很能领悟。在奥托时代，后来主要在宗教改革的强大推动下，萨尔茨堡主教区和帕绍主教区都有一些壮观的作品丰富了宗教建筑术。帕绍的阿尔特曼和萨尔茨堡的康拉德第一在他们的传记中受到赞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热心建筑。代表本笃会和西斯迪显教团的罗马式建筑的，在奥地利境内有阿德蒙特的第一个建筑式样，以及兰巴赫、海利根克罗伊茨、维克特林和鲍姆加滕贝格等。当然，中世纪中期的建筑由于后来的补充和改建，一般都有了些变化，甚至受到破坏。在中世纪和近代初期，人们都不可能把对文物保护的兴趣作为先决条件加以肯定，即使对以前各世代的成就并不缺乏敬意。十二世纪的建筑艺术中保存至今的最重要成就是古尔克的有三个正堂的圆柱式长方形教堂。大约同时修成的维也纳斯特凡教堂的第一个建筑式样规模很是宏大，到了十三世纪三十年代，公爵弗里德里希第二才用一座早期哥特式的新建筑物代替了它。萨尔茨堡的发掘终于使我们得到关于1200年大型五正堂式大教堂建筑的新说明。这个建筑是德语区最大的罗曼式建筑。下奥地利和克恩滕有许多Karrner（积骨堂），是教会的罗曼式建筑艺术的一种有趣的特殊形

式。壁画于1140年在萨尔茨堡的诺恩贝格修道院和一百多年以后在古尔克产生了它的最高成就。1181年，在克洛斯特新堡出现了凡尔登祭坛，最初是一种对布道台的装饰，珐琅描绘工艺上的一项伟大成就，制作者是从洛林请来的具有欧洲声誉的艺术家之一尼克拉斯大师。罗曼艺术时代的晚期产生了申格拉本的教区礼拜堂的雕刻装饰，该教堂大约修建于1220年。哥特式建筑的新趋势首先以托钵僧教团的教堂为代表，如，弗里扎赫的多明我会教堂。按纯哥特式厅堂建筑式样修建的利林费尔德二本堂式圣坛所被认为是最高的成就，该圣坛所是在1200年后不久开始修建的。克洛斯特新堡的Capella speciosa①被看作是过渡性的建筑。巴奔堡家是这里的营造主。在这之前，他们已经建造了克洛斯特新堡的和维也纳的大行宫建筑(在维也纳有 Burg am Hof，即霍夫堡)。在同一时期，在奥地利境内各邦都出现了大量城堡建筑物。施塔海姆贝格的坚固设施令人印象深刻，那是公爵弗里德里希第二与皇帝战斗期间的避难地，巴奔堡家的财宝后来在这里受到德意志骑士团骑士的保护，再者就是在弗里扎赫彼得山上的萨尔茨堡建筑。

罗曼工艺织物，质地优良的很多；虽然君主和贵族在艰难时期曾抢夺教堂的财宝，使有些珍品遗失，我们仍然拥有一些宝贵的作品，例如，1030年的萨尔茨堡圣徒遗留下的十字架；十二世纪圣彼得的鲁佩特圣餐杯和维尔滕的圣餐杯。在十一世纪以及十二世纪，萨尔茨堡派在书籍插画方面一直是领先的。在十一世纪的大型《圣经》中，在进口的意大利样品及其仿制品中可以看出整个时代普遍注重对《圣经》的研究。关于教会的纺织技艺，由于布料质地不坚实，所以，我们掌握的物证很少，但，戈塞尔的法衣就是中世纪

① Capella speciosa，拉丁文，含义为“美丽的小山羊”，这里指著名的克洛斯特新堡教堂的一个小礼拜堂。——译者

中期末尾保存下来的一件著名的珍品。

对中世纪中期奥地利的精神文化作一个综览，就会得出一个全貌，这个全貌可以同那个时代的政治上升、经济繁荣以及殖民事业的大发展相比拟；而且这是奥地利地区的著作在德意志文学史上占据首位的唯一时代；同时，奥地利的造型艺术与相邻地区的成就相比，确实毫无逊色。

110

五、中世纪晚期(1246年至1526年)和哈布斯堡家族"对奥地利的统治"

争夺巴奔堡继承权的斗争。奥托卡尔国王

巴奔堡家族男系的断绝使奥地利和施蒂里亚的政治发展有面 111 临被纳入异邦轨道的威胁;只要巴奔堡家族的政绩再也不能逆转,那么,分割为小块封地就再也不可能。但是,巴奔堡家族各领地已成为邻国政策所觊觎的目标,如普热米斯利登的波希米亚和阿帕登的匈牙利。由于王族发生内讧而遭削弱的维特尔斯巴赫的巴伐利亚也在试图干涉。皇帝可以考虑把奥地利和施太尔当作已归还原主的采邑来对待。最后,有一个无疑是帕绍集团捏造的所谓公爵弗里德里希第二的遗嘱,该遗嘱把巴奔堡家族各领地的支配权许诺给罗马教皇,此外,遗嘱还可以充当受公爵弗里德里希第二损害的帕绍主教区提出要求的基础。罗马教廷从未援引这个伪造的文件,它在罗马可能根本无人知晓。教皇的政权仅限于支持各种不同的王位竞争者。

在"小特权书"里规定了女性有继承权;虽然特权书的原文仅仅谈到公爵的女儿,然而,当时的史料清楚地显示出,人们把这一文件看作女性的旁系亲属——弗里德里希的妹妹玛加丽特和他的外甥女,即声名狼藉的早逝兄弟海因里希之女格特鲁德——也有权要求继承的根据。于是,异邦的觊觎王位者为使他们的要求合法化,纷纷争取和两位巴奔堡家族女性之一结婚,这两人的要求通

常被人们等量齐观。

格特鲁德在1246年就已和波希米亚的弗拉迪斯拉夫亲王结婚，但是，后者还没有能够积极干预奥地利的事务就于1247年2月去世。后来，格特鲁德也想提出一项所谓弗里德里希第二的临终旨意，以图得逞；由于她和罗马教廷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人们就力图从那些拥护教皇的诸侯阵营里挑选一位合适的求婚者。最后，挑选了赫尔曼·冯·巴登，他来奥地利和格特鲁德结婚，然而，他在这个邦里却吃不开；受皇帝委托的帝国摄政官奥托·冯·埃伯施泰因伯爵的成就也同样寥若晨星。1250年末，赫尔曼公爵和 112 皇帝弗里德里希第二先后逝世，不久，后者的同名孙子、巴奔堡女子玛加丽特和她的原配海因里希(第七)国王所生的儿子也死了。于是，巴奔堡家族各领地就变得孤苦无依。这时，在匈牙利和巴伐利亚灾难性的入侵的影响下，奥地利贵族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弗拉迪斯拉夫的弟弟、波希米亚王位的继承人奥托卡尔身上。这位精明强干而又雄心勃勃的亲王于1251年秋出现在这个领地里，并且迅速获得成功；1252年2月，他和比他年岁大得多的玛加丽特结婚，很快得到普遍承认。然而，争夺巴奔堡家族各领地的斗争绝不因此结束；格特鲁德和卢特尼亚的侯爵罗曼·冯·哈利奇结婚，他是匈牙利国王的亲戚，因而得到匈牙利显然并非无私的援助，罗曼和格特鲁德离异后，匈牙利的干涉还继续着。两位巴奔堡家的女性只不过是邻国权力之争中的棋子。教皇调停后，奥芬①和约(1254年)暂时结束了争端：奥地利，包括特劳恩高和皮滕地区，落入奥托卡尔之手，匈牙利人得到施蒂里亚，此外，另给格特鲁德以赔偿。在随后的岁月里，奥托卡尔企图通过颁发国内和平敕令来整

① 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由“布达”和“佩斯”两部分组成，当时“布达”的德文名称叫“奥芬”(Ofen)。——译者

顿奥地利的内政，这时已显示出对贵族采取行动的倾向，然而恰恰是贵族把他请到这个邦里来的，而且这时也显示出对教会的优待，后来又显示出对城市的优待。对巴伐利亚发动的一次战争进行得不甚顺利；萨尔茨堡大主教区的双重选举引起了新的纠纷，先选出来的候选人菲利浦出身于施潘海姆家族，是个公侯之子，满脑子世俗思想，他避不接受圣职，因为他想保留克恩滕和克莱因的继承权。他依仗奥托卡尔。对立的候选人乌尔利希·冯·基希贝格从前是巴奔堡办公署的高级官员，他寄希望于匈牙利的帮助。但是，他仅拥有极少的人力物力，1259 年在一次向萨尔茨堡作殊死进攻时，甚至一度落入奥托卡尔国王之手。起初教廷喜欢他更甚于那个不倾向教会的菲利浦，在这些失利之后，乌尔利希也逐渐为教廷所遗弃。在萨尔茨堡发生混乱的时候，施太尔贵族觉察到摆脱匈牙利统治的机会已经来临，这种依仗占领军而建立起来的统治是很难忍受的；为此，借助奥托卡尔的后援是必要的。他派出奥地利军队帮助施太尔，使起义获得成功。最后，波希米亚和匈牙利之间的公开斗争终于爆发，波希米亚—奥地利联军最初遭受挫折，后来在格罗伊森布鲁恩打败了匈牙利人。在维也纳和约中，匈牙利人终于放弃对施蒂里亚的统治(1260 年)，而让位给奥托卡尔。

不久，奥托卡尔似乎感到不必再珍惜巴奔堡家族各领地的居 113 民热爱王朝的感情了；他和这次婚后没有子嗣的玛加丽特离了婚，并和匈牙利国王的一位亲戚库尼贡德·冯·哈利奇结婚。此外，奥托卡尔竭力利用国王康拉德第四逝世(1254 年)后在德国存在的混乱状况；他的代表在 1256 年两次选举中先后支持两位竞争者，这并非徒劳，而是以此来阻止帝国权力的巩固，因为帝国权力一巩固就必然不利于自己的扩张努力。他仍然在 1262 年让两个德意志傀儡国王之一的理查德·冯·康瓦尔用书面文字把巴奔堡

家族的领地赐封给他，这是违背法律惯例的。

在奥地利也好，在施蒂里亚也好，贵族都友好地对待奥托卡尔，但是，他必然要和每一位企图增强自己地位的国君发生冲突；而且，对外族人的不信任也使贵族和奥托卡尔疏远，他把奥地利的重要职位都交给波希米亚人和摩拉维亚人，在施蒂里亚尤其如此。1265 年，这位国王开始在很多地方拆毁在混乱时期未经国君批准就擅自兴建的城堡。心怀不满的贵族可能与苏台德邦的贵族进行了联系，奥托卡尔对此进行干涉，并下令处死奥地利的邦法官奥托·冯·迈绍。1268 年，无数施蒂里亚贵族被捕，最后，威望很高的南施蒂里亚人赛弗里德·冯·马伦贝格未经法律程序就在狱中被害。匈牙利王室已经由于内部纷争而陷于瘫痪，如果没有比它更为强大的外敌参加奥地利各邦的反叛活动，那么，这种用以对付桀骜不驯的贵族的强硬政策还是卓有成效的。此外，奥托卡尔得到了广大阶层的拥护，首先是市民和小骑士的拥护，他牺牲大贵族领主的利益而让市民和小骑士受惠。在这个意义上，1254 年的国内和平条约已经得到遵守，奥托卡尔 1266 年对巴奔堡家族的奥地利邦法的补充条款也体现了同样的精神。教会和寺院也得到严守和约的国君的保护。帕绍主教区得益于奥托卡尔的很多，这个主教区由一位十分重要的教长奥托·冯·龙斯托夫主教负责（1254 年—1265 年）。奥托卡尔似乎也有过把维也纳变为邦主教区的想法，这是巴奔堡家族的宿愿，然而他很快又放弃了这想法。奥托卡尔严厉对待占多数的发尔多①教派，这也符合巴奔堡家族的传统。

格特鲁德和赫尔曼·冯·巴登婚后所生的儿子弗里德里希 1268 年在那不勒斯断头台上分享康拉丁的悲惨命运之前，在遗嘱

114

① 发尔多（Waldus），法国宗教改革家，1176 年创立以原始基督教为楷模的教派，即以其名命之。——译者

里把奥地利许给维特尔斯巴赫家族，把施蒂里亚许给他的母亲，这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不久，奥托卡尔就把格特鲁德驱逐出施蒂里亚；她在萨克森的佐伊斯里兹寺院里度过她的余生，在那里她还得悉她的冤家对头的失败和死亡。然而，最初奥托卡尔的地位曾大大加强。菲利浦·冯·施潘海姆还一直未受圣职，是一位不安心职守的大主教，乌尔利希·冯·基希贝格则是一位不称职的大主教；一个被贬逐，另一个辞职不干，萨尔茨堡大教堂僧侣会选举奥托卡尔的侄子弗拉迪斯拉夫做大主教(1265年—1270年)。被革除大主教职务的菲利浦想去克恩滕继承遗产，那时，他的兄弟乌尔利希是这个邦的公爵，继父亲之后于1269年去逝，没有留下后代。但是，乌尔利希可能为了避免发生混乱和王位的争夺，在遗嘱里把他的领地克恩滕和克莱因许给奥托卡尔国王。奥托卡尔重新对匈牙利大动干戈，战胜了匈牙利，在施潘海默家族的领地里得了势。此外，1272年，他成为弗里奥尔的统帅，因而实际上也是阿奎莱阿教区的统治者。这样一来，这位波希米亚国王的统治已经由苏台德地区一直延伸到亚得里亚海。奥托卡尔感到自己非常安稳，根本不必再去寻求克恩滕和克莱因的赐封。然而，不久帝国的权力又重新恢复；过去，它的崩溃曾为奥托卡尔的发迹提供了条件。

1273年9月29日，根据美茵茨大主教和纽伦堡城堡辖区长官的建议，鲁道夫·冯·哈布斯堡伯爵被选为德意志国王；奥托卡尔的使者反对未果，而普热美斯利登家族的宣传曾很不恰当地讽刺他为“可怜的伯爵”，他实际上是一位广有地产、饱经战阵而又精通世故的统治者，不久，他当了国王，遇事冷静，目标明确，他崛起在德国西南隅是以冷静见称的。诚然，奥托卡尔拥有完全不同的权力手段——正是因为这样，德意志诸侯和教皇格列高利十世才不愿意看到他登上德意志王座。

鲁道夫·冯·哈布斯堡和德意志诸侯一样，都决不忍受奥托卡尔在帝国内部享有大国地位。这位波希米亚国王拒绝出席纽伦堡法庭，以及没有举行接受采邑的仪式，这就有足够的法律理由，宣布奥托卡尔在整个帝国不受法律保护，并于一年以后，重申了这项严令。奥地利各邦的贵族和主教不久就倾向鲁道夫；教皇格列高利十世的表态和托钵僧的亲鲁道夫的宣传也影响了广大民众阶层，然而，奥托卡尔对一切表示不满的动乱给予了十分严厉的制115 裁，他的地位直到1276年夏天还没有动摇。鲁道夫国王那时和匈牙利联合，维特尔斯巴赫家族，萨尔茨堡大主教，格尔茨的迈因哈特兄弟和阿尔贝特都站在他一边。当德意志国王及其盟友的军队开进奥地利、施蒂里亚和克恩滕时，贵族和多数城市迅速背离奥托卡尔，只有维也纳坚持得稍长一些。因此，奥托卡尔决定不抵抗就屈服。他放弃奥地利各邦和埃格尔，作为补偿，把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作为采邑重新移交给他。鲁道夫·冯·哈布斯堡颁布一项适用于奥地利各邦的国内和平法令，它的条款暗示着对贵族的优惠，允许他们自由建设城堡。但是，也必须争取那些得到过奥托卡尔关怀的阶层。城市得到很多特权，首先是克雷姆斯和图尔恩；皇帝弗里德里希第二曾经（于1237年）确定维也纳为帝国直辖市，这个决定又得到重申；鲁道夫对待寺院与波希米亚国王同样宽宏大量。

鲁道夫·冯·哈布斯堡的成就唤起德意志选帝侯的忧虑；似乎很清楚，他想把巴奔堡家族各领地变为他自己的家族所有；因此，支持帝国权力的热情很快就冷却下来，况且这种热情从来就不高。另一方面，奥托卡尔和他在奥地利为数仍然不少的追随者还有联系，他拒绝撤出好些地方。下巴伐利亚的海因里希公爵公开站到他一边，屈恩林家族为声援奥托卡尔举行了起义，在帕尔特拉姆领导下，维也纳的久居市民搞了一个阴谋，在“斯特凡坟场”前面

被破获。于是,鲁道夫和奥图卡尔之间又发生斗争,二者都寻找同盟者。这一次,鲁道夫并未拥有太多的军队,他可以依靠奥地利各邦的骑士和在老哈布斯堡家族统治区征集的兵力,萨尔茨堡大主教,巴塞尔的主教和纽伦堡的城堡辖区行政官拨了一些兵力增援,整个北德意志和各选帝侯都疏远了他;因此,拉迪斯劳斯国王领导下的一支强大的匈牙利军队来投靠他是很重要的。在奥托卡尔的军队里,除了波希米亚人和摩拉维亚人外,有很多来自勃兰登堡、图林根、西里西亚和波兰的骑士。到那时,他一直提倡德意志人向他的领地移民,这引起了捷克民族反对派的不快;因此,在最后的斗争中,奥托卡尔呼吁斯拉夫族团结起来,对抗德意志人。对方也在进行民族宣传。但是,由于两军的成份庞杂,对于斗争的这一侧面不可估计过高。1278 年 8 月 26 日,经过互有胜负的战斗之后,鲁道夫由于灵活地投入后备军,在迪恩克鲁特大获全胜,奥托卡尔在逃跑中被他的私仇——可能是被处死的马伦贝格的亲戚——擒获并打死。

胜利者迅速追击敌军,直捣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由于抵抗顽强,双方才得以媾和,和约肯定了哈布斯堡家族对奥地利各邦的支配。鲁道夫和奥托卡尔的子女间同时举行的两场婚礼有助于消除王朝之间的对立。鲁道夫的同名儿子和奥托卡尔的女儿阿格妮斯结婚,而波希米亚王位的继承人文策尔与德意志国王的女儿古塔结亲。 116

马希费尔德战役对奥地利历史具有划时代意义。它为鲁道夫国王的儿子们分封奥地利和施蒂里亚的采邑提供了先决条件,此举奠定了哈布斯堡家族在奥地利地区六百三十年的统治。它阻止了奥地利象摩拉维亚以及后来的西里西亚那样,沦落为波希米亚国王的附属国。偶尔有人认为,要是奥托卡尔胜利——这位国王

就可以统治一个德意志民族占优势的帝国——也许会导致捷克人的德意志化，这种观点应当受到批驳；他的王朝夺得政权不可能危及捷克民族的存在，反而会促进苏台德地区斯拉夫贵族的扩张。那个时代的人没有提出影响如此广泛和如此成问题的想法，一个卓有成效地统治巴奔堡家族所属各邦达二十六年之久的国王的惨死给他们留下最强烈的印象。在奥地利编年史家关于奥托卡尔阵亡的报道中，同情和关切占了优势，尽管也不乏敌对的声音。只有到了十四世纪初，施蒂里亚的诗体编年史家的史学著作里，才对这位雄才大略而无所顾忌的统治者人物的形象作了描绘，他的傲慢自负导致了他的覆灭，在他的命运里证明了上帝的报复；这一形象连同对拿破仑的记忆犹新，大大地影响了格里尔帕策笔下的奥托卡尔[①]。在据说由王后玛加丽特的忏悔神父佩诺尔德所著的一部编年史里，对国王的品格作了不友善的描绘，这也对奥托卡尔的评价产生不利的影响——其实，那是一部由利里恩费尔德的历史撰述者克利索斯托姆斯·汉塔勒在十八世纪炮制的一本粗制滥造的著作。事实上，我们必须把奥托卡尔看作一位重要的统治者，奥地利有很多东西得益于他，正如也得益于他的对手鲁道夫那样；在他执政的末年，反抗日渐增多，他无疑曾感到地位不稳，并曾过份严厉地对付过真正的和假想的敌人。

哈布斯堡在奥地利统治的开始

帝国的大诸侯在第二次讨伐奥托卡尔时曾抛弃过鲁道夫·冯117·哈布斯堡，因此，这位德意志国王在夺取胜利之后对他们当然不必考虑过多。在 1276 年的和约中，他就已经得到巴奔堡家族的

① 格里尔帕策尔(Franz Grillparzer)著有历史剧《奥托卡尔国王的盛衰枯荣》。——译者

自由地[1]。乌尔利希·冯·霍伊恩堡和他的夫人阿格妮斯——赫尔曼·冯·巴登和格特鲁德的女儿——在1279年放弃他们的权益,并得到相应的补偿。这样一来,一切关于继承权的问题都解决了。鲁道夫也顺利地争取到教会的采邑,并于1281年任命他的精力充沛的儿子阿尔布雷希特为领地的行政官。一个由日耳曼自由贵族陪臣和官吏组成的领主咨议会协助阿尔布雷希特执政;人们试图以此来安抚奥地利贵族由于阿尔布雷希特这位统治者刚毅的个性而日益增长的忧虑。这些贵族起来反对奥托卡尔不是为了要承认另一个同样咄咄逼人的苛政。1282年圣诞节时,终于委托两位王子阿尔布雷希特和鲁道夫"全权"掌管采邑奥地利,施蒂里亚和克赖因(也就是说共同地、不可分割地统治)。选帝侯们表示赞同,然而兄弟二人共同执政不适合奥地利的国情,因而人们请求改变;在莱茵费尔登条约(1283年6月1日)里,委托阿尔布雷希特一人单独统治领地。鲁道夫及其继承人则得到领土或金钱的赔偿。这一条款没有得到遵守,于是引起了可悲的后果。奥地利的官吏们在自己的一份文件中肯定了哈布斯堡家族的家约;然而,实际上,他们不久就感到阿尔布雷希特的独裁统治比以前的解决办法更令人不舒服。

还有另一个情况使贵族和贵族以外的更广大居民阶层感到不满。新的统治者们不仅自己来,而且还带来数量更多的斯瓦本随员,在当地人看来,哈布斯堡家族对这些人太优待了。对"斯瓦本人"怨声载道,怒气冲天,不久,奥地利各邦所遭受的厄运全都归咎于他们。在来自前奥地利[2]的施瓦本的贵族中,赫尔曼·冯·兰

[1] 自由地(Allodien),指免除赋税的田产,不属采邑以内的封建主私产。——译者

[2] 前奥地利(Vorlande),指旧哈布斯堡家所拥有的领地,参见140页注。——译者

登贝格作为奥地利宫廷的内府大臣，埃伯哈德，冯·瓦尔泽作为恩尼斯河上游之邦的邦法官，很快就争得了领导地位；厄廷根，霍恩贝格-海格洛赫、克林根贝格等家族，在维也纳宫廷也有自己的代表；斯瓦本方言成为宫廷语言。哈布斯堡家族本身源出真正的阿拉曼世家。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虚构的世系记述中，的确有人企图把他们说成是出身于罗马的城市贵族世家科洛纳和皮勒奥尼，不久，又有人利用法兰克人关于特洛伊传说中的说法，以及《圣经》上的祖先名单来为哈布斯堡的族谱增光。除了斯瓦本人外，1289年为公爵所抛弃的南蒂罗尔人乌尔利希·冯·陶菲尔斯，尤其是修道院院长海因里希·冯·阿德蒙特，也遭到猛烈攻击。修道院长是一位有才华的施蒂里亚农民之子，当了施蒂里亚邦的书记官，后118 来成为总督，是贵族最痛恨的仇人；他最后成为一次谋杀的牺牲品。阿尔布雷希特及其亲信的卓有成效然而又是狂热粗暴的行为，如残酷无情地没收地产等，表明公爵依赖贵族的恩惠而当上了国君，是考虑多么不周啊！

哈布斯堡家族在奥地利的新统治和邻居的关系，也同样是棘手的。1282年的赐封也包括克赖因在内，但是，这个领地实际上是格尔茨-蒂罗尔的迈因哈德第二手中的抵押品。鲁道夫国王还为迈因哈德第三保留了克恩滕公爵领地。甚至迈因哈德在1286年放弃进一步的要求而授予克恩滕公爵领地的时候，对于解决克赖因问题，人们仍然沿用那个时候的办法。克赖因由迈因哈德治理，但在原则上仍保持哈布斯堡家族的采邑封号。

同巴伐利亚的边界冲突被阿尔布雷希特迅速解决了。公爵利用有产市民和较贫困的市民阶层之间的对立，以及维也纳市民和反叛贵族的相勾结，在贵族的反抗被摧毁之后，剥夺这个城市的帝国直辖权。维也纳的进一步发展应该在哈布斯堡王朝的范围内进

行，然而，有很多证据说明，中世纪晚期的发展还存在着独立的政治活动。阿尔布雷希特公爵在与萨尔茨堡大主教的激烈斗争中也取得了胜利，这次斗争首先是围绕着对恩斯河谷地的产业和权益进行的；1290 年由于鲁道夫国王从中斡旋，签订了一项对公爵有利的条约。在匈牙利边界上，逆叛的匈牙利贵族，尤其是居辛家族，除了违抗自己的国王外，也经常入侵和骚扰奥地利，公爵对之予以严厉的抗击；有一段时期，他占据了从莱塔河彼岸到诺伊齐德尔湖一带的无数城堡和城镇，以及再往南的京斯城。他父亲在拉迪斯劳斯第四死后，把斯特凡王冠许诺给他——为了维护被匈牙利所拒绝的德意志帝国的主权——这时似乎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前途。但是，1291 年 7 月 15 日，鲁道夫·冯·哈布斯堡去世。阿尔布雷希特取得他在奥地利的地位，应归功于鲁道夫。阿尔布雷希特可能成为最有资格继承德意志王冠的人，可是，诸侯懂得害怕他，担心选举他可能会被看作承认哈布斯堡家族有权继承王位，因而威胁着诸侯的选举权，或者使之成为徒具形式的过场。鲁道夫的两个儿子死得比他们的父亲还早，他们比刚毅的阿尔布雷希特更能得到人们的好感。

阿尔布雷希特的和哈布斯堡家族的对手当时的计划都很庞大。鲁道夫的逝世似乎提供了彻底改变他的事业的可能性。在教皇尼古拉四世的谅解下，结成了一个广泛的同盟，参加的有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国王，下巴伐利亚公爵，萨伏伊伯爵，萨尔茨堡、阿奎莱阿和康斯坦茨的教会诸侯，伦巴底各城市和瑞士联邦的成员。在他们领地里为数众多的不满分子合作下，奥地利的阿尔布雷希特和格尔茨-蒂罗尔的迈因哈德第二的公爵衔头被剥夺。哈布斯堡的最危险的敌人在东方。匈牙利人既不服从鲁道夫国王的裁决，也不服从教皇的决定，而是选举了他们本民族的国王安德烈亚 119

斯第三。安德烈亚斯在军事上优于他的一切对手，他依仗和新任萨尔茨堡大主教的康拉德·冯·范斯托夫的联盟，进军奥地利，大肆蹂躏。由于迅速签订和约，放弃确实无法实现的匈牙利权益，阿尔布雷希特才化险为夷。波希米亚国王文策尔第二在其夫人、阿尔布雷希特的妹妹古塔的影响下，退出了同盟。奥地利起义者的城堡被摧毁，施蒂里亚的起义由于取道塞默林进行冬季讨伐而迅速被镇压下去。阿尔布雷希特为了迎合萨尔斯堡大主教，在领土和管辖区问题上作了广泛的让步。同样地，迈因哈德第二在此期间也有魄力地镇压了一次克恩滕起义。于是，他们共同克服了一次致命的危险。

然而，阿尔布雷希特未能争取到选帝侯。1292 年，阿道夫·冯·拿骚被选为国王；这一次人们真的挑选了一个小伯爵。新国王面临着命运攸关的问题是，要么创建自己的王朝，要么成为一个徒具虚名的统治者。在争夺迈森和图林根的领地统治权时，阿道夫与选帝侯发生冲突，他对他的盟友背信弃义，最后被选帝侯宣布剥夺他的王位，他们认为他们不仅有权选举国王，而且有权罢免国王。六位选帝侯选举阿尔布雷希特公爵为国王，同他分庭抗礼。阿尔布雷希特曾在 1295 平息了奥地利各邦再次爆发的愤懑，只有他拥有获得成功所必要的手段。他接受挑战，并且在莱茵黑森的格尔海姆附近的一次骑兵战斗中取得决定性胜利，那位拿骚人阵亡。阿尔布雷希特抛弃了那个法律地位还有疑问的王位，并被一致重新选为国王。

选帝侯不喜欢有一位强有力的统治者，这个统治者不久就显示出他不仅仅是他们的工具。对立日趋尖锐，但是阿尔布雷希特事前就有所准备；他首先成功地在帝国问题上和勃兰登堡合作，尤其是和波希米亚合作，把波希米亚的扩张引向东方，并争取同法国

的非利浦第四建立一个家族同盟。稍后(1300年)，阿尔布雷希特 120
的儿子和布朗什·冯·瓦卢瓦结婚；婚约按照长子继承权的原则解决了未来孩子们的继承权问题，并把这一原则也带到奥地利的王位继承法上来；但是，由于这一婚姻未出子嗣，这在起初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当莱茵区的选帝侯起来反抗阿尔布雷希特国王时，他们打错了算盘。在迅猛而残酷的征讨中，阿尔布雷希特挫败了他们的反抗。1298年，他的儿子们得到掌管奥地利和施蒂里亚的赐封的"全权"，现在，他着手增强哈布斯堡王朝的权力。这个权力应该成为德意志王权的基础，阿尔布雷希特显然在按照法兰西王权的楷模改组德意志的王权。阿尔布雷希特由于始终一贯地扩大行政机构，从而为执行自己的政策创造了必要的手段。富有的维也纳市民能够用他们的财富为自己的行为作保证，他们担任书记官的职务，财政管理就隶属这个官职。一位内府总管控制国君府里的需求，家族庄园的管理事宜则隶属于庄园总管，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庄园总管上升为执掌邦行政事务的重要官员。由于无情地索回被夺去的土地，公爵的领地也重新得到巩固，而且通过收买利乔和海登赖希施太因两个伯爵领地（1297年）而得以扩大。哈布斯堡家族在奥地利各领地和老哈布斯堡统治区的地产权利和收入都记载在厚厚的土地清册里，此外，还编有特权收益目录。国君档案先是存放在克洛斯特新堡，继而存放在里利恩菲尔德，后来被移到维也纳，归入公爵事务署。阿尔布雷希特不久就改组了那个协助他执政的领主咨议会，对政策有实际影响的仅为多数由非奥地利人组成的一群"亲信"。

象对待贵族一样，阿尔布雷希特在有关领地的教会事务方面也采取了坚定的态度。他不承认教士的免税权，而且还限制了教

会的裁判权。托钵僧团的宣传曾大大地帮助了他的父亲，现在公爵得到了这种宣传的支持，也反对争夺“死手”① 中的产业。公爵鲁道夫第三在 1298 年以后颁布了相应的法令，当然，这些法令几乎没有得到充分的遵守。

阿尔布雷希特把多瑙河各领地的统治托付给他的儿子们之后，企图通过攫取维丁家族的领地图林根和迈森，来扩大他的王朝的权力，他行事的依据是，这些领土从前曾割让给拿骚的阿道夫国王。当然，他在这里遇到了强烈的反抗。不过，1306 年，当最后一位121 普热美斯利登，即国王文策尔第三被弑身死时，阿尔布雷希特就侵入波希米亚，成功地使他的儿子鲁道夫当选为国王。鲁道夫不幸在一年后就逝世，另外一派推选格尔茨-蒂罗尔的迈因哈德第二的儿子、克恩滕的海因里希公爵。阿尔布雷希特前往老哈布斯堡家族所属的前奥地利地区，为一次大规模的冒险行动筹措金钱和军队。1308 年 5 月 1 日，他在渡阿勒河时，被他的侄子“弑亲者”约翰(“Parricida”)及其同谋者所弑；由于供养他母亲阿格妮斯的遗产被扣，以及 1283 年莱茵费尔登条约规定的赔偿要求被压抑，促使约翰转而采取行动。心怀不满的施瓦本的男爵们因自己的地位受到阿尔布雷希特的威胁，而支持了这一阴谋。毫无疑问，阿尔布雷希特完全有意阻止约翰建立一个新的哈布斯堡支系；劳芬堡支系的分裂(1232 年) 使家族遭到明显的削弱，大概这就是促使国王采取这种态度的原因。

正当帝国权力在扩大了的家族权力的广阔基础上似乎马上就要获得巩固的时候，阿尔布雷希特的被弑似乎妨碍了以哈布斯堡一奥地利方案来解决德意志国王的问题。因此，人们把 1308 年

① 即死后无人继承遗产。教会的产业也没有固定继承人，属于“死手” (Tote Hand) 中的产业，又可译为“永远管业”。——译者

5月1日看作不仅是德国历史上而且也是奥地利历史上的一个“黑暗的日子”。在奥地利本身，阿尔布雷希特的事业似乎蒙受了严重的损害，在他死后，反对哈布斯堡统治的骚动之火又再次燃烧起来。

阿尔布雷希特国王逝世后，两个大儿子共同执政，为他们起的名字仍然是传统的巴奔堡家族的名字弗里德里希和利奥波德。利奥波德掌管前奥地利，弗里德里希掌管奥地利。他们根本说不上参加竞选德意志国王，选帝侯们选举卢森堡的海因里希第七当国王，后者犹豫了一段时间，才册封哈布斯堡家族所属各邦和它的领地；但是，当他的家族可望夺取波希米亚时，他就和他们结成同盟。国王政策的这一转变就有可能严厉地惩办刺杀阿尔布雷希特的凶手，以及镇压一次奥地利贵族和维也纳有产市民的反叛。手工业者的态度有助于弗里德里希公爵镇压贵族。不久以前，迈因哈德第二的儿子，克恩滕的海因里希公爵被波希米亚各等级议员推选为国王并在那里定居下来，当哈布斯堡家族支持国王海因里希征服波希米亚时，他们也就卷入了与这位克恩滕人和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斗争。在媾和时，他们从克恩滕公爵那里得到桑河谷地；于是，施蒂里亚就向南扩展了。然而，对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监护权争端的干涉进行得很不幸，和匈牙利结盟的哈布斯堡人在加梅尔斯 122 多夫被上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打败。

由于这次失败而引起的威望下降，因以下情况而越发令人感到不快。国王海因里希第七逝世后，卢森堡一方在自己的行列里缺乏适当的人选，转而支持维特尔斯巴赫竞争王冠，而对哈布斯堡家族友好的诸侯们却赞成两位哈布斯堡兄弟中的老大、即美男子弗里德里希。在筹备选举的过程中，弗里德里希和阿拉贡的公主伊莎贝拉结婚；从阿拉贡王室档案馆异常丰富的档案材料中，我们可

以很清楚地了解到缔结婚约前的谈判情况。在奥地利各等级议员的保证下所达成的协议确保这对夫妇的后代能对哈布斯堡所属各邦实行独裁统治——然而，这一对国君伉俪却没有生命力顽强的儿子。

选帝侯们未能协和一致地在两个候选人中选出一位罗马—德意志国王来；于是进行了重选，在选举时，有效的票多半赞成上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选举弗里德里希的有哈布斯堡家族从前的对手克恩滕的海因里希公爵，他仍然掌握着波希米亚的选帝票，虽然他早就被路德维希的选举人卢森堡的约翰驱逐出境。然而，弗里德里希却拥有真正的王冠、王笏，并且有着科隆大主教这样一个合法的加冕者。当时尚未确立多数选举法，对一些选举人的资格又有争论——因此，必须用武力解决。

那时，哈布斯堡家族同一个新兴的、他们再也无法制服的势力发生了争执，实际证明他们卷了进去对他们是极为不利的。在老哈布斯堡的家产中，有着"林地"(Waldstätte)施维茨，乌里和下瓦尔登；自从为了便于德国西南部和意大利之间的交通而开辟圣哥大山口以来，这些自由拓荒农民的垦殖区享受着日益舒适的生活，因而他们的政治自觉性也提高了。自皇帝弗里德里希第二即位以来，乌里直属帝国管辖。在施维茨，尤其在下瓦尔登，哈布斯堡家族理所当然地实施统治权和管辖权。"林地"互相合作，达成了一些协议，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抗议"外来法官"的1291年协议；拿骚的阿道夫和海因里希第七这两位同哈布斯堡家族有矛盾的国王，忽视了哈布斯堡家族的权益，他们宽宏大量地批准"林地"均归帝国直辖。在巴伐利亚人路德维希和哈布斯堡家族之间的冲突中，"林地"当然站在路德维希一边。当他们犯了侵犯邻近的爱因西德

123 尔恩寺院之罪，并想开垦该寺院的土地时，弗里德里希国王宣布他

们不受王国保护。他的兄弟利奥波德曾经讨伐施维茨，但在莫加登山旁一处不利于他的骑兵用武之地遭受攻击，失败惨重(1315年)；于是，“林地”保持了自己的独立；布鲁能的“永久同盟”确保了他们的继续合作，路德维希国王重申给以他们自由和帝国直辖权。中世纪行将结束时才有记载的关于威廉·退尔和那个射苹果的传说，虚构多于真实——关于攻破城堡的描写也许不在此例；虽然哈布斯堡家族当时在瑞士德语区已经扎了根，但是人们还是把他们看作是外来异族。

尽管在攻打瑞士人时遭受挫折，哈布斯堡家族在王座之争中，起初还是处于优势的；但是，弗里德里希率领一支奥地利骑兵和匈牙利援军进入巴伐利亚，在他的军队和他兄弟利奥波德的施瓦本军队还没有会合之前，就在因河畔的米尔多夫被路德维希打败并俘虏；路德维希叫人把他押送到上普法尔茨的特劳斯尼茨城堡(1322年)。利奥波德本来就比他哥哥更为刚毅，他现在是哈布斯堡党的首领；他和法兰西国王取得联系，而教皇约翰二十二世则在哈布斯堡家族和迄今一直同路德维希结盟的卢森堡人之间从中斡旋。弗里德里希获释，同时——如果我们相信被普遍认为消息灵通的维克特林修道院院长约翰的叙述的话——他发誓：倘若未能争取他的兄弟们接受和平条件，他将重新回去就俘。弗里德里希也遵守这一诺言，虽然教皇解除了他的誓约。无论如何，弗里德里希确曾返回慕尼黑，缔结了一项条约，依照条约应该由两位国王共同执政(1325年)。然而，选帝侯们对此表示反对。路德维希曾一度准备放弃王位，但是，弗里德里希也不能得到教皇约翰二十二世的承认，后者更乐于看到法兰西国王坐在德意志的王座上。1326年利奥波德逝世，人们可以把他看作促使弗里德里希提出要求的真正推动力。在帝国里实际进行统治的是路德维希，弗里德

里希徒然拥有国王的虚名，政治上不再起作用①。他的夫人伊莎124贝拉死后，弗里德里希通常隐居在维也纳森林的古登施泰因宫堡，杜门不出，1330年在那儿逝世。他被安葬在由他捐资修建的毛厄巴赫的查尔特勒会修道院。

美男子弗里德里希可以算是第一个真正把奥地利当作自己祖国的哈布斯堡人。他在奥地利开始执政时还必须克服强烈的反抗。在他的时代，也出现一种独特的名称，表示奥地利是哈布斯堡家族的主要领地。这个名称就是“对奥地利的统治”(dominium Austriae)。这个概念主要出现在文件里，偶尔也在叙事性史料中提及。这个名称起初可以指哈布斯堡家族，这个家族后来也和“奥地利家族”的概念联系在一起。此外，它还可以指他们所统治的地区的国君权力，他们的统治区不仅包括东阿尔卑斯地区，而且也包括老哈布斯堡的前沿地带——前奥地利——正是在这里经常发现这个名称，最后，它还可用来作表示领土的总概念(比较罕见)，而不必罗列哈布斯堡家族的各个邦和所有领地。

弗里德里希死后，他的两个兄弟阿尔布雷希特第二和奥托同巴伐利亚人路德维希签订了一个协定，承认后者为德意志国王。但是，哈布斯堡家族长期游离于德意志王位的竞争者之外。他们满足于较小的目标。通过同路德维希签订的一项秘密协定，哈布斯堡家族企图在迈因哈德-格尔茨王朝死绝时继承克恩滕和克赖因。实际上，五年之后就出现了他们所预见的局面。

① 从法律上讲，把美男子弗里德里希当作德意志诸王中的弗里德里希第三，仍然是符合实况的；在奥地利历史著作中也是长期这样做的。然而，晚近才普遍把下一位德意志的哈布斯堡家族的同名国王(1442年—1493年)马克西米利安的父亲算作弗里德里希第三。这位统治者当然是名叫弗里德里希的第三位皇帝。

格尔茨伯爵世家及其所属的邦和领地

在帝国过渡时期，正当奥托卡尔扩大他对巴奔堡各领地的统治时，其他诸侯也企图利用没有皇帝的这一大好时机。在东阿尔卑斯地区，除了波希米亚国王以外，没有谁能比格尔茨的迈因哈德第四伯爵在这方面做得更为成功，他的事业远比普热美斯利登的短暂的权力膨涨稳固得多，因为他已成功地加入重建起来的帝国权力。在世纪交替时期，这个家族的领地和封土从阿尔贝格一直延伸到喀斯特，它和哈布斯堡家族结盟后掌了权，又有一段时期和他们竞争，最后到了中世纪末时，才把一个个阵地放弃给哈布斯堡—奥地利。

格尔茨的伯爵们无疑源出阿里博血统，他们由克恩滕的卢恩高来到伊松佐河[1]；十二世纪初，他们是格尔茨的领主和阿奎莱亚的行政官，这是有案可稽的。这里处于弗里奥尔地区的东部边缘，125 弗里奥尔曾经是伦哥巴人和法兰克人抵御阿瓦人和斯拉夫人的边陲地区，在中世纪中期是阿奎莱亚的多数属于德意志血统的教长们的宗教和世俗统治中心。这些教会贵族作为皇帝的党羽，于1076年被赐予弗里奥尔边区，1077年被赐予克赖因和伊斯特里亚。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教长们和世俗贵族之间在弗里奥尔和毗邻地区发生了纷争，在伊斯特里亚还和一些城市发生了纷争，教长们在斗争中逐步丧失地盘。不仅如此，同特兰托和布里克森[2]主教区相比，教长辖区更受他的行政官的排挤和威胁，这些行政官由教会特权统治的保护者一变而为它的最危险的敌人。1149年，格尔茨的恩格尔贝特第二伯爵把教长囚禁起来，只是由于施太尔

① 即今南斯拉夫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内的索佐(Soča)河。——译者

② 即今意大利的布雷萨诺内。——译者

的奥塔卡尔家族和安德克斯家族的担保，才使这位教会贵族重获自由。十三世纪初，在沃尔夫格尔·冯·埃尔拉和贝特霍尔特·冯·安德克斯统治下，这个教长国再度强大起来，格尔茨的伯爵们则试图巩固他们在伊斯特里亚和克恩滕的阵地，因为对于弗里奥尔他们重又无法染指。这时，迈因哈德第三伯爵是在他岳父——蒂罗尔的阿尔贝特——的谅解下采取行动的。但是，1252 年对施潘海姆家族发动的进攻失利，当时“被选出的”萨尔茨堡大主教菲利普在格赖芬堡附近打败盟军并俘获了蒂罗尔的伯爵。利泽霍芬和约给格尔茨人带来严重损失，这种损失由于迈因哈德第三伯爵在他的蒂罗尔岳父逝世之后得到一部份蒂罗尔的遗产而得到补偿；他得到南蒂罗尔的一部份以及散处克恩滕和弗里奥尔的蒂罗尔产业，蒂罗尔的阿尔贝特的另一个女婿、巴伐利亚伯爵格布哈德·冯·希尔施贝格主要得到北蒂罗尔地区。在姨母伊丽沙白·冯·希尔施贝格死后(1263 年)，迈因哈德第三的刚强的同名儿子夺取了希尔施贝格的大部份遗产，因而也就是为格尔茨家族夺取了这些遗产。1267 年和 1271 年，迈因哈德第四和他弟弟阿尔贝特瓜分格尔茨的全部产业。阿尔贝特得到哈斯拉赫隘口以东非常分散的领地、普斯特尔河谷、在克恩滕和弗里奥尔的地产、格尔茨老家的城堡和伯爵领地，以及伊斯特里亚地区；迈因哈德则保留了十分完整的蒂罗尔伯爵领地。格尔茨两个支系再也没有合在一起；迈因哈德和阿尔贝特虽然不无冲突，政治上多半却合作得很好，然而，后来“迈因哈德家族”和“阿尔贝特家族”之间的鸿沟却越来越宽。

迈因哈德第四——叫这个名字的第二位蒂罗尔伯爵——遵从他自己的家族的传统，参加了施陶费尔阵营。他同康拉德第四的遗孀巴伐利亚的伊丽莎白结婚，因此，他成了康拉丁的养父，他开放了阿尔卑斯山的道路，支持了康拉丁对意大利南部的远征，而他的

126

兄弟阿尔贝特却疯狂地突然袭击和谋杀弗里奥尔的居尔芬家族的人。两人都多次被革出教门，革出教门在当时已经是教会的一种不太灵的武器，蒂罗尔的迈因哈德就是在被革出教门后去世的。在这期间，他不是完全不信宗教，在康拉丁的悲惨结局(1268年)和伊丽莎白逝世(1273年)之后，他在上因河谷地兴建西斯迪显教团施塔姆斯修道院，作为纪念两者的修道院和作为蒂罗尔伯爵们的墓地。他命令教士们在祈祷中缅怀他，而且迈因哈德对寺院往往馈赠不少；然而，特兰托和布里克森(后来还有阿奎莱亚)的高级修道院必然地成为他那目标明确和思考冷静的权力策略的对象和牺牲品。他用他们的领土的大部份、那些被迫去当官吏的贵族的领地以及他自己家族的产业，组成具有历史意义的蒂罗尔邦，意味深长地把它和老蒂罗尔伯爵世家的事业联系在一起，后来这个邦经过好几百年一直牢固地存在下去。因此，从圣者利奥波德到捐资者鲁道夫，在诸侯国的缔造者和完成者的行列里，他也许是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人物。由于中产阶级的和骑士等级的公职人员的帮助，蒂罗尔的行政管理得条理井然，堪称模范，而且做到使各种极为不同的统治权适应于普及的国君权力范围。重要的是，1282 年库尔主教的一份判例汇编指出：蒂罗尔伯爵(及其领土)从来不属于巴伐利亚或施瓦本公爵辖区。这虽然不正确，但却显示出一个独立的蒂罗尔邦开始从毗邻地区分离开来；人们不再承认 1281 年巴伐利亚邦的禁止械斗令具有约束力。迈因哈德令人把一部蒂罗尔邦法记载下来，这个法现在只有少部份残篇保留了下来。这样，不久，蒂罗尔伯爵领地就被看成一个整体和帝国的一个采邑，它起初是由特兰托和布里克森两采邑组成的；大约从 1300 年起，迈因哈德的继承人明确地自称为邦君，并收获了他的政绩果实。

迈因哈德第二和哈布斯堡的鲁道夫一贯互相合作；同奥托卡

尔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纷争证明他是一位战斗力很强的同盟者。当然，在马希费尔德战役中，他的军队迟到，尽管如此，这位蒂罗尔邦君还是受到了赏赐。可能一开始就考虑把克恩滕给他。1282年鲁道夫的儿子们得到奥地利的时候，已经把克恩滕赐封给他，但一直没有兑现，因为当时迈因哈德被放逐，而且卷入同特兰托和阿奎莱亚的激烈冲突，同时在克赖因问题上也存在着意见分歧。1286年，127 终于赐封迈因哈德为克恩滕公爵，这样一来，他就上升到帝国诸侯一级。克赖因作为向鲁道夫国王提供贷款的抵押品，由他管理，但是，哈布斯堡家族保留对这块领地提出要求的权利。几年之后，迈因哈德第二和奥地利的阿尔布雷希特第一共同抵御对东南部新秩序的总攻击。在反对哈布斯堡人和格尔茨人联盟的范围内，也爆发了霍伊恩堡伯爵领导下的克恩滕贵族起义；迈因哈德的儿子路德维希落入萨尔茨堡所支持的起义者手中，格尔茨的阿尔贝特和大主教辖区媾和。但是，1293年3月，迈因哈德的追随者们在瓦勒斯贝格战役中彻底打败敌人，邦君也战胜他在克恩滕的对手。1295年，作为当时最富有的诸侯，迈因哈德在他的成就到达高峰时，在克恩滕的土地上逝世，死在德劳河畔的格赖芬堡。他平时多半呆在蒂罗尔，新争得的公爵领地仅仅被看成次要的邦。他对货币和经济问题的多谋善断对他一直是大有裨益的。他很善于提高他的各个领地尤其是蒂罗尔的收入，和意大利银行的往来关系使他得到现代财政政策和信贷业的知识，此外，他还创建了蒂罗尔的统一关税制度，并从铸造货币中取得丰厚的利润。在地产的管理方面，迈因哈德也很重视收益。东阿尔卑斯各邦所特有的地主裁判权几乎被他完全废除，因此，蒂罗尔的农民也很怀念他。

迈因哈德第二的儿子们——奥托（卒于1295年），路德维希（1295年—1305年）和海因里希（1295年—1335年）——依照父亲

的愿望,“共同”接管了父亲对各领地的统治权,没有实行分而治之。阿道夫国王拒绝给他们赐封,阿尔布雷希特一胜利就毫不迟延地赐封他们(1299 年),因为他们站在他一边。迈因哈德家族也沿用哈布斯堡王朝的政策,当克恩滕的海因里希在最后一位普热美斯利登死后觊觎波希米亚王冠时,才出现转变。哈布斯堡的军队开进克恩滕,后来阿尔布雷希特国王被弑后,海因里希的情况似乎又有所好转。然而海因里希对付不了自傲的波希米亚贵族,在他登基不久就把波希米亚输给卢森堡家族,因为他在初遭挫折之后就逃离了这个国家;剩下的只是空洞的权利要求和沉重的负债。1314 年复选时,海因里希支持美男子弗里德里希,后来,他就推行一种摇摆政策。哈布斯堡家族把征服得来的北意大利的地方,如特雷维佐和帕多瓦等地划归他管辖,然而,由于海因里希横征暴敛,这些城市民情沮丧,不久就转向维罗纳的斯卡利格尔家族。此后,克恩滕的王朝政治史就被笼罩在帝国的主要家族——维特尔斯巴赫家族,卢森堡家族和哈布斯堡家族——纷争的阴影里。当波希米亚国王约翰依靠居尔芬党企图夺取北意大利统治权的时候,哈布斯堡家族和维尔特斯巴赫家族都因为他们南德意志的领土被包围而同样感到受威胁。哈布斯堡家族和路德维希皇帝签订一项条约,瓜分指日可待的迈因哈德家族的遗产(1330 年),皇帝保留了北蒂罗尔。此外,哈布斯堡家族通过同班贝格、萨尔茨堡和奥尔滕堡伯爵们谈判,为攫取克恩滕作了准备。 128

迈因哈德家族在克恩滕和蒂罗尔兴旺发达,相形之下,在老格尔茨占领地的阿尔贝特支系的命运就显得非常不济。这里是贫瘠的石灰岩地带,也不象蒂罗尔那样具备有利的交通条件,构成统治的经济基础狭窄多了。伯爵阿尔贝特第二试图把他的势力范围向弗里奥尔扩张,但是,经过长期艰难的斗争,才仅仅夺得科尔蒙斯;

而更为重要的的里雅斯特再度失落。在伊斯特里亚海岸地区，威尼斯凌驾于格尔茨人之上。最后，分而治之的原则对阿尔贝特支系的权力地位起了特别不利的影响。1303年，在伯爵阿尔贝特第二的儿子中，较大的海因里希第二得到在伊斯特里亚、喀斯特和克赖因的属地；阿尔贝特第三得到普斯特尔河谷，利恩茨和上克恩滕的德劳河谷地。格尔茨的海因里希本来该是一位扭转命运的人物，他企图使自己成为弗里奥尔的主人，并非完全失败，先后占领了齐维达勒、特雷维佐，最后甚至攻占了帕多瓦，他的突然早逝(1323年)立即引起弗里奥尔阵地的瓦解。但是，阿尔贝特第三由于让他的儿子们把统治权分成三份而葬送了他那个支系的一切前途。于是，从普斯特尔河谷到伊斯特里亚一共有四个阿尔贝特—格尔茨伯爵领地，其中没有一个可以成为值得一提的政治因素或经济因素。在迈因哈德家族男系灭绝的时候，人们再也不关心阿尔贝特几个支系的成员及其继承权要求。

哈布斯堡统治在东阿尔卑斯各邦的扩张和巩固

因为在争夺克恩滕和克赖因的斗争中，各种要求、法律观点和势力集团互相对立，所以，关键在于谁行动得快。哈布斯堡家族做到了这一点。当克恩滕的海因里希1335年逝世时，他的女儿玛加丽特只能保住蒂罗尔；哈布斯堡家族由皇帝路德维希赐予克恩滕，并且得到迄今一直作抵押的克赖因，克赖因现在毫无反抗地屈服了。而在邦总督康拉德·冯·奥芬施泰因最初表示了犹豫之后，奥托公爵把他的军队开进克恩滕，并在君主石和公爵石椅旁举行了仪式[①]。相反，要征服同样是皇帝许给的南蒂罗尔证明是不可能的，因玛加丽特在那儿得到许多人的同情，且有卢森堡的兵力可

129

① 关于这个仪式，请参阅本书106页。——译者

资利用。没有得到皇帝有力支持的奥地利人和波希米亚国王约翰之间的战斗在多瑙河以北地区造成很多伤亡，然而不能使形势发生决定性的转变。几年之后，战线彻底改变；蒂罗尔的状况对于这一变化是举足轻重的。

蒂罗尔的继承人玛加丽特·“毛尔塔施”①——她的浑名是当代人起的，实际上可能和她的容貌丑陋有关，也有人（不正确地）认为是因毛尔塔施宫堡而得出这个绰号，她和卢森堡人约翰·海因里希的婚姻是很不幸的，蒂罗尔人对他们的统治者——一个粗暴的主子同样不满；约翰·海因里希被驱逐出境，玛加丽特未经离婚或教会特许，就和皇帝的同名儿子路德维希结婚。于是，蒂罗尔邦似乎就落入维特尔斯巴赫家族之手，因而也就落入从未放弃它的权利的巴伐利亚之手。在一份皇帝批给新国君的文书里，蒂罗尔邦的权利，尤其在立法和税收批准方面的权利得到书面确认（1342年）。卢森堡人不是痛快地就让人排挤掉的；但是，在德意志伪王卡尔（第四）统率下的一支从意大利出发的部队终于被迫撤退，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权力暂时保住了。

自从美男子弗里德里希逝世以来，他的两个弟弟阿尔布雷希特（1330年—1358年）和奥托（卒于1339年）在哈布斯堡家族各邦共同执政，诚然，他们并不总是和谐一致的；弗里德里希的宫廷成了一个文化创作中心，然而由于他推行一种不稳定的和固执的政策，勿宁说他影响了他的家族的权力地位；在他死后，阿尔布雷希特深谋远虑而又小心谨慎，时刻想着维持和平，这位统治者在极为动荡和不愉快的情况下经受了考验。身体的缺陷——公爵瘫痪，可能是由于投毒谋害未遂所致——使他对军事行动更为厌恶。

① 德文 Maultasch 的译音，同 Maultasche 同音，后者意思是大嘴巴的人。——译者

而更为重要的的里雅斯特再度失落。在伊斯特里亚海岸地区，威尼斯凌驾于格尔茨人之上。最后，分而治之的原则对阿尔贝特支系的权力地位起了特别不利的影响。1303 年，在伯爵阿尔贝特第二的儿子中，较大的海因里希第二得到在伊斯特里亚、喀斯特和克赖因的属地；阿尔贝特第三得到普斯特尔河谷，利恩茨和上克恩滕的德劳河谷地。格尔茨的海因里希本来该是一位扭转命运的人物，他企图使自己成为弗里奥尔的主人，并非完全失败，先后占领了齐维达勒、特雷维佐，最后甚至攻占了帕多瓦，他的突然早逝(1323 年)立即引起弗里奥尔阵地的瓦解。但是，阿尔贝特第三由于让他的儿子们把统治权分成三份而葬送了他那个支系的一切前途。于是，从普斯特尔河谷到伊斯特里亚一共有四个阿尔贝特—格尔茨伯爵领地，其中没有一个可以成为值得一提的政治因素或经济因素。在迈因哈德家族男系灭绝的时候，人们再也不关心阿尔贝特几个支系的成员及其继承权要求。

哈布斯堡统治在东阿尔卑斯各邦的扩张和巩固

因为在争夺克恩滕和克赖因的斗争中，各种要求、法律观点和势力集团互相对立，所以，关键在于谁行动得快。哈布斯堡家族做到了这一点。当克恩滕的海因里希 1335 年逝世时，他的女儿玛加丽特只能保住蒂罗尔；哈布斯堡家族由皇帝路德维希赐予克恩滕，并且得到迄今一直作抵押的克赖因，克赖因现在毫无反抗地屈服了。而在邦总督康拉德·冯·奥芬施泰因最初表示了犹豫之后，奥托公爵把他的军队开进克恩滕，并在君主石和公爵石椅旁举行了仪式[1]。相反，要征服同样是皇帝许给的南蒂罗尔证明是不可能的，因玛加丽特在那儿得到许多人的同情，且有卢森堡的兵力可

129

① 关于这个仪式，请参阅本书 106 页。——译者

夺统治权的决战暂时推迟了。在征讨苏黎世之战结束不久，阿尔布雷希特第二发布一项家规（1355 年），规定他的儿子们不可以分掉他们的领地，而应该共同管理；贵族领主们发誓拥护这一决定，但后来的实际发展同这一决定全然不符。

阿尔布雷希特第二和乌尔利希·冯·普菲尔特伯爵的有继承权的女儿约翰娜结婚，因而能够把这块阿尔萨斯伯爵领地增加到哈布斯堡家族位于前奥地利的地产中去。他死时（1358 年）留下四个儿子，起初只有十九岁的长子鲁道夫一人能实际执政。

年轻的鲁道夫第四公爵很快就表明，他决心增强他的家族和他所统治的各邦的势力，在他的行动的背后，我们当然必须设想存在着有些佚名的顾问的影响，如他的宰相约翰·冯·普拉茨海姆的影响。鲁道夫就职亲政之前两年，皇帝卡尔第四颁发叫做黄金诏书的帝国法令，来澄清国王选举问题上的暧昧不明之处。这项法令不仅规定了选举程序，而且还以难得的优先权来提高选帝侯们的地位；他们的领地被宣布为不可分割的。卡尔第四由于和选帝侯们有联系，因而增强了自己对付与卢森堡家族相争的奥地利和巴伐利亚王朝的地位，这两个王朝均被排斥于选帝侯团之外，就巴伐利亚的维特尔斯巴赫家族来说，这大大违背了到那时为止的惯例，而就哈布斯堡家族来说，至少是同力量对比的情况不符。鲁道夫第四采取了反击行动，他使用的手法在他那个时代并非罕见：他让他的宰相府炮制假证件；伪造的文件共有五个，它们被说成是海因里希第四、弗里德里希第一、弗里德里希第二和他的儿子海因里希（第七）以及哈布斯堡的鲁道夫的原件。而且在这些伪造的证件中，海因里希第四名下的证件（Henricianum）还附有所谓尤利乌斯·凯撒和尼禄给奥地利的特权书的逐字引用的原文。这个引文的内容立即招致反驳，当时有影响的人文主义权威弗朗西斯科·佩

131

在约翰·海因里希被赶出蒂罗尔而激烈地爆发起来的维特尔斯巴赫家族和卢森堡家族的争端中,他始终严守中立。当然,由于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相继发生一系列灾害,公爵在自己所属的各邦里130 已经应接不暇,忙得不可开交。引起歉收的蝗灾(1338 年),特大的水灾(1340 年和 1342 年)和地震(1348 年),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一次空前严重的瘟疫(1348 年—1349 年)造成奥地利各邦和几乎整个欧洲居民的大量死亡。面对着毁灭性的瘟疫,居民束手无策,他们的激动情绪表现在自鞭教徒的狂热忏悔和对犹太人的野蛮迫害上;人们不了解细菌是传染病的先决条件,以为在犹太人中找到了罪魁祸首,由于宗教和经济上的原因,他们本来对犹太人就不信任。迫害使很多人惨遭牺牲,然而被公爵制止了。

尽管时世维艰,阿尔布雷希特还是采取了适宜的措施,提高了邦君的收入。他给克恩滕和克赖因颁布一个新的邦法规,合法的决斗被废除了。阿尔布雷希特三番五次地周游他所属的各个邦,寻求并做到了与居民进行个人接触,这对他实施邦君权力是十分重要的;他的执政活动有益于社会,这一特点是至为明显的。阿尔布雷希特从皇帝卡尔第四那里获得一项"征召豁免特权"(大约 1348 年—1354 年,1361 年重申),这意味着邦君的权力的大大巩固;这样一来,他的臣民就可以避免被传讯到外国的,包括国王的法院去;除非他们的诉讼在奥地利被拒绝受理。

然而,公爵终于不得不以武力来解决一次冲突;瑞士联邦把它们的同盟扩大到奥地利统治下的城市卢塞恩,后来又扩大到帝国城市苏黎世(1352 年);各种争端用仲裁的办法都无法解决。阿尔布雷希特第二两次兵临苏黎世城下,但无法攻克,不过,总还做到使格拉鲁斯地区和楚格城重申对奥地利统治的承认,它们本来想乘机摆脱奥地利的统治的。于是,上莱茵河和博登湖以南地区争

斯堡皇帝弗里德里希第三重申1442年和1453年的特权，第二次得到选帝侯们的同意，因此，这一特权成为帝国法律。但是，对奥地利的历史和国家法的发展来说，大特权书并不完全具有原来赋予它的那种意义，后来的哈布斯堡人极少利用它。此外，在中世纪行将结束时，一切诸侯，不管他们是否拥有广泛的特权，都拒绝帝国权力对他们领土进行干涉。

鲁道夫第四在他所属各邦的施政和管理方面，工作得很起劲。他比他的前任更多地推行一种积极的社会政策；他始终关心增强他的统治的经济基础。鲁道夫不承认贵族和教士们的传统的免税权。他放弃了每年的"货币回收"——即定期回收并更换通货，此举对人民不利而对货币铸造主却十分有利——作为抵偿，他征收饮料税，这项税收不久就成为邦君收入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有意义的是，他致力于消除强迫工匠加入工商业和手工业同业公会的陋规，以促进自由竞争；联合会甚至被禁止，然而，在他执政之后又东山再起。鲁道夫又重新考虑巴奔堡家族建立维也纳主教区的计划，但未能实现。他仅仅做到设立一个圣斯特凡教堂的特别教士团，并大力着手修造该教堂的哥特式长条形新建筑；他的别号"资助者"就是因采取了这些措施而得来的。维也纳城深得鲁道夫偏爱。他企图通过减轻税收来鼓励建筑事业，促进人口流向城市。通过创办大学(1365年)，鲁道夫也表示出他对维也纳城声望的关注，诚然，大学初期没有取得突破性的成就，专设一个大学区的计划未能实施，教皇没有批准该大学设立神学系。鲁道夫在建教堂和办大学方面，很明显地是在和皇帝本人竞赛：维也纳不应落后于 133 拥有法伊特大教堂和查理大学的布拉格。

1353年，鲁道夫和皇帝的女儿卡塔琳娜结婚，他和皇帝的关系时有冲突，偶有合作。有骄傲感的公爵是个难以对付的伙伴，无

特拉卡愤怒地谴责这件伪造古文物的事。在其余文件中，数所谓弗里德里希第一的特权书最为重要，它们能够比较久地经得起审核，在经过各种怀疑之后，到十九世纪时才为约翰·弗里德里希·伯默尔和威廉·瓦滕巴赫彻底揭穿。所谓巴巴罗萨特权书(Barbarossa-Privileg)是利用1156年的真实证件的原文，伪造成内容丰富得多的“特权证书”(Freiheitsbrief)——因此，同真正的、较短的Privilegium minus①比较，取名为：Privilegium maius②。伪造的鲁道夫文件的内容给奥地利以极大的特权，如在接受采邑、统治的象征(尖角王冠和王笏)等方面，以及排除向皇帝上诉而在裁判方面获得的特权，它按长子继承权的精神规定继承的次序，(和真正的特权书一样)也规定必要时女性可以继承王位；奥地利公国，包括合并地区，应该象选帝侯的领地一样，均为不可分割；对帝国军队的义务仅限于，在对匈牙利战争时派十二人象征性地参战一个月。参加庆典时，奥地利公爵应视为具有国君地位的大公爵，他的位置在皇帝的右侧，紧挨着选帝侯。这里多半偶尔才提到的大公爵称号，鲁道夫曾在他那美观的印玺上镌刻着。这个称号在十五世纪才重新采用，后来往往从克恩滕公爵的衔头中引出来，克恩滕的邦君行使帝国大猎官的职权，十六世纪起，大公爵衔头被看作是哈布斯堡家族的特征。

132

赝造的宗旨在于减少帝国诸侯所承担的义务，尽管鲁道夫也骄傲地称奥地利为“帝国的心脏和盾牌”，然而，对他来说，关键是提高对奥地利统治的权力和威望。鲁道夫公爵把已确认的证件副本送呈皇帝卡尔第四，皇帝以他固有的冷静和客观受理此事；他倾向于批准其中几点，其余的予以拒绝；他的记载还保存至今。哈布

① Privilegium minus，拉丁文，意为小特权书。——译者
② Privilegium maius，拉丁文，意为大特权书。——译者

阻挠行动。此外,有一个日期注明为 1359 年 9 月 2 日的证书,证书中提到,公爵夫人玛加丽特在丈夫和儿子死后没有继承人的情况下,可以把蒂罗尔的统治权交给哈布斯堡家族;然而不能消除这样的怀疑:即,这个文件是在 1363 年,即两者都死后才炮制出来,用以安抚蒂罗尔的贵族对把该邦交给奥地利家族统治而产生的疑 134 虑。无论如何,1363 年 1 月,迈因哈德死后,鲁道夫第四不畏旅途艰辛,隆冬腊月兼程赶赴蒂罗尔;他把贵族、城市以及布里克森和特兰托的主教们争取到自己一边;玛加丽特把该邦正式移交给哈布斯堡家族,然而仍以他们的名义继续掌管政务。1364 年 2 月,鲁道夫得到皇帝卡尔第四的赐封,后者宁愿看到卢森堡家族已经丧失了的蒂罗尔落在奥地利手里,而不愿看到它落入巴伐利亚手中。1363 年 10 月,玛加丽特完全放弃政务,前往下奥地利,诚然,她这样做不无鲁道夫第四方面的压力;1369 年,她在维也纳逝世。鲁道夫在邦内募集的军队的支持下,击退巴伐利亚对北蒂罗尔的进犯;他得意洋洋地给威尼斯的元首写信说,从德意志到意大利,条条大道无不处在他的统治之下。实际上,这次取得蒂罗尔的意义是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的,奥地利后来的意大利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仗持着在蒂罗尔的地位,而且,在施瓦本老家土地上的老哈布斯堡家族的地产和东南部的各公爵领地之间的领土联系几乎建立起来了。

当鲁道夫第四夺取蒂罗尔时,格尔茨的阿尔贝特第四和迈因哈德第七两兄弟都支持他,前者在伊斯特里亚内地(皮西诺郡或米特尔堡)和温迪施边区(Windische Mark)拥有格尔茨的地产,后者拥有格尔茨祖传城堡、普斯特尔河谷和克恩滕的分散产业,他们都没有提出权益要求。阿尔贝特在 1364 年和鲁道夫缔结一项遗产继承条约,它保证哈布斯堡家族继承阿尔贝特的地产。1374 年,即鲁道夫死后九年,遗产开始继承,这样一来,哈布斯堡家族赢得了

疑，他认为帝国的皇冠应属于他的家族。卡尔第四对全部承认鲁道夫在国家法方面进行伪造时提出的要求表示了犹豫，促使鲁道夫同这位卢森堡人的某些对手结成同盟。蒂尔瑙条约（1360 年）和布德魏斯[1]条约只带来暂时的和缓；在争夺蒂罗尔的斗争中，皇帝和公爵才达成谅解，共同对付维特尔斯巴赫家族。1364 年 2 月，鲁道夫和卡尔以各自王朝的名义签订相互继承条约，在这些条约里，考虑了未来奥地利、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因为鲁道夫和匈牙利国王路德维希之间已有继承协议——各邦的联合。

由于哈布斯堡有不少地产以前属于阿奎莱亚大教长辖区，所以，鲁道夫执政后不久，就被卷入同大教长路德维希·德拉·托雷的斗争之中，这时，同皇帝的冲突也严重地妨碍了鲁道夫。因为他在与大教长的纷争中获胜，要是他多少有点行动的自由，他本来可以赢得对弗里奥尔地区的统治。在为他的家族争夺蒂罗尔时，公爵的行动表现得多么坚决呵。

在驱逐约翰·海因里希和抵御卢森堡的对抗行动之后，蒂罗尔邦的历史依然是十分动荡不定的。“勃兰登堡人”路德维希更多地依仗可靠的巴伐利亚贵族，而不是本地人；蒂罗尔仍然要感激他曾制订过各种有用的法律，如调整地主和佃户之间关系的法律，此外，他还象迈因哈德第二那样，促进了商业和交通的发展。由于奥地利的阿尔布雷希特公爵的斡旋，终于撤销了对路德维希和他的夫人的逐出教门令，自从他们公然违反教规结婚以后，他们就被逐出教门。毫无疑问，奥地利的公爵曾试图为把蒂罗尔转入哈布斯堡家族手中而做准备。路德维希和玛加丽特只有一个体弱多病的儿子迈因哈德，这一情况实际上使取得领土的可能性变得有希望起来，当然，同时也必须预计到维特尔斯巴赫家族会采取坚决的

① 即今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杰约维策。——译者

希合伙，从哈布斯堡手中重新夺走蒂罗尔的努力。尽管在克恩滕有强大的奥芬施泰因家族暴动，两兄弟在布里克森主教约翰的合作下取得成功。因为哈布斯堡人也得到皇帝卡尔第四的支持，维特尔斯巴赫家族在舍尔丁和约(1369年)中放弃了蒂罗尔，他们除了得到大量赔款外，还得到几座城市，其中有舍尔丁和拉滕贝格。

在随后的年代，尽管一切财源枯竭，哈布斯堡家族仍然十分活跃。初次夺取的里雅斯特的尝试失败了，然而他们成功地再度在弗里奥尔地区立足；此外，他们还收买了阿德尔斯贝格领地，征服了杜伊诺(蒂拜因)领地；而且，格尔茨的阿尔布雷希特第四逝世后，鲁道夫第四准备把内伊斯特里亚和格尔茨在温迪施边区的领地合并于哈布斯堡家族的势力范围之中。他们已经到达亚得里亚海，克赖因公国得到了巩固。

在谋取蒂罗尔时，想把前奥地利和东南部在领土上连成一片的愿望起了作用，那时人们开始把老哈布斯堡的地产称之为"前奥地利"；哈布斯堡在福拉尔贝格邦站稳脚跟时，这种愿望也起了作用。哈布斯堡家族同这个邦的最重要的领主世家和它那两个长期相争的支系蒙福和韦登贝格的关系当然要悠久得多，韦登贝格的伯爵胡戈第一替哈布斯堡的鲁道夫当过上斯瓦本的侯爵，也许是他劝说国王对他的蒙福亲戚采取敌视政策的。十四世纪初，巴伐利亚人路德维希和哈布斯堡家族之间的斗争也向福拉尔贝格蔓延。韦登贝格家族和蒙福家族的势力由于一再分家而完全败落，小骑士几乎微不足道，相反，费尔德基尔希、布卢登茨和布雷根茨等城市的市民却得了势，然而不象那些直属帝国的城市有政治发展的可能性。十四世纪末，农民也崭露头角，在瓦尔泽教区和布雷根茨森林尤其如此。1361年，哈布斯堡家族从图姆本家族手里得到了莱茵河畔的诺伊堡领地时，他们就在这些地盘狭小的领地群

136

夸内罗湾的一段海岸。此后几百年，伊斯特里亚由奥地利和威尼斯共和国瓜分，后者同时取得对伊斯特里亚多数滨海城市的统治权。早在1361年，迈因哈德第七就答应，如果他死时没有儿子的话，就把他在格尔茨领地中的那一份土地的继承权交给奥地利公爵；公爵又准备让他的最小的弟弟利奥波德（第三）和迈因哈德的女儿卡塔琳娜联婚。但是，当阿奎莱亚的教长在1359年战败后重又开战，并且和帕多瓦的统治者弗兰茨·冯·卡拉拉结盟时，鲁道夫和迈因哈德发生冲突。鲁道夫第四也同样寻求帮助者，把米兰的巴尔瑙博·维斯康蒂公爵拉到自己一边，巴尔瑙博的未婚女儿维丽迪斯原来是许给那位格尔茨人的，这时许婚的诺言被推翻，她被选为利奥波德公爵夫人，她父亲给她以无损于诸侯威仪的陪嫁。受侮辱的迈因哈德站到鲁道夫的敌人一边。1365年7月27
135 日，鲁道夫在访问他那不太热心的同盟者的旅途上，死于米兰，年仅二十七岁。

奥地利中世纪晚期的史书已经对这位邦君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诚然，也指出他那骤然多变的政策的危险。在美男子弗里德里希执政的最后几年，哈布斯堡家族越来越明显地在奥地利扎下根来，最后把这件事情肯定下来的是鲁道夫第四，他一辈子都感到自己是奥地利人和维也纳人，并用感人的语言表达了他的这种态度。

当证明严格遵守长子继承权行不通的时候，鲁道夫第四于1364年11月按照所有兄弟共同执政的精神，制订一项继承顺序的新法规，同时保留长子的某些优先权，试图以此来防止领地的分割。根据这个办法，鲁道夫逝世后，他的兄弟阿尔布雷希特第三（1365年—1395年）和利奥波德第三（1365年—1386年）起初共同执政；那时还必须集中力量抵御巴伐利亚想同匈牙利国王路德维

出产丰富的盐矿开采地，尤其是那里还可以征收多瑙河关税。一 137
些条款有助于维系两个统治区的相互关系；在一个支系灭绝时，应由另一支系继承，公爵们应该继续沿用各邦的称号和统治的象征，此外，还规定了出卖领土时相互间有优先购买权，必要时对其他支系的未成年孤儿有监护权。应该避免于兄弟支系有损的结盟，共同抵御敌人的进攻。但是，事实上很少出现有效的合作。无论如何，分割意味着削弱，阿尔布雷希特第三的宫廷诗人彼得·祖亨维尔特和后来的托马斯·埃本多尔弗已经对事件作出这样的评判。

尽管奥地利中世纪晚期的分治时期（1379—1490 年）的历史似乎缺少伟大的政治路线，然而在血统、领土和政治方面可以指出某些稳定的东西：阿尔贝特家族、阿尔布雷希特第三及其后代都只有独子继承父业，进行统治，直到这一支系在第四代遗腹子拉迪斯劳斯灭绝时为止(1457 年)；子孙较多的利奥波德家族分裂为一个施蒂里亚支系和一个蒂罗尔支系；后者在 1496 年完结，而前者则使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重归统一，这个家族继续兴旺发达。由于家族政策运用到领土关系上，哈布斯堡家族统治区分为两个领地群，后来又分为三个；奥地利多瑙河各领地隶属阿尔贝特家族，所有其余地产则隶属利奥波德支系。在地理上，阿尔贝特家族的领地附属于卢森堡家族的势力范围，阿尔贝特家也是这个家族较弱的同盟者。卢森堡家族暂时兼有罗马—德意志的王冠和波希米亚的和匈牙利的王冠。利奥波德家族行动比较独立，受他们行动威胁的邻居——南边的威尼斯和西面的瑞士联邦——是他们的对手，同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关系有所改善。

哈布斯堡王朝的新的总称得以流行，也许同分治有关。皇帝卡尔第四的一封信（大约 1360 年）最早提到“奥地利家族”（domus Austriae)的概念，这个众所周知的提法可能已经属于公爵鲁道夫

第四的时代。后来，这个称呼取代比较老的、本来就不大常用的词组“对奥地利的统治”(Herrschaft zu Österreich)，哈布斯堡家族上升而具有世界性影响时，这个称呼就伴随着它，不久，在操德语各邦以外的地方，人们读到 Casa d'Austria①或 Maison d'Autriche②时，不言而喻地指哈布斯堡家族，也指那些不再统治奥地利各邦的这个家族的支系，尤其指西班牙支系。然而，在中世纪晚期的语言138 运用中，十分清楚地表示出，同被摒弃的旧提法一样，“奥地利家族”(Haus Österreich)一词不仅指它的王朝，而且也指整个受它统治的地区；“奥地利家族”这个总概念，可能比“对奥地利的统治”这个词更适合于从 1379 年以来由于一再分割而变得松散的整体；这时，统治集团有好几个，然而，邦君家族则依然只有一个。

在诺伊贝格分割之后，利奥波德就以作为向南和向西扩张领土的政策的先锋战士的姿态出现。威尼斯和它的世仇、即得到帕多瓦的卡拉拉和匈牙利支持的热那亚发生了一场战争，这座被咸水湖包围的城市一时陷入困境。的里雅斯特人利用形势，动摇了威尼斯几年前才建立起来的统治，他们无力保持独立，而投靠了利奥波德公爵，后者尊重这座城市的自治。

在施瓦本土地上，利奥波德第三最初也颇有成就，虽然把施瓦本在政治上纳入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的公开尝试在这里一开始就遇到结盟运动的反抗，因为这样做是有目的的，1379 年，利奥波德用四万盾的巨资，从文策尔国王手中取得了对上、下施瓦本的管辖权。1381 年，他购买了内卡河和多瑙河之间的霍亨贝格伯爵领地。但是不久，同施瓦本城市同盟和同瑞士联邦的关系越来越尖锐。利奥波德对待联邦成员绝对没有采取侵略性的态度，虽然贵族怂

① Casa d'Austria，西班牙文，意思是“奥地利家族”——译者
② Maison d'Autriche，法文，意义同上。——译者

恩他。当卢塞恩人及其同盟者入侵哈布斯堡统治区时，他才在贵族和前奥地利各城市的支持下向卢塞恩进军。然而他的军队在泽姆帕赫附近为敌人的机动性更强的步兵所打败，公爵阵亡(1386年)。这时楚格和格拉鲁斯公开加入瑞士联邦。阿尔布雷希特第三的军队想挽救危局和报泽姆帕赫之仇，但是军事行动极为拙劣，在内费尔斯为格拉鲁斯人打败(1388年)。哈布斯堡家族在上莱茵河以南只剩阿尔高的一部分和图尔高，不得不在停战协定(1389年)中忍受改变了的局面，协定在1394年和1412年曾两度延长。面对恶化了的形势，阿尔布雷希特第三在1387年就被利奥波德第三的儿子们承认为监护人，因此，哈布斯堡政权的团结暂时得到巩固。布卢登茨和蒙塔丰谷地的购得(1394年)，加强了受威胁的福拉尔贝格邦的地位。

除了在同瑞士联邦的纷争中干涉失利外，在阿尔布雷希特第三执政期间，局势相当平静。绍恩贝格的伯爵们企图在巴伐利亚和上奥地利的边界地区，围绕着他们的城堡、维尔赫林寺、多瑙河口岸阿沙赫和1361年取得的城市爱弗尔丁建立一块自己的领土；公爵善于拉维特尔斯巴赫家族同自己结成同盟，使他同绍恩贝格伯爵们的争端迅速结束，公爵获胜(1380年)。绍恩贝格人不得不承认在采邑和领地法律上对奥地利的依附，他们的特殊地位终于只剩死刑判决权了。阿尔布雷希特竭力促进首府维也纳的发展，他领导了大学的改革，他的前任创建的大学在那时才获得真正的生命力(1385年)，也创办了盼望已久的神学系。 139

阿尔布雷希特第三逝世后产生了某种紧张，死者的儿子阿尔布雷希特第四和利奥波德兄弟中的老大威廉不能和睦地团结起来，后者作为整个家族的长者要求享有特权。最后，在两项条约里调整了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权。在霍伦堡，阿尔布雷希特和威廉

达成在哈布斯堡家族各领地里共同执政的协议(1395 年)，陪臣应向两人宣誓，收入应均分；实际上，威廉对阿尔贝特家族的多瑙河各领地有某些影响。在维也纳条约(1396 年)里，利奥波德家族两位较大的兄弟威廉和利奥波德(第四)决定实行分地而治，威廉得到施蒂里亚，克恩滕，克赖因，亚得里亚海沿岸和弗里奥尔的地产，利奥波德得到蒂罗尔和前奥地利。两人都应关照弟弟，威廉照顾恩斯特，利奥波德照顾弗里德里希。1395 年和 1396 年的条约中标明的三个领土群成为后来的协议的模范，当然，到了十六世纪才普遍应用这些领土群的流行名称：下奥地利(恩斯河下游的阿尔贝特的奥地利各邦和恩斯河上游之邦)，内奥地利(施蒂里亚和威廉所分得的其他领地)和上奥地利(蒂罗尔和福尔兰德；后者通常也用"前奥地利"这个更为狭窄的总概念来表达)①。

在维也纳条约签订的那年，首次召开一个奥地利邦议会，它讨论了在尼科波利斯战役(1396 年)之后变得更加富有威胁性的土耳其危险。中世纪行将结束时的议会，是为各等级从前就享有的参政权而设立的，它起初是有特殊原因才召开，后来就成为定期集会的常设机构。批准税收，决定更广泛的兵役，批准涉及国家利益的王朝条约，以及在困难时期共同维护和平，等等，这些很快地就属于议会的主要议程。

140 在奥地利邦议会中，等级的代议机构一般地分为主教集团、领主集团，骑士集团，城市和集镇集团。主教们作为神职人员享有某些特殊的荣誉，然而却没有最强大的政治势力，他们包括处于邦君保护下的领地寺院的修道院长和邦寺院总监。除蒂罗尔外，贵族

① 从这里看来，前奥地利(Vorderösterreich)的含义较"福尔兰德"(Vorlande)为宽。但很多德文百科全书都认为，两者均指同一地区，即德国西南部的亚尔萨斯、布赖斯高、上施瓦本一带。参见本书所附地图图 3。——译者

列入领主和骑士集团。领主等级由高级官吏和少数中世纪晚期还遗留下来的自由贵族陪臣(Edelfreien)的家族组成。这个等级通常是邦议会中真正活跃的成份。来自它的行列里的有邦总督，下奥地利的邦议会议长。数量最多的是骑士等级——至少在中世纪是这样，城市的个别骑士市民和后来的高级奴仆也属于这个等级。一时的剧烈争夺使它和领主等级分道扬镳。邦君所属的城市和集镇在议会里的代表不太多，属于与邦君关系比较密切的皇家领地的城市，以及贵族和教会领地的城市和集镇都没有代表。在邦议会里农民的代表绝无仅有——蒂罗尔有农民代表，萨尔茨堡暂时也有。在蒂罗尔的邦议会里，有“山谷和法院”(Täler und Gerichte)的发言人，即邦君领地里的农民的发言人。在其他邦里，贵族和主教也被看成是佃户的代表，这对后者不很有利，因为在很多问题上利益是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

人们称各等级代表的团体为“普通地方议员”(gemeine Landschaft)，“乡民”(Landleute)，“四党”(vier Parteien)，他们和邦君在很多方面是互相依赖的。各等级的代表经常被拉去支持和保证家族和领主的条约；在一些邦里，他们早就强有力地行使他们的权利。无论如何，各等级的代表以正常的立法形式参与决定领地事务不是从召开邦议会才开始的，人们可以追溯到在缔结格奥尔根贝格条约时(1186年)施蒂里亚贵族的活动，甚至追溯到奥地利的领地“泰丁会议”(Landtaiding)①针对海因里希第四的若干项决议(1081年)；在十三和十四世纪，记载领地人民及其各等级的政治活动的史料越来越多，哈布斯堡家族各领地的情况是这样，东阿尔卑斯山的其他地区的情况也是这样，教会贵族的领地尤其如此。在还没有统一的领地组织的地方就结成一些同盟，如1391年在阿

① “泰丁会议”的原义为“日间审判会”(Tageding)。——译者

尔贝格山以西各领地中就是这样；在这里，伯爵、骑士、费尔德基尔希和布卢登茨两城市，还有区乡的农民，都共同努力维护和平；瑞士的榜样是现成的，但是，瑞士联邦没有反哈布斯堡的倾向。

141 一般地说，阿尔贝特家族是愿意同邻近处于优势的卢森堡家族的政权合作的。不过，后者在十五世纪初仍然没有统一的家族政策。在微不足道的普法尔茨的鲁普雷希特国王执政期间（1400年—1410年），卢森堡人之间互相斗争不已。匈牙利的西吉斯蒙德把他的兄弟波希米亚国王文策尔抓起来，交给哈布斯堡家族的公爵威廉和阿尔布雷希特第四看管；后来，文策尔逃跑成功并重新向西吉斯蒙德开战时，匈牙利国王和哈布斯堡家族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裂，但是，哈布斯堡人后来参加了对文策尔国王和摩拉维亚边区行政长官约斯特的讨伐。在这次行动中，阿尔布雷希特第四得了痢疾，病死在克洛斯特新堡，年仅二十八岁。公爵参加他的邻邦的战争行动是极为勉强的，他更乐于过幽静的生活，在到圣地朝拜（1398年）后，他往往退居拉克森堡宫或毛厄巴赫修道院。他和巴伐利亚的约翰娜的婚姻留下一个未成年的儿子阿尔布雷希特（第五）。

在阿尔布雷希特第四在世时，情况已经表明，利奥波德系的成员之间也不团结，老大威廉反复试图保住他的优先地位，他遇到利奥波德第四的反抗。此外，他们在对外政策上还有不同看法，威廉和文策尔结盟，利奥波德则同西吉斯蒙德搭伙；这种不和导致匈牙利对奥地利的入侵。威廉公爵1406年逝世时，各等级地位的强大明显地引人注目。一个奥地利各等级组成的理事会对阿尔布雷希特的监护期限作出决定，监护期定于1411年6月23日终止。

利奥波德兄弟之间是这样瓜分哈布斯堡的领地的：利奥波德作为长兄掌管奥地利、克恩滕和克赖因，“铁汉子”恩斯特掌管施蒂

里亚，起初人们想把弗里德里希排除掉，后来又让他掌管前奥地利和蒂罗尔。尽管各等级和西吉斯蒙德国王曾经多次试图调停，兄弟之间的不和，尤其是利奥波德和恩斯特之间的不和依然如故。这种纷争绝不仅限于王族本身。公爵们招募外国雇佣军，此外，还发生了匈牙利和摩拉维亚匪徒的入侵，为保卫领地和平而采取的反击行动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成就。在结党方面也表现出社会特色。大领主和维也纳的教长拥护恩斯特公爵，骑士和手工业者则支持利奥波德。当康拉德·福尔劳夫市长下令处死五个在市议会中反对恩斯特公爵的手工业者时，这种对立在维也纳表现得最为明显。不久，利奥波德开进维也纳，他也下令将福尔劳夫和两位市政委员——汉斯·罗克和康拉德·拉姆佩斯多弗斩首。只有在延长对阿尔布雷希特监护期的做法上，兄弟们意见一致，然而，1411年，那个受他们监护的未成年人被各等级的代表拐走。利奥波德逝世，经过长期的谈判，终于在维也纳签订了一项条约，找到了一种办法，就是在领土方面采用1395年和1396年的协议。阿尔布雷希特第五得到下奥地利各领地，恩斯特得到内奥地利各领地，弗里德里希得到蒂罗尔和前奥地利。在奥地利家族的势力范围内逐渐出现平静；然而，这平静维持不久。 142

公爵弗里德里希第四的处境一开始就极端困难。当他干涉了圣加伦修道院和它属下的阿彭策尔农民之间的一场争端，支持陷入严重困境的修道院院长时，他的军队在施托斯战役(1405年)中被阿彭策尔人挫败，起义蔓延到莱茵河右岸，组成“大湖同盟”(Bund ob dem See)①，大部分福拉尔贝格区镇都参加了这个同盟，只有布雷根茨领地和布雷根茨城在稍事犹豫之后奋力抵抗。同盟者经阿尔贝格向蒂罗尔挺进，直抵兰德克，尽管一路上打了很

① 此处的湖指博登湖(Bodensee)。——译者

多胜仗，最后却一无所获。施瓦本的"盖奥尔格盾牌"(Georgen-schild)骑士军战胜围困布雷根茨的农民，为弗里德里希拯救了局势；1408年媾和，向福拉尔贝格的农民作了书面保证，被摧毁的贵族城堡不得重建。

弗里德里希公爵同阿彭策尔人战斗时遇到种种困难，不得不对蒂罗尔的贵族作些让步。他后来的执政期是以同贵族势力斗争著称，这些贵族势力均为奥地利家族的一切外敌所支持，甚至连恩斯特公爵也暂时站到弗里德里希的对手一边。然而，当蒂罗尔贵族在罗滕堡的海因里希领导下，在一次同特兰托主教区发生冲突期间脱离他时，公爵继承了他的前任们的宿愿，想在特兰托地区实施国君的权利(1410年)，取得了卓著的成就。在这次纷争中，西吉斯蒙德国王的态度对弗里德里希不甚有利，在康斯坦茨宗教会议上，利奥波德家族和卢森堡王室之间原有的矛盾又重新公开爆发。西吉斯蒙德控制着宗教会议，公爵却错误地估计政治形势，极不慎重地帮助受到罢免威胁的教皇约翰二十三世逃脱康斯坦茨宗143教会议，他未能挽回约翰的命运，自己却遭到皇帝的放逐，瑞士联邦无视不久前才信誓旦旦地保证过的五年和约，立即乘机占领阿尔高，以及基堡和伦茨堡两个伯爵领地。那时哈布斯堡家族丧失了祖传的城堡(1415年)。奥斯瓦尔德·冯·沃尔肯施泰因领导的蒂罗尔贵族重新开战。弗里德里希企图以重返康斯坦茨来平息冲突，只是西吉斯蒙德毫不通融，把公爵抓了起来。弗里德里希冒险逃到蒂罗尔，才能够对迫害他的人进行有效的抗击。邦君、城市和农民团结合作，一致反对贵族。贵族想利用这个机会建立较小的帝国直辖领地，从而威胁了蒂罗尔邦的统一。

最后达成一项协定(1418年)，弗里德里希除了丧失给瑞士联邦的地方外，保住了他的领地。公爵重新收回被抵押的地区；他采

用了目标明确而节俭的经济政策，筹到了必要的钱财，反驳了那个嘲弄他的绰号“空囊素手的弗里德尔”。诚然，在福拉尔贝格，抵押给弗里德里希·冯·托根堡的费尔德基尔希领地，一直维持到弗里德里希逝世时（1436年），瑞士联邦的敌意拖延了收回领地的时间。在蒂罗尔，公爵反对贵族的斗争还持续一个时期，富有地产的施塔肯贝格尔家族抵抗得最长久，直到1426年他们的主要要塞格赖芬施太因被攻占时为止。从此，公爵成了邦内无可争辩的主人，农民和城市的支持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市民和农民由于自己的态度保住了自己的权利；农民使自己得以列入享有特权的邦等级，因而可以进入邦议会，同样地，他们保留了在区镇里的自治权；相反地，要是贵族胜利，一定会严重损害他们的地位。弗里德里希在他的兄弟恩斯特逝世(1424年)后，得到对其子嗣弗里德里希（第五）和阿尔布雷希特(第六)的监护权，因而对内奥地利的治理产生重要的影响，于是，公爵就大大地扩大了自己的权力。

阿尔布雷希特第五在下奥地利各领地的执政活动最初颇有成就；长期以来，人们为保障领地和平和实施司法改革作出了努力，但劳而无功；然而他却做到了。邦议会法院取代了旧的“宫廷泰丁会议”(Hoftaiding)，能干而无私的公有地产执掌官(Hubmeister)贝特霍尔德·冯·曼根整顿了财政。公爵在1421年和西吉斯蒙德国王的女儿伊丽莎白结婚，他和国王合作得很好，然而，这种合作却使阿尔贝特所属各领地卷入胡斯教派的混乱之中。毫无疑问，一场大规模的、这一次由邦君鼓励的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发生了普遍的宗教骚乱有关，这场迫害在维也纳使几百个较富裕的犹太人丧失了性命。当然，胡斯教徒自己也迫害犹太人。怀疑犹太人与胡斯教徒相勾结，在公爵的行为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利用这个机会没收了大量的财富。此外，比较激进的胡斯党羽的社会革命思想引

144

起了较贫困的居民阶层的共鸣，肯定是不能排除的；在信仰方面，发尔多教派或其他不满分子可能同情胡斯的教义，总之，发生了审判异教徒的事件。有一个时期，那位波希米亚宗教改革家的战友，布拉格的希罗尼穆斯在维也纳传教。然而，胡斯教徒的民族狂热和野蛮的作战方式不适于在德语区为他们的思想进行宣传和争取活动。在爆发公开战争后的最初几年，阿尔布雷希特公爵在摩拉维亚的军事行动有胜有负，摩拉维亚是西吉斯蒙德作为波希米亚的采邑许诺给他的（1423 年）。胡斯教徒的入侵在奥地利居民中造成严重的伤亡，在攻占边境城市雷茨后的一次大屠杀（1425 年）中牺牲者尤多。两年后，奥地利人在茨维特尔附近遭到惨败。

在随后的几年里，多瑙河以北地区也深蒙战祸，1429 年，埃根堡不得不忍受长期的围困，最后，1431 年维尔德河畔的基希贝格附近的一次防御战取得重大的战果。象从前同瑞士人打仗时一样，这次骑士军在同胡斯教派作战时无济于事，人数也太少，因此，不断在领地居民中征召越来越多的兵员。多瑙河各领地的“区域”(Viertel)[①] 划分和当时所采用的防卫组织是密切相关的。也招收了雇佣兵，在波希米亚动乱结束后，捷克雇佣兵在奥地利的纷乱中起着巨大的作用。

解决了同胡斯教派的争端之后，西吉斯蒙德国王才能返回波希米亚(1436 年)；正如已有的一些条约和最后一位卢森堡家族的成员的愿望所表明的那样，国王死后，西吉斯蒙德的权力地位转给了阿尔布雷希特第五。起初，阿尔布雷希特在匈牙利一帆风顺地被选为国王(1438 年 1 月)，他的妻子西吉斯蒙德的女儿伊丽莎白被

---

① 这里叙述了奥地利某些带 Viertel 语尾的地名的起源。在本书中 Viertel 均音译为“菲特尔”。如 Innviertel(因菲特尔)、Mühlviertel(米尔菲特尔)、Waldviertel(瓦尔德菲特尔)，等等。——译者

贵族承认为国家的女君主，这对他是大有裨益的。1438 年 3 月，阿尔布雷希特——叫他这个姓名的第二位统治者——得到罗马—德意志的王冠；在波希米亚，较大的困难在于宗教的和民族的疑虑，然而，他终于在 1438 年 6 月被各等级议员的多数所选出，并且很快得到普遍的承认。这样一来，第一次由一位邦君集奥地利公爵的冠冕、以及波希米亚、匈牙利和德意志的王冠于一身，然而，阿尔布雷希特不同于哈布斯堡家族后来的国王和皇帝，他的地位多少可 145 以说是从卢森堡人那儿继承来的。阿尔布雷希特荣任新职时间不够长，人们无法实际判断他的地位的内在力量，不过，他的统治者的品质却到处受到好评。1439 年 10 月，他在对威胁匈牙利东南部的新土耳其敌人进行劳而无功的讨伐途中身染痢疾病故。夫君亡故后，伊丽莎白王后才生下一个儿子拉迪斯劳斯（诨名“波斯图穆斯”，意即遗腹子）。国王在临终时指定，由内奥地利的弗里德里希第五同王后和九个顾问对未来的子嗣进行监护。这一指示得到遵守，此外，弗里德里希作为奥地利家族的长者，也被聘请为蒂罗尔的弗里德里希第四的儿子西格蒙德的监护人。

皇帝弗里德里希第三统治下的奥地利动乱时代

无论如何，人们不能不承认，国王阿尔布雷希特第二的统治是很有魄力的。他的早逝导致奥地利历史上一段极不愉快的、持续整整半个世纪的时期；这是一个混乱的时代，它基本上与内奥地利的恩斯特的大儿子弗里德里希第五（第三）的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和名目所进行的统治同时。当然，弗里德里希不得不暂时向各等级、阿尔布雷希特第二的儿子拉迪斯劳斯、他自己的兄弟阿尔布雷希特第六、特别是蒂罗尔的西格蒙德，在奥地利境内的各领地参与统治的实质性要求表示让步，此外，他并不懂得保护这些人，使之不

受外敌和内部反对者的欺凌，不过，他终于能够把显赫的权力地位留给他的儿子马克西米利安。

年轻的拉迪斯劳斯由于他的出身，被看成最有资格取得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王冠的人；然而，在这两个国家里，民族的党派、尤其是贵族建立的党派，拒绝一个德意志的、眼下仅仅由一个小孩代表的统治家族，而宁愿要一个非德意志人、尽可能是本国的人。在匈牙利，曾经发生过让波兰的亚盖沃·弗拉迪斯拉夫当侯选人的事，有一个时候，人们曾想让他同阿尔布雷希特的遗孀伊丽莎白结婚，但是，后者坚持由她的儿子继承王位。于是，两位侯选人都加了冕，拉迪斯劳斯是个十三个月的孩子，亚盖沃总还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年（1440年），诚然，宫廷女官海伦娜·科塔纳发动了一次成功的政变，为这个哈布斯堡家族的孩子保住了真正的王徽。不久，伊丽莎白去逝，弗拉迪斯拉夫相当顺利地保住了他的地位，然而，他在1444年对抗土耳其人的瓦尔纳战役中不幸阵亡。

146　这时，遗腹子拉迪斯劳斯虽然被承认为国王，但是，1440年2月被选为德意志国王的弗里德里希仍不愿交出那个被他监护的人，因此，匈牙利帝国议会选举西本比尔根①贵族约翰内斯·胡尼亚迪为帝国摄政官（1446年）；随即他就入侵奥地利，然而未能使弗里德里希改变态度。在波希米亚，事态的发展极为相似。在这里，胡斯教徒波杰布拉德的格奥尔格·孔施塔特被各等级代表所推选，他起初任最高军事首领（1444年），后来出任帝国摄政官；他也要求交出拉迪斯劳斯，未果，当然他没有力争。弗里德里希也不愿意自己没有开展有效的统治活动，就把世袭的统治者拱手交给阿尔贝特家族的"下奥地利"各领地和它们的各等级。现在各等级反对派有一位极为积极的发言人和领导者，此人可以和胡尼亚迪或

① 即今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下同。——译者

波杰布拉德相媲美，那就是巴伐利亚的低级贵族出身的公有地产执掌官乌尔利希·冯·埃青，他的官职和富裕的婚姻使他筹到了为开展政治活动所必要的资金。作为机敏的煽动家，他在制造反弗里德里希情绪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弗里德里希的玩忽职守的罪过就足够引起人们的不满。在这期间，国王在帝国内部也干尽不得人心的事。他再次试图推行反瑞士的奥地利政策，苏黎世同其他瑞士联邦成员的分裂提供了良好机会。弗里德里希和法兰西国王的秘密同盟招致大批漫无纪律的阿尔马格那克雇佣兵来到莱茵区（1444 年）；瑞士人和阿尔萨斯人的激烈反抗迫使他们撤退；当弗里德里希的政策被识破后，在帝国内部长期没有人同情他。蒂罗尔人乘机强迫他释放蒂罗尔的弗里德里希的儿子西格蒙德公爵(1446 年)，弗里德里希——使用了类似他在奥地利对待拉迪斯劳斯的策略——在西格蒙德成年后仍不愿解除对他的监护，把他交出来。

在发生这些事件期间，多瑙河以北地区不断地遭受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匈牙利和本地匪徒的蹂躏；潘克拉茨·冯·霍利奇，莱昂哈德·阿贝格尔，贝内什·切纳霍尔斯基·冯·博斯科维茨等雇佣兵头目纷纷出动进行广泛的掠夺。弗里德里希国王仍然坐视不动；乌尔利希·冯·齐利伯爵向马希费尔德进军（1450 年），使痛苦减轻了一些。第二年，在乌尔利希·冯·埃青领导下，各等级的少数积极分子向国王下了最后通牒，要求释放遗腹子拉迪斯劳斯。但是，弗里德里希答复得支支吾吾，1452 年春前赴罗马时，他为谨慎起见，带走了拉迪斯劳斯。皇帝的加冕礼于 3 月 18 日举行，这是最后一次在罗马举行的加冕礼；从这时起到帝国同盟解散（1806 年），帝国的最高职位一直掌握在哈布斯堡家族手里，只 147
有一次间断（1742 年—1745 年，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卡尔第七当

皇帝），在意大利疏远之后，“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名称开始流行。大约在弗里德里希在罗马获得皇冠的那些日子里，他面临着丧失奥地利的危险。皇帝在匈牙利、波希米亚和奥地利的对手在维也纳结成同盟，在维也纳新城包围了这位从意大利回来的人，强迫他交出拉迪斯劳斯（1452年9月）。这个十三岁的男孩在凯旋声中被带到维也纳，后又被带到布拉格，在那里他被戴上了王冠，成为波希米亚的国王。当然，拉迪斯劳斯只不过是真正掌权者手中的工具而已；在奥地利，那位埃青家的人和乌尔利希·冯·齐利之间，反复互易其最高职位；最后，那位施蒂里亚伯爵占了上风，他指导着青年国王的政策，直到在贝尔格莱德被拉迪斯劳斯·胡尼亚迪谋害为止（1456年）。1457年11月23日，拉迪斯劳斯国王死于布拉格；一些同时代人揣测，他是被觊觎王冠的波杰布拉德的格奥尔格毒死的。哈布斯堡家族的阿尔贝特系随着拉迪斯劳斯的夭亡而灭绝，他的死结束了奥地利、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等国的合一君主制，人们把这个合一君主制看作是后来的多瑙河君主国的一个短暂的先导。当然，弗里德里希第三企图多少挽回至少由拉迪斯劳斯挂名占有的那个地位。面对着波杰布拉德的格奥尔格，他不得不立即放弃波希米亚。但是，匈牙利西部一些州郡的贵族拒绝胡尼亚迪家族当国王。这个集团的成员，也是奥地利人和施蒂里亚人，他们在相当松懈的边界的匈牙利一侧拥有地产，1458年2月，他们在居辛宫选举弗里德里希为匈牙利的国王。不过，一个人数上多得多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匈牙利民族的党派挑选了马蒂亚斯·胡尼亚迪（“科维努斯”），他获得了成功，尤其是因为弗里德里希不久在奥地利也陷入十分窘迫的境地。

遗腹子拉迪斯劳斯死后，弗里德里希第三对恩斯河两岸阿尔贝特家族的领地提出了要求，他必然会遇到自己王朝内部的竞争

者。蒂罗尔的西格蒙德要求另给赔偿，而弗里德里希的弟弟阿尔布雷希特第六很有魄力，他更是坚决地同皇帝作对，两人的对抗在随后的几年（1458 年—1463 年）里给奥地利各邦重新带来灾祸。当然，皇帝在同格尔茨伯爵汉斯长期争夺由于乌尔利希去世而绝灭的齐利伯爵的私有地产和采邑时，起初获得了真正的成就，把这些地产和采邑并入奥地利家族。格尔茨人提出了很多要求，其中也提出了继承权要求；他们失败后还有遭受到更严重损失的危险，因而不得不在普萨尼茨和约中把他们在利恩茨隘口以东的克恩滕分散地产割让给弗里德里希(1462 年)。在这期间，弗里德里希的地位再度恶化，这对他们是有利的。

148

经过长期而艰难的谈判之后，1458 年达成了一项解决办法，由皇帝弗里德里希第三接管恩斯河下游的大公爵领地[1]的统治权，由阿尔布雷希特大公爵接管恩斯河上游之邦[2]的统治权。然而，此时皇帝在下奥地利也未能得势。这片平原横遭心怀敌意的兄弟及其在国内外的党羽所雇佣的匪帮的蹂躏。由于庄稼失收，爆发了饥馑。如同在与各等级的斗争中的情形一样，皇帝欠了雇佣军的军饷，为无休止的财政拮据所迫，他想利用铸造劣币来控制局面。当这种“新德林”[3]劣币在全国泛滥时，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涨。最后，居民处处拒绝接受。1460 年，由于铸造了一种价值较高的货币，这次货币危机才得到某种程度的克服，然而，维也纳“分尼”币的信用依旧不稳。战斗在继续进行，最令人不快的是皇帝的军官们和雇佣兵头目加马雷特·弗罗瑙尔之间由于有争议的财产权要求而爆发了纷争。诚然，在某些情况下，用械斗来实现权

① 恩斯河下游的大公领地 (Herzogtum unter der Enns)，即下奥地利邦。——译者

② 恩斯河上游之邦(Land ob der Enns)，即上奥地利邦。——译者

③ Schinderling 的音译，意即敲骨吸髓的人。——译者

益要求是符合中世纪的法权思想的。斗争的对手们也往往努力遵守某些法律形式。定居在马希费尔德的马加雷特·弗罗瑙尔象弗里德里希的另一个冤家对头格奥尔格·冯·普赫海姆几年前一样，利用那些促使他同皇帝"决裂"的理由。但是，招收来参加械斗的雇佣兵痞大部份均为极不讨人喜欢的分子，他们滋事犯法，为所欲为，而欠发他们的雇佣兵饷又一再引起新的械斗。从托马斯·埃本多尔弗的描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同时代的人看来，令人不快的械斗方式及其对国家所造成的恶果，显然要比这些械斗的英雄们引用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辩护而宣布的理由更为重要，因为这些理由往往很成问题。实际上，械斗的蔓延使关于械斗的规矩显得荒唐可笑，然而，皇帝太弱，无力维护领地的和平。因此，不满日增，当阿尔布雷希特第六经过彻底的外交准备之后入侵下奥地利(1461 年 6 月)时，他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在维也纳，他的追随者们在颇孚众望的煽动家沃尔夫冈·霍尔策的领导下也占了上风，并149 且开始把皇帝围困在城堡里。1453 年在保卫维也纳新城时表现得很出色的克赖因骑士安德烈亚斯·鲍姆基歇尔召来一支波希米亚援军，把弗里德里希从孤立无援中解救出来。然而，阿尔布雷希特大公爵在维也纳接管了政权；他还挫败了偷偷改换门庭的霍尔策的一次叛变阴谋；霍尔策被处死。自然，一般状况在阿尔布雷希特第六统治下并无本质上的改善。象同他敌对的皇帝一样，他似乎没有满足人们对他寄予的希望。

1463 年末，阿尔布雷希特第六的不测之死使弗里德里希第三再度成为奥地利多瑙河各邦的主人。现在，他谨慎从事，由于同匈牙利年青的国王马蒂亚斯·科维努斯签订了厄登堡[①]条约（1463 年），形势有所和缓。自从匈牙利西部贵族集团在居辛选举中把弗

① 即今匈牙利西部的肖普朗。——译者

里德里希第三选举为国王以来，他一直保留着匈牙利国王的衔头，而放弃实现他的权益。稍后，同马蒂亚斯·科维努斯达成了继承协议，因此，哈布斯堡家族还有获得匈牙利王冠的某些希望。重要的是，皇帝保住了几个在弗拉迪斯拉夫逝世之后占领下来的莱塔河边界另一侧的布尔根兰领地：福希滕施太因，科贝斯多夫，艾森施塔特，京斯，雷希尼茨；然而，不得不把厄登堡交给马蒂亚斯。皇帝的领地在国家法上仍然属于匈牙利，但由下奥地利官厅管理。

在这一暂时安定的时期里，弗里德里希在教会政治上也获得成就。1461 年，皇帝就下令在莱巴赫建立主教区，管辖克赖因和南施蒂里亚的部份地区。弗里德里希第二次在罗马逗留期间，得到教皇保罗二世同意，建立维也纳主教区，实现了奥地利邦君们几百年来梦寐以求的计划。忠于皇帝的维也纳新城这时也成为主教所在地（1469 年）。当然，邦君所属的主教区的扩大是微乎其微的，帕绍的激烈反对使维也纳主教区的真正建立拖延了几年。

克赖因的贵族安德烈亚斯·鲍姆基歇尔的起义引起了新的骚乱，他迄今为止一贯支持弗里德里希第三，例如，在利奥波德的内奥地利各领地里，他拥有无可怀疑的领地统治权，皇帝在这里遇到的反抗较少。鲍姆基歇尔感到他的效劳得到的报偿不够，就和马蒂亚斯·科维努斯建立联系，并同其他贵族结盟反对皇帝。内奥地利各等级的调停尝试导致一项妥协，但是，当鲍姆基歇尔前往格拉茨准备参加实施协议的谈判时，有人告诫皇帝要防范鲍姆基歇尔的暗杀阴谋，皇帝下令逮捕他和他的同谋者安德烈亚斯·格赖泽奈克尔，未经法律程序就处死了这两人（1471 年）。在镇压鲍姆基歇尔叛乱的同一年，皇帝还买到一块并非无足轻重的地方。他向瓦尔泽领主世家购买了阜姆[①]（“St. Veit am Pflaum”），这样一 150

① 即今南斯拉夫的里耶卡。——译者

来，他又赢得一个亚得里亚海口岸。

最后，在七十年代，出现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敌人，他的政权在几个世纪里一直威胁着奥地利。在对土耳其战争中，西方军队在尼科波利斯(1396 年)和瓦尔纳(1444 年）的失败引起极大的惊愕；约翰内斯·卡皮斯特拉诺在维也纳传教，听众甚多，十字军兵士受到他布道的激励，在 1456 年同匈牙利人一起，把贝尔格莱德从土耳其的铁蹄下拯救出来，参加这次战斗的十字军士兵中有很多奥地利人。为同土耳其进行斗争，弗里德里希第三建立格奥尔格教团（Georgsorden，1468 年)，米尔施塔特寺院成为它的本部，然而，这个教团缺乏人力和资金，对于它的任务未能胜任愉快。土耳其人在波斯尼亚站住了脚，当时特别威胁着内奥地利。十五世纪关于奥地利对土耳其战争的报道并不总是可以凭信的；关于铁汉子恩斯特公爵1418 年在拉德克尔斯堡附近取得一次辉煌的胜利，那是很久以后的作者才叙述的。然而，肯定无疑的是，1473 年，1476 年，1478 年，1480 年和 1483 年，土耳其人经克赖因向克恩滕推进，大肆蹂躏了这个邦。1476 年的破坏性入侵促使克恩滕的农民组织了一个同盟，他们抱怨贵族自己龟缩在城堡围墙内，让不设防的国土去听天由命。但是，1478 年，农民在戈高附近向由运河河谷入侵的土耳其人自首，他们失败了。贵族征募的军队也好，农民军也好，都无力对付土耳其人；只有邦君的雇佣军才是合适的抵抗工具，前提是，他得有钱给他们发饷。

奥地利和勃艮第同法兰西和匈牙利的斗争

七十年代初叶，皇帝有一个时期再度巩固了他的地位，西欧开始在奥地利家族的政策中显得重要起来。蒂罗尔和前奥地利的事态发展给了这种面向西方的转变以直接的推动。西格蒙德大公爵

是位乐善好施和喜爱饮宴的邦君，他执政的初年深受人们爱戴。不久，他放弃了对阿尔贝特各领地的要求，以便更坚定地维护他作为蒂罗尔邦君所应享有的权利，使之不受布里克森[1]主教区的侵犯。对他有利的是，尼古劳斯·冯·屈斯主教尽管在很多知识领域里出类拔萃，在处理政务方面却显得颇为笨拙，几乎得不到居民的好感。由于宗南堡的修女曾因有争论的诉讼问题向公爵投诉，主教用武力把她们从修道院里撵走，并且过份强调蒂罗尔大部份地区是依附于他那个主教区的采邑这样一个早已被人们忽视的情况，于是西格蒙德就采取武装袭击行动；在布鲁内克[2]奇袭这位库山人（1460 年）得胜后，公爵强迫主教声明放弃有争议的权益，当然，尼古劳斯被释放后又不认帐。教皇庇护二世（埃内亚·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下令禁止蒂罗尔做圣功；但是，这一措施几乎不为教士们所遵从。号召公爵的敌人进攻公爵的领地所引起的后果却更为严重，因为瑞士人象从前弗里德里希第四被宣布褫夺公权时那样，乘机四出占领地盘；当时，哈布斯堡家族丧失了图尔高，也就是丧失了上莱茵河以南最后一片比较大的地产；他们只剩下弗里克谷地和劳芬堡城。主教和教皇死后（1464 年），对西格蒙德的禁令被解除，禁做圣功的命令被撤销。公国保住了，不久就转入反击。1474 年蒂罗尔的等级代表批准征收土耳其战争税；现在这种税也向主教领土内的居民征收。

151

但是，瑞士联邦成员继续咄咄逼人，西格蒙德感到自己对付这个敌人未能充分裕如。因此，他寻找同盟者，并且认为新崛起的勃艮第公爵的势力就是这样的同盟者。后者利用德意志和法兰西边境地区所提供的可能性，采取了成功的家族政策，把许多领地拼凑

① 即今意大利的布雷萨诺内，下同。——译者
② 即今意大利的布鲁尼科，下同。——译者

为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当然还无力挣脱对邻国的采邑依附关系，而且由两块被洛林公爵领地分开的领土组成，即较小的老勃艮第或称“奥贝兰”[1]地区，以及较大的、从阿图瓦和佛兰德尔一直延伸到弗里斯兰的尼德兰地区。1465年，迟钝的善者菲利浦公爵——金羊毛教团的创始人——的统治权被他的感情用事的儿子“勇士”卡尔所接替。建立一个领土联成一片、完全独立于邻国的勃艮第王国是他公开追求的目标。西格蒙德想通过同这位勃艮第人合作，从两面夹击瑞士联邦的成员；他经常财政拮据，在圣奥梅条约(1469年)里，把宗德高、普菲尔特伯爵领地、旧布莱萨赫和黑森林抵押给卡尔。然而，卡尔实际上并没有支持哈布斯堡家族反对瑞士联邦成员。西格蒙德企图通过更密切的王朝联系来加强合作。152 “勇士”卡尔没有男嗣，只有一个女儿玛丽亚；由于对他的领地的前途感到不安，再加上他的感情冲动，公爵采取了一种变幻无常、前后不一的政策。西格蒙德向卡尔提出让玛丽亚和皇帝的儿子马克西米利安结婚的计划，并诱劝皇帝和勃艮第公爵在特里尔会晤，以达成必要的协议。实际上，特里尔会议(1473年秋)虽然夸示帝王阔绰的排场，令人印象深刻，尤其是“勇士”卡尔，但是，谈判在双方互不信赖的气氛中进行，结果一事无成，被皇帝骤然中断。不久，公爵企图同普法尔茨的大主教鲁普雷希特合作，实际控制科隆大主教区的统治权，结果引起了一场帝国战争；在围攻诺伊斯城失败后，卡尔不得不撤退。

在这个形势下，蒂罗尔的西格蒙德深思熟虑地改变了主意；这时，他设法收回抵押给勃艮第的地方；另一方面他在康斯坦茨签订了所谓“永久方针”条约(1474年3月)，放弃了对瑞士人提出的一

---

[1] Oberlande，“高地”的意思，和 Niederlande(尼德兰)相对，后者意思是“低地”。——译者

切要求。这是瑞士联邦成员和奥地利家族之间第一次真正的和约，在此之前，只有暂时的停火。西格蒙德和瑞士人联合上莱茵区的各城市，以及巴塞尔和斯特拉斯堡的主教，反对这个拒绝交回抵押地的勃艮第人。反"异族"[①]的仇恨之火熊熊燃烧起来了，在有争议的领地里，居民起义，残暴的勃艮第总督彼得·冯·哈根巴赫落入敌手，被处死。接着是瑞士人和勃艮第之间的斗争；瑞士联邦成员在埃里库尔(1475年)附近告捷。"勇士"卡尔攻占了洛林，然而在反瑞士人的斗争中依然运气不佳，他的军队在格兰德松和莫尔滕附近战败（1476年）。当卡尔围攻那得而复失的洛林首府南锡时，洛林人和瑞士人在城下大败勃艮第军队，公爵阵亡。

由于同瑞士联邦成员斗争而陷入困境，勃艮第公爵又同皇帝重开谈判，又提出希望他的女儿和马克西米利安联婚；实际上，现在随着同玛丽亚订婚，巨大的勃艮第产业的继承也日期临近了。马克西米利安匆忙奔赴尼德兰，在根特和勇士卡尔之女成婚（1477年8月19日）。但是，为了实现奥地利家族对荒芜了的勃艮第各领地的要求，首先必须武力解决，因为卡尔领有法兰西皇家领地，所以法国国王路易十一理所当然地立即出头干涉。在连年不断的 153 反复战斗中，马克西米利安获得了广泛的战绩，他于1479年在阿图瓦的吉内加特获得首次大捷。勃艮第的遗产只有布戈涅和皮卡第落入法兰西之手，马克西米利安所保住的那一份更要大得多。在玛丽亚死后于1482年缔结的阿拉斯和约固然不甚有利，然而后来马克西米利安同法兰西人的战斗却巩固了哈布斯堡家族在这一地区的统治。

1477年以来，人们喜欢谈论"奥地利家族和勃艮第"（Haus

① 异族（Welschen），指邻近的克尔特族及以后的意大利和法兰西民族，现音译为"韦尔施族"。——译者

Österreich und Burgund)，哈布斯堡王朝上升为世界大国一事正酝酿中。除了前奥地利和多瑙河地区的旧传统以外，又加进了西欧滨海地区的新权益和勃艮第一法兰西对立的宿仇旧怨。在勃艮第，存在着一股尽管充满矛盾然而却是强烈的国家意识，马克西米利安和玛丽亚——她在1482年的一次狩猎事故中丧生——的婚生子女都感到自己是勃艮第人和尼德兰人，孙子卡尔(第五)和费迪南(第一)也还有类似的感觉。卡尔第五争夺勃艮第的旧首府第戎，而法兰西又因丧失它的采邑佛兰德尔和阿图瓦而梗梗于怀。

马克西米利安的妻子被看成是地道的领地继承人，她死后，马克西米利安的处境变得非常艰难；当勃艮第需要马克西米利安倾注他的全部精力时，哈布斯堡王朝的东部却出现了极为严峻的形势。匈牙利好名心切和精明强悍的国王马蒂亚斯·科维努斯把他的势力扩展到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各地，波希米亚国王格奥尔格的逝世使他摆脱了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马蒂亚斯同亚盖沃·弗拉迪斯拉夫第二争夺波希米亚未能成功；不过，他利用弗里德里希第三对后者的承认，对下奥地利采取了一次军事行动(1477年)，直到皇帝在格蒙登条约里准备把波希米希亚分封给科维努斯为止，当然，弗拉迪斯拉夫的地位并未因此被动摇。弗里德里希政治上处事极端拙劣，导致马蒂亚斯·科维努斯的干涉；虽然贝恩哈德·冯·罗尔无视从前的许诺拒绝辞职，弗里德里希仍想把逃到他那里的前格兰[1]大主教约翰·贝肯斯洛尔派往萨尔茨堡大主教区任职，于是贝恩哈德·冯·罗尔下令在克恩滕和施蒂里亚的萨尔茨堡要塞向马蒂亚斯开放。由于弗里德里希也从受威胁的下奥地利撤退，匈牙利国王在这里占领了很多地方。在长期被围攻之后，维也纳沦陷(1485年)，后来维也纳新城也失守，只有一支皇家占领军在克雷姆斯坚

① 即今匈牙利的埃斯特尔戈姆，下同。——译者

守。

在萨克森的阿尔贝特领导下，曾在帝国范围内征募过军队，但成绩不佳，马克西米利安也未能给陷入窘境的父亲以援助。1484年末以来，他又同法兰西人作战，这次双方胜负反复无常。1486年2月，他被选为罗马国王；弗里德里希对他的提名采取了十分谨慎的促进态度，可能是他怕自己的地位受影响，或者因为选帝侯们对任何王朝要求王冠所陈述的论据都持拒绝态度。马克西米利安返回尼德兰后，被布鲁日居民所囚禁（1488年），他们谴责他所推行的亲英贸易政策；在做出重大让步的条件下，帝国军队到达后，他才获释。但是，弗里德里希第三强行修改了马克西米利安被迫对尼德兰人同意的条款。 154

在蒂罗尔和前奥地利，奥地利家族的地位也极为险恶。1487年，蒂罗尔的西格蒙德对威尼斯开战，但是起初进行得很不带劲，最后在埃奇河[①]畔的卡里亚诺附近大败正在进逼的威尼斯军队，不过，后来媾和了，因为战事对贸易起了很不利的影响。慷慨的邦君逐渐债台高筑，他的宫廷官员劝他把蒂罗尔邦卖给巴伐利亚；在这些阴谋中，宫廷侍从长官高登茨·冯·马奇起着特别有害的作用，他还制造了皇帝弗里德里希要暗杀西格蒙德的荒谬谣言。然而，一次邦议会铲除了这个宫廷集团（1487年），马奇及其朋友被驱逐，西格蒙德不得不撤回他对巴伐利亚人许下的诺言。1490年3月，马克西米利安终于说服西格蒙德引退，而另给他以巨额的补偿。这样，勃艮第和多瑙河各邦之间的重要环节的局势安定了下来。

为同马蒂亚斯·科维努斯和解，马克西米利安有一个时期准备作出牺牲，也许甚至打算割让下奥地利。老皇帝把这事制止了。1490年4月，匈牙利国王的逝世带来了解决办法：马蒂亚斯仅留

① Etsch，即意大利的 Adige（阿迪杰河）。——译者

下一个非婚生儿子，此人没有被承认为王座继承人。在一次毫不费力的征伐中，马克西米利安收复了失地。现在，他似乎甚至有登上匈牙利王座的良好前景，因为他的竞选对手波希米亚的弗拉迪斯拉夫力量远远不如他；匈牙利西部的大小城市先后落入马克西米利安手中，但是，当他准备袭击奥芬时，他的雇佣兵哗变，由于缺乏钱财，他们的要求未能满足，马克西米利安不得不撤退，后来，普雷斯堡[①]和约（1491年）终于结束王座之争，由于对付法兰西出现了新的困难，促使马克西米利安作出让步。条款和1463年的厄登堡条约相似。其中规定，如果弗拉迪斯拉夫第二或者他的儿子们死155 时没有男性继承人，马克西米利安有权要求斯特凡王冠。匈牙利各等级的议员由于担心他们的选举权会被取消，后来也赞同这一解决办法。

1493年8月19日，皇帝弗里德里希第三在林茨去世，他在内奥地利执政五十八年，五十三年当德意志国王，四十一年当罗马皇帝。仅就他统治时间之长而言，弗里德里希第三对奥地利历史就有重大的意义。一般地说，他的个性通常导致了不甚有利的结局，然而他的坚忍不拔是无可否认的，当然，他非常缺乏实干的劲头。因为弗里德里希比他的一切对手都长寿，他的政策最终还是卓有成效的；由于他坚信自己家族所负有的使命，也使他在令人忧虑的情况下态度变得坚决起来。AEIOU 这五个字母曾给这位统治者用来作过财产标记，他也惯于把它们加到他的签名中去，它们所暗示的奥地利的使命，他是知道的，也曾实施过，尽管很难说是他想出来的[②]。

① Pressburg，今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发。——译者

② 在弗里德里希的笔记本里，1437年开始记录的第一页，皇帝亲笔写下——虽然是后来补写的——著名警句："Alles erdreich ist Österreich unterthan"（德文，意即"一切土地均隶属奥地利"。）和"Austriae est imperare omni universo"（拉丁文：

从中世纪到近代

马克西米利安在他父亲逝世时，接管了一个在领土的辽阔方面他的前任所无法相比拟的政权；至多只有阿尔布雷希特第二在多瑙河地区的短暂统治可与之相比。一个国君，如果他的势力范围从佛兰德尔海岸起向东仅仅延伸到海因堡，那么，他是不能以维也纳作首府的。事实上，马克西米利安更喜欢因斯布鲁克和蒂罗尔邦，在那儿的人民当中，他享有极高的，由于一些传说（马丁岩壁[①]上的马克斯皇帝！）而有口皆碑的声望，在那儿，他从银矿开采的收益中，得到为实现他那有为的政策所必需的钱财，此外，他还可以满足他对狩猎的喜好。确实，多方面和不断变换的兴趣，帝国和王朝领土的广袤，以及国君的禀性，使得马克西米利安很少长期呆在一个地方。

没有坚决地实施匈牙利计划，这和考虑到西面法兰西的约束也有关系。马克西米利安也曾企图依靠英国，在布列塔尼立足；他想同最后一个弗兰茨公爵的有继承权的女儿安娜联婚，通过结婚把这位女公爵，并且"Per procuratorem"（通过一个全权代表）也把那块领地和自己紧紧地联在一起。然而，法兰西人攻占了布列塔 156 尼，安娜和法兰西国王查理第八结婚，马克西米利安感到受到了人格侮辱（"抢去新娘"），此外，法国王太子同马克西米利安的女儿玛加丽特的婚约被解除，而且这位哈布斯堡家族的女子还被扣留在法兰西一段时间。不久，他的同盟者英国和西班牙在这战斗即将爆

意即，支配全球非奥地利莫属）；不久也有各种各样的其他解释，偶尔也有反奥地利的解释。在1666年的一个出版物里，AEIOU 第一次被维也纳宫廷图书馆馆长彼特鲁斯·兰贝克理解为弗里德里希第三的纲领性政治口号。

① 马丁岩壁（Martinswand），高1113米，在蒂罗尔的齐尔（Zirl）附近，在因斯布鲁克上方，内有马克西米利安岩洞。——译者

发之际抛弃了他，不过，他的军队仍在法朗什·孔泰的杜尔农附近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1493 年 1 月）。由瑞士人根据军事态势居间调停而签订的森利斯和约（1493 年 5 月 23 日）并非不利，勃艮第的大部分遗产留给马克西米利安，玛加丽特回到尼德兰。由于法兰西国王转而采取积极的意大利政策，尼德兰边境地区出现较长时间的缓和似乎不是不可能的。马克西米利安愚蠢十足地支持英国王位的觊觎者、骗子珀金斯·瓦尔贝克的行动仅仅具有插曲性的意义，后者是国王爱德华第六的儿子，曾起事反对都铎尔家族（1494—1495 年）。然而，后来法兰西人入侵意大利，造成一种危急的局面，主要是威尼斯人的高超的外交手腕控制住了这一局势。米兰、西班牙和教皇也根据"神圣同盟"和德国皇帝一起联合行动。马克西米利安本人 1494 年 3 月和带来丰厚陪嫁的毕安卡·玛丽亚·斯福扎结婚，证明了他同样对意大利事务感到兴趣。后来，1495 年 5 月，马克西米利安和阿拉贡的费迪南之间达成一项婚约——当时为了加强政治同盟，王朝之间缔结婚约的事是很常见的。1496 年 10 月，马克西米利安的儿子菲利浦和西班牙公主约翰娜结婚，菲利浦管理着勃艮第各领地，因为他是勃艮第人玛丽亚的儿子，被看成是本地人，因而比他父亲更能赢得尼德兰人的好感；约翰娜的兄弟、西班牙帝国的可能继承者胡安和菲利浦的姐妹玛加丽特结婚。与勃艮第的联婚相反，同西班牙结盟时没有想到要为奥地利家族争遗产；在胡安和西班牙王朝的其他成员死后，王冠才转到菲利浦和奥地利家族手里。在意大利旗开得胜的法兰西人，由于他们的敌人结成同盟而背后受到威胁，因而不得不争取北撤，但是保住了意大利西北部的重要阵地；德意志的反对妨碍马克西米利安及时地、坚决地进行干涉，他对阿斯蒂和里窝那的征讨（1496 年），由于财力不足和威尼斯人的支持不够而告失败。

这时候，马克西米利安也着手进行帝国改革；神圣帝国的宪法暴露了明显的弱点，同西方的君主政体或威尼斯共和国的效能比较，这些弱点特别突出。关于帝国议会的议程和决议的措词，意见 157 极为分歧，少数根本不尊重多数的表决，没有能保证实施决议的机构。沃尔姆斯帝国会议(1495 年)宣布了“国内永久和平”，其目的是铲除械斗，这种械斗已经从守法不够而发展成遍及全国的灾祸。永久国内和平虽然未能立竿见影，但却导致了逐步的和平。帝国最高法院被看成是最高司法当局，在神圣帝国解散以前，它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机构，尽管多数邦君能够使他们的国家或多或少地摆脱它的判决。帝国的公共税——“公共芬尼”税搞得最差，无休止地缺钱花的国王对它最为关心。为了切实达到帝国改革，需要马克西米利安和美因茨大主教贝特霍尔特·冯·亨内贝格领导的各等级议员反对派之间进行合作，然而，没有做到这一点；从此以后，“皇帝和帝国”这个词组所表示的与其说更高度的统一，勿宁说是根植于帝国宪法的政治分裂。几年以后，人们重新试图进行改革。1500 年，作出一项关于帝国执政府——一种帝国政府——的决议。马克西米利安反对这一使他成为各等级议员的政治俘虏的机构；它始终毫无意义，而且当时就着手进行的政区划分只有在卡尔第五统治下才得以实现。

在整顿奥地利各领地的行政管理方面，马克西米利安的组织工作不是持久的；然而，他作为奥地利中央集权史上的伟大倡导者却令人铭记不忘。他的孙子费迪南第一继承了他的功业，建立起一个基本上是常设的行政机构。马克西米利安可以依靠行之有效的领地管理的经验，但是，到底是蒂罗尔的还是勃艮第的机构的范例对他起决定性的影响，这一点不能肯定。不过，这位统治者的个人功绩不容低估。马克西米利安把下奥地利和内奥地利各邦组

成一个更高级的行政管理单位，蒂罗尔和前奥地利亦然。1490 年为蒂罗尔，1493 年为下奥地利和内奥地利各地区建立了中央集权的行政机构，叫做“执政府”或“政府”，在因斯布鲁克和林茨(后来在维也纳)也建立了同样的机构，也为管理邦君的财政建立了国库或财务署(Raitkammer)。特设的皇家法院机构由于各等级议员的反对不久又被撤销。设在阿尔萨斯的恩西斯海姆的前奥地利政府隶属于因斯布鲁克官厅。人们想尽可能地在国王宫廷里成立联合158 机构来领导家族领地和帝国的管理事宜。因此，1498 年建立枢密院作为最高行政和司法机关，建立宫廷财务署作为财政机构，并且重新整顿宫廷司法处①。对建立有系统的档案也给予了关心。诚然，马克西米利安在因斯布鲁克建立一个哈布斯堡王朝中央档案馆的设想未能实现。在他执政的后期，他下令对机构进行种种调整。象从前多次举行过的那样，1518 年各世袭领地再次派代表在因斯布鲁克召开一次联合的执行邦议会，在他们代表的合作下，终于草拟了一项新的管理法规，不过，在马克西米利安生前未能很好付诸实施。关于作战时各邦征募军队互相合作的规定是至关重要的。

1498 年，马克西米利安妄图利用法兰西王座换人之机，进攻布戈涅；但是，帝国拒绝追随他，甚至他的儿子和尼德兰也不跟着他干，他一无所成。一年之后，同瑞士人以及和瑞士联邦仅仅保持松散联盟的格劳宾登人发生了纷争，损失极大，其中不无法兰西外交官的推波助澜。马克西米利安试图维持和平；他极重视同瑞士人的和睦相处，因为他想利用他们的雇佣军为自己的征战效劳。他想把帝国改革扩大到瑞士联邦的企图，加上局部的对立——其

① Hofkanzlei，在古奥地利，为处理司法行政的中央机关，同时也是最高法院。——译者

中包括在格劳宾登的，尤其在恩加丁和明斯特河谷的有争议的哈布斯堡王朝统治权，——结果在引起地区性的小冲突之后，又爆发了战斗，战斗中瑞士人压倒一切对手。福拉尔贝格人和蒂罗尔人在弗拉斯坦茨附近遭到失败，在上芬奇高的卡尔文战役的结局也是不利的，施瓦本人在施瓦德洛（康斯坦茨附近）和比尔斯河畔的多尔纳赫败北。在巴塞尔和约里，奥地利对格劳宾登的各种统治权虽然得到承认，然而，瑞士联邦和与他们结盟的地方实际上脱离了帝国。法兰西利用这个形势，企图在米兰公爵领地立足，路易公爵（"摩尔人"）被俘，他曾长期巧妙地玩弄手腕，使邻近的大国相争而从中渔利。1504 年，马克西米利安不得不把米兰分封给法兰西国王，以便至少在表面上保持这块公爵领地属于帝国的假象。当然，马克西米利安在此期间改善了他在意大利东北边境的地位。尽管威尼斯共和国在外交上百般从中作梗，国王在他家族的阿尔贝特系最后一个成员格尔茨的莱昂哈德伯爵逝世之后，仍然成功地把普斯特尔河谷的"格尔茨的前伯爵领地"和包括伊松佐河畔的祖传城堡在内的"后伯爵领地"收归奥地利家族（1500 年）。如果格尔茨成为威尼斯所有，奥地利就难以在的里雅斯特和内伊斯特利亚保住自己的阵地。在这位格尔茨人逝世之前同他和他的首领维吉尔·冯·格拉本签署的条约性协议，为马克西米利安的占有做了准备。 159

在格尔茨取得外交上的胜利以后，紧接着又在普法尔茨战争中取得军事上的胜利，这次战争是由于普法尔茨人和慕尼黑的维尔特斯巴赫家族为争夺已经灭绝的兰茨胡特系的领土而爆发的。马克西米利安支持他的更有资格要求继承权的内弟巴伐利亚-慕尼黑的阿尔布雷希特，在这以前，巴伐利亚各等级议员已请求国王出面就争端做出裁决。阿尔布雷希特公爵答应把蒂罗尔的因河

谷地的巴伐利亚的那一份奉送给国王，以报答马克西米利安的支持。因为普法尔茨人不顺从，他们就指望法兰西的帮助，并且还招募了波希米亚的雇佣兵，于是爆发了战争；马克西米利安在战斗中得到施瓦本同盟的支持，占了上风。他在文岑贝格亲自参战，骁勇异常，打了胜仗（1504 年），并借助重炮攻克库夫施泰因。他为装备重炮花费很多心血和金钱。胜利后，马克西米利安得到巴伐利亚割让的库夫施泰因，基茨比海尔和拉滕贝格，就把它们拼入蒂罗尔邦；普法尔茨人不得不让出哈格瑙和奥特瑙的管辖权。为此，他们得到后来称之为上普法尔茨的雷根斯堡以北的地区作为补偿。无论如何，继承权争端的解决是马克西米利安的一项显赫的成就。

1506 年，美男子菲利浦本应继承意料不到的西班牙继承权，然而，他还在当年就已去世。对他的未成年儿子卡尔和费迪南实行监护的阿拉贡政府多方推行一种违背马克西米利安利益的政策。当时，德意志国王正在筹备一次进军罗马；只有皇帝加了冕，马克西米利安的大孙子卡尔才有条件在他活着的时候加冕而成为国王，以及确保帝国的统治权掌握在奥地利家族手里。然而，此举为威尼斯所妨碍；共和国阻止了这位统治者过境。于是，马克西米利安(1508 年 2 月 4 日)在特兰托采用了“当选罗马皇帝”的称号——这样一来，皇帝的显赫地位便同罗马和教皇分开。此后，罗马—德意志国王在当选之后立即自称罗马皇帝。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因为这次带兵进军罗马没有成行而高兴，他没有认识到马克西米利安所采取的步骤的后果，马克西米利安本人也可能没有充分意识到他这个行为的深远影响，然而，估计他担心的是皇权从德意志分开而转让给法兰西。

160 马克西米利安不能饶恕威尼斯人妨碍他进军罗马，他想洗雪

对他的人格和尊严的侮辱，便对共和国举行一次组织得很糟糕的进攻；于是由此而爆发了多年的弗里奥尔战争，这次战争使双方都付出惨重的牺牲，使马克西米利安的活动自由也瘫痪起来。皇帝在战场上成就很少，但是，他的女儿玛加丽特搞成了一个"康布雷同盟"，这是一个同法兰西、教皇和西班牙的同盟，威尼斯在陆地上是对付不了的。然而，法兰西人在阿尼亚德洛告捷因而有变得过份强大之虞，这时教皇改换门庭，同盟的其他多数成员追随教皇，英国和瑞士人也反对法兰西；皇帝对是否参与这一转变犹豫不决。当尤利乌斯二世得病时，马克西米利安——在毕安卡·玛丽亚死后又成为鳏夫——似乎有一个虚妄的计划，自己想争取教皇的地位，作为皇帝，他想让位给他的孙子卡尔，另由富格尔家族资助他以巨款贿赂红衣主教，竞选教皇。然而，教皇又康复起来，于是再次发生阵线的变换。法兰西现在同威尼斯合作，相反，马克西米利安却成功地纠集一个反法兰西的大联盟。他率领一支有很多德意志雇佣兵参加的英军，在吉内加特（或特卢安）打了胜仗，三十四年前，他曾在这里争得最初的几个军事桂冠；但是，他无力从法兰西人手里把米兰夺过来，法兰西人在马丽尼亚诺战胜瑞士人（1515 年）之后，还在米兰坚守了十年。同盟成员纷纷离异，最后在布鲁塞尔缔约了和约（1516 年）。两年之后，同威尼斯议和。多年斗争的结果是，改善了伊松佐边界，其次是夺得了科蒂纳·达姆佩佐地区和"韦尔施边陲"：阿拉、里瓦、托波勒、罗韦雷托等地方。另一方面却丧失了在弗里奥尔的奥地利老领地波尔德诺内。一直坚守到最后的维罗纳也不得不撤出。

在马克西米利安执政的末年，东方在皇帝的政策中又起着较大的作用。这时需要坚持 1491 年赢得的、1506 年在炫耀军事实力之后得到了肯定的、尚在亚盖沃王朝统治下的斯特凡和文策尔

的皇家领地的继承权。如同在勃艮第各领地和西班牙的事例一样，马克西米利安力争通过家族结合来补充政治上的合作。在放弃支持德意志骑士团进攻同样处在亚盖沃家族统治下的波兰之后，他如愿以偿，办法是在维也纳同时举行了两个婚礼(1515年)，在这之前，在一次盛大的诸侯大会上曾进行了长时间的外交谈判。马克西米利安收养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国王弗拉迪斯拉夫第二的儿161 子、十九岁的路德维希，使他也可望获得德意志王座——这很难认为是可以当真对待的事情。匈牙利王子和马克西米利安的孙女玛丽亚结婚；皇帝和路德维希十二岁的妹妹安娜走向圣坛举行婚礼。但是，如果在一年之内马克西米利安的两个孙子之一，费迪南或卡尔，决定同安娜结婚的话，第二对结合就无效。1516年，费迪南发表了一个相应的声明。

十年后出现的继承，以及马克西米利安与勃艮第通婚和菲利浦与西班牙通婚在国家政治上引起的后果，为下述既流行民间又带有恶意的观点提供了基础：即把哈布斯堡帝国看成是一个异质成份联婚而形成的产物，这种看法表现在仿照奥维德[①]文句(«女英雄»13,84)而写成的虽著名但往往被糊里糊涂地引用的诗句里："Bella gerant alii, tu felix Austria nube, Nam que Mars aliis, dat tibi regna Venus。"[②]单靠联婚是不能达到目的的；马克西米利安生前的事态的进程就显示了这一点，例如在涉及布列塔尼时情况就是这样。人们不得不用武力去征服或者至少会用武力去保卫王朝所要求取得的地区。

的确，哈布斯堡家族权力增长的倾向在马克西米利安推动下

---

① 奥维德(Ovid)古罗马诗人(公元前43年—公元17年)。——译者

② 拉丁文，意为"让别人从事征战吧，幸福的奥地利啊，你燕尔新婚吧！"——译者

表现得最为清楚，他也想以此来最好地为帝国和德意志人民的繁荣强盛效力。虽然在他的祖先中由于妇女继承权的影响，罗曼人和斯拉夫人的素质远占优势，但是，马克西米利安对德意志人民有一种休戚与共之感，他一再用热情洋溢而又富有民族色彩的语调召唤德意志人民的领导阶层。皇权的光辉在他父亲时代似乎已经黯然失色，马克西米利安使之重获生机。他的行动尽管不总是卓有成效的，但多数给人印象深刻，这位统治者善于利用有效的政治宣传，为此，他慷慨地笼络许多宫廷艺术家和学者。关于哈布斯家族世系的详尽而又夸张的论文也旨在为王朝和个人增添光彩。但是，马克西米利安对于文化和艺术缺乏真正而直接的兴趣。作为收藏家和文学艺术的倡导者，他超过哈布斯堡家的一切前辈。

马克西米利安在他执政的后期，力争使他那个从 1516 年以来既在西班牙也在尼德兰掌权的孙子卡尔当选为罗马国王。皇帝的逝世(1519 年 1 月 12 日）暂时妨碍了这种努力的成功。哈布斯堡家族是否能保住皇冠似乎没有把握，他们的强大势力吓坏了选帝侯们；哈布斯堡家族的德意志世袭领地同卡尔第五的西班牙一尼德兰统治的关系也还需要调整；这个问题又同在卡尔第五和他的 162 兄弟费迪南之间分配哈布斯堡领地的问题密切相关，后者对待很多德意志诸侯比起沉默寡言、令人捉摸不透的卡尔，显得更为友善。马克西米利安发表 1508 年宣言之后，人们就可以谈到选举皇帝，候选人的数目相当大，最后，竞选活动演变成为卡尔第五和法兰西的弗朗索瓦第一之间的一场尖锐斗争；这位哈布斯堡人由于富格尔家族的金钱，施瓦本联盟的军队和人民仇视法兰西的情绪而获胜。在连续三个哈布斯堡人登上罗马一德意志皇座之后，他的家族的权利被视为是合法的，这一点对他也有裨益。

在当选之后，卡尔第五立即得到一块地方，这块地方如果能牢

牢掌握，对巩固奥地利和哈布斯堡在南德意志的地位有决定性意义。符腾堡的乌尔里希公爵在进攻帝国直辖城市罗伊特林根之后，同施瓦本联盟发生冲突，联盟攻占了他的领地，并把它作为战费的赔款转交给皇帝。哈布斯堡家族在西南德意志的大片领土，以及阿尔萨斯同东阿尔卑斯各邦之间的广阔的陆桥似乎有了保障。然而，当哈布斯堡家族的力量为土耳其战争所束缚时，1534年符腾堡又丧失给它原来的统治家族。

在法兰克福选举之后，治理帝国内部的哈布斯堡世袭领地，还需要在卡尔第五和费迪南之间进行协调。在沃姆斯条约（1521年）里，下奥地利和内奥地利各邦被许给费迪南。在起初保密的第二个布鲁塞尔协定（1522年）里，蒂罗尔，符腾堡和前奥地利也划归费迪南管辖。此后，哈布斯堡家族就有两个支系，奥地利—德意志系和西班牙—尼德兰系，罗马—德意志皇冠暂时也同后者联结在一起，领导权——考虑到地理大发现时代西班牙王朝权力的极大扩张——肯定也是落到它手里。不过，费迪南1516年就已声明愿意与亚盖沃的安娜结婚，在他们完婚（1521年）之后，奥地利支系保住了自己继承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权利。

在这期间，还是在费迪南外出的时候，下奥地利各等级，尤其是贵族和维也纳城群起反对国君的执政府即马克西米利安设立的行政管理机构。它的成员被指责受贿，甚至背叛，其中最高首领格奥尔格·冯·罗塔尔，宰相约翰·施奈特珀克博士和维也纳主教斯拉特科尼亚起着领导作用。一个激进的反对派在维也纳得势之后，各等级的多数派就成立了一个新的执政府。在这个新的执政163府里，可以遇到在弗里德里希第三统治下就已经出人头地的家族的姓氏，如普赫海姆，埃青，以及维也纳城法官汉斯·里纳和被看成是实际领袖的大学教授马丁·西本比格尔。新执政府得势后，

旧执政府的成员逃到维也纳新城。在其他邦里，各等级议员行事比较谨慎，而在蒂罗尔却燃起农民骚动的怒火。1522年6月，费迪南大公爵从布鲁塞尔返回，动身前往维也纳新城，主持一个异邦人占多数的法庭，它将在新旧执政府之间作出抉择；不出所料，法庭赞同旧执政府；新执政府的行动被宣布为非法，它的八个领导成员被处死。维也纳城丧失很多自由，丧失大部份自治权，也不得不放弃它的裁判权和货币铸造权。它在十五世纪期间以及以前也往往表现得令人印象深刻而突出的政治独立意志——被摧毁达几个世纪之久。但是，各等级议员输掉了一个大战役，即自从发难反对阿尔布雷希特第一失败以来的第二个战役。

各等级的纷争仅仅是一个更严峻和更大牺牲的冲突的前奏。在1524年至1526年间，哈布斯堡各领地为迅猛爆发的农民起义所席卷，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就是这些农民起义登峰造极的表现，以前就有过许多迹象和先兆，人们可以把1470年克恩滕的农民联盟和1515年内奥地利的农民战争看成奥地利土地上最重要的迹象和先兆。同时情况也表明，由于路德的推动(1517年)而掀起的宗教运动在奥地利也站住了脚跟，虽然费迪南第一在1523年曾企图用取缔宗教改革论著的禁令来对付来自维滕贝格的宣传。不过，在奥地利世袭领地也同在帝国里一样，社会运动和宗教运动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

关于中世纪晚期奥地利农民的法律关系和经济关系的一般发展将另作叙述。租税的增加，徭役的提高，对外敌防范之不足，是内奥地利农民骚动期间发表的抗议书中明显地提到的。但是，现在人们不仅反对破坏旧的习惯，而且企图按照《圣经》的精神来实现"上帝赋予的权利"。

1525年的运动，在奥地利地区是由蒂罗尔率先搞起来的，这

个领地的农民状况并不过份地坏，但是，那里的人们对费迪南第一
164 的宠儿西班牙人加布里尔·德·萨拉曼卡特别不满，他善于在管理财政时从这个邦榨出巨额款项来。起义由释放布里克森的渔民彼得·帕斯勒开始，这个人同一位竞争者发生争执，并作为"谢绝者"领导农民械斗，反抗那个竞争者和那个拒绝给他法律援助的布里克森当局；他在反抗中被俘。在帕斯勒被释放，不满者的力量经过初步考验以后，运动席卷整个领地。不久就得到广泛承认的起义领袖米夏埃尔·盖斯迈尔——他比弗洛里安·盖尔或十分自私的格茨·冯·贝利辛根更有资格——可以被称为农民战争中最杰出的人物。他在"蒂罗尔邦法规"里，企图创建一个纯农民结构的新国家。这是一种乌托邦，然而，个别的要求，如矿山国有化，国家垄断商业，农业自给自足等给人以现代的印象，引人注目。作为农民领袖，只有盖斯迈尔看到了斗争的外交方面，他同瑞士联邦和威尼斯建立了联系，干涉了萨尔茨堡的斗争，他在逃往威尼斯后，最后被一个被收买的刺客击中身亡。除了盖斯迈尔外，在蒂罗尔还有一个温和派，它宣布了美朗六十四条。它要求统一的农民权利，邦议会中的农民代表试图使美朗纲领获得通过。其中几点已经实现；但是，此时邻近几个邦里的农民被打败，对谈判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新的邦法规（1526 年）几年以后（1532 年）又作了对农民不利的修改，不过，他们地位的改善并非完全化为乌有。美朗条款终于在邻近领地格劳宾登，略作改动就被写入领地的法规里。

在萨尔茨堡发生过两次起义（1525/26 年）。"萨尔茨堡普通行政区二十四条"具有很高的思想水平，说明它出自能人的手笔。萨尔茨堡人在施拉德明也取得一次对施蒂里亚等级议会派来的军队的军事胜利；然而，激进分子的再次起义却是一败涂地。初步达成协议的种种规定被取消，矿工组成的革命运动中心施拉德明城

遭到破坏；它的城市权利在400年以后才恢复。除了在阿特尔高和下奥地利某些地区有一些意义不大的运动外，其余各邦十分平静。除了蒂罗尔取得部份成功以外，奥地利各邦的农民运动也彻底失败，不过，这里农民的地位至少不象在帝国起义区域内那样明显恶化。

镇压起义农民的最后战斗尚未结束，对土耳其人作战的莫哈奇战役(1526年8月26日)失败和国王路德维希第二身死的消息已经传到维也纳。波希米亚、匈牙利及其邻近地区有可能成为哈布斯堡家族所有，前提是费迪南大公爵善于实现他在1491年和1515年条约中的权利，同时有效地抵抗土耳其人。建立和保持一个多瑙河各领地的君主政体联盟是摆在哈布斯堡家族奥地利支系面前的方向性目标；实现这一任务是以后几个世纪奥地利家族政策的一项主要内容。 165

中世纪晚期的移民

奥地利中世纪前期是扩大土地和加紧移民的时期。紧接着的时代就不是这样。十三世纪末前后，许多地方的村镇和耕地都被放弃了；领主的土地清册上提到无数“不毛”之地，农宅空无人烟，残破失修，更多的是荒废了的田野。许多在中世纪前期的文件中提到过的村镇，以后的史料根本就再也没有提到，所有这些村落都被遗弃了，有用土地转为邻居所有，或者被领主们改用来放牧。在一些土地清册上称之为“合法占有的无主土地”而被耕种的土地上，还可能指望某些低微的收成。高山上的常年垦殖点变成高山牧场；在仍保留下来的村镇里居民无论如何有所衰减，其他较大的垦殖点则由于人口流入而居民再度增加。就在中世纪晚期垦殖缩减时，我们在很多地方发现有无数在乡村赁屋居住的小工，也有

无地的居民("客居者"),这说明,尽管存在着上述主导倾向,不少地方可资利用的土地一直太少。

人们常称被抛弃的村落和有用土地为"荒野",它的百分比相当大,在奥地利地区东部广阔的地带尤其显著。在维也纳盆地,在中世纪晚期有将近百分之三十的村落变得荒无人烟,在马希费尔德相应的数字也是很高的。在施蒂里亚,特别是在东施蒂里亚地区,荒野很常见,在这个邦的西部,荒野非常罕见。十三世纪末以来,在上奥地利的豪斯鲁克也有很多荒野,在那里的自耕农的小地产区里尤其如此。

166 在中世纪晚期,荒芜现象不仅局限在奥地利境内,这种大量荒芜以及荒芜过程的区域性动荡的原因,大部份还搞不清楚。造成这种现象的种种条件已经考虑到,以后还要谈。无论如何在拓殖成绩卓著的地区,荒芜现象特别怵目惊心。事实上,十三世纪后期,垦殖活动在奥地利下降了,如果不是完全绝迹的话。在这个世纪末,由奥地利向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南部边缘地区的移民活动有了发展;匈牙利西部的德意志人比以前更加崭露头角,尤其在厄登堡,维泽尔堡和普雷斯堡。十四世纪初,上克恩滕的奥尔滕堡伯爵终于开始在克赖因边境森林区向克罗地亚方向开发;随后,戈特舍的德意志人逐渐减少,到二十世纪时由于改移他处,德意志人才逐渐消失。在南蒂罗尔,德意志人继续向博岑①的低地和费尔森谷地推进,其他移民也在国境的另一边的威尼斯的七区乡和十三区乡(Sieben und Dreizehn Gemteinden)②扎根;一半由于学者间的辗转相传、一半由于民间的辗转相传,导致后来不正确地把这些移

① 即今意大利的波尔萨诺。——译者

② "七区乡"和"十三区乡",地名,在意大利威尼斯北部阿尔卑斯山南麓,居民操德语。现已罗曼化。——译者

民活动归结为基姆贝尔人的迁徙。十四世纪时，瓦尔泽人的移民活动还在继续。当然，移民村落和耕地的形式在这一时代没有多少新创造。人们经常发现相当有规则然而却很松散的布局，即排、行状村庄。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中世纪晚期城市移民的发展。尤其是普热米斯尔·奥托卡尔和最初的哈布斯堡人，作为奥地利土地上的城市创建者，或者说，在有计划地扩建旧设施方面，表现得相当突出。这里应该提到施蒂里亚的几个城市，如穆尔河畔的布鲁克，莱奥本，克尼特尔费尔德，哈特贝格；大约在同一时间，克恩滕的格明德，沃尔夫斯贝格，圣安德烈和圣莱昂哈德，首次被称为城市，而且可能当时就有了城垣，后来又被扩建。瓦尔欣的弗里德里希第二大主教（1270 年—1284 年）在恩斯河谷建立了拉德施塔特，1289 年，这个地方也得到与其他大主教辖下的城市相同的权利。在奥地利地区的西部，布卢登茨十三世纪末被称为城市，并制定了相应的法规；布雷根茨是罗马时代福拉尔贝格邦的最重要的居民点，到十四、十五世纪时才恢复城市的职能和法律地位。在今日奥地利的东部，艾森施塔特 1373 年得到城市的权利。在蒂罗尔，美朗，施特尔青①，利恩茨，基茨比海尔和库夫施泰因，在中世纪晚期才得到城市的地位，但它们作为居民点，历史则要悠久得多。我们看到，这里的城市多数是小城市；在这个时代，有机的逐步增长和有意识的城市规划都没有超过有限的规模，有时失败是很明显的。奥托卡尔用以对付匈牙利的边防要塞马尔歇格，从未能充满它那设计过大的城墙圈。等级议员的首领乌尔里希·冯·埃青的领地中心施拉滕塔尔，尽管享有城市的权利，但依然是一个农村性质的无足轻重的居民点。十三世纪下半叶时，弗克拉布鲁克被称为集镇，公爵阿 167

① Sterzing，即今意大利的威皮托诺。——译者

尔布雷希特第二把它提升为城市，然而，它始终是一个财政拮据的小城，如同格蒙登一样，与上奥地利的七座邦君城市中的较老一些的城市相比，它更小，人口也更少。但是，几个后来扩建的集镇和城市有着给人深刻印象的布局，例如，蒂罗尔的拉滕贝格(1396 年的城市设计)，它原有的面貌基本上保存至今。四方形的、往往近乎正方形的广场具有十四世纪形式的特点。奥地利中世纪的房屋形式很少保留下来，不过，最古老的描绘城市的风景画提供了充足的直观材料，如装饰阿尔布雷希特圣坛的大师所画的水彩画中的维也纳风光(1439 年)，苏格兰人修道院的绘画(1470 年)，舍德尔的世界编年史 (1496 年) 和在克洛斯特新堡的巴奔堡家族的族谱(1497 年)。这些画展示了高山墙的房子，上层往往突出，空间利用得很充分。相应地，街道往往很窄，光照很差，卫生状况不佳。建筑密度过大和木板屋顶都能助长大火的蔓延，造成了巨大的祸害，如在维也纳，1276 年，1326 年和 1525 年均曾发生大火。

城市居民点中人口变动的景象比农村好些。据我们掌握的可靠资料，在中世纪的城市里，死亡人数就超过出生人数；埃内阿·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明白地提到维也纳手工业家庭孩子很少。但是，城市通过农村人口的流入来弥补这一短缺；在 1276 年鲁道夫国王的国内和平法令中或弗里德里希第三的施蒂里亚邦证书(1445 年)中对付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规定，依旧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成就，十四、十五世纪农产品的价格和倾销危机尤其加剧了向城市的迁徙。所以，我们恰好在城市附近发现许多地方荒芜，这并非偶然。一般地说，中世纪末期城市人口达到了工业化开始前的数字，只是略有增加。中世纪晚期，城市人口大约占奥地利各邦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到十五；然而，城市的经济地位，往往也包括政治地位，它的强大却是这个数字对比所无法表述的。

此外，中世纪晚期人口变动并没有显示静止的景象，所以如此，除了战争的破坏和局部的灾难（火灾，水灾）外，首先是那个时代的大瘟疫。1348 年至 1349 年的“黑死病”造成巨大的牺牲—— 168 这是肯定的，尽管这份或那份史料的报道有所夸张。据审慎的估计，百分之二十五至百分之三十五的欧洲居民成为这次鼠疫灾难的牺牲品。在奥地利，疫疠猖獗可怖，的确，宣布的数字——在维也纳有四万人死亡，可能包括近郊——难以同事实相符。在传染病渐减以后，在瘟疫发源地疫情依然未除，于是，不断重新爆发新的瘟疫；据记载，1381 年在维也纳有一万八千人死于疫病，1399 年，1410 年至 1411 年，1436 年和 1521 年，也都是疫情严重的年份。这些灾祸的规模，可用对病因和疾病传染的无知来加以解释，以及可用不充分的措施、甚至是荒唐的反而助长传染的措施来加以解释。作为瘟疫伴随现象的自鞭教徒的游行和对犹太人的迫害，反映了给居民留下的恐怖印象，他们无所措手足，因而逃遁到宗教的狂热中去。大灾之年，1348 年年初的大地震，多布拉奇和格尔利岑的山崩，以及菲拉赫教堂的坍塌，同样造成很多人伤亡，大大加剧了普遍的混乱。人口大量损失之后，到十四世纪中叶时，没有过剩的人员可去殖民；要弥补这些损失相当难；象鲁道夫第四这样一些有魄力的国君企图通过税收上的优惠来促进城市里的建筑活动，但也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成就。

同瘟疫、械斗、战争、歉收和大群蝗虫入侵联在一起的是饥荒。大量运输粮食是困难的，需要时间。富裕地区和短缺地区之间的调济只能时断时续。1277 年，严重的饥馑笼罩着克恩滕和施蒂里亚，甚至人吃人的事件也时所有闻；十五世纪中叶，托马斯·埃本多尔弗描述了蒙受械斗灾祸的下奥地利所发生的类似情况。指出瘟疫和饥荒，械斗和战乱，以及经济危机现象，也就暗示了垦殖衰

退的各种原因。当然，在从前扩大土地的时代，也在不太合适的、收成不好的土地上设立过居民点，开垦耕地，后来又不得不避开不良的地利。在河谷里，人们遭受洪水之灾。多瑙河及其支流冲走了无数的村庄。例如，加罗林时代的居民点特赖森堡 1180 年被多瑙河洪水冲走，教区迁至普法尔基尔兴，当这里也受洪水威胁时，1343 年又移居到施托尔霍芬。在克恩滕，由于有遭受洪水的危险，旧市把（默尔桥附近）迁至萨克森堡。维也纳河平时几乎都缩

169 小成涓涓细流，有一次发洪水，却把郊区舍夫街毁灭掉。此类例子不胜枚举。

如果说在奥地利中世纪晚期的垦殖史的发展中，除了几个有利的方面外，一般地说，不利的方面似乎占据上风，但是，这无疑不能用突如其来的灾害来解释，而应该从经济的、因而也是经济政策的根本变化来解释。中世纪早期，领主阶层的权力和财富主要建立在地产和领地的收益之上，因此，竭力促进移民是符合统治者的最根本的利益的。在中世纪晚期，往往已经缺少合适的土地，而另一方面，国君和教会却找到更丰厚的收入来源，这种财源降低了对艰苦地扩大耕地的直接兴趣。实物交换经济向货币经济过渡应该这样看：它既是价值转移的前提，又是价值转移的象征。

中世纪晚期的经济生活

陈述中世纪晚期农民经济状况的史料，首先是领主们的土地清册，其次是地方习惯法记录（关于农村区乡习惯法的记录）、文件和文献中的旁证，它们反映出一幅复杂的景象。同以前相比，农业经营方式当然没有根本改变。在农产品中，小麦种植得越来越多。在森林利用方面，十三世纪已经开始有条不紊地经营林业——在大领主们的土地上尤其如此，磨坊和酿酒厂在乡村工业中已经起着

重要作用；十五世纪，已经有造纸坊和玻璃厂。在生活享受品中，啤酒日益同本地酒进行竞争，1454年，遗腹子拉迪斯劳斯发布一项禁止向奥地利输入啤酒的法令，然而，在这道禁令中，酒还是被称为奥地利的主要产品。无地的"租佃户"和乡村赁屋居住的小工为乡村工业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

在这个时代，农村的社会分化也已经十分明显；乡村无产阶级的增长在地方上可以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得出来，这是无法用禁令的规定制止得住的。农村居民的明显的社会地位的不平等也产生于农民与领主之间法律关系的悬殊。十三世纪下半叶以来，种种极不等价的土地租借区别得更为明显。最广泛流行的是限时租佃 170 (Freistift)。它一般地可以在一年期满后宣布取消租约，这样一来，佃户深受专横处置之苦。如果说，盲目地解除佃户的租约也于地主不利，那么，地主还有机会在重续租约时要求提高租税。在自己的命运捉摸不定的情况下，限时租佃农对耕耘土地也是不会抱非份的奢望的。限时租佃尤其在上奥地利，下奥地利，施蒂里亚，在克恩滕的大部份地区，在东蒂罗尔和萨尔茨堡的边缘地区，颇为常见。这种租借形式在十四世纪越来越为领主们所实行，而1300年以前，还可看到一种世袭租佃倾向。另一种租借是终老包租，即一个人或两个人，例如父与子，终身租佃。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总算一生赡养有靠，此外还有准备转交给下一代的可能。这种租借形式在巴伐利亚—奥地利边界地区，特别是在萨尔茨堡，相当流行。有继承权和赎买权的租佃对农民最为有利；这种情况下，地产有保障地留给后代，农民也往往有权支配它，即出卖或赠送，然而，一般地是把地产继承下来。在蒂罗尔，在福拉尔贝格和萨尔茨堡的部份地方，在克恩滕的德劳河上游，在施蒂里亚的个别地方，我们经常发现享有继承权的情况；在这里，无数农民向领主买到了这

种比较好的租佃。所有这一切“受约束”的租佃都是以隶属关系为条件的；自由租佃则完全不同，各等级的阶层可以不丧失其法律地位而参与自由租佃，属于这类自由租佃的首先是城堡法（Burgrecht）和山地法（Bergrecht），二者早在十二世纪就已有据可查。城堡法涉及到把城市的法律习惯扩大到地产，在城市周围这种情况尤为突出。这种租佃形式甚至渗入采邑制度，挤掉较小的采邑，小采邑还存在着个人对于领主的依附关系。城堡法则往往免除税收和徭役，主要支付的是地租和保护税。山地法盛行于下奥地利的葡萄种植区，在稍后的时代，在南摩拉维亚和施蒂里亚也有采用的。山地法是世袭的，交付的是钱和酒，交租的义务往往可以用一次付款来代替。无论如何，这种特别有利的租借形式同中世纪晚期葡萄种植和酒类贸易的繁荣有紧密的关系。

就多数租佃而言，在中世纪晚期，实物交租越来越为付钱所代替，这尤其适用于地租。农产品的价格越低，交租就越多，这种情况在十五世纪达到了令人忧虑的程度，城市工商业可以保持或提171高他们的产品价格，这对产品超过自身需要而有富余的农民等级来说，越发令人不快。因此，农民感到向地主交租的负担特别沉重。徭役也更苛刻了。胡斯教徒和土耳其人的入侵以及内部械斗引起的危险，一再要求农民为构筑碉堡出人工和畜力去效劳。领主们保护和荫庇臣仆的积极职能越来越为国家所接管。他们提高上述那种要求，与农民和领主关系的发生危机有连带关系。这种危机在十五世纪农民骚乱和1525年伟大的农民战争中达到它的戏剧性的顶峰。在较早的起义中，多半把徭役的提高、新税以及其他被认为不正当的苛捐作为要求恢复原有权利的理由。后来，宗教改革思想的影响给农民运动后来的要求带来了一个新的因素，这就是源出《圣经》的所谓“上帝赋予的权利”，农民还要求进行更

激进的改革，并拒绝交纳《圣经》中没有谈到过的租税。但是，真正具有革命性的却是米夏埃尔·盖斯迈尔提出的纲领，他要求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

与农业相反，中世纪晚期奥地利的矿业处在意义重大的蓬勃发展之中。这既适用于采盐业，也适合于金属采矿业。扩建了邦君所属的奥斯泽盐场，开采和熬制作业已经现代化。1288 年，骑士尼古劳斯·冯·勒伦巴赫受邦君的委托，在因河谷地的哈尔附近，仿效奥地利的榜样，扩建了采盐业。他也在哈尔施塔特工作过，阿尔布雷希特第一的遗孀伊丽莎白下令把那里废弃已久的盐矿重建起来。在戈绍，同样新建的晒盐场成为萨尔茨堡一次进攻的牺牲品；这个大主教区担心有人同自己那个产量高的哈来因盐场竞争。上特劳恩河谷地的矿业和土地收入归哈布斯堡家族的“国库”所有；这个地区被称为萨尔茨卡默古特[①]就与此有关。最初有一个矿务官领导邦君的管理机构；1334 年以来，一个矿长负责技术领导，一个管理人负责财政指导。他们特别重视细心经营木材生产和加工；缺乏木材对任何矿坑作业都引起生命危险。盐场工人（采矿工，熬盐工，晾晒工，木材工和运输工）有很高的等级觉悟，他们不是容易安抚的。1392 年，由于各种弊端，爆发了一次严重的起义，后被血腥镇压。但是，一般地说，邦君的采盐业经营得很好，开采量很大。

十三世纪中叶，由于在熔炼和锻造过程中有目的地利用水力和较好的熔炉，施蒂里亚的炼铁工业显著地扩大了生产。劳动力的数目与对煤和粮食的需要量同样增长。对工人供给食品和物资——即所谓“廉价品”——一般地由企业主负责；工人对这种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办法并不总是满意的，他们抱怨供应物品质量低 172

① Salzkammergut，地名，原意为“皇家专有的盐场”。——译者

劣和价格昂贵。施蒂里亚矿山开采是在因内贝格(铁矿)和福尔登贝格之间进行有计划的分工，出口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因内贝格矿向施太尔交货，再从那里多数经水路转运到德国，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福尔登贝格矿则利用大路，经转运地莱奥本，运往威尼斯。莱奥本市民在1415年成立一个按资本股份分红的销售合作社。冶炼技术的继续进步，生吹高炉的应用，威尔施锤和展锻锤的应用，十五世纪大轮盘的安装，为大规模的卓有成效的生产提供了可能。在这方面，邦君也过问了开采业和冶炼业；1448年弗里德里希第三颁布的条例，尤其是1489年—1492年的"改革"导致对工资和价格的统制，不过，对工人生活资料的供给也实行了控制。克恩滕的许滕贝格的开采意义小一些，这里的销售也由于萨尔茨堡大主教和哈布斯堡家族的对立而受影响；后者为了有利于他们的领地首府圣法伊特而企图排除萨尔茨堡的阿尔特霍芬。产量高的制铁工业依赖着内奥地利的铁矿开采，例如，因内贝格的铁就在上、下奥地利的"艾森武尔岑"(Eisenwurzen)进行加工，施太尔城的制刀匠是组织得很好、水平很高、有专长的手工业者。

铅矿开采业也相当兴旺。克恩滕的布莱堡附近，温迪施铅矿山和菲拉赫铅矿山，都有非同小可的矿藏，由形形色色较小的企业主经营，直到十五世纪末被富格尔家族挤掉时为止。铜矿多数是在有利可图的银矿开采业范围内取得的，银矿，金矿和铜矿多数蕴藏在同一个地方。中世纪晚期的采矿业中，银在贵重金属中占首位，此外，十四、十五世纪，劳里斯和加施泰因的金矿开采还起一定173 的作用。在银矿开采中，施蒂里亚的施拉德明和蔡林两地的矿山具有重大意义。它们的矿山条例为其他阿尔卑斯山的采矿地所采纳。施拉德明的矿山条例甚至写入威尼斯的矿山法。1361年，蔡林矿是一场可怖灾难的现场；一次大水突入时，据说有1400名矿

工丧生；该矿三十年后才能复工。在克恩滕，也有些银矿井，例如，在拉凡特谷，在古尔克谷，在上菲拉赫附近。贵族和市民的采矿同业公会出资开采，矿工的劳动计量付酬，也招收妇女和儿童从事繁重的矿井劳动。蒂罗尔的矿业办得最为兴旺。继特兰托和布里克森的主教之后，蒂罗尔的伯爵们也充分利用矿山开采权，不过，他们是把勘探权租让给不同的企业家。在这个邦里，十五世纪末，为数甚多的较小的矿业公司为富格尔家族所取代，他们用自己的经理人员建立了一个大规模的、统一的矿业组织。邦君的最高法院或矿山法院调解企业家和矿工之间经常发生的社会性冲突。十五世纪末，开采量最大的施瓦茨矿年产银一万二千公斤，铜二百二十万公斤。此外，拉滕贝格，施特尔青和克劳森也值得一提。这些丰富的矿产品构成蒂罗尔铸币业的基础，尤其用以铸造"铸币富翁"西格蒙德的哈尔的翁齐阿里斯币，它们开始了大银元即塔勒(Taler)的时代。银矿职工的数字是很高的，在全盛时代，连同部份参加工作的家属在内，数字高达三万人。

在研究了相当广泛的史料之后，中世纪晚期的城市及其居民的经济结构大致已为人所知。一般地说，占有财富最多的居民阶层也是政权的掌握者——只要政权不是仍然掌握在市长手中的话。例如，维也纳的市议员是大商人，地主和已经发家致富的手工业者，他们都有房产——大多数有几处房产。当然，城市里的一大部份土地是在教会手里，这也适用于多数其他城市(尤其适用于克雷姆斯，圣珀尔滕，萨尔茨堡和弗里扎赫)。市议员家族往往几个世纪一直保住自己的显赫地位。比如，我们发现，克勒贝尔家族从1208年—1417年，波尔家族从1239年—1539年，维费尔家族从1285年—1523年，埃斯拉恩从1271年—1491年，都在维也纳身居要职。诚然，面对着据说来自普雷斯堡的市长沃尔夫冈·霍尔

策这类青云直上的冒险家，这些久居本地的老家族在十五世纪中叶前后失势。货币贬值、不慎的经济和政治的投机使有世袭财产的久居市民一蹶不振；此外，维也纳从来没有象奥格斯堡那样，财富过份地集中在富格尔和韦尔塞等几个家族手里。在一些较小的城市里，个人财富形成的历史和维也纳相似。

174

手工业者在数量上大于有世袭财产的久居市民，中世纪晚期，他们已经到处组织起行会和兄弟会。邦君的禁令，最初是取缔继续操纵物价和排除竞争方面的禁令，在鲁道夫第四时代也颁布取缔行会本身的禁令，都未能取得长久的效果。行会除了行业的职能以外，也有社会的和宗教的职能；它使星期日的休息得到遵守，资助有病的会员，设法维持符合礼仪的丧葬，定期举办公共讨论会、宴会和礼拜。城市检验员检查商品的质量、规格和重量。行会的手工业者同“捣乱者”之间进行着持久的斗争，后者往往是一些精悍的工人，他们由于某种原因，例如由于是非婚生子女或不正当关系所生子女，而被排斥在行会之外；这种纷争在近代几个世纪里继续进行，愈演愈烈。在一些较小的城市里——不是在维也纳——行会章程往往要求会员必须是属于“德意志民族”的。十五世纪以来，关于职业训练的规定，即从学徒到师傅的必由之路的规定，还保留着。对待学徒往往非常苛刻，同已经组织在行会里的帮工也不断有冲突，例如，1418年至1439年在维也纳就是这样。个别的行业有一定的聚集点，部份地在街道名称中一直留传到今天（维也纳：弓匠巷，羊毛街，布店街，面包师大街等等）。然而，也往往有一些手工业和工艺作坊具有代表全城经济的特色，例如，在奥地利，锻匠，刀匠，五金匠等铁器加工业就分别成为施太尔、莱奥本、魏德霍芬和伊布斯等城市的特色。最后，城市居民中的相当可观的一部份是雇工，家庭佣人和出门做事的短工属于这类人；这些人

的权利和义务在他们自己的雇工规矩里有规定。这些规矩讲到了工资要求，新人员的录用、雇佣关系的解除，以及对东家及其家庭的态度。

那些成为社会救济负担的人，在居民的社会阶梯中处于最低层，虽然如此，人们还是把"清白"无过而贫穷潦倒的人和犯法的人区分开来。有佩戴着标识的获准行乞的人；对于行乞诈骗严惩不贷。社会堕落分子由市议会进行监督，通常由一个特定的官员——流浪汉管理员（Sterzermeister）来实施。一无所有的外乡人、流浪汉和"游手好闲的"和寻求雇佣兵差的仆役的境遇特别严重，只要有点滴可疑，就对他们严厉处置。 175

中世纪晚期的贸易还是广泛地依靠水路。这一点从多瑙河关税对邦君财源所具有重大意义中看得出来。在十四世纪时，已经利用多瑙河和因河两岸的纤道，用马拉船只作"逆流作业"，即逆水航行。横越较大的河流，大多数仍然需要摆渡。1439 年，维也纳的多瑙河的三条支流才全部架上大桥，在维也纳城和韦尔德（利奥波德城）之间的支流上早有桥梁。1463 年和 1497 年分别在克雷姆斯和林茨架设了一座多瑙河大桥。湖上运输也相当活跃，比如，在博登湖上就有意义重大的货运。不过，中世纪晚期，陆路也比从前护养得好些。在颁布道路管理条例时，也责成邦君护养公路，这明确地表现在国王阿尔布雷希特第一给蒂罗尔伯爵们的一项特权证书中。人们也已精于船闸建筑；1309 年，博岑的市民海因里希·孔特尔修建了一条由博岑穿过埃扎克峡谷到克劳森的大道（孔特尔路）。十四世纪以来，蒂罗尔在开垦事业中拥有一个规模巨大的运输服务组织。通过这个运输服务组织，有规则地轮换车夫，他们往往只驾驶在较短的路程上，人们设立了适用的站（垦荒站）和客栈（大车店）。道路税给邦君带来巨额的收益，领主的关卡逐步被

撤销。

关税章程和关税登记簿现在成了我们了解贸易大道——多瑙河通道和贯穿阿尔卑斯山南北的联系线——交通繁忙程度的最丰富的史料来源。沿多瑙河顺流而下运到维也纳的两项主要货物是盐和布匹；维也纳人承担向匈牙利转运。他们的利润是巨大的。1326年，波希米亚的约翰国王曾企图排斥维也纳，把德意志贸易引向经布尔诺到匈牙利的陆路上去；但是，这条路比较长、更难走，因而未能真正被人采用。维也纳人也企图对外国商人封锁经蔡林和塞默林的南北联系线；这样就使布拉格和布雷斯劳的贸易尤其受到打击。上溯多瑙河的货运首先是酒类，1400年前后，向南德意志出口的酒大约为一百万公石；参与货运的除了维也纳人以外，也有克雷姆斯、伊布斯、克洛斯特新堡和上德意志的商人。当1390年帕绍城获得酒类堆存权时，维也纳人就不得进入上德意志布匹市场，过了一些时候，此举对维也纳的贸易产生令人相当不快的影响。奥地利对匈牙利的输出包括大部份的转口商品，下奥地利和西德意志的纺织品，以及本地的铁制品。木材出口受到奥地利邦君们禁令的阻遏，他们想保护森林，林木仅限于满足自己的矿山建设和奥地利建筑及燃料用材的需要。中世纪晚期，从匈牙利进口的主要也是活牲畜，其次是肉类和皮革。十五世纪中期的混乱和帕绍的商品堆存权损害了奥地利的贸易；1400年前后，维也纳的贸易量相当于奥格斯堡的贸易量，而1500年左右则降到奥格斯堡销售量的二十分之一。维也纳的商品堆存权原是城市繁荣发达的基础，然而再也坚持不住，1515年不得不放弃。

176

从德意志到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山过境贸易，部份地依赖对南方的盐运；亚麻和羊毛也输往意大利，从那里运进丝、酒类和东地中海沿岸的棉花。由蒂罗尔向两个方向输出铜，反之，银的出口不

利于邦君铸造硬币，因而课以高额的关税予以限制。穿过萨尔茨堡一克恩滕隘口的大道，就其本身来说，来往行人比蒂罗尔大道少，但对意大利和波希米亚之间的贸易具有某种意义。蒂罗尔主要商业集散地是博岑，它的交易会在中世纪末期还有重大意义。在多瑙河地区，林茨的市场有着相似的职能。在这里如同在那里一样，以物易物的商品交换在各地开始逐步让位于货币和汇兑的流通。货币经济的侵入从根本上说是我们时代的特点，但是，这个过程在奥地利比在西方和南方进行得慢一些。对哈布斯堡各领地来说，令人忧虑的是维也纳分尼的贬值，因为停止使用臭名昭著的劣币（1359 年）后，情况也没有改变。由于昂儒国王的禁令，在这以前，维也纳的货币就已经被挤出流通领域，不久，匈牙利的金盾——至少作为计算单位——就盛行于维也纳市场。在弗里德里希第三和他的兄弟斗争期间（尤其在 1456 年—1460 年），随着"新德林"[①]时代通货膨胀现象的出现，维也纳分尼币的重要性就彻底完结。在奥地利西部地区，分尼币也贬了值，但是，在十三世纪，这里的人认为四分尼币（印有双十字，因而后来称为"十字币"）是一种适用的小硬币；十五世纪，哈尔的翁齐阿里斯币（1484 年）被铸成大硬币，它后来成为波希米亚和萨克森的"塔勒"的楷模。1524 年，在哈布斯堡的世袭领地里，费迪南第一颁布的维也纳货币法规终于规定以银为本位，在哈布斯堡的世袭领地里实行统一的塔勒货币。同年在埃斯林根制订的帝国货币法规没有在奥地利实行。

奥地利西部在信贷经济方面领先。迈因哈德第二在博岑和布里克森建立信贷银行，并与意大利的银行进行信贷交易。后来在十五世纪中叶，主要是上德意志人在奥地利各邦从事大规模的钱 177

---

① "Schinderlinge"，劣币的绰号，参见本书 189 页。——译者

汇和外汇业务。教会关于不许追逐利息的禁令在当时早已不为人尊重，此外，犹太人在银钱和典当交易中的重要作用，随着1421 年的大迫害，已经结束很长时间了。

奥地利中世纪晚期的精神文化

就整体而论，在中世纪晚期，文化创作不再象前一时代那样受教会的支配。世俗文化的解放取得进展，它的基础也比从前更广阔了，城市市民，大学学者补充了教会和贵族-宫廷界人士的创作。在维也纳大学创立之前，大教堂学校，寺院学校和教区学校等宗教教育在奥地利教育事业中具有决定性意义。中世纪晚期，这类学校的数目增多了，我们发现，在较小的地方也有此类学校。奥地利最重要的教区学校，维也纳的圣斯特凡学校，改变了它的类型；当公爵阿尔布雷希特第一于 1296 年放弃学校保护权时，它成为一所市立的中学。市长和市议会决定校长、发放教员的薪俸。在 1446 年的学校法规中，已经提到五所学校，除了大学和斯特凡学校以外，还有苏格兰教堂学校，圣米夏埃尔学校和市民医院附属学校。此外，1446 年的维也纳学校法规也使人能了解到教学方法的梗概，并且显示出与中世纪前期的办学方法在原则上的一致，只增加几种新教科书到那些久经考验的著作中去。十四、十五世纪，在大多数其他奥地利城市也有类似的拉丁文学校。重要的师资并不缺乏，几乎全为教会界人士。1300 年前后，医科学士乌尔里希在维也纳工作，他也是个医生、画家和诗人，流浪学生的诗歌称颂他为遐迩闻名的教师。康拉德·冯·梅根贝格在 1342 年后任斯特凡学校校长，又是重要的翻译家，有责任感的政治评论家，这证明了该校地位的重要；该校在大学成立后，还能够在维也纳的精神生活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在奥地利的寺院学校中，在 1300 年前后，

圣弗洛里安和克洛斯特新堡取得了重要的科学成果——后者在十五世纪成就尤其显著。

随着维也纳大学的创立(1365 年)，奥地利的文化出现了新的因素。维也纳大学是继布拉格大学（1348 年）之后在中欧成立的第二所高等学校，最初在布拉格大学的教师和学生当中同样也是德意志人占优势。另外，维也纳大学也是继重要性略逊一筹的特雷维佐大学(1317 年)之后，哈布斯堡家族创办的第二所大学，特雷维佐属于美男子弗里德里希的权力范围。当然，为使维也纳大学能够有力地发展，首先需要由阿尔布雷希特第三倡导改革（从1383 年开始)，向巴黎招聘教授和批准建立神学系。公爵豪爽豁达，慨然允许大学逐个制订自己的章程；后来，这项工作得以实事求是地在短期内完成。该大学的根本法（1385 年的总章程，1389 年的各系章程）几乎未作修改地施行了大约一百七十年。听课者迅速增加,不久就越过千人大关。在分为四个“民族”(毋宁说是同乡,奥地利的、匈牙利的、莱茵区的和萨克森的民族)的大学生中,南德意志人和哈布斯堡—奥地利各领地的听课者占优势;北德意志人为数很少。 178

在 1383 年到大约 1450 年期间，维也纳大学在当时的思想大辩论中表现得很突出,首先,它有出类拔萃的神学和自然科学的代表人物。这里首先应该提到海因里希·冯·兰根施泰因,黑森人,在来自巴黎的教师中,他最活跃;他作为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所获得的权威几乎同作为唯理主义神学家和保守的国民经济学家所获得的权威一样。同属这一代人的有，著名的布道演说家和教义学者尼古劳斯·冯·丁克尔斯比尔，海因里希·托廷·冯·奥伊塔和格哈德·冯·卡尔卡。除了多明我会修士、神秘论者约翰·尼德尔以外，维也纳大学的大神学家都是经院哲学的代表，而且还属于

奥卡姆主义[1]的“现代方法”派，当然，其形式比较温和。在1400年以后的半个世纪里，同天文学比较起来，神学是落后了；约翰·冯·格蒙登，格奥尔格·冯·波厄巴赫和约翰内斯·雷吉奥蒙塔努斯（米勒）合称三巨星——两位上奥地利人和一位法兰克人——使维也纳天文学派在欧洲取得重要地位。约翰·冯·格蒙登的天文图表，波厄巴赫关于日蚀和月蚀的著作，他的正弦计算发现，最后，雷吉奥蒙塔努斯——他后来在纽伦堡建立了德国第一个天文馆——的星历表，实际上是自然科学发展的里程碑。来自帕多瓦的加勒阿佐·德·圣索菲亚和他的本地学生约翰·艾格尔置教会方面的忧虑于不顾，破天荒地在解剖学上用人的尸体进行示范教学。十五世纪后半叶，由于产生了不利的政治局势，维也纳大学失去很多学生，大概经院哲学和人文主义之间的辩论也导致教授间的个人磨擦，新事物只有得到宫廷的大力支持才得以立足；马克西米利安和高级监督贝恩哈德·佩格尔·冯·施太因茨之间的个人信赖关系是举足轻重的，后者按照人文主义精神进行大学改革。在 Alma mater Rudolfina（鲁道夫大学[2]）之外，新思想早就传播得更快。

179

中世纪的文献显示出祖国语言获得进展，这首先是同能读会写的人的范围有所扩大相一致的，但是，拉丁文献依然为数不少，而且在十五世纪中叶，可以看到，在人文主义的影响下，有一种重新倾向拉丁风物的强烈转变。这个时代开始时，即在十三世纪里，在拉丁文作家中，学识渊博的西斯迪显教团修士古托尔夫·冯·海利根克罗伊茨占据首位；他除了一篇关于教会法的论著和一本拉

① Occamismus，即英国经院哲学家威廉·奥卡姆（William Ockham，1270—1347）所创立的学说，他是中世纪后期唯名论的建立者。——译者

② 即维也纳大学，该大学为鲁道夫第四所创建，故名之。——译者

丁文法以外，他还写了两部关于他那时代的很有启发性的历史著作，即：《圣物迁移记》和《1264年—1279年的历史》。前者论述圣徒遗物由布拉格转移到维也纳的经过，书中对维也纳城作了简要的描写，还有很多不可磨灭的、激发乡土之情的锦句，赞美醇酒，多瑙河和山水美景。两部作品都是研究奥托卡尔统治时期历史的重要资料。古托尔夫的第二部著作属于奥地利寺院编年史一类，中世纪晚期，这类著作仍然为数不少。值得一提的有原属于克洛斯特新堡的《文多波纳续志》和维也纳多明我会编年史（《布道会续志》①）。在克雷姆斯明斯特史料中包含很多巴伐利亚—奥地利早期历史的传说，最重要的是克雷姆斯明斯特僧侣贝特霍尔特编撰的编年史，这部编年史以前曾被人说成是"诺里孔人伯纳德"所作。克恩滕的维克特林修道院长约翰在《信史》中立下了十四世纪史学、甚至也可以说是文学方面的最重要功绩。这位作者也许是原籍洛林人，他与格尔茨家族和哈布斯堡家族的宫廷过从甚密；他很了解情况，并善于用洗炼的词句来再现他的思想。我们要感谢他对克恩滕历史所作的珍贵说明。约翰后来所编纂的东西由《莱奥本的无名氏》留传下来，它在一种世界编年史的范围内着重强调了奥地利和施蒂里亚的历史。和约翰差不多同时，另一位博学的修道院长恩格尔贝特·冯·阿德蒙特是位多才多艺、名望很高的作者，他遗留下来的有 180 神学著作，自然科学著作和教育学著作；他的关于哈布斯堡鲁道夫国王选举的论文已经失传。在十三、十四世纪的德语文献中，世俗作者远远超过教士。我们发现，有晚期宫廷抒情诗和骑士小说文学的代表作。萨尔茨堡骑士普莱尔主要是摹仿老一些的作品；克恩滕人

① 多明我会（Dominikaner）的正式名称为"布道兄弟会"（Ordo Praedicatorum）。此处的《布道会续志》(Continuatio Praedicatorum)，实际上就是指多明会会史续篇。——译者

蒂尔林的乌尔里希，把他那洋洋大观的诗体小说《威勒哈尔姆》献给奥托卡尔国王。维也纳新城的海因里希大师出身于上层市民，他是诗人、神学家和医生，曾在维也纳居留过很久，他在那儿有自己的采邑弗赖辛格庄园。海因里希把流传得很广的阿波洛尼乌斯·冯·蒂鲁斯国王的故事，作为长篇诗体小说《阿波洛尼乌斯·冯·蒂尔兰》的内容，作者又穿插一些惊险离奇而又富于想象的故事。海因里希的警世诗《上帝的前途》则截然不同，它以基督的拯救行动和世界末日的审判做题材。此外，在奥地利地区由鲁道夫·冯·埃姆斯首倡的德语韵诗编年史的两位代表还值得我们推崇：维也纳市民扬辛的孙子扬斯和施蒂里亚骑士奥托卡尔。扬斯的诗才微不足道，他按六个时代的体系扩充而写成一部世界编年史和一部论述奥地利历史的王侯录，两部著作中的第二部是阐述最后几代巴奔堡家族统治下的维也纳的文化史的重要文献，扬斯把那个时代赞颂为“美好的旧时代”。施蒂里亚韵诗编年史家奥托卡尔的作品，仅就其篇幅而论，就令人肃然起敬，他出身于施特雷特维格领主家族，即后来的加勒尔伯爵世家；格里尔帕策曾借他的口说出了歌颂奥地利的名句，如同很多更老的历史学家一样，错误地认为这位作者出生于霍内克家族。奥托卡尔写了一部帝王编年史，后来失传，和一部洋洋十万句的长篇韵诗编年史，它在许多手稿中留传了下来，当然并不完整。在往常描述帝国历史的著作中，占据突出地位的是，从好斗者弗里德里希逝世到美男子弗里德里希执政这段时间内奥地利和施蒂里亚所发生的事件。这位韵诗编年史家尽管厌恶新主子的施瓦本随从人员，在思想上还是倾向哈布斯堡的，而且，他还活在施陶费尔的传说里。因此，对于奥托卡尔，昂儒的卡尔就是政治罪犯的原型，作者对十三世纪的教皇也没有好感。他对奥托卡尔国王的严厉而不大公平的评判是众所周知的。作为

怀有等级自豪感的施蒂里亚贵族的一员，这位韵诗编年史家也是一位宫廷盛典和古代法律风习的深情描绘者；他具有可观的史料知识。此外，奥托卡尔还对一些值得注意的自然灾异作过一些生动的报道。

早在世纪交替以前，茨维特尔地区一个下奥地利的骑士就用 181 对话的形式写了一首时评诗；作者所作的识别试验失败——人们想到诗中被称为乐师的赛弗里特·黑尔布林——人们参照那被奉为楷模的十二世纪的德意志人卢契达留斯，给这部作品取名为《小卢契达留斯》。我们这位作者的批判几乎没有对任何一个等级表示宽容，他那强烈而明显的奥地利乡土意识首先是针对外来人的。在这部著作里受到讽喻的哈布斯堡王朝，逐渐地消除了那个使它和国民离心离德的鸿沟。它的宫廷成为一个文学艺术创作的中心。快活人奥托被视为骑士歌手和象奈德哈特·福克斯一类宫廷弄臣的朋友；鲁道夫第四把象萨克森人海因里希·冯·米格尔恩那样有地位、有学问的诗人当作亲随人员。诗人把他的匈牙利编年史的德文本献给公爵，并在维也纳把《圣经》翻译成德文——比马丁·路德早一个半世纪。泰奇纳人海因里希最后也搬到哈布斯堡的首府来，他可能是上施蒂里亚人，是一位有点伤感的批评家，对周围的事物所作的批评很中肯，此外，他又是一切穷苦人和受迫害者的朋友，他的作品广为人们所诵读。彼得·祖亨维尔特是那位泰奇纳人的朋友，比他年轻，曾为他写过一篇优美的悼词。祖亨维尔特是阿尔布雷希特第三的宫廷押韵诗吟咏家，参加过后者的普鲁士之行。他的“荣誉演讲”和时事诗具有文化史料价值，尽管作者的文才很有限。

阿尔布雷希特第三的宫廷作为大量翻译拉丁文为德文的中心，也是有意义的。主持这项工作的人是阿尔布雷希特的宫廷经师

利奥波德·施泰因罗伊特,他是奥古斯丁会修士,曾在巴黎留过学。施泰因罗伊特翻译过红衣主教威廉·杜兰都斯关于天主教礼拜仪式的著作,并写过一篇饶有兴味的前言,此外,他还把卡西奥多尔的教会史翻译成德文;不过,他最重要的贡献是他自己的创作《奥地利九十五领地编年史》,这是一部荒诞离奇的奥地利上古史,它把一个光辉灿烂、幻想离奇而又完全脱离实际的过去附会于奥地利。尽管如此,这部著作有详细的人地名和年代,因此,还是有人相信的,埃尼阿·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嘲笑说,奥地利人把这部编年史奉若圣经,加以崇拜。

阿尔布雷希特第三和利奥波德第三的一位政治家、蒙福—布雷根茨伯爵胡戈也是诗人,他在泽姆帕赫战役之后接任阿尔高和图尔高行政官的重任,后来又接受施蒂里亚邦长官之职。胡戈再次复活了骑士爱情诗,在他和比他稍为年轻的奥斯瓦尔德·冯·沃182 尔肯施太因以后,骑士爱情诗就绝迹了。奥斯瓦尔德是来自格勒德纳谷地的蒂罗尔贵族,在两人中,他具有比较淳朴粗犷的诗才;漂泊动荡的命运把他引导到东方、瑞典、俄国、西欧和南欧,而且使他后来积极参加蒂罗尔贵族的起义,反对公爵弗里德里希第四。奥斯瓦尔德的强劲豪放的生活作风表现在他的作品里,我们发现除了骑士爱情诗外,在宴饮歌和格斗歌里也有他的代表作;最后,这位沃尔肯施太因人也写宗教题材。

在十五世纪,哈布斯堡宫廷依然是一个文学创作基地。阿尔布雷希特第五(第二)作为西吉斯蒙德皇帝的女婿和继承人,承受了奖励文艺活动的卢森堡传统,也接受了大量的图书馆藏书。那时,人们首次接触人文主义精神,正是佩特拉卡,由于同卡尔第四的布拉格所保有的关系,为人文主义进行了开路先锋的工作。当然,伊丽莎白皇后的宫廷女官海伦娜·科坦纳用德文写成的生动

活泼的回忆录完全不受这种精神影响，在文中，为年青的遗腹子拉迪斯劳斯而窃取斯特凡王冠一事的描写达到戏剧性的高潮。哈塞尔巴赫的托马斯·埃本多尔弗也许可以称为基本上是中世纪的思想界在奥地利的最后一位充分有资格的代表，他的内容无比丰富而方面繁多的创作是在旧经院哲学思想和新人文主义思想之间展开大辩论的紧张气氛中进行的。虽然他身负许多外交和政治使命，他的活动与其说跟宫廷勿宁说跟维也纳大学的联系更为密切，埃本多尔弗担任过该校的杰出教授，教务长和校长。这位学者的学术著作主要在神学方面，除了一篇关于以赛亚[①]的评论和其他一些圣经注疏以外，他还写了很多德文和拉丁文的说教文章。在晚年，埃本多尔弗转向史书的写作；他与亲密的故乡下奥地利的血肉联系，可以从他那带有极深刻的个人色彩的最重要的史学著作《奥地利编年史》中得到清楚的说明；我们应该感激他，他那不倦之笔还为我们写下了一部论教皇的专著，一部帝王编年史，一部帕绍主教编年史，一篇关于教派分立的论文和一部记载着他作为维也纳大学代表参加巴塞尔宗教会议的活动的工作日志。埃本多尔弗一生是最激进的宗教会议派的坚定拥护者，他妨碍了自己，因而未能在教会生涯中获得更加辉煌的前程；他只当过帕希托尔茨多夫的教区司铎。埃本多尔弗也同起初很器重他的皇帝弗里德里希第三发生过冲突；皇上似乎要他为世纪中叶以后在奥地利出现的悲惨状况承担主要罪责。

埃内阿·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完全属于另一个世界；他出身于托斯卡纳的贵族，大约在1437年来到奥地利，起初对奥地利并无好感；一封关于维也纳和维也纳人的著名信件就是明证，埃内阿认为，对维也纳人的奢侈生活，不笃信宗教和伤风败俗必须予以 183

① 以赛亚(Jesaia，公元前740—700年)《旧约圣经》中的先知。——译者

鞭答。他也不太看得起维也纳大学。作为文学家，皮科洛米尼很快赢得巨大的声望，弗里德里希第三给他戴上诗人的桂冠，并把他拉进御前办公厅。作为人文主义的先驱，这位意大利人立即在这里为新事物展开积极的宣传活动。在两本王侯修身宝鉴和《五人谈话集》中，埃内阿主张一种全面培养人的人文主义教育理想，特别讲到培养王子，使他们能胜任未来的统治任务。因为埃内阿的文笔欢快流畅，他的作品脍炙人口；最受欢迎的当然是爱情中篇小说《奥伊利亚鲁斯和鲁克雷西亚》，但作者后来不再提起它。在埃内阿的历史著作中，《奥地利史或弗里德里希第三传》是对当代历史的一个重要贡献；这部作品的真正魔力在于它的人物描绘。一部波希米亚历史也有相似的特色。皮科洛米尼也试图通过学术讲演，使人文主义思想得以在大学人士当中流传，但，最初仅在修辞学这一有限专门领域里获得成功。埃内阿在宫廷里找到更多的追随者。马克西米利安大公爵受过人文主义思想熏陶；宫廷人士中的音乐家和藏书家约翰·兴德巴赫在这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后来是特兰托的主教。蒂罗尔的西格蒙德的宫廷中的人文主义活动也颇活跃，值得注意，他的夫人苏格兰的爱丽诺是个很有文化教养的人，自己也执笔写作。来自哈尔的约翰·富克斯马根在这里工作过一个时期，他是一个大收藏家；后来，他作为法学家和外交家为弗里德里希皇帝效劳。最后，还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在蒂罗尔活动，在奥地利境内代表早期人文主义思想，这就是莱茵兰人尼古劳斯·冯·屈斯（即 Cusanus），作为布里克森主教，他是西格蒙德大公爵不幸的政治对手。

弗里德里希第三和他的各等级对手之间的斗争，以及后来同阿尔布雷希特第六和马蒂亚斯·科维努斯之间的斗争，在十五世纪后半叶，最严重地影响了维也纳和下奥地利的文学和科学的创造

性活动，直到马克西米利安得势后，局面才改观。这时才能聘请到著名的人文主义者；1497年康拉德·塞尔特斯来到维也纳，人们得到了一位有吸引力的教师和卓有成效的组织家。由他创建的多瑙河学会(Sodalitas literaria Danubiana)的会员们使马克西米利安执政期间的精神生活和费迪南时代的初期都蒙受他们的影响，会员中有库斯皮尼安，康拉德·波伊廷格，拉迪斯劳斯·宗太姆和斯塔比乌斯等。经院哲学得以被清除——在神学系中除外。184 事情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归根到底，原因在于皇帝。诚然，皇帝把某些有才华的人过份地禁锢在自己的、往往是滑稽而虚幻的王朝的和家谱的思想中，这是至为明显的，比如，拉迪斯劳斯·宗太姆，或者，特别是布雷根茨的雅各布·梅涅尔，他长年累月地搜集浩繁的家谱资料，发表了一部六卷本的帝王编年史《出生录》，论述了马克西米利安家族的特洛伊—法兰克血统。

如果说人文主义在宫廷和大学取得胜利，并且不久也为贵族所接受，那么，这并不意味着它在1500年前后已经统治着整个精神生活。例如，那个时候，克恩滕教士、特歇尔斯贝格圣马丁教堂的雅各布·翁雷斯特完全按中世纪晚期史学风格，用德语写了一部奥地利编年史，他就没有受到新思想的干扰。同样地，中世纪具有部份历史内容的滑稽文学也有成就卓著的代表人物。菲利浦·法兰克福特尔，可能是维也纳人，曾写了一部关于卡伦贝格神父的滑稽作品，差不多同时，也出了一部以奈德哈特·福克斯为主人公的类似的滑稽故事集。法兰克福特尔这本书曾被翻译多次，流传很广，后来蒂尔·厄伦施皮格尔[①]成名，才使卡伦贝格神父相形见绌。具有宗教内容的民间戏剧依然主要因袭旧有的轨道，十五世纪时，写

① Till Eulenspiegel，德国滑稽故事作品中的主人公，以机智、诙谐著称，在德、奥、瑞颇脍炙人口。——译者

这类内容的作品很多，尽管教会和学者阶层偶尔也忧心忡忡，这类作品也往往以粗野孟浪的方式表现出来，但却为广大观众所喜闻乐见。最杰出的导演之一是维也纳的木刻家威廉·罗林格尔；他曾在圣斯特凡教堂唱诗厅的座椅背上刻出维也纳的一出耶稣受难戏(1476年)的场景，这个唱诗厅的座椅于1945年毁于火灾。

中世纪晚期的造型艺术在各个领域里都取得了重要成就，那时的创作完全为哥特风格所支配。在建筑艺术方面，由德意志地区和波希米亚地区的影响而孕育出来的哥特式大教堂建筑式样，尤其是西斯迪显教团和托钵僧教团的哥特式大厅建筑式样，都有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代表作。茨维特尔大教堂圣坛所回廊和原计划为哥特式大厅、但却按大教堂式风格、在大门口装饰大量杰出雕塑(保罗之毁灭)的维也纳斯特凡教堂，同海利根克罗伊茨、米尔茨河畔的诺伊贝格和圣兰布雷希特等地的教堂大厅，以及维也纳的米诺利滕教堂和奥古斯丁教堂的大厅，形成对照。从鲁道夫第四到弗里德里希第三，所有奥地利的国君都和维也纳市民一道，参加了维也纳斯特凡教堂的哥特式扩建工程，这两位国君的令人印象深刻的高冢就在这个教堂里。扩建了的南钟楼就其规模和造形来说，是中世纪奥地利土地上钟楼建筑中最杰出的作品(1433年建成)，其他重要的成就，如滨河玛丽亚教堂钟楼的结构精细的圆顶、185 格拉茨附近施特拉森格尔的钟楼、维也纳的和维也纳新城的“十字架旁的织纱女工”的建筑设施，对上述那个中世纪最杰出的作品作了补充。大建筑物也是营造主的纪念碑；比如，圣斯特凡教堂就装饰着哈布斯堡家族许多捐资者的形象，而维也纳新城的格奥尔格教堂的纹章墙或因斯布鲁克城堡上的马克西米利安的纹章钟楼，则是借用纹章的象征来显示国家和王朝的重要意义。

统治阶层，即邦君和各等级的议员，把无数的城堡建成为，或

者把旧的设施改建为防御建筑、住宅建筑、宏伟建筑，以及统治和管理的中心。值得一提的有，福拉尔贝格的诺伊姆斯(格洛帕尔，1345 年)，哈特贝格东南的布尔高水上城堡(大约 1400 年)和十五世纪普赫海姆家族扩建的瓦尔德菲特尔的海登赖希施泰因，以及比较小的、但自建成以来一直保存原来风格的玛丽亚策尔附近的沙亨施泰因。蒂罗尔的统治者西格蒙德大公爵建造了七个城堡，全都以他的名字命名，最大的西格蒙德王冠城堡，在博岑附近。

雕塑创作，在中世纪崇拜玛丽亚的风气极盛时，产生了石雕圣母像（1320 年左右的圣斯特凡教堂的奴婢圣母像，克洛斯特新堡和亚德蒙特的圣母像），和木雕圣母像（克鲁毛尔型的"美丽的圣母"雕象）。十五世纪发展了一种很有民间风格的圣坛雕刻艺术，尤其在蒂罗尔产生了大量作品。出类拔萃的尖端成就是南蒂罗尔人米夏埃尔·帕赫尔在圣沃尔夫冈雕塑的圣坛，以及克菲尔市场圣坛。因斯布鲁克的宫廷教堂里的马克西米利安墓(空的)上的青铜雕像已经散发着文艺复兴的气息，它们表现了宫廷人士的家谱幻想。

这个时代绘画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一位佚名的艺术家在 1330 年前后，用壮观的木板画，把凡尔登的尼古拉的作品扩大为一个耳圣坛。鲁道夫第四的胸像（海因里希·瓦尚所作？今存维也纳主教区博物馆）是阿尔卑斯山以北一带保存下来最古老的同代人创作的国君像。在博岑附近的龙克尔施泰因宫堡的连环壁画(大约 1400 年)里，我们可以找到贵族界的思想和英雄。阿尔布雷希特圣坛和苏格兰大师的木板画，把圣经故事的场面表现在当地的城乡风景画之中。小吕兰·弗吕奥夫和艾哈德·阿尔特多弗的关于利奥波德传说的画描绘了奥地利国的过去及其神圣的国君，克洛斯特新堡的巴奔堡家族族谱(1489 年)也产生于相似的动机。

同样地，玻璃画除了表现宗教题材外，也表现历史和家谱方面的题材，这种艺术在维也纳，在克洛斯特新堡和在利林费尔德创作了极为珍贵的作品。书本装饰画在十四世纪也有一些是寺院制作的好186 作品。这种艺术在维也纳的宫廷学校里，拥有一个画室，阿尔布雷希特第三时代都兰迪的《圣功原理》[①] 德译本中的装饰画证明了这个画室的工作能力。阿尔贝格的圣克里斯托夫留宿所兄弟会(建于1400 年前) 在其总帐本中，保存了德语区纹章印刷术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一个世纪之后，为了替马克西米利安作宣传，出现了有大量插图装饰的、美化这位国君的作品:《真诚的谢忱》、《白衣国王》和《弗赖达尔》。

在中世纪晚期，奥地利的工艺美术行业创作了许多极为宝贵的金匠工艺品，特别是萨尔茨堡、克洛斯特新堡和维也纳的礼拜用器。鲁道夫第四的大骑士印玺是刻印艺术的一项光辉成就。在西格蒙德公爵和马克西米利安皇帝的大力倡导下，甲胄生产(盔甲匠工艺)特别繁荣，参加这个行业工作的就有象康拉德·佐伊森霍弗尔那样杰出的行家里手。纺织艺术方面生产了绚丽多彩的刺绣弥撒礼服，圣坛挂锦，传令官服饰，花地毯和各种编织的毯子。在织毯工艺方面，虽然勃艮第和意大利一直领先，但是，由于哈布斯堡与西欧和南欧保持着联系，也把优秀的产品带到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对艺术品的搜藏和倡导活动对促进艺术有着极大的意义；家藏的珍品丰富多彩，玲琅满目；它们在暂时被分掉之后，又被弗里德里希第三集中起来，并大大增加；哈布斯堡家族的珍藏更应归功于马克西米利安，在他的统治下，大量勃艮第的珍宝流入奥地利家族；它们后来保存在尼德兰。

① 指 Durandi(1237—1290，法国教会法规学家)所著的 Rationale divinorum officiorum。——译者

在其他方面，马克西米利安的工作对未来也有指导性意义，维也纳宫廷乐队确实要追溯到他的提倡，不久，维也纳主教格奥尔格·斯拉特科尼亚对这个乐队的发展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无论如何，维也纳的音乐文化在中世纪行将结束时还得到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推动。

六、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

(1526 年至 1648 年)

1526 年的国王选举和费迪南第一的行政改革

187　从一开始,哈布斯堡竞选王位的前景,在波希米亚就显得要比在匈牙利好。虽然如此,在布拉格也得预计到会有困难,因为波希米亚各等级不承认费迪南的夫人安娜的继承权。其他的王位竞争者,首先是巴伐利亚的维特尔斯巴赫家族,与费迪南竞相争夺。敌视哈布斯堡的教皇克莱门斯七世也与大公爵作对。以西格蒙德·冯·迪特里希施泰因和西格蒙德·冯·波尔海姆为首的交涉人员,处事圆通,善长外交,使费迪南受惠不浅;他们耗费了大量的钱财,终于成功地使那些起先倾向于巴伐利亚的举足轻重的王国显贵们改弦易辙。1526 年 10 月 23 日费迪南当选。文策尔王朝的次要邦——西里西亚,劳西茨和摩拉维亚——的等级代表没有参加布拉格的选举,只是援引安娜的继承权要求,而没有经过自己的选举,就批准费迪南为自己的国君。情况不久就显示出,跟这个哈布斯堡人打交道,不同于跟那些屈从于各等级代表的权力的亚盖沃的国王们打交道。

在匈牙利,西本比尔根的都督约翰·扎波利亚自从残酷无情地把一次旗开得胜的农民起义镇压下去以后,就一直被看成贵族多数派的领袖。因此,由匈牙利,西本比尔根和斯洛文尼亚组成的一个强大的派别,于 1526 年 11 月在施图尔魏森堡① 选举都督为

① 即今匈牙利的塞克什费赫尔瓦尔。——译者

国王。费迪南的追随者比较弱，但是，属于这一派的有同情新教的聪明的女政治家、国王遗孀玛丽亚，此外，还有诸侯巴托里，齐普斯人和西本比尔根的萨克森人，以及一些匈牙利贵族和克罗地亚人。这个集团于1526年12月17日在普雷斯堡选举费迪南为国王。一次短期的停火给了双方纠集各自力量的机会。这个哈布斯堡人也利用这个时机来从新整顿他的行政机构。

哈布斯堡家族的奥地利支系的地产和职责的增加，要求从新整顿行政管理机构，这次整顿大大超出在马克西米利安统治下就已经可以看出来的中央集权化的开端。1527年1月1日，费迪南国王颁布“王国法规”，它为奥地利所属各邦，也为波希米亚和匈牙利所属各邦的中央集权管理奠定了持久的基础，尽管进行多次改革，这个管理体制一直保留到1848年还有效。 188

枢密院被看成是新官府的最高机构，它商议朝廷事务，家族政策和外交政策；君主召集最高的宫廷显贵在这里议事，其成员数目最初限定为六人。宫廷司法处行使最高司法机关的职权，枢密院的成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是宫廷司法处的成员。1537年在遭受匈牙利和波希米亚方面的抗议之后，宫廷司法处的作用仅限于世袭领地和德意志国家。卡尔第五放弃皇位之后，宫廷司法处也具有帝国上诉法院性质，因而与帝国法院发生了关于职权范围的争执。但是，正是对帝国事务产生影响的可能性，使宫廷司法处长期具有特殊的意义。对于行政事务，它只有建议权。宫廷办公厅在中世纪就是作为邦君的文书房而产生的，即使经过费迪南的改革，它还是一个虽然重要、然而却是从属的执行机关，不是一个真正的官署。起初设立三个处分管奥地利的各个邦，另设两个处分管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到1559年，管辖仅限于世袭领地；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各自有自己的办事处。维也纳，因斯布鲁克，布拉格和普

雷斯堡等地的邦财务局隶属于掌管财政和结算的宫廷财务署，虽然宫廷财务署行使其职权绝不是一帆风顺的，各等级的批准权就是一重大障碍，但是，一旦新的组织熟悉自己的业务，它就是一个比旧的机构更好的财政管理工具。然而，为了进行抵抗土耳其的战争需要向军队供应粮饷、弹药，为此宫廷财务署却不能筹集到可以迅速利用的资金。这样，便于1556年设立宫廷军机处，它的机构划分一般不考虑邦界，因而是一个名符其实的中央机构。宫廷军机处是为防御土耳其进攻的国防需要而设立的，它不能充分胜任后来日益增多的议程；在其存在的漫长时期中，人们动辄就把一切军事上的失利归咎于这个机构。

在匈牙利的斗争(1526年—1562年)

在1526年的复选之后，在匈牙利必须用武力解决问题。诚然，费迪南拥有比扎波利亚更为强大的力量，但是，几百年来跟土189耳其人长期斗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哈布斯堡家族几乎没有一次能够集中全力去对付土耳其敌人及其匈牙利仆从。在帝国和世袭领地里，宗教信仰方面的矛盾越演越烈，起了使力量瘫痪的作用，此外，又有敌视哈布斯堡的欧洲列强插足其间。法国虽然在几条战线上受到哈布斯堡政权的威胁，却在敌人的背后寻求盟友，那个“最笃信基督教的国王”在苏丹身上找到了援助，1536年以来，一个正式的同盟把他和苏丹联合在一起。英国、威尼斯、波兰、巴伐利亚、甚至教会国①，也都暂时参加反奥地利的联盟，而维也纳则试图与莫斯科建立联系。别的结盟伙伴变换不定，然而，土耳其与法兰西的勾结，以及哈布斯堡家族的两个支系的合作长期主宰着欧

① Kirchenstaat，指教皇管辖下的领地，在意大利中部，一度包括西西里，现仅限于梵蒂冈。——译者

洲的政治。

由于土耳其人在莫哈奇大捷之后重又撤出匈牙利，费迪南击败扎波利亚，扎波利亚逃往波兰。费迪南于 1527 年 11 月 3 日在施图尔魏森堡加冕。在这期间，曾几度设法使土耳其人承认哈布斯堡家族对匈牙利的权利，但都归于失败。1528 年发生了几次入侵克赖因的事件，1529 年苏利曼苏丹在大规模整顿军备之后，进军讨伐奥地利。苏利曼是一位其权力堪与卡尔第五相匹敌的统治者。费迪南迅速丧失在匈牙利的阵地。普雷斯堡、维也纳新城、莱塔河畔的布鲁克虽然坚守得住，但是却未能抵挡苏丹向维也纳的挺进。但总算还能及时调遣一支一万八千人的卫戍部队来保卫这个城市，其中有波希米亚和西班牙的部队，同时还配备有强大的炮兵。久经考验的军事首领尼克拉斯·萨尔姆伯爵担任了防务的领导工作。为不使敌人凭借掩护逼近城市，市郊都被夷为平地。9 月底，土耳其人兵临城下；他们对克恩滕城门一带实施地雷爆破和突袭，妄图突破防线而未果。在 10 月 14 日最后一次袭击失败后，土耳其军由于气候条件不利，开始撤退。奥军没有力量穷追；在这期间，鞑靼人对维也纳森林所辖的菲特尔地区进行了可怕的破坏。费迪南占领了拉包、科摩恩、格兰等要塞，得以不断改善在匈牙利的地位，不久也攻克埃尔劳和托考伊。1531 年费迪南和扎波利亚谈判，但是没有达成协议。土耳其人也拒绝了费迪南的一切媾和建议。1532 年夏天，苏丹又重新试图进逼维也纳，这次选择从更南的地方向北进军，不过，克罗地亚贵族尼古拉·尤里席奇 190 奋力保卫小小的京斯要塞，卓有成效地进行了抵抗，最后土耳其人经过施蒂里亚地区向南撤退。在卡西姆·贝格率领下入侵下奥地利的鞑靼人（“疾走和放火的人”），在他们撤退时，被维也纳森林的峡谷挡住去路，全军被歼；无论是在奥地利的还是在土耳其的民间

传说中，都还生动地提到这些往事。

卡尔第五的一支劲旅出现在维也纳地区，迫使土耳其人于1532年秋撤退；然而却未能把帝国的军队投入匈牙利展开攻势。这样，一次夺回匈牙利的良好机会未加利用就放过去了。1537年，费迪南的一支军队企图夺取埃塞格城，该城为土耳其远征时的一个重要给养站，但是，哈布斯堡的部队由于将领指挥不统一，又为瘟疫和粮秣短缺所削弱，在戈里安遭到沉重的失败。于是，下列事实也就失去了意义：费迪南于1538年2月在大瓦代恩与扎波利亚进行了秘密谈判，后来缔结了和约，和约答应在伪王死后，由这位哈布斯堡人统治整个匈牙利。这个条约没有得到遵守，因为扎波利亚死后（1540年），他的追随者们就把他的儿子约翰·西格蒙德立为国王。费迪南两度企图攻占奥芬都失败，第二次以他的部队全军覆灭而告终（1541年）。当时土耳其人牢牢据守着该城和匈牙利中部。勃兰登堡侯爵约阿希姆第一率部进行一次反击（1542年），结果一败涂地，土军随后攻占了巴拉顿湖和蒂萨河之间所有最重要的城市。1547年终于达成停火协议，这是费迪南每年以三万杜卡特[①]的“献礼”换来的。

这时，三分匈牙利的鼎峙局面已经开始形成，这种局面以后维持了一个半世纪。匈牙利“王国”包括克罗地亚西北部，然后是巴拉顿湖以西的毗连的匈牙利地区，边界在拉包东面越过多瑙河，在东北曲折蜿蜒直抵齐普斯河。从匈牙利的东北部开始就是扎波利亚和西本比尔根后来的邦君们的统治地区，后者除了这个地区外，还控制了匈牙利平原前伸展着的一条狭窄地带。匈牙利中部，从中部山脉直抵蒂萨河，1551年起还包括特梅斯·巴纳特，均作为土耳其长官辖区而隶属土耳其政府。

① 原为古金币的名称，1284年铸于威尼斯。——译者

1551年，费迪南似乎就要拥有西本比尔根。约翰·扎波利亚的遗孀伊莎贝拉王后准备放弃这个地区，在卡尔斯堡已经达成一个相应的协议，但是，与费迪南进军的同时，土耳其人也开进来，那时他们已经攻占了特梅斯堡。费迪南的外来军队的严重骚扰行 191 为，以及卡斯塔尔多将军手下的人员谋杀了伊莎贝拉的顾问、政治家乔治·乌蒂赛尼奇枢机主教（“乔治兄弟”）所引起的反应，使形势骤然转变。1552年秋，萨克森的选帝侯莫里茨进行了一次征伐，毫无成果。不久，约翰·西格蒙德被承认是西本比尔根和毗邻匈牙利诸郡的国王；在这里，人们又回到苏丹的管辖之下。土耳其人首次进攻锡盖特失败（1556年），因而要塞得以及时解围。最后，费迪南的公使奥基尔·吉斯兰·德布斯贝克在承认目前占领状态的条件下，签署了一项八年和约。在这个君士坦丁堡条约（1562年）里，费迪南表示继续承担义务，按照1547年达成协议的，每年交纳献礼。

帝国政策和宗教信仰问题

新教进入哈布斯堡各领地

自从1526年取得土地以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居民，就其民族而言，比以前更加复杂得多。在旧的世袭领地里，德意志民族成份占决定性优势。在世袭领地的南部和东南部，除了人口较多的、几乎还没有社会分化的斯洛文尼亚的农业居民，以及拉定的、弗里奥尔的、意大利的和克罗地亚的移民以外，现在又加入了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各领地的具有民族自觉意识的有影响的民族。马扎尔人和捷克人对德意志人的不信任，对于哈布斯堡王朝的政治是一个扰乱性因素，然而同王朝和贵族所领导的各等级之间的大纷争比较起来，民族的对立仅仅起了次要的作用，尽管它也增加

了王朝的困难。十六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在哈布斯堡的领地和帝国里，信仰的分裂构成最危险的冲突因素。宗教信仰的争执以及它的政治后果，直到三十年战争结束时为止，一直成为奥地利国内历史所论述的真正主题；信仰斗争紧紧地和等级问题联系在一起，对奥地利及其王朝在帝国内部和在欧洲范围内，产生了十分严重的后果。

新教的教义在奥地利获得迅速发展。我们发现，还在费迪南第一执政的初年，新教在各阶层的居民中，在贵族阶层、在矿工、市民、大学生和农民中，已广泛传播，教士们也绝不是可以不受影响的。令人印象最深的是贵族的接受新教。恩斯河上游之邦长官192 的儿子克里斯托夫·耶格尔 1522 年成为新教徒，他的父母也随后入教；不久，施塔海姆贝格、波尔海姆、迪特里希施太因、克芬许勒、翁格纳德、普赫海姆、青岑多夫和其他家族，效法了耶格尔一家的榜样，这些家族有几代一直是新教的先驱者。贵族子弟和其他大学生进入德国北部的大学里去就读，尤其是去维滕贝格，以便学习新教义；维也纳失去了它的大部分大学生。奥地利城市里的印刷工场纷纷印刷宗教改革的论著，1521 年，约阿希姆·冯·瓦特的一部著作首先在维也纳付印。1524 年，新教的追随者、富有的维也纳公民卡斯帕尔·陶贝尔被处决。在圣珀尔滕、魏德霍芬、林茨、韦尔斯、格蒙登、克拉根福，二十年代中叶以前就有为数甚多的新教徒。在这种情况下，1523 年一项禁止新教论著传播的法令毫无效果，就不足为奇了。1527 年，费迪南第一重新颁布反对路德教派的总训令（Generalmandat）。在这个训令里，还谈到了再洗礼派的“闻所未闻的教义”，同路德教相比，这种教义长期在农民阶层中获得更有力得多的支持。洗礼派既反对世俗制度，也反对教会制度，他们主张实行财产公有制，并且由于信仰上的激进和由于缺少各

等级代表作靠山，一开始就遭到血腥的迫害。施瓦本人巴尔塔扎尔·胡布迈尔在奥地利的多瑙河地区和摩拉维亚南部把所有洗礼教徒组织起来，尼科尔斯堡成为这一教派的一个中心。胡布迈尔在维也纳大力传教，成绩卓著，后来于1528年被捕，被处以火刑。在萨尔茨堡和施蒂里亚也有很多洗礼派教徒，因而也有许多这一教派的殉道者。奥地利最重要的再洗礼派教徒是普斯特尔河谷人雅各布·胡特尔，这个教派在他的家乡蒂罗尔的很多地方站住了脚。持续的迫害使数百人遭受牺牲，为避开迫害，胡特尔带领很多洗礼派教徒前往摩拉维亚，他在那里重新组织他们的教区，在“教会产业”或兄弟大院里建立了财产公有制。在某些方面，这些洗礼派的观点和彼得·切尔奇基的斯拉夫的“波希米亚兄弟会”相近。奥地利—摩拉维亚的教友们拒绝象威斯特伐利亚的洗礼派那样使用暴力，但是，明斯特事件肯定对奥地利起了不利的影响。1535年，胡特尔返回蒂罗尔，在克劳森被捕，并于1536年2月在因斯布鲁克被处以火刑。“胡特尔的兄弟们”在摩拉维亚一直坚持到三十年战争开始时，后来，事态迫使他们重新流亡。

当德国的路德教徒们在奥格斯堡帝国议会上呈递他们的信纲时（1530年），信仰问题得到某种澄清。因为天主教徒坚决拒绝“confessio Augustana”(奥格斯堡信纲)，1531年，在图林根的施马尔卡尔登，成立了新教诸侯和城市的同盟。另一方面，同年1月5日费迪南当选为罗马国王，给奥地利家族带来了一项重要的成就。对法兰西人和土耳其人的斗争，迫使卡尔第五采取克制态度，尽管他有着不可动摇的天主教信仰；在1532年纽伦堡帝国议会上，同新教徒达成暂时的谅解。但是，此后不久，信奉新教的诸侯转入进攻；菲利普·冯·黑森得到英国和法国财政上的支持，他的一支军队攻占了哈尔斯堡家族的符腾堡，符腾堡回到旧王朝手里（1534

193

年)。在卡登和约里，哈布斯堡家族只好忍受损失这一事实；他们只剩下公爵的头衔和徒有虚名的领地管辖权。

在此期间，在哈布斯堡各领地里，新教的事业继续取得进展。1541年年底，费迪南国王在布拉格召开奥地利和波希米亚各邦的特别会议，会议本来的任务应该是组织对于抗土战争的支援，尤其是财政上的支援。然而，各等级的代表却首先赞成新教教会的要求，允许俗人使用圣餐杯的要求暂时还在优先考虑之列。施马尔卡尔登派在米尔贝格败给卡尔第五的军队(1547年)，使力量对比发生了转折；操之过急地追随施马尔卡尔登派的帝国直辖城市康斯坦茨变成了奥地利所有。更重要的是，费迪南第一大大巩固了他在苏台德区的地位，夺回了卖给萨克森的扎甘公爵领地和抵押给霍亨索伦王朝法兰克支系的奥佩尔恩和拉蒂博尔两侯爵领地。在波希米亚，费迪南坚定有力地反对各等级代表，因为他们在米尔贝格战役之前的紧急关头，表现极为倔强不驯。

在奥地利，不是教会本身，而是作为"advocatus ecclesiae"①的国君，站在反对新教义的最前线。费迪南第一进行巡视时，也有信天主教的俗人参加，从那几次巡视中，可以窥见旧教会令人担忧的状况。1528年，1536年，1544年和1561年的视察报告清楚地指出，新教在不断地渗透。在1549年一项对萨尔茨堡地区教会会议表态的声明中，克恩滕和施蒂里亚的各等级代表特别坚定地支持新教的观点。在1560年前，参加天主教复活节圣餐的人数日益减少。福音的宣传越过德语区，蔓延到南斯拉夫人那里。施蒂里亚邦长官汉斯·翁格纳德·冯·宗内克赞助斯洛文尼亚的神学家普里穆斯·特鲁贝尔用他的母语翻译圣经；诚然，翁格纳德不得不于1556年放弃他的职位，他后来在符腾堡流亡时，继续支持特鲁

① advocatus ecclesiae，拉丁文，意思是"教会辩护士"。——译者

贝尔的工作。那时，一种克罗地亚语的《圣经》译本也完成了。的 194
确,新教没有能够在南斯拉夫人中间盛行起来,但是,在这期间,翻译的活动促进了本民族的语言,因而也提高了它的文学价值。

新教贵族利用这种状况攫取教会的产业,但是,尽管很多僧侣和尼姑离开了他们的斗室，大多数寺院仍然得以保存。路德反独身的斗争，对世俗教士也产生极大的吸引力。在这种令人担忧的形势下，费迪南第一企图尽可能长时间地维持教派间的和解，然而,随着特兰托宗教会议(1545 年—1562 年)——除了一次次要的会议以外,新教没有派代表参加——开下去,越发证明教义上的分歧越来越变得难以克服,个别问题的迁就 ,例如，有时也容许天主教徒享用两种形态[1]的圣餐,却不能抹煞本质上的区别。于是,只剩下争取新教徒回来赞成旧教义这种可能性了,通过说服也好、通过暴力也好,两种方法都试过。

信奉新教的萨克森选帝侯莫里茨，在施马尔卡登战争中曾经是卡尔第五的同盟者，在 1551 年突然起而反对皇帝,在因斯布鲁克发动突袭并差点儿俘虏了皇帝。直属帝国的新教诸侯和天主教诸侯与法兰西国王结盟之后，奥地利家族不得不同意奥格斯堡宗教和约(1555 年)。法兰西国王趁机占领了梅斯、图尔和凡尔登。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使教派斗争大约一直缓和了六十年之久。在奥格斯堡得到赞同的词句 “cuius regio, eius religio”[2]是违反信仰自由的,使国君们可以支配臣民的宗教信仰,当然,也被费迪南第一用来维护他的王朝权力；它对奥地利的新教徒可能造成损害。虽然如此，费迪南仍一反一年前颁布的训令，许可享用两种形态的

① 即面包和酒。——译者

② “cuius regio,eius religio”. 拉丁文，意思是“谁在统治，就信谁的宗教”。——译者

圣餐。

在五十年代，在奥地利已经可以看出天主教进行有效反击的重要苗头，这种反击并不以统治者使用自己的权力为限。在主教当中有些重要的人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维也纳的法布里主教和瑙赛亚主教。萨尔茨堡和帕绍的情况却不大令人欣慰。把耶稣教团召到维也纳，后来又召到布拉格和因斯布鲁克之举，引起无穷的后患；起初来的主要是非德意志人，但是，来自尼姆维根的彼特鲁斯·卡尼修斯，曾在维也纳逗留四年，在这里的大学里工作过，当过教士，在传教工作中取得一些成就，但最初的成就肯定是微不足道的。他作为行政官执掌过一个时期的主教辖区。卡尼修斯也是在维也纳创作了他的主要著作：《教义问答》，这部作品正是由于简明扼要、通俗易懂，被证明是特别有用的教义宣传工具，1555年以来出了很多版，译为多种文字。

195

卡尔第五在企图夺回梅斯失败以后逊位；他不肯忍受信仰分裂的事实。随着他的逊位，在皇座上的中世纪普世得救论最后一位也许是最重要的代表引退了；他把帝国思想上升到统治世界的思想。尽管他树立了丰功伟绩，最后却败在法兰西王室和最重要的帝国议员的相互合作上，败在政治斗争和宗教纷争的结合上；他曾试图调解这个争端，然而却徒劳无功。卡尔和费迪南一样，都不是毫无顾忌地和狂热地反对宗教改革的人，和他的弟弟一样，他把对天主教教会无条件的忠诚和认真排解信仰争执的努力结合在一起。当费迪南试图在特兰托宗教会议的第三阶段强行通过他的“反宗教改革文告”的纲领失败时，这种努力付诸东流就是确定无疑的了。

卡尔第五想让他的儿子菲利浦在帝国继位的愿望没能实现，正如他想让哈布斯堡家族的两个支系之间轮流当皇帝的计划没有

实现一样。非利浦不仅遭到新教徒,也遭到德意志诸侯的拒绝,费迪南也暗中作梗,力争使自己获选,而使侄子落选。当非利浦和英国女王玛丽结婚时,他放弃了罗马—德意志的帝位(1553 年)。卡尔第五退位不久,费迪南第一就被宣布为“当选的罗马皇帝”(1558 年)。教皇保罗四世是那不勒斯人,同他的许多同乡一样,与西班牙和哈布斯堡家族为敌,而且拒不承认费迪南,在教廷上有人怀疑皇帝是新教徒的朋友;不过,这些都没有什么意义。保罗的继承人庇护四世没有提出什么条件就承认了费迪南的皇位。这样,帝国的领导权就转给了哈布斯堡家族的奥地利—德意志系。

费迪南的长期执政,尽管有过很多挫折,但根本上说,还是成就卓著的,他赢得了他治下的各族人民的尊敬,他是作为外国人到这些人民的国家里来的。外国的外交家,象威尼斯人朱斯蒂尼亚诺那样,对这位统治者所作的中肯描写说明了这种钦佩。奥地利家族在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得以牢牢立足,一个有效的中央政府得以建立,把抵抗土耳其人的斗争以及反对新教运动的斗争承担并且领导起来,这些都是他作为统治者所建立的最重要的功勋;他在 196 精神文化方面的兴趣爱好,大有利于哈布斯堡搜集品的积聚、有利于宫廷图书馆和维也纳大学。

奥地利世袭领地由费迪南第一的儿子分而治之

1554 年,费迪南第一改变了以前为了实行共同统治而颁布的训令,安排由他的儿子们分治世袭领地。长子马克西米利安(第二)1548 年与他的堂妹、卡尔第五的女儿玛丽亚结婚。他得到奥地利多瑙河流域各领地,包括整个萨尔茨卡默古特,此外,还保证他得以继承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王位;1562 年和 1563 年,他父亲还在世时,他就分别在这两个地方加了冕。1562 年他还被选为罗

马国王。次子费迪南分得蒂罗尔和前奥地利。分治的训令也许可以追溯到他对父亲的影响。他背着费迪南第一，1557年和奥格斯堡一个漂亮而有教养的贵族女儿菲利皮内·韦尔塞结婚；这门婚姻到1576年时才得到教廷承认，这次婚姻所生的后裔被看成出身不同，门第不等。费迪南第一的第三个儿子卡尔和巴伐利亚公爵阿尔布雷希特第五的女儿玛丽亚结婚。卡尔得到内奥地利地区，计有施蒂里亚，克恩滕和克赖因等主要领地，包括亚得里亚海沿岸的奥地利领土在内。

中世纪晚期奥地利家族的历史经验说明，不能再实行分治的原则；不信任倾向新教的长子，担心家族里被冷落的年轻成员会采取危险的行动，也许还考虑到在较小的统治范围里更易于对抗各等级的势力，这些因素可能有助于分治思想的再次获胜。由于费迪南第一的儿子们合作得比中世纪晚期哈布斯堡家族的成员要好得多，所以，1564年的解决办法并没有招致从前分治条约那样的恶果。

某些集团预料马克西米利安第二（1564年至1576年）会在其父亲死后公开转向新教。然而，马克西米利安曾向费迪南发誓永远忠于天主教信仰。对西班牙哈布斯堡人的顾虑一定也在其中产生作用。马克西米利安又为新教阵营内部可憎的纷争所激怒，在纷争中，梅兰奇通和弗拉修斯·伊利里库斯两派的党羽为了教义上的原因而互相攻讦。对他所属的奥地利各邦新教等级最初提出来的要求，马克西米利安一概予以回绝。随后，土耳其人重新点燃起战火，使得教派的争辩中断下来。费迪南第一去世后，年青的约翰·西格蒙德·扎波利亚对皇帝管辖下的匈牙利发动了几次进攻，但要想取得更大的成就，他的兵力还不够，特梅斯堡的土耳其长官的进攻也被击退。但是，后来年迈的苏利曼苏丹再次兴师前

来讨伐。土耳其人从埃塞格渡多瑙河，进逼锡盖特要塞，围困一个月之后，攻占了要塞。克罗地亚的都督尼古劳斯·茨里尼领导了守卫战，最后跟大部分将士一起壮烈牺牲；苏丹在快拿下要塞之前死去。马克西米利安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但是没有用来向土耳其人发动进攻，只有内奥地利的一些军队挺进克罗地亚，带来了一些胜利。军营的瘟疫使马克西米利安的军队遭受重大损失。作为军队的统帅，马克西米利安是不能胜任的。尽管约翰·西格蒙德企图从中破坏，皇帝和新苏丹赛利姆第二终于在1568年在亚得里亚诺佩尔缔结了和约。因为扎波利亚力量太弱，无力单独继续战斗，他只好放弃了匈牙利国王称号，参加休战；此后，他就只称自己是西本比尔根侯爵。在他1571年去世，接替他的是更加有影响的斯特凡·巴托里。

最后一个亚盖沃·西吉斯蒙德·奥古斯特去世后，波兰王位的继承问题成为现实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时候，巴托里成了皇帝的对手。开始，波兰人选举昂儒的亨利；马克西米利安的儿子恩斯特与之竞选毫无成绩。但是，亨利1574年离开这个国家，以便在他的兄弟查理第九去世后，登上法兰西的王位，这时，波兰的王位再度空缺。这次马克西米利安皇帝提名自己，他在立陶宛和普鲁士的贵族中，在教会贵族中，有一些拥护者，但是大多数波兰人拒绝这位德意志统治者作候选人。这样，少数派选举马克西米利安就没有什么意义；贵族多数派的候选人斯特凡·巴托里于1575年12月获胜；在随后的岁月里，证明他是一位既强有力而又颇有成就的统治者。他的兄弟克里斯托夫成为西本比尔根侯爵。

在这期间，奥地利多瑙河地区的教派纷争继续进行着。马克西米利安第二答应给新教徒的东西比他们所希望的要少；不过，他也放弃了天主教的反攻。1566年的巡视发现了寺院里存在着令

人极为不快的状况，在检查这次巡视的结果以后，紧接着就建立了寺院管理处(1568 年)，以监督和改善各寺院机构，管理处的建立终究有利于天主教的革新。皇帝对信仰的分裂和问题的提出持冷静和超然的态度，他把它们当作神学家间的争吵而加以摈弃，这样198 做也许太轻率了些，但与此相适应，马克西米利安考虑创建一个协调各教派的"普世的"基督教的可能性；据说，他曾毅然表示：他既不想当教皇，也不想成为路德派，而只想做一个基督教徒。皇帝命令奥地利的新教徒制订一个统一的教规。这个工作由来自罗斯托克的大卫·奇特拉伊斯负责；他的«基督教规程»遵照皇帝的愿望作了几处更动，之后，马克西米利安发布"保证令"(1571 年)。在这个文件里，新教徒得到的权利比 1568 年的特许令还广泛。现在，除了在邦君的城市和集镇里以外，允许封建领主和骑士及其奴仆和管辖下的农民，在他们的宫殿里，家里和庄园里做新教的礼拜。最后甚至允许贵族在维也纳举行一次公开的礼拜式（1574 年)。除了等级阶层外，在城市居民中，新教占决定性的统治地位。对分裂为不同派别的波希米亚新教徒，马克西米利安也象在奥地利一样，推行一种类似的安抚和半许可的政策。

马克西米利安的弟弟们在他们各自的局部统治区里的执政活动主要也是在教派纷争的影响下进行的。在费迪南大公爵的统治区蒂罗尔和前奥地利，天主教的地位比任何地方都强大。农民受路德教的影响较少，洗礼教被血腥镇压，或被迫流浪他乡。贵族多数信奉天主教。在城市和集镇，尤其在工矿区，有比较强大的新教成份。采矿企业家汉斯·施泰因佩格尔大力地为奥格斯堡信纲进行种种活动。另一方面，费迪南公爵一开始就显示出，他决心恢复旧信仰的独占地位，不言而喻，大多数居民还是忠于旧信仰的。耶稣会教士在因斯布鲁克办学卓有成效，皮特鲁斯·卡尼修斯也在这

里工作过一个时期。后来，方济各会修士约翰内斯·纳斯作为宫廷讲经师表现极为突出，他是耶稣会的敌人，受大公爵庇护。这样，在蒂罗尔，这个信奉天主教的邦国，在一位精明强干、坚忍不拔、作为艺术的提倡者颇有作为的邦君领导下，在七十年代里，为恢复这个邦的天主教性质，已经做了主要的工作。

在内奥地利各邦，教派的冲突采取了最尖锐的形式。卡尔第二由于坚信而偏爱天主教，在1571年与他结婚的夫人玛丽亚·冯·威特尔斯巴赫，在信仰的坚定和个人的魄力方面都超过他。起先，大公爵在新教等级的进攻面前不得不退让。马克西米利安的让步增强了内奥地利新教徒彻底实现自己的要求的力量。因此，199 终于在1572年2月出现了“宗教和解”。大公爵在格拉茨邦议会上发表声明，强调他对天主教信仰的不可摧毁的忠诚，但是，他向封建领主和骑士等级，连同其家属、奴仆，以及“属下的宗教亲友”——贵族等级以此所指的是他们管辖下的农民——保证给予信仰自由，此外，还给予保有讲道师和兴办学校的权利，“直到实现一项普遍的符合基督教精神的和解”。城市和集镇不在让步之列，然而，恰恰在这里就有新教的布道师和教师。两个教派竞相举办能起作用的教育事业，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思来影响青年；在天主教方面，耶稣会教士在施蒂里亚居于领先地位，他们在和解之年里创建了格拉茨学院。

卡尔治理下的各邦一再要求抗击土耳其；因此，有必要在宗教信仰的事情上对各等级迁就，以换取对税收的批准。信仰的冲突折磨着大公爵，他终于在1576年重申从前的让步。不久，他还不得不进一步退让。

1576年10月12日，皇帝马克西米利安第二在雷根斯堡逝世。他作为十六世纪最后一个哈布斯堡人，在教派斗争中还是采

取了调解的态度。此后，如他的儿子和继承人鲁道夫第二所体现的，坚定地信奉天主教和反对宗教改革的方针终于占了上风。

鲁道夫第二的执政、反宗教改革和对土耳其战争

鲁道夫是在西班牙宫廷里一切非天主教影响都已被排除的情况下受教育的。还在他父亲当政的时候，他就已接受加冕，成为匈牙利(1572 年)和波希米亚(1575 年)的国王，马克西米利安第二也同样成功地使他的长子 1575 年 10 月当选为罗马一德意志国王。鲁道夫的四个弟弟，在 1578 年 4 月分配遗产时，起初只分得一些钱财和家藏珍宝。马克西米利安(第三)，恩斯特和马蒂亚斯跟蒂罗尔的费迪南一样，1586 年竞相争取波兰的王冠。马克西米利安被一个贵族党所选中，但是在战斗中败给竞选对手瑞典的西格蒙德亲王和皇家统帅扬·扎莫伊斯基。这位哈布斯堡人在西里西亚的土地上，在皮申附近被虏(1588 年)，被迫放弃王位，后又发誓，予以重申。西格蒙德国王和施蒂里亚的哈布斯堡家的女子、卡尔大公爵的女儿安娜结婚，此事以及为了反宗教改革而进行的教会政策上的合作，不久就导致奥地利家族和波兰新王朝之间的妥协。恩斯特和阿尔布雷希特这两位哈布斯堡家族的兄弟，几年以后就脱离了奥地利的政治。恩斯特大公爵在内奥地利和下奥地利短期摄政后，1595 年，任尼德兰总督时去世，而原来准备从事宗教事业的阿尔布雷希特，却于 1598 年以后作为国君领导了尼德兰的政府，而且干得很出色。他和西班牙哈布斯堡家的女子伊莎贝拉·克拉拉·欧格尼亚的婚姻并无子嗣，因此，尼德兰南部在他死(1621 年)后重又落入西班牙手中。马克西米利安，从 1585 年起任德意志骑士团的大师兄(Hochmeister)①的助理(称为德国师兄)，在波兰冒险

200

① Hochmeister(大师兄)是德意志骑士团(Deutscher Orden)的首领，又称为

失败后，在内奥地利和蒂罗尔任摄政。在对土耳其斗争中，他任前敌统帅，战绩甚微。马蒂亚斯在 1577 年—1582 年企图作为西班牙和起义军之间的第三势力进军尼德兰，这次冒险失败后，他多半呆在恩斯河上游之邦①；从 1595 年起，他作为皇帝的总督执掌下奥地利各领地的政务。但是不久，当个人间和政治上的矛盾使皇帝和他的较年轻的亲属之间爆发一场激烈争执的时候，他成了鲁道夫的死敌。在这几年里，在处理一切政治和教会问题时，果断有力的梅尔希奥·克列斯尔大主教作为最有力的人物越来越崭露头角；他真正推动了奥地利多瑙河地区正在蓬勃发展着的反宗教改革。

在这里，尽管耶稣会教士取得某些局部的成就，天主教的情况还是非常可怜的。在下奥地利，首先由恩斯特大公爵作为总督所体现的邦君的权力，取得了对新教徒阵线初步的、但又是影响深远的突破。在维也纳邦议会旁举行的福音派新教会的礼拜式被迫停止，布道师不得不离开这个城市，其中重要的有约书亚·奥皮茨。1579 年 7 月市民向大公爵呈递请愿书，毫无结果；在宫廷里供职的新教徒被排挤掉，新教市民中的领袖人物被捕。各等级的反抗虽然比较难以打破，但是，在这里有一个颇有影响的天主教少数派，属于这一派的有一些大贵族的家庭成员，如列支敦士登、特劳特森、哈拉赫和布罗伊纳等，他们站在信奉天主教的王室一边。显然极为不幸的是，即使在这种灾难临头的形势下，梅兰希通和弗拉修斯·伊利里库斯的信徒们之间的对立依然无法消除；因此，不能建立起一个统一而有效力的路德派教会组织来；喀尔文教派本来就是坐山

Grossmeister（大师兄），其助手（Koadjutor）称为 Deutschmeister（德国师兄），负责骑士团在德国地区的工作。——译者

① Land ob der Enns，即上奥地利。——译者

201

观虎斗的。天主教方面不仅拥有国家权力，而且还有为耶稣会教士格奥尔格·舍雷尔所感化而皈依天主教的维也纳面包师的儿子梅尔希奥·克列斯尔，他是一个热情而又颇有成就的神父，出色的组织家，非常精明的政治家。克列斯尔做过圣斯特凡教堂事务总监，帕绍大主教的代理法官，1588 年以后当维也纳新城主教区的行政官，他的活动很广泛。他热情地帮助克服自己队伍里的缺点，继而着力争取城市和集镇回过头来再信天主教。在十年以内，他成功地使旧的信仰在几个较大的城市里重占优势，当然，也从外部施加了压力；莱塔河畔的布鲁克、巴登、海因堡、雷茨和其他一些地方就是这样信了天主教。1585 年至 1588 年，克列斯尔在维也纳也取得重大的成就。在双城克雷姆斯和施泰因，以及伊布斯河畔的魏德霍芬，都曾遇到较为激烈的反抗。在上奥地利，重新天主教化开始得略为晚些；新教最强大的阵地就在这个邦。1592 年以来，信奉天主教的邦长官汉斯·雅各布·勒布尔·冯·格赖因堡和克赖因贵族家庭出身的喀尔文教徒格奥尔格·埃拉斯穆斯·冯·切尔内姆布尔，作为两个教派的政治领袖在这里相对峙。一次也有下奥地利人参加的新教农民起义和 1592 年爆发的土耳其战争，使各等级内部的教派斗争暂时未能采取更加尖锐的形式。新教贵族不能不认识到，农民起义除了有宗教倾向以外，而且在具有宗教倾向以前，也有社会革命的倾向，矛头指向统治者，因此，他们出自等级上的顾虑，完全没有对农民教友表示有效的声援。暴动被镇压；福音派阵营内部的社会分裂后来也极大地损害了新教的事业。

在费迪南公爵的领地和区域里，1576 年后反宗教改革继续进行，十分顺利，没有遇到什么反抗。新教徒的残余还在萨尔茨堡教区的蒂罗尔部分里保存着，而在福拉尔贝格，有一个时期，还有隐

蔽的喀尔文教派，他们得到毗邻的格劳宾登的支持。费迪南大公爵的夫人菲利皮内死于1580年。她的两个儿子都是很令人讨厌的人。其中安德烈亚斯未受僧职就做了康斯坦茨和布里克森的主教，后来又是统治前奥地利领地的总督。次子卡尔分得布尔高侯爵领地，此外，还把内伦堡和霍亨贝格分拨给他；他还继承了父亲所搜集的安布拉斯艺术珍品。菲利皮内死后，大公爵费迪南娶了曼图亚公主安娜·卡塔琳娜；他希望这次结合能给他带来几个门第相等的男性继承人，可是安娜·卡塔琳娜只给他生了三个女儿，最小的女儿安娜1611年和她的堂兄、国王以及后来的皇帝马蒂亚斯结婚。费迪南大公爵死（1595年)后，德意志骑士团的"德国师兄"马克西米利安大公爵做了总督，在蒂罗尔执政。

在内奥地利，马克西米利安皇帝死后不久，新教的事业取得了一次最后的、相当成问题的成就，它似乎不仅肯定了而且扩大了1572年和1576年的成果。1578年2月9日，邦君为争取"对反土耳其战争的支援"，对在穆尔河畔的布鲁克召开的内奥地利总邦议会作了口头的承诺，这些承诺涉及到格拉茨、犹登堡、克拉根福和莱巴赫等地的传教师；也泛泛地谈到了保障市民的信仰自由。据此，邦议会议员们认为对新教的宽容在邦君辖下的城市和集镇里也有了保障，并把"布鲁克和解"连同1572年和1576年的声明和批准书汇编成一本"小册子"。卡尔大公爵由于他的承诺而遭到天主教方面的猛烈攻击。他下令发表一个没有提及市民的和解文本；人们把这个限制解释为副首相沃尔夫冈·施兰茨博士的篡改；大公爵在布鲁克所作的许诺也许故意措词含混，无论如何，邦君的纪录也好，等级代表们的纪录也好，似乎都把许诺中对各自的信仰教派有利的提法包括进去。格尔茨伯爵领地，也就是在新教力量最薄弱的内奥地利地区，1579年就已下令驱逐传教师了。1585年，

202

格拉茨耶稣会的学院扩建为大学。邦君的宗教委员会在很多地方用天主教神父代替福音派的传教师。邦君的行动得到泽考和拉凡特的刚强有力的主教马丁·布伦纳和格奥尔格·施托巴伊斯的持续不断的支持。

在卡尔大公爵去世(1590年)后，恩斯特大公爵和马克西米利安大公爵掌管内奥地利，直到卡尔的儿子费迪南(第二)于1595年亲政时为止。于是，随着他的上台，一位来自王朝行列中的反宗教改革最坚定的代表执政了，他后来成功地首先在内奥地利，然后在除了匈牙利和西里西亚以外的其他哈布斯堡领地里，几乎全部把新教铲除掉。宗教委员会在雇佣军护送下，走遍各地，关闭和破坏新教教堂，焚毁宣传福音的书籍，驱逐布道师。在克恩滕，也和在施蒂里亚相似，人们搞得十分残酷。最后轮到邦首府格拉茨和克拉根福(1600年)，只有贵族得以幸免。在克赖因，反宗教改革进行稍晚些，在这里，除了莱巴赫以外，反宗教改革迅速取得成绩。

在皇帝鲁道夫第二执政下，局部的边界战斗燃烧成一场经年累月的对土耳其战争（1592—1606年）。奥斯曼人把君士坦丁堡条约和亚得里亚诺佩尔条约仅仅看作停战协定；在他们的眼里，203 四千人以下，没有动用大炮，小规模地侵犯皇帝领土的行动，不能算破坏和平。他们企图用游击战来损害皇帝在国内的地位，迫使局部地区向他们臣服和纳税，以此扩大他们的统治地盘。由皇帝属下的各民族凑成的雇佣军以及在地方上招募来的军队保卫着漫长而战略上不甚有利的边界线。一般地说，匈牙利人宁愿没有外来的军队到他们的国家里来，可是他们又总是要求丰厚的金钱援助。准备点火为号(烽火)，把敌人的临近通知遥远的后方，也属于边境保安措施。这些措施经常没有充分发挥作用，无论是领主，还是臣民，都不愿意为信号站作出哪怕是十分微小的牺牲。1578年，

内奥地利的卡尔大公爵承担了保卫东南部德劳河和萨瓦河之间的温迪施边界以及萨瓦河和大海之间的克罗地亚边界的任务。他在库尔帕河畔建成坚固的卡尔施塔特要塞，增强了防务。在边界的重要地段都设有哨所和防御工事。内奥地利各邦为保卫委托给他们的边界地段，作出了巨大的财力和人力的牺牲。在皇帝管辖下的克罗地亚，从土耳其统治区移进了信奉正教的塞尔维亚人，这些“乌斯科克人”(Uskoken) 证明既是骁勇善战，也是难于就范的分子。鲁普雷希特·冯·埃根贝格在其他指挥官配合下，在西赛克取得辉煌战果，抵御了波斯尼亚土耳其长官的一次入侵之后，克罗地亚地段的边界战斗就演变而为一场旷日持久战争 (1592 年—1606 年)。在随后的岁月里，双方各有胜负。维也纳外城拉布失守，但，1598 年，由于一次成功的突击，把它重新夺了回来。在整个帝国，人们纷纷在十字架和路标上题词，以示庆祝这次攻克。格兰，维斯普雷姆和施图尔魏森堡，都曾几度易手。西本比尔根人从 1595 年以来就站在皇帝一边，但是，在年青的西格蒙德·巴托里放弃统治权以后，皇帝的军队在巴斯塔将军率领下占领了这个国家；而当人们不顾军事首领的警告，仍然在这里采取反宗教改革措施的时候，西本比尔根人的态度就变得动摇不定。不久，形势变得一团糟，西格蒙德·巴托里撤回了他的辞职，和土耳其人相勾结；有进取心的瓦拉几亚总督米夏埃尔加入了斗争，但是，在巴斯塔的指使下被人暗杀 (1601 年)。米夏埃尔的继承人拉杜尔·舍尔班忠于皇帝，在反对土耳其人及其追随者方面颇有成就，接着，西格蒙德·巴托里就重申放弃统治权(1602 年)。这时，人们在维也纳感到可以放心了，于是又强化了反新教的措施。因此，德意志人和路德教派占优势的上匈牙利山城，以及西本比尔根的萨克森人，就背叛了皇帝，而以前他们一直是支持他的。巴斯塔企图采 204

取严酷的手段挽回局面，然而反抗变得更加坚强，鲁道夫第二对匈牙利帝国议会的要求不肯妥协，迄今一直忠心耿耿追随皇帝的喀尔文教徒贵族斯提凡·博奇凯就起来领导不满者，不满者选他为西本比尔根侯爵。博奇凯在上匈牙利也有很多拥护者。皇帝的军队不得不向西撤退，土耳其人利用这个转折夺回很多地方；博奇凯最后臣服于土耳其宰相。

现在必须媾和；早些时候，在博奇凯起事前，土耳其政府为波斯和小亚细亚起义者所逼迫，致力于谋求停火，那个时候，媾和条件会有利得多，也许会挫败土耳其在匈牙利的优势。内奥地利的费迪南大公爵总算成功地缔结了维也纳和约，首先解决了同匈牙利人的斗争，允许他们享有信教的自由，这种自由又悄悄地扩大给喀尔文教派。博奇凯除了西本比尔根侯爵领地以外，还得到匈牙利东北部的几个郡，不过，如果他死后没有男性继承人，这些地方就要归还奥地利家族。据心怀疑虑的匈牙利人的要求，条约的规定经奥地利和波希米亚的等级代表批准。皇帝在保密的记录里记下了一项保留：他只因形势所迫而作出让步。在维也纳和约签订之后，与土耳其人的谈判也进行得很顺利。1606 年 11 月，席特瓦托罗克(位于格兰和科摩恩两要塞之间的席特瓦河口)和约签字。土耳其政府第一次承认奥地利及其皇帝是平等的政权；用一次过的赠款来代替被土耳其人理解为纳贡的每年一次的付款。条约也为未来的外交往来确定了双方平等的关系。自然，条约的某些条款规定得很不清楚，而且土耳其文本和拉丁文本相差得很远。以后的麻烦由此而发生。军事阵地就作为划定边界的依据。所以，双方征服的地方都各自保留，土耳其人保留了卡尼沙和埃尔劳，皇帝保留了魏岑和位置重要的诺格拉德郡。鲁道夫想比较长时间地破坏和平协定，虽然他没有足够的军队和钱财来继续进行卓有成效

的斗争；内奥地利的费迪南大公爵也采取类似的拒绝态度。他们最后屈服于亲戚们和匈牙利人的压力。在谈判中，有魄力的路德教徒斯特凡·伊勒萨奇成了匈牙利各等级的代言人而崭露头角，1608年他被选为侯爵。

205

这两个和平协定签订之后不久，斯特凡·博斯奇就去世了。他推荐对皇帝友好的贵族瓦伦丁·霍莫奈接替他，但是，西本比尔根人却选举了西格蒙德·拉科西。拉科西不久又让位给西本比尔根最有名望的家族的代表加布里尔·巴托里。

"哈布斯堡兄弟失和"

皇帝鲁道夫第二有卓越的天赋；他特别爱好美术和自然科学，作为文学艺术的提倡者和收藏家，在他那通晓艺术的家族的多数成员中，他是出类拔萃的，在青年时代，他对政治事务也不乏健全的判断。不过，随着年齿的增长，他的神经错乱发作得越来越频繁，他忧郁而无所事事，有时又突然大怒，暴跳如雷。对他的亲属，对宫廷周围的人，同对所有的陌生人一样，他都极不信任，他一再撤换他的工作人员，无缘无故地使他们失宠，而让政府的事务搁置起来。皇帝曾经力图阻挠与土耳其的媾和，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的意见分歧终于演成一场他和他的亲属间的激烈冲突，即所谓"哈布斯堡兄弟失和"。早些时候，他的弟弟们，尤其是马蒂亚斯，提出统治权的要求而没有得到满足，在那个时候，就已种下这次争执的根苗。

关于皇帝的所作所为，传出了越来越令人不安的消息，因此，1605年，大公爵们一起对君主表示他们担心他的措施将对王朝产生危险的后果，可是，君主没有听取他们的意见；尽管如此，那时马蒂亚斯还是得到了与匈牙利人和土耳其人谈判所必要的全

权。在克列斯尔的倡议下，终于在1607年4月25日在维也纳达成秘密协议，承认马蒂亚斯是家族的实际首脑。当皇帝力促重新对土耳其进行战争并企图离间马蒂亚斯和他的谋士们的时候，马蒂亚斯却力图与匈牙利的和奥地利的各等级议员取得谅解，虽然他们的最杰出的代表都是新教徒。除了目标明确的上奥地利代言人切尔纳姆布尔和并非无私的匈牙利人伊勒萨奇外，素有涵养而厌恶任何暴力行为的赫恩胡特兄弟会成员摩拉维亚人卡尔·冯·齐罗丁和他的信奉天主教的同乡卡尔·冯·列支敦士登尤其是最著名的等级政治家。1608年2月，奥地利和匈牙利在普雷斯堡缔结了维护内外和平的同盟，当然，这是在天主教的教士和几个仍然忠于皇帝的贵族缺席的情况下进行的。在鲁道夫皇帝的很不得人心的党羽、邦长官拉迪斯劳斯·冯·贝尔卡被罢免以后，摩拉维亚人加入同盟。波希米亚人暂时还忠于皇帝，由于他们的拒绝，马蒂亚斯在恰斯劳召开的一次会议失败了。西班牙的一次调解尝试也毫无成果。

206

外交局势极端令人不快。亨利第四正在炮制一项针对奥地利家族、西班牙和皇权的“伟大计划”，哈布斯堡家族在帝国内部的死敌，如克里斯蒂安·冯·安哈尔特，与切尔纳姆布尔结成同盟，他们希望奥地利政权崩溃。巴伐利亚公爵袭击了帝国直辖城市多瑙韦尔特，促使德意志新教徒结成一个活跃的政党，叫“联盟”(“Union”, 1608年)，一年以后，一个对立的天主教“同盟”(“Liga”)在巴伐利亚领导下成立。在这些动乱事件发生的时候，马蒂亚斯把军队开进波希米亚；最后缔结了利本条约(1608年6月24日)，在这个条约里，马蒂亚斯得到匈牙利的、恩斯河两岸的奥地利和摩拉维亚的统治权，而把蒂罗尔和前奥地利让给鲁道夫。不过，现在马蒂亚斯不得不去处理他的各等级同盟者的要求了。摩拉维亚

人满足于对信教宽容所作的极其笼统的保证。在奥地利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因为切尔纳姆布尔及其追随者不会轻易感到满足。上奥地利人团结一致地支持这个富有战斗精神的喀尔文教徒,相反地,下奥地利已经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天主教少数派,当新的等级代表在霍恩集会时,大多数城市都敬而远之,而这时,维也纳的天主教徒们却归顺于马蒂亚斯。对他有利的是,1608 年 11 月匈牙利人选他为国王,以换取他在宗教上和政治上相应的让步;那时匈牙利的城市和集镇也得到了宗教自由的保证。在漫长谈判过程中,曾经考虑过把马蒂亚斯掌管的领地归还给皇帝,经过谈判以后,马蒂亚斯和霍恩联盟之间在 1609 年 3 月 19 日达成了协议。卡尔·冯·齐罗丁曾从中斡旋。领主和骑士等级中的新教成员得到了在马克西米利安第二在让步中所许诺给他们的自由。对于城市,笼统地重申尊重它们的"老习惯";这还不意味着信仰和礼拜的自由,不过,上奥地利人有了机会,可以提出他们在这方面的要求。一年之后,切尔纳姆布尔成功地为城市争得明确的许诺,他和伊勒萨奇的后继者匈牙利侯爵图尔佐建立联系,而且这次把齐罗丁也拉到自己 207 这一边。当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天主教在这些城市里已经大大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撇开上奥地利不说,当时在贵族阶层以外,信奉新教的只是居民中的少数。

在这期间,波希米亚的形势也已经变了。鲁道夫第二对于波希米亚各等级多数派关于批准他们在宗教上的要求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然而,当各等级以武力相威胁时,鲁道夫在 1609 年 7 月 9 日下了一道"诏书",诏书虽然没有正式谈到新教徒,而是谈到了胡斯派教,但实际上包含了反宗教改革期间奥地利家族对新教和各等级势力所作的最广泛的让步。诏书保证给贵族和城市以信仰自由,建立教堂和学校的权利,监督大学和设立等级"保卫"委员

会（Defensoren），以保卫让与他们的权利。在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关于细节问题和实施问题的补充议定书里，也谈到了在皇家土地上兴建教堂的权利;新教徒把教会地产也理解为属于皇家地产。

皇帝的另一项政策是由他个人对马蒂亚斯的厌恶所决定的;鲁道夫不是考虑让他来继承帝国，而是考虑让内奥地利的卡尔的儿子、已经还俗的帕绍大主教利奥波德大公爵来继承帝国。利奥波德已经招募军队，他的军队在帕绍和恩斯河上游之邦里作恶多端。1611年1月,他们向布拉格进军,妄图扭转局面,使之有利于鲁道夫第二。他们袭击了赫拉钦,但是失败于城下,不得不撤退。这样一来,皇帝就暴露了他的无能，各等级代表转向马蒂亚斯，马蒂亚斯同样率部进入这个领地，并被加冕为波希米亚国王。鲁道夫只得到布拉格城堡作为首府,他于1612年1月20日逝世,从而结束了这场兄弟不和。

在此期间，外交方面经历了严重危机之后出现了和缓。最后一位于利希和克莱弗公爵死后，在这个德国西部地区继承人的问题变得现实起来。普法尔茨—诺伊堡、勃兰登堡和萨克森都提出继承权要求,鲁道夫第二也插足其间,并派利奥波德大公爵到于利希去。新教联盟和他们的保护者法兰西的亨利第四联合起来，反对哈布斯堡家族在这块有争议的地方立足。在敌对行动发生之后，亨利国王被一个宗教狂热分子所杀，以及好战的普法尔茨选帝侯弗里德里希第四的去世，拯救了和平。诺伊堡人的有继承权的儿208 子转向天主教，造成了一种新的局面，最后由勃兰登堡和普法尔茨—诺伊堡瓜分了这个有争议的地区（1614年)。一场欧洲战争在德意志土地上再次被阻止,未能爆发。

当哈布斯堡家族的兄弟内讧行将结束的时候，在萨尔茨堡大主教区也发生了一场统治者的悲剧。好大喜功而又颇有天分的沃

尔夫·迪特里希·冯·赖特瑙排挤了各等级的代表，蔑视旧的惯例，实施一种强有力的独裁统治。这位年轻的教会贵族毫不掩饰他和漂亮的萨尔茨堡市民女儿莎乐美·阿尔特的关系。他所采取的反宗教改革行动开头搞得很猛烈，后来有所节制，他企图开办一些天主教神学课，来把他的信奉新教的臣民争取回来。大主教还大兴土木，建设萨尔茨堡城，为此，他牺牲了旧的建筑物，其中有被烧坏了的罗曼式大教堂。沃尔夫·迪特里希和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由于争夺制盐权爆发了一场争执，带来了不幸的后果。马克西米利安击退了大主教一次考虑不周的进攻以后，开入萨尔茨堡。沃尔夫·迪特里希已经逃跑，在克恩滕的土地上被俘，并且被迫下台（1612 年)。福拉尔贝格人马可·西蒂库斯·冯·霍亨埃姆斯接管大主教区，他是沃尔夫·迪特里希的远房亲戚和冤家对头，他也用类似的作风进行统治。两位大主教都脱离帝国内部的党派斗争，因此都没有参加天主教同盟。

马蒂亚斯皇帝和三十年战争爆发前的历史事件

鲁道夫第二死后，马蒂亚斯不久就在 1612 年 6 月 13 日被选为皇帝。这场选举是经过精心准备的；对马蒂亚斯有利的是，新教徒觉得他比内奥地利的费迪南危险性小一些。梅尔希奥·克列斯尔，自从 1611 年以来，就是“枢密院”的主导人物和政策的实际负责人——老百姓称之为“副皇帝”，实际上，同他从前的态度相比，他那时已经有了一种值得注意的、颇具政治家风度的转变，他寻求与帝国内部的新教徒实行和解（“合作”）。他有理由担心会爆发一场宗教战争，因为新教联盟和天主教同盟在外交上结盟可能会招致不可预测的后果。积极开展反对土耳其的外交本来会有助于缓和教派之间的紧张。然而，由于两个阵营毫不妥协，克列斯尔的计

划在雷根斯堡帝国会议上（1613 年）未能实现。在所有比较重要的事情上，新教派都拒绝了帝国议会代表中天主教多数派的决议，同样，天主教徒的态度也强硬起来。克列斯尔尽管以后在宗教政209 策问题上表现更为克制，他在宗教上的前程却依然是载荣载誉的。他作为主管者长期负责领导维也纳主教区，于 1614 年成为主教，1615 年成为枢机主教。由于他表现得自傲而又不甚讲究策略，在这期间，他在统治者家族的圈子里很不讨人喜欢；马克西米利安大公爵有计划要把这位主教搞掉，但遭到其他哈布斯堡人的拒绝。这些年来，这位教长积攒了大量财富，后来人们怀疑他受贿赂，但没有证据。

尽管克列斯尔外交上精明机智，可是，皇帝在各个邦里的困难却与日俱增。匈牙利的局势无法逆料，虽然土耳其人保持安静。在西本比尔根，加布里尔·巴托里由于飞扬跋扈，而失尽人心。各种阴谋威胁着他的统治，在和瓦拉几亚的都督拉杜尔·舍尔班的战争中，开始时，他很顺利，后在克隆施塔特[①]却被打得落花流水。不过，皇帝要夺回西本比尔根的尝试在赫尔曼施塔特[②]城下遭到失败。巴托里为了挫败自己领地里的敌人，再次靠拢皇帝。当另一个觊觎西本比尔根统治权的敌手、巴托里以前的追随者，有才华而果敢的加布里尔·贝特伦，在土耳其的支持下，开进这个邦的时候，巴托里失败了；他被暗杀，贝特伦成为这个邦的主人。过了一些时候，在蒂尔瑙和约（1615 年 5 月 6 日）里，他被维也纳宫廷承认为西本比尔根的侯爵，诚然，相互关系依旧是紧张的。稍后，由于签订了维也纳条约（1615 年 7 月 14 日），与土耳其的和平得以延长二十年。

---

① 即今罗马尼亚的布拉索夫，下同。——译者
② 即今罗马尼亚的锡比乌，下同。——译者

1615年，由于定居在克罗地亚沿海地区岑格城周围的乌斯科克人进行海盗活动，内奥地利的费迪南大公爵和威尼斯共和国之间爆发一场武装冲突；威尼斯人方面企图扼杀奥地利在亚得里亚海沿岸的贸易。费迪南兵员短缺，但是，格拉迪斯卡要塞保卫战打得很顽强，使敌人未能获得更大的成就，阿尔布雷特·冯·瓦伦斯坦上校在这次保卫战中表现得特别出色。在法兰西和西班牙从中调解之后，终于在1617年9月26日在马德里缔结了和约。一支德意志卫戍部队开往岑格，乌斯科克人受到约束，威尼斯人撤出几个被占领的边境据点。既然亚得里亚海的航行问题仍然悬而未决，马德里条约绝不是有利的，不过，当波希米亚的政治事态变得越来越紧迫的时候，和约却使奥地利在一条次要的战线上得到安宁。

就事关教派的和民族的重大问题而言，波希米亚王国是一块灼热的土地。在胡斯动乱爆发时，波希米亚境内的德意志人大部分成为动乱的牺牲品，在这以后，由于新来移民的迁入，德意志成分又有所增强；西北地区一向是德意志人的天下。1615年，捷克贵族在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波希米亚邦议会，通过了好几个流露出强烈的反德意志情绪的决议，虽然有影响的贵族领袖，如马蒂亚斯·图恩和莱昂哈德·科洛那·冯·费尔斯，都是半德意志出身的外来人。德语应被广泛地排除于官方交际、公众场合和教堂礼拜之外，移入居民的子女应强制学习和使用捷克语。类似的倾向在摩拉维亚的邦议会里同样有所表现。苏台德地区的社会对立也是严重的，因而在决定性的斗争中，波希米亚方面宁愿不去武装农民。然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教派关系的紧张，诏书未能消除这种紧张，尤其是因为在解释这个文件时存在着意见分歧。诏书容许新教徒有在王家地产上建筑教堂的权利，他们把教会的地产也

210

看成是王家地产；天主教派拒绝这种看法。这些分歧导致在布劳瑙和克洛斯特格拉布建筑教堂的冲突。因为布劳瑙新教徒反对停止建筑教堂的诉讼被驳回，马蒂亚斯·图恩领导下的一个激进党策划了一项势必产生决裂的行动；这个党在早些时候，即1617年6月，在选举费迪南大公爵为波希米亚国王时，曾遭到突然袭击。这样一来，就发生了“布拉格掷出窗外”事件。1618年5月23日，一个等级议员代表团前往赫拉钦，经过激烈辩论之后，把最可憎的皇家总督雅罗斯拉夫·冯·马丁尼茨和威廉·冯·斯拉瓦塔以及他们的机要秘书菲利浦·法布里齐乌斯从窗口扔到护城壕里；不过，三人都幸免于死。

领地的安全和组织比搞这样一次暴力行动要困难得多，人们还不得不估计到维也纳会作出反应。威廉·冯·鲁帕成为由三十人组成的等级督政团的首脑，这一运动的真正的策划者马蒂亚斯·图恩负责指挥一支迅速征募起来的军队。对天主教徒采取了严厉的步骤，耶稣会教士被驱逐出境。人们听任信奉天主教的领主属下的奴仆皈依新教，而没有考虑对新教贵族管辖下的信天主教的农民作出相应的让步。

在维也纳，一片混乱。跟以往一样，皇帝马蒂亚斯还是依靠克列斯尔出谋划策，同他一样，也想讲和；他们和波希米亚各等级的议员谈判，后者在此期间继续扩军备战。费迪南国王领导的主战派由于来自波希米亚的天主教难民而力量有所增强，而认为强行 211 实施军事解决的时机已经到来。克列斯尔特别为这个集团所憎恨；费迪南让宫廷财务署长布罗伊纳逮捕他，并解往蒂罗尔，在那里，他被软禁在安布拉斯和格奥尔根贝格。后来他得到允许，前往意大利；1627年，他返回维也纳时，名望已经恢复，但失去了政治势力；1630年9月18日，他在这里去世。大搏斗的最初十二年的

进程似乎驳斥了他的担忧,后来却出现了他所担心的那种转折,他比他的对手们更有远见。克列斯尔的巨额财富在他垮台时被没收,用来支付皇帝的战争费用。

三十年战争

自从克列斯尔垮台以来,得到西班牙支持的奥地利主战派占了优势;然而,只有在马蒂亚斯皇帝1619年3月20日驾崩之后,公开爆发斗争才成为不可避免。皇帝好大喜功,然而却又意志薄弱,无法驾驭政治形势,尽管如此,全部和平的希望都取决于他个人,因为蒂罗尔和前奥地利的摄政王马克西米利安大公爵已于1618年死去,由费迪南这个最不妥协的宗教改革的反对者继承奥地利家族的领导,所有新教徒对他都心怀恐惧。

诚然,费迪南的地位还决不是巩固的。图恩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军队开进下奥地利,在菲沙门德渡过多瑙河,向维也纳进逼。由保尔·雅各布·施塔海姆贝格伯爵和安德烈亚斯·托恩拉德尔男爵率领的下奥地利新教等级代表团,在1619年6月5日,争取费迪南作出让步,以换取同波希米亚人的和约,以及在宗教事务上给予迁就。然而,邦君态度坚定。胸甲骑兵到达维也纳,加强了城防,军队开进宫城,一路上耀武扬威,这些给居民和各等级的代表留下强烈的印象。后来发生了“狂飙式请愿”,事态演变得极其激越;新教贵族表现虽然坚定不移,但也不是傲慢无礼的。波希米亚军队未敢进攻维也纳,不久就撤回本邦。虽信天主教但敌视哈布斯堡家族的萨伏伊公爵所派遣的雇佣军首领恩斯特·冯·曼斯费尔德被皇帝的前敌司令官布古瓦击败,皇家军队在波希米亚的地位亦有所改善。费迪南前往法兰克福竞选皇帝,尽管新教徒们忧心如捣,他还是在8月28日在一致同意下当选。奇怪的是,他竟 212

也得到普法尔茨选帝侯弗里德里希的选票；后者两天前在费迪南被废立之后，被起义军选立为波希米亚国王，并且很快就在布拉格加冕。当西本比尔根侯爵加布里尔·贝特伦参加到波希米亚一方，并迅速夺取了多瑙河以北皇室管辖下的匈牙利地区的时候，在双方目标不甚明确的作战中，在年底将近时，似乎出现了一个对波希米亚人有利的转折。皇帝的敌手们的大军再次兵临维也纳城下，费迪南下令全城准备进行保卫战。贝特伦的天主教敌人瓦伦丁·德鲁格特·冯·霍莫奈从波兰出发，突进到西本比尔根侯爵的军队背后，迫使贝特伦后撤，贝特伦的后撤又引起波希米亚人的撤退。费迪南同贝特伦缔结停战协定，把被占领的地区交由贝特伦统治。

1620年，对文策尔王朝统治下各邦的争夺越来越明显地具有国际性质。在帝国内部，天主教帝国议会代表同盟，即天主教同盟(Liga)的改组变得重要起来；有魄力的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为同盟建立了一支很有战斗力的军队，由久经考验的统帅约翰·切尔克拉斯·冯·蒂利男爵率领。萨克森选帝侯约翰·格奥尔格支持皇帝一事也是意义重大的；这样一来，新教阵营被分裂了。在普法尔茨人方面，如果人们竟然也寄希望于哈布斯堡的信天主教的对手，那么，除萨伏伊人以外，人们是失望了；尤其是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三不想支持波希米亚的叛逆者去反抗他们的领主。

当图恩和贝特伦进军的时候，上奥地利各等级代表在切尔纳姆布尔的影响下，仓促地和波希米亚人结成几乎毫不掩饰的同盟。但是，他们无力抵抗天主教同盟的入侵军队，领地被占领，并根据以前的协议，被皇帝典押给巴伐利亚，直到偿还战争费用时为止。天主教同盟的军队横渡多瑙河，在瓦尔德菲特尔与布古瓦统帅的皇家军队会师。大军挥戈直向布拉格，尽管布古瓦犹豫不决，蒂利

还是大胆地向在白山① 草率构筑防御工事的、并得到匈牙利部队增援的波希米亚人发动一次进攻,经过短暂的战斗,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普法尔茨的弗里德里希连保卫布拉格也都没有试一下,就逃离波希米亚。不久,这位受尽嘲笑的“冬天国王”就前往尼德兰。

现在,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对于奥地利已是确保无疑的了。加布里尔·贝特伦适时地缔结了一个并非不利的和约,和约把他所攻克的一部分土地留给了他。劳西茨抵押给萨克森选帝侯,他从北面进入波希米亚。卡尔·冯·列支敦士登和枢机主教迪特里希施泰因分别率领皇家委员会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工作。起义的首领,只要是没有跑掉的,均被处死,其他被揭发参与阴谋的贵族则丧失他们的财产。许多新教徒离乡背井。费迪南皇帝认为,波希米亚由于起义闹事已经丧失其特权,他撕毁了鲁道夫第二的诏书。1627年的“更新领地法规”是一个决定性打击,它把波希米亚及其邻近领地都变成哈布斯堡家族的世袭王国,各等级的选举权只有在王朝灭绝时才得以重新生效;领地议会的影响仅限于财政事务,宫廷波希米亚事务处迁到维也纳。

213

许多外来领主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攫取了大量地产,由于天主教的、罗曼的和德意志的家庭流入,贵族正在改变其性质。政府没有推行日耳曼化的政策,然而专制制度必然更强有力地应用和推广宫廷的德语;捷克语失势②。

① 白山(捷文为 Bila Hora),布拉格以西的高地(380米)。1820年,普法尔茨的弗里德里希在“白山之战”中受到皇家军队的进攻,遭到惨败。从此波希米亚的捷克人开始受到残酷迫害。——译者

② 捷克民族的传说,而且西方亲斯拉夫的历史著作,总是把1620年和1627年的事件解释为在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捷克人民“受难”的真正开端,恩斯特·德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国际紧张局势影响下写的《白山之战以后的波希米亚》(La Bôhme depuis la Montaigne Blanche, 1903年)一书就是这类西方著作的代表;然而,事实上当时专制主义和等级势力之间,以及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纷争才是居于第一位的。

现在，费迪南皇帝成了自己家族内部无可争辩的主宰，二十年代前奥地利的特殊地位再度变得更加明显起来，也就没有太大的意义。1619 年，马克斯大公爵的弟弟利奥波德大公爵首先作为封疆大吏，接替了马克斯。利奥波德本来是准备从事宗教职业的，他获得过帕绍(后来又获得斯特拉斯堡)主教这样的教会显职。1625 年，这位很能干的政治家放弃了他的宗教职务，和美迪奇[①] 的克劳迪亚公主结婚。一年之后，大公爵做到让皇帝承认他是有继承权的蒂罗尔和施瓦本的国君，不久，也是前奥地利其余领地的有继承权的统治者。

在二十年代中叶，上奥地利发生一次严重的危机。在抵押给巴伐利亚的领地里，任用天主教神甫一事触发了地方性的骚乱，尤其在法兰肯堡骚乱的规模更大。巴伐利亚总督、一个改宗者，亚当·冯·赫贝施托夫男爵下令进行一系列逮捕，并且违背已经许下的诺言，掷骰决定三十八人的生死，其中十七人被绞死。这个“法兰肯堡掷骰戏”和一道关于宗教改革的皇家特许令是新教农民公开起义的直接导因，斯特凡·法丁格尔和他的妹夫克里斯托夫·策勒是起义农民的天才领袖。一些城市的市民半自愿、半被迫地加入了起义；林茨尽管被长期围困，但是没有失陷，在围攻时，法丁格尔牺牲。起义军继续遭受挫折，1626 年 9 月达成停战协定，皇帝在一道赦免令中答应至少要减轻农民的社会负担。巴伐利亚的军队开进来时，农民再度起义，但是，被戈特弗利德·海因里希·冯·帕本海姆率领下的皇家军队和巴伐利亚人在埃弗尔丁和格蒙登打败。惨重的流血牺牲和严酷的惩罚措施摧毁了反抗。1628 年，上奥地利重归哈布斯堡统治。那时，在奥地利各邦里，反宗教改革又进一步强化起来；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在这个重新改信天主教的

① 美迪奇(Medici)是佛罗伦萨的一个名门望族。——译者

国家里，广泛地磨灭了对 1628 年起义及其精神的回忆。

1627 年，对上奥地利和下奥地利分别颁发了诏书，宣布再天主教化应予结束。接着在 1628 年 8 月 1 日又颁发对内奥地利的敕令。费迪南区别对待这些邦，其渊源在于他准备恪守对下奥地利的忠诚的新教贵族所发布的宽容条款；但是，除此以外，迄今一直受到保护的贵族也不得不让步。因此引起了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农民、市民、商人和贵族出国迁徙，奥地利失掉成千上万宝贵的人才。大部分移民转向信奉新教的诸侯领地和南德意志的帝国直辖城市。

首先是皇帝的同盟者西班牙和巴伐利亚的要求，在战胜波希米亚之后，在西方导致战争的继续进行。普法尔茨被征服，然后，皇帝和天主教同盟的军队又进攻敌对的雇佣军首领恩斯特·冯·曼斯费尔德和北德意志的克里斯蒂安·冯·安哈尔特。北德意志的新教徒转向丹麦的克里斯蒂安第四，克里斯蒂安出兵干涉，他的军队败给蒂利麾下的天主教同盟军，皇帝的司令官阿尔布雷希特·冯·瓦伦斯坦率部侵入日德兰。

吕贝克和约（1629 年）似乎保障了费迪南第二对德意志的统治和他在奥地利家族中的霸权地位。1629 年，皇帝颁布了“归还敕令”[①]，企图把帝国内部事态的发展限制在缔结奥格斯堡宗教和约时的水平上。这个敕令对教派的要求过于苛刻，激起新教徒进行绝望的反抗。瓦伦斯坦想取消选帝侯们的选举权并把德意志变为一个世袭国家，他和西班牙的外交家一样，认识到一种不现实的 215 宗教政策会招致危险，然而，费迪南出自信仰上的原因，贻误了政

① 归还敕令（Restitutionsedikt），为 1629 年费迪南第二所颁布，主要内容有：1552 年帕绍条约签订后，新教徒所占的教产发还给天主教徒；参加宗教改革的教堂一律排斥于宗教和约之外；信奉天主教的帝国议会等级代表有权对其辖下的臣民实行再天主教化。——译者

治上的良机。另一个严重的错误是，在1630年7月雷根斯堡诸侯会议上罢免了瓦伦斯坦，当然这是在诸侯们，尤其是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施加最强大的压力下才这样做的；对采取这个措施，法国的外交是作了贡献的，那时，它已经处在明智而有远见的枢机主教黎希留的领导下。在1620年没收财产期间，瓦伦斯坦获得了赖兴贝格和弗里德兰两领地，后来费迪南又授予他梅克伦堡公爵领地。现在，当他退隐到他的波希米亚庄园时，他辛酸地表示：皇帝对施予这一侮辱将会后悔的。

瓦伦斯坦的撤职发生在这样一个时候，那时，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已经陈兵波罗的海的德国海岸，并把瓦伦斯坦前此久围而未克的施特拉尔松城变为牢固的据点。雄厚的法兰西援助保证古斯塔夫·阿道夫有广泛进行战争的财政基础，有一支很有战斗力，而且受过各兵种配合作战训练的军队可供使用。除了新教的目标外，古斯塔夫·阿道夫还追求瑞典民族的目标；"统治波罗的海"(Dominium maris Baltici)构成纲领中的要点。尽管瑞典人开始时就取得重大胜利，北德意志信奉新教的诸侯们依然举棋不定，未敢公开站在瑞典人一边；这就使联合指挥天主教同盟军和皇家军队的蒂利，1631年4月有可能夺取马格德堡城，该城在攻占时成为一片火海。马格德堡的火灾在北德意志舆论中激起了惊恐，舆论完全错误地以为蒂利有意放火，惊恐情绪迫使德意志的新教徒和古斯塔夫·阿道夫合作。1631年9月17日，尽管萨克森盟军逃跑，瑞典人还是在莱比锡附近的布赖滕费尔德打败了蒂利的常胜军，在勒希河畔的赖因第二次胜利之后，瑞典人就可以长驱直入巴伐利亚。慕尼黑沦陷，只有因戈耳施塔特要塞坚守住。蒂罗尔似乎也受到了威胁，然而，利奥波德大公爵采取了足够的防卫措施。

费迪南第二迫于困境，再次向瓦伦斯坦求救。这个深受侮辱的人在这期间也与瑞典人取得了联系，要把他争取过来为皇帝效劳是不容易的。在格勒尔斯多夫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瓦伦斯坦要拥有几乎不受限制的全权，在这种极高的要求得到批准之后，他重新执掌兵权，他的敏捷的才干和巨大的名望使得组织一支强大的军队成为可能。他迫使古斯塔夫·阿道夫不再向奥地利各邦挺进；1632 年 9 月初，瓦伦斯坦在纽伦堡设防坚固的营垒里胜利地击退瑞典人的进攻。战斗转移到萨克森。1632 年 11 月 16 日，瑞典人在吕岑进攻瓦伦斯坦的军队。皇家军队由于帕本海姆的部队匆忙地调出执行临时任务而有所削弱，部队只有骑兵能适时投入战斗。古斯塔夫·阿道夫和帕本海姆都在鏖战中阵亡，瑞典人终于保住阵地，瓦伦斯坦经过莱比锡，撤退到波希米亚。他在布拉格设立军事法庭，审判在吕岑一战中失职的军官。 216

在往后的时间里，瓦伦斯坦的作战和个人行为越发令人捉摸不透。他的军营和波希米亚流亡者之间有联系；一个被截获的交涉人员赛西马·拉辛声称，大元帅正在觊觎波希米亚的王冠。瓦伦斯坦也和瑞典敌人进行违背维也纳指示的秘密谈判。皮科洛米尼向费迪南报告了大元帅的一项瓜分中欧和推翻奥地利家族统治的计划——自然，这个情报的正确性几乎是无从查核的。可以视为瓦伦斯坦行为的推动力的，几乎不是什么捷克民族的愤懑，如弗兰茨·佩卡日所设想的，也不是什么真正的"国家意识"，如海因里希·冯·斯尔比克所揣测的。在三十年战争的将领中，也许有一个人想到帝国而且真正是一个德意志爱国者——萨克森人汉斯·格奥尔格·冯·阿尼姆，然而，这个人在敌对阵营里工作，竭尽全力去破坏瓦伦斯坦的计划，他觉得这些计划是把国家拱手让给外敌的。就民族渊源和民族意识而言，这位弗里德兰人勿宁说是处

于几个民族之间。瓦伦斯坦力求与敌人达成叛国性的谅解，那是他对维也纳宫廷里的敌对集团、对巴伐利亚和对西班牙的愤恨情绪，以及他要对真正的和假想的侮辱进行复仇的愿望所使然。这样一来，他就踏上一条灾难性的道路，他的谈判对象纵然偶尔使他有些踌躇和猜疑，但是，从这条路上他再也不能回头了。

特别激怒维也纳的是，瓦伦斯坦在施泰瑙战胜一支瑞典集团军之后，把被俘的波希米亚头号叛徒马蒂亚斯·图恩重又释放，而且在1633年11月，瑞典人攻占雷根斯堡时，他拒不给巴伐利亚公爵以任何援助。瓦伦斯坦也拒绝把一个军团分给一支已经进入南德意志的西班牙军队。更为令人疑虑的是，他在1634年1月12日让他的军官们签署一项效忠声明（第一个比尔森决议），声明草稿里原有的"限于在他为皇上效劳期间"的字句，到了最后文本中却被删掉了。这时，忠于皇帝的军官报告了全部事情的经过，维也纳采取了适当的反措施。多数军队拒绝追随瓦伦斯坦。当褫夺大元帅的公权并要求不论死活捉拿归案的诏令下达时，他从比尔森启程前往埃格尔，准备与瑞典人汇合，但是，在1634年2月24日夜间，连同他的妹夫特雷奇卡，追随者金斯基、伊洛夫和诺伊曼，都被忠于皇帝的三个军官——爱尔兰人瓦尔特·巴特勒以及苏格兰人约翰·戈登和瓦尔特·勒斯利所组织的暗杀的牺牲品。人们因为对瓦伦斯坦采取这个行动而严厉谴责了费迪南第二。事实上，君主让三位枢密院顾问（埃根贝格侯爵、维也纳主教沃尔夫拉特和马克西米利安·特劳特曼斯多夫伯爵）对大元帅的过错进行鉴定，而他们并非瓦伦斯坦的死敌；此举颇似秘密审判，当然没有为被告辩护的可能，被告的有罪似乎已有定论。和广为流传的看法相反，皇帝的忏悔神父、耶稣会教士威廉·拉莫曼并没有参与筹划反对瓦伦斯坦的行动，不过，他在一个神学鉴定里为这一行动进行

了辩护。

1634年，皇家军队及其盟军获了辉煌的胜利。在夏天里，夺回了雷根斯堡，西班牙军队、皇家军队和巴伐利亚军队在诺德林根附近会师之后，于9月6日大败瑞典人。在此以前，皇帝已经和萨克森谈判，这些谈判导致1635年5月布拉格和约的缔结。最重要的帝国等级议员不久都参加了这个条约；皇帝放弃在德国北部实施"归还敕令"，为和解创造了条件。只有受到灭顶之灾威胁的南德意志新教徒还附和瑞典人，若不是法兰西一直在用外交手段破坏和平而现在公开介入斗争的话，战争可能就已经结束了。争取瑞典撤出波罗的海沿岸的一些地方，以换取战斗的调解，当然是可行的；在维也纳，人们没有认识到法兰西参战的影响，希望取得更为有利的条件。

在随后漫长的战争最后阶段，在皇帝方面参战的，除了西班牙和巴伐利亚以外，不久也有萨克森，一度有勃兰登堡；敌人方面，站在法兰西和瑞典一边的有尼德兰、萨伏伊和一些象黑森那样的德意志小侯国，以及在魏玛公爵贝恩哈德领导下的南德意志新教徒的一支很有战斗力的部队，贝恩哈德和法兰西人密切地合作。法国人尽管兵力强大，然而却缺乏作战经验，一时战绩寥寥，相反地，218 1636年瑞典将军巴内尔在波罗的海海岸附近的维特施托克打败了一支皇帝的和萨克森的军队。

1637年2月15日，皇帝费迪南第二逝世，在变幻多端的战争中，他保持一种坚定的态度，纵然在政治上并不总是贤明的；象黎希留所遵循的那种治国之道的新思想，对费迪南来说是陌生的，在他看来，宗教信仰决定政治。象狂热的改宗者卡斯巴尔·朔佩(西奥皮乌斯）和拉莫曼神父这样的顾问加强了他的这种态度。这位邦君对宗教事务的责任感为他创造了前提，使他得以摧毁在宗教

信仰上敌对而在政治上又不可靠的各等级代表的反抗时，采用专制政体，并得以为此在自己的良心和臣民面前为自己辩护。

费迪南第三的执政原则在对天主教事业的无条件忠诚上和他父亲相同，但他的政治实践比较冷静。在这期间，战争的进行明显地呈现不利的转折；对隶属皇帝的阿尔萨斯及其全力以赴参加抗战的忠诚的人民的命运来说，布赖萨赫要塞的沦陷是举足轻重的，在一切突围尝试失败后，1638 年 12 月 17 日，勇敢的指挥官赖纳赫不得不把要塞交给魏玛的贝恩哈德。贝恩哈德的早逝，使法国人稍后就得以占有这个由德意志新教军队所征服的领地。魏玛的军队被法国所雇佣。另一方面，瑞典向布拉格挺进失败，1639 年 6 月，皮科洛米尼在迪登霍芬附近取得一次对法国人的重大胜利。1640 年，拥有一些军队的黑森和不伦瑞克-吕内堡加入瑞典-法兰西联盟。在雷根斯堡的帝国会议上，皇帝企图为媾和创造先决条件；瑞典军队向这座城市推进，威胁了帝国会议，然而败于强有力的反击措施。1641 年，天才的将领勒纳特·托尔斯滕森接受了指挥瑞典军队的兵权；他取得战胜皇家军队的伟大战果，1642 年 11 月 2 日，他在布赖滕菲尔德第二战役的血战中也战胜了皮科洛米尼和利奥波德·威廉大公爵；瑞典人占领了西里西亚和摩拉维亚的大部分。更为不幸的是，西班牙政权越来越清楚地表明行将崩溃。1640 年，在加泰隆尼亚和葡萄牙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人们无法制止；紧接着，在那不勒斯和西西里也发生严重的骚乱。西班牙越来越迫切地要求皇帝的军事首领和军队予以支持，但是，军219 队在德国又几乎是不可少的。在尼德兰，法国前敌司令官孔代亲王在罗克罗瓦附近取得一次对西班牙人的决定性胜利（1643 年），法国人在德国西南部的战斗行动进行得不甚顺利，弗兰茨·冯·默西指挥下的一支很能打仗而又领导得很好的巴伐利亚军队迎击

了法兰西人。1643 年 11 月，默西与皇家军队协同作战，出奇制胜，在图特林根消灭了一支法兰西-魏玛的军队； 1644 年 8 月，在一场胜负未决就中断了的弗赖堡战役中，他顶住了孔代的一次进攻，1645 年 5 月，巴伐利亚人在默根泰姆再次战胜蒂雷纳麾下的一支法国军队；1645 年 8 月 3 日默西在阿勒海姆战役中阵亡才使这个战场有了转机，虽然法国人不久就撤退。在这期间，瑞典人在托尔斯滕森统率下继续取得成就。当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重新成为战场，瑞典军队转向一个新的对手时，皇家军队的压力基本上没有减轻。丹麦惧怕瑞典那种咄咄逼人的崛起，因而倾向于与皇帝结盟，然而它几乎没有进行战备；在突如其来、迅速策划和迅速实施的作战行动中，托尔斯滕森迫使丹麦进行谈判，谈判以缔结布隆塞布罗和约告终。一支在加拉斯率领下派去支援丹麦人的皇家军队，由于在饥饿的国土上进行劳累的行军而被司令官葬送掉。不久，瑞典人再次挥戈南进。1645 年 3 月 24 日，皇家军队在波希米亚南部的扬考遭到毁灭性的惨败；瑞典人侵入多瑙河以北的奥地利领地，占领了很多地方，其中有双城克雷姆斯和施泰因。但是，强行渡河没有成功，在围困由为皇帝效劳的法国胡格诺教徒德苏什坚强保卫下的布尔诺城时，托尔斯滕森遭受重大的损失。他寄希望于与西本比尔根侯爵乔治·拉科西的合作，当这个匈牙利人在拉姆佩尔斯多夫和林茨就政治和宗教问题与皇帝谈判达成谅解时，他的希望就落空了。另一方面，萨克森不得不同意与瑞典人停火，瑞典人获得在莱比锡和托尔高的驻军权。1646 年，瑞典军队在新的最高统帅符兰格尔的指挥下，向巴伐利亚和福拉尔贝格推进，布雷根茨被攻陷。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到那时为止一直是皇帝最强大的支柱，于 1647 年 3 月与法国和瑞典缔结了乌尔姆中立条约；韦尔特和施波尔克二位将军企图把巴伐利亚军队拉到皇帝一

边，未能成功。

夏天，瑞典人侵入苏台德地区，并且攻占埃格尔，于是巴伐利亚公爵再次站到皇帝一边。1648年5月17日，皇帝和巴伐利亚220的联军在楚斯马斯豪森被瑞典人和法国人击败，巴伐利亚在这次失败后重遭敌人蹂躏。然而，从尼德兰召回的皮科洛米尼率领下的皇家军队不久又解放了这块领地。瑞典将军柯尼斯马克胜利地奇袭了赫拉钦和布拉格的北城，但旧城和新城都能坚守，这是三十年大搏斗的最后一次比较重大的战争行动。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与奥地利

1640年以来争取实现和平的努力就已在进行，但是，法国却尽可能长时间地拖延谈判。维也纳宫廷里"极端派"的影响也起了不利的作用，他们出自教派上的原因反对一切让步，后来证明，由于敌人所取得的战果，让步是不可避免的。法国和瑞典提出了苛刻的要求，然而，皇帝的代表，尤其是首席代表马克西米利安·特劳特曼斯多夫伯爵和主管前奥地利问题的法学家伊萨克·福尔马博士进行坚忍不拔的谈判，争取到可以忍受的条件。领土的损失已不可避免，不过还保持在适度的范围以内。皇帝把宗德高、上、下阿尔萨斯侯爵领地、包括阿尔萨斯十座帝国直辖城市（斯特拉斯堡不在其中）的行政管辖区和布赖萨赫城割让给法国；法国还获得在菲利浦斯堡的驻军权。为此，皇帝得到赔款。他承担义务，不支持仍在继续进行对法战争的西班牙，但是，人们找到了绕过这一条款的途径。既然尼德兰与西班牙媾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也给这个国家减轻了某些负担，然而，西班牙和教皇一样，反对批准条约的异议却毫无成果。两个劳西茨[1]已经在1620年被皇帝抵押给萨克

[1] 指上劳西茨和下劳西茨。——译者

森，现在最终划归这个选帝侯领地。皇帝在帝国内的地位遭受极度削弱，除了萨克森外，倾向于法国的巴伐利亚，由于攫取了上普法尔茨和第七个选帝侯的地位，增长了势力，特别是勃兰登堡-普鲁士得以大大扩展了自己的疆域。莱茵普法尔茨（连同第八个选帝侯的地位）归还它的王朝。瑞士和尼德兰退出帝国同盟，留下的帝国等级议员得到充分的政治行动自由；关于他们不许针对“皇帝和帝国”而结盟的规定完全不起作用。此后，帝国就成了一个松散的国家联盟，体现它的结合的仅仅是皇帝的选举和皇帝本人、帝国会议，以及帝国最高法院和帝国宫廷司法处这两个互相竞争的司法机构。真正的帝国改革几乎是不可能的。1653年雷根斯堡帝国会议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毫无效果。极为令人忧虑的是外国的影响，瑞典和丹麦可以依赖在帝国会议中他们的北德意志属地所保留的席位和选票，法兰西可以依赖它本身的实际政治优势。 221

由于帝国联盟毫无希望地逐渐松弛起来，奥地利王朝政权的政治、军事和财政基础的重点比以往更多地转移到世袭领地上来。在这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重申了1620年和1627年的决定：专制制度和天主教的胜利。这个结果反映在和约有关教会的条款中：仅仅答应给西里西亚部分地区和下奥地利的贵族以实施奥格斯堡信纲的自由。瑞典王朝和帝国的新教派保留了为奥地利新教徒而进行非暴力干涉的权利。不过，新教徒的公开反抗逐渐熄灭。下奥地利的新教贵族，或者改宗易教，或者出境流亡，最后这样做的是十八世纪的青岑多夫家族；可是，直到约瑟夫第二的宽容特许令颁发时（1781年），在几乎整整一个半世纪里，在阿尔卑斯山地区的个别地方，尤其是在萨尔茨卡默古特和克恩滕，还有秘密的新教徒。在维也纳活动的新教徒有外国公使馆的职员和享有特权的外

国商人，即“开分号的人”中，特别是书商和印刷工人。在奥地利的军队中，也还有新教徒在服役，而且往往身居要职。在三十年的搏斗之后，奥地利继续保持一支由九团步兵和十团骑兵组成的武装常备军。从此构成皇帝固有军事力量的就是这支得到半正规的边防军和匈牙利民兵加强的军队，而不是帝国招募兵，为了这些招募兵还得在帝国议会的冗长谈判中讨价还价。对于皇帝来说，奥地利中央和各邦的官厅所具有的意义完全不同于残留的帝国行政机构；世袭领地的收入早就数倍于帝国的捐税。这样一来，由于种种原因，哈布斯堡人的地位在自己的家族政权内部要比在帝国内部牢固得多，人们开始把奥地利国家思想看得比帝国思想更重要。因此，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也标志着奥地利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教派斗争时代的垦殖和居民状况

中世纪后期人口下降，十六世纪人口又有增长，一些地区的垦222殖活动也较活跃。也许仅仅在某些局部地区才出现新的秩序，如在维也纳森林，那里的伐木工人的居民点发展成为一些或大或小的集镇，如格尔斯特霍夫，多恩巴赫，海因费尔德，后来也出现在格弗勒森林和德罗森森林，在那里，贵族格赖斯家族在其林务局里有计划地进行个别农家的移民。十六世纪在米尔菲特尔区的邦君的“自由林”里也进行了规模较小的垦荒。在反宗教改革时期重又香客盈门的恩典教堂和朝圣教堂的周围，也往往形成居民点，如玛丽亚-塔菲尔或玛丽亚-三橡树。为了安置增长的人口，在现有的村镇旁兴建各种各样的“新村”，或者至少在较大的旧农庄旁边，由贫穷的居民盖起简陋的茅舍。人口增长的一个极不良的后果是农民的土地被广泛地分配和分散，例如，在蒂罗尔的高山深谷里就是这样，以致邦君的政府在1571年就怀疑小农庄的生存能力。在葡萄

种植区，我们也发现地产状况有类似的发展。

在近代开始时，耕地的形式和旧的布局没有本质上的改变，但是，一般来说，边界要规则一些。这也适用于垦殖点本身。住宅建筑正从木结构向着石结构过渡；那时，上奥地利和下奥地利西部的四合院已具有轩昂的外观。

在城市，也兴建了更为讲究的市民住宅，后来，巴罗克式的正面往往掩盖了这种建筑活动。城市几乎没有扩大，然而，当用时髦的威尼斯防御工事修筑法建成附有幕墙、半月形射击点和外壕侧坡的棱堡带取代了中世纪的雉堞墙时，很多城市就面貌一新。这样的设施，我们在维也纳，格拉茨，克拉根福和林茨都遇见过，甚至在东南部无数的边境小城里也是如此。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帕里斯·洛德隆大主教就用这个方法在萨尔茨堡城设防。

尽管一般说来垦殖的情况没有十分引人注目的变化，而人口密度也只有微小的上升，但这个时代的人口的历史却没有显示出稳定的情景。反宗教改革和土耳其战争致使人口严重损失，然而也不乏弥补这一损失的尝试。十六世纪土耳其的入侵虽然不能长期地消灭较大的垦殖点，但是，鞑靼人抓了很多俘虏并把他们带离这个国家。在维也纳森林地区和东施蒂里亚，很多房屋被烧毁。1586 年，土耳其人卷土重来，侵入施蒂里亚内地。在遭洗劫地方的新移民中，布尔根兰和下奥地利的克罗地亚人值得一提，成群结队的克罗地亚人一直逃到摩拉维亚南部。在马希费尔德，奥特、马尔歇格和施洛斯霍夫等领地的村庄都住了移民，不过，在这里和在莱塔山的下奥地利的村镇，克罗地亚语在十八、十九世纪就灭绝了。在布尔根兰，拿达斯第家族和巴蒂阿尼家族曾赞助过殖民事业，在那里的德语区和马扎尔语区的边缘，在诺伊齐特尔、艾森施塔特、上普伦多夫和居辛等地区，至今还保留着克罗地亚风习。移 223

民主要来自克罗地亚沿海地区（"水克罗地亚人"），但也有来自萨格勒布地区和斯拉沃尼亚的。自然，也有无数来自奥地利世袭领地和来自帝国的德意志新移民，比如，1628年至1629年，下奥地利就有来自勒希河和因河河谷的蒂罗尔人。

宗教斗争对奥地利各邦的居民结构所产生的影响远比土耳其战争灾难所产生的影响更大。在崇尚新教理的信徒中，洗礼派首先遭受迫害，因此，他们在十六世纪就离开奥地利各邦，到摩拉维亚和匈牙利的西北部（今斯洛伐克）去寻找避难之所，后来，他们对官府的军事上的要求进行抵制，如同他们先前抵制宗教上的要求一样。这样一来，迢迢千里的迁徙就把洗礼派送到俄罗斯的南部，后来，有的飘洋过海到了美国和加拿大，在那里，至今"胡特兄弟会"还有繁荣的教区存在着，人们缅怀古老的故乡，对之依然记忆犹新。

在十六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时间里，路德教派已经为较强烈的反宗教改革所压迫，然而，他们更大规模的迁离是在1600年以后才开始的。自从三十年战争开始以来，尤其是在1625年和1628年的敕令颁布以后，以及在1648年以后，他们面临两个抉择：要么重新皈依天主教，要么流亡他乡。这种宗教难民的数字很高，在今天奥地利国境内的地区里，数目超过十万。难民流入雷根斯堡、纽伦堡、奥格斯堡、乌尔姆和林道等帝国直辖城市，前往符腾堡，安斯巴赫-拜罗伊特，但是，也有到瑞士和德国北部的，零星小股甚至到达了瑞典和瑞典的波罗的海沿岸各省。在法兰肯的一些地区，奥地利流亡者在整个居民中占很大的百分比，他们时常寻找在战争中遭受严重破坏的城镇，参加重建工作。一群在1600年左右离开家乡的流亡者在黑森林创建弗罗伊登施塔特。某些奥地利流亡者，以自己的才智和毅力，在新的故乡里争得了重要的位置，例如，

在大选帝侯[1] 领导下的勃兰登堡军队的组织者、陆军元帅格奥尔格·冯·德弗林格尔，他的原籍就是林茨附近的诺伊霍芬。 224

反宗教改革措施的后果是在贵族和市民的结构中引起严重变化。罗曼民族的家族成员取代逃亡的新教贵族的事情并非罕见，例如，西尔瓦-塔鲁卡、霍约斯、皮科洛米尼、克拉里、阿特姆斯或科洛雷多等家族。从信奉天主教的南方流入的罗曼人，在城市的市民中也引人注目，尤其是在蒂罗尔和内奥地利的城市。贵族继续由已经发家致富的本地资产阶级中得到补充；例如，国君曾封埃根贝格和施蒂尔克为贵族，而从政和从军则提供另一种升迁的机会，埃默贝格、贝希托尔德、温德哈格、加拉斯和阿尔德林根等人的贵族封号就归因于此类途径。

因为奥地利受三十年战争的直接战斗行动的影响较少——损失大部分是上奥地利农民起义和瑞典人侵下奥地利北部带来的——这里尽管有宗教难民离乡别井，但不象其他德语区那样蒙受战争所造成的巨大的人员损失。

从十六世纪开始到十七世纪中叶，在这段时间里，奥地利各邦遭受多次瘟疫的侵袭；除了鼠疫外，还提到了其他传染病；1529年英国脱汗症蔓延，1542年赤痢可怖地袭击着在奥芬城下的费迪南第一的军队。在三十年战争期间，也发生过传染病；1645年的鼠疫给多瑙河地区造成无数人的牺牲。

“早期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生活

早在十五世纪，中欧的，例如南德意志城市的经济状况的变化，已经引人注目，这种变化与信贷事业和商业投机的发展息息相

[1] 大选帝侯（Grosser Kurfürst）指勃兰登堡的弗里德里希·威廉（Friedrich Wilhelm，1620—1688）。——译者

关，也与阿尔卑斯山矿业的兴盛和广泛卷入政治活动的诸侯们日益增长的银钱需要紧密联系着。在十六世纪，诸侯和各等级企图通过他们的管理机构，通过尽可能有计划地充分利用一切资源，来使各领地的经济生活为他们自己的政治的和财政的要求服务。这种影响遍及一切经济领域，尤其是地主和农民的关系。

各种史料告诉我们，同以前一样，农民占有土地的数量是极为悬殊的，然而史料也指出，农民的法律地位有某种拉平的倾向。在225 地产单位和居住场所方面，除了整个、半个和四分之一的采邑和份地[1]外，也提到 Keuschen, Chaluppen, Batzenhäusel, Kleinstätten, Hauerhäuser[2] 等名称，除了大大小小"带房屋的庄园"的业主和不属于一定家族的"空地"的占有者外，正如在中世纪末期一样，也提到了无产业的居民，他们在地主或富农家里当仆役和奴婢，或者经营家庭工业。饲养小牲畜，纺纱织布，木材加工和玻璃制造业，可以维持贫乏的生计，然而经常由于销售不稳定而受威胁；我们可以听到对于这种受苦受难的乡村无产阶级增多的怨言，他们参加很多暴动和扰乱，有很大的影响。

在十六、十七世纪，农民的法律关系多数已经用文字固定了下来。全面官僚化了的地产管理机构的财产监护人和领地法官通常都着力地维护地主的权益。尽管极力强调对待"子民"——这个词越来越普遍地用来指小农——要宽厚温和，但、在量收租子，在劳役要求和实施狩猎法方面，都不乏凶狠残暴的事情。劳役比以前提高了。蒂罗尔偏离这个倾向，很少甚至没有劳役要求，完全是一个例外。此外，国君还征收农业税，这是国家最重要的财源之一，

① Hube 或 Hufe，指农民向农村公有土地中领取的份地，大体上能满足一家的需要，相当于 15—60 摩根(Morgen)，又为古代田地面积的一种单位，其大小各地不同。——译者

② 这五个词均为奥地利方言，均指程度不同的简陋小屋。——译者

地主们往往从中敲诈，饱肥私囊。农民对于一再要求把他们耕耘所得的产品只卖给地主一事极为不快。一些贵族，如施蒂里亚人西格蒙德·冯·埃比斯瓦尔德或上奥地利人卡尔·耶格尔，被视为农民的盘剥者，不过，他们可能是令人不快的例外。但是，领主偶然也出面维护他们的奴仆的权利，为保卫手艺的经营而反对城市行会的非难，或者甚至抗议军队驻扎在农村奴仆的家中。另一方面，国君也开始关心农民。1542 年的治安法规也为调整农产品的价格作出了规定，这显然是要保护农民免于剥削。1573 年，鲁道夫第二发布的一项法令反对地主提出过高的租税要求。在某些情况下，国君也指派临时的工作委员会，去调解地主和农民之间的争端。然而，在近代的初期，还谈不上政府对农民有计划的保护；农民的投诉并不总是得到政府的处理。

中世纪的租佃形式在十六、十七世纪也依然有效；自由租佃还是常有的，但是，人们往往通过付钱使它变为世袭永租权。1570 年，皇帝把这个抵偿办法强加给他的农民和教会贵族的领地上的农民。某些奴仆也成功地通过赎买，免交什一地租和其他租税。无论如何，世袭永租权逐渐压倒所有别的租借关系。这样，与中世纪纷纭繁杂的情况相比较，农民的法律地位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补偿。 226

地主收买较小的地产或划进荒地，形成大农庄。不过，这种扩大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一般地说，不是牺牲农民而实现的；可以说，往往同时把领主庄园的土地交给奴仆去经营，在税收方面当然不能与农民的土地相提并论。对统治关系的结构变化具有重大意义的是，在十六世纪最后的三分之一时间里，哈布斯堡家族在钱财拮据时，把他们的大部分皇家领地出卖掉，而且也放弃最高裁判权。国君的统治机构效能拙劣。据说，佃户所交的租税收入往往仅够支付给领地的官员们，他们如何治理几乎是无法检查的。因

此，人们就廉价转让土地及其一切附属权益，在多瑙河地区尤其如此；但是，国君保留森林和狩猎区的产权。当然，反宗教改革驱逐为数众多的贵族，使领地发生重大变化。教会的地产又增多了。

农村区镇的职能在十六、十七世纪大大地失去它的意义。泰丁会议不定期召开，农民对这个机构失去兴趣，初级审判权越来越多地由国君的办事机构来处置。农民控诉对他们所受到的随意惩罚，显而易见，人们明显地把持有偏离法律的观点当作臣民违抗的罪名强加给他们。泰丁会议总是有机会提出责难和讨论比较具有普遍性的经济问题。

由农民选出的恭顺的基层法官和乡村法官在征税方面起着一定的作用，在法律裁判方面所起的作用较差；未经请示上级，他们只能作出一些微不足道的决定，因此他们的威望很低。由于他们所处的双重地位，他们很难既取悦于统治者又能满足区镇的要求。

与中世纪比较，农业经营方法上有若干变化。人们也开始更 227 加热心地研究农业理论。三年轮作制被种植绿色饲料作物，尤其是苜蓿所补充。新饲料保证牲畜存栏数的增加；无庸赘言，在大地主的庄园土地上，人们多半宁愿放牧牲畜，认为比耕种农作物更为有利可图。人们也试种各种外来的农作物。列支敦士登家族在费尔茨贝格，尼科尔斯堡和埃斯格鲁布的地产里种植桑树，但是，这些试验由于气候原因未能取得持久的成果。从新世界[1] 引入的植物中，只有玉米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十七世纪，也开始广植烟草；农民从士兵那里认识了烟草，对它很珍视。马铃薯仅仅在个别地方作为园圃作物栽培，尚无国民经济意义。

地主们绝没有逃脱资本主义化的时代倾向。领地被当作经济

① 指美洲。——译者

企业来经营。奴仆们只能把他们耕耘的产品卖给地主，后者至少有优先购买权。这种“强迫预售”(Anfeilzwang)压低了价格。另一方面，农民应尽可能地只到地主管辖范围内经营的饭店和酒馆去吃喝，这些饭店和酒馆又靠地主的酒窖、啤酒厂和磨坊供货。地主也开设砖窑、玻璃工场、镰刀作坊、锯木场，还经营棉纱和麻布贸易。造纸也属于乡村工业，由于公私文件的来往增多和印刷的大量需要，而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多数造纸作坊设在城市之外的较小的村镇里。

奥地利的葡萄种植和酒类贸易在近代早期还有显著意义；三十年战争造成出口困难，迄今一直是“复活节酒”(Osterwein)的主要消费者的巴伐利亚人改用本地的忽布酿造的啤酒，这次战争导致了转折。另一方面，葡萄种植和酒类贸易在十七世纪从大量供应军需中得到了好处。根据城市对乡村的、亦即地主和农民的酿造厂的增加所作的责难来推断，早在十六世纪，奥地利啤酒的消费量就已大大上升。果子酒作为便宜的大众饮料也起了作用。

在中世纪与近代交替时期，阿尔卑斯山的矿业的发展达到了极度的繁荣。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制盐业对奥地利国君的宫廷经济仍然具有重大意义，开采和熬制、林业和运输的经营，以及盐的贸易，都与此有关。波希米亚各领地自身缺少产量高的盐场，这 228 些领地的取得扩大了蒂罗尔、萨尔茨堡和萨尔茨卡默古特等地的采盐场的销售市场。当然，在克赖因和克恩滕南部，伊斯特里亚盐场所产的海盐和国君领地所产的盐进行了激烈的竞争。除了在奥斯泽、哈尔施塔特和蒂罗尔的哈尔等地的国君所属的老盐场以外，1563 年又在伊施尔温泉附近建设一个新的盐矿。熬盐场需要大量木材，于是，从哈尔施塔特向埃本泽的多森林地区铺设碱水管道，1607 年开始在那儿熬盐。生产的扩大需要矿山技术、行政管理和

经济的革新。在这里所论述的时代里，最重要的措施已规定在1524年和1563年的两道“反宗教改革文告”里，1656年还颁发第三道。在这些谕令里，特别强调萨尔茨卡默古特在国库中的特殊地位。从中也可以得到关于矿工的社会地位的启示，他们进行着艰苦的生存斗争。行政管理方面完全了解矿工的困苦，这种处境迫使他们和他们的家属从事副业营生。人们企图通过资助小块土地以降低生活费用，但是拒不提高工资。矿工追随新教理的后果是引起官府再三对宗教信仰方面的事务进行控制。

在十六、十七世纪“荣”与“辱”的急迅变换中，阿尔卑斯山的铁矿开采业经历了繁荣与危机。主要开采地施蒂里亚矿山的开采，在1520年左右，由于埃森厄茨和福尔登贝格采矿公司的纠纷而受影响，当时规定了“等高原则”，因而也规定了双方股份的固定界限。木材日见缺乏也在这里造成令人不快的问题。但是，面对贵族等级的反对，长期未能做到节俭地经营林业。直到十六世纪八十年代，铁的销售一直很好，它是重要的出口商品，尽管耗费巨大，对内奥地利的国君来说，它是最重要的收入来源。1564年，这项收入大约为30万金盾。卡尔大公爵清除恩斯河上的航行障碍和修建公路，运输条件得到改善。熔炼过程，生吹炉逐渐为较现代化的高炉（连续操作）所取代。但是，十六世纪末出现了倾销危机，这个危机日益尖锐，一直持续到三十年战争。1600年前后反宗教改革引起熟练矿工和有经验的矿山企业家的外逃，造成不利的影响；然而，正是国君的政府，通过有目的地重新组织矿山事业，导致229 某种程度的好转。1625年，人们发起建立因内贝格总矿业公司。劳动场所和矿工的数目缩减了，机构精简了。由于这些措施，才免于崩溃，但是因内贝格的形势依然是严峻的。福尔登贝格的销售市场受宗教斗争的政治混乱影响较小，情况好一些。此外，莱奥本

的炼铁工业成本低于施太尔。上施蒂里亚在十六世纪未能达到施太尔城那种出色的经济繁荣，但是，另一方面，却幸免了后者在1600年左右遭受的崩溃。

克恩滕的"主要铁矿山"许滕贝格仍有某种意义。诚然，它的开采量少于施蒂里亚的铁矿山开采量的三分之一。施蒂里亚和克恩滕的小铁矿的"森林铁"(Waldeisen),尽管开设一些新的采掘场所,仍然越来越失去其重要性。

直到十六世纪后半叶,铅矿的开发一直欣欣向荣,菲拉赫铅矿山开采量最丰富。后来，克恩滕的矿层逐渐枯竭，其中赖布尔、姚肯和温迪施铅矿山还值得一提。

在伊德里亚(克赖因),早在十五世纪末就开采水银,产量不断上升。在当时试用汞齐法来析出黄金时，这个金属很重要。伊德里亚水银的开采财政上依仗三个矿业开采组织，其成员多数是内奥地利的贵族。人们结成卡特尔，十六世纪中叶开始出现极大的景气。七十年代出现危机现象时，矿山被卡尔大公爵纳入哈布斯堡家族产业，但不久又交给租佃人 (Appaltatoren)，他们首先是为自己的利润工作。汞对健康有害，矿工们深受其苦,因此，必须采取药物预防和保护措施。

十六世纪,尤其是前半叶,银矿开采的产量极其丰富。法尔肯施泰因的施瓦茨矿山当时处于繁荣昌盛时期,这里也开采铜矿,后来，该矿山由富格尔家族出资开采，产量下降；人们曾滥加采掘。1600年前后,银的年产量为二千公斤，仅为1500年前后年产量的六分之一。在格奥尔格·勒施的蒂罗尔乡村韵诗(1558年)和差不多同时代的斯瓦茨矿山志里,还赞颂过矿产的丰富。当时,蒂罗尔还有较小的银矿,均在勒雷比尔的基茨比海尔,在拉滕贝格和戈森萨斯附近。与蒂罗尔的和新获得的波希米亚(约阿希姆斯塔尔)的

银矿相比，施蒂里亚的矿山意义就小一些，蔡林银矿已枯竭，施拉
230 德明矿受到农民战争和反宗教改革的严重损坏。阿尔卑斯山的矿工，特别是蒂罗尔的矿工，在国外成了名望很高的专家，因此，有很多人被聘请到远方去；到英国坎伯兰郡的湖区的矿山去，甚至到俄国和南非的矿井去，当然，也到哈布斯堡家族的波希米亚领地和匈牙利领地去。匈牙利北部的诺伊索尔铜矿在这之前为富格尔家族的无与伦比的兴旺发达提供了主要条件之后，又以它丰富的采掘量构成宫廷财务署最重要的矿业收入。但是，三十年代战争期间，贝特伦的军队占领匈牙利的几座山城，使这个上匈牙利的矿山开始衰败下去。

阿尔卑斯山的金矿开采量很有限，但对铸造硬币有意义。克恩滕的上菲拉赫、格罗斯基希海姆和拉凡特河谷的圣莱昂哈德附近的克利宁等矿产地值得一提。景气的变动在这里特别明显。十六世纪中叶，当地较小的矿业组织为企业家们所取代，后者赢利心切，当然，也拥有大企业的技术扩建所需要的资本。企业家们几乎不和矿工接触，他们和矿工的个人关系不复存在了；管理人员（矿山照料人）经营企业，经常中饱私囊。因此，当国君从中干预时，往往对企业和职工都有利。但是，十六世纪末期，成本费用上涨，海外竞争日感明显，金矿开采从此衰退。克利宁矿在1589年停业，格罗斯基希海姆矿1640年停止开采。阿尔卑斯山的河流淘金场主要是德劳河畔的淘金场，没有多大意义。

教派斗争时代奥地利城市和集镇历史的特点是，一方面多数居民倾向新教教义，另一方面邦君竭力限制城市的自治权。尤其是经济方面的原因，终于发生了市民和贵族等级之间的对立。

费迪南第一通过1526年的法规把维也纳城及其行政机关置于自己的严格控制下。两个代议机构的构成虽无本质上的改变，

但少数几个人"延长"任职的倾向标示着削弱其他阶层的地方政治利益。对邦君的措施稍有违抗,就严加惩罚。比如,克雷姆斯和施泰因的市民反对在这个双城进行反宗教改革(1589年),结果是被剥夺特权到1615年,改由邦君的一个全权代表执政。不然的话, 231 人们就设法使城市法官——只有较大的城市才设市长——作为邦君的官吏行使职权。这在1600年前后已成为定规。在费迪南第二大公爵1599年和1600年颁布的内奥地利城市和集镇的宗教改革法规里,除了宗教政策性规定以外,也包括广泛的"警察"权限的规定:照料公众福利,监督治安情况和行政管理。

1527年颁发的"新警察法规与新手工业者和仆役法规"也可以从邦君的监督和控制机构的精神中得到说明,这个法规适用于上、下奥地利各领地。由于颁布这一法令,手工业公会就被取缔了。但是,这是一项迁就贵族等级敌视城市的愿望而采取的措施。显然,邦君并不关心1527年法规的施行。这样一来,它就逐渐被遗忘,公会再度复活。在地方上,手工业的关门倾向甚至更为明显。师傅们成功地限制了作坊数目,因此,后起者很难兴旺发达。帮工们要想接受一个作坊,就必须与师傅的寡妻或女儿结婚。在这种情况下,帮工们和师傅们之间的争执必然继续扩大。另一方面,市民的手工业还对各种竞争者进行着艰苦的自卫斗争。这种竞争者总是被认为是没有资格的局外人,属于这类人的不仅有拙劣工匠和"捣乱者",而且也有为宫廷所雇佣和被宫廷所释免的手工业者(和商人),其数目在领地首府是很大的,他们不仅为供应宫廷而劳动。军工和手艺人也不限于满足军队的需求;例如,维也纳城防队的成员就经营副业,首先是当面包师和屠夫。

财富较多的市民和乡村贵族的生活方式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城市抱怨在贵族领地范围内有工商业活动,而贵族给市民在购

置土地时制造困难，而自己在城市里却力争占有“免税房屋”，这种房子既可免除市民的赋税和义务，也可以豁免城市审判权。事实上，双方的封锁尝试都未能收到持续的成果。1552 年，维也纳城和各等级缔结了一项关于免税房屋的条约。

十六世纪手工业者往往结成地区性团体，也许是和邦君对工 232 商业组织形式日益增长的影响息息相关的。在中世纪，只有石匠才有广泛的联合。现在，下奥地利各行各业都组成了全国性的团体，如辣味糕点师傅、制筛匠、制革匠、制帽匠、染色匠和啤酒酿造匠，其他如锻工、制鞍匠和细木匠都有组织，这些组织又都蔓延到邻近的领地。这些行业仅在城市和集镇里工作。乡村的手艺业一贯被城市手工业者所拒绝，但是，结果枉然。

各行各业的经济状况极为不同。有些行业就成为技术进步的牺牲品，例如制弓匠和刻箭匠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为武器生产的牺牲品；这两个行业的成员不得不改操他业。造纸业的胜利使得羊皮纸制造者销声匿迹。另一些行业的产生正是该归功于这种技术进步，如制造怀表的“小钟表匠”。在奥地利各邦里，纺织手工业的从业人员为数众多，但是，他们的商品同德国西部和尼德兰相比，质量仍然低劣，织布业没有真正繁荣过。当然，在上奥地利分布很广的亚麻纺织业情况却不同，十六世纪尽管有乡村纺织工和城市纺织工的尖锐纷争，依然出产甚丰。

十六世纪，玻璃工业也获得决定性的高涨。它对蒂罗尔邦的经济具有重大意义，下奥地利也有很多玻璃工厂。在此期间，按照传统，奥地利的炼铁业提供了最重要的铁手工艺产品。由于与国库直接利益有错综复杂的联系，人们试图统一组织铁的加工和贸易。施太尔城的铁业经营委员会的建立（1584 年）应该归功于这种努力。隶属于它的铁业加工手艺有制刀、制大小镰刀、制刀剑和

制针等行业；铁商和船员，以及木材和粮食的供给也受经营委员会监督。在铁手工业内部，制刀匠不如大镰刀匠，后者的产品质量出色，为整个欧洲所公认。它的生产中心在上奥地利的克雷姆斯谷地，在基希多夫和米歇尔多夫周围；除了蒂罗尔和克恩滕以外，其他奥地利的作坊也效法它们的榜样。在下克恩滕的费尔拉赫的枪械制造匠也同样享有好声誉。与经济的发展相适应，铁加工业对原料的需求也大大上升；铁矿开采几乎不能满足它。和炼铁业一样，铁的贸易直到1600年以后还一直欣欣向荣。然而，施太尔城的公司（1581年）未能特别经受考验。三十年战争期间，在因军备而一度繁荣之后，它就遭受严重挫折。 233

中世纪末以来，欧洲贸易越来越多地利用新的道路；这些变化对奥地利各邦绝不是有利的，它既影响了多瑙河的交通，也影响阿尔卑斯山的交通。多瑙河航道自拉布以下入土耳其占领区，到这个区域去需要通行证，而且还得冒风险，奥地利和南德意志的商人不是轻易就能通过的。被土耳其占领的匈牙利城市和集镇变得贫困了，它们的商品需求下降，因此，东南欧的贸易不能指望获利丰厚。自然，为了不致增强土耳其敌人，也应避免出口重要的战争物资（武器，以及金属制品）。多瑙河贸易的规模尤其因为国君过高的关税而受影响，特别是在十七世纪初。至于输入方面，从匈牙利贩牛对奥地利仍然具有重要意义，谷物输入暂时也还很多，然而，匈牙利酒只有在本地歉收时才许可进口。最后，从上匈牙利输入铜是很重要的。如果说十六、十七世纪多瑙河和多瑙河沿岸到匈牙利的大道，总的来说，较早地失去商业上的意义，那么，另一方面，水路对军队的运输具有重大意义，皇家军队也好，土耳其人也好，在河上都保留着军用运输工具(Tschaiken)；大量的军需一时提高了商人的利润。

多瑙河地区与南德意志的贸易无论如何要比与匈牙利的贸易繁忙一些。传统商品依然是主要项目：奥地利输入布匹，输出酒和金属制品。由于扩大了自己的生产，因而能够停止把巴伐利亚和萨尔茨堡的盐输往多瑙河以北的奥地利地区。在哈布斯堡世袭领地境内，木材贸易起着明显的作用，例如，用多瑙河航道由上奥地利运输木材，以满足维也纳城的需要。上奥地利的亚麻布贸易也是重要的。

十六世纪后期，经由阿尔卑斯山大道与意大利的贸易，特别是对威尼斯的贸易，开始出现十分令人担忧的转折。大西洋的港口逐渐把地中海沿岸的古老城市排挤出海上交通的领先地位。威尼斯的商业意义开始下降。费迪南大公爵的"上奥地利"邦政府的鉴定书在1561年就指出这一变化。南德意志的城市也感受到欧洲贸易重心的转移。直到十七世纪中叶，威尼斯的贸易对萨尔茨堡和施太尔城的商人还一直是非常重要的。受到匈牙利事态特别强烈冲击的维也纳城也试图更强有力地参加南北贸易。当人们想对外国商人封锁塞默林大道作为某种程度上代替1515年以来就被突破的栈货法时，维也纳商人那种独特的、保守的、旨在消除强烈竞争的态度就变得昭然若揭了。马克西米利安第二在1573年颁布一项相应的法令，满足了这种意愿。同南方贸易的出口商品和转口商品，特别应该提到的有金属制品、牛皮、蜡和树脂；相反，由威尼斯运来的是玻璃、油料、肥皂和意大利酒（马尔瓦西酒和莫斯卡尔酒）。奥地利多瑙河各领地和蒂罗尔的商人在意大利贸易中和萨尔茨堡人的竞争，导致了采取在卡奇贝格山口下方的克雷姆斯桥头设置一个过桥税卡的措施，来对付萨尔茨堡人。这个关卡之争保证蒂罗尔的布伦纳道路得以压倒萨尔茨堡—克恩滕路线。

234

1526年以来与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政治联系有利于同这些领地的通商，而另一方面，东北欧的贸易转向北海和波罗的海的港口却起了有害的影响。

鲁道夫第二时代，哈布斯堡宫廷迁至布拉格，使这座城市的经济意义高于维也纳和林茨。向波希米亚出口盐、铁和酒，由北方进口波希米亚的玻璃工业产品、布匹，此外还有东北欧各国的产品，如蜡或皮货。

在这个时代，奥地利地区的贸易和金融的特点是大量外国资本的参与。在弗里德里希第三时代的财政和货币危机中，奥地利商人蒙受沉重的损失。此后，当宫廷需要钱用时，就得罗致上德意志人的财力。没有富格尔家族的钱财，马克西米利安第一的政策是不可想象的；这尤其适用于卡尔第五和费迪南第一。上德意志人的巨额现金储备使他们能够进行冒险的银钱交易，贷款给宫廷财务署也属于这类交易，贷款很少按期偿还。有财政经验的官员也为财务署效劳。象奥格斯堡人帝国税务官格奥尔格·伊尔松·冯·特拉茨贝格和在上德意志活动的蒂罗尔人扎哈里亚斯·盖茨科夫勒这样一些精明强干又殷实可靠的财政官员，善于一再为宫廷及其行政机构开辟新财源，盖茨科夫勒在鲁道夫第二时代的任务特别艰巨。

十五世纪末以来，上德意志人掌握着阿尔卑斯山和喀尔巴阡山的矿山。诺伊索尔铜矿先后由富格尔和曼利希、帕勒尔和魏斯等南德意志的公司经营。但是外商也控制着广泛的横越大陆的贸易。的确，十六世纪后半叶，无数纽伦堡和奥格斯堡商行的倒闭减少了“高地人”① 的影响。从那时以来，萨尔茨堡的大商人在哈布 235

① Oberländer，此处指上德意志人，即德国南部的人，德国的地势北低南高。——译者

斯堡各领地更为得势；意大利人和尼德兰人也以更大的规模进行贸易。在挨家串户的小商贩中，各民族的人都有，如，伦巴底人、萨伏伊人、苏格兰人。阿尔卑斯山地区为数众多的居民也以流动小商贩为生。犹太人经营的商业经历了十五世纪的挫折之后，又开始东山再起，个别享有优惠的商人，以及医生和学者，与他们的生活在风雨飘摇中的教友相比，争得到了重要的特权。

在十六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时间里，在银钱交易和大商品贸易中，奥地利人参加的比重提高了。维也纳商人和市议员拉扎鲁斯·亨克尔(冯·多纳斯马尔克)——原先是从洛伊绍迁来的齐普斯人——经营布匹和木材，赚得了很可观的财富。他和他的合伙人马克斯·雷林格尔经营的诺伊索尔矿重又生机勃勃，在鲁道夫皇帝的反土耳其战争期间，他向宫廷提供大宗贷款。贵族地主也以款项资助过奥地利家族。信奉新教的蒂罗尔人汉斯·施泰因佩格尔作为重要的采矿企业家是有功劳的，他在施拉德明和施泰尔城的炼铁工业中，在波希米亚和萨尔茨卡默古特的矿业中都工作过。1600年，在费迪南大公爵的内奥地利政府反宗教改革措施的高潮中，他在施拉德明被捕，丧失了财产，然而后来在匈牙利采矿事业中，还为维也纳宫廷效犬马之劳。

在十六世纪，世袭领地、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货币之间的差别缩小了，并逐步趋于同一；货币铸造的技术设施有所改进。奥地利的塔勒货币是一种价值很高的银币，也就常常流到国外，从外国则流入较次的货币。三十年战争期间，奥地利曾铸造质量低劣的“赝”币，在1623年的“卡拉达”“Calada”中不得不赎回它的一小部分币面价值，否则就无法控制通货膨胀。人民已经损失了现金的百分之八十七，慢慢地才赢得他们对稳定了的货币的信任。赝币时代和伴随着货币危机而出现的独特现象，尤其是肆无忌惮的

投机倒把，还长期地留在人们忧郁的回忆之中。

教派时代的思想文化

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开始，奥地利的教育事业完全处在宗 236 教纷争的影响下。这个论断可能不太适用于德语初级学校，而更多地适用于传授较高学问的学校。德语学校和德语—拉丁语学校的数目很大，我们发现，在一切较大的城镇和一些较小的城镇里都有这类学校。当然，在小而没有名声的、"未经立案的学校"里，教师往往只有贫乏的知识；他们的地位不很受尊重，薪水也不够用。因此，许多教师被迫从事各种副业。如同 1586 年费迪南大公爵示范地为蒂罗尔的德语学校颁布一项统一的学校法规所说明的那样，邦政府制订这样一个学校法规，可以说是一大进步。十六世纪，内奥地利和下奥地利各邦的大多数城市学校都具有明显的新教性质。维也纳圣斯特凡市立中学一直是天主教的，但是，在城里和近郊都有新教的、德语的和拉丁语的学校。

我们也发现，在高等教育方面，较大的积极性起初是在新教方面，然而，耶稣会教士的干预也在教育事业中带来力量对比的改变。

在十六世纪建立起来的贵族等级的乡村小学，对培养年青的贵族有着重大的意义。它们的教学计划和教授法是参照了梅兰奇顿、雅各布·施图尔姆和瓦伦丁·特罗岑多夫在帝国的福音学校里所树立的教育学范例。在下奥地利，维也纳和霍恩设有贵族子弟学校，其次，在梅尔克附近的洛斯多夫有一所杰出的学校。在这些学校里，除了教授母语和拉丁文以外，也教授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在恩斯河上游之邦的几个城市里，有新教学校和一所贵族的邦立学校，它在 1574 年从恩斯迁到林茨的邦议会大厦里。这所学

校有优秀的教师，例如，历史学家和语法学家希罗尼穆斯·梅吉塞，西里西亚诗人格奥尔格·卡拉米努斯；约翰内斯·开普勒本人就曾在这里任教。施蒂里亚尔人把他们的邦立学校办在格拉茨的埃根贝格修道院里(1574年)；大卫·奇特拉伊斯负责制订学校法规。在犹登堡，另有一所贵族子弟学校。在七十年代，也在克拉根福和莱巴赫为等级贵族和市民的后代设立了学校。

在天主教方面，历史悠久的寺院学校在十六世纪也在不少地方作出优异的成绩。例如，那时蒙特泽就显得特别兴旺，格斯女修院作为施蒂里亚贵族女子学校也有良好的声誉。然而，在天主教方面，耶稣会教士取得了无疑是最有意义的成就。他们在维也纳，因斯布鲁克，格拉茨和林茨等较大的城市里，创办了文科中学，后来，也接管了新教的学校。最后，他们还赢得了对大学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237

随着马克西米利安第一的逝世，维也纳大学短暂的人文主义鼎盛时期就基本结束，马克西米利安第一是新方针的保护者，他的新方针只能在哲学系中得到充分的贯彻。一些优秀教师附和新教思想，首先是约阿希姆·冯·瓦特(瓦迪阿努斯)，他是文学理论的创建者，后来又是他的家乡圣加伦的宗教改革家；新教思想的渗入使神学家们和其他院系之间的关系紧张起来。此时，大学公开附和新教义是不可能的。奥地利的大学生成群结队地离开维也纳，到维滕贝格、耶拿、莱比锡、海得尔堡或图宾根去；然而，对外国人来说，由于维也纳大学处于经常吃紧的土耳其边界上，所以很少有吸引力，来这里求学的人微乎其微。他们中间值得一提的有，克隆施塔特人约翰内斯·洪特鲁斯(格罗斯)，他后来在克拉科夫讲学，出版过地理著作，成为他的萨克森同胞在西本比尔根的宗教改革家。费迪南第一在维也纳大学进行过几项善意的改革试验，这些试验

终于导致"新的改革"("nova reformatio", 1554年),使大学的自治权受到限制,从而成为一所受国家严格监督又被天主教信仰所束缚的学校。邦君的高级督学比马克西米利安时代更是大学管理机构中的决定性人物。这时,又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学者来到大学,其中有尼德兰人和意大利人。1551年起,又有耶稣会教士在大学任教,例如,彼特鲁斯·卡尼修斯、兰贝特·奥尔和后来的马丁·贝卡努斯,然而,1554年创建的耶稣会学院对于这所老学校很快就成为危险的、一时太过强大的竞争。1593年,学院的学生人数是维也纳大学人数的五倍(大学生一千人)。鲁道夫第二执政之后,大多数新教徒从教师团中销声匿迹,考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必须信仰罗马天主教。最后,耶稣会神父也渗入到哲学系的师资中去,并且通过1623年的"国事诏书",把耶稣会办的学院和维也纳大学合并。事实上,被耶稣会神父控制的两个系(神学系和哲学系),后来办得就比其他两个系更好些;耶稣会善于从欧洲各国招聘师资到他们的大学中去,教学大纲按照"教学规范"(ratio studiorun)的原则,有目的、有系统地加以安排。十七世纪前半叶,在维也纳大学任教的耶稣会神学家中,希伯来语学家斯西皮奥·斯卡姆巴塔和教祖学家巴尔塔扎·科迪尔特别享有盛誉。 238

1585年,格拉茨大学作为耶稣会创办的教育机构而成立。这所大学只有神学和哲学两个系,它也吸引了有名望的教师,其中如彼得·帕茨曼和后来的威廉·拉莫曼在教会政策方面是出类拔萃的。作为杰出的数学家,比利时人奥诺里于斯·迪朗和瑞士人哈巴库克·古尔丁值得一提;有一段时间,古尔丁也在维也纳任教。

萨尔茨堡大学也是反宗教改革的产物,是在巴伐利亚和施瓦本的本笃会修道院的合作下诞生的(1617年筹办,1623年开学)。

这个教育机构得到皇帝和教皇的批准后就兴旺发达起来，由于大学生数目可观，它对该城也有重要的经济意义。神学家和法学家为萨尔茨堡大学奠定了声誉，而设立持久的医学研究机构却未获成功。

上文已经指出，很多奥地利大学生到外国高等学校去留学。在这方面，宗教信仰观点决不是仅有的决定因素。贵族大学生也常常象"骑士周游列国"那样去西欧和南欧的名牌大学留学。新教徒一般都选择途经德国的新教高等学校的道路，而天主教徒则往往在因戈耳施塔特，布拉格或卢万的大学里注册。其次，两个教派的信徒都到法国去，尤其是去上巴黎大学，此外，也到意大利去，很多奥地利大学生在波洛尼亚或帕多瓦攻读法学，偶尔也有上荷兰和英国大学的。游学不仅为了学习专业，首先也是为了扩大语言知识、掌握和改进社交知识。如果说，贵族子弟的学习不仅是，甚至首先不是由学科学的动机决定的，那么，贵族图书馆的丰富藏书向我们证明，对科学和世界文学主要著作的兴趣是存在的；当然，宗教信仰的观点在这里又起一定的作用。维也纳主教约翰·法布里的图书馆似乎是奥地利最大的人文主义私人图书馆；象汉斯·施泰因佩格尔这样一位蒂罗尔大企业家的私人藏书也有三千本。维也纳宫廷图书馆藏有奥地利最有价值的图书；皇帝马克西米利安第二让胡戈·布洛蒂乌斯对藏书进行编目和做索引，以便有计划地扩大它们。蒂罗尔的费迪南也是大藏书家。

奥地利的人文主义文献绝不是微不足道的。我们发现，在贵239族子弟学校的教师群中，有人用拉丁文进行学术性创作，然而，很明显，占主导地位的是外来成分。在维也纳工作的法兰克人保卢斯·梅利苏斯和在林茨工作的西里西亚诗人和教育家格奥尔格·卡拉米努斯都是多产作家，其次是在埃根贝格修道院任教的萨克

森人格奥尔格·奥修斯。贵族克里斯托夫·冯·沙仑贝格是来自米尔菲特尔的上奥地利人，他颇有造诣，也从事外交工作，他的拉丁文诗歌流露了他的天资聪颖。一个世代以后，汉斯·路德维希·冯·屈夫施泰因曾试译过西班牙文学作品，他找到了从新教政治家到达天主教的途径。此外，在天主教方面的拉丁文诗人中，克赖因人托马斯·赫伦应该一提，他后来是莱巴赫的主教，是主张天主教革新最重要的代表之一。在科学著作方面，拉丁文的垄断只是偶尔被打破，例如，萨尔茨堡人奥托尔夫·富克斯贝格尔用德语写过逻辑学，他曾在蒙特泽教过书(1534 年)。在信仰争端时代，宗教祈祷歌曲和战斗歌曲的写作和演唱也很盛行，其作者并不总是为人所周知的。上奥地利城市中的新教手工业者的格律诗是在南德意志的孕育下形成的。在施泰尔城有一个格律诗学校；最重要的大师保罗·弗罗伊登勒希纳主要在韦尔斯和埃弗丁活动；他的歌曲有时十分清楚地表现了一个笃信不移的路德教徒对喀尔文教和天主教的厌恶。在三十年战争中，格律诗到处销声匿迹。一位生于下奥地利的人——保尔·雷布胡恩是艺术性很强的德语舞台剧的创新者，他大概是从伊布斯河畔的魏德霍芬来到萨克森的，在那儿从事新教教学和布道的工作（卒于 1546 年）。维也纳苏格兰人学校的教师沃尔夫冈·施梅尔茨尔也企图当戏剧家，他是从普法尔茨迁入的。然而，他最成功的杰作是押韵的维也纳颂歌，他在歌词中颂扬了他所选择的维也纳故乡悠然自得的生活情调。最后，学识渊博的苏格兰人教堂的风琴手约翰·拉施是一位非常高产的作家，他对他那个时代的弱点，诸如占星学和假预言作了严厉的批判，并在«酒醋志»（“Weinbuch”）里创作了一首关于下奥地利葡萄种植的教育诗。

在三十年战争的岁月里，英国的话剧团体偶尔访问奥地利，它

们也在宫廷里演出。后来，耶稣会教士对舞台艺术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们演出古典作家或当代作家的拉丁语教育剧，不过，也上演可能对广大群众有影响的作品。耶稣会的舞台最后变成一种维也纳宫廷剧院。在萨尔茨堡大主教府和本笃会办的大学里，人们也经常演出宗教戏剧。

240 十六世纪的奥地利史学撰述取得一些重要的成绩。史学撰述由于对本国历史有着强烈兴趣而立下了一大功绩，它采取了比以往更尖锐的批判态度。贵族等级促进了这种史学撰述，宫廷特别支持关于族谱和王朝的研究著作。库斯皮尼安在1527年创作«奥地利»时，就已对奥地利风土作了描述，但这些描述只流传下一些片断。维也纳医生沃尔夫冈·拉齐乌斯在1546年首次付印的«奥地利的维也纳»(Vienna Austriae)中，为他的家乡写了一部城市史，书中有些平时未见流传、而且往往不完全足信的史料。这位作者的其他作品是写民族迁徙和哈布斯堡世系的。他计划写一部大部头的奥地利历史，但在进行准备时就已搁置起来，为预备写作而搜集的奥地利地图最为重要。维也纳大学教授乌西努斯·菲留斯曾任奥地利家族王子的教师，他编写过一部关于费迪南第一的反土耳其斗争初年的历史«潘洛尼亚战记»(De bello Pannonio)。

人文主义的学识也促进了对陌生而遥远的国度的了解。西格蒙德·冯·赫贝施泰因是一位博学的和老于世故的外交家，他在为哈布斯堡家族服务时认识了俄国，他在«莫斯科»(Moscovia, 1549年)一书中，第一次对这个国家作了科学的描述，他还到过西欧和南欧旅行。赫贝施泰因的自传和一部家族史证明了这位内奥地利贵族风度高贵而又善于处世。地理大发现时代的精神也感染了其他奥地利贵族。1588年，格奥尔格·克里斯托夫·费恩贝格尔·

冯·埃根贝格到过阿拉伯国家，并经由前、后印度，到达中国南部；他的伙伴克里斯托夫·冯·托伊费尔则前往波斯和亚美尼亚，后者惊险离奇的游记还保存着。皇帝的使者们传授了比较正确的关于土耳其的知识，通过购买和土耳其的馈赠，他们为宫廷图书馆获得了无数东方手稿。这些外交家中的一个佛兰德尔地方的贵族奥吉埃·吉斯兰·德·布斯贝克，曾在维也纳宫廷度过很多岁月，在他的《土耳其书简四封》(1555—1562年)中，描绘了这个东方大国丰富多彩的文化景象；他把郁金香、风信子和紫丁香带到西方国家，记录了克里米亚哥特人的语言标本，并在安卡拉为欧洲的科学发现了号称"碑铭之王"的奥古斯都的《安西拉碑铭》。

从十六世纪下半叶起，贵族的、多半为新教的历史学家受奥地利等级议会的委托而工作。赖歇特·施特罗伊恩·冯·施瓦策瑙编写了一些关于领主世家的族谱、领地历史和领地法律的巨著，然而未能印刷出版。另一位下奥地利人约布·哈特曼·埃南克尔男爵，增补了施特罗伊恩的系谱方面汇集的资料，并计划出版奥地利历史学家的著作。这个丛刊只出版了跟他同宗的扬斯·埃南克尔的王侯录，该书由在奥地利工作的施瓦本人希罗尼穆斯·梅吉塞整理过。梅吉塞也是个杰出的语言学家、系谱学家和教育家，有一部土耳其文文法出自他的手笔。在奥地利城市史方面，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成就是施泰尔城的史学家瓦伦丁·普罗伊恩胡贝1625—1630年间创作的《施泰尔城编年史》(Annales Styrenses)。 241

改宗者弗朗茨·克里斯托夫·克芬许勒在他的《费迪南纪年》(Annales Ferdinandei)里，对费迪南第二统治下奥地利的政治和宗教斗争的论述反映了奥地利官方的看法。勤奋的编纂家马蒂亚斯·布格克莱纳是蒂罗尔人，在邦政府里供职，编写过一部他家乡的历史《蒂罗尔之鹰》，这部荣获盛誉的著作附有十二幅地图和一

些漂亮的纹章图案。马克·西蒂希·冯·沃尔肯施太因在他撰写的十四卷著作中对南蒂罗尔的风土景物作了出色的描绘，可惜只留传下来一部分。蒂罗尔的费迪南大公爵的侍从医生希波利特·瓜里诺尼祖籍特兰托，他写下了医学、文化史和修身方面的著作；在建筑福德尔斯教堂时，他表现出自己是个独具匠心的建筑师。费迪南的另一位朝臣荷兰人格拉尔德·范罗在死（1592 年）后才出版的《年代记》中，澄清了哈布斯堡族谱中的某些传说。

奥地利科学工作的中心也受到了十六和十七世纪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的影响。当然，重大的贡献首先是那些由宫廷和各等级招聘来的外国名流学者在这里做出的。天文学的情况尤其是这样。著名的蒂科·德·布拉赫在布拉格鲁道夫第二的宫廷里度过他的晚年；约翰内斯·开普勒的事业同奥地利的联系比较密切。他在格拉茨首次结婚，工作几年后来到布拉格，1612 年各等级请他到林茨当"邦聘数学家"（Landschaftsmathematiker），发妻死后，他在这里同一位上奥地利女子结婚，并且发现了他的行星运行的第三定律。1619 年，他发表了他的天文学主要著作《宇宙之和谐》。在反宗教改革以前，开普勒于 1627 年逃出奥地利，在布拉格作第二次短暂逗留之后，到了西里西亚，在瓦伦斯坦庇护下工作，然而薪俸极微，最后卒于雷根斯堡，他是到那里的诸侯会议上进行游说的（1630 年）。教派斗争也在科学研究中招致了恶果；敌对阵营的成果得不到信赖。例如，内奥地利的新教各等级拒绝进行必要而又适用的格列高利历法① 改革，仅仅因为它是教皇搞起来的；尽管如此，它却在皇帝所属的各邦里得到实行（1583 年）。占星学说得到的反响比较冷静的天文学研究更为广泛，即使严肃的学者也没有摆脱他周围的人要求按占星学说解释问题的愿望。

242

① 即现在通行的阳历，为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所倡。——译者

这个时代的许多科学发现是在炼金术士的活动的微光照耀下完成的，他们摸索人造贵重金属的可能性，在这些人中，有不少是冒险之徒，甚至有的是骗子。不少炼金术士被吸引到布拉格鲁道夫第二的宫廷去，"骑士团德国师兄"马克西米利安大公爵也颇喜好炼金、寻宝和召神遣鬼。一般地说，马克西米利安第二对自然科学的兴趣不是很浓，然而，他也搞一些机械玩艺儿，以及收养异国的动、植物。他把植物学界的开路先锋夏尔·德·勒克吕斯（克吕修斯）由阿拉斯召到维也纳宫廷。克吕修斯把七叶树引进奥地利，从那时以来，维也纳的大花园就少不了它。在保护和提携他的皇帝死后，作为新教徒的他就离开了奥地利，但，于 1583 年在安特卫普发表了一部关于奥地利和匈牙利花卉的奠基性著作。

十六世纪的德国医生中，最重要的也是最有争议的医生是特奥弗拉斯图斯·博姆巴斯图斯·冯·霍恩海姆，又叫帕拉赛尔苏斯，他的漂泊不定的生涯同奥地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在九岁孩提时，就随同他那个施瓦本贵族出身的父亲到克恩滕的菲拉赫城。他在这里得以观察他父亲的医疗活动，并在东阿尔卑斯山的矿区里，熟悉了化学，并且最先有计划地把化学知识应用于医学。他为克恩滕邦写一部简明编年史。当然，帕拉赛尔苏斯没有在任何地方呆过很多时间，在巴塞尔也呆不长，他在那儿的大学里用德语开课，猛烈抨击过他的同行。他的学说对认识职业病，治疗伤口感染，医治梅毒和发展外科学，极为重要，但是，同时代人未能公正地对待他。他的人生途程的下几站是萨尔茨堡、因斯布鲁克、美朗、维也纳和克拉根福，1541 年死于萨尔茨堡。

皮特罗·安德雷亚·马蒂奥利是一个有地位的自然科学家，尤其是植物学家，也是费迪南第一的随侍医生，而马克西米利安第二的宫廷医生、西里西亚人约翰·克拉夫特（克拉托）则是一位在神

学和人文科学方面造诣颇深的路德教徒，仅就他按主子的政策宗旨，从事于有利教派和解的活动而言，已经值得一提，他曾一再在他的主子面前为新教的要求进行游说。

243 在欧洲，十六世纪的艺术受文艺复兴时代的建筑思想和风格形式的影响很大。这个新流派由意大利传入奥地利各邦，后来在1600年之后取代文艺复兴的早期巴罗克也是如此。在奥地利，文艺复兴的艺术思想比较晚才逐步取得胜利，人们认为其原因在于本地建筑师厌恶外来的风格，以及他们跟意大利人发生了竞争；奥地利东部地区受土耳其人威胁，这种不安定的局面尤其限制了建筑术的发展，教派不和又使教堂建筑陷于瘫痪。虽然奥地利同英国、法国或波希米亚比较起来，令人印象深刻、可供人们凭吊的哥特式建筑物不多，但人们没有轻易放弃哥特式样。因斯布鲁克的宫廷教堂还表现了晚期哥特式的风格形式，克拉根福的大教堂也是如此。1600年过后不久，林茨人希奥布·埃德尔完全按照哥特式的建筑构思建造了瓦尔德豪森教区教堂；反宗教改革时期的某些建筑重又采用旧风格，显然象征着旧教会所取得的成就。新教徒由于他们的地位始终不稳，所以只建筑了少数教堂；洛斯多夫的后来巴罗克化了的教堂值得注意，它是汉斯·威廉·冯·洛森施泰因于1587年让人兴建的。

十六世纪文艺复兴式的世俗建筑绝不是无关紧要的。在维也纳内城，瑞士门、阿玛利亚街和施塔尔堡，使人想起这个时代皇家城堡的布局。在维也纳郊区的“荒野上”，马克西米利安第二的游乐别墅（“新建筑”）也作收藏皇家珍品之用，建筑剩下的材料用来建造了维也纳火葬场。这一仿效意大利和法兰西的建筑，在十七世纪时就倾圮不堪。因斯布鲁克附近的安布拉斯宫的运气好一些，它有一个豪华的西班牙大厅，这是蒂罗尔的费迪南所建。在维

也纳、格拉茨和林茨修建了邦议会大厦，它们是象征等级政权的雄伟建筑物。在这个时代的连环拱式贵族城堡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有下奥地利的罗森堡和沙拉堡，此外，还有德劳河畔施皮塔尔的波尔西亚宫。较古老的城堡设施和城市要塞，按照意大利的新风格进行了扩建和加固。十六世纪，霍奥斯特维茨和兰茨克隆有了棱堡和城门，十七世纪中叶，在受土耳其威胁的边陲地区，大规模地改建和加强了里格斯堡和福尔希滕施泰因。

1600年前后，在奥地利产生首批早期巴罗克的重要建筑，它们几乎全是由意大利人修建的。他们的主要活动场所起初在萨尔茨堡，他们由于沃尔夫·迪特里希，马尔库斯·西蒂库斯和巴里斯·洛德隆等自负的教会贵族懂得和大力提倡艺术而被吸引到这里来。在文森佐·斯卡莫济的建筑计划被搁置之后，桑蒂诺·索拉里建成了宏伟的新萨尔茨堡大教堂；优雅的赫尔布隆别墅也是索拉里的创作，他修了那个时代人们所喜爱的喷泉。早期巴罗克建筑活动的另一个中心是内奥地利的首府格拉茨，皮特罗·德·波米斯作为建筑师、雕塑家、画家和奖章制造家，在这里发挥了多方面的作用。耶稣会教士在维也纳和因斯布鲁克建造了巨大的教会教堂，此外，他们的伊尔·格苏总教堂也给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新风格树立了决定性的榜样，教会的创始人依纳爵·德·罗耀拉的坟墓就在这里。十七世纪四十年代，一批意大利建筑师参加了维也纳苏格兰人教堂的巴罗克式新建筑的工程；这里提到的阿利奥和卡尔隆的名字和两个在奥地利工作的、成果累累的意大利艺术世家的其他代表，在巴罗克时代的许多创作活动中常常聚首见面。极为值得注意的是转入十六世纪时的壮观的墓冢雕塑所取得的杰出成绩，在泽考有内奥地利的卡尔第二和玛丽亚的墓碑，在因斯布鲁克有费迪南和菲利皮内·韦尔塞的墓地教堂，在格拉茨有费迪南

244

第二的陵墓。绘画的重要性次之，最重要的还是多瑙河风格的作品——从中世纪一直耸立到我们这个时代；在这里应该提到的是蒂罗尔人耶尔格·克德雷尔，在马克西米利安时代，他就已经是建筑师，以及福拉尔贝格人沃尔夫·胡贝尔，他对未来有指导意义。费迪南第一的宫廷画家雅各布·赛泽内格尔可能是下奥地利人，他是一位勤奋的肖像画家。

工艺美术最重要的成绩出自宫廷的作坊，尤其是有为数众多的国内外师傅在这里从事金饰工艺和石雕，甲胄艺术也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从费迪南第一到费迪南第三时代，奥地利家族的珍藏品中就增添了几件这些行业的珍品。购买和加工的方针随统治者的爱好和财力而易。费迪南第一对奖章特别感兴趣，他把他的珍宝以"艺术与珍品陈列馆"的时兴形式保存起来，货币陈列馆也应追溯到他的首创。卡尔和费迪南第二的内奥地利宫廷偏爱建筑艺术，不过，卡尔也喜欢地毯、挂毯一类织物。蒂罗尔的费迪南是一位十分内行的艺术爱好者，他对金属板作品——它兴盛得晚，但却特别繁荣——和肖像画特别喜爱；他把大量的艺术收藏品存放在安布拉斯宫。骑士团的"德国师兄"马克西米利安大公爵对乡土历史很感兴趣，他下令在加尔农通进行发掘，克洛斯特新堡应为了大公爵帽和利奥波德第三的珍贵的半身像而感谢他。最后，皇帝245鲁道夫第二特别喜爱工艺美术，哈布斯堡家族的珍贵王冠就是为他制作的。在他的宫廷人员中，有大量的雕塑家、画家、石雕匠、金饰匠、钟表匠、奖章制作匠。巴伐利亚人、萨克森人和瑞典人对他的珍藏品的掠夺，以及由此引起的损失，长期以来使人们难以判断这位统治者作为文学艺术的倡导者和行家所具有的意义，然而，他的重要意义今天已经得到承认。自从马蒂亚斯皇帝以来，"艺术与珍品陈列馆"这种类型已为按科学观点布置起来的巴罗克陈列馆

那种类型所取代；这位政治上没有多少成就的国君对他家族的收藏品却布置得十分适当。

在费迪南第一统治下重建的宫廷乐队是音乐创作最重要的中心，其次，有较大的意义的是萨尔茨堡，1617年，第一个意大利歌剧团在这里上演。直到十六世纪中叶，维也纳宫廷还是本国音乐家占优势，接着是尼德兰人控制的时代，1580年起，他们又日益为意大利人所取代。此外，人们还发扬了地方音乐的传统，其创作保存在琵琶曲谱和杂曲集里。

音乐基本上证实了这个时代造型艺术所给人的印象，即，有重大成就，这些，人们肯定不想失去，甚至不想把它们排除于奥地利的艺术传统之外；然而，另一方面，却存在着罗曼人、首先是意大利人和瓦隆人压倒由于信仰争端而遭削弱的奥地利的创作力量的现象。科学和文学使这样一个时代的形象得以臻于完善，在这个时代里，总的看来，奥地利在思想文化方面所接受的要比所贡献的多些。

246

七、奥地利上升为强国

(1648年至1740年)

重建与对土耳其人和法国人的两线作战

在三十年的搏斗结束后，首先需要弥补战争同样对奥地利各邦所造成的严重损失；因此，人们避开外交上的纷争，延长了当时与土耳其维持着的条约。在费迪南第三的政府执政的最后九年里，局势一直很太平。皇帝经过长期谈判以后，做到使雷根斯堡帝国议会选定他的同名儿子为罗马-德意志国王（费迪南第四），对于皇帝来说，这意味着成功，无奈，中选者一年后死于天花。在特劳特曼茨多夫伯爵去世(1650年)以后，维也纳宫廷再也没有杰出的政治家，这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最重要的还是帝国副首相费迪南·库尔茨伯爵。影响更大的是皇室侍从长奥尔斯佩格伯爵约翰·魏克哈特。在这期间，他显得最易于接受法国的强烈影响，此外，他最关心自己的飞黄腾达。宫廷军事委员会主席洛布科维茨侯爵文策尔·奥伊泽比乌斯和皇家财务署署长辛岑多夫伯爵路德维希·盖奥尔格，起初都还处于次要地位。这期间，在蒂罗尔，发生了一个尽忠职守的国家公仆的悲剧。哈布斯堡家族蒂罗尔系的行政首脑，首相威廉·比纳，一向效忠于克劳迪亚大公爵夫人(1632—1646)和她的儿子费迪南·卡尔，对于排除邦议员的对抗，扩大国君的地位，有过重大的贡献，后来却成为私仇的牺牲品；在采用非法审讯程序以后，并无充分理由就把他判处死刑，并在拉滕贝格处决(1651年)。

皇帝的大儿子费迪南(1654年)死后，他的弟弟利奥波德原来是为教士等级所确定和培养的，这时成为皇位继承人。在合并了波希米亚的奥地利，他很快就得到认可；不久就进行了匈牙利国王的选举；但是，在帝国内部，人们最初无法突破枢机主教玛扎然操纵下的法国政策所造成的阻力。因此，并且由于瑞典军队在波兰的凶猛推进，在皇帝费迪南第三去世时(1657年4月20日)，人们的处境相当危急。

法国的外交虽然能够使利奥波德当选皇帝一事推迟，却不能阻止它。枢机主教玛扎然想把巴伐利亚的选帝侯费迪南·马利亚提名为对应候选人，可是，这个维特尔斯巴赫人拒绝了。争取德国诸侯支持路易十四的选举的企图，一开始就毫无希望。当维也纳宫廷争取到勃兰登堡来支持利奥波德的候选资格时，事情就已成定局。利奥波德于1658年7月18日当选，在这以前，他当然不能不容忍玛扎然所宣扬的选举誓约，这誓约使他在仍持续进行着的对法战争中得不到西班牙的支援。一向强加于法国国王的“互惠条款”，本应保证皇帝和帝国免受西方邻邦的侵犯，对此却没有多大意义，因为，恰好在同一时期，美因茨的约翰·菲利浦大主教领导下的德国西部诸侯已经结成“莱茵同盟”，这个同盟是十分倾向法国的：莱茵同盟诸侯尽管努力在哈布斯堡和波旁之间保持平衡，但是，他们却又明显地过高估计自己的能力。法国在比利牛斯和约(1659年)中成功地结束了旷日持久的对西班牙战争，路易十四与西班牙公主玛丽亚·特蕾西亚结婚就旨在保证这个和约。法国咄咄逼人的威势影响着瑞典和波兰战争的解决。奥地利于1658年曾经干涉过这次战争。

古斯达夫·阿道夫的女儿、瑞典女王克利斯丁退位(1654年)以后，不久就在因斯布鲁克宫廷教堂里皈依天主教，茨魏布吕肯

247

的国君卡尔·古斯达夫就登上这个北欧强国的宝座。他利用出身于前瑞典王朝的波兰国王约翰·卡西米尔就瑞典王位继承方案所提出的抗议，来对波兰国家发动进攻。波兰国家不得不同时抵抗沙皇和发动起义的乌克兰哥萨克。1655年夏天和秋天，瑞典大军迅速获胜，一举席卷波兰的大部分，次年，卡尔·古斯达夫在勃兰登堡支援下，克服了一次挫折。西本比尔根[①]侯爵格奥尔格第二·拉科西(Georg II. Rákóczi)也和瑞典人联合起来。岌岌可危的波兰的崩溃，对于奥地利来说，意味着极大的危险。派驻北欧各国的皇帝公使里索拉男爵弗兰茨力促进行干涉；他还做到把勃兰登堡拉到皇帝一边。在这期间，卡尔·古斯达夫进攻了丹麦，在这个新战场上获得了很大的胜利。这时，梅尔希奥·冯·哈茨费尔德和蒙特古科里率领下的皇家军队向波兰北部挺进，后来又袭击在波美拉尼亚和朱特兰的瑞典阵地；由于一支荷兰舰队的支援，248 还得以向丹麦诸岛突进。同时，法国由于缔结了比利牛斯和约而腾出手脚，它的影响决定了波兰和荷兰境内的和平，皇帝和勃兰登堡只好参加谈判。1660年5月3日，奥利瓦和约签字，这个和约批准瑞典人取得朔能，从而分享对海峡[②]的控制权，还批准勃兰登堡对于普鲁士的主权(从威劳条约起)，而奥地利却不得不放弃对任何土地的觊觎，不过，瑞典在德国北部的继续扩张却被阻止住了。在随后的几年中，法国在波兰的影响不消说是占优势的。

土耳其边境上的和平虽然不算稳定，但是，却使奥地利在三十年战争期间享有行动的自由。盖奥尔格第二，拉科西的不稳定的政策重新诱使奥斯曼人力争用自己的傀儡阿恰茨·巴尔赛来充当

① 西本比尔根(Siebenbürgen)，是德国人对德兰西瓦尼亚的称呼，现在罗马尼亚境内。——译者

② 海峡(Sund)，指位于瑞典和丹麦之间、卡特加特海峡与波罗的海之间的厄勒海峡。——译者

西本比尔根侯爵。巴尔塞没有当成侯爵，但是，拉科西却于1660年5月，在克劳森堡附近败于一支强大得多的土耳其军队，战役结束后不久，他就因伤致死。虽然西本比尔根诸侯对帝国政策多半采取不友好的态度，但是，听任土耳其政府彻底征服这个邦却是不可容许的。蒙特古科里麾下的一支皇家军队帮助了拉科西以前的一位元帅约翰·克美尼，此人这时正在争夺这个侯国，土耳其却支持另一位觊觎者米夏埃尔·阿帕菲。当蒙特古科里从那个被洗劫一空的邦里撤走，而克美尼又在舍斯堡附近攻打阿帕菲阵亡时，争夺西本比尔根的斗争似乎已成定局。维也纳宫廷和土耳其政府进行了谈判，谈判进行得拖拖沓沓。奥地利方面，由于害怕瑞典人和法国人，很愿意维持和约，但是，土耳其人被帝国外交的拖延谈判的策略所激怒，于1663年春开始发动进攻。9月底，他们攻下了诺伊豪赛尔要塞，取得比较重大的胜利。于是，皇家部队也集结起来，并得到元帅兼诗人尼古劳斯·兹利尼麾下的匈牙利征召部队和帝国援军的支援，其中包括勃兰登堡和萨克森的劲旅。莱茵同盟也提供了军队，法国一反它的传统对土政策，这次也派出一个约有六千人的兵团；法国希望借此进一步提高它在帝国内部的威望和影响。少数几个盟友的作战最初没有采取重大的行动。德·苏什领导下的北部军团虽然在列瓦附近重创土耳其人，另一方面，在南方，却不得不放弃兹利尼构筑的塞林堡要塞。但是，1664年8月1日，蒙特古科里袭击了在圣哥大以北摩格斯多夫附近横渡拉布河的土耳其军队，取得了重大胜利。战斗的结局迫使土耳其宰相阿赫默德·柯普吕吕接受和平谈判，于8月10日缔结了沃什堡（艾森堡）和约，和约条款和战役的胜利显然不相称。土耳其的附庸阿帕菲依然是西本比尔根的主宰，人们甚至重又敬献二十万元的“荣誉礼物”，并将大瓦尔丁和诺伊豪赛尔让给土耳其。由于

249

法国军队驻扎在帝国境内,新的危机又威胁着波兰,奥地利全国的形势相当不妙。这样，与土耳其政府媾和似乎可以给人以喘息的机会，还可以如同齐斯特·多洛克和约一样,给人以行动的自由。奥地利新任驻土耳其公使瓦尔特·勒斯利伯爵只不过把奥斯曼帝国看作昔日泱泱大国留下来的幻影，可是，几年以后的情况却表明,它还可以造成很大的危害。

在这里应当对当时的一个事件略作回顾，虽然它完全属于另外一个方面。在沃什堡和约签订后的那一年，随着西格蒙·弗兰茨大公爵(1662—1665)的去世，哈布斯堡家族的蒂罗尔系就断绝了。西格蒙·弗兰茨是费迪南·卡尔(1646—1662)的弟弟和他作为蒂罗尔国君的继承人。费迪南·卡尔的政府，由于他的宫廷挥霍无度而使国家承受许多的负担，但，西格蒙·弗兰茨却是一个勤俭节约、精明能干的国君。同他的父亲利奥波德五世一样,西格蒙·弗兰茨在亲政时还拥有神职和教士薪俸。他也曾想还俗并考虑过结婚;但是,早逝妨碍了这些计划的实现，蒂罗尔连同它的前沿地带都落入皇帝利奥波德一世的手中，利奥波德一世允许因斯布鲁克当局，尤其是"上奥地利"枢密院，继续保持独立的地位。哈布斯堡-奥地利的分治局面的第二个时期，在持续百年之后，终于结束。

让我们转过来看看东方。在匈牙利，人们对利奥波德皇帝的第一次对土战争的结果很不满意,这是可以理解的。此外,贵族中信奉新教的那一部分人由于正在进行的反宗教改革而感受到威胁,然而,在不满分子当中也有不少天主教徒。一群达官显贵想竭力限制、以至最后摆脱哈布斯堡的统治。他们的精神领袖先是尼古劳斯·兹里尼，后为国君威色列尼。尼古劳斯·兹里尼（1664年)和威色列尼(1667年)死后，"显贵密谋"就以宫廷审判长弗兰

茨·纳达斯迪为首，其他显赫的成员有尼古劳斯的弟弟彼得·兹里尼，彼得的连襟弗兰茨·弗兰格帕尼，以及施蒂里亚伯爵汉斯·艾拉斯谟·冯·塔腾巴赫。不久，奥地利的机关已经听到搞阴谋的风声。连土耳其政府也对匈牙利的不忠蒂出了警告。密谋者决 250 心不大，当他们开始害怕自己的地位不稳时，他们就动摇于屈服和继续反抗之间。一封皇家诏书答应宽赦兹里尼。当他和弗兰格帕尼正想动身去维也纳的时候，他们却被捕了。在这以前，奥地利的内政机关就已下令捉拿塔腾巴赫。上匈牙利的一次起义迅速垮台，纳达斯迪相继被捕。1671 年 4 月，三个匈牙利显贵的命运决定了，他们被判处死刑并被处决。向"clementia Austriaca"("仁慈的奥地利")呼吁也没有用。年底，塔腾巴赫也被处决。其他煽惑者受到监禁和没收财产的处分。按照帝国政治家的意愿，推行了一种专横体制，也重新采取了一些反宗教改革的措施，虽然主要密谋者全是天主教徒。作为对新方针的回答，匈牙利北部的州郡掀起了猛烈的暴乱，它得到西本比尔根和土耳其的支持。起义的"Kuruzzen"("十字军")和忠于皇帝的"Labanczen"("步兵")相互交锋，战况酷烈。事态发展尤其令人不快，因为法国和奥地利之间外交上的勾心斗角已转化为公开的战争。

人们不能说，对于在太阳王① 及其能干的大臣们治理下强盛起来的法兰西国家的日趋明显的霸权，奥地利曾一贯与之抗衡。这与利奥波德皇帝的最先起领导作用的政治家，即奥尔斯佩格和洛布科维茨的政治态度不符。西班牙国王菲利浦斯第四死后，人们甚至想瓜分西班牙君主国。路易十四极力维持他那非常可疑的继承权要求，对西属尼德兰发动了进攻，以前这场进攻被叫做"第

① 太阳王(Sonnenkönig)，指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译者

一次掠夺战”,现在按照法国所宣扬的继承原则客气地改称为转让权战争。当荷兰、英国和瑞典武装起来，准备抗拒路易十四的时候，奥地利避开了这个三国同盟。利奥波德皇帝刚刚娶了西班牙公主玛加丽特·特蕾西亚(1666年)，这样，一个楔子就被打进奥地利皇族的两个支系之间。这种事态发展对皇权的威望极为不利，使维也纳宫廷对总理大臣奥尔斯佩格不满，后来人们获悉，他在法国帮助下，正在谋取枢机主教的地位，对他的不满情绪也就更加强烈起来。于是，1669年他被撤职，并被赶出维也纳。这时，洛布科维茨侯爵在奥地利政治家当中升到了首要地位。总的来说，他仍然奉行一条不坚定的对法友好的方针。下述情况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路易十四准备对三国同盟的真正发起者——尼德兰“联省”(Generalstaaten)发动进攻，而皇帝却在一个密约中答应保守中立。西方的政治和军事局势日益令人担忧，1672年6月，人们只好下决心同荷兰订立防守同盟，8月，同勃兰登堡达成了相应的协议，由于盟友要求采取行动，于是，一支由蒙特古科里指挥的皇家军队就向下莱茵进发。它奉维也纳指示，避免作较大的战斗，因而没有取得很多战果。此外，勃兰登堡于1673年6月单独媾和。同年，蒙特古科里用诡计战胜了他的大敌杜兰尼，肃清了莱茵河右岸的法军。接着，丹麦、英国、荷兰和西班牙结盟，勃兰登堡也重新加入战斗。在这期间，路易十四在放弃了对荷兰的行动计划以后，征服了西班牙的弗朗什·孔泰①。盟国的军队统帅和外交官之间的种种意见分歧妨碍了西线的彻底胜利；相反，勃兰登

① Franche-Comté，原为法国东部的一个省，后据凡尔登条约划入洛林(843年)，879年并入阿尔(Arles)王国，1034年并入神圣罗马帝国，1127年独立，1382—1678年先后归属卡贝和哈布斯堡，1679年尼姆维根条约划归法国路易十四管辖。——译者

堡的军队却在费尔贝林附近战胜了路易的瑞典盟军，巩固了自己的声誉。在这次血战后的一个月，蒙特古科里在萨斯巴赫战役中获得了战术上的优胜，杜兰尼阵亡；洛林公爵的国土被法国人占据，他在帝国一边参加战斗，1675 年 8 月 11 日在特里尔附近的康采尔桥取得更重大的胜利。

然而，战争的结局对于盟国不利。大约在 1676 年 9 月，人们攻克了被法国人占据的菲利浦斯堡，但，次年，西班牙人和荷兰人惨遭失败，法国人于 1677 年 11 月 16 日发动奇袭，攻下了重要的弗赖堡因布赖斯高。法国取得了有利的尼姆维根和约（1679 年），这并非由于军事上的优势，而是由于外交上的高明。法国的政治家和代理人能够做到分化敌人，促使他们进行单独和谈。对于帝国，路易放弃了在菲利浦斯堡的占领权，而取得了弗赖堡占领权。西班牙丧失了弗朗什·贡代，还有几个弗兰德尔边境城镇。洛林公爵收复了失地，但不许他在城市里设防。勃兰登堡的选帝侯被法国在外交上弄得很孤立，不得已交出了他所征服的瑞典地区。他被自己的盟友所遗弃，尤其是被皇帝所遗弃，于是突然转而投靠法国，给予法国军队以过境的权利，并答应在选举皇帝时支持法国的候选人。不久，路易十四从萨克森选侯国那里也得到类似的保证。巴伐利亚的中立政策曾为拆散联盟提供了诸条件中的一个条件，252 这个邦在十年前与路易十四已经订立过这样的条件。

被洛布科维茨提拔的内廷司法大臣约翰·保罗·霍赫平时倒是精明能干的，他对帝国政策的失败不无责任。这次失败招致了灾难性的后果：路易十四开始他的“Réunionen”（兼并），即对德意志地区的合并，在假托的法律借口下，采用了一套既充当当事人之一又充当法官的虚假程序。在太平无事之中，他却于 1681 年 9 月 30 日，违反市民的意愿，占领了德国的自由城市斯特拉斯堡，同一

天，还占领了曼图亚地区波河畔的卡萨列要塞。但是，要不了多久，在东方出现了一个对奥地利本土具有致命性的危险：奥斯曼人最后一次凶猛地进逼中欧心脏。

土耳其年(1683年)与奥地利的反击

上匈牙利起义者自从显贵密谋被破获后就奋起反抗奥地利皇室。他们有一个年轻有为的领袖，叫做埃默里希·特克利，他在七十年代里采取过几次作战行动，打得相当巧妙，这样就在皇家匈牙利境内建立起一个牢固的阵地。在一次停战期间，他还同厄登堡帝国议会(1681年)建立了谈判关系，这个帝国议会对新教徒给予了礼拜的自由，重新肯定古匈牙利的诸侯称号，力图迎合贵族的历史传统。后来，特克利终于决定与土耳其政府联合，而且他还特别具有这样的野心：除了法国外交官的活动以外，不管帝国驻君士坦丁堡的总督库尼茨和特使卡普拉拉的诱和活动怎样频繁，仍要促使那个功名熏心的土耳其宰相卡拉·穆斯塔法接受一次进攻战。这一事态发展对太阳王的政策极为合适；于是，土耳其政府就设法阻止加强对土耳其进攻的反抗，然而，尽管使用了得力的奸细和大量的钱财仍未奏效。波兰国王约翰第三·索别斯基于1674年当选，此举被认为是亲法派的胜利。他确实看到皇家权力的崩溃会对波兰带来多大的危险。1683年3月31日，华沙议会在长期反对以后终于接受了波奥同盟条约。这个盟约于5月2日得到皇帝批准。在动员西方力量来防止奥斯曼危险方面，主要的功绩应归于教皇英诺森九世，他还以巨额的补助拨款支援了奥地利和匈牙利的武装。萨伏伊、托斯卡纳、热那亚、西班牙和葡萄牙都送来了援款。帝国外交官经过长期谈判以后，得到巴伐利亚和萨克森肯予军事支援的保证，作出同样保证的还有较小的帝国会议等级代

253

表①；可是，勃兰登堡还深深地处于法国影响之下。

最初，皇家军队在极其能干的陆军中将洛林的卡尔公爵率领下，只有依靠自己，以及依靠通过在亲哈布斯堡的伯爵尼古劳斯·埃什特哈齐领导下的匈牙利"起义"所给予的无足轻重的援助。人们想抢在土耳其人之前，趁土耳其大军还没有到达，夺占格兰和诺依豪赛尔两要塞，但，这两件事都不得不中途而废，奥地利军队撤退到拉布河后面据守防御阵地。不久，鞑靼人迂回拉布防线；洛林的卡尔只好重新退却。他向维也纳提供了足够的驻屯军，随同他的主力部队渡过多瑙河北岸，以待增援的到来。

维也纳的防御工事在十七世纪时已有所扩充，在围城的军队快要到来时，又紧张地予以加固。这个由一万一千士兵以及大约五千由市民、宫廷释免奴和大学生征集来的兵力据守着的城市，于7月14日开始被围。防卫工作由颇有魄力的将领恩斯特·吕迪格尔·冯·施塔海姆贝格伯爵来领导，由茨登科·卡普利尔斯伯爵辅助他；市长安德烈亚斯·利本贝格由于英勇善谋而经受了考验，直到围城的后期，如同许多别的守城者那样，死于痢疾。城防部队有一支精锐的炮兵，在争夺要塞工事的接近战中，临时制作的手榴弹却成了有效的防御武器。土耳其人集中攻击布格棱堡和勒韦尔棱堡之间的地段。他们长时期地被阻于前沿阵地，于9月3日才攻下了经过苦战防御的布格棱堡，主城墙有被爆破之虞，土耳其人是最善于进行地雷战的。他们的鞑靼援军在这期间蹂躏了下奥地利的广大地区，在那里，一部分农民由于对地主和教会怀有不满情绪，使得组织抵抗的工作变得困难。

① 帝国议会等级代表(Reichsstände)，在神圣罗马帝国时代(962—1806年)，指在帝国议会中拥有席位和表决权的帝国王公诸侯、高级主教和帝国直辖城市的代表。——译者

由于巴伐利亚和萨克森选帝侯的部队，以及施瓦布-弗兰克地方部队的抵达，洛林公爵的军队逐渐增强。后来，于 8 月 31 日，多半由骑兵组成的波兰军队，约一千四百人，也来和大部队会合，大部队这时的总兵力达六万五千人左右，并已占据卡伦山脊上的阵地，这个山土耳其人并没有防守得很严密。名义上，国王约翰·索别斯基掌握着对基督徒联合战斗部队的最高指挥权。热情和聪明的方济各会托钵僧马可·达维阿诺激励官兵积极投入即将来临的战斗。9 月 12 日，决定性的维也纳解围战开始，在这场战斗中，由皇家军队和萨克森军队组成的左翼的胜利突击决定了战局；波兰骑兵发起的第一次英勇的进击陷入一个极其不利的地形而不能自拔。土耳其人遭到毁灭性的失败，由洛林公爵细心指挥的解围军采取了攻势，于 10 月 26 日攻克格兰城。

254

这次大胜使有计划的继续反击显得颇有希望。皇帝与波兰和威尼斯共和国订立了攻守同盟，即所谓"神圣同盟"。法国则由于停战协议而暂时被迫采取中立，在签订这个停战协议时，当然会容忍那个非法的兼并。以后的几年，在匈牙利作战的皇家军队和盟军，在洛林公爵的指挥下，取得了重大的胜利；1685 年 8 月，诺依豪赛尔被攻克。土耳其政府现在准备讲和了；特克利被土耳其人抓了起来，他暂时失去了作用。在这期间，基督教联合阵线内部的紧张当然加剧。索别斯基转而采取他以前那种对法友好的政策，功名熏心的巴伐利亚选帝侯仍然是一个难以合作的伙伴。勃兰登堡在政策上的变动，对奥地利却是更加可喜的事。亨利第四颁布的南特敕令，曾对胡格诺教徒给过各种必要的保证；路易十四却宣布撤销南特敕令，从而激怒了这个大选帝侯，在他的各个邦里曾流入大批法国的新教难民。于是，他又重新投靠皇帝。一支勃兰登堡援军在攻克奥芬城中作过有价值的贡献，该城由一支

小的土耳其城防军在坚决的指挥官们领导下抵抗得很勇敢，1686年9月2日在长期围困后陷落。后来，皇家军队攻克了大部分匈牙利要塞，1687年8月12日，洛林的卡尔同巴伐利亚选帝侯一起，在古战场莫哈奇附近的豪沙尼取得辉煌的胜利。于是，皇家军队就向西本比尔根推进。他们在军事上的成功当然会驱使他们在新夺取的地区里建立严厉的专制政权，卡拉法将军由于采取粗暴行为而被人们所痛恨。与匈牙利议会的谈判终于导致制止那些不再切合时宜的反宗教改革措施，另一方面，匈牙利贵族放弃了国王安德烈亚斯第二通过黄金诏书(1222年)赐予他们的反抗权，普雷斯堡帝国议会承认哈布斯堡男系对于继承斯特凡王冠的要求。255 同时，即在1687年秋，与西本比尔根的诸侯和等级代表举行了谈判；阿帕菲根据布拉森多夫条约一直保持侯爵的称号到他死亡时(1690年)为止，他的儿子经过长期的抗拒以后，于1697年放弃了他的大侯国，这个侯国在军事上从1688年以来由皇家军队予以防守，甚至在策尔内斯特附近反抗特克利失败(1690年)以后还能保住。在这期间，皇家武装在多瑙河获得很大的进展；选帝侯马克斯·埃马努埃尔在洛林公爵患病后接替了最高指挥权，于1688年9月攻占贝尔格莱德，其他支队则开进波斯尼亚和瓦拉几亚；塞尔维亚人的起义运动对皇家军队的进攻行动有利。奥地利人和帝国军队占领了尼什、维丁、普里什蒂纳。此时，路易十四当然重新对帝国发动进攻战，尤其是对普法尔茨，抽调其他军队到东南战场上来，则是不可能的了；此外，在对待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居民方面曾犯下严重的错误。所以，在能干的皮柯洛米尼将军死后就遭受惨重的挫折，1690年秋，萨瓦河以南的战果，包括贝尔格莱德在内，又都重新丧失，无数塞尔维亚难民，约三万户人家，在长老阿尔森·采尔诺耶维奇·冯·伊佩克率领下向匈牙利南部迁徙，他们

定居在那里，得到了宗教和政治上自治的保证。皇家军队和帝国军队，在边区行政长官路德维希·冯·巴登指挥下，在富有戏剧性胜负反复的斯兰卡门战役中，于 1691 年 8 月 19 日在蒙受惨重损失后，大败土耳其宰相穆斯塔法·柯普吕吕，使后者在战斗中阵亡，并且夺得了他的土耳其军队，匈牙利的战果才被奥地利保住。于是，冯·巴登边区行政长官就开往艰窘万分的莱茵前线；他的接替者根本经不住考验。这样，土耳其战争又拖延了几年，直到萨伏伊的欧根亲王代替了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特第二，后者于 1696 年作为约翰·索别斯基的继承人登上了波兰的王位。

欧根亲王接掌了兵权，这位将军在以后的几年中获得了奥地利历史上最出色的军队指挥官的声誉；欧根于 1663 年生于巴黎，他是萨伏伊-加里南的欧根·莫里茨亲王及其夫人奥林比亚（曼奇尼）的儿子。他最初在法国，在他度过青年时代的那个国家里，力求上进而没有成果。1683 年，欧根逃出法国，为帝国效劳，他参加了维也纳的解围战，在随后的几年中，在匈牙利和意大利以勇敢而审慎的军队指挥官著称。1697 年，这个萨伏伊人根据宫廷军事委员会主席施塔海姆贝格伯爵恩斯特·吕迪格尔的建议，接受了驻匈牙利的皇家军队的最高指挥权，在短期间内就赢得了士兵们的信任，他于 1697 年 9 月 11 日率领这些士兵取得对土耳其军队的决定性胜利。土耳其军队在岑塔镇附近渡过蒂萨河时受到袭击，溃不成军。

256

在随后的几年中，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压倒了其他一切问题，由于奥地利王室的西班牙支系行将灭绝，这个问题必然变得尖锐起来。与土耳其媾和是符合奥地利利益的，土耳其政府由于它的军队在攻打威尼斯和波兰时损失惨重，战况不妙，也愿意媾和。于是，1698 年 11 月，在卡洛维茨（彼得瓦丁以南）的废墟上开始谈

判,1699 年 1 月 26 日缔结和约，和约条款与基督教盟军的有利军事地位相符。整个匈牙利，还有西本比尔根和斯拉沃尼亚的大部分都落入皇帝手中,但,特梅斯·巴纳特除外。这时奥地利王室拥有的领土已经变得圆整而且连成一片,多瑙河是它的轴心,它占据了整个东阿尔卑斯、苏台德和喀尔巴阡地区。

早在大规模的土耳其战争开始以前,西部的战斗已经结束,当然，雷斯维克和约(1697 年)不仅仅意味着停战而已，围绕着西班牙的王位继承而展开的外交争吵已经甚嚣尘上。路易十四的将领在作战时,使受攻击的国家蒙受严重的蹂躏,对于十七世纪下半叶在西方对手中业已行之有效的准则大都置之不理。这一次，整个帝国都准备参战,更重要的是,英国和荷兰加入了反太阳王的联合阵线。英国的“光荣革命”(1688 年)结束了斯图尔特朝的王国，这个王朝最后完全听命于法国。尽管维也纳宫廷里目光短浅的集团还想作有利于被废黜的天主教国王詹姆士第二的干涉,但是,现实政治却使同获胜的新教国王威廉第三的合作成为必要;于是,经过艰难的谈判，终于与那个海上强国结了盟。萨伏伊也暂时参加联合阵线。军事行动的成就自然与所预期的不相符合，盟国的合作又搞得不好,此外,皇家军队的主力还被拴在土耳其战争之中。当英荷联合舰队在拉奥格取得对法国人的重大的海战胜利(1692年) 257 时，法国人在陆地上却能很好地坚持住。1696 年萨伏伊公爵离开了联合阵线，意大利战区改守中立。这样，1693 年在法国和个别盟国之间开始进行的谈判终于导致和平。法国的外交官，如同在尼姆维根已经做过的那样,懂得利用盟友之间的意见分歧,特别是,海上强国已经准备自行其是。尽管如此,雷斯维克和约还是把弗赖堡和布赖萨赫归还给皇帝,把克尔、菲利浦斯堡和大部分吞并了的土地归还给帝国,但是,对斯特拉斯堡却不得不放弃。在最后

一刻，根据法国的要求加入了一个宗教条款，据此，在法国所放弃的已合并地区内不得撤销反宗教改革措施。这一条款使信奉新教的帝国诸侯对皇帝不满，人们不无理由地认为，皇帝的默认对于条款的被接纳具有决定性作用。斯特拉斯堡的放弃更不能归咎于利奥波德，这时人们不能受海上强国宣传的影响，后者把一切失败都归之于盟友，自己却是更多地关心西属尼德兰的保全，而不是对德国在下莱茵利益给予支持。

围绕着西班牙继承权而进行的战争

在西班牙继承权的斗争还没有公开以前就发生在马德里宫廷的一场拔河赛中，法国的外交就显得比奥地利精明。最初表现在海上强国和路易十四之间的秘密谈判之中的瓜分意图，在西班牙引起了公愤。西方强国想把本土、殖民地和西属尼德兰留给巴伐利亚选帝侯太子约瑟夫·费迪南，一个哈布斯堡女人的儿子，把西班牙在意大利的大部分领地和在比利牛斯山区的边境地段移交给法国王太子，另外把米兰将就地塞给利奥波德一世皇帝的小儿子卡尔大公爵。西班牙国王卡尔第二在遗嘱中却宣布选帝侯太子为单独继承人，可是，这个维特尔斯巴赫人却完全出人意料之外地于几个月以后死去。在马德里，皇后玛丽亚·安娜出身于普法尔茨-诺伊堡家族，她的活动对于奥地利的计划大体上是有利的，然而，更加成功的却是亲法派的头子、马德里首相、枢机主教波尔托-卡雷罗。在伦敦，路易的谈判代表和海上强国所缔结的第二个瓜分条约，对于奥地利并非不利，它把西班牙、尼德兰和殖民地许给了卡258 尔大公爵，法国当然就只好接受意大利领地和洛林，而洛林公爵则取得米兰作为补偿。皇帝对于是否同意此事曾有所踌躇，于是，法国人在马德里就占了上风，人们从垂死的国王那里弄到了一个有

利于路易十四的孙子菲利浦·冯·昂儒公爵的遗嘱；卡斯蒂利亚的居民本来就希望波旁的候选人结束长期与法国的战争，保全西班牙这个大国，对于事态的这种转变自然是心满意足的。可是，由于路易十四想为他的皇室取得全部西班牙遗产，必要时还想使之与法国合并，法国军队开进了西班牙和次要各邦，波旁王朝的"世界统治"重又威胁着法国的所有邻国，结果，使一切敌对的力量重又结合起来。在帝国内部，勃兰登堡和汉诺威参加了皇帝的宣战，1702 年春天，海上强国参加了战斗。巴伐利亚的选帝侯马克斯·埃马努埃尔，同他的兄弟科隆的约瑟夫·克莱门斯一样，由于希望取得领土并提高自己的地位，不顾奥地利的谈判代表百般的活动，仍然站到了路易一边，使这个抵抗阵线遭到重大损失。在战争的最初阶段，葡萄牙和萨伏伊也都支持路易。对于奥地利最有威胁性的是弗兰茨第二·拉科西领导下的匈牙利起义，他极力想同奥地利的一切敌人，尤其是想同路易十四进行合作。在新十字军运动的开始阶段，饱受苛捐杂税之苦的匈牙利农民的社会革命行动曾经起过一定的作用。这个运动经过多年的工作，团结了强大的奥地利力量；十字军的游击队曾一度威胁维也纳，使它的郊区不得不建立起防御墙来防卫。

反抗法国军队的战斗最初分三个前线来进行：在意大利，在莱茵区，在尼德兰；不久，西班牙就成为第四个欧洲战场，此外，海上强国还在海外与法国和西班牙进行一场殖民战争。征募的军队超过了十七世纪的军队总兵力；尽管十四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 年）比起土耳其战争或三十年战争要进行得温和些。但是皇家国库的财政负担，虽然有英国的补助，还是很大的。

在还没有与海上强国结盟以前，皇帝就已经同侵入意大利的法国人对阵。欧根亲王在出色的作战行动中，以大胆的侧翼行军

包抄了法国的阵地，在卡尔皮和基亚里(1701 年)战胜了法军统帅
259 卡蒂纳和维勒鲁瓦；维勒鲁瓦在袭击克雷莫纳时被俘。法军新统帅旺多姆公爵得到了雄厚的援军，但是，欧根亲王还是在卢扎拉附近击退了他的攻势。

在这期间，英荷军队在比利时打得相当好，战前法国军队已经驻扎在比利时。但是，维特尔斯巴赫人与法国的公开联合却发生了危机。能干的法国统帅维拉尔未能按照计划，以巴伐利亚-法国军队沿着多瑙河一线迅速挺进，对于奥地利，这不啻是一件幸事。尽管如此，选帝侯马克斯·埃马努埃尔还是试图夺取蒂罗尔，最初战果辉煌，后来遇到蒂罗尔邦的征募军顽强抵抗而失利，征募军的指挥官是兰德克[①]的看守人米夏埃尔·施特尔青格，他表现得很出色。这时，巴伐利亚人想对奥地利的几个主要地区发动攻势，塔拉尔元帅麾下的一支法国军队越过黑森林向前进逼，与选帝侯的军队会师。在这期间已经采取了一些有效的反措施。马尔巴罗的军队佯骗了敌人，进入了德国。

南部，在那里，他们与巴登侯爵和欧根亲王麾下的皇家的和帝国的军队会师了。马尔巴罗和欧根合作得亲密无间，在突破敌人的中心之后，以强有力的骑兵进行袭击，在酷烈的霍赫施泰特(又名 Blindheim, 英语作 Blenheim)战役中打败了那略强一些的法国-巴伐利亚联军，使它的残余不得不向西撤退。现在，巴伐利亚被皇家军队占领，但是，驻军和征税，尤其是征募军队的尝试，在巴伐利亚居民中引起了骚动，那里的居民仍然忠于维特尔斯巴赫家族。马克斯·埃马努埃尔想用巴伐利亚去换取西西里或者尼德兰，他当然绝对不配得到这种效忠。这次起义被奥地利军队血腥地镇压

① 兰德克(Landeck)，蒂罗尔邦的一个小镇，位于因河两岸，风景佳美。这里指该地同名的一个古老城堡。——译者

下去了;对于巴伐利亚和科隆选帝侯,人们判以驱逐出国的惩罚。

1705 年,结盟国家的成就不多,联合国家之间总是发生意见分歧,尤其是很难争取荷兰人采取重大的行动。此外,战争的进行还受到一件大间谍案的影响,这个案件在二十世纪才由法国研究战争史的人发现。为帝国服务的一个高级军官,希罗尼穆斯·冯·埃尔拉赫,伯尔尼生人,多年来把作战计划泄露给法国敌人。他替他们从事特务工作时使用的假名是达尔森男爵;他的活动没有能够被揭露。1706 年,上了年纪的路德维希·冯·巴登侯爵交出了兵权退休。同年,马尔巴罗在拉米里斯附近获胜,并攻克布鲁塞尔;西属尼德兰逐步为人们所夺取。 260

1703 年,萨伏伊的维克托·阿马迪乌斯公爵,在继续执行他那个王朝的被该邦地理环境所决定的、传统的摇摆政策时,实行倒戈,从那时起他就被法国人苦苦相逼。吉多·施塔海姆贝格和维里希·道恩率领下的较弱的奥地利军队协助防守这个山峦起伏的邦。在大部分要塞陷落以后,法国军队围困首府都灵。欧根亲王已于 1705 年重新接管意大利前线的指挥权,他率领皇家的和普鲁士的军队,以急行军从蒂罗尔开往皮埃蒙特,在那里和萨伏伊人会师;1706 年 9 月 7 日,盟军在都灵城外获胜,该城解围,次年年初,达成了协议,法军退出意大利。

在这期间,奥地利获得了一个新主人。皇帝利奥波德第一于 1705 年 5 月 5 日,在执政四十八年以后去世。在他执政期间,克服了许多危机,奥地利的威势大大提高。利奥波德的大儿子约瑟夫第一继承了父亲的王位,成为奥地利各邦的统治者;他是一个有魄力、有自信并且好名利的国君,他的登极唤起了很大的希望。他的弟弟卡尔公爵思想上更倾向西班牙,与此相反,约瑟夫却坚信自己是德意志人;在这里,起作用的不仅仅是他的老师汉斯·雅各

布·瓦格纳·冯·瓦格费尔斯对他的教育，还有由于法国的侵略战争而风行一时的情绪。在三十年战争结束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皇权从来没有这样地被强调过。在宗教信仰这种事情上，约瑟夫第一虽然身为坚定的天主教徒，但是，他的想法不同于十七世纪的哈布斯堡统治者。在决定同新教国家和罗马教廷的关系时，君主和宫廷首先要考虑政治上的动机，约瑟夫的顾问除了利奥波德的久经考验的参议以外，还有别的新人。因此，一个极为棘手的局势得以迎刃而解，那局势产生于北欧战争的第一个阶段，瑞典国王卡尔十二顺利地开入萨克森以后，瑞典军队横穿了奥地利的西里西亚地区。除了别的插曲以外，西里西亚新教徒由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允予他们的自由受到限制而产生埋怨情绪，这种埋怨使不可估量的、令人畏惧的斯堪的纳维亚好战君主与皇帝宫廷之间的关系危险地紧张起来。由于维也纳宫廷所有的军队都要用来同路易十四和匈牙利起义者打仗，人们只好对卡尔十二的宗教信仰要求让步，马尔巴罗作了调解人。阿特兰施泰特条约(1707年)重新确认西里西亚新教徒的权利，由瑞典出面担保；后来，卡尔十二就没有再提出进一步的要求。

261

在都灵大捷以后，海上强国想对土伦发动袭击，一举毁灭法国在地中海的舰队和贸易；这个艰巨的行动，奥地利勉为其难地同意了，但却没有成功。然而，维里希·道恩伯爵领导下的一支较小的奥地利军队却从西班牙人手中夺取了拿不勒斯和南意大利。在南部前线正在采取行动的时候，皇家军队开进了那个宗教国家，人们把帕尔玛和皮亚琴察这两个公国当作帝国领地对待，而另一方面，罗马教廷又要求领地管辖权，这样就同教廷发生冲突。在维也纳，人们还由于教皇克莱门斯十一在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上偏袒昂儒的菲利浦，而不是卡尔大公爵，因而被激怒了。政治上的冲突还伴

随着宣传上的争吵，在这场争吵中，奥地利的国教概念和宗教会议至上的概念占了上风。1708 年，甚至爆发了敌对行动，教皇的军队没有得到期望中的法国的支援，迅速失败了。克莱门斯十一终于不得不让步，解散了他的军队，承认卡尔大公爵为西班牙国王。

哈布斯堡觊觎者在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地位，从一开始就很不稳固。只是由于葡萄牙参加协约国的事业(1703 年)，以及作为新教徒而受到西班牙人憎恨的荷英联军的作战行动，卡尔才有可能在西班牙立足。他的权威的最重要基础在于加泰罗尼亚，那里的居民都忠实于他；1705年攻克的巴塞洛那，尽管有西班牙和法国的进攻，还是守住了。1706 年夏，马德里一度被占领，但是，没有顶住卡斯蒂利亚人的起义。此外，卡尔与英国的司令官、那个刚愎自用而又干劲十足的彼得巴罗伯爵，以及他那个不大能干的后继者斯坦厄普勋爵和高尔韦勋爵，相处得都不好。

同盟国在尼德兰战场上获得的成功较多。当法国人发动攻势时，欧根亲王就率领驻守莱茵河和摩泽尔河的皇家军队前往援助马尔巴罗的军队，会师军队于 1708 年 7 月 11 日在奥德纳德附近战败旺多姆和勃艮第公爵麾下的法国人，而大获全胜。1708 年底，防守顽强的里尔要塞，在长期围困后被攻陷，通往法国的道路似乎敞开了。路易十四倾向于议和，但 1709 年春在海牙谈判时，同盟国却提出了苛刻的要求，他们要法国在计划消灭非利浦第五的西班牙王国时给予军事支援。于是，斗争又继续下去。1709 年 9 月 11 日，同盟国的一支大部队在马尔普拉盖附近战胜维拉尔麾下的法国人，但损失惨重；该年的十一月，人们在马斯河畔的格特鲁登堡重开谈判，同盟国又再次拒绝路易的广泛的、虽然有所保留的让步，他想放弃阿尔萨斯或者甚至斯特拉斯堡，以及在最终打垮非利浦国王时支付援助款项。帝国的诸侯所提出的要求自然绝不

262

是一致的，在上莱茵本来可以为帝国设立一道“屏障”，这样的机会丧失了，不久，一个不祥的变化露出了端倪。

1710年秋天，人们在西班牙开始获得成功，暂时再度占领马德里以后，不得不向加泰罗尼亚海岸撤退。更具有决定性的是英国政府的更迭，托利党内阁代替了辉格党。船主和大商人的政党准备支持一项消灭法国竞争和在海外夺取霸权的战争政策。这个党被大地主取而代之，对于大地主，这些目标似乎太遥远。此外，经过连年战争以后可以理解的和平渴望产生了影响。于是，英国内阁同法国开始秘密谈判。1711年初，在英国司令部中，马尔巴罗被奥尔蒙德公爵所代替，此人并不支持欧根作战，而是妨碍他。另一事件决定性地进一步削弱联合阵线：1711年4月17日，年方三十二岁的皇帝约瑟夫第一，在短期的天花病以后死去。他仅仅留下两个女儿，那是从他最后与不伦瑞克-吕内堡的阿玛利亚·威廉明妮相当不幸的婚姻中产生的。现在，卡尔大公爵成了哈布斯堡全部权益的唯一继承人。奥地利各邦与整个西班牙君主国合并不符合海上强国的心意，它力求在欧洲保持平衡，平衡对于扩大自己的殖民强权地位是十分有利的。

恰巧在王位变更和盟约动摇的危机时期，奥地利的一个忧患被消除了：它经过多次徒劳无功的尝试以后，解决了匈牙利的起义。如果说，以前的努力均告失败，那么，其原因主要在于，拉科西从一开始就要求恢复西本比尔根侯国，他变得更勇敢，更不肯妥协，在奥诺德联合议会上，在反对派被血腥镇压以后，在他自己的队伍里甚至宣布过废除奥地利皇室(1707年)。但是，在战场上，得到在残酷无情的海斯特尔将军领导下的匈牙利塞尔维亚人(即 Raizen)的行动所支持的哈布斯堡军队占据着优势；他们在蒂尔瑙(1704年)和特伦辛(1708年)附近获胜。在拉科西逃往波兰

263

以后，皇帝的一位忠诚的匈牙利将领约翰·帕尔菲终于说服拉科西的战友亚历山大·卡罗利签订索特马尔和约（1711年4月29日）；叛军瓦解了，对于叛逆者保证宽赦，传统的匈牙利信仰自由得到肯定。拉科西没有利用与皇帝和解的可能性。这位国君先后流亡到波兰、法国，最后流亡到土耳其。

卡尔大公爵很快就被选为罗马-德意志皇帝（即卡尔第六）。维特尔斯巴赫的选帝侯由于被驱逐出国而被排除于选举之外；路易十四的种种阴谋诡计都没有引起共鸣，罗马教廷干涉选举谈判的努力已不合时宜，同样归于失败。选举誓约的拟定当然需要一些时日。1711年10月12日，卡尔终于一致当选。然后，欧根亲王就前往英国和荷兰，在这期间，马尔巴罗在英国已完全失宠。欧根的使命毫无成果。1712年初，和平谈判在乌得勒支开始，不久情况就表明，新的英国托利党内阁、它的掮客和代理人并不同情战斗十三年的奥地利盟友，而是同情法国人，他们背着同盟国与法国人达成广泛的协议。欧根亲王企图通过军事上的成功来改善境遇，但是，英国军队已经不可指望，荷兰人在德楠惨败，完全依附了英国；最后，普鲁士想抽出它的军队来打瑞典，此战似乎颇有利可图。1713年4月11日，皇帝的所有盟国（英国、荷兰、普鲁士、萨伏伊和葡萄牙）几乎都参加了乌得勒支和约。皇家军队现在在人数上大大劣于法国人，继续进行战斗并没有带来任何成果；维拉尔攻下了兰道和弗赖堡因布赖斯高；当然，路易十四的国家由于长期战争已经相当疲惫；于是，1713年11月，皇帝和法国之间的和平谈判又重新恢复，由欧根亲王和维拉尔这两个元帅在巴登的拉施塔特要塞里进行。欧根显然是一个坚忍不拔的谈判者；他扬言要中断谈判，终于做到拒绝了某些傲慢的法国条款。1714年3月17日，和约签字；帝国于1714年9月7日在巴登（在阿尔高）批准了和约，这

264 使他失去兰道城，但是，西部边界仍然不变。法国人则应撤出被占领的地区。

由于拉施塔特和约，奥地利从西班牙的继承产业中取得了以前合并于西班牙的尼德兰南部，其领土相当于后来的比利时和卢森堡的领土，诚然，荷兰人在现在的皇家尼德兰中得到了一个“屏障”，也就是说，在一系列要塞中享有驻屯权。在意大利，奥地利取得了米兰、曼图亚、米兰多拉，以及拿不勒斯王国的大陆部分、萨丁岛。卡尔第六默认对于西班牙本土和殖民地的放弃，但是，对于菲利浦第五却用不着明确地予以承认。维特尔斯巴赫人收复了失地，但是，不得不放弃法国人为他们索取的赔款。欧根亲王已经在乌得勒支，后来又在拉施塔特寻找一条途径，以便为奥地利皇帝取得巴伐利亚，把人们想用以赔偿维特尔斯巴赫人的那个偏僻的尼德兰拿出去交换。对于这种解决方案，无论海上强国，还是法国，都不会感兴趣，尽管如此，在拉施塔特条款中还是保留了巴伐利亚-尼德兰交换的可能性，这个计划从此就再也没有从十八世纪的哈布斯堡政策中消失过。

西班牙继承权战争的主要得益者当然是大不列颠，尼德兰尽管享有驻屯权和封锁斯开尔特河，然而却是大大地被英国所超过了。从此，帝国所得到的只是一个易受攻击的西部边界，不久，它的西南部再度成为法国军队的操练场；这次战争，算起总帐来，虽然最后两年有过失望，对于奥地利来说，并非不利。在新获得的地区中，以北意大利领地最有价值；皇家尼德兰和拿不勒斯是军事上难以防守的外围岗哨；此外，屏障条约的规定在1718年的坚韧谈判中略有缓和，斯开尔特河的封锁从1648年起使安特卫普港瘫痪，因此，比利时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受到了抑制。由于卡洛维茨和拉施塔特和约的签订，奥地利总算是最终上升到大国的地位。在

哈布斯堡家族的两个支系中，从卡尔执政开始直到菲利浦第三统治终了时，西班牙系占主导地位；奥地利系虽然不是什么王朝的附属物，如同人们所贬抑的那样，但，它却处于第二位。现在西班牙系已经断绝，奥地利-德意志系比任何时候都更强大，但是，由于卡尔第六是唯一活着的男性哈布斯堡人，因而它直接受到男系死绝的威胁；这样，在一个关心王朝盛衰的时代里，哈布斯堡各国的存亡和维系就面临令人忧虑的危险。所以，在围绕着西班牙继承权 265 的搏斗中，人们已经设法防止这种岌岌可危的局面。

继承权的解决。国事诏书

到十八世纪初叶时，哈布斯堡王朝控制下的各国，在国家法上虽然有着中央的组织机构和往往互相竞争的官厅，但是，主要还是由一个共同的元首，由统治者本人来维系；当皇室分成不同的支系时，曾经作过一些特殊的约定，旨在维持继承权上的极其有限的联系，以及在政治上采取共同的行动。在费迪南第二的遗嘱（1635年）中，我们当然可以找到那个源出西班牙法的基本准则，即各邦和各领地均结成一份“限定世袭财产”（Fideikommiss），王位的继承顺序则按照长子继承法办理。这条准则1703年由于海上强国的反对——更不用说波旁王朝的要求——已经无法应用到西班牙的哈布斯堡人方面，因此，皇帝利奥波德和他的大儿子约瑟夫只好庄严地宣布放弃他们对西班牙继承权的要求，这是有利于卡尔大公爵的。对于这项放弃，另有一项秘密协议，即“pactum mutuae successionis”（无言物继承协定）予以限制。这个协议规定，从约瑟夫和卡尔预期产生的哈布斯堡系的相互继承权，遇男系断绝时，根据长子继承原则，也可以由妇女继承。同时，还以当然不十分明显的形式确定，约瑟夫的女儿应享有优先权。

在约瑟夫去世和卡尔回到奥地利以后，哈布斯堡大公爵夫人为争地位而发生争执，这就需要根据继承法来求得解决。与匈牙利明显地相反，克罗地亚邦议会提出一项要求，这个议会希望解决继承次序问题，以便维持克罗地亚与奥地利各邦的关系。皇帝卡尔第六与改宗者不伦瑞克的伊利莎白结婚后，一直到那个时候都没有孩子。1713 年 4 月 19 日，皇帝把他的顾问召集来，宣读了 1703 年的协议，然后宣布皇帝的意旨：他所属的各邦都是不可分割和不可分离的（“indivisibiliter ac inseparabiliter”）。如果哈布斯堡的男系死绝，则由卡尔的（预期要生的）女儿或女儿的后裔来继承，在卡洛林族女系断绝时，则约瑟夫第一的女儿，以及，最后，一切其 266 他（利奥波德第一传下来的）哈布斯堡妇女均可享有继承权。这个声明的名称是“Pragmatische Sanktion”（“国事诏书”），是经过公证人证明的。由于皇帝的儿子在 1716 年生下仅几个月以后便死去，以后他只有两个公主，玛丽亚·特蕾西亚（生于 1717 年 5 月 13 日）和玛丽亚·安娜（生于 1718 年 9 月 14 日），因此，保证君主国的存在并按照国事诏书来确定王位继承顺序就成了卡尔第六的内外政策的准则。

在 1720 年和 1721 年，国事诏书最先被非匈牙利的邦议员所获悉。蒂罗尔邦议会略有踌躇，此外并无强烈的反对。人们承担了维护既定的继承次序的义务，在邦议会的声明里，几乎没有提到国事诏书所着重申明的各邦不可分割的联合，然而，后来这个“国家根本法”的长期有效性却加深了哈布斯堡的统一思想。自然而然地，做工作让匈牙利接受国事诏书最为困难。这一个工作做得十分慎重，因 1716—1718 年土耳其战争获胜而提高了的威望也发生了作用，还有就是克罗地亚（1721 年）和西本比尔根（1722 年 3 月）已经表示拥护；最后，匈牙利的议员和显贵的“议席”，在听取了

普雷斯堡郡公证人弗兰茨·斯卢哈的慷慨激昂的演说后一致同意接受这个法则。这个决议在法律上完全无懈可击，在以后的两个世纪中，对于维护哈布斯堡在匈牙利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1713 年以后，卡尔第六的对外政策的特点在于，努力争取德国和欧洲国家承认国事诏书；在皇帝执政的最后几年里，这个政策必然使奥地利君主卷入许多外交的和军事的冲突之中。在西班牙继承权战争结束后的第一次战斗爆发时，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有一些别的条件。

对土耳其政府和波旁国家的新斗争

自从损失惨重的卡洛维茨条约以来，土耳其的地位已有不小的改善。在西班牙继承权战争期间，与奥地利一直相安无事。北欧战争的事态发展似乎一度提供了成功地向乌克兰推进的可能性。国王卡尔十二在波尔塔瓦的失败虽然打破了土耳其联合瑞典 267 合击俄国的计划，可是，不久土耳其和俄国在比萨拉比亚爆发的战斗，对于土耳其政府来说，却是成功的。诚然，沙皇彼得由于外交上的巧妙至少部分地抵消了他在军事上失败所引起的后果。土耳其人在宰相达马德·阿里的煽惑下，开始进攻威尼斯共和国的属地，主攻方向是摩雷亚(伯罗奔尼撒)半岛，不久攻克该地，后来在转而攻打科孚时，却遇到了有力的抵抗。对于奥地利来说，土耳其力量的继续加强是危险的，所以，它首先遵循外交途径作有利于威尼斯的干预。奥地利的宣战受到土耳其政府粗暴的拒绝。欧根亲王接掌了集结在靠近边境处的彼得瓦尔丁要塞附近的军队的指挥权。在这里展开了一场战役，战役于 1716 年 8 月 5 日以土耳其人彻底失败告终。于是，欧根率领皇家主力开入巴纳特，该地重镇，那个经过大大扩建的沼泽地要塞特梅斯瓦尔，经过短期坚实的围

困以后，于 1716 年 10 月被攻占。

在 1717 年夏季的战役中，奥地利军队得到一支巴伐利亚部队和许多外国志愿兵的支援，实力有所增强，于是向贝尔格莱德开拔，该城由一支约三万人的卫戍军防守。在土耳其解围军持续推进的情况下，奥军未能拿下要塞，围城军队在要塞和土耳其野战军夹击之下，情况变得危急起来。1717 年 8 月 16 日，欧根亲王出其不意地袭击了土耳其军。浓密的朝雾有利于初战告捷，妨碍了城防军的参战，可是易于使个别的进攻纵队失去联系。由于欧根的亲自干预，危机得以消除，最后终于取得决定性胜利，紧跟着要塞就立刻投降。在贝尔格莱德城下驻营时，大约由一个巴伐利亚士兵作词谱曲的欧根亲王骑兵进行曲，使人们对这个萨伏伊人无数战功中最脍炙人口的一次至今记忆犹新。在战争期间，拉科西的党羽曾数次进犯匈牙利，但是得不到居民的支持，很容易就被赶跑了。

帕萨罗维茨(Požarevac, 1718 年)和约的条款，同战争过程一样明晰。疆界的划法与军事占领状况基本相符。土耳其政府不得不把巴纳特、西尔明前此属于土耳其的那部分、至阿卢塔为止的小瓦拉几亚、北塞尔维亚、波斯尼亚的边境地带割让给奥地利，它的成功还由于签订了一个有利的贸易条约而得到补充。在与威尼斯作战中，土耳其人获胜，因此，他们保住了被征服的摩雷亚。

268 在土耳其战争期间，皇帝与西方强国在外交上达成了重要的协议。这时西班牙已为波旁王朝所属，它正在努力弥补这个国家的国际地位由于欧洲邻邦的割让而遭受的损失。实际决策者朱利奥·阿尔贝罗尼大臣的进攻意图首先针对他的意大利祖国。西班牙那时完全没有可能收复南尼德兰。阿尔贝罗尼首先得到菲利浦第五的第二个王妃伊丽莎白·法尔内塞的支持，她希望为她的

儿子们获得亚平宁半岛上的采邑。这些盘算已为人们所知晓；皇帝在土耳其战争爆发时，就设法同英国结盟，英国自从汉诺威的格奥尔格第一登极（1714 年）和托利党内阁垮台以来，一直与旧日的盟国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关系。奥地利对意大利的事态也不很满意；人们最想取得西西里，该岛在乌得勒支条约中划归萨伏伊，其价值较之皇家的萨丁岛简直大得无可比拟，人们想把撒丁岛当作交易物来使用。1717 年 8 月，阿尔贝罗尼让西班牙军队在撒丁登陆，次年在西西里登陆，这时，英奥谈判逐渐有了眉目，法国和尼德兰也被吸收参加谈判。1718 年 8 月 2 日，"四国同盟"条约的条款由皇帝、大不列颠和法国的代表在伦敦签订；只有尼德兰参加进去，这个"四国同盟"才算凑齐。但是，这个联合邦由于国内发生困难，而没有参加。在盟约曾规定以撒丁交换西西里（撒丁归属萨伏伊，于是萨伏伊成为"撒丁王国"）；皇帝那方面应正式放弃西班牙；伊丽莎白·法尔内塞的儿子在限定的条件下取得所盼望的帕尔马、皮亚琴察、托斯卡纳。卡尔第六尽管内部极力反对，还是实际上放弃了西班牙。萨伏伊被迫同意以撒丁换取那个难以防守的西西里。为了克服西班牙的反抗，首先需要英国人在西西里海岸的帕萨罗角消灭它的舰队和搞垮阿尔贝罗尼大臣；法国人在比利牛斯地区的作战行动和帕萨罗维茨的土耳其和约，在促使菲利浦第五于 1720 年初参加同盟并从有争议地区撤出其军队方面，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四国同盟所拥有的领土得到帕萨罗维茨优厚战利品的补充：奥地利君主国空前地扩大，这个绝非连成一片的权力实体的疆界从英吉利海峡伸展到意大利的南端，从西里西亚西北部的施维布斯县伸展到瓦拉几亚的阿卢塔，人们认识到，哈布斯堡由于取得帝位而得到提高的家族权威的内在的实力与显赫的空间扩张并不相称。在民族的和文化的特色方面，在经济力量和政治权

269

利方面，各个省区都呈现很大的差别；尽管重商的经济决策者和行政官员们作了努力，仍然没有做到把幅员广大的君主国建成一个“总体”，即一个多少比较划一的整体。

在以后的几年中，欧洲强国的混乱的外交把戏引起许多复杂的情况。贸易政策上的考虑破坏了皇帝与海上强国的合作，使以前的宿敌奥地利和西班牙走到一起。皇家尼德兰由于斯开尔德河封闭和驻屯条约而损失重大；西班牙继承权战争结束后不久，弗兰德尔商人得到皇帝的支持，进行了与印度通商的大规模的和有组织的尝试，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海上强国立刻就出现，它们的商人提出了垄断殖民地贸易的要求，对于新的竞争表现完全不能容忍。皇帝开头表示退让，这只能增加了海上强国的要求；最后，卡尔第六终于把“奥斯坦德公司”(Kompagnie von Ostende)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西班牙的海外地区只有为被封锁的英国和尼德兰的属地提供赔偿。1725 年春，达成了必要的协议。和约和盟约补充了贸易协定。条约是由一个不太严肃的西班牙掮客里佩尔达男爵在维也纳起草的，尽管欧根亲王心存疑虑，条约还是缔结了；1725 年 11 月，又缔结了一个更加密切的盟约。但是，在这期间，反措施也正在采取；法国(当时正由于一场家族冲突而同其他波旁国家分道扬镳)，大不列颠(汉诺威和它站在一起)和普鲁士，于 1725 年 9 月，在赫伦豪森(汉诺威附近)缔结了盟约，就军事力量而论，这个同盟肯定优于奥地利-西班牙联合。因此，人们只好在维也纳寻找新的结盟伙伴：1726 年夏，人们与俄国结合，1726 年 10 月，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第一变卦，改而与皇帝在武斯特豪森缔结了密约，他希望他对贝格和于利希的继承权要求能因此而获得有利的解决。当西班牙人开始包围直布罗陀之时，一场欧战的爆发似乎不可避免。于是，法国进行干涉，它的政府首脑、枢机主教弗勒利

(Fleury),同维也纳宫廷一样,都不想打仗。1727 年,卡尔第六同意撤销奥斯坦德公司(为期七年,后来变为长期解散),出现了暂时 270 的缓和。在索瓦松会议上,皇帝极力迎合海上强国;在这期间,尤其是在想与奥地利皇室发生王朝上的联系这一希望变成泡影的时候,西班牙同英国和法国进行了秘密谈判,并于 1729 年 11 月签订塞维利亚条约,不久,尼德兰也加入这个条约。菲利浦声明,与皇帝签订的一切条约均属无效,让海上强国恢复它在同西班牙海外属地的贸易中所占的优势地位,作为交换,对帕尔马和皮亚琴察的要求得到广泛支持的许诺。塞维利亚条约是在取消西班牙以前对奥地利所作的一切保证的情况下产生的;哈布斯堡君主国现在相当孤立,论比较重要的盟友,它只有一个普鲁士国王;俄国表现得相当冷淡。当然,敌人的联盟也不是很牢靠的。在西方盟国中间,保守的海上强国与好战的波旁国家之间的矛盾,不久就变得明显可见。欧根亲王尽管一再失望,还是力图恢复同英国的传统同盟;经过旷日持久的谈判以后,终于在 1731 年 3 月签订第二个维也纳条约,在条约中英国承认了国事诏书,皇帝则表示不将其有继承权的女儿嫁给一个有巨额家财的亲王,奥地利最终放弃奥斯坦德公司,允许西班牙警备军驻守托斯卡纳、帕尔马和皮亚琴察。不久,尼德兰和西班牙也同意已达成的协议。1731 年和 1732 年,当欧洲强国试图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他们的矛盾的时候,终于发生奥地利军队武装干涉科西嘉的事件,那里的居民奋起反抗热那亚统治;奥地利担心波旁国家介入(该岛实际上于 1766 年归法国所有),但是在科西嘉恢复平静以后重又把军队撤出。

一个不愉快的、几乎象是不合时宜的事件,于三十年代初期,扰乱了帝国在政治和宗教方面的安宁。萨尔茨堡的利奥波德·菲尔米安大主教(1727—1744)作出重大努力,使他那个邦的许多新

教徒重新皈依天主教——约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早在马克斯·甘多夫大主教治理下，于1684—1685年就已将大约一千名新教徒逐出萨尔茨堡所属的德弗雷根各地。施瓦察赫的新教徒为强力推行的传教活动所苦，为自己的信仰自由而担心，遂于1731年结成"萨尔茨同盟"(Salzbund)，他们表示要为自己的信仰而团结起来：这271时，对大主教的不满表示了出来，他召来了皇家军队，控告叛乱的农民，最后把他们强行驱逐出境。这样，1732年，有二万名以上的信奉新教的萨尔茨堡人离开了他们的故乡，大部分人迁往东普鲁士；那个霍亨索伦国家由于采取反宗教改革措施较晚，如同以往由于法国驱逐胡格诺教徒一样，获得了能干而又勤劳的公民。皇家政府对于煞住萨尔茨堡大主教的行径，什么事也没有做；但是，人们不能象偶尔发生的那样，把他的措施归咎于奥地利的专制。

萨尔茨堡的事件也妨碍了卡尔第六要为国事诏书取得帝国保证的尝试。三个有神职的选帝侯一向是赞成保证的，普鲁士国王的态度是积极的，通过第二个维也纳条约，人们也争取到汉诺威，它的选帝侯也就是英国国王。巴伐利亚则起劲地反对，萨克森选侯国也随声附和，尽管如此，谈判和雷根斯堡议会上的投票却是以奥地利的圆满成功而告终，保证被宣布了。但，与此同时，皇帝与波旁国家之间的矛盾却变得尖锐起来。

1733年2月1日，波兰国王奥古斯特死去，波兰的王位继承问题自从十七世纪中叶以来一直成为影响欧洲结盟政策的一个因素，这时它重又成为一件具有直接现实意义的事。法国的外交曾为斯坦尼斯劳斯·莱什琴斯基效劳，他在北欧战争期间已经有几年是瑞典卵翼下的波兰国王。波兰的邻国——奥地利、普鲁士、俄国先是支持卡尔第六的侄子、葡萄牙国王埃马努埃尔亲王。但是，人们不久就认识到，这个僭望王位的人没有什么希望，于是，尤其

是俄国和奥地利就转向已故波兰国王的儿子、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特第三。波兰民族因此加强了支持斯坦尼斯劳斯的决心，他于1733年9月当选。但一个月以后，俄国军队入境，他就不得不让位于奥古斯特第三。这个事件正好为波旁国家早就准备好了的进攻提供了所期望的时机，虽然奥地利军队根本就没有踏上波兰的土地。可是，人们已经获悉，在维也纳，洛林公爵被认为是最有希望把有继承资格的女儿玛丽亚·特蕾西亚娶到手的求婚者，因此，他的国家就有被奥地利合并的危险，而这却是人们无论如何都要避免的，法国的政策长期以来就致力于取得这个国家。于是，法国军队就占领洛林，并渡过莱茵河。法国和萨伏伊-撒丁同时在意大利北部展开敌对活动，西班牙人则进攻两西西里王国。奥地利指望海上强国的支持，而它却保守中立，俄国的盟国又离开战场很远。普鲁士国王主动提出，作为平等的盟友，以它全部相当可观的兵力参加莱茵河畔的战斗，这个建议却在维也纳遭到拒绝；人们满足于普鲁士对帝国援助所分摊到的一千人份额；霍亨索伦国家自从北欧战争以来力量不断增长，这些力量在莱茵河不应过分显示，因为他的王朝正在那里谋求于利希和贝格。实际上，奥地利方面需要每一个人，尤其是因为巴伐利亚坚决倒向波旁强国，波旁强国可以从背后威胁莱茵战线。皇家军队则在最近几年颇受忽视。莱茵河畔的指挥权落到年纪老迈的欧根亲王手中，但是，他已经没有以前那种魄力；被法国人包围和顽强防守着的菲利浦斯堡要塞，他已无法予以解围，诚然，他阻止了敌人的继续进逼。奥地利在意大利的作战行动进行得非常不利。帕尔马一役（1734年6月29日）没有起决定性作用，在这场战役中，皇家司令官，那个开拓巴纳特有功的殖民者默西将军阵亡。此外，奥地利人于1734年9月19日在瓜斯塔拉被击败。意大利南部的情况最糟，那里可用的力量

272

很不够,在数量上占优势的西班牙人,在比通托告捷以后,攻占了那不勒斯的大陆部分,不久还攻占西西里岛。1735 年,莱茵河畔的作战没有产生任何特殊事件,但是,摩泽尔河畔的法国军队却开始撤退,一支俄国援军的抵达加强了皇家的和帝国的军队的军事地位。一个新司令官,安德烈亚斯·路德维希·克芬许勒伯爵,在上意大利获得了局部的胜利。

1735 年内,交战各国进行了谈判。虽然海上强国的居间调停失败了,但是,奥法直接接触不久却带来了具体的结果;1735 年 10 月 3 日,维也纳临时和约签字。条件对于奥地利并非不利。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划给唐·卡洛斯属下的一个波旁支系,没有与西班牙合并。伦巴底仍为奥地利所有,仅诺瓦拉和托尔托纳周围的边境地带除外,这个地带划给撒丁。此外,人们还得到帕尔马和皮亚琴察,在领土上这个补偿当然抵不上南方的割让地。托斯卡纳被许给了洛林和巴尔的弗兰茨·斯特凡公爵,但他却不得不放弃他的故土(伯爵领地法尔肯施泰因除外)。洛林则被分配给被逐出波兰的斯坦尼斯劳斯国王;在他死后,洛林应归法国,从而法国也就达到了许多世代以来顽强地推行的扩张政策的目标(1766 年)。从此凡尔赛再也用不着害怕洛林-哈布斯堡为继承而缔结的婚姻,于是法国就同意保证国事诏书——当然要保留第三者的权利。经过旷日持久的谈判,以抚慰法国被激怒了的盟国,才于 1738 年 11 月 18 日,在第三个维也纳条约中批准了法国和奥地利之间的媾和,不久,别的参战国全都加入这个和约。

在结束波兰王位继承战争的外交活动期间,1736 年 4 月 21 日,萨伏伊的欧根亲王逝世了,在他的同时代人看来,他似乎比任何人都更能代表哈布斯堡君主国。哈布斯堡君主国特别是由于他的成就才上升成为强国的。

作为杰出的军事指挥官，以及在一度采取选拔制的皇家公职中绝对忠诚和头脑冷静的政治家，作为豪爽的和充满同情心的文艺提倡者，欧根把他的非凡的人格铭刻于奥地利。如果把他当作德意志英雄来纪念，那当然是错误的。——不仅在罗曼族出身和教育方面是如此。首先，亲王对皇帝和奥地利皇室是尽忠职守的；"帝国思想"，从他的言论和著作中很难体会得出来。不消说，他得到帝国议员们的完全信任，就政治利益来说，他属于卡尔第六宫廷中的"德意志党"，西班牙人(大部分加泰罗尼亚人)和那不勒斯人与这个集团相对立，而君主则特别感到自己与那不勒斯人有休戚与共之感。此外，这个萨伏伊人得到卡尔应有的信任，正如他得到利奥波德或约瑟夫的信任那样。相反的认识通常应追溯到约瑟夫·冯·萨托里斯的伪造，即所谓"萨伏伊欧根亲王的遗著"。在欧根的晚年，他的影响由于约翰·克里斯托夫·冯·巴尔滕施泰因男爵官运亨通而受抑。与海上强国和普鲁士合作（他认识到普鲁士大有发展前途），此外，尽可能通过与巴伐利亚的有继承权的婚姻来建立王朝的联系——这些就是欧根亲王的策略原则；对于波旁国家，尤其是对于法国，他总是心存疑虑。尽管一再失望，欧根亲王还是主张维持奥地利对于正在逐步酝酿中的"renversement des alliances"("推翻盟约")的传统义务，对于此事，巴尔滕施泰因至少是含着消除哈布斯堡-波旁的"世仇"的意图去做的。暂时与法国亲善，就能在土耳其战争中取得活动的自由，这样做在欧根看来当然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对于行政管理，对于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努力，欧根的兴趣要小一些。他在晚年中再也筹不到必需的资金来维持一支强大到可以打仗的军队。不幸的是，在欧根死后，如不久以后所表明的那样，再也没有优秀的指挥官可用了。 274

第二次土耳其战争爆发于一场土俄冲突，这场冲突是由于俄

国力图占据黑海北岸而引起的。奥地利由于1726年的盟约,负有出兵支援的义务;既然居间调停无效,人们就想以独立作战国的姿态出现。巴尔滕施泰因所领导的维也纳政治家中的主战派很想在土耳其地区里把由于波兰继承权战争而遭受的损失弥补过来;人们制订了大量的征战计划。同俄国缔结了一个新同盟;根据盟约预定要进行的军队合作没有以任何形式搞过。人们一开始就低估了土耳其军,这支军队被改信伊斯兰教的克洛德·亚历山大·德·博纳瓦尔将军(阿赫默特·帕夏)彻底地改组过,博纳瓦尔在1726年的不快事件以后离开了奥地利公职,正如他在以前曾离开过法国公职那样。奥地利的作战行动于1737年夏以攻占尼什要塞告捷开始,后来在波斯尼亚受挫,连尼什也重新丢掉。在尼米罗夫(波多林恩)举行的和平会议失败了。洛塔尔·柯尼塞格伯爵取代泽肯多夫将军,成为军事行动的首领,洛林公爵弗兰茨·斯特凡公爵只是名义上负总指挥之责。在科尔尼亚和梅哈迪亚附近的战斗获胜以后,1738年又再失利;这时柯尼希斯埃格也只好下台,但他的继任者也同样失败。由于他的优柔寡断,格罗卡战役(1739年7月22日)打败,军队向贝尔格莱德退却。在这期间进行了和平谈判,法国驻土耳其政府的大使路易·德·维勒纳夫也参加其中。他的活动并非如人们长期所倾向认为的那样,单纯针对奥地利。土耳其人的要求自然随着他们意料不到的胜利而升级。皇帝的外交官总是表现得不稳重,不果断。奥地利全权代表奈佩尔格伯爵害怕进一步受挫折,放弃了帕萨洛维茨和约取得的大部分土地,其中包括贝尔格莱德要塞,于是谈判宣告结束。奥地利在波斯尼亚所领有的部分以及小瓦拉几亚,同北塞尔维亚一道丢失。

275　比丧失领土更糟的是,这个不幸的贝尔格莱德和约(1739年9月18日)使奥地利在信奉基督教的巴尔干各国中损失了威望。

俄国在战争中打得很好，又由于都信奉正教，故巴尔干各国人民感到与俄国有休戚攸关之感。从那时起，在这些人民看来，在一切摆脱土耳其枷锁的联合行动中，俄国都占据首要地位。奥地利君主国及其军队的威信，甚至在西方强国中也一落千丈；本国的人民则由于无数次最终打失败了的战争而负担过重，在忠诚方面也就必然动摇。哈布斯堡男系的最后一个成员卡尔第六于1740年10月20日死于一场急性的恶病，于是女王位继承人玛丽亚·特蕾西亚就面临一个吃力不讨好的、难以解决的任务。

人口与1648—1740年的移民

十七世纪下半叶，为消除三十年战争的损害和为弥补土耳其人侵所造成的人力和物力损失而作的努力，影响着当时的一切。在对土耳其发动猛烈攻势以后，需要开垦已取得的、部分地变得非常荒芜的地区，需要加紧对人口相当稀疏的地区移民。专制国家的官方机关越来越多地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地主们的作为仅限于较小的经营活动。如同前一个时期，属于这方面的有局部性的开垦，如在波希米亚边境或在维也纳森林的施雷姆斯和利乔。旧城镇里的新教堂的筹建工作也在继续进行着。

在1683这个土耳其年以后，被毁坏的移民村必须重建，新移民应予以安置。当时的一个刊物《欧洲舞台》(Theatrum Europaeum）报道说，被焚的城镇达14,933个，被劫持的人达88,209名，这个似乎很具体的数字虽然已不可考，就城镇的数字而言，至少是大大夸张了的，但是，无可怀疑的是，损失很大。受损特别严重的是维也纳森林辖下的一个下奥地利的菲特尔区(Viertel)；下奥地利邦无法自力更生地弥补人力上的损失，因为在敌人入侵前不久，鼠疫同样也害死了许多人。从经受过1679年和1683年事件的城镇的结

婚登记簿来看,很多新来的移民都是来自施蒂里亚、上奥地利、蒂罗尔、萨尔茨堡、弗兰肯、施瓦本和普法尔茨,在有些地方,如默德林、贡波尔茨基尔兴、林边的拉布,十七世纪末时,几乎占总人口的半数。土耳其人一定曾经劫走不少俘虏,土耳其的材料谈到虏掠妇女,为数至巨。因此,在奴隶交易中她们的价格下降得很厉害,其他俘虏就被解围军队释放了。另一方面,土耳其战俘有留在国内的,如关于"土耳其人受洗"(在维也纳郊区圣乌尔里希教区)的消息所证明的;大概只有少数后来回到他们的故土,如那个奥斯曼·阿加,他谈到他在维也纳和卡普芬贝格的遭遇,他的报道值得一读。1679年鼠疫所夺走的人命肯定要比土耳其战争要多,在维也纳、下奥地利、施蒂里亚,鼠疫为害特甚。哈拉赫伯爵家族档案记载了维也纳的损失;据记载,死于鼠疫的,在维也纳市区有59,486人,在郊区有30,470人。这些数字不可能相符;据维也纳死亡调查表,在市区和郊区鼠疫死亡人数达到80,000之多。这样的损失已够严重。精明能干的医生保罗·佐尔拜特提出过消灭疫病的建议,很合情理,但,由于一般人表示冷漠而未能实行。在鼠疫猖獗之际,有讲究排场的外国使节进城,情况热烈,引来许多看热闹的人群,这就有助于传染。在格拉茨,据说疫病造成3465人死亡,占人口的五分之一;有几个较小的城镇失去了居民的大多数。死亡率相差悬殊,令人惊异,我们发现,在关系密切的近邻之中,有些地方完全幸免,有些地方受损至为严重。1713年的鼠疫,即维也纳所遭到的最后一次鼠疫,仍然使该城损失约二千五百条人命。在这时为防止瘟疫而采取的防范措施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根据1710年和1728年的皇家敕令,沿土耳其边境建立起一条"鼠疫防线"(军事警备线和交通断绝站)。

地缘政治地位的变化,奥地利的上升为强国,清楚地反映在人

口变动和移民活动之中。敌对危险的减少使维也纳郊区得以扩大，皇家首都的移居活动已着重向郊区转移。到十八世纪中叶为止，维也纳的人口总数达到 175,000 人左右。新郊区产生了，直角相交的马路和街区布置得井井有条，以皇帝约瑟夫第一命名的约瑟夫镇、新莱兴费尔德和阿尔塞格隆德就是这样产生的。在十字军作乱时，显然有必要用防护墙来至少勉强地防护一下郊区。外省城市，如邦首府因斯布鲁克和格拉茨，或者，封爵的大主教驻在地萨尔茨堡，都按照巴罗克时代的城市建设原则加以扩建。工业化最初有点畏缩不前，有些地方已经建立起工人新村，有少数难以悦人 277 心意的工厂和工人住宅建筑，但是，距离下一个世纪那种拥挤的城区和贫民窟一筹莫展的局面还很遥远。

由国家有计划地推行的移民活动的主要场地自然是在所谓“Neoaquisita”，即新取得的地区，如在匈牙利南部，在托尔瑙和巴兰尼亚（“施瓦布土耳其”），在巴奇卡，尤其是在特梅斯瓦尔·巴纳特。应特别指出，巴纳特是在 1718 年才取得的，作为皇家直辖地区而被治理，因战争和土耳其时代的荒芜，而同遭深重的苦难。沿河的广袤地区变成了沼泽，别的地方似乎只适宜于放牧，到处游荡的瓦拉几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就是从事这种放牧的。尽管如此，在这里还是建立了欣欣向荣的种植区，放牧地变成了农田，也就是君主国的小麦仓库和大麦仓库，人们还努力建立手工场和工厂。欧根亲王和能干的总督克劳迪乌斯·弗洛里蒙德·默西伯爵，一个优秀的组织者，号召德国南部的殖民者，弗兰克人、施瓦本人、普法尔茨人，还有下奥地利人和德意志波希米亚人到巴纳特去，深入匈牙利南部；来自阿尔卑斯山区的矿工，首先是蒂罗尔人和施蒂里亚人被安置到巴纳特东部山区。这些移民大多数都从水路来，他们的通称是“多瑙施瓦本人”，那是就出身而言的，并不贴切；他们在

前奥地利的多瑙河城镇埃欣根和京茨堡上船，也有很多人在维也纳上船。除了德国人以外，还安置了匈牙利、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的移民，个别地连罗曼语系的洛林人和意大利人也吸收前来参加国土的开发。奥地利的军事工程师和建筑师指导土地测量和移民村的设计。不幸的1737—1739年的土耳其战争使大规模垦殖的继续发展中断；巴纳特南部和东部的移民区严重地受到牵连；由于贝尔格莱德不得不割让，德国移民和部分塞尔维亚居民撤出这个城市。后来，在玛丽亚·特蕾西亚时代，东南方的移民重又以更大的规模恢复起来。

在宗派争执的时代，许多新教徒被驱逐出境，现在人们却不惜一切代价来增加人口。当然，天主教徒作为入境移民得到极大的优先，往往还只有他们才被允许入境，带有明显反宗教改革性质的措施也不少。这些当然不仅限于哈布斯堡各国；在这里，在三十年战争期间，由于信仰而迁徙出国的活动达到了最大规模，然后又很快低落下来。在萨尔茨堡，情况有所不同：1685年，有一千多名萨尔278茨堡臣民不得不离乡别井，他们是来自德弗雷根谷地的东蒂罗尔新教徒和迪恩贝格的矿工。大部分移民前往德国南部，如约瑟夫·沙伊特贝格尔，著名的《放逐者之歌》的作者。有些人甚至到达北美教友派的殖民地宾夕法尼亚。1731年的萨尔茨堡大移民涉及到大约二万二千人，几乎为该邦居民的五分之一；他们中的大部分来自庞高(Pongau)和平茨高(Pinzgau)。这一回，大多数人都转向东普鲁士，被安置在古姆比楠和戈达尔普地区，他们在那里成了能干的农民，表现得很出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当代的民族仇恨从这些宗教难民的子孙手里夺走了他们的新家乡。一群人数较少的萨尔茨堡人被尼德兰安置在泽兰省，有少数人飘洋过海，到了北美洲的英国直辖殖民地乔治亚，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小城埃

本-埃策尔。在萨尔茨堡大移民时期，发生过被驱逐出萨尔茨卡默古特的事。在一次信仰清查中查出了一千二百个新教徒。向"帝国"的新教地区移民，是要受到阻拦的，因为，在这里已经可以感觉到"人口论"思想，于是就把这些新教徒放逐到匈牙利(西本比尔根)，他们在那里有宗教自由。这些"邦民"(Landler，指来自上奥地利"邦"Landl)，在玛丽亚·特蕾西亚统治下曾不断得到人力上的支援，他们被安置在一些德意志村镇，与西本比尔根的萨克森人相比，他们的许多特点还一直保留到现在。

在重商主义影响下的经济生活和经济政策

在十七世纪中叶，先是在法国(据这里所举的例子)，不久又在中欧，出现了宫廷及其大臣指导下发展国民经济的端倪。如所周知，当时采取的措施首先有利于"商业"以及工艺(包括刚刚诞生的工业)生产。为了促进工商业，在奥地利成立了专门的机构；1666年，维也纳商务处，1705年，各邦商务署，1714年，重商委员会。农业没有受到同样的促进；但是，在农业方面还是出现了变化；一种陈旧的家长制经营方式，即家庭与企业被认为理所当然地浑成一体的方式，还占据主导地位，它没有明确地考虑市场和交通状况，这种经营，如同下奥地利乡绅沃尔夫·黑尔姆哈德·冯·霍贝格在他的名著"Georgica Curiosa"(«好奇的乔治»，1682年)中所 279 肯定的那样，这时已在逐渐消失。然而，贵族等级思想在地主及其生活方式和经营方式方面，要比别的地方留存得长久些。

在等级和信仰纷争的时代大贵族的财产状况已有明显的变动，这一变动在十七世纪下半叶仍在继续进行；邦里的国君放弃了广阔的领地，贵族等级因此而得利，并且逼着骑士们退让，在贵族内部，骑士在人数上退居少数。另一方面，发了财的官吏、商人和

手工业者则爬上了贵族地主阶级。教会贵族在克服信仰斗争的困难以后,重又表现出扩张的倾向。

专制时代农业子民的权利状况同十七世纪初的状况不相上下。农民自治当然受到进一步的限制;这时,只要判例不维护较老的习惯法,就成为官府的规范,官府可以随意作出任何变更。农民对已大大贬值了的村公所的兴趣似乎正在消失。另一方面,争取国君保护农民的努力开始发生较大的影响。1679 年发布的《无形法论》(Tractatus de iuribus incorporalibus),尤其是 1681 年利奥波德第一的皇家领地敕令,都包含有不许对臣民"刁难"的规定。卡尔第六颁布过反对强行预购、反对地主屯积谷物和减轻徭役的法令。这些具体规定究竟实际发生多大作用,不易查考;专制国家的有力措施在地主掌权者身上总是贯彻得不力。关于王侯地产的法令倒是比较易于实行;对于奥地利西部各邦,对于蒂罗尔和福拉尔贝格尤其具有意义;长期以来,这里农民的社会和经济状况通常比较好。在农民的租佃形式当中,在东阿尔卑斯和多瑙各邦,永佃权(购买权)已成定局,终老财产制往往能实行。那些仍领用免税教产的农民则感到高额"变更费"的重压,而地主们在厉行催征中却可以得到相应的利润。徭役的分派也同样是极为讨厌的,不少高雅的巴罗克式建筑之所以能在短期间内建成,就是靠的残酷使用子280 民们的人畜徭役。《法论》中规定可用钱来抵偿徭役,但未见诸实施。卡尔第六的三个徭役敕令未收彻底贯彻之效。

人们种植中世纪流传至今的谷物一般仍沿用传统的方式,但是,真正的休耕已开始从三年休耕制中消失,三叶苜蓿和其他刍料植物已经有计划地种植。对于国民经济的要求越来越多地加以考虑,劝导人们将葡萄园改为农田也与此有关。改建农田的过程是由于土酒的销售逐渐困难起来,以及也许由于气候变迁所致。烟

草的种植颇受人欢迎；1659 年，把烟草种植者从美茵河法兰克福请到了奥地利。奥地利有些邦办了私营烟草工厂，到 1772 年时，在海因堡才开设一家皇家烟草工厂，地主和农民土地上种植的烟草都要交给这家工厂。农具改良曾经作过各种各样的试验。1662 年，约瑟夫·洛卡泰利申请一架播种机的专利；四年以后，西格弗里德·克利斯托夫·冯·布罗伊纳男爵造出第二台大有改进的机器。

地主在畜牧业仍然占据主要地位；人们进口荷兰和瑞士的种牛，力图改良本地牛种的质量。牧羊业当时之所以有重大的发展，是同重商主义者对纺织工业的关怀分不开的，一般说来，重商主义者重视农业，而不大重视粗放的畜牧业；皇家行政机关在新取得的匈牙利地区，尤其是在巴纳特所采取的措施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在重商主义时代，森林业也发展了。新兴工业和逐渐增长的城市居民一样，也需要柴禾和建筑木材。人们进行森林业的改革，以避免掠夺性滥伐而增加森林的利用。于是，1681 年，新成立一个皇家维也纳林业管理机构（普尔克斯多夫林业局），后来，在 1718 年，由于颁发了一个新的"林业局指令"，该局遂进一步扩大。维也纳森林提供了建立城防工事所需的塞栅，以及造车、造船和燃烧用的木头；1694 年以后，在特利斯廷、图尔曼和维也纳举办了流放作业，帝都的木材需求量得到了满足，木价也降低了。

总之，人们可以这样说，对农业和农民生活水平影响最深远的，不是专制国家和它的官厅为农民采取的经济措施，这些措施多 281 半可以说是畏缩不前、以及首尾不一贯的，而首先是旨在发展工商业的重商主义的努力，它的后果当然对于后代会发生深刻影响，而且这影响是积极的。人们暂时还没有达到这种地步。衡量居民阶

层的经济状况的最可靠尺度乃是他们的劳动产品所获得的价格，以及对于付出的劳动所支付的报酬。从这个原则来看，十七世纪中叶至十八世纪中叶，整个中欧的农业人口的状况一般都很不妙，因为，农业的产量低，而手工业和工业的产品价格高，两者之间显然不成比例。

我们转过来看看“商业”。首先应当对那些在奠定理论方面以及在实际拟定和贯彻重商主义经济政策方面具有特别意义的归化奥地利人表示敬意，是适宜的。这里要谈到三个来自“帝国”的新教改宗者：约翰·约阿希姆·贝希尔、菲利浦·威廉·冯·赫尔尼克和威廉·冯·施罗德。三人中最有独创性和最多才多艺的是贝希尔，坎坷的生涯把他从莱茵区经过巴伐利亚和奥地利带到尼德兰和英国。他的兴趣绝不仅仅限于经济问题，这个有自信的人尝试过炼金术家、教育家和神学家的行业。他的主要重商主义著作《城、邦、共和国盛衰原因论(1668)》，论述了少数人(Monopolium)的财产积累，无资本的小手工业者(Polypolium)过多，或者人为的竞争限制(Propolium)对于国民经济的危险威胁。对外贸易应由公司来组织。作为实际企业家，贝希尔并不是十分成功的，他在慕尼黑和瓦尔佩斯多夫（在圣珀尔滕附近，1666年）创建的缫丝工场，由于同业公会的反对和官厅的不信任，没有能办下去。他创办的（第一个）“东方贸易公司”（1667年）办得不坏，于土耳其年(1683年)结束。这一年，贝希尔的后继者威廉·冯·施罗德领导下的大制造厂也遭到了同一命运，该厂位于维也纳附近的塔博尔河畔，原拟办成一个发展化学、金属加工和纺织工业的示范企业。施罗德的炼金术倾向使人联想起贝希尔的类似兴趣。此外，他在哈

282 布斯堡君主国还当过数年的财政官员和企业主——在海因堡从事毛纺业。他在青年流浪学艺期间，以及后来充当皇家代理人期间，

熟悉过尼德兰和英国的先进纺织工业，想把自己取得的先进经验应用到奥地利，但是，没有能够实现。在普雷斯堡的匈牙利议会里，他有揭发密谋之功。施罗德在一本重要的理论著作《国君的财库和税库》(1686年)里，力图证明专制国家和人民的真正利益相一致;国民经济的运转应通过详细的调查统计(制造业表格)来控制。最后，施罗德对于银行贷款资助工业赋予极重要的位置。

贝希尔的连襟菲利浦·威廉·冯·赫尔尼克，作为利奥波德第一的一位能干的外交官克里斯托夫·德·罗雅斯·伊·斯皮诺拉男爵的秘书，来到奥地利，在哈特堡(东施蒂里亚)充当过罗雅斯的地产管理人，在一次长途旅行中对哈布斯堡帝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此行他搜集了一些有关工商业活动的统计材料；后来，他为上奥地利议会工作过，为帕绍主教效过劳。他的主要国民经济著作《奥地利将凌驾一切，只要它愿意》(1684年)，标题活泼有力，经常被引用。该书最初被人拒绝，后再版十三次之多，成为奥地利重商主义的纲领性文献。赫尔尼克十分着重地指出了奥地利经济领域内的有利天然条件，以及更好地利用这些条件的可能性；建立一个受禁止货物输入令保护的示范工业，在他的思想中占据着中心地位，此外，他还比贝希尔更多地考虑到原料供应和培养一批熟练工人骨干的问题。

在建设示范工业时，利奥波德时代的早期重商主义者并不是很幸运的，已如前述，他们的主要从事纺织业的制造厂不久就停办，不正直的宫廷财务局长辛岑多夫的冷淡和恶意是要对此负责的。归根结蒂，问题在于：一个没有经验的工业政策不可避免要患幼年期疾病，它要和那么多困难作斗争。在大企业中，1672年克里斯蒂安·辛德建立的林茨毛织厂是成功的，但是，业主的更换频繁，以及与邦内纺织工人和林茨市政当局的不断争吵，使它不免遭

受重大挫折。1725年时，这里已有工人4415人，此外，在家里为工厂从事劳动的纺织工为数也不相上下。第二个小得多的织布厂在恩斯河上游之邦的诺伊菲尔登附近的朗哈尔森建立。这里还要283 指出重商主义纺织业的一个先驱者：帝国副首相库尔茨于1650年前后，在霍恩举办了大规模的织布业和染布业。

政治经济学家们把主要着眼点转向奢侈品和嗜好品工业；维也纳市场对于奢侈品的需求量很大；只要人们依靠从西欧进口，甚至从敌对的法国进口，贸易平衡就很难达到。早在1659年和1671年就已颁布过不准消费昂贵的外国货物的禁令；1712年重又颁布禁止世袭地输入奢侈品的敕令。1697年内，一个意大利移民布拉蒂在苏格兰人门(Schottentor)前面开办了一个丝绸厂，从而为十八世纪欣欣向荣的在朔滕菲尔德(即所谓"宝石地")举办的维也纳丝织业奠定了基础。日内瓦的琥珀织物制造商弗朗索瓦·迪南在极其优渥的条件下，于1717年移居维也纳；不过，后来他的企业并未获致圆满的成功。次年，克劳迪乌斯·英诺岑茨·杜·帕基埃在维也纳建立了一个瓷器工厂，该厂产品颇负盛名。在维也纳周围建立的工厂中，(第二个)东方贸易公司(1722年)在施维哈特开办的大棉织厂成了维也纳盆地纺织业的萌芽。

本国的玻璃制造业为重商主义者提供了某种继续发展的可能性。无论在质量还是在价格上，人们当然都无法与威尼斯的商品竞争。1701年，两个意大利人获得到在下奥地利诺伊豪斯开设镜子工厂的许可，该厂于1709年才能开办。

在阿尔卑斯山各邦，自古以来就有一个卓有成效的、以手工业为基础的金属工业，尤其是制铁工业，然后又有制盐场、造纸坊、玻璃厂和啤酒厂；重商主义者在这里的建厂活动一般地都比在多瑙河畔要晚一些。当然，在这里也有先驱者：如普利米罗(南蒂罗尔)

的卡尔·阿绍尔在三十年战争后期曾去过瑞典，在那里学习了冶金术，于1649年在阿亨赖因开办了一个拥有几百名工人的黄铜厂。成立于1682年的因斯布鲁克金银丝工场不久停办。在萨尔茨堡，封爵的大主教、图恩伯爵约翰·恩斯特素有兴办工商业的奢望，他在圣吉尔根创办的玻璃厂却没有兴旺起来。在十八世纪上半叶，施蒂里亚开始建立纺织业；1720年，在格拉茨设立了一个较大的工厂，主要从事麻纱布的生产。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的织布业，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在德意志-斯拉夫世袭地的生产中都首屈一指，大部分产品可以出口，这里就不详述了。 284

在重商主义影响下得到发展的经济部门中，不言而喻，也包括采矿和冶炼业。在这一领域中，奥地利国家早在几百年以前就已插手，最先是在制盐业，这个传统的奥地利垄断业，然后是在制铁业。在这方面，专制主义的经济政策只要把那个老传统加以发扬光大就行。制盐局在十七世纪五十年代由皇室财务顾问克莱门斯·冯·拉多尔夫率领下的一个视察小组予以改组。人们关心盐场技术的更新，致力于组织盐业贸易，于是，外国的竞争被排除，自己的盐场生产就可以大大提高，虽然有时不诚实的机关的敲诈勒索和人员的过于庞大有影响盐业发展之虞。在铁矿石的开采和冶炼方面，十七世纪末，经过1678年和1679年因内贝格总工会的深刻的行政改革，以及着眼于重又变得有利的销售条件的生产调整以后，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在世纪递嬗之时，由于食品价格的提高，在以实物工资发给采矿人员方面自然是有困难的。生铁生产继续增长，在十八世纪中叶，人们在因内贝格地区重又达到1600年以前兴旺时期的年产量十万吨。福尔登贝格的开采和融冶过程发展得颇令人满意。后来，在1711年以后人们在拉德梅尔附近开发了一个新铁矿，在那里早就采过铜。重要的是，在世纪交

替时，在矿山里采用了爆破作业，大大提高了生产数字，施蒂里亚采掘区和克恩滕的许滕贝格的情况也是这样。

自从十六世纪以来，在海外矿山的竞争下，铜矿和贵重金属矿的开采有所增长，但，从长远看来，与海外是无法竞争的。1657年，富格尔① 家族放弃了黑色金属的开采；他们的蒂罗尔采矿公司负债累累。于是，财政机关接管了企业的经营。要取得巨利是不可能的了，但是，由于收支平衡，在十八世纪中叶还可以指望有少量的盈余。在阿尔卑斯山里，有时还找到一些有开采价值的矿藏；汉斯·亚当·施坦普费尔·冯·瓦尔申贝格，经过偶然的发现，于上克恩滕的弗拉甘特开采铜矿。奥地利国内最为重要的采矿企业285 应推克赖因的伊德利亚水银矿，在那里，在十七世纪中叶每年约采得二百吨这种渴望得到的液体金属。

专制主义经济政策自然也积极地干预手工业组织。在费迪南第三和利奥波德第一统治下，曾颁布过许多关于手工业和工艺的条例，其大部分均适用于各个邦，而在从前每个城市通常都有自己的条例。敦促制订“邦条例”的往往是邦议员，他们想对条例的规定施予决定性的影响；但是，他们的想法却没有能够完全办到。皇家手工业委员会在作出权威性决定以前，总是给同业公会代表以机会，以便把他们的要求详细地条陈出来。同业公会多半都热中于限制企业的数目，出师成品检验往往从难从多，对学徒收费提高和处罚则从严，在这些方面，它们都取得了广泛的成功。无法从事合法职业的分子只不过徒然增加了捣乱者的人数，他们是中产阶级手工业的没有资格的竞争者。据贝希尔统计，1679年在每十万个世袭地的手工业师傅和学徒中就有五万个“捣乱者”。因为，在常

① 富格尔(Johannes Fugger)，德国奥格斯堡企业家，因经商及采矿致富，1409年被封为伯爵。——译者

备军和宫廷费用日益增长的时代，军事手工业者、宫廷释免奴，以及享有皇家特权的——多半信奉新教的——“教会宣讲师”的人数大大增加，中产阶级手工业的处境就仍然是困难的。

对于“同业公会的独断专横”，重商主义者方面表示了严厉的抗议，同业公会对于局外人的竞争和学徒们的压力采取惊惶的、越来越紧张的禁止性措施，其实只是清楚地表明他们对于行将到来的经济结构的改变心怀恐惧。施罗德赞成取消那个“被诅咒的、被斥之为整个德国最可怕的瘟疫的同业公会”。官厅方面倒没有采取这种行动，不过，人们却不让同业公会接近新引进的制造业；在重商主义时代，“工厂”这个术语指的不是雇工众多的、工作方式机械化的大企业，而是指处于同业公会之外而享有特权的工业企业。这种特殊地位当然成为手工业发出经常抗议的原由。有些手工业，国家公开地表示关心，国家当局有意予以帮助。1656 年，人们把尼德兰和德国西部的军火工匠聘请到维也纳新城来，他们的“军械师傅”则为皇家军队供应武器。钾硝和火药制造者所从事的工艺对防务也是很重要的，他们依据国君赋予的特权收集硝石，甚至还修造所谓“硝石园”。 286

十七世纪后期，手工业帮工的社会地位变得非常恶劣。同业公会象后娘那样对待他们，官府对他们比对师傅要严厉得多；尤其是，当帮工们如同十八世纪初维也纳鞋匠曾多次表示过的那样，以聚众闹事和暴力反抗来表示他们对恶劣的生活条件和职业条件的不满时。1731 年雷根斯堡帝国议会的法令，以及次年卡尔第六对奥地利各邦颁发的手工业总条例，使同业公会受到国君的严格控制，但是，当涉及到帮工时，规定就变得非常严厉。

尽管在许多经济部门中，奥地利的生产首先是为当地消费而工作的，但是，正如以前的时期那样，传统商品的国内外贸易也是

不可忽视的：从事这种贸易的人往往是外国人或者少数民族和少数宗教的成员。由奥地利人组成的大商店主和杂货商同业公会与货栈管理员(Niederlagsverwaudten)联合会经常发生冲突，德国的新教徒多半参加这种联合会，他们绝不仅仅限于从事特许的外国商品贸易。在同土耳其人进行的多瑙河贸易中，塞尔维亚商人很活跃。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也从事东南欧贸易。在批发商和零售商中很多犹太人，他们同信奉基督教的商人之间进行着激烈的竞争，这场竞争于1671年导致维也纳犹太人被驱逐出境，在这个措施中，宗教信仰的观点自然起了很大的作用。改信基督教就可以不受驱逐令规定的影响，但是，几乎没有人利用这种可能性。

在十七世纪下半叶，国家从对外贸易中取得的收益还不是很大的，甚至在国有的、通常租给租佃者的企业所生产的货物的贸易中也是如此。国家垄断对出口贸易的意义就不完全一样；盐是在国内消费的，铁的贸易则由因内贝格和福尔登贝格的矿业公司自行经营，虽然处在国家监督下；1661年，阿尔布雷希特·辛岑多夫伯爵获得镰刀专卖权，即对上、下奥地利镰刀打造匠产品销售的垄断。自从利奥波德第一执政以来，直接受国家管辖的，最初是水银的贸易，然后是铜的贸易。两者一度获利甚厚。可是，内奥地利财政署顾问阿本迪奥·因扎基为自己的腰包而搜括得太甚，伊德利亚矿冶企业和水银贸易由财务署接管和产量的提高都应归因于他。1669年，他利用职权营私舞弊事被揭发，因而导致他的垮台，他是作为一个奸商，而不是一个官员去经营水银贸易的。在诺伊索尔[①]和施默尔尼茨，“下匈牙利”的铜也遇到很大的困难。国营的销售组织运转不灵，在世纪更替时，无论铜还是水银的贸易，人们终于

287

① 诺伊索尔(Neusohl)，即班斯卡-比斯特里察(Banska-Bystrica)，在斯洛伐克中部。——译者

完全仰赖于荷兰资本，荷兰资本预付了大笔的款项。1724 年，荷兰的水银借款，1733 年铜的借款才得以先后还清；从此，出口就进行得颇为顺利。在私营出口业方面，西里西亚麻布的输出最为重要，外国的封锁措施已经出现，它们也采取重商主义的保护政策。

为了避免外国的关税限制和促进本国的河运和海运，国家试图把出口业引入某种方向。所以，在和土耳其签订帕萨罗维茨和约时，还签订了一个贸易协定；在艾森堡条约和卡洛维茨条约签订以后，人们就已着手组织经由多瑙河水道的东方贸易。1667 年的第一个东方贸易公司出口了铁制品和布，进口了羊毛、皮革，尤其是活牲畜，以供应维也纳的肉市场。1699 年以后，巴尔干商人，还有荷兰人和英国人，先后参加东南欧贸易，可是，在土耳其贸易中；奥地利仍出现逆差。1719 年，第二个东方贸易公司恢复了从维也纳经过多瑙河同土耳其进行的贸易。当时奥地利所属的贝尔格莱德成了一个重要的水陆转运站。人们尽管做了种种努力，还是无法与巴尔干商人相抗衡。不过，多瑙河上游的交通变得更加通畅，已经建立了船舶的定期航行。

此外，地中海贸易的有计划增长与第二个东方贸易公司的活动相关。在利奥波德第一统治下，特别是在贝希尔的首创精神影响下，人们更加积极地努力参加亚德里亚海贸易，1719 年，卡尔第六宣布的里雅斯特和阜姆为自由港，奥地利在南欧的海洋贸易这才扩大了范围。第二个东方贸易公司也在这里进行活动，它从事对西班牙、葡萄牙的贸易，甚至还从事对北非柏伯尔国家① 的贸易，这些国家因从事海上抢掠而被人们惧怕。托斯卡纳的里窝那和意大利南部的港口曾被利用为据点。为奥地利建立一支可用的

① 柏伯尔国家(Barbareskenstaaten)，指信奉伊斯兰教的柏伯尔族人民居住的北非国家：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等。——译者

舰队的第一个尝试也属于这个时期，但后来终于失败了。由于奥288地利的出口经过汉堡、什切青和但泽遇到运输上的困难，并且还受到关税的阻碍，因此，人们想改而取道的里雅斯特。这件事进行得并不很顺利，威尼斯人一如既往地试图阻挠奥地利的亚得里亚海贸易。但，马可共和国① 再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封锁奥地利的海路。东方贸易公司，正如在别的地方所实行的那样，也在试图开设工厂，后来却因为与一家破产的彩票公司有联系，被该公司的倒闭所牵连而成为它的牺牲品。

奥地利的最初几个殖民地企业也属于卡尔第六时代；为振兴奥斯坦德贸易公司所作的努力获得了应有的好评，随后，在前印度的东海岸、在马德拉斯以南科罗曼德尔海岸（萨达特帕特南，1719年），以及恒河口（班基市场）都建立了一些洋行；在中国的广州也有一个分号。在印度的据点比奥斯坦德公司的寿命还长几年，一直坚持到十八世纪中叶。

在卡尔的政府统治下，人们还决定了一个大规模筑路的计划，而在十七世纪，对这个君主国的交通联系却没有做出什么。新的大路为腹地打开了亚得里亚海的港口，经由塞默林和洛伊布尔山口的驮兽路扩建成宽阔的马路，此外，还修建了一条穿越维也纳森林的大路。哈拉伯爵弗兰茨·安东大主教，根据卡尔第六的旨意，在萨尔茨堡修建道路。扩大从维也纳到苏台德区的联系一事进行得不大令人满意。河流的通航也略有成效；在利奥波德第一和卡尔第六统治下，多瑙-奥得运河方案第一次出现，但未见诸实行。后来的一个重要措施乃是邮政的国有化，首先在德意志和波希米

① 马可共和国(Markusrepublik)，即威尼斯。马可是耶稣的著名门徒之一，威尼斯城的守护神。市内的大天主堂中陈列有马可的遗骨，该市市徽上有一只象征马可的狮子。——译者

亚的世袭地(1722 年)实行；因此，信件的来往就改善，加速和便宜了。

如果要使哈布斯堡各邦的内部交通和过境贸易兴旺起来，就要对大量私人的和邦议会设立的道桥税采取行动，这种税使货物大大变贵。有些国内税卡被撤销，但是，建立统一的经济区的主要工作仍有待于后代。

国家为了建设大型军事企业和经济企业需要巨额款项；采取陈旧而又拙劣的典质法已嫌不足，所以就依靠投机商人，他们能够在必要时迅速筹措所需的现款，现款借给国库自然要很高的利息，而国库履行自己的义务又很差。御用银行家萨穆埃尔·奥本海默 289 就是这种借款者中的一个，他的银行自从七十年代末期直到破产(1703 年)时为止，曾借给宫廷巨额贷款，但是经过一些难以看透的和令人忧虑的交易以后终于倒闭。奥本海默的后继者扎姆宗·韦特海姆工作得无懈可击，但，另想补救的办法还是必要的。以现代方式设立起来的吉罗银行(1703 年)，由于个人方面的缺点而失败了；1705 年，维也纳市立银行开始活动，它依靠维也纳市的资金和信贷，办得很好，而国有的"万国银行"(成立于 1715 年)不久却不得不进行清算。因此，中央政府专管财政的部门没有很好地完成自己的任务，因为它似乎缺乏精干和无私的官员。局长格奥尔格·路德维希·辛岑多夫伯爵，因经营不善而于 1680 年被撤换，此后宫廷财务局就建立了新的规章制度，但是，一个肯干和能干的官员贡达卡尔·施塔海姆贝格伯爵接管宫廷财务局(1703 年)之时，真正的转机这才出现。在卡尔第六执政的最后几年里，国家财政又走下坡路；它无法应付旷日持久和糜费巨款的战争，而宫廷的财政开支又需要巨额款项。

教育、科学和巴罗克时代艺术

在反宗教改革获胜和新教学校崩溃以后，奥地利的教育制度就具有明显的天主教性质。在各种学校的章程里，从初级学校——它的教员往往也充当教堂仆役——一直到大学，都特别关心师生是否保持正确的天主教信仰。耶稣会教士在天主教学校一直占主要地位，他们按照教会传统和自己所受的教育，几乎把全神贯注于兴办高等拉丁文学校，而忽视了基础教育，使低级学校略微蒙受损失；直到虔教派修士① 展开活动时，才有彻底的改变。另一方面，在初级学校里放弃人文主义奢望所追求的拉丁文教学是会产生广泛影响的。在巴罗克时代，许多奥地利教师对儿童教育的任务并不缺乏实际的教育学认识，可是却没有一个有水平的开路先锋，如那个在宗教信仰斗争中复灭的波希米亚兄弟会所产生的约翰·阿莫斯·夸美纽斯（1592 年至 1670 年），他的主要著作“Orbis 290 pictus”(«被描绘的世界»)和«教学理论大全»对于未来具有指导意义。诚然，欧洲各国离开夸美纽斯所主张的普遍义务教育的实现还很遥远。

在奥地利，代表中等教育的是许多耶稣会和本笃会开办的教会学校，古老的市立学校，如果没有停办的话，也多半远远落后于它们。这种教会学校有一种颇为明显的社会性；他们不收学费，因此，各种不同环境出身的天才儿童就有可能入学。

在奥地利的巴罗克时代，大学的科学水平很不平衡。耶稣会教士统治着格拉茨和维也纳，他们的兴趣集中于神学和亚里斯多

① 虔教派(Piaristen)，这个教派成立于 1607 年，在波兰和奥地利从事免费的教学活动，Piaristen 得名于拉丁文原名 Ordo Clericorum Regularium Pauperum Matris Dei Scholarum Piarum 中的最后一字。——译者

德-繁琐哲学；在这些领域，他们也可以做出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来。“世俗的”法学院和医学院，在格拉茨根本没有，在维也纳则很衰落；杰出的医生保罗·佐尔拜特，在鼠疫流行期间和土耳其围城时表现得很出色，有口皆碑，尽管作了百般的努力，仍然没有为他那个专业带来转机。大学的图书馆完全不能利用。在卡尔第六统治时，人们对这些状况已经感到痛心；人们只能期望国家影响增强，从而使情况得到改善，这当然是符合当时人们的思想的。1677年，在因斯布鲁克也成立了一所大学，该城因蒂罗尔宫廷放弃经营(1665年)曾遭受损失，人们想给该城以补偿，但是，后来为德国西南部创办了一所天主教大学，它遭受敌人侵犯的危险较小，如弗赖堡因布赖斯高，该城不久就沦丧给法国达数年之久。蒂罗尔邦早就恢复了它的纯天主教特性，这又是值得推荐的一个理由。因斯布鲁克一共有四个学院，它的名声从一开始就来自神学。布雷斯劳大学(1702年)是巴罗克时代的另一个建树，它是从该城的一所耶稣会中学办起来的，暂时只有神学和哲学系。

萨尔茨堡的本笃会大学与哈布斯堡各世袭邦里的大学情况略有不同，那里正在精心地研究法学，它拥有柯勒斯廷·斯丰德拉蒂这样一个具有欧洲水平的法学家。尤以诗人著称的西蒙·雷滕巴赫讲授哲学和历史课。巴罗克时代的大学，在历史写作方面，具有根本性意义。因为，当时已经把历史当作为专门课程看待，前奥地利的弗赖堡因布赖斯高大学在这方面早已走在前面。自从十八世纪初叶以来，人们已经开始撰写供教学和研究用的历史教科书。 291

在这方面，人们仍不过才刚刚开始。在巴罗克极盛时期，历史写作主要仍然围绕着皇家宫廷、外省的邦议会和修道院进行。

在宫廷里——或者为宫廷——写历史的，往往习惯于写王朝史，有的写成族谱世系史，有的写成带辩白性质的传记史，在这些

装饰着铜版画的豪华著作里，对国家大事给予了应有的评价。虽然这种史书具有半官方性质，它的作者处于从属地位，还是有些不朽之作写了出来。莱巴赫大教堂司铎约翰·路德维希·舍恩勒本的«Dissertatio polemica de prima origine augustissimae domus Habsburgico-Austriacae»（«关于哈布斯堡-奥地利王家起源的论争»）(1680年)，是巴罗克时代哈布斯堡家族的神秘主义思想的真正宝库，人们可以毫不踌躇地把它列为第一流的老式族谱方面的"光辉著作"。诗人西吉斯蒙德·冯·比尔肯于1668年增订发表了仍未付过印的富格尔奥地利家族光荣史册（Fuggerscher Ehrenspiegel des Hauses Ösrerreich)；这部著作的笔者是长期默默无闻的奥格斯堡城书记官克莱门斯·耶格尔，比尔肯的修改当然可以说是有损于原著的历史价值的。约翰·克里斯托夫·贝尔的两卷本著作«奥地利大公爵殿下的生平、政绩与事迹……»(发表时未署名)，写作时未加褒贬，实际上仅仅把许多摄政者的传记罗列起来而已，不过，由于它材料丰富，时至今日仍有一定价值。就篇幅和科学性而论，汉堡出身的、维也纳宫廷图书馆馆长佩特鲁斯·拉姆贝克的八卷本«Commentarii Aug. Bibliothecae Caesareae Vindobonensis»(文多波纳皇家图书馆述评)，超过了前述一切著作，作者在该书中对历史和委托他珍藏的全部材料都作了翔实的说明；对于宫廷图书馆，当时的确做了很多的工作。利奥波德第一执政时间很长，这就使宫廷史作家有机会去研究这位统治者的形象。加莱阿佐·瓜尔多-普雷奥拉托伯爵，以优美的意大利文撰写了«Historia di Leopoldo Cesare»(利奥波德皇帝史1670—1674)，共三卷，作者的同胞约翰·巴普蒂斯特·科马齐搞了一个选本，读的人很多。有学问的施瓦本耶稣会修士弗兰茨·瓦格纳，利用档案材料，以拉丁文撰写了两卷«Historia Leopoldi magni Caesaris»

(利奥波德大帝传 1719,1731),把利奥波德时代写得很深很透。最可能作客观描写的毋宁说应当是莱比锡人戈特利布·奥伊卡里乌斯·林克,他曾在维也纳工作过几年,但并未依附于朝廷,他不仅对统治者本人,还对他所属的各邦和人民作了评价。瓦格纳和林克还试写过约瑟夫第一的传记。克恩滕耶稣会修士马可·汉西茨 292 的主要成绩在于教会史的撰述,他曾为卡尔第二编写过两个纪念文集;许多历史家,除奥地利人以外,还有意大利人、尼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都写过欧根亲王,他的战果辉煌的战役确实提供了充分的材料;所以,这个萨伏伊人的七卷本《英雄事迹》得以出版。利奥波德第一宫廷中的王子教师、维也纳新城人汉斯·雅各布·瓦格纳·冯·瓦根费尔斯,编写过一本通史和《德国、德国人及其帝国的赫赫声誉》。他维护了德国的语言和人民的风习,使之免受过分强大的法国政治和文化的影响。我们在这里发现有些见解在约瑟夫第一治理下还颇有市场。瓦格纳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人,他还不是一个眼光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而是一个胸怀宽阔的思想家,只有在东西方夹击下的帝国处境窘迫才使他使用尖刻的词句写作。

族谱学和邦史一如既往地为撰写等级历史提供了素材。撰史者多半是贵族,在这个时代里通常都皈依天主教。武姆布兰德男爵约翰·威廉(1705 年)和霍亨内克男爵格奥尔格·亚当(1734—1737)的著作主要写上、下奥地利贵族的家族史。马蒂亚斯·富尔曼写了一本通俗的爱国历史著作《新旧奥地利》(1734—1737),他还出了一本维也纳市史《新旧维也纳》(1738/39)。但是,等级制邦史中的真正光辉成就应推约翰·魏克哈德·冯·瓦尔瓦索尔的插图丰富的四卷本《克赖因公国的光荣》,在该书中,这位德意志奥地利贵族瓦尔瓦索尔为他的故乡克赖因、它的喀斯特景观和斯洛文尼亚农民树立了一个美丽的纪念碑,他谈到那里的农民时是带

着真诚的同情心；关于克恩滕的两本地形学著作也是他撰写的。这类著作可以指望受过教育的阶层中感兴趣的读者群的欢迎。因马特乌斯·梅里安的铜版画而出名的«奥地利风土志» (Topographia Austriae,1642—1673,原文为拉丁文,德文版于 1677 年发表)也是如此，上施蒂里亚流亡者马丁·蔡勒于十七世纪中叶在他的避难地乌尔姆已经为这本书做了必要的准备工作。蒂罗尔人格奥尔格·马特乌斯·菲舍尔,受邦议会的委托,编写了下奥地利、上奥地利和施蒂里亚的风土志，这些风土志由于内容丰富、图文并茂，今天仍然很有价值。同以前的时代相似，贵族阶层对历史地形学的兴趣不仅在于他们的本乡本土，而且还在于偏远的难以到达的地区，那种地方只有替皇家服务的外交官才能熟悉。俄国蒸蒸日上的力量吸引了沿着赫贝尔施泰因的足迹漫游的奥古斯廷·迈尔贝格男爵。他在«Iter in Moscoviam»(«莫斯科纪行»，无年份，第二版，法文版 1688 年) 中对俄国的风土人情作了有趣的报道。约翰·彼得·科布报道了 1698 年出使彼得大帝宫廷时的情况。这本书语言锋利、直爽，由于外交上的原因而被没收。

293

巴罗克时代奥地利教会撰写的历史著作，有些堪与法国圣莫尔本笃会修士或荷兰耶稣会修士的成绩相媲美，那些成绩曾因其对史料的考证彻底和井井有条而著名于世。以前有一部著作«Annales Astro-Claravallenses»(奥地利克拉拉瓦伦编年史)，出自祖籍西里西亚的西迪斯显教团修道院院长伯恩哈德·林克的手笔，写的是他所属的那个茨维特尔教堂，完成(1646 年)多年以后才得以付印(1723—1727)，该书显示了以广泛的史材为基础而写成的研究著作的优越性。最出色的成就还是梅尔克地方的巴罗克时代寺院史的撰述。除了安泽尔姆·施拉姆的«Chronicon Mellicense»(美拉编年史，1702 年) 和菲利伯特·许贝尔的«Austria ex ar-

chivis Mellicensibus illustrata»(取材于美拉档案馆的绘图奥地利史，1722年)以外，首先应提到贝恩哈德和希罗尼穆斯·佩茨兄弟所毕生从事的不朽之作。伯恩哈德对语言学更有兴趣，他编写了六卷本的«Thesaurus anecdotorum»(逸事集)，对寺院图书馆所藏的科学手稿作了详尽的评注，而希罗尼穆斯则出版了一本叙述奥地利历史的史料集«Scriptores rerum Austriacarum»(奥地利史编纂家)，共三卷，第四卷未付印，这个集子时至今日仍然是不可缺少的。如同在西欧一样，在奥地利，以自己的宝藏自豪的本笃会修士和多疑的耶稣会修士之间，就史料学曾发生过一场争论。发言人是贝恩哈德·佩茨和克恩滕耶稣会修士马可·汉西茨，后者极力效法法国和意大利的范本，心存撰写一本"Germania sacra"即德国教会史的计划。关于这本历史，如同汉西茨所打算写的克恩滕史一样，当然只能够发表一些初步的研究论文而已。奥地利历史的有价值论著还应当归功于圣珀尔滕大教堂僧侣赖蒙德·杜埃利乌斯，首先是"Miscellanea"(杂记)和"Excerpta"(文选)，各两卷，内有原始文件和世系族谱材料，此外，还有关于德国骑士团的历史、齐利城古物、以及美男子弗里德里希国王的论著。祖籍莱茵兰的修院院长戈特弗里德·贝塞尔·冯·戈特魏格，是一个杰出的人物，他那个修院的华美多采的巴罗克式新建筑就是他发起兴建的，他也是一个从事多方面活动而又对政治感兴趣的高僧。他的"Chronicon Gottwicense"(戈特维编年史，1732年)，并非如书名所示，单纯是戈特魏格教会史，而是一本规模宏大的关于文件和书籍文献以及历史地理学的辅助性科学著作，这部著作在史学史中占有荣誉地位。我们还要提到两个人，他们已经属于玛丽亚·特蕾西亚时代。克里索斯托穆斯·汉塔勒·冯·利林费尔德神父，一个因菲特尔人，他作为出类拔萃的钱币学家、文件研究家和 294

教会史家的声誉，由于在他所编著的“Fasti Campililienses”（堪比拉年代记，1747至1754年）塞进了伪造的东西而受到损害，他错误地以为这样就可以为他那个寺院争添光彩，此外，这样做大概还由于学究式的虚荣心所致。“编年史”，应源出于巴奔堡时代的作者，而他所撰述的“编年史”，以及他在文件原文中添加的东西，给撰写奥地利中世纪初期的历史造成很大的混乱。一个前奥地利人，来自弗赖堡因布赖斯高的马夸德·赫尔戈特，僧侣、后在黑森林任圣布拉辛修院院长，曾当过皇家史官和外交官，撰写过王朝史著作，后者以科学性和装璜富丽著称。尤其是他的“Monumenta Angustae Domus Austriacae”（«奥地利家族大事记»，一个有关巴奔堡和哈布斯堡历史的形象性和叙事性史料集，可以视为奥地利巴罗克时代的终结和最高成就，尽管它的态度保守，但由于它的史料考证尖锐犀利，对事实的兴趣令人有颇为接近现代之感，对史学方法和史料领域作了决定性的贡献。

除史学上的成就以外，巴罗克时代奥地利教会人士对各国风土人情的研究也值得一提；哈布斯堡君主国的传教士，大部分属于耶稣会，对于非欧洲国家的科学启蒙所起的作用很值得人们注意。在中国，以德文写作的特兰托人马丁·马蒂尼（Martin Martini）从1643年起就已开展工作；除马蒂尼以外，林茨人约翰·格吕贝尔神父（Johann Grueber）在中国从事数学、天文和地理学方面的工作。格吕贝尔还完成了一次从北京到西藏的惊险旅行，从西藏首府拉萨又成功地越过喜马拉雅山山口，抵达印度境内的耶稣会居留地。十八世纪初，另一个林茨的耶稣会修士克萨韦尔·弗里德尔（Xaver Friedel）神父参加了他那个教会对中国的大规模实地测量，他干得很出色。在东南亚各群岛和南美洲，来自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区的传教士和苏台德区的德意志人做了一些成功的考察旅

行,其中有精力充沛的特劳特瑙人萨穆埃尔·弗里茨,他游历了亚马孙河,为该河流域绘制了地图,但是,在对印第安人传教和启迪方面,以及在研究他们的语言方面,他也获得了辉煌的成绩。

295 如果不考虑奥地利传教士在研究地球方面的作用,那么,巴罗克时代的奥地利在科学和数学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开路先锋可言。土地测量有过良好的传统和受人重视的地位,在这项工作中,有三个入籍的奥地利人建立过殊功,即萨克森人丹尼尔·祖廷格尔、北意大利人安圭索拉伯爵勒安德尔和雅各布·马里奥尼。老家在布尔诺的格奥尔格·卡梅尔曾一度在远东从事传教工作,曾著有关于菲律宾植物的奠基性著作。奥地利本来可以争取到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这样杰出的大研究家。在成立“勃兰登堡科学会”(1700 年)方面,莱布尼茨曾起过重要作用,但是,这个学会的后来发展使他深感失望。他经过多年的准备,于 1714 年把一份筹建维也纳科学院的草案呈给皇帝;连欧根亲王对成立科学院的计划也很感兴趣,1715 年时这个计划的实现似乎已有保证。莱布尼茨于 1716 年去世时,经费上的困难仍待克服。对此表示关注的还有几个有影响的人士,尤其是皇家史官和钱币学家阿波斯托罗·策诺,可是这时却缺乏真正的推动力,事情也就再也没有进展。

巴罗克时代德意志文艺创作的最佳成就产生于当时属于奥地利管辖的土地上,当然不是在东阿尔卑斯各邦,而是在哈布斯堡幅员中堪称宽容之地的西里西亚,在那里,西里西亚的第一个和第二个诗派创造了条件,使十八世纪下半叶德意志文化的繁荣昌盛的伟大宣告者得以产生。古奥地利领域里的德意志文学在本时期里稍稍落后于西里西亚人的作品,但,仍然有不少独到、有力的作品。信奉新教的贵族,也就是下奥地利的那些贵族,按照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条款,要求予以宽容,他们的地盘日渐丧失,然而,一直到最

后，他们在精神创作上仍然很有建树。人们有理由把沃尔夫·赫尔姆哈德·冯·霍贝格称为贵族生活方式的真正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主要著作《好奇的乔治，或贵族的乡居生活和务农生涯》，为我们描述了奥地利地主和农业情况，写得栩栩如生，富有教益。此外，他还以同样题材写了诗体的"Georgica"，他创作了历史叙事诗《哈布斯堡的奥托佩特》和《不愉快的普罗塞皮娜》，在诗中，"奥托佩特"证明自己是一个忠于王朝的爱国者，这个新教徒在雷根斯堡流亡期间结束了自己的生命（1688年）。下奥地利贵族卡塔琳娜·冯·格赖芬贝格的创作才能，无疑是高于霍贝格的，霍贝格的实际作用不能通过他的主要文学价值来衡量。她的《精神十四行诗、歌谣及诗》首先表达了这位女作家的虔诚的福音信仰；《忏悔的胜利柱》产生于1663—1664年土耳其战争期间，反映了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一度同仇敌忾去反击"基督教不共戴天的仇敌"。作为多产的意大利、法国和拉丁文作品（其中包括韦鲁拉姆的培根的《忠言》）的译者，约翰·威廉·冯·施图本贝格向德意志民族介绍了世界文学的重要作品。米尔菲特尔区萨尔莱因斯巴赫的亚当·冯·勒本瓦尔特是一个天主教徒、诗人和医生，曾被利奥波德第一皇帝封为"桂冠诗人"，他的讽刺短诗明显地表明，他有西里西亚人的影响。他曾针对庸医害人和迷信鬼神，试写过通俗易懂的《城乡及家庭药典》。克雷姆斯明斯特本笃会修士西蒙·雷滕巴赫的老家在萨尔茨堡附近的艾根，本人受过高等教育，多半以拉丁文从事创作，他的作品透露出非凡的形式天才和雄健的创造力。贺拉斯（Horaz）的颂诗是他的学习范本。时代的艰辛、土耳其人和法国人的两面夹攻促使他写下了最有名的诗篇"Germania invicta, si conjuncta"（日耳曼虽被合并，但未被征服）。作为译者，这个不知疲倦的人也做出了极有意义的成绩。奥西阿赫修院院长菲吉

尔·格莱森贝格尔写过一本关于波兰国王博列斯拉夫第二的拉丁文史诗，金信国王的坟就藏在他那个修道院里。奥古斯丁会僧亚伯拉罕·阿·圣克拉拉，本来是从黑高迁到维也纳来的施瓦本人，俗名为约翰·乌尔里希·梅格勒。这个利奥波德第一皇帝的内廷讲经师颇善于词令，他为巴罗克时代的奥地利天主教真正在宣传上立下了丰功伟绩。亚伯拉罕神父的说教，由于用字遣词颇为贴切、诙谐，吸引听众蜂拥而至，他的文章同样也赢得了广大的读者群。作为社会批评和经济方式的史料来源，这些文章对于我们也是很有意义的。无论侧身仕途和经商，亚伯拉罕都进行得颇不顺利；在讽刺作品《犹大这个大骗子》里，他痛斥了商业中的敲诈勒索，另外，他所代表的前重商主义经济思想不仅十分保守，而且已经过时。在《维也纳，请牢记！》里，他以鼠疫为缘由，攻击了肤浅、轻浮的生活作风。面临土耳其人侵之灾，曾在格拉茨居留过几年的亚伯拉罕神父，为了鼓舞抗敌意志，写出了激动人心的通俗短文《基督徒们起来，起来啊！》。亚伯拉罕·阿·圣克拉拉的宗教论战文章，尽管时而有激愤的迸发，但是已经显示出明显的衰退，不过，可以说，他的著作在精神方面已经向十八世纪过渡，它们就是在这个世纪的门槛上被撰写出来的。 297

奥地利巴罗克时代的人们对于戏剧特别感兴趣。在巴罗克戏剧里，各种艺术都在通力合作；音乐和舞蹈与台词同样重要，人们尤其大量地使用舞台器械和布景，后者有时竟成为主要的东西。演戏对于反宗教改革的信仰宣传具有巨大的意义，后来在铺张扬厉地表现它的胜利时，也是如此。在维也纳、格拉茨和因斯布鲁克的耶稣会剧院如此，在萨尔茨堡或克雷姆斯明斯特本笃会的舞台也是如此，其次，还有虔教派的演出，先是在较小的城镇，如下奥地利的霍恩。在十七世纪下半叶，在教会的舞台上演出了真正豪华

的戏，如在维也纳耶稣会剧院上演的尼古劳斯·阿凡西努斯的名剧«Pietas victrix»(«胜利的感情»)。维也纳宫廷也很喜欢这种戏；由于大量使用戏剧技巧，1667年在维也纳城堡庭院中演出的«空气与水的争辩»成了十分感人的话剧。构成这个剧种的顶点的，大概是豪华歌剧«Il p'omo d'oro»(«金苹果»)，作者弗兰切斯科·斯巴拉，作曲者马尔科·安东尼奥·切斯蒂；这个歌剧是特意为新婚的女皇玛加丽塔·特蕾西亚根据古老的巴黎斯品评美人的故事改编而成的。本章所述的时代与阿尔卑斯以北的意大利歌剧的极盛时期完全一致，这个时期一直持续到卡尔第五去世时为止。这个非常讲究文艺欣赏的君主有阿波斯托洛·策诺作为他的高级宫廷诗人，在他去世(1729年)后，开始了罗马人彼特罗·特拉帕西的时代，他以艺名梅塔斯塔西奥著称，这个歌剧的台词的作者极为多产，他的形象在玛丽亚·特蕾西亚时代里仍占主导地位。

除了那个具有强烈浪漫主义色彩的宫廷和教会舞台艺术以外，还有一种粗犷的民间戏剧，在那里，欢乐的艺术之神统治着一切。西里西亚人约翰·巴普蒂斯特·阿道夫和施蒂里亚人约瑟夫·安东·施特拉尼茨基是维也纳民间戏剧的前驱，机智的仆人汉斯·武斯特成为施特拉尼茨基的即兴剧院中的主要人物，非常受人民欢迎。

三个会作曲的皇帝，菲迪南第三、利奥波德和约瑟夫都有高超的音乐天赋，在巴罗克时代，对于宫廷圈子里音乐活动的开展极为有利，他们十分爱护宫廷乐队，他们当中尤以利奥波德喜欢意大利歌剧。卡尔第六也同样爱好音乐，在他的宫廷里，东施蒂里亚人约翰·约瑟夫·富克斯(1660—1741)曾经工作过，他作过很多曲子，如弥撒曲、歌剧和圣乐，写过一本评价很高的教科书«Gradus ad Parnassum»(«做诗初步»)。他的以及其他在维也纳从事音乐活动的

大师们的工作，为十八世纪下半叶以来奥地利音乐经典作家的作品奠定了基础。在巴罗克音乐中，我们也观察到，除了宫廷和教会的中心以外，民间艺术活动也开展得很蓬勃，这多半与前者的活动密切相关；那时的歌曲集为我们保存了不少旋律，以及个别创作者的名字。家喻户晓的人物——维也纳街头歌手和风笛吹奏者奥古斯廷及其在1679年鼠疫猖獗期间的惊险故事当然完全与历史不符。在1800年前后，《可爱的奥古斯廷之歌》才参照这个传奇人物被创作出来，于是这个人物不久就被认为是地道的维也纳典型。 298

我们曾选定1648年为宫廷专制时期与前一时期的分界线，这一年在奥地利艺术史上并非真正划时代之年。这个重大的年份应随着巴罗克的胜利，而定在较早的时候，即大约1620年前后：人们顶多只能说，三十年战争的结束为艺术活动的更趋活跃提供了条件。在这方面，1648年的意义自然不如1683这个土耳其年，在这一年以后，艺术创作以强大无比的端倪宣告开始。

在巴罗克时代，造型艺术通常还是由那三个独特的和传统的领导阶层，即宫廷、贵族和教会，来资助和推进，可是，市民阶级已经开始更大规模地修建，往往还吸收大建筑师来参加。这一时期的三个君主利奥波德、约瑟夫和卡尔第六都喜爱艺术。我们曾指出过他们对音乐的偏爱和天赋；利奥波德还对建筑和表演艺术有强烈的爱好。他的儿子约瑟夫和卡尔在性格上迥然不同，他们的兴趣在提倡艺术方面就分道扬镳了。约瑟夫的天资较之其父，有过之而无不及。作为建设规划者，由于他执政时间的短促，又由于战争的困难，他没有能够如心所愿地那么出人头地，对于皇家艺术珍品的搜集，他也没有做出什么重要的成绩，不过，他曾捐赠过不少有价值的珍品。卡尔第六对这些搜集品反而极为爱护，他对古钱

币有着特殊的爱好。对于这三位统治者来说，由于政治上的原因终于产生了一种必要性，即，在艺术费用开支的增加上不能过分落后于他们的大敌路易十四和他的凡尔赛宫。除这些君主以外，我们还要赞扬一位哈布斯堡老人，利奥波德·威廉大公爵，他在任西属尼德兰总督时曾收集到大量油画和挂锦，在他于1656年移居维也纳时这些也带了来。他的财产成了艺术史博物馆油画厅的基础。

299 人们致力于对造型艺术家进行有计划的培训，并尽可能进行院校培训。1692年，原籍南蒂罗尔的宫廷优秀画师彼得·保罗·施特鲁德尔先是开办了一间私立艺术学校，他想在宫廷资助之下，把该校办成"绘画、雕刻、堡垒修建、透视及建筑艺术专科学校"。施特鲁德尔死于1714年，在他死后，他的设想和那个专科学校也就幻灭了；然而，1725年，卡尔第六下令由宫廷画师雅各布·冯·舒彭创建"造型艺术专科学校"，这个新学校不久就有不少人入学，声誉斐然。

我们再来看看贵族阶级。欧根亲王搜集到的艺术品，不幸大部分被他那个无知的侄女维克托利亚挥霍掉。在提倡艺术的贵族当中，除了欧根亲王以外，首先应提到列支敦士登的卡尔·奥伊泽比乌斯，他是列支敦士登画廊的创办者，也是一个伟大的建筑者，在十七世纪七十年代曾写过一本详尽的论述建筑学的书。在这本书里，可以明显地看出，贵族艺术爱好者想身后留名是写书的主要原因。同专制统治者和贵族一样，反宗教改革的教会及其显贵也需要显示阔气和排场；上一代人仍然忠于宗教改革家的思想，可是他们的子孙后代自从十七世纪中叶以来，从感情上显然已倾向于巴罗克时代的天主教，这在别处是曾经得到好评的。这种倾向对于宗教艺术的巨大高涨同样作出了贡献。赞颂对"异教徒"所取得

的成就，以及1683年以后对“不敬畏上帝的”土耳其人所取得的胜利，为雕塑和绘画提供了重大的激励和造型的可能性。巴罗克艺术，就其题材、寓意和指导思想而论，显示出与当时精神的和宗教的潮流，与政治的和军事的斗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十七世纪中叶，奥地利建筑艺术也一如既往地仍然是意大利人的活动领域。多美尼科·夏西亚在圣兰布雷希特和玛丽亚策尔从事营建。1677年，焦瓦尼·卡尔隆在加尔斯滕建造教堂，福劳大教堂的巴罗克化也是仿照卡尔隆的风格修造的。1667年，艾森施泰特的埃斯特哈齐城堡由卡尔洛·马尔蒂诺·卡尔隆赋以巴罗克式的外部装饰。在1683年以前的维也纳宗教建筑中，应当提到“新天使圣坛所”教堂的装璜，该教堂宏伟壮观的正面由卡尔洛·安东尼奥·卡尔隆修造（1662年），而在世俗建筑中，则应提到施塔海姆贝格宫（1650年以后建成，现为教育部所在地）；1667年以来，卡尔洛·卡内瓦莱就从事修建德意志骑士团的会所。在房屋拥挤的城市里，只有牺牲较老的东西，才能建设新的东西，没有现成的空地可用，而土耳其人的进攻已经在城外威胁着人们。1683 300 年以后，情况就不同了。在城里，人们填满了火灾后留下来的废圩，在郊区，高级贵族们则营造带有花园的夏季别墅。在城里和罗绍的两个列支敦士登式宫殿建筑就是这样产生的，它们是多美尼科·马蒂内利的作品，参加合作的还有许多其他意大利和德国的建筑师、雕刻家、石膏胶泥细工匠。焦瓦尼·彼特罗·滕卡拉修造了市立迪特里希施泰因宫（后改名洛布科维茨宫），宫的正面壮丽威严。与此同时，卡斯帕尔·楚加利在萨尔茨堡建成了诺恩塔尔的埃哈特教堂和卡耶塔纳教堂。重要的意大利建筑师的人数绝不是仅限于上述，不过，这时第一代重要的奥地利人已经纷纷出现，他们中的先驱者是约翰·贝恩哈德·菲舍尔·冯·埃尔拉赫，

贝尔尼尼的学生。菲舍尔（1656—1723年）生于格拉茨，他把罗马的和法国的建筑思想同自己特有的思想结合起来，在与皇廷里的意大利人的争辩中贯彻了自己的想法。1688年，他为阿尔坦伯爵在南摩拉维亚的塔雅河畔建成了弗赖茵宫堡；次年，他当了王储约瑟夫的建筑学教师，1692年，他为座落在丽泉宫（Schönbrunn）的皇家游乐园设计了一个其宏大规模超过了凡尔赛宫的草图，主要建筑安排在高地上，自从1775年以来，该地耸立着得胜门（die Gloriette）。① 由于有着预期要支付巨额费用的顾虑，1796/97年乃开始按照菲舍尔的简化了的方案动工；他的儿子约瑟夫·埃马努埃尔继续搞下去，这个工程几经重大修改，直到玛丽亚·特蕾西亚时代初年，才由尼古劳斯·帕卡西竣工。约瑟夫·埃马努埃尔还完成了他父亲的宫廷图书馆的设计；这个儿子还采用了晚期古典风格，修建了宫堡中的帝国枢密院建筑。修建维也纳市立欧根亲王宫（财政部）和施特拉特曼伯爵宫（匈牙利公使馆）的工程时，约翰·贝恩哈德·菲舍尔也参加了；他在维也纳创作的顶点和终结是卡尔教堂的修建（1716年），这项工程是1713年鼠疫平静以后，皇帝卡尔第六为了还愿而着手进行的。在萨尔茨堡，图恩伯爵约翰·恩斯特大主教（1687—1709年）与意大利艺术家的传统已经决裂，在那里，这位大建筑师在世纪更迭前后，除了修造一些宗教建筑以外，还为大学建立了大学教堂。时至今日，菲舍尔的建筑还被奉为奥地利巴罗克文化的充分体现和最高成就；他的名字也许是奥地利艺术史上最杰出的名字，无论如何在他那个时代是居于首位的。

老菲舍尔的最大对手是卢卡斯·冯·希尔德布兰特（1668—1745）。他生在热那亚，是一个德国军官和意大利母亲的儿子，也是在意大利和法国艺术的影响下成长的。自从十七世纪末以来，

301

① 此门建筑在丽泉宫的一个小山顶上，1765年为纪念科林大捷而修造。——译者

他在维也纳当建筑师，颇受欧根亲王和帝国副首相弗里德里希·卡尔·冯·申博恩的器重。该市许多宫殿式建筑都应归功于他，如那个为弗兰茨·曼斯菲尔德伯爵修造、不久由施瓦岑贝格家族买去，并以家族之名为名的宫殿，后来，菲舍尔父子参加它的内部装璜和花园布置，此外，还有欧根亲王的花园宫、上、下贝尔维德雷宫(1714—1722)，他在花园建筑师多米尼克·吉拉尔的帮助下，以这项工程做出了奥地利宫堡建筑中最重要的成绩。维也纳彼得教堂、戈特魏格修道院、萨尔茨堡米拉贝尔宫堡的壮观的楼梯间，这些巴罗克式的新建筑，乃是希尔德布兰特漫长的、成绩卓著的艺术家生涯中又一些代表作。

蒂罗尔人雅各布·普兰德陶厄(1660—1727年)应评定为第三位伟大的奥地利巴罗克建筑大师。他转移到圣珀尔滕，在奥地利多瑙河地区工作，在那里建成了梅尔克的教会和修道院建筑，那是真正的杰作。营建主、修院院长贝特霍尔德·迪特迈厄尔懂得艺术，经济上管理得卓有成效，并保证了必要的资金。这位有魄力的高僧不管修士会议的猛烈反对，使工程的动工和完成得以顺利进行。普兰德陶厄的计划虽然庞大，但他比其他建筑师都更节俭，更善于精打细算，这有利于他所承担的工程，其中应提到赫尔措根堡修院，宗塔格斯贝格的朝圣教堂，以及圣弗洛里安修院的主要建筑，在迪恩施泰因，他的影响也是显著的。他保留旧的设施，把它们包括在他的计划之中；因此，他必然能够顺利地完成。参照过普兰德陶厄的作品的，有马蒂亚斯·施泰因尔在迪恩施泰因和茨维特尔的建筑，以及普兰德陶厄的侄子、来自蒂罗尔施楠地方的约瑟夫·蒙格纳斯特，他把阿尔滕堡教堂彻底翻修过，并在巴伐利亚石膏胶泥细工的帮助下，把修道院建筑装璜得富丽堂皇。多纳托·费利切·达利奥是数十年来一直在奥地利工作的一个艺术家家族的后

裔，在维也纳的赛马道上修起了萨莱斯修女会[1]教堂，该寺为约瑟夫第一的遗孀、威廉明妮·阿玛莉女皇所建。达利奥也拟定过克洛斯特新堡的修院新建筑的设计图，克洛斯特新堡遵照卡尔第六的意旨，应改建为行宫式寺院，即一个奥地利的埃斯科里阿尔[2]。经过长时间的停顿以后，拟议中的设施只有大约四分之一得以完成；可是，这个建筑仍然具有一种强大的整体影响力。内部建筑，包括宽敞豪华的大厅和成排皇帝和大公爵居住的房间，尤其令人印象深刻。

约翰·米夏埃尔·普鲁纳曾在上奥地利工作，他建成了保拉镇具有独特风格的朝圣教堂，该教堂的平面图为三角形，象征着三302位一体神的护佑，以及菲恩河畔的济贫院教堂。在蒂罗尔，许多巴罗克建筑应追溯到艺术家家族贡普，最有名的建筑中有因斯布鲁克的乡村别墅，这是宫廷建筑师格奥尔格·安东·贡普，模仿意大利的楷模，以雄伟的气概修建的。因斯布鲁克许多贵族宅邸都出自他和约翰·马丁·贡普之手；两人也参加了施塔姆斯修院及其教堂的巴罗克改建。在布雷根茨附近的梅雷劳，安东·贝尔建立了一个美观的寺院教堂(1740年，1808年中断过)。应当特别指出，福拉尔贝格邦的许多巴罗克建筑师在德国西南部和瑞士工作，他们天分颇高，大部分原籍都在布雷根茨森林。

巴罗克极盛时期的艺术观为雕塑家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前途。一个具有早期特征的作品是屹立在维也纳格拉本（Graben）的鼠疫纪念柱，于1679年鼠疫平静以后建立。那个时候，人们很喜欢

① 萨莱斯修女会(Salesianerinnen)，属于萨莱斯修会，1859年鲍斯高(Bosco)为纪念圣弗朗索瓦·达·萨莱斯(St.François de Sales)而成立的教派。——译者

② 埃斯科里阿尔(Eskorial)，西班牙城堡，离马德里四十公里。宫殿及寺院建于1562—1584年。纪念圣劳兰的教堂被毁于战火，后菲利浦第二下令重修埃斯科里阿尔寺院。——译者

设立纪念柱和耶稣受难十字架，很多玛丽亚、安妮和三位一体柱，1723 年以后还有很多约翰·冯·内波穆克立像。最重要的奥地利巴罗克雕塑家格奥尔格·拉斐尔·多纳，一个来自马希费尔德的下奥地利人，他是在圣十字修院工作的焦瓦尼·朱利亚尼的弟子；多纳多半做铅塑像，他把意大利的和法国的巴罗克形式和古典主义的题材结合起来，由于在维也纳(新市场的水泉、卡尔第六礼赞像)、萨尔茨堡、普雷斯堡和古尔克(Pietà①)创造过许多作品，因而早年就负有盛名。巴尔塔扎尔·佩尔莫塞尔塑了一个颇有特色的欧根亲王礼赞像，被认为最能表达巴罗克的艺术感。尤达斯·塔德乌斯·施塔梅尔是个施蒂里亚人，哥特族的工艺手工精神在他身上仍然存在。他曾用木头雕刻了"最后四件东西"(Vier letzten Dinge)，曾在他工作过的阿德蒙特修院图书馆里展出。

在绘画方面，本国的大师接替意大利人(如著名的安德雷阿·波佐)的事情一再出现。应当提到的有，伟大的壁画家萨尔茨堡的约翰·米夏埃尔·罗特迈尔、维也纳的丹尼尔·格兰和普斯特尔河谷的保罗·特罗格尔；下奥地利、维也纳和萨尔茨堡的巴罗克建筑中的最佳壁画就出自他们的手笔；卡斯帕尔·瓦尔德曼在蒂罗尔工作过，他以壁画装饰了哈尔女修道院。

奥地利巴罗克极盛时期的造型艺术，首先是建筑术的伟大成就，早就被人们充分认识。格奥尔格·德希奥在那本洋洋大观的德意志艺术史里，把三个皇帝利奥波德、约瑟夫和卡尔的时代称之为奥地利艺术史的黄金时代，是很有道理的；除此以外，从十七世纪进入十八世纪之际，欧洲的艺术创作的尖端地位应给予奥地利的巴罗克建筑艺术。艺术的名次排列(肯定是非常难办的)中的第二

① 圣母受尸像(Pietà)，此像表示的是一个圣经传说：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以后由妇人从十字架上起下来，圣母接尸痛哭。——译者

303 位可以评给巴罗克戏剧。尽管宫廷中存在着有利的气氛，开始上升的迹象十分清楚，奥地利音乐的伟大时刻还是没有到来。科学和文学，虽然有些名字经久不衰，但是较之造型艺术却明显地逊色。无论在科学的个别成就上，至少就数理学科方面而言，还是在普及国民教育方面，都表现出落后于帝国中那些信奉新教的地区，这种状况在下几个世代中，尽管千方百计地努力，还是无法追赶的。人们还是必须作出这样的估计，尽管对巴罗克时代的奥地利教育全盘否定的笼统判断应予拒绝。

最初居于领导地位的、浪漫主义的、几乎纯属意大利的成分，在接近十七世纪末时，越来越多地被本国艺术家的成就所达到，有时甚至超过，但，它以后仍在起作用。这成分发生了一种非同寻常的能促进多产的作用，再加上与南方和西方在王朝和政治上的联系，并且，在宗教信仰业已发生影响的范围内，赋予奥地利文化以一种独特的色彩，使它与其余的德意志语言和文化地区较前更为疏远。反击土耳其人和法国人的抗敌情绪在奥地利产生出一种可以明显感觉得出来的德意志巴罗克民族主义，而从这种民族主义精神中产生的逆流对于这种情况却无能为力；本着莱布尼茨的精神去克服宗教信仰上的矛盾的努力还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成效。在越来越严重的脱离帝国非哈布斯堡地区的倾向影响下，这个力求自给自足的专制国家的许多经济政策上的努力终于能奏效，面临着奥地利越来越明显的脱离德意志大家庭这一事实，这个君主国内非德意志民族集团的影响表现得比以往更加强烈，尤其在首都维也纳有世界主义倾向的贵族阶层和宗教界中，情况更是如此；在居民的构成和资产阶级文化的特征中，这一情况暂时仍处微小的规模上。另一方面，恰恰是在巴罗克时代，德意志文化在苏台德区继续在空间和势力方面有所增加。由于民族方面的重重矛盾，以及

宗教信仰上的束缚，奥地利的巴罗克通常很少获得斯拉夫和德意志民族主义忠实信徒们的同情。尽管对于极端爱国主义的陈腔滥调需要持审慎态度，但是，人们还是难以否认，奥地利在这个时期里经历了政治和文化威望上的巨大高涨。

304

八、改革、反动与革命

(1740年至1848年)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与争夺西里西亚的开始

在维也纳，人们曾经希望，即使在紧急关头，欧洲强国也会履行它们对国事诏书的允诺和保证；可是，在卡尔第六死后，人们不能不承认，自己肯定地错了。二十三岁的玛丽亚·特蕾西亚面临着异常棘手而又几乎无法解决的任务。

巴伐利亚的敌意是应该估计到的。它是唯一没有承认国事诏书的国家。选帝侯卡尔·阿尔布雷希特宣布，他的夫人玛丽亚·阿玛莉，约瑟夫第一的次女，在结婚时（1722年）所表示的弃权无效。这个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人援引了费迪南第一的1543年遗嘱和他的女儿安娜的婚约(1546年)，安娜嫁给了巴伐利亚王子阿尔布雷希特(第五)。审阅原始文件自然可以看出，只有在费迪南和卡尔第五的嫡出后代——而不是象人们以为的那样，男性的后代——死绝的情况下，安娜的维特尔斯巴赫后代对王位继承的要求才能得到满足。虽然如此，巴伐利亚仍然坚持它那个在法律上很难站得住脚的要求。萨克森人也相继而来。约瑟夫第一的大女儿玛丽亚·约瑟法嫁给了萨克森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1719年时，她大概也不得不同样彻底放弃对奥地利皇位的继承权要求。但是，萨克森对于将波希米亚的选帝票交给玛丽亚·特蕾西亚的夫婿弗兰茨·斯特凡一事持有异议。有着巴伐利亚和萨克森这两个没有决定性军事力量的二等国家在作对，奥地利君主国

就可能完蛋。尤其是巴伐利亚得到法国的撑腰。但，年事已高的法国外交政策领导人、枢机主教弗勒里反对采取军事行动，由于国王路易十五赞成他的主张，如果不是普鲁士的进攻在西方也节节得手，因而作出对奥地利宣战的决定，那么，弗勒里反对那期望取得赫赫战功的贝尔-伊尔伯爵领导下的主战派的行动就会得到成功。

在卡尔第六临终前的几个月，普鲁士的统治者换人。弗里德里希第二登上霍亨索伦王朝的宝座。由于他的父亲厉行节约，普鲁士有资金来维持一支强大能战的军队，这支军队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和北欧战争中都经受了考验。这个北德国家由于采取了一种成功的王朝政策，早已从德意志国家那种习以为常的穷苦环境中发展壮大；它与奥地利的关系，尽管有时搞得不好，但是迄今仍然没有公开翻脸；年轻国王的功名心和天才还不大为人们所知晓，所以，人们倾向于低估来自北方的紧迫危险，在军事上绝没有预作准备。国王弗里德里希不久就找到一个冲突的借口，他继续实现霍亨索伦想掠取部份西里西亚的宿愿。这些努力关系到1621年执行放逐令时从霍亨索伦边区行政长官约翰·格奥尔格那里剥夺过来的公爵领地耶格恩多夫，以及对公爵领地利格尼茨、布里格和沃劳的继承权要求。虽然大选帝侯[①]于1686年放弃这些封地，以换取施维布斯郡，他的儿子和继承人弗里德里希是普鲁士的第一个国王，早在当选帝侯国太子时就已在密约中允予归还这个郡，在他登极以后，这个诺言付诸实行。于是，在柏林，人们产生这样的看法，即，以前的要求现在又死灰复燃。普鲁士外交官在以前的谈判中就曾以同样的方式争辩过；这是可疑的，尽管很有理由，因为，选帝侯国太子为归还施维布斯而索取的赔款实际上已拿到手，此外，弗里德里希的要求已经超出上述公爵领地的范围。在与

305

① 即勃兰登堡的弗里德里希·威廉。——译者

奥地利进行的谈判中，弗里德里希大概作出一些让步；但是，玛丽亚·特蕾西亚觉得不战而放弃大片领地，对于一个大国是难以忍受的。俄国女皇安娜之死自然使奥地利在战争快要爆发之前失去了一位盟友，再者，这个东方大国由于战争爆发正忙于对付瑞典。而奥地利的传统盟友大不列颠则在一次殖民战争中已经同法国和西班牙纠缠在一起，英国首相罗伯特·沃波尔如同在西班牙王位继承纠纷时一样，很少考虑对奥地利给予有力的支援。

1740年12月16日，普鲁士军队越过奥地利边界，信奉新教的西里西亚居民对他们表示友好的欢迎。大部份城镇都被普鲁士军队不战而得，只有格洛高要塞进行了长时间的抵抗。奈佩尔格将军麾下的奥地利军队实力较差，最初指挥得并非笨拙，可是，1741年4月10日，在莫尔维茨附近，虽然骑兵袭击得很成功，还是败于敌人步兵的突击队。普鲁士武装部队的这次胜利，对于奥地利的一切敌人来说，竟成了一个进攻的信号。巴伐利亚、萨克森306和西班牙一齐向这个哈布斯堡君主国进攻，在广泛的协议中已经预定要将它瓜分。最大部份分给了巴伐利亚选帝侯，其中包括波希米亚、上奥地利、蒂罗尔和前奥地利。萨克森可以取得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的一部份。法国想获得尼德兰，而西班牙则想取得哈布斯堡在意大利的属地。法国“援军”所支持的卡尔·阿尔布雷希特如果转而攻打维也纳，玛丽亚·特蕾西亚的处境就更加不堪设想。他满足于占领上奥地利，然后就向波希米亚进军；在这两个邦里，各等级的代表都表示愿意臣服。在向维也纳进军声中，人们只推进到特赖森为止。1741年秋天，玛丽亚·特蕾西亚的境遇重又好转。由于她的风采和人品颇为感人，她争取到那游移不定的匈牙利国会的支持，虽然存在着蒂萨郡代表的令人担忧的反对。她向议会保证要遵守匈牙利宪法，她以后确也一贯信守这个诺言。

国会决定征募贵族入伍和征兵，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如果征集的兵员仅仅实际达到二万人左右，那么，在当时那种紧逼状态中却是很有意义的。在仇奥的联合阵线里所发生的信任危机也同样重要；萨克森对西里西亚部份领土所提出的要求，促使弗里德里希第二与奥地利签订克莱因施奈仑多夫密约，根据这个密约，奥地利放弃下西里西亚，并撤出尼斯要塞。这个条约当然无法保密，于是，弗里德里希宣布它受到侵犯，于1741年11月重新发动进攻。奥地利充分利用了这个短暂的喘息时间，在维也纳周围集结了一支军队，1741年年底，奥地利军队转入进攻，于1月24日收复林茨；在同一天，巴伐利亚选帝侯卡尔·阿尔布雷希特在法兰克福当选为罗马-德意志皇帝，是为卡尔第七。这是第一个保有这种帝位三百多年的非哈布斯堡人。1742年2月，奥地利人也占领了慕尼黑。诚然，过不了多久，弗里德里希第二方面就发动攻势，这一次甚至提出要割让波希米亚部份地区，即柯尼希格雷茨和帕尔杜比茨。这种勒索被玛丽亚·特蕾西亚顶了回去；但是，弗里德里希于1742年5月17日在霍图西茨（离恰斯拉夫不远）攻溃了弗兰茨·斯特凡的小弟弟洛林的卡尔麾下的一支奥地利军队，于是在英国调停下开始和谈。在布雷斯劳预备谈判以后，奥地利在柏林和约（1742年7月28日）中放弃西里西亚（和伯爵领地格拉茨），公爵领地特申、特罗保（在奥帕之南）和耶格恩多夫。如果玛丽亚·特蕾西亚的英籍全权代表海因福德伯爵采取比较强硬的态度，也许整个上西里西亚会保全下来。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就这样结束了。1742年9月，萨克森也缔结了和约。

后来英国内阁的更迭对于奥地利意义极为重大。罗伯特·沃波尔避免给玛丽亚·特蕾西亚以任何实际的援助，后被卡特雷特勋爵所取代。卡特雷特立即展开有力的外交活动，撒丁的卡尔· 307

埃马努埃尔第三站到奥地利一边,主要应归功于他的斡旋;萨克森意向的改变也是由于英国的影响和对变得十分强大的普鲁士日渐增长的嫉妒心理所致。法国人还做到了向巴伐利亚推进,但是,他们的军队在冬季战役中损失惨重,不得不放弃波希米亚,于是,玛丽亚·特蕾西亚得以在巴黎加冕。1743年,奥地利和他的盟友获得了辉煌的战果。在意大利战场上,特劳恩伯爵在帕纳罗河畔的坎波桑托战胜了西班牙人,由英国、荷兰和奥地利部队组成的“特遣军”(Pragmatische Armee)在美茵河畔德廷根告捷(1743年6月27日),从而结束了对在德国西部作战的法国人所发动的攻击;维特尔斯巴赫皇帝卡尔第七不得不在奥地利人面前重新逃出该国。普鲁士想成立一个具有反奥地利倾向的诸侯联盟,来支持那个摇摇欲坠的王国,但是徒劳无益。在这期间,英国、撒丁和奥地利之间的合作,由于1743年秋签订了沃尔姆斯条约而得到加强,后来,沃尔姆斯条约在较晚的时候引起了法国对结盟国家正式宣战。1744年夏,洛林的卡尔指挥下的一支奥地利军队突入阿尔萨斯,逼近斯特拉斯堡,这时,弗里德里希第二生怕丢掉他所取得的西里西亚领地,于是开进波希米亚;奥地利军队被从莱茵河召回。由于萨克森参加了对普鲁士的战争,国王弗里德里希只好在隆冬里退却,这使他遭受重大的损失。皇帝卡尔第七由于同法国结盟而丧失了很多人的同情,在奥地利挺进之时,他不得不第三次撤出他的巴伐利亚故乡。1745年1月20日,这个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人猝然死去,他那个倒霉的帝国也就寿终正寝。由于巴伐利亚的盟友法国和普鲁士在推选皇帝的问题意见不一,卡尔·阿尔布雷希特的儿子和继承人马克西米利安·约瑟夫宁愿于1745年4月22日与玛丽亚·特蕾西亚缔结菲森和约。在和约中,这个巴伐利亚人承认了国事诏书,答应把他的选帝票投给玛丽亚·特蕾西亚的

伴君。后者于 1745 年 10 月 10 日在法兰克福当选和加冕。

当时由于俄国也倾向于与奥地利和英国联合，战胜普鲁士似乎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可是，这个时候弗里德里希的统帅艺术已经处于光天化日之下，至为明显。他在霍亨弗里德贝格附近打败了洛林的卡尔麾下的正在鲁莽地向前进逼的奥地利-萨克森联军(1745 年 6 月 4 日)，又在佐尔击退了洛林人的另一次攻 308 击(1745 年 9 月 30 日)，而利奥波德·冯·德绍麾下的另一支普鲁士军队则在克塞尔斯多夫把萨克森人打得一败涂地。萨克森人不得不停止战斗，于是玛丽亚·特蕾西亚又与普鲁士重开谈判，这次谈判导致德累斯登和约 (1745 年 12 月 25 日) 的签订。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的结束很符合英国政策的意图，英国很希望奥地利加紧反对它自己的主要敌人法国。

这时，反法国的作战在陆地战线上进行得相当不利。在尼德兰，萨克森的莫里茨元帅领导了对结盟国家进攻的法国军队，使之获得丰特努瓦、鲁科和拉格费尔德之战的胜利，荷兰要塞贝尔根-奥普-佐姆不得不投降。在海上，当然是英国较强，斯图尔特王朝的觊觎者查尔斯亲王曾试图把战争引向英国，起初似乎很有成功的希望，结果却以克洛登附近战败(1746 年)和他的党羽在苏格兰高原的悲剧告终。在意大利，奥地利军队在遭到一系列挫折以后，于 1746 年 6 月在皮亚琴察附近打了大胜仗，向普罗旺斯推进却没有结果。两个波旁王朝国家关系上的危机，以及一支俄国援军向莱茵前线的开拔，重又加强了玛丽亚·特蕾西亚的地位，她同这个东方强国的防守同盟多少使她免于普鲁士的进攻。军事行动既然已经停顿，于是，交战者就开始在亚琛进行和谈，于 1748 年 10 月缔结和约。如同昔日在里斯维克和乌特得支一样，同法国签订了预备条约的海上强国使奥地利面对既成事实。双方夺得的东西普遍

地交了出来，但是，奥地利必须把帕尔玛、皮亚琴察和瓜斯塔拉放弃给西班牙的唐·菲利浦。缔约国保证普鲁士拥有它在西里西亚的领地。

随着亚琛条约的签订，“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宣告结束。在卡尔第六的不幸的第二次土耳其战争以后，这个哈布斯堡国家的军队的状况最初令人完全绝望，却能比人们预料的更好地抗拒了那个想瓜分它的、一度有法国、西班牙、普鲁士、巴伐利亚和萨克森参加的联合。西里西亚省在经济上最发达，它的丧失当然令人痛苦。由于失去这个德意志移民占大多数的邦，哈布斯堡君主国的民族构成发生了值得担忧的变化，它的后果为人们始料所不及。奥地利与普鲁士的矛盾已经清晰地变成帝国宪法和奥地利外交政策309中的一个未来主要问题，而在西欧，法英的敌对使其他一切都相形见绌。亚琛和平谈判的情况表明，原来的阵线1714年以来由于奥地利和法国一再接触本来就已经松弛，这时也就丧失了意义。在亚琛率领奥地利代表团的文策尔·安东·冯·考尼茨-里特贝格伯爵(从1763年起为侯爵)也有这种想法，他的人品在随后的几十年中为奥地利政策指出了新的方向。

联盟的逆转与七年战争

亚琛条约签订以后，在维也纳宫廷，与会的大臣们忙于检查传统的结盟政策。考尼茨伯爵在1749年时就已主张解除与海上强国的盟约，与法国发生联系，以抗击他所认定的主要敌人普鲁士，可是他却遇到大多数主管部门的反对，然而，他的见解却得到君王的赏识。打仗，人们当然还用不着去想，但是，陆军必须改组。在这项工作中，利奥波德·道恩伯爵的行政才干表现得很好；军事边防区的古老制度得到了改革。1752年，在维也纳新城成立了一个

玛丽亚·特蕾西亚军事学校，以培育军官，这个学校以后办得很出色。

对于奥地利的外交政策来说，争取法国有相当的困难，要估计到强烈的、被传统所决定的阻力。由于这种阻力，以及普鲁士的经常干扰，来往于维也纳和凡尔赛之间的好几个密使的种种努力，尤其是作为公使被派往巴黎的考尼茨伯爵的外交手腕，都未能奏效。在这当儿，1754 年，英美和法国的战斗部队在北美发生了冲突，不久就扩大成为一场殖民战争；于是，大不列颠就根据盟约要求奥地利支援。不久就变得很明显，奥地利首先想到的是攻打普鲁士，那个海上强国由于处境窘逼无法参加这场战争，而从奥地利的观点看来，当哈布斯堡本土有受普鲁士入侵之虞的时候，把军队派到尼德兰和莱茵河去乃是冒险之举。弗里德里希第二于 1756 年 1 月仓促地与英国订立威斯敏斯特协定，这才使法国警觉，愤怒，终于使它倾向于与奥地利缔结一项攻守同盟（1756 年 5 月）。不过，在 310 奥地利，同样也在俄国，人们对英国的态度非常不快。哈布斯堡君主国多年以来与俄国有防御盟约的联系，而女沙皇伊丽莎白又仇恨弗里德里希和普鲁士，于是不管什么条约义务，一心想发动进攻。至于争取法国向弗里德里希进攻，则一时还没有办到。由于与法国的谈判过程未能尽如所愿，考尼茨就寄希望于敌人的进攻行动，因为在防守战中，结盟的国家必须遵守更加广泛的义务。普鲁士国王确实由于一个奥地利官员的不忠而得到奥地利和俄国在作军事准备的情报，而与他重开谈判的英国也对他提出了警告。于是，他命令他的军队进入备战状态，当他就奥地利这时已经公开进行的备战活动和军事运输所提出的质询只得到躲躲闪闪的回答时，他就亲自转入进攻。他的军队越过萨克森边界，萨克森曾经试图脱离双方的同盟而处于局外。追究战争的真正责任问题讨论得

很多，人们总是喜欢把它同寻找1756年“最初的”战争意愿联系起来。无可置疑的是，玛丽亚·特蕾西亚和考尼茨都极力想利用各种收复西里西亚的办法，而弗里德里希通过三次进攻——最先在1740年12月，然后又在克莱因施奈伦多夫条约签订以后，最后又重新在1744年——表明，对于奥地利邻邦的边界来说，他就是一个长期的危险。人们很难责备奥地利政策，说它想的不仅是抵御。如果人们想重新夺回在德国的传统优势地位，那就要打倒普鲁士，重新把他的西里西亚抢走。

弗里德里希国王的进攻战略取得了成功。萨克森人被围困在皮尔纳营，最后被迫投降。布朗将军麾下的一支奥地利军队试图替萨克森人解围，可是，在波希米亚北部的洛博西茨附近被普鲁士人所击退(1756年10月1日)；这次战斗实际上胜负未定，但却表明，经过整顿的奥地利军队战斗力大为增强。这时，考尼茨的外交手腕也生效了。他终于做到，在第二次凡尔赛条约中明确了同法国结盟。在战争胜利时，法国应取得尼德兰的一部份；其余归西班牙的唐·菲利浦。奥地利应获得西里西亚，必要时还有一些普鲁士领土，收复在亚琛条约中放弃了的帕尔玛、皮亚琴察和瓜斯塔拉地区，作为补偿损失和褒扬胜利。

311 冬季里，一直没有战事，春天里，弗里德里希又恢复攻势。1757年3月，瑞典又参加了他的敌人的行列，瑞典可以从它的施特拉尔松要塞向普鲁士的波美拉尼亚进攻。这时，普鲁士国王想趁奥地利的盟友还没有以雄厚的力量投入战斗以前，给奥地利以决定性的打击。这一点没有做到。不过，普鲁士人仍然于1757年5月6日，在布拉格附近的大战中获胜，这一次奥地利的指挥官布朗和弗里德里希的元帅施威林都已阵亡。守城的军队坚决抵抗，元帅利奥波德·道恩伯爵麾下的一支奥地利解围军于1757年6

月 18 日，在科林附近击败了普鲁士人；这是第一次对畏敌所获得的重大战役胜利。那时，玛丽亚·特蕾西亚设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最高奥地利军事勋章，道恩获得了这种勋章的大十字章。在这期间，法国人也在德国西部推进，他们在哈斯滕贝克附近战胜汉诺威人，而俄国人则开入东普鲁士。但是，这时弗里德里希在罗斯巴赫附近取得了对法国人和帝国军队（1757 年 11 月 5 日）的胜利，极得人心，一个月以后，他在洛伊滕附近打败了那个“不幸的统帅”洛林的卡尔麾下的一支实力大得多的奥地利军队，取得了更大的胜利（1757 年 12 月 5 日），而洛林的卡尔在此以前曾攻占了施魏德尼茨和布雷斯劳。1758 年，与英国巩固了盟约关系的普鲁士人已占据摩拉维亚领土。对坚强的要塞奥尔米茨的围困遭到了失败，因为吉德昂·冯·劳东将军在多姆施塔特尔附近突袭成功，切断了普鲁士的给养，这一次吉德昂·冯·劳东将军首次以勇猛善战的指挥官著称。武运开始发生变化。虽然普鲁士国王在措恩多夫附近的浴血战中打败了俄国人，可是，后来道恩在偷袭了弗里德里希的营地（1758 年 10 月 14 日）以后，又在萨克森的霍赫基尔希告捷。霍赫基尔希虽不能起影响深远的决定性作用，但是，次年，1759 年，对于普鲁士武装部队却充满了灾难。1759 年 8 月 12 日，弗里德里希同劳东和萨蒂科夫指挥下的奥俄联军对阵，在库纳斯多夫（在诺伊马克）遭到了毁灭性的惨败。自从这次惨败以后，普鲁士国王感到绝望，心怀自杀的念头，然而，争取俄罗斯盟友和睦地、目标明确地作战，当然一向是困难的，因此，库纳斯多夫大捷几乎没有加以利用。是年秋天，道恩元帅还攻占了德累斯登，迫使芬克将军麾下的一个普鲁士军团在马克森附近投降（这叫做“活捉芬克”）。奥地利在外交战线上也取得了成绩，与法国和俄国签订的条约使必要时迫使奥地利割让所属的尼德兰的协议归于无效。

312 1760年，变化又重新发生。在6月里，劳东还在兰茨胡特（在伯爵领地格拉茨）附近战胜了普鲁士的富凯将军。在利格尼茨附近的战役中，由于预期中的道恩和拉西的援军没有来，这个奥地利统帅于1760年8月15日败于弗里德里希；轻装的奥地利和俄国部队——在这次战争中，这是第二次——曾一度占领柏林，但对战斗的进行没有重大的影响。1760年11月3日，普鲁士国王在托尔高附近变幻多端的战役过程中，战胜了道恩和拉西。次年，奥地利人和俄国人的协作有所好转，但是，1761年并没有带来重大的军事决定；交战各方已经感到战争消耗这个负担非常沉重。奥地利甚至还不得不缩减它的军队实力。无疑，考尼茨把哈布斯堡君主国实际能量估计过高。行政管理上采取了各种整顿措施，并未能对此产生重大的变化，关于这些措施，以后还要谈。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开始想到和平。1761年10月，英国政府更迭，皮特内阁垮台，比尤特勋爵正在改变方针，这时局势对于普鲁士国王再度变得具有威胁性。另一方面，1762年1月，弗里德里希第二的不共戴天之敌、俄国的伊丽莎白女皇死去，她的后继者彼得第三与普鲁士签订了和约，甚至还结了盟。在1762年7月彼得被谋杀后上台的卡塔琳娜第二对盟约当然是要翻悔的，但是，对和约的缔结，她却牢牢地抓住不放。瑞典也退出了战斗。俄国军队的在场还帮助弗里德里希在布克尔斯多夫战役中获胜，奥地利人撤出了西里西亚。

在萨克森的调停下，1763年2月15日，奥地利和普鲁士在维持领土现状的基础上，缔结了胡贝图斯堡和约。奥地利人撤出了仍处在它的军队占领下的伯爵领地格拉茨，不得不重新肯定普鲁士人对西里西亚的占有。普鲁士国王答应支持玛丽亚·特蕾西亚的儿子、王储约瑟夫当选为皇帝。几天之前，西方国家缔结了巴黎

和约，这个和约使法国失去了它的大部份北美殖民地；英国成了七年纷争的最大胜利者，普鲁士则保持了它作为中欧强国这个新赢得的地位。五强寡头政治（英国、法国、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尽力维持欧洲的平衡；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的矛盾主宰着罗马-德意志帝国的政治生活。在奥地利，人们固然逐渐地安于西里西亚的 313 丧失，约瑟夫第二和考尼茨脑海里虽然还有时浮现起重新反对普鲁士的念头，但，普鲁士则力图阻止在其他德意志地区取得补偿的行为。可以设想，帝国内部的这两个主要强国，通过外交途径勉为其难地保持了合作，但是，从长远来看，保持力量的和平均势是困难的，一遇战斗，奥地利由于错综复杂和因内部关系紧张而受到削弱的结构，以及有着比较危险的邻邦，因而处境不利。

玛丽亚·特蕾西亚的改革

在玛丽亚·特蕾西亚执政后不久，在与普鲁士等敌人发生军事纷争的最初几年里，情况就已表明，那个从大选侯时期起就实行中央集权制的普鲁士国家，就财政和军事效能来说，确实比哈布斯堡君主国优胜一筹。特别是在丢掉了的那几个西里西亚邦里，普鲁士的行政管理制度的成功影响着奥地利，于是，奥地利就开始搞行政改革，最初，这些改革还完全没有按步就班的性质，毋宁说，只是探讨性的尝试而已。重要的是，1742年，外交事务和王朝事务脱离奥地利宫廷事务处(Hofkanzlei)，另指定给一个新成立的“宫廷与国家事务处”（Hof-und Staatskanzlei)。当考尼茨这样一个善于独立思考的外交官接管这个新宫廷机构的时候，这个措施的意义就变得很明显。女皇还为了能够更好地综览所有涉及国家大政的重要文件、证书，而促使成立一个统一的王朝、宫廷与国家档案局，该局的创建由宫廷秘书特奥多尔·安东·陶洛夫·冯·罗

森塔尔有目的地领导进行（1749 年)。难以撑持的宫廷财务署进行了改革，终于导致司法和行政分立，就其形式而言，最初当然不是很成功的。军事机构也实行改革，这是自不待言的，宫廷军事委员会（Hofkriegsrat）和 1746 年升格为独立宫廷机构的总军务处（Generalkriegskommissariat）后来都很好地经受了考验。在一件棘手的事务中，即在调解维也纳宫廷、匈牙利等级代表和匈牙利南部的塞尔维亚人之间长期冲突方面，人们找到了成立主管机构“Hofdeputation in Banaticis, Transsylvanicis et Illyricis”（“宫廷巴纳特、特兰西瓦尼亚和伊利里亚事务部”)这样一条出路。

只有亚琛条约能保证奥地利能有好几年的喘息时间，真正彻 314 底的改革才得以进行。这时所采取的措施已经越出单纯的行政改组的范围，而带有国家改革的性质。这些改革的实行主要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冯·豪格维茨伯爵的功劳。他是一个西里西亚的改宗者，在他的故乡大部份沦丧在普鲁士手里以后，被任命为驻节特罗保的西里西亚残存地区的行政机构的领导人。同以前的奥地利在西里西亚的行政机构相比，普鲁士取得了巨额的额外收入，这给豪格维茨以强烈的印象。国君的和地方的财政制度互相脱节刚刚得到克服。豪格维茨想在各邦和维也纳成立管理政务和财务的官厅为哈布斯堡君主国达到同样的目的。豪格维茨先是在奥属西里西亚，然后在克恩滕和克赖因实行他的改革。玛丽亚·特蕾西亚无视大多数顾问的反对，采纳了豪格维茨的改革意见。作为奥地利各邦（包括波希米亚在内，但没有匈牙利）的政务和财务最高管理机构，成立了“公共及宫廷事务督导部”[1]，隶属这个机构的，在各个邦里有“代办与财务处”[2]，作为最小的官厅，则有“县公

[1] 其名称为“Directorium in publicis et cameralibus”(拉丁文)。——译者

[2] 其名称为“Repräsentation und Kammer”(德文)。——译者

署"①。其名称与有关的前波希米亚机构有联系。由于县公署对各个等级监视得比较严，所以，贵族人士对它特别恨。此外，对新设机构的工作进行消极抵抗的尝试已经引人注目，豪格维茨感到肯定会得到女皇的同意，于是就采取严厉的有力措施对付。在改革初期坚决贯彻改革措施时，成立了一个最高司法机关，这样就把司法和行政完全分开了。

所有这些官厅都是奥地利和波希米亚各邦所共有的，而匈牙利和尼德兰却保持了原有的封建机构。在匈牙利，玛丽亚·特蕾西亚行事最为谨慎。尽管如此，还是采取了各种行政措施，特别是经济政策措施，以巩固同奥地利的联系。1776 年，亚德里亚海港阜姆划归匈牙利，这样匈牙利就从地中海贸易中直接得到了益处。

在七年战争期间，1749 年的组织工作受到严峻的考验，这次战争的进程，尽管在外交上作了细致的准备，还是未能符合预期的愿望。国务总理考尼茨倾向于把国家的日趋明显的匮乏归咎于豪格维茨所进行的行政改革的缺点。最高机关——督导部，实际上未能满足人们的期望。于是，在 1760 年，人们把财政同行政管理分开，其中之一划归宫廷审计处（Hofrechenkammer）管辖，另一个则归奥地利和波希米亚联合宫廷事务部（Hofkanzlei）管辖。315 在邦机构(这时称为"Gubernien")里，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另一方面，1761 年，成立了一个国务院，这个咨询性机构位于一切宫廷机构(联合宫廷事务部、国务处、最高司法处、宫廷财务处、宫廷审计处和宫廷军事委员会)之上，协调各官厅的工作。考尼茨所推行的改变，当然只是对以前的改革作一些表面上的更正，几年以后，一些更改重又变得必不可少(1765 年)。尽管如此，玛丽亚·特蕾

① 其名称为"Kreisämter"(德文)。——译者

西亚的行政机关仍然构成风暴之年的1848年以前奥地利国家的坚强支架。

在七十年代里，改革扩大到教会政策领域。这些改革已经成为人们通常称之为“约瑟夫主义”那样一种精神的明证，虽然人们自然总是知道，玛丽亚·特蕾西亚的儿子既不是创始人，也不是唯一负责人。早在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期间，教会和邦君之间有时曾发生过冲突。王朝和官僚们，由于意识到自己的宗教斗争能力，变得更加骄矜。甚至对于教会也是如此。在十八世纪，在奥地利冉森派思想所产生的影响已经有所表现。冉森主义是一种宗教运动，是由伊佩恩的副主教科内留斯·冉森创立起来的。这个流派所着重的，主要不是神学理论，而是国教理论。宫廷圈子里的某些重要成员，如玛丽亚·特蕾西亚的侍从医生兼科学顾问格哈特·范·斯维滕，女皇的忏悔僧伊格纳茨·米勒、维也纳圣多罗特娅大寺僧修道院院长，都属冉森派。特里尔副主教约翰·尼古劳斯·冯·洪特海姆(尤斯蒂努斯·费布罗尼乌斯)[①]赞成国教的见解在奥地利很受人尊敬，诚然，1778年他又宣布撤销这种见解。各种启蒙性的倾向开始对官方的教会政策发生影响。国务总理考尼茨是鼓吹由国家政权坚决控制教会的代言人和首创者。国家宗教措施首先在伦巴底土地上实行，后来又由奥地利-波希米亚宫廷事务部在君主国的各核心邦里实施。足以说明问题的，特别是针对僧寺机构的措施，如不准在二十四周岁以前加入教团的禁令。玛丽亚·特蕾西亚尽管有个人顾虑，还是在1773年参加了对耶稣会所采取的行动。其他法令目的在于审查奥地利教士与罗马教廷的联

① Johann Nikolaus von Hontheim (1701—1790, 即 Justinus Febronius)，曾著书立说，要求在教会内部大大限制教皇的权力。据此，1786年科隆、美茵茨、特里尔、萨尔茨堡的主教提出一个教会改革纲领，要求成立国家教会。但，由于诸侯的反对而未果。——译者

系；神职人员免税的特权被取消了。这些措施尤其引人注目，因为 316 玛丽亚·特蕾西亚仍然怀着旧式的宗教虔敬心，而且，她虽然身为侯爵夫人之女，出身于一个信奉新教的家族，但对新教徒和犹太人极不宽容。

玛丽亚·特蕾西亚在晚年所推行的其他改革，除了在合并新略取的领土加利曾、布科维纳和因菲特尔期间所采取的行政措施以外，多半属于福利国家的“社会立法”范畴，其影响将在别的地方论述。这特别涉及到玛丽亚·特蕾西亚为农民而提出的创议、为教育改革、为财政、工艺和人口政策所采取的许多措施。在司法方面，玛丽亚·特蕾西亚可以说遵循着保守性原则，她的刑法(Nemesis Theresiana 1768)还规定极其严厉的刑罚；只是经过国务顾问约瑟夫·冯·宗南费尔斯长期煞费苦心，刑讯逼供才于 1776 年被废止。

巩固和新略取的领地

1764 年 3 月 27 日，玛丽亚·特蕾西亚的大儿子约瑟夫第二当选为罗马-德意志皇帝，在其父死(1765 年 8 月 18 日)后，他顺利地即了帝位。约瑟夫虽然位居“协同摄政王”之尊，但是对于奥地利政策的影响很是有限，尤其是在涉及军事和对外政策方面。弗里德里希第二和他(以及，和考尼茨)相互不信任，可是，他们还是采取了一个意义重大的共同行动，即第一次瓜分波兰(1772年)，俄国也参加了这一行动，其作用最为举足轻重。那个建成了的波兰贵族共和国的内部实力大体上与这个国家日益广泛的领土扩张相符。在七年战争期间，普鲁士军队，尤其是俄国军队一再穿越波兰国土，没有人敢于阻拦。俄国的影响占据优势，当卡塔琳娜第二的宠儿斯坦尼斯劳斯·波尼亚托夫斯基当选为国王（1764 年）的

时候，这种影响就变得极其强大。俄国土耳其战争使这个国家还有一段时间的宽限，在这期间，约瑟夫第二和弗里德里希第二，在尼斯(1769年)和摩拉维亚的诺伊施塔特(1770年)的两次会晤中，互相有所接触。俄国想盘踞在多瑙河侯国（摩尔道和瓦拉几亚），这个尝试威胁着奥地利的东翼，使奥地利和俄国处于冲突的边缘，这场冲突使哈布斯堡君主国显得好象是土耳其这个死敌的盟友。玛丽亚·特蕾西亚避免了这个作战行动，它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巴尔干信奉基督教的各族人民中间都是很不得人心的，这样做也就使土耳其免受俄国继续推进之害。这时波兰问题就变得紧迫起317 来。在昔日匈牙利按照卢布劳和约(1412年)抵押给波兰王室的十三座齐普斯[①]城镇中发生过骚动以后，奥地利军队应波兰国王之请开入波兰，但是，奥地利军队却把占领行动扩大到三个古波兰县，该地的维耶利奇卡盐矿极有价值。在这当儿，俄国和普鲁士已经就进一步吞并波兰领土而举行了谈判；1772年8月，奥地利加入了俄国普鲁士协定，对此玛丽亚·特蕾西亚曾表示强烈反对，但是，考尼茨已经抛弃了她，于是，她也就对约瑟夫第二无能为力。在第一次瓜分波兰中所取得的战利品份额可以概括为一个按照古鲁特尼亚[②]的哈利奇和弗拉迪米尔诸侯国“加利曾和洛多梅里亚王国”命名的行政区，其首府为伦贝格[③]，这个行政区从西里西亚的东部疆界一直延展到布格，其西部有波兰人定居，其东部有鲁特尼亚人定居，在那里，尤其是农业有着良好的发展前途。俄国把迪

① 齐普斯(Zips)，即捷克斯洛伐克的斯皮什(Spiš)，在塔特拉山脉以南。——译者

② 鲁特尼亚(Ruthenien)，古地名，占加里西亚东部、匈牙利西北部和布科维纳的部份地区，其居民相当于今日的喀尔巴阡乌克兰人。该地现已大部份合并于苏联。——译者

③ 伦贝格(Lemberg)，即苏联西部的利沃夫(Lvov)。——译者

纳河和第聂伯河以东的边区据为己有，普鲁士获得东普鲁士和波美拉尼亚之间的毗连地带，这个地区最小，但最有价值，就主要方面来说，相当于以前的骑士团[①]领地，那里德意志居民占极大的比重。毫无疑问，“第一次瓜分波兰”乃是十八世纪强国政策最司空见惯的行为之一。从奥地利的观点看来，北方的这个无害的天主教国家的削弱和俄国的逼近都是特别可虑的。玛丽亚·特蕾西亚，由于参加了这个被认为不正义的行动而感到良心责备，对于瓜分政策的危险，比较他的顾问们估计得更正确一些；另一方面，不容否认的是，奥地利太弱，不足以阻止瓜分，袖手旁观反而会使同普鲁士和俄国的力量对比恶化，哈布斯堡君主国，同霍亨索伦国家一样，在自己持审谨态度时，都要估计到，整个波兰都会成为俄国的战利品。

在取得加利曾以后过了三年，又不战而获取布科维纳，于是加利曾和西本比尔根的联系就建立起来了。奥地利曾居间促成俄国-土耳其的屈楚克-凯纳奇[②]条约的签订，土耳其对奥地利不得不割让领土，但主要不是由于奥地利的居间促成。总之，这次得地至少可以说是经由条约途径促成的，而布科维纳居民对于国籍的变更肯定用不着后悔。奥地利行政机构经过几十年的工作，终于把那个人烟稀少、满目荒凉的地区建设成为君主国的模范邦。

318 波兰和土耳其的事务解决以后，曾几何时，王位继承问题在巴伐利亚又引起了新的、不无危险的纠纷。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嫡系行将断子绝孙，巴伐利亚选帝侯马克斯·约瑟夫和卡尔·特奥多尔·冯·普法尔茨-苏尔茨巴赫公爵婚后都没有子嗣。于是，可

① 骑士团指 Deutscher Ritterorden（德意志骑士团），又称条顿骑士团或十字架骑士团，从 1308 年起即占有革但斯克一带，即今日的“波兰走廊”。——译者

② 屈楚克-凯纳奇（Kürschük-Kainardsche），在保加利亚的多布罗加，位于锡利斯特拉东南。——译者

以考虑立卡尔·冯·普法尔茨-茨魏布吕肯公爵为直接的继承人，他由于在巴伐利亚和普法尔茨具有双重地位，可以成为显赫的南德王朝权力的主宰。这时，考尼茨就劝说卡尔·特奥多尔，在选帝侯马克斯·约瑟夫死后订立一个条约，承认最棘手的哈布斯堡对于下巴伐利亚的要求。明德尔海姆领地——对此奥地利顶多可以提出自己的权利要求——以及波希米亚在上普法尔茨的前采邑应立即割让给奥地利，而不管当地居民的异议。奥地利军队占领了这些地区；约瑟夫第二和考尼茨又再次对玛丽亚·特蕾西亚的警告置若罔闻。普鲁士无论如何都要阻止奥地利扩大它在帝国内部的根基，于是，普鲁士就表示猛烈反对，有继承资格的普法尔茨-茨魏布吕肯公爵也表示附议。普鲁士军队开进波希米亚，但是，经过几个月的不流血的行动以后又不得不离开该地。约瑟夫皇帝在随奥军亲征期间当然已经证明，他缺乏担任统帅的全部才能，正如他对军事只是有兴趣，而不是有天才。玛丽亚·特蕾西亚曾主动设法解决这场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最初徒劳无功，后来才能如愿以偿，这场被讽刺为“土豆战争”和“李子纠纷”的战争，以签订特申和约（1779 年 5 月 13 日）告终，俄国和法国做了该条约的保证国。作为对奥地利的其他要求的补偿，它获得巴伐利亚的因县（Innkreis），居民约六万人，该县作为“因菲特尔”合并到恩河上游之邦。同人们的期望相比，这算不了什么，但当时还看不出来，这块获得的土地比其他十八世纪所获得的土地都更能持久。

特申和约的缔结是玛丽亚·特蕾西亚在外交上的最后一次成功；对于促成约瑟夫皇帝和卡塔琳娜第二之间的莫希列夫会晤，她没有参与，这次会晤再次导致奥地利和俄国的接近。玛丽亚·特蕾西亚于 1780 年 11 月 29 日去世，在执政四十年以后，才六十三岁。她在极其危急的局面下，领导了奥地利国家，顶住了那些威胁

着国家存亡的危险，它们肯定不会小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使哈布斯堡君主国灭亡的那些危险。所遭受的损失，至少就领土幅员而论，在她执政的后期已经得到弥补；罗马-德意志皇帝的尊严，319 特别是由于这位老哈布斯堡女皇的坚定而为新兴的哈布斯堡-洛林王朝维持了下来。实际上，玛丽亚·特蕾西亚完全意识到自己是哈布斯堡家族传统的继承者，虽然就仪表和天性方面来说，与其说她是抑郁的卡尔第六之女，不如说她是她那个王族出身的母亲玛丽亚·克里斯蒂妮之女。女皇的世界观当然是源出于有着奥地利印记的巴罗克天主教的，在严重的紧急关头，对上帝的坚如磐石的信仰给她以可靠的支持。启蒙思想对于她是陌生的和不愉快的，但是，对于象豪格维茨、考尼茨、范·斯维滕和宗南费尔斯那样易于接受新思想的人，她是信任的，而特蕾西亚的国家改革，就其结果而论，尽管条件极其困难，还是符合那种通常可以确证的开明专制主义的倾向。玛丽亚·特蕾西亚的政府，在维护历史疆界的原则下，使国家整体得到更坚强的团结，大大提高了国家意识；特蕾西亚时代在政治上、行政上，尤其是在文化上的成绩和成就，对于哈布斯堡帝国各邦和各民族来说，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约瑟夫第二统治下的十年

在玛丽亚·特蕾西亚执政的后期，约瑟夫皇帝已经对哈布斯堡君主国的政府和行政机构有较深的了解；他作了多次旅行——通常用法尔肯施泰因伯爵的假名（法尔肯施泰因是从洛林遗产中分给奥地利的莱茵河左岸的一块伯爵领地，在沃尔姆斯附近），考察了不熟悉的诸侯宫廷和世袭地。自从约瑟夫的第一个爱妃伊莎贝拉·冯·帕尔玛(1763 年)和第二个妻子、那个未被钟爱的维特尔斯巴赫族女子玛丽亚·约瑟法(1767 年)死后，皇帝就一心从事

政务。作为独立统治者的约瑟夫，在考尼茨的影响和赞助下，坚持反对普鲁士并与法国结盟的政策；俄国的卡塔琳娜则是可以争取其采取友好态度的。

约瑟夫用心解决，但收效甚微的第一个外交问题是奥属尼德兰与荷兰的关系问题；驻屯条约和斯凯尔特河的封锁应当取消。虽然撤销荷兰在屏障要塞中的驻屯权已经实际做到，然而，取消320 1648年以来就存在着的斯凯尔特河封锁，从而达到振兴安特卫普的贸易往来的尝试都遇到了荷兰联省议会的坚决反对，后者甘冒战争的风险。所以，皇帝只好以微小的边界修改和一笔赔款为代价，在枫丹白露条约(1785年)中承认对斯凯尔特河的封锁。比利时人感到失望，统治者的另一个计划是，在采用较老的策略时，把他们作为交换巴伐利亚的筹码，这就使他们的忠诚受到极严峻的考验。由于普鲁士的反对，以及法国没有给予支持，这个方案也就落空，因为普鲁士正在组织反奥地利的诸侯同盟，法国对于消灭它以前的老盟友巴伐利亚又没有兴趣。1786年，弗里德里希第二去世，这个奥地利的大敌死后不久，在外交政策上总是摇摆不定的约瑟夫就打算同普鲁士合作。如果这样做，法国和俄国当然就会和哈布斯堡君主国疏远。考尼茨对于这个新方针很冷淡，在这方面，除了他对普鲁士在感情上怀有强烈的愤怒情绪以外，他生怕俄国与西方强国合作，这两个中欧国家会有被包围的危险的感觉也起了一定作用。

因此，人们仍然坚持旧有的外交政策概念，并且在俄国盟约的支配下参加了对土耳其的战争，这次战争归根到底是由于卡塔琳娜第二的征服和瓜分计划所造成的，这些计划对奥地利来说，也是极其危险的；土耳其人当然也就开始采取敌对行动，英国和法国并非没有插手其间。按照盟约条款，奥地利只有派出辅助兵团的义

务(一如 1738 年那样),但是,奥地利超出了盟约规定的范围,以独立的交战国的姿态投入战斗（1788 年)。战争的进程与预期的完全不符。元帅拉西伯爵是一个杰出的组织者，但不是一个有卓越才干的指挥官。他把皇家军队沿着边境作线状布列，一当土耳其人转入进攻,他们就仓皇撤退;约瑟夫皇帝随军亲征,但由于他优柔寡断,反而产生了非常消极的作用。1789 年,形势完全改观。年迈的劳东在多瑙河前线接管了兵权,在短时间的包围以后,拿下了贝尔格莱德。约西亚斯·冯·科堡亲王与俄国并肩作战，在福克沙尼和马丁内什蒂获胜。土耳其人的威胁宣告解除。

其他方面的局势更令人担忧。在普鲁士，赫茨贝格大臣的外交政策具有明显的反奥地利特色;他与海上强国合作,并正在设法同瑞典和土耳其接触。此外，哈布斯堡各邦里又爆发了动乱。在尼德兰发生了公开的叛变,匈牙利的局势极为紧张,玛丽亚·特蕾西亚对这些地区的传统特殊地位曾予以照顾，而约瑟夫在这里则仓促地推行改革，招致特权阶层的反抗，不久其他阶层也起来反抗。在严格信奉天主教的比利时，约瑟夫的宗教政策措施引起了巨大的骚动,尽管如此，皇帝还是对行政机构进行了彻底的改组;不久,天主教保守派和革命派结成了一个独特的、为时短暂的反奥地利统治的战斗共同体。当约瑟夫第二以取消宪法，即取消 1355 年对“愉快的开端”（Joyeuse Entrée)①允予的特权来回答巴拉邦特各等级的抗税运动时，于是就爆发了公开的起义。只有倾向哈布斯堡的卢森堡省保持忠诚。软弱的奥地利军队不得不撤出布鲁塞尔,起义者宣布邦的独立,于是马上被普鲁士和海上强国承认为

321

① “愉快的开端”宪章，是 1355 年布拉邦特人迫使其女君主约翰娜在婚前惠予的宪章。约翰娜即将同温塞斯特拉伯爵完婚，布拉邦特人对这位新君主很不放心，因此要求颁布这个宪章。参见让·东特著《比利时史》，中译本 114 页脚注。——译者

独立国家(1790 年底)。

马扎尔人对约瑟夫的政府从一开始就抱着极大的疑虑；这个君主放弃了斯特凡皇冠加冕礼，从而伤害了他们的感情，1784 年甚至还下令把这个匈牙利国家的神圣象征送到维也纳。约瑟夫既不召开国会，也不召开郡代表会议，最后干脆取消了州郡法(Komitatsverfassung)，还进一步以德语代替拉丁文为官方语言，于是，群情激忿。在这种事态发展中，普鲁士的奸细也起了一定作用；匈牙利各阶层在这方面受到鼓动，想进行新的国王选举；在候选人中有卡尔·奥古斯特·冯·魏玛公爵，一部份通信被他的大臣歌德所否认。公爵最后拒绝了。约瑟夫皇帝于 1790 年 1 月收回他的成命，这当然不能改善国内的情绪，人们倒是把这种让步看成是软弱的象征。

这个长期患病的皇帝死于 1790 年 2 月 20 日，这时，哈布斯堡君主国内外局势都极为可悲；他的弟弟利奥波德那时还是托斯卡纳大公爵，约瑟夫留给他的是一个岌岌可危的政权。

约瑟夫主义的思想内容和改革

我们已经指出，人们喜欢贴以“约瑟夫主义”标签的那种类型的思想和改革，早在约瑟夫第二开始执政以前就已有过。各种不同的文化潮流和传统，在特蕾西亚-约瑟夫时代的奥地利汇合，总的322 来说，决定了官方的国家政治观，这一点尤其在教会政策方面明确地表现了出来，这种政策人们习惯地视为狭义的和本义上的约瑟夫主义。对于古老的、可追溯到中世纪的、邦诸侯所设立的教会监督处的回忆，以及对于保皇的、吉贝林① 传统——这传统绝非敌视

① 保皇的吉贝林传统(Kaiserlich-ghibellinische Tradition)，吉贝林指中世纪在意大利境内忠于德国王室霍恩施陶芬的保皇党人。他们与忠于教皇的古埃耳夫党人作对。——译者

宗教信仰，而是对教会，尤其是对作为政治因素的罗马上层领导，抱有戒心——的回忆总是与冉森派和费布罗派[1]的争取建立国教的活动联系在一起。对于开明专制主义的政治家——不仅在奥地利，在这里无论如何既不是首先的，也不是最坚决的——天主教教会及其所属机构，尤其是寺院的古老册封特权，不啻国中之国；人们把这种状况与简单得无可比拟的、从国家的角度来看，简直是可喜的新教全国性教会的状况相比。这个教会的教阶并不扩展到国界以外，并且相应地，也不从外国接受宗教指示。与波旁国家结盟再度使人产生那种充满嫉妒心理的、渴望得到象"法国教会那样的独立自由"的愿望，在许多措施中(例如，针对耶稣会修士)，人们遵循了法国的榜样。从西方传来的还有启蒙运动的精神，魁奈、孟德斯鸠的思想，其次，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的思想，在维也纳宫廷和中央政府里也有人准备接受。

当然，人们不可以误解，以为这种"新精神"对君主制的、保守的奥地利国体可能是危险的——约瑟夫第二在晚年里还经历过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所以，人们就想尽快达到妥协，消除这些新思想的危险性，并且尽可能使之为君主国效劳。人们没有试图取得人民或议会代表的同意；宫廷还是搞专制独裁；所有改革虽然理应为人民造福，但是人民的合作似乎是不必要的，终究会迁延时日，增添麻烦，因而要不得。颁布法律和法令的方式是那样威风，那样粗暴，使得约瑟夫派的许多有充分根据的、就其本身来说是有益的措施反而变得极其不得人心。

在行政管理方面，人们努力尽可能地精简上层机构，担任领导职务的官僚人数做到越小越好；国务顾问的人数减到四个人。尽量

---

① 费布罗派 (Febronianische)，指 Justinus Febronius 主张限制教皇权力，争取成立国教的主张，参见本书400页的脚注。——译者

推行中央集权的倾向十分清楚地表现在将波希米亚－奥地利宫廷事务处、宫廷财务处和内阁银行督办处合并为一个由最高宰相领导的联合宫廷事务处这一措施(1782 年)之中。奥地利各邦(包括加里西亚在内)的全部政治和财政机构都隶属于这个联合事务处，而伊利里亚和西本比尔根宫廷事务处则并入匈牙利的宫廷事务处。在各邦的管理机构中，人们把相邻各邦的地方政府(Gubernien)归并起来，为施蒂里亚、克恩滕和克赖因成立了一个共同的、奥地利地方政府，这样就与中世纪晚期和信仰纷争时代的联合领地(Territorialkomplexe)相衔接，与此相仿，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加利曾和布科维纳，以及沿海地带的各领地也都合并起来。人们不能断言，这些庞大的管理机构都经受了考验，人们几乎没有更加接近中央集权的奋斗目标，反而可以说，豪格维茨所创导的非匈牙利各邦的联合制度，由于新建的联合邦(Länderkomplexe)而变得松弛了。

最能说明统治者和他的近臣们的特色的，是对各种特殊地位和特权的反感，不管它们是否有历史根据，或者在其他方面可以站得住脚。那位君主既没有在匈牙利，也没有在波希米亚加冕，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不愿意要各邦传统性的宣誓效忠。在地方政府里，各等级代表保留了由两个咨询机构组成的代表机构，作为具有旧日意义的那种装饰性残余；皇家选举特派员监督地方行政官员的选举。

君主国既成为福利国家，又成为警察国家，是符合约瑟夫主义的本质的。国家应通过一个开明的政府和管理机构为它的公民的福利创造最良好的条件；为实现这个纲领起见，还要维护秩序、道德和安全。1749 年以来，一个警务处承担这些职责；1782 年，下奥地利政府总督佩尔根伯爵约瑟夫·安东建立了邦警务厅，这就

为整个警察工作的永久性组织奠定了基础。

在这方面还应谈一下书报检查。约瑟夫第二本人并不赞成对书报检查掌握得太严，可是，他那种尤其是对攻击他本人所采取的宽大为怀的态度却被人滥用了，这样，1781 年的书报检查法就规定了对印刷物，特别是对报纸，采取了严格的检查制度。诚然，书报检查各地掌握得不一致，教会高级人士对于敌视教会的刊物的泛滥曾提出过抗议。

在法律方面，约瑟夫主义可以举出一些有意义、有益处的成绩。玛丽亚·特蕾西亚时代所开创的司法和行政的分立一直在坚持着，地主的领主裁判权广泛地受到限制。这当然仅仅指德意志世袭地而言，在匈牙利和尼德兰就没有达到这种地步。在这里，人 324 们不得不放弃《普通公民法典》的实施，该法典的第一部份于 1786 年出版。在这本书中公布的婚姻法基本上与业已在 1783 年公布的婚姻特许令相符；这里对（今后仅仅在教会当局面前缔结的）婚姻作为公民契约所下的定义引起教会最猛烈的反对。玛丽亚·特蕾西亚仍以保守精神编撰的刑法典，于 1787 年以革新了的形式出版；诉讼法经过整理。约瑟夫废除了死刑（除非是按军法判决的），此外，约瑟夫主义法律却规定了严厉的监禁、劳动和惩戒处罚。

教会政策措施和法令构成约瑟夫主义立法的中心环节。正如教皇庇护六世在访问维也纳（1782 年）时所肯定的，皇帝是一个笃信的、虔诚的天主教徒，但这并不妨碍他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以及本着他那个世纪的人道主义精神，而主张实行宗教宽容的原则。他在 1781 年 10 月 31 日颁布了宽容特许令，这个法令对较大的非天主教团体，如路德派、卡尔文和希腊正教，允予在公民权利上与天主教占多数的居民平等，以及信仰自由。某些限制条款，如关于教堂建筑（不可有塔楼和钟，不可有临街的大门！），今后应保证“占统

治地位的”罗马天主教信仰享有某种优先地位。新教徒现在可以公开组织自己的教区；在今天奥地利的范围内，产生了大约五十个宽容教区，多半在后来的布尔根兰和克恩滕。1784年，奥地利宗教法庭从特申迁往维也纳，并为瑞士派[①]信徒和（在人数上多得多的）奥格斯堡派[②]而分成两个。由于这时公开奉教的新教徒人数多得惊人，1782年12月颁布法令，这法令意味着某些障碍，如由主管的天主教司铎讲授若干星期的宗教课。尽管存在着这些限制，宽容法令却标志着奥地利宗教政策的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个时代最终将导致一切被承认的宗教团体享有完全的平等权利。对于那些难以控制的教派，约瑟夫主义始终持不信任的态度，往往很严厉地对待它们。

虽然没有一个专门的法令赋予犹太人以完全的公民权平等，但是，他们仍然得到以前拒绝过的基本权利；他们被允许从事手工业、手艺、工业活动和进入高等学校学习；仍然存在着的歧视性的325 服饰规定被取消。在犹太人圈子里，对待这种办法反应不一；迫切需要解放的、人数较少而往往富有的西部世袭地上的犹太人多半欢天喜地表示欢迎，对于正教徒来说，这种新方针是可忧虑的。在基督教居民中的排犹阻力也活跃起来，我们有时候当然也听到天主教徒对于“过份容忍”新教徒所引起的焦虑。在教士当中的约瑟夫派对于宽容特许令是友好的，萨尔茨堡大主教希罗尼穆斯·科洛雷多的治理方式有很多地方可以同约瑟夫第二相比拟，他在一封已经有名的主教通谕中对宽容特许令表示欢迎。总的说来，适合时代潮流的宽容立法所遇到的反对，较之统治者的许多其他改革，

① 瑞士派（Helvetischen），流行于奥地利的一种福音改革派，创始于1536年，1562—66年大盛。——译者

② 奥格斯堡派（Anhänger der Augsburger Bekenntnisse），指拥护1530年宗教改革家路德所揭示的奥格斯堡信纲的一个教派。——译者

要少一些。

约瑟夫第二针对寺院所采取的宗教政策性行动，外表上非常动人听闻，在实行过程中也非常具有戏剧性。约瑟夫对寺院并不很友好。僧侣们，这些天分往往很高的人，作为独身者不仅对于繁殖人口不利，这是十八世纪人口论的一个被人喜爱的论题，而且，他们的天赋几乎未能为公众服务，这使政治理论家们大为不快。就这一点来说，僧侣们比世俗修士受到更多的否定性评论；广袤的"永远管业"① 地产是又一个推动力。早在玛丽亚·特蕾西亚时代，在伦巴底已有许多寺院被取缔；耶稣会的解散也可以视为先例。在这期间，处置寺院问题在约瑟夫第二看来最初并不紧迫，一个仅仅具有局部意义的事件——在维也纳附近的毛厄巴赫的一场内部争吵——才提供了广泛研究的机会，最后导致一个后果深远的决定（1781 年 11 月 29 日），即凡是不从事教育青年和医治病人、其成员仅仅过着内省生活的寺院一概予以撤销。这个措施由"宫廷宗教委员会"(Geistliche Hofkommission)来执行，该会还经管银钱收益；至少在约瑟夫主义的后半个十年里，解散往往是富裕的寺院的倾向是至为明显的。有四百多个寺院受到无情的清算，其中有几座在奥地利文化史中曾起过杰出的作用，如蒙德泽、鲍姆加滕贝格、泽考、诺伊贝格、奥西阿赫、在拉凡特谷地的圣保罗、加明、毛厄巴赫和维也纳的多罗特恩修道院。其他寺院，如克雷姆斯明斯特，差一点儿就横遭解散，至于利林费尔德，过了两年以后，它的解散才被约瑟夫的继承人利奥波德所撤销。残留的教会办事处与国外教会的联系受到最大限度的限制，寺庙的豁免权被取消。这个 326 措施，至少在形式上，对主教有利，在他们的行列中有几个人是拥

① "永远管业"(Tote Hand)，法律用语，指归法人所有而不能变卖的房地产等。——译者

护约瑟夫主义的，如莱巴赫的卡尔·赫贝尔施泰因大概就是其中最激进的分子。在维也纳，接替那个同情约瑟夫主义的特劳特森大主教的，是枢机大主教米加齐伯爵克里斯托夫·安东，他不消说是一个坚决而又顽固地反对新思想的人。约瑟夫派有一个重要的要求直接涉及到主教职权：调整主教区，设法使教会的界线与领土的界线相符。对此人们仅仅取得部份的成功。过去曾负责在奥属多瑙河地区传教的帕绍主教区，被完全取消，上奥地利划归林茨主教区，下奥地利分别划归维也纳和圣珀尔滕教区，维也纳的大主教同时还领导着新设立的、包括两个省[1]在内的教会省，而圣珀尔滕则新划入维也纳新城这个比较老的主教区。萨尔茨堡辖下的泽考、古尔克和拉凡特教区的范围大为扩大，但是，萨尔茨堡大主教的特权则未被撤销。归根结蒂，在前奥地利的领地散处各地的情况下，调整主教区的尝试是毫无希望可言的。

在一切神职人员中，最有可能从约瑟夫派那里得到同情和支援的是司铎；他的职责当然是，不仅要关心他所经管的教民对教会的忠诚，还要关心他们是否持有国家公民应有的爱国和可靠的态度。许多新教区的设立最终应归功于约瑟夫主义。任何人到教区教堂去都不应走一个钟头以上的路，因此，修造了很多新教堂，而其他多余的就被关闭或拆除。从宗教经费中还拨出款项以供国家发给世俗教士（“Kongrua”）薪俸之用，这种办法在奥地利一直维持到 1938 年。对于这些措施，教会还是可以将就的，更可虑的却是，自从 1783 年以来，由国立的总神学院负责培养新一辈的教士；人们希望这样更好地监督年轻教士的培育工作。对宗教生活的种种干涉曾在天主教居民中引起莫大的烦恼；自从反宗教改革以来，宗教游行的数目当然增加得太过份，现在大部份都被禁止，朝圣进香

① 省(Kronland)，前奥匈帝国的十九个行政区之一。——译者

受到严厉的限制，兄弟会被解散，许多节日被取消。还对宗教仪式的程序进行了干涉；宗教音乐，以及，连祭坛上的蜡烛数也成了带政治性的东西；这些措施中最令人难堪的高潮是，规定用口袋来代替棺材的法令，这个法令当然很快就中止执行。民间的各种风俗习惯也遭到官方的厌恶，从驱鬼[1]到“爬窗”[2]、遇风雨鸣钟、尖声歌唱和响鞭，都为种种离奇古怪的规定所禁止。

如果仅仅从官僚主义弊端和策略上的错误去判断约瑟夫派的思想和措施，那就是不公平的。即使不计及这些，肯定还有许多成问题的东西；希冀对生命的一切表现都进行监视和监护的愿望说明对国家使命的估计极为错误。另一方面，有许多改革非常合理，以后的时代至少在同样多的事务上可以为约瑟夫第二和他的助手辩护，或者对之予以批驳。与行政改革和国家教会措施同样有争议的是，这位统治者早在玛丽亚·特蕾西亚时期在许多方面已经着手实行的社会立法，这立法对农民特别有利，关于这一点，以后还要详谈；暂时要指出的只是，在仍然存在农奴制的邦里对农奴制的废除(1781年)，以及徭役令(1771—1789)、管理开垦和整顿地税的尝试。总的来看，这些法令都行之有效，并且同在广大地区所采取的维护国民健康的措施一样，都使这位人民皇帝约瑟夫在人们的记忆中变得更加光采夺目。 327

“约瑟夫主义”并非约瑟夫第二所创造，它尽管有过多次失败，但并不随着皇帝的逝世而结束；倒是可以说，直到哈布斯堡君主国的末年，它在许多方面形成了这个帝国思想上最活跃、政治上最感兴趣的那些阶层中大多数人的世界观的鲜明特征，约瑟夫主义

① 驱鬼(Perchtenlaufen)，巴伐利亚和奥地利的迷信：相传在圣诞后的第十二个夜晚中亡灵到处游荡。此时，由戴面具的青少年去赶鬼。——译者

② “爬窗”(“Fensterln”)，指从窗口爬人情人的卧室进行幽会。——译者

的思想财富，在千变万化之中，决定了各政党的纲领，以及基本上不关心政治的、或者至少有义务采取不偏不倚态度的高级国家官吏、军官、甚至许多教士的国家观。

新危机前夕的巩固。利奥波德第二的政府(1790—1792)

利奥波德第二在短得难以令人置信的时间里，解决了一系列棘手和危险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清理对于巩固业已动摇得厉害的国家实体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同他已故的哥哥全然相反，利奥波德在托斯卡纳统治过二十五年，政绩斐然，对于治国的实践取得了透彻的知识。他是一个巧妙的、善于冷静思考的策略家，对于可能办到的事物有着敏锐的感觉，这种敏感在他处理国内外政务中已经证实，而在教会事务方面，他在托斯卡纳时已显露出不那么有把握。利奥波德本来就受过孟德斯鸠和重农派深刻的影响，有一次，在给他的姊姊、比利时总督玛丽亚·克里斯蒂妮的一封信里，328 他表示了如下的信念：统治者的职责不仅在于为人民谋福利，还要取得人民的同意。在奥地利，利奥波德由于对他哥哥所遇到的困难，以及对法国的发展印象颇深，因而决定采取保守政策，当然已故皇帝的一切措施并未完全取消。

尽管考尼茨反对，利奥波德还是在与俄国稍稍疏远以后，对普鲁士作了让步，于 1790 年 7 月，找到了和解的途径，这途径是在赖兴巴赫协议中确定了的。在这里已经预定同土耳其签订谅解性和约，没有领土上的合并，普鲁士首相赫茨贝格不得不在牺牲奥地利利益的情况下，结束他那个雄心勃勃的、然而却有点考虑不周的扩张政策。土耳其战争由于西斯托瓦和约的签订（1791 年 8 月 2 日）而终于实际上结束。奥地利的边界只得到局部的改

善(旧奥尔肖瓦、乌纳地区和多瑙河岛屿阿达-卡勒)。在1790年年底以前，强大的奥地利部队已经开入比利时。起义者当中的派系斗争加速了这个变化，在海牙会议(1790年12月)上，奥地利在比利时的属地得到欧洲强国的保证。匈牙利心怀不满的份子，在赖兴巴赫协议签字后，不得不放弃他们所希望得到的外国援助，这时，利奥波德皇帝却争取到南塞尔维亚人；在普雷斯堡帝国会议上，经过长期谈判之后达成了协议；利奥波德接受加冕而成为匈牙利国王。官方德语被取消，各等级在立法会议上的份额确定了。

在维持和继承约瑟夫改革这个问题上，奥地利各邦走了妥协的道路。结果是在行政上放弃过份中央集权化的措施，在撤销联合宫廷事务部以后，重新将政务和财务分开。等级议会恢复了许多权利，尤其是在征税和募集兵员方面。等级议会进一步的要求则为统治者所拒绝：大多数有利于农民等级的改革——当然不是指地税和徭役的调整——以及教育的整顿仍然进行，统治者对教育是十分在行的。至于教会政策，总神学院被撤销，有些被解散了的寺院被恢复。

国内巩固工作的成功，以及外交上对普鲁士、海上强国和土耳其的妥协政策所取得的成功，当然不能掩饰那个在理论上始终与之结盟的法国的局势，由于紧张和尖锐化可能带来的后果。利奥波德对付这个国家的革命运动绝不是目标明确的。他的妹妹玛丽·安托瓦内特和他的妹夫路易十六的困境，尽管有种人间忧患，但并没有大大地影响这位君主的务实的政治态度，他憎恶感情用事地做出决定，而喜欢冷静地盘算。此外，作为对法国任何干涉的前提，首先必须克服在赖兴巴赫还没有解决的其他矛盾；在两位君主的会见以后暂时只能发表一个笼统的声明，由其他欧洲国家给予支持来援助法国王室。俄国的卡塔琳娜赞成这些计划，但是英国人

329

拒绝。在路易十六宣誓效忠宪法(肯定不是没有压力的)以后，利奥波德重又准备妥协，根本谈不上他想打仗。洛林通过阿尔杜瓦伯爵提出的建议，并没有扰乱皇帝的态度。1792 年年初，他必定已经认识到，革命还没有结束，当国王伉俪双双被捕时，他似乎倾向于采取行动。1792 年 3 月 1 日，他的暴卒不合时宜地夺走了奥地利这个政治上极为能干的统治者。盛传雅各宾派或共济会下了毒手，但是，这种揣测缺乏根据；皇帝大概死于肋膜炎。

反对革命的法国的斗争。第二次同盟战争(1792—1797)

利奥波德皇帝之死从许多方面来看都是奥地利历史中的一个重大事件：以带有奥地利特色的开明专制主义精神进行的国家改革工作已有五十年之久，虽然最初处于一个女君主统治之下，这个女君主对于启蒙运动思想感到陌生，或者始终采取了拒绝的态度。现在这个改革工作已经结束。人们不得不同保守派的阻力作斗争，但是却把国家彻底地改变了。1789 年的思想由于革命的法国的陆军的令人惊异的突击力量而得到了加强，于是人们只好同这种思想较量了；斗争围绕着是否保持君主制欧洲的旧秩序来进行，因此，奥地利的保守分子重又得势。新君主也可以列入这些人之中，虽然在弗兰茨第二(1792—1835)的政治特征中绝对少不了约瑟夫的个性特点。无庸否认，这时亲政的利奥波德的大儿子是有魄力、刚毅和冷静的责任心的，但是，就精神个性来说，他的才具就不如他的叔父和父亲；弟弟卡尔和约翰肯定在天才、想象力和易于接受新事物方面，胜过弗兰茨。弗兰茨皇帝把他以前的师傅(Ajo)弗兰茨·保拉·科罗雷多-瓦尔泽伯爵任命为国家要员（内阁大臣）。

330

统治者更换不久，法国投递过几个咄咄逼人的照会，接着，巴

黎国民议会的宣战书就送达维也纳和柏林。这个行动是吉隆特党采取的，它的政治可靠性当时在巴黎已经被人们所怀疑，因此，它想把群众的激昂情绪转移到外部敌人身上。革命军的战斗行动并未旗开得胜，对比利时边境要塞的进攻并未得手。于是，在中欧国家的宫廷里，人们颇一厢情愿地以为，久经战阵的奥普联军只要作一次军事散步就可开入巴黎；俄国和撒丁加入了这个联合，当然并未实际参战。结盟国家发表了一个愚蠢的宣言，以最严厉的报复措施相威胁，这只能增强法国人民的同仇敌忾，此外，这宣言还决定了王族的命运。在瓦尔米炮战以后，联军于 1792 年 9 月开始退却；法国人随即以强大的兵力开进比利时，由于热马普大捷(1792 年 11 月 6 日)，整个比利时遂落入他们手中。德国莱茵河左岸地区也很快丢失。面对着革命的法国，保守的欧洲显露出一种可悲的虚弱。

在法国宣战以后，英国、西班牙和荷兰还参加了反法同盟。后来战争的进程表明，同盟结构中的裂痕日益扩大。1793 年 1 月，普鲁士和俄国商定，绕开奥地利，进行第二次瓜分波兰，这时，维也纳已经开始改变方针。弗兰茨·冯·图古特这时作为“外交总指挥”已身居显要，对普鲁士深恶痛绝。在这一点上，他继续奉行考尼茨的外交方针，但是，这个功名熏心的新贵却没有那位一年以后死去的老宰相的那种大政方针。一个世纪以前，海因里希·冯·聚贝尔曾对图古特的政策进行过猛烈的攻击，这攻击并非完全中肯，它首先取决于如下的倾向：希图为第一次同盟战争期间普鲁士那种最令人讨厌的态度作辩护。1793 年春，对法战争的军情暂时出现好转，在内尔文登大捷（1793 年 3 月 17 日和 18 日）以后，奥地利人重又向比利时挺进。法国司令官迪穆里埃，不堪国民公会特派员的折磨，采取了叛国行动，投奔奥地利人。莱茵前线的形势对同 331

盟国并非不利。法兰西共和国在后方受到旺代人民大起义和南方局部暴动的威胁。这时，由于陆军部长卡诺实行“全民入伍”政策，革命的法国得以派出新军作战；奥地利人先是在瓦蒂尼（1793 年 10 月 15 日和 16 日），次年夏天在弗勒鲁斯（1794 年 6 月 26 日）被击败。比利时的要塞被放弃，图古特甚至敦促向莱茵河右岸撤退。奥地利政策以比利时换取巴伐利亚的旧计划，人们最近着手实现了，但是受到同盟国的阻挠，最后尤其是受到大不列颠的阻挠，看来似乎图古特撤出比利时的意图首先就针对这个国家。塔代乌斯·科希丘什科领导下的爱国起义被镇压下去以后，波兰问题重又变得现实起来，这时同普鲁士的关系却破裂了。这一回，奥地利和俄国一起行动；1795 年 1 月 3 日，这两个国家达成第三次瓜分波兰的协议；同时也为普鲁士适当地保留了一份。这个北德王国，由于维也纳和圣彼得堡宫廷的独立行动而感到受了侮辱一般，它单方面退出了同盟。1795 年 4 月 5 日，普鲁士同法国订立巴塞尔和约，该和约把莱茵河左岸割给了法国，那时，一场普奥战争似乎变得不可避免。连西班牙也退出战斗；荷兰作为巴达维亚共和国而成为法国的一个附庸。

在波兰范围内划定领土界限的问题终于取得一致意见；那时奥地利取得克拉科夫城周围的地区，以及沿皮利查河、魏克塞尔河和布格河、连同卢布林、霍尔姆和桑多米尔等城在内的一条叫做“西加利曾”的宽阔地带。从此，奥地利就不得不单独进行莱茵河畔的战斗，支持它的只有德国南部的一些小邦。然而，1795 年，奥地利将领武姆塞和克莱法伊特获得一些胜利；奥英俄联军的斗志暂时又高涨起来。可是，1796 年的定局却有利于法国。在德国南部战场上，卡尔大公爵挡住了法国的攻势；在维尔茨堡（8 月 24 日）和安贝格（1796 年 11 月 3 日）的战役中，儒尔当的军队被击

退；在另一支莫罗麾下的军队推进之下，巴伐利亚同法国签订了停战协定。于是，意大利就成了主要战场，在那里，拿破仑·波拿巴特的军事天才始终表现得很出色，他迫使撒丁人退出了同盟，并且几乎把奥地利人全部从伦巴底赶走。被召回意大利的武姆塞将军顽强地坚守牢固的曼图亚要塞，但是，在解围的军队先后在卡斯蒂利奥内、巴萨诺、阿尔科和里沃利遭到惨败以后，于1797年1月 332 14日向法国人投降。由于这种不幸事件以及内政上的原因，奥地利的盟国的态度开始变得没有把握，这时图古特把敌人最初试探和平的使者打发走是不合时宜的。当拿破仑的军队侵入东阿尔卑斯各邦的时候，征召有抵抗能力的居民以便抗拒敌人的工作已是太迟。拿破仑和卡尔大公爵这两位司令官于1797年4月18日签订莱奥本预备和约，随后于10月17日在乌迪内附近签订坎波福米多（而不是坎波福米奥）条约。

奥地利不得不放弃比利时和伦巴底，并同意割让莱茵河左岸。另一方面，它却获得威尼斯城和该共和国的大陆领地的大部份，此外，还有伊斯特里亚和达尔马提亚。在上意大利西部成立了两个法国的卫星国，即利古里亚共和国①和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②。罗马德意志帝国和法兰西共和国的和约留待以后的拉施塔特会议签订；人们想以奥地利的布赖斯高来补偿莫德纳公爵。

对法斗争的严酷在奥地利的内政中也产生了影响。相应地扩大了的警察缉捕隐蔽的革命同情者；1794年破获了维也纳的“雅各宾密谋”，其参加者有一部份出身于名门望族，他们不是被判死刑就是被判以严厉的监禁。教育、新闻出版、社团生活都受到严密

① Ligurische Republik，继热那亚共和国以后，于1797年在热那亚湾沿岸成立的法国附属国，1805年合并于法国。——译者

② Cisalpine Republik，拿破仑在意大利北部成立的法国附属国（1797—1802）。——译者

的监视。“公共舆论”根本谈不到，因为人人都不想招惹嫌疑。在布达佩斯，同样也发生了密谋案，它被血腥地镇压下去了。另一方面，蒂罗尔农民参加抵抗法国人入侵的斗争（1797 年 4 月 2 日的施平格斯战役），以及 1797 年募兵的成功，都说明大部份居民都有爱国心和甘愿牺牲的精神，而那个多疑而又无谋的政权似乎无法利用这种情绪来真正为国家服务。

论第二次和第三次同盟战争(1799—1805)

为了获致全面和约而在 1797 年就已召开的拉施塔特会议以 333 失败告终；法国的谈判代表把商谈拖长，并彻底地利用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的不和，还同匈牙利和波兰的不满分子联系；法国驻维也纳公使贝尔纳多特将军也采取了极为蛮横的态度。另一方面，法国的力量似乎由于拿破仑远征埃及而被削弱，分散，而英国则试图组织一个新的欧洲反法同盟。那不勒斯军队的仓促侵犯自然以彻底失败告终，法国人遂占领两个西西里王国①的大陆部份，并宣布帕特诺培②共和国成立。在莱茵前线，法国人也采取了敌对行动；他们的使节尽可能久地呆在奥地利的进军地区。1799 年 4 月 28 日，他们由于迟迟不动身而受到袭击，两个谈判代表被杀；这个事件从未充分搞清，大概是匈牙利骠骑兵干的，他们可能奉一个军事指挥部之命，收走了那些使者的文件，其中有可疑的谍报材料，并给了

① 两西西里王国（Königreich beider Sizilien）：1282 年，昂儒家族统治下的西西里分裂为两部份（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两者的正式名称均为“西西里王国”。1442 年，阿拉贡族的阿尔方斯五世统一两国，称为“两西西里王国”。1458 年又再度分裂，萨伏伊（1714 年）和西西里（1738 年）被交给哈布斯堡（1720 年），后又被交给两西西里王国，该国于 1738 年臣服于法国波旁王朝。——译者

② Parthenopäische Republik，为法国于 1799 年在意大利那不勒斯成立的共和国，寿命只有几个月。——译者

他们以"惩戒"。奥地利政府同这个"拉施塔特使节谋杀案"绝无牵连。

第二次同盟战争开始时，同盟国家十分得手。1799年3月，卡尔大公爵在德国南部奥斯特拉赫附近打败了他的宿敌儒尔当，6月，在苏黎世附近击败了另一支在马塞纳指挥下的军队。在意大利也是如此，苏沃洛夫元帅麾下的一支俄国军队支援了奥地利人，同盟的作战行动最初进行得极为顺利，在卡萨诺、在蒂顿和特雷比亚的战斗，以及诺维大会战(1799年8月15日)均以同盟国胜利告终。同盟国的政治计划和军事计划并不协调，妨碍了进一步合作，而图古特与盟友打交道的方式又显得令人忧虑，尤其是同那个动辄猜疑并易于动怒的保罗沙皇难以打交道，苏沃洛夫虽然具有无可争辩的军事才干，但是很难争取他采取协调一致的作战行动。图古特几乎毫不掩饰地想吞并已收复的皮埃蒙特地区，这就引起了纷争，而作战计划修订得又不好，使法国人得以重占军事优势。苏沃洛夫奉命率领军队进入瑞士，历尽艰辛翻越阿尔卑斯山，可是到得太迟，无法阻止另一个俄国指挥官科萨科夫在苏黎世附近的溃败；俄国军队向德国南部撤退，最后被沙皇召回；俄国于1799年退出同盟。

在这期间，拿破仑已从埃及返回，雾月18日(即1799年11月9日)政变成功使他获得首席执政官这个显赫的要职。他在意大利 334 前线的干预又一次带来转变，他攻下了米兰，虽然开始时梅拉斯率领下的奥地利人颇占优势，但由于德赛和凯勒曼两将军的及时救援(1800年6月14日)，在马伦戈决战中终于转败为胜。奥地利人撤退到明齐奥的后面，于是，意大利北部战场上战事沉寂。在德国南部，战斗继续打下去，和谈毫无结果，莫罗麾下的法国人在霍亨林登附近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1800年12月3日)，打败了在有名

无实的总司令,十八岁的约翰大公爵统率下的奥地利军队,使这支军队不得不撤出巴伐利亚,退到恩斯河后面。这时,谈判挪到洛林的吕内维尔举行,于 1801 年 2 月 9 日以缔结和约告终,条款是奥地利所能忍受的,同 1797 年的和约大同小异。割让莱茵河左岸已经确定,同样,取得威尼斯领土也被肯定了下来。莫德纳公爵获得布赖斯高和奥尔特瑙,萨尔茨堡(包括贝希特斯加登)则给予托斯卡纳公爵。德国的诸侯在莱茵河左岸的损失可以从帝国的其他地区中得到弥补。这一情况由于法国和俄国参与制订帝国议会总决议(1803 年)①而得以实现;奥地利在莱茵河左岸只丧失了一个小小的伯爵领地法尔肯施泰因,却得到了封爵主教区的领地特兰托和布里克森,它们事实上早已被认为是蒂罗尔的一部份。

这时,在维也纳中央政府里发生了一些人事变动,相应地,在外交政策上也出现了一个新趋势,这个趋势明显地决定于战争的不幸进程。路德维希·科本策尔伯爵代替了与法国和普鲁士为敌的图古特,而科洛雷多则保住了他的职位。这两个政治家从一开始就处于法国优势论的影响下,因此,开头时行事谨慎。卡尔大公爵作为新任宫廷军事委员会主席由于采取了适当的措施而加强了军队,这是应予以肯定的评价的;代替迄今的终身职的,是一种为期十年至十四年的职责。一个新的中央机构国务及会议部(Staats- und Konferenzministerium)负责协调行政管理工作;财政和审计制度也重新改组,由于战争和军备开支浩大,财政状况拮据,当然说不上真正好转。十年来的行政改革(最先为 1792 年,然后是 1794 年,最后是 1802 年)计划性不强,现在重又脱离约瑟夫统治

① 帝国议会总决议(Reichsdeputationshauptschluß)论及将莱茵河左岸割让法国,对于受损失的各邦诸侯则在莱茵河右岸给以补偿,同时,一切教会侯爵领地和慈善机关均实行世俗化,大部份直属帝国的城市下放给邦诸侯治理。——译者

十年期间的那种中央集权倾向。人们一如既往地厉行由警察和书报检查机关所实施的严格监视。

在举行吕内维尔谈判以后，人们随即着手解决法英冲突；亚眠 335 和约(1803 年)仅仅存在了一年，在战争重新爆发时，英国重又力图在大陆上动员它的盟友。这首先在俄国引起有利的反响，尤其是在拿破仑加冕成为法国人的皇帝以后，这次加冕激怒了沙皇亚历山大。维也纳宫廷的反应则不同。人们把拿破仑即帝位这件事看作是从首席执政官这个实际上超群出众的地位合乎情理地发展而来的，但也看作是对压服革命的肯定。另一方面，法国向莱茵河的进逼，以及教会封爵领地的取缔，无论在选侯团，还是在帝国诸侯会议中，都招致新教徒多数的产生；在这种情况下，哈布斯堡人当选皇帝并不是把牢的；此外，还存在着法国的优势和帝国彻底瓦解的危险性。所以，维也纳宫廷想建立一种在哈布斯堡家族内部世袭帝位的制度，这种世袭帝位至少在地位上与新建立的法国帝位相等，而且较之罗马－德意志帝位会少受威胁。科本策尔伯爵呈给弗兰茨皇帝的条陈正是本着这种精神写出来的。新的皇帝称号应行使于哈布斯堡统辖下的各个邦。1804 年 8 月 10 日，弗兰茨皇帝将采用“奥地利皇帝”称号的决定通知一个高级国家显贵的集会；次日，通过一道敕令向公众宣布，1804 年 12 月 7 日，又以庄严的形式予以宣布；对于加冕礼则未加考虑。皇帝称号不言而喻地适用于匈牙利，不过，为了不致伤害民族的和等级议员们的自尊心，人们还是声明，各邦的制度和权利不受影响。从法律上看，已采取的方针无疑是可以争论的；对各世袭邦的等级代表是否同意，从来没有征求过意见，其次，神圣罗马帝国的宪法受到了侵犯；人们回避了选帝侯和帝国议会。诚然，人们还是设法保持联系。1804 年的奥地利国徽上面仍然有一个高高在上的罗马皇冠；黑、黄(黑、

金)的国色也是帝国的国色,双鹰也起源于帝国国徽。此外，弗兰茨第二还戴着罗马-德意志皇冠。只是在战场上再次吃败仗以后，这个皇冠才失掉;于是,这个帝国的末日就已经来临。

如前所述,奥地利最初并不接受英国的结盟政策，但是，对于法国在意大利的行动又不能不加以考虑，而且在自己的阵营里还有一个主战派。当卡尔大公爵对于成功的远景却认为可疑的时候,这个主战派却终于把皇帝争取过来。1805年8月,奥地利参加了英俄同盟,这个同盟瑞典也加入了。最后,人们希望普鲁士加入。实际上,第三次同盟战争进行得非常失败。

336

在德国南部,巴登、符腾堡和巴伐利亚站到了拿破仑一边，他从布洛涅兵营很快就来到战场上，为人们始料所不及。奥地利统帅马克将军虽然穿过巴伐利亚抵达伊勒尔一线，却被拿破仑所包围,马克由于无法利用各种撤退的可能性,被迫率领着二万三千人在乌尔姆投降(1805年10月20日)。另一方面，卡尔大公爵在意大利战场卡尔迪罗附近击退了前来进攻的马塞纳军（1805年10月29--31日)，但已无济于事。卡尔的军队和约翰大公爵麾下用以保卫蒂罗尔的兵力都被抽调到多瑙河前线,但为时已晚,无法阻止拿破仑占领维也纳(1805年11月13日)和渡过多瑙河。这时，库图佐夫麾下的俄国军队在洛伊本战役告捷以后，正向摩拉维亚推进。

同盟国虽然开头失利,但局面并非绝望,人们在兵力上略优于拿破仑，而且仍可指望有更多的俄国部队和卡尔大公爵率领下的奥地利人抵达;拿破仑却远离自己的作战根据地,对冬季作战并未充分装备好。此外,还得考虑普鲁士的干涉,它由于自己的领土安斯巴赫-拜罗伊特侯国受到侵犯而深感不快,并且同俄国订有波茨坦条约。沙皇亚历山大的武功心未能满足，这促使奥地利人和俄

国人在援军尚未抵达之时，冒险进行奥斯特利茨的"三皇战役"①，这次战役于 12 月 2 日导致同盟军的惨败。

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以后，沙皇亚历山大抛弃了奥地利，返回俄国；无疑，如果采取另一种态度，奥地利是可以免于割让大片领土的；普鲁士全权代表豪格维茨与拿破仑缔结了申布龙条约，在这条约中，霍亨索伦国家割让安斯巴赫-拜罗伊特来换取法国人占领的汉诺威。于是，奥地利完全孤立，不得不在普雷斯堡接受拿破仑的苛刻条款：威尼斯、伊斯特里亚和达尔马提亚划归新成立的意大利共和国；在德国南部，残留的前奥地利地区，大部份为前哈布斯堡属地，被割让给拿破仑的德国盟友，对此当地居民极为不满；此外，巴伐利亚还获得蒂罗尔(连同福拉尔贝格、布里克森和特兰托)，另外，作为对广大得多的领土损失的微不足道的补偿，把萨尔茨堡连同贝希特斯加登一道划给奥地利。对于刚刚在萨尔茨堡立足不久 337 的菲迪南·冯·哈布斯堡-托斯卡纳大公爵，则给维尔茨堡大公国作为补偿。在执行和平条款时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枝节事件，即俄国海军在门的内哥罗匪帮支助下占据卡塔罗，使卡塔罗迟迟未能移交给法国人。

奥地利败北引起的直接后果是德国发生重大变化。在德国最后一个帝国直属教会公爵卡尔·特奥多尔·冯·达尔贝格大公爵的影响下，拿破仑曾一度想把罗马-德意志皇冠戴在自己头上，把具体体现对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统治的查理曼大帝的帝国恢复起来。由于维也纳宫廷持观望态度，这一点未能做到，因为维也纳宫廷不愿意越出普雷斯堡和约条款的范围。于是，拿破仑发起成立

① "三皇战役"(Dreikaiserschlacht)：1805 年 12 月 2 日，拿破仑在加冕一周年之日，在奥斯特利茨(Austerlitz，在今捷克斯洛伐克境内)战败奥地利和俄国军队，迫使奥地利签订普雷斯堡和约。因除拿破仑以外，尚有奥皇弗兰茨第二和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曾亲临参战，故名"三皇战役"。——译者

莱茵同盟，它的成员宣布退出帝国。在这种情况下，几经拿破仑威逼，弗兰茨第二才于 1806 年 8 月 6 日把罗马皇冠收起来，同时宣布“神圣罗马帝国”解散。

这个昔日由奥托第一行皇帝加冕礼而于 962 年成立起来的国家，早已没有任何政治或者甚至军事权威。它有时成为善意嘲弄的对象，可是在德国人思想和感情之中却根深蒂固，在一个早就被视为“世仇”的强国的最后通牒式的压力下残酷无情地被清算，是有利于德意志民族意识的激发的，较之那个古老帝国的时代，这种民族意识就显得鲜明深刻得多。这个帝国的恢复不久就成为德意志浪漫主义的神秘的向往之的。

在同年和次年(1806/1807)，在拿破仑的一次神速的、目标明确的征战以后，尽管有着为时已晚的俄国支援，普鲁士还是遭到一次惨败；后果是毁灭性的和平条约：易北河以西地区几乎尽失，军队必须大加裁减，法国驻屯军占领了最重要的要塞。拿破仑主动提出归还西里西亚，作为结盟的代价，这一建议似乎并非出自诚意，而被弗兰茨皇帝所拒绝；由于法国占据优势，不彻底消灭普鲁士，是符合奥地利和俄国的利益的。另一方面，普鲁士和俄国提出结盟的建议也被驳了回去。在蒂尔西特和约以后，奥地利终于被迫参加了拿破仑针对英国的大陆封锁；这个措施至少对本国的工业是有利的，这样优越的竞争者就无法插手进来。

338

1809 年的战争和蒂罗尔争取自由的斗争

从 1805 年 12 月起，在维也纳决定外交政策的是一个新人约翰·菲利浦·施塔迪翁伯爵。随着这个信奉天主教的施瓦本贵族和他那个意气相投的兄弟弗里德里希·洛塔尔一道出现，在哈布斯堡君主国的政府事务中呈现出一个新的特色。就出身和本人的

历史观而论，施塔迪翁在感情上同那古老的帝国关系极为密切。这时，他力图更新和加强君主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以创造条件来同拿破仑的优势相抗衡。当时西班牙人民到处如火如荼地奋起反对拿破仑蛮横干涉比利牛斯半岛的内政，这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在施塔迪翁和他那一帮人看来，毫无疑问，反法斗争在奥地利也应当成为一件全民的事情。几年来人们已经有了一个象西里西亚人弗里德里希·冯·根茨那样精明干练而又足智多谋的宣传家，他的职责在于鼓励舆论来反对拿破仑；奥地利驻巴黎公使克莱门斯·洛塔尔·梅特涅伯爵的外交才干已经经受过初步考验，他也倾向于主战派，在宫廷里代表这一派的主将是弗兰茨皇帝的第三个夫人，那个性情活泼的皇后玛丽亚·卢多维卡。约翰大公爵离施塔迪翁的思想境界也很近，他对有组织的大规模的人民武装期望甚殷。虽然陆军已经大大加强，并且有后备军的补充，卡尔大公爵还是对战争获胜的希望不大乐观。军队的情绪很高，1809年，奥地利士兵打得很勇敢。

1809年2月，在一次负责的政要会议上，决定冒战争的风险。诚然，很快就可以看出，除了英国和那个遥远的、军事上羸弱的瑞典以外，很难指望什么盟友。俄国站到拿破仑一边——当然自己有自己的目标。在这种情势下，普鲁士保守中立，尤其是那个处事谨慎的哈登贝格接替了坚决果断的施泰因男爵成为政治领导人以后。第一个奥地利作战计划预定要从波希米亚和蒂罗尔发动一个钳形攻势，其时，蒂罗尔反对失尽民心的巴伐利亚统治的暴动，在能干但又无所顾忌的约瑟夫·冯·霍尔迈尔男爵和约翰大公爵的决定性参加下，正在准备着。卡尔大公爵麾下的主力军正面越过因河向前推进，费迪南大公爵麾下较弱部队则向华沙大公国进攻，约翰大公爵麾下的较弱部队则在上意大利作战。

339 拿破仑又再次惊人神速地亲临战场，奥地利人在一系列战斗中被赶出雷根斯堡区域。不久，法国人进入上奥地利，在那里，希勒将军在埃贝尔斯贝格战役中给他们以重创，但是，随后又为他们继续推进而腾出了道路。1809年5月13日，维也纳在遭到敌人短促的轰击以后被夺占。侧翼的局势则有利一些。费迪南大公爵征服了华沙，约翰的军队在萨西尔附近击退意大利总督欧根·博阿尔内。在蒂罗尔，安德烈亚斯·霍费尔领导下的人民起义旗开得胜，战果辉煌，尽管前来支援的奥地利军队作战不利。在阿斯佩恩和埃斯林根的战役中，拿破仑的军队尚未全部渡过多瑙河之际，卡尔大公爵麾下的奥地利人使拿破仑吃了第一次败仗(5月21日和22日)。当然，这个胜利并未被充分利用。拿破仑得以调来一支可观的援军，而约翰大公爵在穿越匈牙利西部以后，在拉包附近作战失利，参加决定性的瓦格拉姆会战过迟。奥地利人寡不敌众，经过两天战斗和顽强抵抗后被击败(1809年6月5日和6日)。在茨奈姆又一次短促的战斗以后，卡尔大公爵与俄国人缔结了停战协定。弗兰茨皇帝解除了他的兄弟最高指挥权。

对取得外国援助的希望已经破灭。一个英国的登陆兵团胶着在尼德兰海岸的沼泽地带，损失惨重，在德国北部，果断的军队指挥官费迪南·冯·席尔少校和弗里德里希·威廉·冯·不伦瑞克公爵所采取的勇敢的个别行动也失败了。蒂罗尔仍然成功地抗住了优势的敌人，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决定言和。申布龙的谈判最初由梅特涅进行得相当巧妙，后来拖长了，可是，列支敦士登和布勃纳将军对外交工作并不胜任。在谈判期间，瑙姆堡青年弗里德里希·施塔普斯刺杀拿破仑未遂，此事哄动一时；这件意外事故可能有助于加速缔结和约。

1809年10月14日签字的申布龙和约的条款当然很苛刻。新

获取的萨尔茨堡、因菲特尔、乃至豪斯鲁克菲特尔的一部份都不得不让与巴伐利亚。东蒂罗尔、多瑙河以南的克恩滕地区，整个克赖因、萨瓦河以南的克罗地亚合并于前已于1805年割让的伊斯特里亚和达尔马提亚，作为法国的"伊利里亚省"。哈布斯堡君主国失去了出海的道路，此外还得付出巨额的战争赔款；陆军只好降低到十五万人的水平。 340

根据申布龙条约的要求，奥地利不得不抛弃了仍在英勇斗争着的人民；这种行事的方式和方法没有为维也纳宫廷带来任何光采。

蒂罗尔起义以惊人的迅猛之势到处蔓延。巴伐利亚的统治虽然实行了一些应予正确估计的改革（大约在财政方面），但是在邦内却被人们所深恶痛绝：蒂罗尔这个名字被勾消了，仓促的世俗化措施伤害了居民的宗教感情，居民们拒绝为巴伐利亚军队服役。巴伐利亚官员行动笨拙，举止粗暴，难以为新统治者争取到朋友。顶多只能说，因斯布鲁克的中产阶级还能够容忍蒙日拉政府的热心教化、反对传统和反对教会的倾向，而农民和大部份教士却很忿慨。此外，巴伐利亚人在制度和行政管理上的变动，使举足轻重的维也纳阶层产生合乎情理的忧虑，给他们以通过维也纳宫廷去援助起义运动的口实。约瑟夫·冯·霍尔迈尔援引了普雷斯堡条约的套语"non autrement"①，其用意仅仅是，巴伐利亚人具有与哈布斯堡人同样的权利，可以接管奥地利割让的地区；霍尔迈尔对该词这样解释：巴伐利亚人有义务"一如"哈布斯堡人那样进行统治，并由于他们的措施而违反了和约。除霍尔迈尔以外，约翰大公爵在准备起义方面也起了作用；在维也纳，帕赛尔谷"沙滩"旅馆的老板安德烈亚斯·霍费尔参与了蒂罗尔人民起义的策划。在蒂罗尔

① non autrement，法文，意为"同样"。——译者

人的领袖当中，除霍费尔以外，因河谷地的约瑟夫·施佩克巴赫和克劳森的嘉布遣会神父约阿希姆·哈斯平格尔表现得也很突出。蒂罗尔人战斗得很出色，虽然陆军中将沙斯特勒·德·古塞尔侯爵约翰·加布里尔并未如所期望地减轻他们的重压，因为沙斯特勒于1809年5月13日在韦格尔附近被巴伐利亚人击败。因斯布鲁克失守，但是，蒂罗尔人于5月25日和29日经过伊色尔山的战斗后收复该地。月底，由于霍尔迈尔的一个专擅行为，弗兰茨皇帝的一个未经充分考虑的旨意遂被蒂罗尔人所知晓；旨意的内容是，他无意签订把蒂罗尔同奥地利割裂开的和约。拿破仑在格瓦拉姆获胜以后，重又能够派遣更多的部队到蒂罗尔去，这些部队占领了因斯布鲁克和一些别的城镇。他指示他的将领们，应残酷无情地对341待居民，不过，这些命令只是部份地执行了。蒂罗尔人消息不灵通，认为敌人这样行事就是破坏停战协定。蒂罗尔人在拉德里奇附近埃萨克谷地的“萨克森狭谷”① 中歼灭了敌人一个师，在庞特拉策桥附近打垮另一个分队，经过又一次伊色尔山战斗(1809年8月13日)以后，迫使法国元帅弗兰茨·约瑟夫·勒费弗尔撤出该邦。安德烈亚斯·霍费尔成了邦司令官。10月，巴伐利亚又从北边，法国人从南边逼进蒂罗尔，最后一次伊色尔山战斗因敌占优势而打输(1809年10月21日)。法国人发出号召，答应放下武器即可赦免，可是，霍费尔由于消息互相矛盾而头脑混乱，继续抵抗了一个时期，有时还得到局部的胜利。后来，他只有逃跑一途，躲在帕赛尔谷的普凡德勒高山牧场被一个潦倒的农夫弗兰茨·拉夫尔所告发。霍费尔被俘，在曼图亚经过一场假审讯，按照拿破仑的意

① “萨克森狭谷”(Sachsenklemme)，位于施特尔青和布里克森之间。1809年8月，蒂罗尔民军(Landsturm)在这个狭谷中歼灭萨克森、图林根和巴伐利亚人的军队。——译者

旨被判死刑，于1810年2月20日被枪杀在要塞墙跟前。他的战友彼得·迈尔，“马尔河畔”酒店店主，拒绝接受向他提出来的种种借口，于同日在博岑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这两个南蒂罗人成了争取蒂罗尔自由和统一的烈士，就象在1796/97年和1809年战斗中牺牲了的大约二千五百名他在布伦内罗山口两边的同胞那样；拿破仑为了削弱蒂罗尔的抵抗力，把这个邦分割了，该邦曾在1805年整个儿地割让给巴伐利亚。南部（韦尔施蒂罗尔[①]和博岑地区）划归意大利王国，其余（包括美朗和布里克森）仍归巴伐利亚。战斗爆发后不久，拿破仑曾考虑将蒂罗尔和福拉尔贝格合并于瑞士。这个建议曾向瑞士的大行政长官汉斯·冯·赖因哈德（Altlandammann Hans von Rheinhard）提出，但是，他没有同意。

论起义的失败。法俄之间的奥地利

不管人们对政治领导和军事领导的错误有怎样的评论，1809年，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居民显示了最令人难忘的工作能力和牺牲精神。诚然，帝国的各个地区并不都以同样的方式参加抵抗；陆军相对地最大的份额由军事边区[②]来提供，自玛丽亚·特蕾西亚时代以来一向如此；对于后备军的征募，德意志阿尔卑斯和多瑙河各邦积极响应，而在波希米亚的有些地区则遇到困难；拿破仑企图以檄文和传单来煽动匈牙利和波希米亚起事，全都没有奏效，爱国主义和保皇精神仍然是维系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坚强纽带。如果人们 342
失败，那么，其原因应归咎于，当冒险作战时，施塔迪翁的政治改革

① 韦尔施蒂罗尔（Welschtirol），指前奥属蒂罗尔东部，在 Salurn 和Gardasee 之间，该地居民讲意大利语，现划归意大利，称为特兰提诺（Trentino），其首府为特兰托（Trento，德文称为 Trient）。——译者

② “军事边区”（Militärgrenze），为奥匈帝国与土耳其毗邻的一个地带，成为直属奥地利的一个省军区（militär. Kronland），以防土耳其侵袭。——译者

工作和卡尔大公爵的军事改革工作都尚未结束，并且当时又不得不独力对付法兰西帝国及其附庸。然而，失败使人们忘记了人民的业绩，自从 1809 年以来，那些一度不被重视的保守专制主义原则重又猖獗起来。奥地利外交政策的新主持人梅特涅伯爵觉得自己应当遵守这些准则。奥地利居然能够在欧洲国家之林中占有一席尚能令人满意的地位，首先当然应当归功于梅特涅的巧妙而又谨慎的外交手腕，拿破仑与奥地利皇帝的一个女儿玛丽亚·路易丝大公爵夫人的得以联婚，应视为这种外交手腕的第一个遐迩可见的成就。拿破仑既是革命的镇压者，又是革命的完成者，作为专制君主，他没有正统的灵光，由于他这种矛盾百出的地位，又由于他与比他大得多的约瑟芬·博阿尔内婚后并无嫡出子嗣的希望，这位科西嘉人就力图攀附一个古老的王朝。当彼得堡宫廷对拿破仑求婚的意图表示冷淡之时，他就转向维也纳，驻巴黎公使卡尔施瓦岑贝格伯爵从中撮合予以支持，他就向玛丽亚·路易丝求婚。1810 年 3 月 11 日，婚礼的宗教仪式在维也纳举行，卡尔大公爵充当拿破仑的代表；4 月，这仪式再次重复。1811 年 3 月 20 日王储的诞生似乎保证了拿破仑家族的未来。正当人们在维也纳希望申布龙和约条款能够有重大的缓和之际，梅特涅却首先想取得伊里利亚诸省，这些省遮断了通往阿德里亚海的道路，或者收复其中的一部份，——可是，人们打错了算盘；仅仅获得推迟支付战争赔款的期限。奥地利的财政状况依然极度拮据，人们曾想一如往昔地，用发行纸币的办法来克服支付和信贷上的困难；1810 年，流通的钞票超过十亿盾，于是显而易见，全值兑现已是不可能；1811 年 2 月 20 日的特许令规定兑现面值的五分之一，从根本上说，这意味着国家的破产。宫廷财务署长约瑟夫·瓦利斯伯爵由于币值猛跌而为人们所痛恨，他发行"维也纳币"并没有带来真正的好转，只是在拿破仑

战争结束以后，货币才得到巩固。

当拿破仑为了攻打俄国而加紧备战的时候，对于他，同奥地利 343 结盟就变得有价值和重要起来。特殊地涉及奥地利的问题，即大国在巴尔干半岛上的摩擦问题，在拿破仑大军远征俄国以前的历史中，起着一定的作用。在巴尔干，1804 年，处于土耳其统治下的塞尔维亚人，在前奥地利边防军的一个伍长乔治·彼得罗维奇(又名卡拉乔治)的领导下揭竿而起。起义最初相当成功，后来土耳其的优势逐渐发生了作用，一部份起义者就可能接受奥地利对塞尔维亚人的保护统治。但是，拿破仑阻止了奥地利的干预。于是，塞尔维亚人求助于俄国，俄国从 1806 年以来就与土耳其人作战。当俄国人取得较大的军事胜利之时，拿破仑就改变了他的态度，可是，梅特涅害怕卷进巴尔干而退缩。不过，他赞成从军事上支持拿破仑对俄国的征战行动，认为征战有胜利的可能。法国大军的南翼有卡尔·施瓦岑贝格伯爵麾下的一支三万人的奥地利兵团予以掩护，而在北部，普鲁士人也分到了类似的任务。施瓦岑贝格从一开始就很珍惜自己的军队，法国大军从莫斯科撤退时，他使他的军队免除了这场灾难。作为奥地利外交政策的主持者，梅特涅也采取了类似的审慎态度。他欣然同意与再度向前推进的俄国人缔结停战协定(1813 年 1 月 30 日)，但并未参加于 2 月底在卡利施缔结的普俄同盟，而英国，还有瑞典，却立即参加了。梅特涅的观望策略在普鲁士的史书中尤其受到奚落和批评；可是，人们必须明白，奥地利要争取时间，以建立一支较强的军队和募集一切可资利用的财力。于是，梅特涅对“阿尔卑斯同盟”的阴谋采取了行动，该盟正在策划一次新的蒂罗尔起义，作为全面反拿破仑斗争的序幕。另一个最积极参加者霍尔迈尔男爵和他的合作者阿洛伊斯·施奈德博士被捕，受株连的约翰大公爵则受警察监视。从此，有好几

年，不许大公爵到蒂罗尔去。这就是这个对待阿尔卑斯诸邦及其人民十分友善的哈布斯堡人从此转向施蒂里亚的主要原因，不久，他对施蒂里亚做了许多好事。从国家政治的观点看来，梅特涅的做法无疑是正确的：蒂罗尔的起义会使同最初保守中立的巴伐利亚的合作成为不可能，反而会使这个国家重新投入拿破仑的怀抱，344 还会使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各邦有遭受从意大利和德国南部两面夹攻的危险。

梅特涅向拿破仑和普俄同盟表示愿意进行武装的和平斡旋，但是，拿破仑并未采纳他的建议，1813 年 5 月，法国人在格罗斯格尔申和鲍岑还赢得了军事上的胜利。虽然如此，梅特涅还是说服了拿破仑同意缔结停战协定(1813 年 6 月 4 日于波伊什维茨)。在此停战期间备战继续进行。梅特涅与法国皇帝在德累斯登进行了戏剧性的谈判，意见分歧显然很大；几天后在布拉格召开的和约也没有得出结果，因为拿破仑不肯接受同盟国家的要求。同盟国要求撤销华沙大公国，波兰地区和但泽归还普鲁士，伊利里亚诸省归还奥地利，以及解散莱茵同盟。

停战期限已过，奥地利于 1813 年 8 月 11 日宣战。根茨起草了战争宣言，弗兰茨皇帝虽然对文字的草拟起了不幸的影响，但是，宣言仍然很能激动人心。这时，军队互相对峙，其实力较以往任何战斗都更为强大，同盟国在人数上略占优势，而法国军队自从远征俄国遭受重创以来，素质已经变弱。即使现在拿破仑还是不愧为一个重要的指挥官，而他的将领多半已被击败。在盟国方面，不可避免地出现联合作战上的困难；首先是在总司令的提名上。沙皇亚历山大要求最高指挥权，他的军事野心大大超过他的才干，1805 年的考验已证明他的才干是可疑的。最后，人们一致同意由久经考验的奥地利将领卡尔·施瓦岑贝格伯爵来担任，施瓦岑贝

格虽然没有非凡的统帅才能，但是，作为机智的外交官，他懂得如何应付他那个阵营中戴王冠的人物们的脾气。

奥地利军队在德国北部的主战场上活动，在俄国和普鲁士分遣部队的援助下，与施瓦岑贝格指挥的波希米亚军联合作战，布吕歇尔麾下的西里西亚军（普鲁士人、俄国人）、贝尔纳多特麾下的北方军（俄国人、普鲁士人、瑞典人）则与该军合作。拿破仑在 8 月 26 日和 27 日抗击施瓦岑贝格获胜，但他的将领们却在格罗斯贝伦和卡茨巴赫败于北方军和布吕歇尔的军队；范达梅兵团在试图切断施瓦岑贝格的后路时，在库尔姆地方被歼（8 月 29 日和 30 日），拿破仑只好撤退，在莱比锡坐待盟国的大举进攻。

莱比锡的“国际大会战”①经过几天的激战（10 月 14 日，16—18 日）以后，转而有利于同盟国军队，它们的进军是按照奥地利总参谋长拉德茨基的计划执行的。尽管如此，拿破仑还是得以向西突围，并把他的军队撤过莱茵河。巴伐利亚人于 10 月 8 日在里德条约中——保证在交还前奥属地区时相应地给予补偿——参加了同盟国一边，并试图与奥地利分遣部队一道截断法国人的退路，这个尝试以哈瑙战役（1813 年 10 月 30 日）告终。还在 1813 年年底以前，在希勒将军卓越指挥下的内奥地利② 军终于占领了伊里利亚诸省和威尼斯。　345

这时人们面临如下的必要性：远征法国，消灭拿破仑的势力。他拒绝了人们向他提出的一项极为有利的和平建议，这个建议向他保证“法国的天然边界”（莱茵河、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

① “国际大会战”(Völkerschlacht)，指 1813 年 10 月 16—19 日在莱比锡附近，俄德法三国的大会战。——译者

② 内奥地利 (Innerösterreich)，以前指奥地利的施蒂里亚、克恩滕公爵领地和格尔茨伯爵领地；现在，在蒂罗尔和福拉尔贝格，则指奥地利其余各地。参见上文 178 页的说明。——译者

梅特涅和弗兰茨皇帝倒是乐意尽可能地保护拿破仑：皇帝出于家族关系的考虑，以及梅特涅不无根据地对俄国优势的担忧，普鲁士似乎已在追随俄国，这些因素在权衡时都起着重要的作用。由于盟国统帅之间，尤其是布吕歇尔和施瓦岑贝格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1814年的远征遭受了不同的挫折。1814年2月在沙蒂荣举行了和会；在这次会议上，拿破仑驳回了关于采用1792年边界的建议；于是，盟国奋起，屡战皆捷，在奥布河上的巴尔（2月27日）、拉昂（3月9日和10日）告捷以后，又在奥布河上的阿尔西大胜（1814年3月20日和21日）。这时向巴黎挺进已势不可挡。3月31日，盟军开进法国首都。4月4日，拿破仑让位给他的儿子，但是，在这期间，法国的首要政治家塔列朗已经决定让波旁人回来，高级军官也已背弃拿破仑。所以，他只好无条件地放弃王位。

在这紧急关头，玛丽亚·路易丝大概是在第三方面影响下，久经踌躇，终于与拿破仑疏远。帕尔玛和皮亚琴察公爵领地，在十八世纪时已经常成为王朝之间交换和赔款计划的对象，作为独立的采邑赠给她和她的儿子，但是，1817年，这个男孩的王位继承权被剥夺，转交给了波旁人。他作为赖希施塔特公爵，度过了短暂的抑郁寡欢的生涯，于1832年死于维也纳。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上去世（1821年）后，玛丽亚·路易丝嫁给亚当·阿尔贝特·冯·奈佩尔格伯爵；两者的子孙后裔都得到了蒙特努沃侯爵的称号。

346　经过短时间的谈判以后，于1814年5月30日，在法国首都签订了第一个巴黎和约，法国只受了轻微的损失，甚至有些革命时期的胜利果实仍得以保留，尤其是萨伏伊。为了全面地解决欧洲问题，一致商定会议移至维也纳召开。

维也纳会议

选择奥地利首都作为欧洲空前盛大的贵族和外交集会的地点，仅仅这一点已足以说明梅特涅政策的决定性成功，虽然这个讲究多端的会议（1814年9月18日至1815年6月9日）的费用加重了奥地利预算的负担。在出席会议的戴王冠的巨头中，以沙皇亚历山大在社交和政治上最为突出，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第三往往替他当助手。梅特涅担任外交官会议的主席，根茨作为秘书辅助他。在外交强国之中，俄国由涅赛尔罗杰、施塔克尔贝格和拉苏莫夫斯基代表，英国由卡斯尔雷和威灵顿代表，普鲁士由哈登贝格和威廉·冯·洪堡代表。法国代表塔列朗表现得很果断，很机灵。根本谈不上把法国当作战败国对待，不久，在强国的危机中，它反而享受着平等的权利。有助于产生这种情况的，除塔列朗的灵活外交手腕以外，还有会议上那种全无民族仇恨的贵族气氛，首先是前盟国之间日渐明显的矛盾，这个矛盾不久就导致新阵线的建立，以奥地利、英国和法国为一方，以普鲁士和俄国为另一方，彼此互相对峙着。萨克森和波兰问题难以解决，增长了1815年初局势的尖锐化，以致一时甚至出现咄咄逼人的战争风险。妥协最后终于达成。拿破仑从厄尔巴岛返回法国的消息传来时，强国已经取得一致，在百日统治的插曲中，早在滑铁卢决战(1815年6月18日)前，会议的工作就已结束，会议结束文件于1815年6月9日签字。

奥地利的政治家相信，就涉及本国之处而言，对于结果可以满意，但，广大阶层的情绪却不那么赞同。奥地利德意志地区（以及整个德国）关心政治的人对德国问题这样解决并不十分欢迎。由于联邦宪法已拟定，这就既能够考虑到奥地利的，也能够考虑到普 347

鲁士的组织建议。在代表着三十九国的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联邦会议上，奥地利可以担任主席，不过，放弃罗马-德意志皇位一事不仅仅会伤害富有浪漫情调和怀古思旧的情绪。很明显，任何恢复这个帝位的做法都必然会使普鲁士感到极为不快。只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梅特涅才争取到霍亨索伦国家放弃已经允诺了的对整个萨克森的合并，并得以保留那个一分为二的萨克逊国家作为奥地利北部边陲的某种屏障。除了萨克森以外，还可以动员巴伐利亚和汉诺威来反对普鲁士称王称霸，梅特涅想避免使奥普关系负担过重。另一方面，一群德国贵族则劝弗兰茨出任德国皇帝，象以私人身份出席会议的施泰因男爵那样的爱国者，则强烈地要求恢复帝政，这对于这个惯于冷静考虑和唯理是从的政治家来说都算不了什么。联邦国家的宪法问题，按照明文载入联邦文件中的梅特涅意图，应以恢复前邦议会宪法的办法来解决。在反拿破仑的艰苦斗争中，也是以宪法上的许诺去动员各国人民，并使他们坚持不懈地参加的；尤其是在普鲁士，曾经以种种方式许下这种诺言。现在，人们却试图以议会机构来搪塞公众，议会机构曾经一度在中世纪后期和近代初期的国家范畴内起过极有意义的作用，可是现在已嫌不足。

奥地利外交在争取实现领土要求时，遵循一种倾向，就是砍掉难以防守的前哨，以便使君主国连成一片，尽可能完整，在地理上成为一个整体。按照古老的哈布斯堡传统，对于确保意大利阵地是很看重的。费尔特林以前归格劳宾登管辖。因增加费尔特林而扩大了幅员的伦巴底和威尼斯，作为伦巴底-威尼斯联合王国而直接合并于奥地利。在南方，在御弟费迪南第三大公爵统治下的托斯卡纳，以及在哈布斯堡-埃斯特家的弗兰茨第四统治下的莫德纳，作为哈布斯堡小国而位于奥地利地区之前。此外，还有玛丽

亚·路易丝在帕尔玛和皮亚琴察的统治。那个教会国家① 和波旁系的两西西里王国均被恢复，而拿破仑的元帅和姻亲约阿希姆·穆拉特的统治这个棘手的问题，获得了戏剧性的解决：1814 年，他身为那不勒斯国王背弃了那个科西嘉人②，次年，由于对参加维也纳会议的各强国狐疑满腹，而参加了百日冒险，这时南意大利已归属波旁王朝，穆拉特入侵失败，于 1815 年 10 月被枪决。

348

梅特涅意欲奉送意大利一个类似德意志联邦那样的宪法结构；要建立的是一个在奥地利主持下的“Lega itaica”（“意大利联邦”），可是，这个政治家没有做到违拗弗兰茨皇帝和意大利贵族的心意而贯彻自己的主张；仅仅搞成了几个军事同盟。以哈布斯堡-意大利式的治国法术去治理伦巴底-威尼斯王国及其哈布斯堡前沿地区，或者，起码不去损伤意大利人的民族意识，这大概是可以做得到的。有洞察力的军人和官吏，如贝勒加德元帅、他的后任布勃纳将军，还有米兰总督斯特拉索尔多，曾经力谏维也纳宫廷；无奈弗兰茨皇帝听不入耳。意大利各省应治得象“良好的奥地利省”那样，此时运用警察方法恰恰激怒了有教养的居民阶层，结果与所期望的适得其反。

法国的新“伊利里亚诸省”重归奥地利所有，自不待言。这些省，经过伊利里亚王国的短暂统治以后，基本上仍按旧日的省界重新划分。1816 年，梅特涅曾有过一种想法，就是在君主国的范围内建立一个南斯拉夫王国，达尔马提亚和克赖因也归属该国，不过，这一次他也向皇帝的阻力屈服了，1822 年，伊利里亚地区的大部份归还给匈牙利。在以前的几个世纪中，达尔马提亚是匈牙利

① 教会国家（Kirchenstaat），指直属教皇管辖的政治实体，以前在意大利和西西里，现仅在罗马的梵蒂冈。——译者

② Der Korsen，此处指拿破仑。——译者

和威尼斯共和国之间的纠纷之源，这时仍然作为奥地利邦联中的一个独特的共和国而留在拉古萨共和国[1]领土以内。南斯拉夫地区暂时仍然可以视为忠于皇室的堡垒，弗兰茨时代那种不彻底的解决办法只是加重了未来的负担。

在君主国东北部，1809 年割让给俄国的塔尔诺波尔县重又划归奥属行政区加利曾和洛多梅里安，同时，以克拉科夫及其紧邻地区成立了一个自由国。波兰人聚居区的大部份，其中包括 1809 年奥地利让与的西加利曾地区归属俄国，不过，对这个所谓"会议波兰"[2]还是暂时给予了广泛的自治权。

最后轮到阿尔卑斯山各邦。蒂罗尔和福拉尔贝格重新结合到奥地利乃是理所当然的，已割让的上奥地利部份又重新收复。萨349 尔茨堡的问题比较难办。唯一确定了的只是，前教会封爵领地的南部，为确保与蒂罗尔的联系而应归属奥地利。一部份与梅特涅友好的奥地利政治家主张，将萨尔茨堡城及其周围地区让给巴伐利亚。萨尔茨堡问题，由于牵涉到所有德国南部的领土问题，而与另一个问题紧紧地联系着：即布赖斯高问题。奥地利如放弃萨尔茨堡则可收回前奥地利的最重要地区布赖斯高，这与当地的民意一致。这样一来，奥地利在德国的西边陲上也就可以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人们也考虑到莱茵河西的普法尔茨。这样的德国西部属地必然会重新引起与法国的传统摩擦，此外，孤立的布赖斯高在军事上无论如何也是难以防守的。因此，施瓦岑贝格领导下的军人，以及被他们和梅特涅个人的仇敌暂时争取过去的皇帝都对此表示反对，人们就丧失了旧日前奥地利的中心环节，从而也就把帝国在

① 拉古萨共和国(Republik Ragusa)，指1403—1809 年间在拉古萨(即今南斯拉夫的杜布罗夫尼克)建立的贵族专政的共和国，与土耳共的贸易极盛。——译者

② "会议波兰"(Kongreßpolen)，指由维也纳会议 (Wiener Kongreß) 所产生的波兰。——译者

旧日的关键性地区的阵地丢掉——在联邦要塞美因茨的驻屯权除外。于是，布赖斯高划归巴登，莱茵河左岸的普法尔茨划归巴伐利亚，为此，奥地利获得萨尔茨堡邦的绝大部份，连同它的首府在内，当然，不包括萨尔察赫左岸的弗拉赫高，即所谓的“鲁佩蒂角隅”(Rupertiwinkel)，附劳芬和蒂特莫宁两城，但贝希特斯加登不在内。萨尔茨堡从1848年起由上奥地利管辖，对此当地居民一点也不满意，虽然合并于奥地利，较之归属巴伐利亚，更为可取。

人们是会赞同维也纳会议的政治家们的，他们在对待战敌方面采取了克制的态度——法国在第二个巴黎和约中，尽管在德国和比利时的边界上略有修正和割让萨伏伊，损失甚微。在会议期间有人偶然地提出，将阿尔萨斯和洛林给予奥地利，这个动议曾由帝国男爵施泰因特别提出过，并举出了历史的和王朝的证据，但，当地的居民公然表示愿意留在法国，奥地利方面对此并未认真看待。从一开始，人们就无意收复昔日的奥属尼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尼德兰就与荷兰合并而成为“尼德兰联邦”；在卢森堡，有一个强烈倾向奥地利的党，它希望恢复哈布斯堡统治，但是，希望落空了。

如果人们不得不承认，1814—15年，战胜国处置法国是有分寸的，那么，另一方面，它们的疏忽之罪却又昭然若揭；重大的问题——德国、意大利和波兰问题——基本上没有试行认真地解决。各国人民争取民主的和民族独立的努力，对于维也纳会议的主要政治家是生疏的，格格不入的，至少他们似乎并不急于考虑，因为，350 对和平的普遍渴望预示着一个时期的安宁。人们希望以保守的基督教见解来抵消1789的危险观念及其有关思想①；基督教的精神——至少在原则上应指导“神圣同盟”的政策；那个世界和平同盟，

① 指导致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法国启蒙运动哲学家们的思想，如狄德罗、伏尔泰、卢梭等人的思想。——译者

最初于1815年9月15日，作为三国条约由奥地利皇帝、沙皇和普鲁士国王予以成立，不久就有欧洲各国来参加，只有英国例外，它愿意处于局外，还有土耳其政府，它的苏丹因系非基督徒而未被允许参加。

神圣同盟的干涉政策与“梅特涅体系”

1815年以后，奥地利的外交政策完全着眼于与友好国家合作，来反对欧洲各个部份的革命运动。同沙皇的关系当然并非未受干扰，奥地利与俄国的天然矛盾已开始显露，并由于个人恩怨而有所增强。在亚琛会议(1818年)上，它们重又接近；以前，奥地利皇帝在穿越德国西部时，一路上受到莱茵地区天主教居民热情的，近乎做作似的欢迎。驻屯军从法国撤出了。那不勒斯的动乱导致特罗保会议(1820年11月)和莱巴赫会议(1821年1月)的召开，在这些会议上决定由奥地利出兵干涉，这干涉马上就获致预期的结果，这个行动，如同在皮埃蒙特地区的干涉一样，没有能使意大利人更加爱戴奥地利。另一个会议于1822年秋天在维罗那举行；它是为讨论西班牙及其殖民地的革命运动而召开的，但是，也已经开始研究希腊问题。这时，奥地利就要同英国打交道了。希腊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得到了德国舆论的热诚的钦佩，英国同俄国一样，也打算支持希腊人民的自由斗争，与此同时，梅特涅出于原则性的考虑，并且也考虑到俄国向巴尔干推进可能招致令人担心的后果，而不想触及土耳其苏丹的“合法”统治。与土耳其接壤的边界，几百年来一直是哈布斯堡政权主要关心之的，现在在奥地利外交政策的负责人看来，已经是“比海还要稳定”。可是，对方更活跃，更强大。一支英法舰队和俄国军队(1827年)的公开干涉给希腊以自由，而伦敦会议则于1830年2月予以认可。

由于德国公众和君主国的大部地区拒绝接受官方政策而引起 351 的问题，应由会议决议和政府间协定来解决。瓦特堡节，德国大学生中民主思想和民族思想的一次示威（1817 年），其次，一个激进学生对被视为俄国间谍的诗人奥古斯特·科策布埃的谋杀，成了并非不受欢迎的由头，以便于 1819 年 8 月在卡尔斯巴德举行商讨会和在那里作出“卡尔斯巴德决议”，这些决议尽管有些人反对，还是在联邦议会上被通过了。人们对“蛊惑性团体”采取了严厉的检查和制裁措施，属于这类团体的首先是体操协会和大学生协会。美茵茨中央调查委员会的任务在于追查一切颠覆性组织。1820 年的维也纳会议的最后文件同样得到联邦议会的批准。文件甚至还限制本身已嫌不足的邦议会机构的权限，而强调国君的权利，如果说，法令和禁令能够举足轻重地决定政治事件的进程，那么，人们已经把一切凡是能够做到的都做了，尤其是卡尔斯巴德决议的有效期于 1824 年还予以不定期地延长。

法国的七月革命（1830 年）为保守的欧洲体系带来了第一次深刻的突破。这个事件在奥地利引起意义重大的反响，可是，国家暴力在这里和在德国都能应付种种向外扩大的麻烦。在德国，稍晚发生了局部性的示威，如哈姆巴赫节（1832 年）和激进学生对法兰克福警察总局的盲目冲击。在亚平宁半岛发生了动乱，奥地利军队在莫德纳、帕尔马和教会国进行了干预。波兰起义经过激烈的战斗后，被俄国人镇压下去。但是，在比利时，革命获胜，从此，西欧的自由力量占了上风。另一方面，梅特涅与普鲁士、俄国与奥地利采取一致行动，力图使中欧和东欧免受革命的传染。

1830 年以后，在奥地利不满现状的情绪继续增长；在有民主和自由思想的批评家心目中，负主要罪责的应是梅特涅侯爵，此人自 1821 年以来就担任国家首相之职，这个职位自从考尼茨侯爵从

政界引退以来一直没有换过人。梅特涅(Metternich)，这个被不友好的文字游戏称之为“Fürst von Mitternacht”(“夜半侯爵”)的政治家最为人们所痛恨，“梅特涅体系”则成了形容被戴上反动帽子的政体的总称呼，海因里希·冯·斯尔比克[1]改正了传统的梅特352涅形象——并非没有遭到激烈的反对——，梅特涅的形象尤其曾受特赖奇克影响颇大；时至今日，人们大概还能看到斯尔比克描摹的主要轮廓。梅特涅认为在保守和革命之间保持平衡是不可能的，如果象在英国那样，不存在特殊的历史条件的话；因此，他把自由观念看成是矛盾重重的、不能长久站得住脚的妥协。梅特涅坚决主张实行君主政体，正统原则没有起到人们颇愿意相信的那种作用，即这位公爵的国家理论思想的中心概念所起到的作用，更不用说根据正统原则确定的有利于费迪南第一继承皇位的决定了。按照这位国家首相的意图，天主教作为精神力量应当成为现行秩序的支柱。无疑，梅特涅的影响缓和了约瑟夫时代对教会的管理制度，虽然这位国家首相并没有能贯彻政府与教会达成协议的计划(1816年)。确实，梅特涅的天主教在本质上还是十八世纪的产物，在他的第三个妻子梅拉尼·齐希-费拉里斯伯爵夫人及其神秘狂热的神父们的影响下，这才多少有些改变。在外交上，梅特涅主张搞五强政治[2]式的欧洲平衡，在德国，则主张与普鲁士实行和睦政策，他的卓越的人品能对昂西荣和维特根施泰因两大臣起决定性影响。但是，梅特涅认为，严密地组织德意志联邦是不可能的。就这位公爵的才干和作用而论，他作为外交官更受人器重，而不是他的内政措施；他自己也有类似的看法，他曾经表示过，他往

① 斯尔比克(Heinrich Srbik，1878—1951)，奥地利历史学家，1929—30年，曾任教育部部长，著有梅特涅传三卷等。——译者

② “五强政治”(Pentarchie)，尤指1815—1860年间，英国、法国、俄国、普鲁士、奥地利五大国的称霸欧洲。——译者

往领导的是欧洲，而不是奥地利。一些心存恶意的同代人曾称他为“欧洲的马车夫”。梅特涅在同他那个等级的人和戴王冠的人物周旋时，精通了待人接物的艺术，可是他却完全欠缺领导群众的才具；此外，在四十年代，这个日渐老衰的政治家的活力已明显地减退，在他公共活动的最后几年，他就再也没有什么建树。

费迪南第一与国务会议。革命前夕的各国人民

弗兰茨皇帝于1835年3月2日去世；于是，一个执拗的，并非不重要的统治者进入了坟墓。关于那位“善良的弗兰茨皇帝”的爱国传奇所刻划出来的形象，当然与实际不符。那位颇愿意把自己看成就是国家的君主，最后终于大大地损失他那暂时得来的人望。比较聪敏的观察者大概看得出，他的俨然家长似的举止不尽真实。353 遵照弗兰茨的遗愿和在梅特涅影响下作出的决定，他那个智慧平庸的大儿子费迪南大公爵，尽管人们顾虑重重，还是被确定为继承人。经过长时期的争论不休，尤其是在梅特涅和弗兰茨·安东·科洛夫拉特伯爵之间的争论，从1836年12月起，实际事务由路德维希大公爵主持下的“国务会议”来处理，作为常务委员参加会议的有那两个对手，此外还有王位继承者（统治者的弟弟）弗兰茨·卡尔大公爵，他的夫人为人热情，爱好荣誉，坚决反对梅特涅。大公爵卡尔（卒于1847年）和约翰被广泛地排除于政府之外。有时，人们还吸收几个首要大臣参加会议的讨论。皇帝几乎很少干预政事，国务会议的决定通常很快就得到皇帝的照准。这样，缺乏才智和魄力的费迪南皇帝所显示的，也许就是一个“专制”统治者的最希奇古怪的讽刺画象。

国内的行政工作，尤其是财政，首先由科洛夫拉特来指导，而外交政策，虽则是在新君主统治下，仍属梅特涅的主要工作范围。

正当土耳其政府和它那不大顺从的附庸埃及总督梅赫默德·阿里之间的冲突发展成为涉及世界政治的大事之时，奥地利伙同英国插手进来袒护土耳其，而把梅赫默德·阿里的主要支柱法国赶走。法国要求在莱茵河取得“赔偿”本来就全然无理，在德国引起了爱国主义的骚动，后来这危机终于过去。对于君主国来说，波兰的民族奋斗可能会变得更为严重，斗争的中心就在那个蕞尔城邦克拉科夫。1846年2月，在加利曾发生贵族叛乱，在奥地利军人未加干涉以前，因波兰和鲁特尼亚①农民的坚决反对而失败，这些农民害怕贵族集团的专横暴虐卷土重来，这时，奥地利在普鲁士和俄国的同意下，吞并了克拉科夫自由邦。1846年的事件在波兰民族感情中留下一根深邃的芒刺，后代不能也不愿意了解，农民宁要皇家奥地利的统治，也不要“独立”，“独立”会危及奥地利保护农民立法方面的一切成果。因为，对臣属关系的进一步限制可以保证日后加利曾的安宁。

在这个国家里，以改善广大居民阶层的物质状况来平息危害354国家的政治活动的思想似乎有取胜之望，而梅特涅用这种方法在意大利就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虽然在这里务农的居民对于民族奋斗也是冷漠的。此外，意大利国民的态度具有地区差别的特性。表现得最为强烈的是力争独立的、大多数有共和思想的伦巴底分子，较弱的是威尼斯，最差的是韦尔施蒂罗尔和滨海地区。就哈布斯堡在意大利的旁支而论，只有托斯卡纳支系，由于它的行政工作搞得很成功，而在人民中获得某种支持。

较之边缘民族的奋斗，如波兰人和意大利人，以及刚刚觉醒而获得政治自我意识的鲁特尼亚人和罗马尼亚人的奋斗，对于哈布

① 鲁特尼亚(Ruthenen)，指居住在加利曾东部、匈牙利东北部和罗马尼亚布科维纳一带的乌克兰族聚居区。——译者

斯堡君主国的存亡更为举足轻重的是捷克人和马扎尔人那里的事态发展。在波希米亚，在1848年3月以前，乡土观念还能把捷克人和德意志人团结起来，还是一个有效的力量，在贵族当中，它在更长的时间里在政治上还很有意义，除此以外，这两个民族就分道扬镳了。捷克人一向希望恢复波希米亚国家法以及中止由1627年决定（改革邦的制度）和1748年决定（共同的波希米亚-奥地利中央政府）所规定的发展，在苏台德区德意志人那里却毫无反响。泛斯拉夫主义思想，最初在文学方面较之在政治方面更易于为人们所理解，对于德意志人却毫无吸引力，反而使他们顾虑重重。捷克精神在文化上的茁壮的复兴颇受人钦佩和欢迎，那时出了一系列优秀的英才，其中的首位应推历史家弗兰茨·帕拉斯基。在斯洛伐克群众中，对捷克人的革新运动反应甚微。扬·科拉尔产生于这个民族，他是哈布斯堡君主国的斯拉夫族的重要政治诗人。在他那里决然可以同样觉察到一种明显的泛斯拉夫倾向。当然，在匈牙利各民族当中，把它们同争取马扎尔文化的努力联系起来的匈牙利国家意识还很起作用，表现得最为显著的是匈牙利德意志人。匈牙利人在1835—1840年期间争取到以马扎尔国语代替拉丁语。更为重要的是，以前仅仅由贵族和僧侣代表的政治国家现在却扩及全民族，斯特凡·塞切尼伯爵就是为此而奋斗的。不言而喻，他也坚持斯特凡王朝所属各邦的统一。

在1848年3月以前，留德维特·加伊和其他领袖所宣扬的伊里利亚主义体现了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南斯拉夫支族（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的最强烈的政治思想，这个主义利用一个非斯拉夫原始民族的名字（它在命名拿破仑帝国的伊利里亚省时已经起过作用），以求统一三个种族，如前所述，国家首相梅特涅的类似思想曾遭到弗兰茨皇帝的反对。创造一种共同的南斯拉 355

夫书面语言只是部份地获得成功，因为斯洛文尼亚语不能包括在内；后来，克罗地亚人在政治上顾虑比较大，他们害怕人数较多的信奉正教的塞尔维亚人来监管他们，面对着塞尔维亚人，正如面对着马扎尔人一样，他们只好到维也纳去寻求靠山。

在德意志奥地利阿尔卑斯和多瑙河各邦，在蜘起的资产阶级的成员中，种种自由民主的思想已广为流布，保守的“心地善良的人”在这些阶层里仅居少数，而在西部阿尔卑斯各邦，这种思想可以指望有更多的追随者。在这里流行的是一种不同于维也纳周围所流行的精神。这表现在：1837年，特别是在蒂罗尔等级议会的影响下，发生了驱逐好几百齐勒谷地[1]新教徒的事件，他们多半都投奔普鲁士的西里西亚。此外，政权对待争取革新宗教生活的天主教浪漫派团体，如同对待克勒门斯·玛丽亚·霍夫鲍尔周围的那个重要的维也纳团体一样，都极为冷淡。人们仍然从这个环境里，把弗里德里希·根茨（卒于1831年）的继任者：卡尔·恩斯特·雅尔克拉出来，充当这个政权的主要半官方的政论家。仰人鼻息的报刊当然很少引起共鸣，反之，大量外国出版物被偷运进来，并且恰恰是由于它们被查禁，而被人们热心地阅读和传播。这种说法适用于那个使用假名查尔斯·西尔斯菲尔德不久就爬上文坛的南摩拉维亚人卡尔·波斯特尔（《奥地利真相》，1828）和维克托·冯·安德里安-韦尔堡男爵（《奥地利及其未来》，两卷，1842，1847）的尖锐批评，当然也适用于一些价值低劣的小册子。这时，系统的仇恨宣传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已受抑制，因为，比较强烈的政治兴趣还没有掌握所有民众阶层，可是，这种宣传却使得在四十年代期间由于在日渐增长着的城市产业无产阶级当中社会危机

[1] Zillertal，在奥地利蒂罗尔邦，因河的一条横谷，地势开阔，盛产小麦、玉米，山坡上有森林覆盖，养牛业发达。——译者

现象趋于尖锐化而变得焦躁不安的舆论，易于为革命的创议所感染。

风暴之年

前一年的秋天，由于极度歉收而发生多起饥民滋扰事件。随后，1848年以"米兰雪茄骚动"开始以来，局势非常动荡，这是一次意大利爱国者的拒不抽烟运动，其矛头是针对奥地利国库的。在波希米亚，危机的气氛左右着一切。巴黎二月革命的消息最先在布达佩斯轰动起来，路德维希·科苏特立即要求制订一个代议制的民主宪法；在维也纳，人们也无所畏惧，在公开辩论中要求颁布"Konstitution"，也就是，一个西方模式的代议制宪法。含有类似内容的请愿书递交给了宫廷和官府。大学生表现得最为激烈，他们致宫廷的陈情表被驳回，于是决定向3月13日召开的议会请愿。巨大的人群聚集在赫伦巷的议会大厦前面，随后冲进院子和楼道里。医生阿道夫·菲施霍夫博士讲了话，科苏特的声明也宣读了。处境窘逼的议会想向宫廷呈递自己的、自然是极其谦卑而又适中有度的禀奏书。由于局势颇堪忧虑，一个工兵营接到廓清赫伦巷的命令。令人遗憾的射击令造成许多人的牺牲。于是，维也纳内城的窄街陋巷里，有如雨后春笋似地布满了街垒。在郊区，不负责任的分子放火焚烧工厂，警察所受到冲击，一些官员被粗暴地折磨。由于局面紧张起来，宫廷在大公爵约翰和弗兰茨·卡尔(人们还举出弗兰茨·卡尔的夫人索菲的名字)的影响下，试图推出一个人去做民众情绪的牺牲品。最得人心的莫过于将梅特涅撤职；人们毫不踌躇，也不讲究方式方法，就抛弃了他，这个人最后肯定是相当不幸的，不过，几十年来总是忠心耿耿地为王朝和国家效过劳。另一方面，人们对使用武力呢，还是继续让步，仍然举棋不定。

356

维也纳的市民团体成立了国民警卫队，大学生则在其中组成一个学院团。3 月 14 日，取消了书报检查，跟着就颁布新闻法。警察大臣赛德尔尼茨基伯爵约瑟夫和(也许并非完全合理)那个同样不受人喜爱的市长伊格纳茨·恰普卡也很快就遭到梅特涅的命运。牺牲者于 3 月 13 日被体面地埋葬，学院团的从军牧师安东·菲斯特教授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他是个倾向革命的教士。

维也纳的革命运动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可是不可忽视的是，除了格拉茨的几个行动以外，它在君主国的德意志地区是颇为孤立的。相反地，自从 1848 年 3 月 17 日起，在伦巴底-威尼斯发生了公开的骚动，它所取的形式很令人担忧，3 月 24 日，撒丁国王卡尔·阿尔贝特率领军队越过伦巴底边界。现在，蒂罗尔也受到威胁，357 德意志蒂罗尔人组织了蒂罗尔的防务。年事甚高的意大利战区皇家军队总司令、元帅约瑟夫·拉德茨基伯爵在圣卢西亚的反击获胜（1848 年 5 月 6 日），暂时阻止了意大利革命者的胜利，在这期间，他们曾把哈布斯堡支系的国君从其封国里赶了出去。在波希米亚，尽管有时发生过兄弟友爱的场面，捷克人和德意志人之间的矛盾仍在增长，这种矛盾妨碍了革命运动，使它终于越来越多地具有捷克民族主义的特征。匈牙利的形势更是咄咄逼人，人们暂时仍在寻求妥协，国君斯特凡·维克托大公爵任命一个以路德维希·巴蒂阿尼为首的政府，科苏特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由于他越来越明显地要把匈牙利从整个君主国中分离出去，于是发生了抵抗行动，先是在匈牙利南部以边防军官斯特拉蒂米罗维奇为首的塞尔维亚人，有魄力的司令官约瑟夫·耶拉契奇男爵领导下的克罗地亚人也拒绝服从布达佩斯政府。在斯洛伐克人和罗马尼亚当中也酝酿着事变。

在这期间，在维也纳进行了国家行政机构的改组，其意义尤其

重大，因为它经过风暴之年仍然存在下去。宫廷办事处、宫廷总务府和宫廷财务局均为部所代替，或者根本撤销，取代枢密院和国务会议的是大臣会议。梅特涅的宿敌科洛夫拉特，开始时居于领导地位，后于1848年4月引退，让位于那时的外交大臣菲格尔蒙伯爵，最初领导财政部门的卡尔·弗里德里希·屈贝克不久退休。作为极右翼的代表，现在只有陆军部长特奥多尔·贝叶-拉图尔得势。该部在向人民的革命情绪让步，还是作局部抵抗之间摇摆不定。4月25日，颁布了一部由内务大臣弗兰茨·皮勒斯多夫男爵参照比利时宪法起草出来的宪法。它只适用于非匈牙利各邦，对意大利属地并未提到。国民议会由两院组成，选入下议院需要有一定的纳税能力，上议院则由大地主的代表和由皇帝任命的议员组成。皇帝有权否决两院的决议。这些限制使人民对刚刚获得的"宪法"不满。菲格尔蒙成了仇视和攻击之的，遂于5月4日引退。这时，皮勒斯多夫继任为政府首脑，并颁布了选举法，这个选举法也不得人心。5月15日，革命的维也纳人激烈的请愿行动，在没有军事防卫的霍夫堡宫勒令宫廷收回宪法和允予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达到了目的。但是，宫廷方面也并不坐视，他们说服了皇帝秘密出走因斯布鲁克，皇帝在那里受到欢呼；在维也纳，小资产阶级显示了不满，其实，他们倒可以说是忠于皇帝的。宫廷发表了过于强硬的声明，错过了不战而胜的机会，不久，在维也纳，激进分子重又占据上风。解散学院团的尝试毫无结果，局部地区发生射击和构筑街垒。在阿道夫·菲施霍夫博士领导下，由二十个委员组成的治安委员会成了首都的真正权力机关。但是，在8月里，在维也纳的普拉特公园，资产阶级的国民警卫队和因缩减工资而奋起的工人之间发生流血冲突，此时这个机构就不管事了。7月8日，皮勒斯多夫内阁辞职，由安东·多布尔霍夫于7月19日承担组织新政府。这

358

个政府比它的前任更倾向民主，虽然主席职位和外交部委托给了梅特涅的老同事约翰·菲利浦·冯·韦森贝格男爵，但，多布尔霍夫本人仅满足于一个内务部；司法大臣亚历山大·巴赫博士是一个杰出的成员，在三月的日子里曾经是革命者的发言人，这时却变得越来越右倾。后来，制宪议会也召开了，各个民族和不同政治派别的代表参加了议会，同激进派相比，温和派在人数上占据优势。菲施霍夫提议，采用德语为谈判语言——而不是国语，这个提议为捷克人帕拉斯基和里格尔杰出地领导下的斯拉夫多数所否决，于是，民族问题立刻就显得极其尖锐。宪法讨论有徒劳无功之虞。1848 年 6 月 26 日，德意志西里西亚人汉斯·库德利希提出一个干脆取消农民依附关系的提议，讨论这才有了生气。对赔偿问题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之后，以议员约翰·冯·拉塞尔的修改文本为准的提议，才于 1848 年 7 月 7 日被通过。这样，农民就取得他们所企盼的东西，他们对革命的兴趣也就开始消失，因为继续革命可能危及他们的胜利成果。在这期间，宫廷重又迁回维也纳，王朝和整个保守的君主体系的地位比较地巩固起来，因为，拉德茨基在意大利战场上取得了新的战果，在(第一次)库斯托扎战役(1848 年 7 月 25 日)中，战胜了皮埃蒙特人，战役后米兰可望收复。在夺取了该城后不久，与撒丁缔结了停战协定(1848 年 8 月 6 日)。在这以前，阿尔弗雷德·温迪施格雷茨侯爵，经过好几天的骚乱和战斗以后，于 1848 年 6 月 15 日攻陷布拉格，这就帮助反动派在波希米亚取胜。革命者方面的错误使局势恶化，如，听任左派拉着走的议会多数拒绝向在意大利也战胜了外部敌人的军队发感谢信(1848 年 9 月 13 日)。议会的态度再也不能同维也纳的舆论取得一致，更不用说同其余的德意志奥地利了。有产的市民阶级的革命热情已经冷却下来，爱国主义情绪占了上风。格里尔帕

359

策写向拉德茨基致敬的诗(“祝您成功，我的元帅，进击吧……”)，约翰·斯特劳斯·法特作拉德茨斯进行曲。可是，蒂罗尔人却拿起武器保卫他们的故乡，以防意大利起义者的游击队前来袭击。

在匈牙利，经过初期的动荡以后，阵线开始分明。维也纳宫廷在布达佩斯政府和克罗地亚人的纷争之中，最初作出不利于司令官耶拉契奇的决定；但是，忠于皇帝的司令官和宫廷自然而然地随即联合起来反对匈牙利。1848 年 9 月中，克劳地亚人向布达佩斯进军，开头相当顺利，后来却被逼向奥地利边境。匈牙利人在宫廷中进行预谈毫无结果，乃于 9 月 18 日诉诸奥地利国会，但是，他们被主要由斯拉夫人构成的多数派所拒绝。倾向革命的维也纳居民阶层当然是同情马扎尔人的。这种态度于 1848 年 10 月 6 日引起了流血事件，那一天，大部份从上奥地利人中征来的里希特榴弹兵联队将要从维也纳向匈牙利开拔。人们想阻止军队出发，一部份军队哗变，郊区警备队和学院团干涉了正在发生的巷战，由于指挥官奥尔斯佩格优柔寡断，他们得以占了保持忠诚的军队的上风。倾向君主制的市警备队也被打垮，与此同时，在斯特凡大教堂里也流了血，宫廷军械库和陆军部受到冲击，陆军部长拉图尔伯爵被殴打。宫廷迁离该城，前往奥尔米茨；几天以后，国会也挪至摩拉维亚一个小城克雷姆西尔。同时，人们武装起来，准备攻打维也纳。温迪施格雷茨这时已是世袭邦的皇家军队总司令，他和耶拉契奇于 10 月 26 日开始炮击奥地利首都。这个首都武备不足，城防司令文策尔·梅森豪塞是一个有才华的文人，但对于军事任务却颇不胜任，辅助他的波兰将军约瑟夫·贝姆在生疏的环境里也束手无策。人们寄希望于外来的援助，但是，只得到几个格拉茨大学生和 360 一些倾向革命的林茨市民。在法兰克福保罗教堂里召开的德国国民议会派出了一个以左派代表罗伯特·布卢姆为首的代表团。10

月28日，梅森豪塞决定提出该城投降的建议，并商妥了相应的协议。但，匈牙利前来解围的军队逼近的消息传来，人们又决定继续战斗。在这期间，匈牙利人在施维哈特被耶拉契奇所击退，10月31日，温迪施格雷茨连内城也攻下了。侵入的军队犯下了许多严重的暴行。更为遗憾的是，对知名的革命拥护者迅速进行了有组织的残酷迫害。梅森豪塞和罗伯特·布卢姆具有议员身份，享有拘捕豁免权，对此军事法庭佯作不知，他们和一些新闻记者都被处决。激进的领袖大半都已逃亡。维也纳的胜利把温迪施格雷茨的威望抬升到难以估量的高度，他的姻亲费利克斯·施瓦岑贝格侯爵得以受托组阁应归功于他。施瓦岑贝格很会寻找重要的合作者，如倾向温和保守的弗兰茨·施塔迪翁(内务)，悔过的革命者亚历山大·巴赫(司法)，还有那个具有杰出才华的商业大臣、德国西部的新教徒布鲁克男爵卡尔。财政大臣克劳斯男爵菲利浦是一个优秀的专家。1848年11月27日，施瓦岑贝格口头表示忠于立宪君主制，向克雷姆西尔帝国议会递交了他的内阁名单。

但是，另一个问题的解决已趋于成熟。费迪南皇帝在太平时世已经不能胜任工作，在这个紧急关头那就更加不行，这时，他尽管办事非常诚恳，怯于使用暴力，但，始终不得不屈服于他周围那些人的强硬意志。经过长期的努力，也使用了不愉快的欺诈手段，终于劝说皇帝退位。同日，即1848年12月4日，十八岁的弗兰茨大公爵、这个弗兰茨·卡尔大公爵和维特尔斯巴赫公主索菲所生的御侄，登上了哈布斯堡的皇位，是为弗兰茨·约瑟夫第一，这就是一个漫长的统治期的开始，君主国历史的最后一段历程就在其中度过。反对革命的斗争并未结束，奥地利帝国议会还在克雷姆西尔召开，有奥地利代表参加的德国国民议会则在法兰克福保罗教堂召开；在匈牙利还发生过严重的挫折，但是，主动权却转到了保

守集团手里，它们将在十多年的时间里颇为专横地决定官方政策的方向。

人口政策、农民保护和农村经济 1740—1848

361

在十八世纪，开始发生一个工业化过程，这个过程自从中世纪初期民族大迁徙以来，比任何事件都更多地影响本大洲的移民和人口结构。工业化作为事件和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乃是有计划的经济政策措施的产物。如前所述，这些措施的开始应追溯到十七世纪。这些努力绝不仅限于促进工业。从以前的重商主义学说中渐渐地发展出一种政治经济学体系，它特别要求增殖人口。这个"人口论"在奥地利有其杰出的代表，即后来移居普鲁士的国民经济学家约翰·海因里希·戈特洛布·冯·尤斯蒂，以及奥地利高级国家官员约瑟夫·宗南菲尔斯男爵。根据他们的见解，一个宽容的政府应促进人口的移入，也应关心世居臣民的增长，因为人口的增殖可以加强国家的军力和经济力，有利于国家和全体公民的昌盛。人道主义的考虑能补充经济原则之不足，所以，工业化的促进、农业的提高、宽容的立法、人民卫生、教育改革和司法改革方面的措施都是相辅相成的。

我们先来看看农业。玛丽亚·特蕾西亚时代的保护农民立法不同于以前为务农臣民谋福利所作的努力，它取得的效果更显著，也更为直接。取缔地主征税、限制领主裁判权，以及 1751 年的特蕾西亚地籍册将农民地产和贵族地产坚决分开，这些对于农民都有显著的好处。在皇家庄园上至少已认真着手实行清偿徭役。约瑟夫第二在农民保护方面，如同在其他一切方面一样，采取了较快的速度。尽管玛丽亚·特蕾西亚比较更关心农民，但是，在 1781 年 11 月 1 日的臣民特许令颁布以后，约瑟夫第二被认为是

农民的真正保护者和朋友；他长期被人们所怀念。实际上，"农奴制"的取消首先在文策尔王朝辖下的各邦实行，这个措施也已在奥地利宣布，以便澄清法律地位。法令结束了对农民人身迁徙自由的限制，并保证他不受地主蛮横的"拆迁"之害。农民还没有自由的地产权，地主则还享有一些统治权。1789年(以1787年约瑟夫地籍册为基础的)垦殖办法本来可能是又一个进步，它规定对庄园土地和农家土地平等课税，可是，这个法令由于开始实施时遇到种种困难而被约瑟夫第二撤销了。由弗兰茨地籍官(1817年)比较准确地丈量土地以后，1848年3月以前仍沿用约瑟夫的试行办法，地产的大小和土地收获量尽可能完美地弄清，于是就可以恰如其分而不是过高地征税了。

议会方面对以前农民的劳役的症结所在渐渐有所认识，劳役是农民极不愿意从事的，于是人们特地建议对农民所憎恨的徭役予以补偿；在1848年革命爆发前，使这个计划不再能实现的，与其说是地主的阻力，不如说是官僚们的顾虑和官厅的未能洞察入微。革命带来了农民的解放，随之也带来了几百年来存在于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约束关系的解除，这些约束关系再也没有意义了。享有支配权的地主变成了单纯的大地主——他们依然保留着庄园土地，真正的保守者，如阿尔弗雷德·温迪施格雷茨，不想勉强接受这样的改变。实际上，摆脱掉利息和徭役的农民与总是支配他们的贵族之间的关系通常会变得比以前好得多，不过，贵族仍然保留以前对奴才的那种"老爷"式的威风。这种关系也表现为：在这个多瑙河君主国最后那段历史中国内阵线的形成。

对于农业具有与权利改变同样重要意义的是，逐步引进有用的经营方法，那是大约1760年以来各种"经济协会"在奥地利各邦所宣扬的。倾向进步的地主，如施瓦岑贝格、霍约斯和列支敦士登

做了一些先锋工作。这种说法首先适用于以有计划的饲养来改变存栏牲畜的质量，然后是，高产谷物品种和有目的的施肥的推广，饲料作物的广泛种植，特别是土豆栽种的普及。自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土豆越来越受欢迎，在对法战争期间终于成为不可缺少的人民食粮，此外，人们还用它来做烧酒。由于大陆封锁切断了海外的甘蔗糖，这对本国的甜菜种植有利，这种种植业发展得很快。这些进步自然不能阻止1816—1818年间(特别是1817年)的 363 连年歉收所引起粮荒，在有些地方甚至造成饥馑。在1848年3月革命以前，在阿尔布雷希特·丹尼尔·塔尔的先锋性的研究和著作的影响下，在中欧也逐渐推行轮种制，它抛弃了休耕。在较小的农庄里，三年轮种法也慢慢地实行起来，如果不是土质太劣妨碍或阻止了这种改变的话。在奥地利实现塔尔思想方面成绩卓著的，尤其应推克恩滕医生舒曼和农业著作家约翰·布格尔。没有农业的现代化(以及交通，特别是铁路的发展)，就不可能供养迅速增长的人口。由于新工业和建筑业的需要(包括造船业在内)，木材的需求激增，虽然采用了泥炭和褐煤。在较老的采矿和冶炼工业里，木材的需求已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因此，国家方面已经开始更加重视细致的森林管理和已伐地区的造林更新。

在特蕾西亚和约瑟夫时代，从德意志殖民者向匈牙利南部地区的移民，以越来越大的规模进行着，在1848年3月以前，这种殖民运动重又衰疲。一般地说，这个巨大的移民事业是在人口论的影响下进行的，但是，在1752—1757年重又发生把上奥地利新教徒驱往西本比尔根事件期间，反宗教改革倾向还是起着主要作用。这个行动组织得不好，在实施中二千六百个被驱逐出境者有三分之一以上死亡。德国南部一些较小的新教徒集团，那时自愿地从哈瑙地方和巴登迁往西本比尔根。迁往巴纳特的人就多得多。在胡

贝图斯堡和约签订以后，在枢密院顾问博里埃男爵埃吉德的倡导下，移民运动进行得很好，当时有五万多人迁往匈牙利南部，随后，在约瑟夫第二皇帝执政时的一次新移民浪潮中，又有大约二万五千人前往。那个时候，在重农主义思想影响下，当然不会首先考虑人口的繁殖，而是农业的加强和提高。大多数几乎完全是信奉天主教的移民者，如同在卡尔第六时一样，均来自帝国的西南部，在少数来自东阿尔卑斯各邦的人当中，主要有上奥地利人、施蒂里亚人和蒂罗尔人。非德意志人也再次参加了。移民的支流被导向加利曾、尤其是桑河以东的地区，以及布科维纳。在德意志世袭邦里只有局部地区安置新移民，如蒂罗尔人迁往维也纳新城的特蕾西恩菲尔德。在对法战争以后，国家机关的兴趣渐渐减退，不过，私人对移民的促进一直持续到本世纪中叶以后。

364

重商政策与工业化。商业、交通与货币问题

我们要指出，在十八世纪下半叶，手艺和工业的发展颇受官方试行领导和指引的做法所影响。对于手工业和手艺，将地方手艺(Polizeigewerbe)和商业手艺分开的1754年法令具有极重要的意义。所谓地方手艺是指其销售品能更多地满足地方上的需求的(如，屠户、面包师、酒店主、锁匠、裁缝、马车夫、制皂商等，但也包括印刷匠)，所谓商业手艺是指大批制造和出品的(如，纺织业和纺织商业、金属加工、手套匠、鞣皮匠、珠宝匠、眼镜匠、钟表匠，还有货郎、油漆匠、雕刻匠等)。地方手艺由宫廷总务府监督，商业手艺则由1762年新成立的宫廷商业参赞监督。

玛丽亚·特蕾西亚、约瑟夫及其顾问致力于排除一切从当时盛行的并非无根据的观点看来不利于经济生产的障碍。加入行会的强制规定有碍于手艺的劳动，有时甚至有碍于工业劳动。这种

规定，在玛丽亚·特蕾西亚时有所放宽，在约瑟夫第二时对于纺织工业和金属工业则被取消。有些行会禁止帮工结婚的陋规被废除，另一方面，人们想限制手工业帮工四处流动，如果流动是逾越国境的。在约瑟夫第二死后，与其他事物的发展全然相似，国家对手艺和工业的干涉减弱；在漫长而艰巨的对法战争中，人们尤其避免激怒手艺人和手工业者，他们的劳务是供给和装备军队所需要的。行会重又得势，在 1848 年 3 月以前，没有实行自由阶层所盼望的"营业自由"，这自由对于较小的手工业作坊是令人忧虑的，这种作坊受到大工业兴盛的威胁。

尽管对于资本微薄的手工业者危机已经显露，他们还是能够做出质量优越的成绩，在 1848 年 3 月以前，比德迈尔①的趣味和对技术的讲究，使各种手工业者，如家具木匠、镟工、精巧锁匠、制袋匠、手套制造者、烟斗匠、乐器制作匠、眼镜匠和吹玻璃工人都有机会各显其能。但，切勿忘记，在手艺和工业生产的技术发展中，打前锋的却是有才华的手工业者。维也纳的精密技工西蒙·普勒斯尔由于制作显微镜和望远镜，伊格纳茨·伯森德费尔则由于他的钢琴异常精工细作而获得优异的名声。两人在商业上都取得成功。当代人对重大的技术革新和发明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并非罕见。家居维也纳的裁缝约瑟夫·马德施佩格尔是库夫施泰因人，自 1815 年以来就研究出机器缝纫的原理，也得到一些人的钦佩，但却没有可能去利用他的发明。他终于在 1850 年死于贫困。 365

工业还需要许多来自技术上先进的西欧的激励，如英国、法国、莱茵区、瑞士和意大利；比利时，尤其是当它属于奥地利的时候，曾派来许多专家。另一方面，德意志人，包括德意志奥地利人

① 比德迈尔(Biedermeier)，十八世纪上半叶的一种艺术风格，注重纤巧、秀丽。——译者

在苏台德区起过先锋的作用，在发展工业的工作中，捷克人的作用微乎其微，这一情况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才逐渐改变。大企业主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在玛丽亚·特蕾西亚时代初年，有相当多的贵族开办工厂；他们同宫廷的关系，在需要官厅的经济协助之时，对于他们非常有利。后来，在弗兰茨皇帝统治下，国家退却，这时在工业家当中，中产阶级才占压倒多数。

如前所述，在十八世纪，国家的经济政策很乐意领导、调整和禁止，有时甚至试图以物资补助来促进工业化，把它引向一定的轨道，这种情况在世纪更迭以后才有所改变。弗兰茨皇帝一反他平时的见解，主张给企业主们以自由发展的可能，财务上的忧虑也由他们自理。第一个尝试，即成立商会使经济有一个正式的权益代表机构，在维也纳会议以后不久还没有取得成果；在三十年代里成立了省商务委员会，由经济界派代表参加，以供邦政府咨询。工商展览会更加具有实际意义，别的邦参照布拉格的榜样(1791年)很晚才举办(格拉茨1832年，林茨1833年，克拉根福1838年，等等)。第一个帝国博览会于1835年在维也纳举行。商会、工艺和工业协会也致力于促进经济，成绩时好时坏。

366

不成功和失败并不希罕，它们给深刻的改革以推动。西里西亚大部份沦丧，为行政的改组提供了机缘，对于玛丽亚·特蕾西亚提倡工业也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往昔那个地区是哈布斯君主国工商业最发达的省。因此，人们非弥补那个失去了的西里西亚生产基地不可。为此作出的努力首先有利于波希米亚的纺织工业，但是，对阿尔卑斯和多瑙河各邦也有利，在那里已经有一些示范工业，当然，它们多半都得为自己的生存而奋斗。除施维哈特一些旧有的下奥地利棉纺业以外，在弗里道(1752)、诺伊克滕霍夫(1765)、埃布赖希斯多夫(1773)等地又有一些新建的工厂。弗里道工厂的

创办人、祖籍阿尔萨斯的大商人约翰·弗里斯，不久就有理由被认为是奥地利巨富之一。1754年，他在维也纳郊区德布林也设立了一个天鹅绒厂，别的天鹅绒制造厂也随之产生。丝绸厂在维也纳森林的菲特尔十分发达，尤其是在维也纳郊区朔滕菲尔德。在十八世纪末以前，君主国还依靠进口，但是，在革命期间法国的竞争没有了，丝绸业感到显著的轻松。在临近1848年三月革命的那几年，丝绸工业极其繁荣，1845年在维也纳开工的丝绸工厂不下四百三十个。此外，丝织品厂在君主国的南部各省、在伦巴底、在韦尔施蒂罗尔和格尔茨，以及苏台德区也有的是。除丝绸业以外，将兴旺发达的伦巴底-威尼斯养蚕业引进奥地利多瑙河各邦的尝试，多半由于气候上的原因而归于失败。在国家的总预算中，生丝的作用要比丝绸品大得多；这种情景至少可以从三月革命以前的贸易结算中看得出来。

在福拉尔贝格有过古老的亚麻布制造业，在十八世纪下半叶时，一个重要的地方纺织工业发展了起来，主要加工棉花，搞起来的是该邦的瑞士企业主（1764年，罗尔沙赫地方的卡斯帕·德·特拉夫，在布雷根茨；1794年，阿尔萨斯的米卢兹地方的萨姆埃尔·福格尔，1825年，格拉鲁斯地方的梅尔希奥·燕妮，两人均在哈尔德）；本国的企业主约翰·约瑟夫·加纳尔、约瑟夫·安东·龙贝格和弗兰茨·马丁·黑默勒，与外国人合伙经营。家庭企业也建立起来了，后来证明是很有抵抗力的。陈旧的林茨毛料厂于1754 367 年改为国营，直到八十年代为止生产一直蒸蒸日上，后来发生了销售困难，虽然开设了奥地利第一个地毯厂，这个困难也未能克服。在最兴旺时期，为工厂做工的人不下四万，绝大部份在下奥地利各地从事家庭劳动，这个数字只有施维哈德纺织业才可以相比。1854年，传统的林茨企业停办。问题的关键在于，企业主是否能及时地

适应技术上的进步：在世纪更换时，纺织改用机器，一个英国专家约翰·桑顿慷慨地装备了波滕多夫的棉纺厂（成立于1801年）。除了织布以外，棉布的染色也有很大的意义。维也纳纺织业在设计和制造时髦布匹方面名声很好。

在三月革命以前，毛制品工业在弗斯劳和贡特拉姆斯多夫有一些生产能力强的工厂，本国的养羊业相当发达，提供了羊毛。君主国的整个经济，无论在羊毛或亚麻布制造方面，当然比不上苏台德区。虽然如此，上奥地利的亚麻布制造在就业人数和生产规模上仍然起着重要作用，对于国内外贸易具有重大意义，在1800年以后其重要性当然略减。维也纳的天鹅绒制造业发展得很好，除了弗里斯以外，在他以后，应推汉堡企业家恩格尔贝特·柯尼希（从1768年起）干得最成功。在阿尔卑斯各邦，粗呢业很发达。

在以奥地利农业为基础的工业中，由于地主提倡种植酒花，为数众多的啤酒厂得到了好处。一些大企业凌驾于其他一切之上。十八世纪末，啤酒酿造家族德雷埃尔开始发迹，那时，祖籍普富伦多夫的施瓦本农民弗兰茨·安东·德雷埃尔收买了施维哈特酿酒厂，后来他的儿子安东·德雷埃尔使用新的酸酵和发芽法制造了烈性啤酒(Lagerbier)。1838年，弗·克纳贝尔在格拉茨附近的蓬蒂加姆建立了一个大酿酒厂。

在制糖工业中，发生了从外国原料到本国原料的过渡。只要人们获得从西印度来的粗糖，人们就必然以生产精制糖为限；玛丽亚·特蕾西亚于1750年在自由港阜姆① 开设奥地利第一个炼糖厂。1785年，在奥地利开办了一个炼糖厂，设在克洛斯特新堡，后来，1791年在维也纳新城又设立了一个炼糖厂，该厂不久就十分兴旺。在维也纳也有几个制糖厂。世纪交替后几年，在大陆封锁

368

① 阜姆(Fiume)，即现在南斯拉夫的里耶卡(Rijeka)。——译者

期间(1811 年)，人们致力于枫树糖的制取。1766 年，大商人范蒂斯搞了第一个试验，不久就停止。不过，枫树糖只能满足本国需要的一个极微小的部份。反之，改用甜菜糖却是很重要的，虽然头几个工厂——圣珀尔滕(1803 年)和因策斯多夫(1810 年)——的寿命很短。在三十年代第二次开始时，人们在上、下奥地利、施蒂里亚和克恩滕开办工厂，最初的困难未能克服；然而，在迪恩克鲁特办厂却能持久。马希菲尔德成为多瑙河一带种植甜菜的主要地区。在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甜菜糖的生产就快得多，在本世纪中叶欣欣向荣的奥地利制糖业的重点从此就转移到那里。

在造纸方面，也发生了原料基础的改变。十九世纪初叶，古老的造纸坊为机械化的造纸厂所取代，从木头制造的纤维纸在生产数字上远远超过了陈旧的破布纸。由于印刷厂、办公室和官署的需要逐渐增长，对生产纸的要求越来越大。大出版商托马斯·冯·特拉特纳恩已于 1767 年在埃伯加辛格附近的弗兰岑斯塔尔(下奥地利)建立了自己的造纸坊，别的造纸坊开设在塔尔贝格、福伊茨贝格和格拉茨(施蒂里亚)，塔尔维斯(克恩滕)，小诺伊西德尔(下奥地利)。在三月革命以前，小诺伊西德尔已经被视为装备良好的造纸厂的典型。约纳坦·乌芬海默(维也纳新城)和安德烈亚斯·莱卡姆(格拉茨)的工厂也安有新式机器，生产效率很高。

在木材加工业（造纸自从植物纤维纸成功以后才可以算入其中）的范围内，家俱工业在比德迈尔文化的影响下茁壮地发展起来，在这种文化中，家俱艺术占有中心地位。除了许多细工木匠以外，还有象约瑟夫·丹豪塞尔(自 1804 年起)和米夏埃尔·托内特(自 1842 年起）那样的大企业在维也纳开办着。托内特是梅特涅从莱茵区聘请到维也纳来的，他的弯木家俱享有欧洲声誉。钢琴的制作也很重要，据首位的应推维也纳的施特赖歇尔(1794)和伯

森多费尔(1828)两公司。

冶金工业的扩大令人印象最深;的确,在这个方面,奥地利的多瑙河和阿尔卑斯各邦毫无疑问地落后于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发展。施蒂里亚和克恩滕的采矿地为钢铁工业提供矿石,采矿地的行政管理经过彻底改组,国家退了出来,约瑟夫第二取消了以前国营的粮食、木料专营区的供应系统。矿业主的自营机构,尤其是因内贝格矿业联营组织工作得的确不很令人满意。于是,铁矿石采矿企业于 1808 年重新由国家接管;从那时起,因内贝格总采矿公司实质上是一个国库经营的企业。在福尔登贝格,约翰大公爵发起成立一个车匠联营厂(Radmeisterkommunität),它办得比单个企业更合理些,不过仍处在私人手中。

369

在 1848 年 3 月以前,英国炼钢业的技术成果渐渐流入奥地利,特别是以煤代替炭火精炼的搅炼法。采矿业需用大量木头,虽然增加泥炭和褐煤的利用,但仍然很成问题,直到十九世纪中叶,人们才改烧硬煤。冶炼技术的改进,以及用辊压机代替传统的锤(首先由克恩滕南部的普雷瓦利地方的罗斯特霍恩兄弟采用),都大大提高铁加工工业的生产数字;最重要的购用户铁路、兵工工业、造桥和机器业,本身也都在不断扩大之中。这样,在普雷瓦利生产着钢轨,在维也纳生产着机车,在施太尔和费尔拉赫生产着枪炮,在维也纳、维也纳新城、诺恩基尔兴、格拉茨-安德里茨,以及在许多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工厂里生产着机器。在四十年代,贝恩多夫和特里斯廷河畔的圣法伊特的金属制品工业开始高涨。大钐镰、镰刀、钉子、针,通常仍在锻铁工场中制造;传统的上奥地利出产地的钐镰生产量很大,以输出东欧为主。在维也纳新城(建立于 1751 年)的纳德尔堡,人们试用机器做针,在 1848 年 3 月以前,金属丝辊压厂挤掉了古老的金属丝制造厂。在这个时候,用途广

泛的黄铜制品的销路很好；从事于这种制造业的，有一个设在厄德（下奥地利）的大工厂，为罗斯特霍恩家族所创办。

化学工业的发展很值得注意。这就是颜料（铅粉等）、氨、明矾、白矾的制造，那时，蜡烛和肥皂的制造也算入这个工业部门之中。1759 年，约翰・米夏埃尔・冯・赫伯特已经在克拉根福成立了一个铅粉工厂。一个法国人路易・罗贝尔在欣贝格（下奥地利）和哈来因附近的奥伯阿尔姆建立了颜料工厂。伊格纳茨·冯·米蒂斯在他开设在魏克塞尔河畔基希贝格的工厂（建立于 1797 年）里，从胆矾中制造米蒂斯绿。约翰・内波穆克・赖特霍费尔（下奥地利菲尔茨贝格人）于 1830 年前后开始制造橡胶和橡皮制品。1837 370 年，居斯塔夫・德・米利开始在维也纳制造硬脂蜡烛。米利蜡烛和也是在维也纳制造的阿波罗蜡烛都很畅销。

其他哈布斯堡各邦的工业有时在竞争，结局很不幸。多瑙河地区的玻璃制造业的命运就是如此，它往往不得不屈服于高超的波希米亚玻璃制造业，在 1797 年或 1815 年以后，还要屈服于声誉悠久的威尼斯玻璃工业；这样，在 1830 年，诺伊豪斯地方的陈旧的国营玻璃厂就被抛弃了。施蒂里亚的玻璃生产情况稍好一些。一种特殊工业，从玻璃质熔剂中制造人造宝石，是约瑟夫・施特拉塞尔在玛丽亚・特蕾西亚执政期间在维也纳开始搞起来的，可用于制作廉价的“假”饰物，这种工业风行全欧洲，在时髦的中心巴黎也不例外（“pierre de Strasser”，“施特拉塞尔宝石”）。

为了开发传统的奥地利矿业产品铁、有色金属、盐，在十九世纪煤的开采急剧上升。为燃烧目的而需用的木材应予限制，以便较廉价地利用于他处，据英国经验逐渐深入地认识煤以及特别是烟煤的大得多的燃烧值，把它们利用来产生照明用煤气的可能性——例如，1817 年以来在维也纳就有了煤气灯——凡此种种必要

性在 1848 年 3 月以前就已导致阿尔卑斯和苏台德区煤层的开发和采掘。在接近三月革命时，在铁路上已经改烧煤炭。

在受这种进程影响的奥地利各邦里，工业化导致人口结构的深刻变化。城市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大为增加，由农村地区向工业地区的流动造成了新的人口重点。人力的需求引起了较大范围的移居活动，在人民的社会结构，以及常常在人民的民族结构中，发生变本加厉的变动。

从中世纪末至十八世纪中叶，城市人口数字，除了局部的，并非举足轻重的适度增长以外，一向相当稳定。在这幅静止的图画中，维也纳当然是某种例外。在中世纪晚期，城里住着大约二万五千人，连同郊区在内，大约有两倍这么多。1754 年，在边防墙内（城区和郊区），居民人数为 175,460 人；人口的增长部份地发生在第371 二次土耳其人围城以后，那时该城从一个边陲要塞变成为一个强国的首都，但，在十七世纪时，已经可以预料人口会有较大的增加。1796 年，有维也纳人 235,098 名登过记，在对法战争期间，人口一度衰减（1810 年：224,548 个居民），但，衰减不久就克服了，在十九世纪中叶，该城居民人数为 431,147 名。在中央政府里，人们对无产阶级的壮大不无忧虑，曾致力于限制首都工业的发展，当然收效不大。以往，维也纳的新市民多半来自下奥地利，此外，来自阿尔卑斯各邦，来自前奥地利和苏台德区的移民只占较小的份额。自十九世纪初叶以来，从苏台德区，尤其是从摩拉维亚的移入者开始占上风。参加移入的，既有捷克人，也有德意志人，前者以工人居多，后者则多为中产阶级。在这个皇家的首都和京城里，人数较少但颇有影响、并往往拥有资产的民族集团有波兰人、意大利人、马扎尔人、希腊人（包括由于信仰上的原因而同他们结合的马奇顿罗马尼亚人）和亚美尼亚人。对操德语的多数人的同化作用的抵抗力

颇有差别，抵抗力最强时，民族的差异可以由宗教信仰上的差异和一个顽强的传统来补偿，如在维也纳的希腊人那种情况。在驻屯军中当然也有些外来民族的成份，在1848年3月以前，多半是来自加利曾的“可靠的”波兰人和鲁特尼亚人。犹太人始终仍然受到种种限制，特别是在获取地产和担任公职方面。他们的人数虽少，但，在维也纳城市全面发展期间，它也有所增长，维也纳也成了奥地利犹太人的中心。在这个情形中，来自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移民占绝大多数，其次才是来自匈牙利的移民。更穷困的、动荡不定的东方犹太分子暂时还没有。富有的犹太银行家和工业家，除在经济上有影响以外，在社会上也有很大的影响。

对工业化在人口史上的后果所作的探讨不能仅限于首都。其他新工业中心存在于维也纳森林的菲特尔地区，最老的大企业在维也纳新城。波滕多夫、弗斯劳、诺恩基尔兴、施维哈特、欣贝格、贡特拉姆斯多夫。在本时期末，贝恩多夫和特尔尼茨已成工业点。在维也纳森林以西，圣珀尔滕从一开始就据首位。在施蒂里亚，铁工业的生产和就业人数上升的结果，造成上施蒂里亚的莱奥本、布鲁克、克尼特尔费尔德、犹登堡、米尔楚施拉克和艾森厄茨等城镇人口激增，原属村落的地方，如多纳维茨和卡普芬贝格，当然大部份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才迅猛地发展起来。格拉茨及其周围的地点（安德里茨、格拉特科因、格拉特魏因、蓬蒂加姆）的发展是造纸、金属制品和酿酒工业所引起的。在上奥地利，工业的发展首先集中在林茨、施太尔、韦尔斯和格蒙登；除林茨外，人口增长不大。无论如何，我们不可以忽视，尽管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从事工业的人口的增长很值得注意，但是，占奥地利总人口约百分之七十左右的人仍在务农。 372

三月革命以前的工人已经不是重商主义时期那种希罕的专

家，也不是特蕾西亚时代向大纺织厂交付其产品的家庭劳动者，而是从事于越来越机械化的大批生产销售的商品的制造的无产者，这种产品的制造不需要很多的训练。除男人以外，妇女和儿童也往往在极不利、极不讲卫生的条件下劳动，劳动时间过长，多半为十四个小时。通常工资低微，只有在个别的工业里，灵巧的、高度熟练的工人才可指望优厚的报酬；他们不必受那种千篇一律、极其无聊、极其单调的劳动之苦。矿工仍有社会革命战斗精神的古老传统，以及相应的阶级觉悟，在大企业（如在煤矿里）兴起之后，他们反而受到损害。提供劳动力的人很多，因而报酬菲薄，但是，一班的劳动时间比别处都更早地需要予以限制（通常为八小时）。

1848 年以前，虽然威廉·魏特林和卡尔·马克思曾经短时间地在维也纳呆过，工人的政治运动的开端成效不大，由于屡屡发生饥馑，人们感到，在工人当中蕴藏着大批革命运动的后备军。因此，官方力图避免将工业集中在较大的城市，已如前所述。在风暴之年，工人表现很突出，不过，他们多数追随大学生的创议，在大学生当中，安东·维尔纳直截了当地被当作"工人之王"。

随着工业的发展，交通，特别是铁路，也在同时发展。没有交通的发展，原料和工业品的快速长途运输，工人们的往往从远处聚集到新、老工业中心，以及这些中心的飞速发展，都是不可能的。工厂专用线已产生了，第一条在艾森厄茨。1827—1832 年期间，敷设了主要用来向波希米亚运盐的林茨-布德魏斯马力铁路；就其本身而论，这是大陆上第一条比较大的铁路，因为是马力铁路，在建筑时，基本上已经过时，尤其是廉价修筑的线路妨碍了它后来改用蒸汽动力。按照弗兰茨·克萨韦尔·里普尔的设计，在罗特席尔德家族领导下的一个银行团，在 1836—1847 年期间，修造了费迪南皇帝北方铁路，是为第一条蒸汽动力铁路，它从维也纳起，经

过布鲁诺和北摩拉维亚-西里西亚工业区延至奥德贝格，1848年，从那里又与普鲁士铁路网相接，于是维也纳-汉堡间的直达线路也就建成了。北方铁路具有极大的经济价值，对于从摩拉维亚向维也纳的移民起了重要的作用。作为把维也纳同亚得里亚海港连接起来的南方铁路的第一段，人们于1841年兴建维也纳-格洛格尼茨段；塞默林山口暂时仍未打通，后来又兴建一段线路，从米尔楚施拉格通往格拉茨(1844年)和齐利(1846年)。在君主国的匈牙利和意大利地区，当时也已开始修路。

1829年，享有帝国及皇家特权的第一多瑙汽船航运公司成立；1834年，已经从维也纳通航到多瑙河口，河流尚未整治，航行困难自然很多。尽管如此，这家奥地利公司还是办得很成功，同外国相比，它总是居于领先地位，在本世纪中叶，它已有五十多艘汽船。的确，货运和客运的重点已经从河流，正如已经从公路，转移到铁路方面，因此，虽然有一些设计方案，运河的扩充规模依然很小。在世纪递嬗时，人们还是把维也纳新城运河建成，确实，它的经济作用还是微乎其微。

在玛丽亚·特蕾西亚时代，一度重又试办殖民事业。为奥地利效劳的荷兰航海者在迪拉果阿湾(东非)建立了一个站，在印度马拉巴尔海岸和尼科巴尔也立住了脚跟。过了十年(1775—1785)，所有的洋行和基地又都放弃了；对传统的殖民强国的顾虑对此起了很大的作用。在1848年3月以前，人们已经不再争取海外属地，但是，却逐渐地建立起一个效率很高的航运业，它从的里雅斯特、威尼斯、阜姆等船籍港开始运营。在三十年代，奥地利轮船公司开始它的活动，它主要从事于近东、印度和远东的交通业。主管当局对于赫鲁迪姆人约瑟夫·雷塞尔发明轮船螺旋推进器一事冷若冰霜，当然起过不利的影响。

374 在1848年三月革命以前，通讯事业已经发生重大的变化。自从1748年以来，已经有定期的邮车联络。1813年，帕尔伯爵在世袭邦的邮政专营业务被取缔，邮政被国家接管。这样就易于进行书信检查，在梅特涅时代，书信检查搞得很起劲，很巧妙。在长途通讯方面，军方曾参照法国的模式，进行过种种光电报① 试验。在四十年代，铁路沿线的电报网开始扩大，这个电报网当然暂时只能供国家通讯使用。

在1740—1848年期间，奥地利商业的发展，尤其是对外贸易的发展很能说明问题。理所当然地，它的发展主要取决于战争与和平的交替和君主国幅员的变动。在这方面，我们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追查那数量，因为，自从1776年起(略有中断)已经有整个君主国的贸易统计数字。奥地利经济有一个时期与1740年丧失的西里西亚，以及1772年获得的加利曾② 的朝北位置紧密相关，加利曾很快也就加入了奥地利经济区。由于上述原因，经由北海和波罗的海港口的出口贸易最初比经由的里雅斯特要来得大，尽管这个港口城市得到很大的发展，它的人口在玛丽亚·特蕾西亚时代就已增长三倍。直到三月革命前的一段时期，巴尔干贸易仍然是微小的，虽然在玛丽亚·特蕾西亚时代有过很大的增长。人们曾试图为奥地利的贸易寻找新的市场。于是，在殖民试验结束以后，于1785年建立了一个奥美贸易公司；但，对法战争和大陆封锁大大地妨碍了海外贸易和对英贸易的开展。

直至十八世纪末为止，在奥地利出口商品中，铁制品占据着领先地位，后来，由于瑞典、英国，最后还有德国西部的竞争而发生极

① 光电报(optischer Telegraph)，最初为法国人沙普(Chappe)所采用，它利用火光和太阳光的反映来传达信息，后发展为利用旗语等。——译者

② 加利曾(Galizien)，位于喀尔巴阡山脉北坡及其北面山麓地带，介于維斯拉河与普鲁特河上游之间，桑河以西属波兰，以东属苏联的乌克兰。——译者

大的衰退。早在世纪更迭之前，高度工业化的比利时的沦丧就对君主国的贸易总结算产生不利的影响，而在1815年以后，特别是威尼斯的获得和伦巴底的收复对这种景象产生有利的影响。在奥地利管理下，威尼斯港得到很大的发展。在1848年3月以前，生丝和纺织品(羊毛和丝绸制品)是最重要的出口商品，而矿产品(特别是金属)，亚麻和亚麻制品则大为减退。各个邦的贸易平衡自然是不同的，最强的是下奥地利和波希米亚的出口。匈牙利呈现一派远为不利的景象，在这里工业就是少；毫无疑问，特蕾西亚的和约瑟夫的商业机关对这个邦比对世袭邦的帮助要少，匈牙利首先被当成适合奥地利商品销售的地区，奥地利纺织品向匈牙利的出口达到向整个君主国边界以外的出口量的许多倍。同时，匈牙利还面临着关税的限制，而国内的税卡则逐渐取消。在对外方面，保护关税，甚至进口禁令(1784年，适用于各种在国内买得到的商品，如玻璃、磁器、钟表、编织物等)都可以保护奥地利工业免受竞争劲敌之害。1835年的关税条例，本着保护关税政策的精神，为较长时期创造一种稳定的局面。参加德国关税同盟一事，曾经讨论过一个时期，后来由于商业机关和经济界有顾虑而放弃了。 375

倾向于统一，这是十八世纪下半叶的改革所具有的特征。这种倾向也表现在货币政策之中。在玛丽亚·特蕾西亚统治下，1750年实行了约定货币成色比例(每1科隆马克，20盾=10塔勒)，这个比例由奥地利和巴伐利亚商定，后来大部份德意志国家都接受了(普鲁士和汉萨城市除外)；这种货币一直流通到1858年。玛丽亚·特蕾西亚塔勒币铸造得很细致，用它来支付运往奥地利的商品时，它就流入外国，特别是经由的里雅斯特和托斯卡纳的里窝那而进入东地中海各国。由于东方人看重之故，远至埃塞俄比亚和阿拉伯，它都是人们所喜爱的支付手段，能够一直流行到二十世

纪。这对于奥地利国库也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来源。

在七年战争期间，由于筹措军费的需要，1762年，人们不得不暂时发行纸币。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人们又想借助于"银行本票"(Bancozettel)来解救，但是，这次却无法按票面价兑现；如上所述，发生了贬值五分之一并且引起国家破产的事（1811年）。解放战争[1]又用纸币来维持，它的行市不断下跌。只有成立了奥地利国民银行(1816年)以后，才建立起秩序来。但是，在1815年至1848年三月革命这整个期间内，君主国的财政状况危急；国家预算经常有赤字，人们只好靠借款来维持，借款大部份由罗特希尔德家族垫付或者由它居间介绍。这个家族于1820年由所罗门·罗特希尔德建立起来的维也纳钱庄，在三月革命以前非常兴旺发达；梅特涅和他的宣传家根茨苦心维持着同那些不可缺少的资助者的联系。从长远来看，其他的银号都办得不成功；弗里斯公司于1826年垮台，盖米勒公司于1841年倒闭。

376

教育与科学

这个时期的精神生活显示出各种极不相同的世界观的、宗教的和政治的潮流的相互并存和相互递嬗，在其中又有着许多纷繁的过渡。正式的国家政策不论有时候显得多么清一色和僵硬，这些不同的潮流总是在国家政策中发生作用。在玛丽亚·特蕾西亚时代，温和的启蒙主义倾向占有显要地位。这也表现在政府及其主持教育的代表们的工作中，从这项工作中显然可以看出福利国家对

---

① 解放战争(Befreiungskrieg)，指1813—15年间，德国为争取从法国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战争，1813年，拿破仑从俄国仓皇撤退，俄军追击进入德国。德国人民奋起抵抗。1814年的春季战役，拿破仑获胜，与普鲁士达成停战协议。后来俄、普、奥、英、瑞典结成抗法同盟。秋季战役，拿破仑败北，即所谓"莱比锡国际大会战"。此后，拿破仑屡战屡败，1815年终于垮台。经过此次战争，德国解放了，但分裂仍旧。——译者

于子民们的义不容辞的关怀；与此并行不悖的是，人们常常依靠来自天主教僧侣行列中的教师，僧侣们部份地也倾向于类似的观点。

玛丽亚·特蕾西亚的政府，在教育中也宣布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在特蕾西亚统治的头十年里，发生过局部的教育创举，即耶稣会神父帕尔哈默在格拉茨和维也纳所做出的创举。后来，在教育委员会（Studienkomnission）实行自治（1760年）以后，主要的工作才搞起来。最重要的是一个初级小学的建立，它已经有普遍义务教育思想为其基础，这种思想在步调上存在着很大的地区差别，并且逐步地，先是在男孩当中，后来又在女孩当中实行起来。女皇召见修道院长伊格纳茨·费尔比格尔·冯·扎甘（普鲁士-西里西亚），他的"学校章程"对于初等教育的改组（1774年）具有指导意义。读、写、算在初级小学里教，其上则为高级小学，在那里最初规定要教授拉丁文，最后，人们建立起师范学校作为培育教师的场所；从被解散的耶稣会的财产中拨付的教育经费构成了必要的财政基础。

耶稣会办过很多中学，该会的撤销在中等教育中很引人注目。这时，虔教派在教育中居于领先地位，那个古老教会所办的中学也起过重要作用，但其中有许多所，由于约瑟夫解散寺院而蒙受影响。这样中学的数目就减少，而小学的数目在约瑟夫第二统治下却增加了。两所具有中等专科学校的开办还应追溯到玛丽亚·特蕾西亚；一度称为特蕾西亚学校，1751年该校高级班独立为特蕾西亚骑士学校，它专门培养将来担任公职的青年贵族，后来又有东方学校（1754，后改名领事学校），专门为国家驻外的代表机构培训人员。

近代教育的建设绝不是一帆风顺地发展的；非宗教宣传渗人 377
广大的居民阶层，引起教会的忧虑，已是众所周知，此外，地主反对

农村青年接受义务教育，父母中文化较低的也不赞成，他们担心田间劳动会受影响。等级议会无论如何想把小学控制在手里；这种侵犯被国家当局挡了回去。在弗兰茨时代，国家对学校的监督更为加强，精神实质当然已有改变：主要关心的是，使师生与革命思想绝缘。根据1804年，在监督学校方面，教士负有协助国家的义务；教员只能使用规定的教材。中学的水平可以说是倒退了。弗兰茨皇帝对自然科学和技术教育颇感兴趣，它对国计民生的意义至为明显；于是，1809 年，在维也纳成立了第一个实科中学，1845 年格拉茨仿效之。作为高等技术学校，维也纳工业专门学校于 1815 年成立，设备齐全。

在特蕾西亚-约瑟夫时代，大学里的教会监督为国家监督所取代。在十八世纪四十年代，玛丽亚·特蕾西亚就已经特别关心维也纳大学，人们由于大量奥地利学生流向外国的大学而感到不快和不安。这位女君主委托她的侍从医生、那个应聘从荷兰来到维也纳的格哈德·范·斯维滕拟订一个大学改革计划，在她看来，范·斯维滕是一切科学事务的标准权威，绝对可以信赖。他首先改革医学院的教育章程(1749 年 2 月 7 日特许令)，后来，另外三个学院也以类似的方式进行改造。教育督导在学院里代表国家。耶稣会被撤销以前，该会教士已逐步被从关键的教学职位中排挤掉，该会被撤销(1773 年)后，该会的教堂和图书馆被拨归大学。新教徒(1778 年)和犹太人（1782 年）均允许受教育和考取学位。在格拉茨和因斯布鲁克，情况与维也纳相似，可是，约瑟夫皇帝厉行节约，对于这些大学却是灾难性的，他把这些大学都改成公立中学，仅仅保留有限的授予博士学位之权。德语取代拉丁文而成为大学通用的教学语言。一般地说，这些学校的学术水平可以说不高，人们要培养的不是学者，而是受过专门教育的公务人员。然

而，维也纳大学的法学院，尤其是医学院，取得了明显的办学成绩：它们有一批杰出的教员，他们即使在不利的条件下也能坚持下去。

在十八世纪下半叶的法学家当中，应提到卡尔·冯·马蒂尼、安东·冯·里格尔、约瑟夫·冯·宗南费尔斯和约瑟夫·瓦伦丁·艾贝尔；他们是十分坚定的约瑟夫派，讲授的是半官方的国家学说。在对法战争期间，君主国处境极为困难，弗兰茨·蔡勒继承了马蒂尼的草稿，扩大写成巨著《普通公民法典》(ABGB)。蔡勒撰写著作时，本着启蒙运动和自然法的精神，行文有如经典著作，有力而紧凑。《普通公民法典》，从1811年起直至现今，一直是奥地利民法的基础。

"第一维也纳医学校"有象解剖学家洛伦茨·格拉塞尔、临床教师马克西米利安·施托尔和利奥波德·奥恩布鲁格尔这样优秀的人员。奥恩布鲁格尔第一个把敲击胸膛应用于诊断，前耶稣会修士马克西米利安·施托尔是一个杰出的内科医生，在维也纳居民中很受欢迎。卢卡斯·约翰·伯尔改革了接生，他早在1848年三月革命以前很久就已从事医务工作。人们还不得不指出，政府及其顾问本着启蒙运动思想的精神，在公共卫生方面作出了努力。医院、产科医院和疯人院建立了。由于那个时候奥地利卫生事业存在着独特的上下级组织机构，问题的关键在于皇家宫廷中的"普罗托梅迪库斯"("Protomedicus")，他负有广泛的代理权，但也负有最大的责任。这个职务有了格哈德·范·斯维滕，也就有了一个出类拔萃的代表，在范·斯维滕死(1772年)后被任命的安东·冯·施特克，是一个有地位的解剖学家和研究药物的开路先锋。诚然，他在医学院和附属医院担任教席时并不总是十分成功的。施特克去世(1803年)后，合格的继任人本来是1783年据约瑟夫第二的旨意而成立的维也纳综合医院院长约翰·彼得·弗兰克，一个具有欧

洲声誉的医生和优秀的组织者，他建立了隔离室和急救站，他搞的卫生制度堪称模范，后来为欧洲其他国家所模仿。这个坦率无隐的学者并不符合弗兰茨皇帝的心意，他宁愿选择约翰·安德烈亚斯·施蒂夫特。施蒂夫特的态度确实反动，后来在1848年三月革命以前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此外，尽管为人民的健康作了值得表扬的努力，情况仍然很难令人满意，儿童的夭折夺走了大部份新379 生婴儿的生命，产后热在母亲当中索取了极高的代价。三十年代初期，霍乱流行，1814年为了抑制在土耳其欧洲部份猖獗为害的鼠疫传染病而沿军事边境建立起来的防疫带，也被霍乱所逾越，在维也纳居民中造成相当重大的损失。另一方面，奥地利多次试用过别的免疫法，早在世纪更替之前就采用了琴纳氏天花接种法，于是，这种危险的病就大为退缩。在费迪南时代，第二维也纳医学校的老教员就开始工作，后来在弗兰茨-约瑟夫时代获得出色的进展。1834年，卡尔·罗基坦斯基作为解剖学教授开始他的活动，1846年，约瑟夫·斯科达接受了附属医院的领导工作。

国家的外在困难消除以后，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后，奥地利大学的学术水平仍继续下降，这是耐人寻味的。国家更多地注意对政治上不可靠的大学生和教授的监督，而不是关心科学的促进，——理工学科除外。对于凡不按规定好了的、往往是老掉牙的教科书讲课的，或者由于世界观上的表现而不受欢迎的学者，采取了不愉快的措施。成为牺牲品的，有神学者贝恩哈德·博尔扎诺（布拉格）、宗教学家文岑茨·魏因特里特、哲学家利奥波德·伦博尔德（维也纳）、史学家尤利乌斯·施内勒尔（格拉茨），甚至还有维也纳的妇科学家卢卡斯·伯尔。胆小怕事而与外国隔绝，尤其是与黑黄色界桩那边的德语地区兴旺发达的科学和繁荣昌盛的文学相隔绝，产生了极其令人痛心的影响。最重要的科学成果产生于被严

密监视的学术园地的另一边，绝非偶然。

从特蕾西亚时代起至1848年三月革命前夕，在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中从事科学研究的官员，以及一些经院学者，同历史研究领域中的大学教师相比，明显地占据优势。一如既往，大部份工作都是从事史料的整理。学问渊博的维也纳虔教派教士阿德里尼·劳赫出版了“Rerum Austriacarum Scriptores”(《奥地利史学家》)三卷(1793年)，格拉茨的耶稣会教士埃拉斯穆斯·弗勒利希搜集了两卷施蒂里亚原始文件(1757年)。马夸特·赫尔戈特从巴罗克时代一直突出地延续至晚近的形象已经阐述过。生于维也纳的国务院顾问弗兰茨·费迪南·施勒特尔曾经颇为成功地尝试过研究工作和从事写作；他的《奥地利国家法大纲》(1775年)和未完成稿《奥地利史》(1779年)证明了施勒特尔的批判精神，他应被视为奥地利国家法的创始人。奥古斯丁寺僧侣阿揆略·朱理亚·凯撒发表了三卷集的“Annales ducatus Styriae”(《施蒂里亚诸将传》1768—1779)，第四卷成为检查机关的牺牲品。他也写过教会法和教会史方面的论文。杰出的档案馆长和法学研究者约翰·弗兰茨·塔德乌斯·克莱迈恩写过一本很有学术价值的萨尔茨堡古代史著作，即《尤瓦维亚地区及城市概况报告》(1784年)。约翰·尼古劳斯·福格尔和利奥波德·格鲁贝尔的奥地利历史书目学(《德奥图书馆样本》三卷，1779—1785)可以视为一项重大的成就，它的赞助者是约瑟夫·文特·冯·文滕塔尔。格雷戈尔·格鲁贝尔，与刚才提到的利奥波德·格鲁贝尔一样，也是虔教派教士，研究原始文献十分擅长，这一点同在他以前的前耶稣会教士约瑟夫·贝内迪克特·海伦巴赫相似，海伦巴赫的著作只有一小部份付印出版。另一个前耶稣会教士、生于下奥地利的恩岑斯菲尔德的约瑟夫·希拉里乌斯·埃克黑尔，作为皇家钱币陈列所所长，撰写了 380

八卷的《古钱币学》(1792—1798),可以认为,该部著作是近代科学的钱币学的主要基础。

寺院撰写历史的传统以圣弗洛里安修道院为最优秀的代表。寺僧弗兰茨·库尔茨撰写《奥地利恩斯河上游之邦历史论文集》(1805—1809),有系统地利用了文献和案卷,同样,他在写中世纪哈布斯堡家的传记时,特别注重原始材料。在他以后,人们才真正懂得档案作为未付印史料汇集处的价值。在圣弗洛里安本着库尔茨的宗旨从事研究的,有福拉尔贝格人约多克·施蒂尔茨,他后来做到修道院院长,以及德意志摩拉维亚人约瑟夫·赫梅尔,一个不知疲倦的搜集者,他的成绩通常只是被善意地贬低,实际上应当受到赞赏。1834 年,赫梅尔奉命到"皇族、宫廷及国家档案馆"任职,不久就发表了许多论中世纪后期历史的佳作。约瑟夫·霍尔迈尔男爵因参加阿尔卑斯同盟事件(1812 年)被判处要塞监禁获免后,担任"皇族、宫廷及国家档案馆"馆长,工作热心。霍尔迈尔写了不少著作,其中有一本维也纳史(九卷,1823—1825 年),《奥地利的普鲁塔克[①]传记集》(20 部,1807—1814 年),一些史地专业杂志的出版也应归功于他。后来,霍尔迈尔为巴伐利亚效劳(1828 年),诽谤他的祖国和他以前的雇主,令人极为痛心。爱德华·玛丽亚·利希诺夫斯基侯爵撰写了一部八卷本的哈布斯堡家族史(1836—1844),这部历史还补充了恩斯特·比尔克时至今日仍然可用的文献目录。它一直论述到弗里德里希第三执政末期,可以说代表旧式由国君撰写的历史。上述研究者和著者所创作的东西,尽管很有成绩并且能为未来指示方向——如埃克海尔和库尔茨,当然还

381

① 普鲁塔克(Plutarch)本为希腊历史学家,著有《传记集》,此处比喻为奥地利传记作家。——译者

是不能够同尼布尔[1]或兰克[2]的著作等量齐观，相提并论。施蒂里亚人约瑟夫·哈默尔·普尔格斯塔尔男爵作为杰出的东方学家得到欧洲真正的好评，尤其是他的《奥斯曼帝国史》（第2版，1835年，4卷）和他的文学史著作和译作。哈默尔也为枢机主教克勒斯尔写了一本洋洋大观的传记（4卷，1847—1851）。后来在雅典和斯坦布尔从事外交工作的安东·普鲁克施-奥斯滕伯爵对东地中海地区的风土和希腊争取自由的斗争所作的叙述，以及目光敏锐、受过高等教育，也在新闻界工作过的南蒂罗尔人雅各布·法尔默赖尔的《东方杂记》（2卷，1845年），两者材料都不那么丰富，但写得很精彩。

在君主国的各个领地，地方志研究组织纷纷建立，在施蒂里亚，1811年由于约翰大公爵倡议，而成立了约阿内姆邦立博物馆（1811年）和它的读书会，后来又成立内奥地利历史协会（1843年）；这位大公爵及其志同道合者的倡议，对其他各邦也产生了有益的影响。1823年，在因斯布鲁克出现了费迪南博物馆，1811年，《卡林西亚》"[3]杂志开始在克拉根福出版，它是历史最久，至今仍然存在的地理杂志。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在三月革命前，科学的乡土思想的高涨已经颇引人注目，它的影响不仅限于德意志奥地利人，而且还包括斯拉夫人和马扎尔人；只要指出弗兰茨·帕拉茨基和约瑟夫·多布罗夫斯基周围那群人就够了。

在评价自然科学时，从高等学校出发并不相宜。首先必需指出，在玛丽亚·特蕾西亚的夫婿弗兰茨·斯特凡所搞的皇族搜集

---

① 尼布尔(Berthold Georg Niebuhr,1776—1831)，德国史学家，生于哥本哈根，所著《罗马史》十分有名。——译者

② 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德国史学家，佳作有《宗教改革时代的德国史》等。——译者

③ 卡林西亚(Carinthia)，即今之克恩滕(Kärnten)。——译者

品范围内，成立了一个博物标本陈列所和物理陈列所，弗兰茨·斯特凡还把许多法国和洛林的艺术家和学者吸收到维也纳来。他为博物标本陈列所购买了约翰·冯·巴尤的搜集品，这大概是当时最大规模的科学搜集品，后来，在玛丽亚·特蕾西亚统治下，由伊格纳茨·冯·博尔恩，在弗兰茨皇帝统治下，又由卡尔·冯·施赖贝尔斯有目的地、适当地予以扩充。尼古劳斯·约瑟夫·雅坎，与格382 哈德·范·斯维滕同是莱登人，于1753年被任命为维也纳大学植物学及化学教授。他作过广泛的植物学旅行，在内容丰富的出版物中记载了他的研究结果，其中如奠基著作《奥地利植物志》(Flora Austriaca 5卷，1773—1778年)；他带回来的异国材料合并于皇家搜集品之中。博尔恩搜集过并研究过矿石和含矿石块，但，奥地利矿物学的真正创立者却是格恩罗德人弗里德里希·莫斯。这位归化奥地利人，在三月革命以前，在阿尔卑斯各邦进行了广泛的矿物和地质学研究工作，并曾在约阿内姆博物馆和植物标本陈列所工作过。那个时期的大部份矿物学研究著作还是与实际的矿冶工作结合得很密切的。

地形测绘和地理与地图研究符合国家行政机构的利益，这机构出于财政和军事上的原因而赞助这种研究活动。在玛丽亚·特蕾西亚治下，有两个自学成功的农家子弟、上佩尔富斯人彼得·阿尼希和布拉修斯·许贝尔为他们的蒂罗尔故乡绘出最佳地图。从青年时代起就为奥地利服务的列布塔尼人乔治·贝尔萨扎尔·阿凯，对于研究奥地利阿尔卑斯各邦，无论在地理和矿业方面，还是在民俗学研究方面，都做了真正的先驱工作。在本时期，终于出现了一系列地理学著作；成功地兼做演员和喜剧作家的弗里德里希·威廉·魏斯克恩(1769年)、后来，C. W. 布卢门塔尔(1816年，1834年)和弗兰茨·克萨韦尔·施魏克哈特(1831—1840)，在多卷

性著作里论述了下奥地利，弗里德里希·萨尔托里(1816 年)和卡尔·施穆茨(1822—23 年)论述施蒂里亚，约翰·雅各布·施塔夫勒(1847 年)论述了福拉尔贝格。关于苏台德区和喀尔巴阡邦也出版了一些重要著作。

十八世纪下半叶，奥地利人参加了对新世界的研究，特别是对南美的研究，他们的作用值得颂扬。两个耶稣会修士，西里西亚人弗洛里安·鲍克和施蒂里亚人马丁·多布里茨霍费尔给我们留下了关于巴拉圭风土人情的有价值的报道，他们在那里一直活动到这个耶稣会国家[①]被解散(1767 年)时为止。在世纪更换前后，德意志波希米亚的克赖比茨人塔德伊斯·黑恩克——在亚历山大·洪堡之前——研究了安德斯山和拉普拉塔河各国。他研究了好几个科学领域，并且是开采智利硝石的重要倡议者。由于他仅仅以西班牙文发表著作，他的名字在奥地利已湮没无闻，这是很不应该的。施蒂里亚人贝内迪克特·赫尔曼最初发表过有关奥地利阿尔卑斯各邦矿冶方面的论著，后于 1783 年前往俄国，对于开发西伯利亚的矿藏及其冶炼事业，他是功劳卓著的。他也写过关于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重要科学著作。维也纳女子伊达·普法伊费尔是一 333 个刚毅顽强而又无所畏惧的研究者，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曾经到过各大洲旅行，写过生动感人的著作。

1755 年，维也纳获得了一个永久性的大天文台，设在耶稣会学校旁边，与其他城市相比，这是相当晚的。在这里工作的马克西米利安·黑尔神父作为天文学家，享有欧洲声誉，1769 年参加丹麦考察队，在靠近挪威最北部海岸的瓦尔多岛，对日蚀作了精确的

① 耶稣会国家(Jesuitenstaat)，1608 年，耶稣会曾在巴拉圭建立了一个“国中之国”。该会在巴拉圭势力极盛，前后达一百五十年之久。1750 年，西班牙将巴拉圭让与葡萄牙，遭到耶稣会反对，从此葡萄牙与耶稣会矛盾激化，相互倾轧。耶稣会势力从此衰微，至 1767 年被逐出巴拉圭。——译者

观察和计算，而其他为了同样目的向北方所作的航行都没有取得结果。克雷姆斯明斯特的普拉西杜斯·菲克斯尔米尔纳也是一个杰出的天文学家，在那里也建了一个漂亮的天文台。一个比朔夫泰尼茨地方的德意志波希米亚人约瑟夫·约翰·利特罗夫，曾在克拉科夫大学（1807 年）、喀山大学（1816 年）和维也纳大学(1819—1840)教过天文学，他的著作既有学术价值，又写得清楚明晰，引起广大阶层对天文科学的兴趣；他的儿子卡尔（卒于 1877 年)在维也纳成功地继承了他的事业。

在 1848 年三月革命以前自然科学界的主要代表人物当中，似乎还应该提一下弗兰肯地区出身的物理学家和工业技术专家约翰·约瑟夫·里特尔·冯·普雷希特尔，他从开办之日(1815 年)起三十五年来一直成功地领导着维也纳工业专科学校；安德烈亚斯·鲍姆加特纳在维也纳大学讲授物理和数学，他是一个真正有多方面修养的人，一个干练的组织者，如同普雷希特尔一样，属于那种懂得及时地提供国内外科学技术发展知识的人们之列。他的不屈不挠的主动精神，在领导陶瓷厂、卷烟厂，在新建电报业，以及在兴修塞默林铁路线的南段时都经受了考验。双亲为意大利人的卡尔·冯·比拉戈男爵，在 1848 年三月革命以前，以出色的、在维也纳和图尔恩研制出的浮桥和作战架桥物资装备奥地利陆军，这些物资后来被其他军事强国所模仿。

1847 年，奥地利科学院，经过多次试办失败以后，正式宣告成立。早在特蕾西亚时代，德国“文豪”约翰·克里斯托夫·戈特舍德，于 1749 年，发起成立一个科学院的倡议，其最崇高的任务是研究德语，而在玛丽亚·特蕾西亚的教育改革范围内，作为教育新秩序的最高成就，预定要成立一个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科学院(1774 年)，为了它的建立尤其尽心尽力的有宫廷星象家马克西米

利安·海尔；但是，人们屈服于不可避免出现的经费困难。玛丽 384
亚·特蕾西亚认为，成立科学院并非当务之急，这种看法完全符合她那比较切合实际的改革纲要。在弗兰茨时代，人们遇到有影响的皇家侍从医生施蒂夫特的反对，后来由于哈默尔-普格施塔尔的不疲倦的努力（自1837年起），才能争取到梅特涅对科学院计划的支持；1847年5月14日，经皇帝的批准，任命了最初的四十个院士，其中除德意志奥地利人外，还有斯拉夫人、马扎尔人和意大利人。

文学、戏剧、音乐和造型艺术

在巴洛克极盛时期，宫廷和贵族圈子里使用的主要外国语是意大利语，其次是西班牙语，在科学界，人们喜欢使用拉丁文。以前由于同法国在政治上有矛盾，法语被禁止使用，恰恰是在懂德语的玛丽亚·特蕾西亚执政期间，法语却成了交际语，它开始在贵族家庭生活中盛行起来。德语在科学方面，并且作为官方语和媒介语，应用逐渐广泛，而德国文学在它的古典时期里曾有迅猛的发展，对奥地利也产生了影响。最初还缺乏在才情诗意上能够同克洛普施托克、莱辛、维兰德、歌德或席勒相媲美的作家；虽然如此，人们还是试图把这个或那个大作家争取到维也纳和奥地利来。于是，戈特舍德、维兰德、莱辛和温克尔曼一度到维也纳来过，不过，这种接触没有产生持久的结果。在玛丽亚·特蕾西亚和约瑟夫第二的政治顾问当中，宗南费尔斯曾特别致力于增进对德国文学和戏剧的了解，宫廷在厉行节约时期仍坚守奖励文学艺术的传统。最后一个封过爵位、又有统治权的萨尔茨堡大主教希罗尼穆斯·科洛雷多-瓦尔泽伯爵（1772—1803，卒于1812年）就是文学艺术之友。在奥地利的大贵族世家中，尤以列支敦士登和洛布科维茨为艺术提倡者，在匈牙利贵族中，则以埃斯特哈齐为艺术提倡者。在

1848 年三月革命前的维也纳文化生活中，有教养的阔太太们的沙龙曾起过重要的作用。好客的女诗人卡罗利妮·皮希勒广泛传诵的历史小说和无关紧要的骑士戏剧的著者、犹太银行家之妻弗兰齐斯加(法妮)·阿恩施泰因，获得成就最大。在维也纳会议期间，北德人常出入于法妮的家。约翰娜·冯·普格施塔尔伯爵夫人，生于苏格兰(克兰斯顿男爵夫人)，颇受人敬重，许多大作家都和她来往。

385

结社，尤其是在弗兰茨时代，由于官府的根本不信任和警察方面的监视而大受限制。在玛丽亚·特蕾西亚及其儿子们统治下，尽管有过暂时的禁令(1765 年)，共济会的影响仍很可观，尤其是在约瑟夫的政治家当中，曾有很多共济会会员，该会也打入艺术家群中，如海顿和莫扎特都参加过共济会的组织。1797 年，共济会和其他秘密结社都被查禁。后来，"蓝地维尔登施泰因骑士会"也遭到同样命运，该会是 1790 年左右由布尔根兰人安东·达维德·施泰格尔建立的，他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作为自然研究者和矿业主也并非微不足道。国内外许多贵族，甚至统治家族的成员，以及，尤其是艺术家、学者和神父都有参加维尔登施泰因会的。该会在"驼原"(下奥地利)的泽本施泰因宫集会，仪式有浪漫主义色彩，大概是中世纪流传下来的，由于为慈善目的捐输而有功。1823 年，因有人告密，该会被迫解散。同样无害、也可以说是不过问政治的"卢德拉姆会"(Ludlamshöhle)也成了官府猜忌的牺牲品，参加该会的主要是作家和造型艺术家。后来，对政治和文学感兴趣的维也纳社会为自己建立了一个法政读书会(1841 年)，这个组织遭到长期反对，但终于为政府当局所承认。

在 1848 年三月革命以前，检查机关和警察的所作所为对文化生活究竟有怎样的影响呢？无庸置疑，对书业实行预审原则是起了

不良作用的，所有印刷品都要送审，本地的则送呈原稿，以便强行修改，这种修改通常都对内容的价值产生不利的影响。一般地说，有影响的、昂贵的著作审查得比较廉价的著作宽些，人们最怕它对广大群众产生影响，这表现在新闻检查方面最为明显。除普遍禁令以外，有时候，有关的著作只是在专业人员作出保证后才准参阅。政治性文字，特别是批评时政的论题，是悬刑禁止的。历史题材也难免受禁，如果可以嗅出有影射味道的话。如，格里尔帕策就因国王奥托卡尔和主子的忠仆[①]而招惹过麻烦。对戏剧生活的干涉给当代人和后代人以嘲弄的把柄，书报检查由于删删改改而变得十分可笑；此外，虽然禁令如山，但是，在大众戏剧方面，对于演员们的即兴表演却是无能为力。书报检查机关对内地报纸的干涉，就重要性而言，稍逊一筹，地方报纸大多数不为人们所欣赏，尤其是《维也纳日报》和《奥地利观察家报》，它们均被视为政府的传声筒。1815年以前，政论比较活跃；例如，从1785—1813年，发表了约瑟夫·里希特的《埃佩尔道尔人信札》；这些信札，从乡村环境的角度出发，以天赋的机智和合情合理的幽默对维也纳的文化生活作了一番考察。以后，约瑟夫·施雷福格尔创办了《维也纳星期刊》，使首都有了一份令人喜闻乐见的机关报。在萨尔茨堡，在希罗尼穆斯·科洛雷多大主教统治的时代，世俗教士洛伦茨·许布纳进行了重要的政论活动。经过三月革命的沉寂阶段以后，风暴之年带来了新闻业的巨大高涨，激进派的机关报发表了许多令人不快而又夸张失实的报道。

386

在特蕾西亚时代的奥地利创作中，常常可以看到对德国和法国范本的模仿。舍尔丁人米夏埃尔·德尼斯的活动颇为重要，他

① 此处指格里尔帕策所写的两个历史剧《国王奥托卡尔的盛衰枯荣》和《主子的忠仆》因上演而受到书刊检查机关阻挠的事。——译者

头一个发表了以德文改写（仅仅部份真实的）的古苏格兰的奥西安①颂歌(1768 年)，但是，他对旧式史诗和斯拉夫民歌也很感兴趣。施太尔人阿洛伊斯·布卢毛厄尔，同德尼斯一样，都参加过耶稣会。他起先曾试写过严肃的诗作，后来将维吉尔的叙事诗改写成幽默讽刺诗，为他那种辛辣的讥讽精神留下了一个纪念碑。德尼斯循着克洛普施托克的足迹前进，而布卢毛厄尔和维也纳人约翰·冯·阿尔克辛格尔则受维兰德的影响。

十八世纪中叶，在奥地利戏剧的发展过程中，发生了重要的决定性变化。在维也纳，在并非没有官方压力的情况下，古典戏逐渐压倒了戈特弗里德·普雷豪塞尔（斯特拉尼茨基在维也纳克恩滕门剧院的继承者）和约瑟夫·库尔茨的为人们所喜爱的即兴喜剧，以及他们笔下的主人翁汉斯·武斯特和贝尔纳东。1741 年，在旧日的网球场里建立了一个城堡剧院，它从此不仅用来演话剧，还用来演歌剧。在约瑟夫皇帝倡议下，这个前出租剧院直接由宫廷接管，从 1776 年起，它被办成"德意志民族剧院"，歌剧节目单被排除，但是，仍有一段较长时期，说唱节目和歌剧交替上演，歌剧词多半为意大利文。在重要的戏剧城萨尔茨堡，从 1775 年起，传统悠久的大学舞台被大主教的宫廷剧院所排挤。在格拉茨，德国戏剧占领了建成于 1776 年的各界剧场。在蒂罗尔，虽有官府干涉和禁令，农村集镇和小城市里的大众戏剧仍有很大的发展和影响，大批业余演员热情地支持它。

387　在 1848 年三月革命以前，维也纳城堡剧院有着上文已提到过的约瑟夫·施雷福格尔这样一个名符其实的、极其重要的领导者和卓有成就的导演，其实，他名义上只不过是宫廷剧院的秘书。他让人上演席勒、歌德、克莱斯特、西班牙古典作家，以及格里尔帕策

① 奥西安(Ossian)，古苏格兰叙事诗中凯尔特族的英雄。——译者

的戏。他有一批优越的演员，如维也纳女子安东妮·阿达姆贝格尔和威斯特伐利亚女子索菲·施罗德。

从施瓦本迁来的工厂主之子阿道夫·博伊尔勒，成了维也纳通俗戏剧的主宰；雨伞匠施塔贝尔的滑稽形象使他的剧本演出时场场满座，作为新闻工作者，他所办的«戏剧报»(1806—1859)长期以来一直办得很成功；不过，他临终前却很贫困潦倒。象他那种维也纳式大众创作的先驱者有：和蔼可亲的符腾堡法伊欣根人卡尔·弗里德里希·亨斯勒和身体比较健壮的施特劳宾人埃马努埃尔·席卡内德尔，后者尤其擅长于描绘维也纳地方色采；与博伊尔勒同时代的人中，应当提到朴素而又十分成功的滑稽剧的多产作者卡尔·迈斯尔和约瑟夫·阿洛伊斯·格莱希。费迪南·赖蒙德(1790—1836)当演员时已经很有名气。当他执笔写作时，只用几年工夫就写出一些神话剧和妖魔剧使他那真挚、质朴的天才得以永垂不朽。他的作品具有在文学上无可比拟的高水平。约翰·内斯特罗伊(1801—1862)的幽默比较尖刻，在他的时评中已经显露出革命精神，诚然，作者对人民的政治觉悟并非完全信赖(1848 年，«市侩集镇里的自由»)。

自从世纪更迭以来，在严肃的创作方面也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成果。海因里希·约瑟夫·冯·科林试写过古典体裁的剧本；他的«士兵歌谣»(1809 年)使他遭到拿破仑的迫害，据说，弗兰茨皇帝对于这种自发的爱国主义努力也感到不快。海因里希的兄弟马特乌斯作为政论家(«文学年鉴»)，比作为历史题材作家所作的贡献更大。克里斯蒂安·策德利茨男爵是个移居维也纳的、渗透了温和的自由思想和约瑟夫主义思想的西里西亚贵族，作为抒情诗人，成绩很大，特别是他那首写拿破仑神话的诗«夜间检阅»颇为有名；作为剧作家，他并不很成功。活跃在文坛上的贵族，毫无疑问，

以安东·亚历山大·奥尔斯佩格伯爵(1806—1876)最为突出，他用安纳斯塔西乌斯·格林的假名从事写作。他的诗《一个维也纳诗人的散步》(1831)和《瓦砾》(1835)，由于坦率的自由主义态度和相当明显的反教士的精神，而引起热烈的共鸣。这个贵族分子出身于克赖因大贵族，他对自己的斯洛文尼亚同胞的了解是值得注意的，他翻译过最重要的斯洛文尼亚作者弗朗斯·普雷舍伦的诗作。388 奥尔斯佩格曾于1848年试图争取斯洛文尼亚人与德国人合作，并派出代表参加法兰克福的保罗教堂集会，但是没有产生决定性的效果。

匈牙利的施瓦本人尼古劳斯·尼姆施·冯·施特雷勒瑙(即Lenau)，以其浪漫的抒情诗而获得好评；他的叙事诗《萨伏纳罗拉》和《阿尔比教派》①(1842年)，同样表现了反教会的忿懑情绪，影射现实之处虽然包含着一个历史外壳，却依然可辨。恩斯特·福伊希特斯勒本男爵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维也纳精神病医师(《心灵疗法教科书》，1845年)，曾撰写过《论心灵的摄护》一书，一度流传甚广，曾多次再版。福伊希特斯勒本的时代批评思想以箴言体散文表现，读之感人。他向往革命，但革命的进程却使他感到失望，如同格里尔帕策和施蒂夫特尔那样。因斯布鲁克的赫尔曼·冯·吉尔姆，一个以席勒为师而成长起来的诗人，属于该邦的自由反对派，他的《耶稣会士之歌》和《普斯特尔河谷时兴十四行诗》可以作证；他从故乡来到维也纳以后不久，他的笔也就写不出什么东西了。

弗兰茨·格里尔帕策(1792—1872)在奥地利作出的成绩堪与德国的古典作品相比美；他的最主要的著作写于1848年三月革命

① "阿尔比教派"(Die Albigenser)，中世纪时法国南部的一个教派，因其活动中心在阿尔比(Albi)城而得名。1209年，教皇英诺森第三目之为异端，下令组织十字军讨伐，从此式微，以致最后销声匿迹。——译者

以前，后来才部份地发表。虽然格里尔帕策曾被德国浪漫主义思想所触动——他的早期剧作《祖妣》(1816)可以为之印证——但，他的精神个性却尤其具有启蒙运动和约瑟夫主义思想的特征。诗人对奥地利这个多民族国家和它的统治家族还是感到关系密切，即使他尖锐地批评了王朝和政治家，这不是绝无仅有的事，而格里尔帕策对弗兰茨皇帝和梅特涅的品评后来采取了异常尖锐的形式。格里尔帕策是一个忠于职守的国家官吏，从1832年至1856年，他很认真地主持了维也纳宫廷财务局档案馆 (Hofkammerarchiv)；调图书馆工作的尝试未获成功。

格里尔帕策的写作素材有不少取自哈布斯堡帝国所属各民族的历史和神话。在《利布萨》(1844年)中，他从波希米亚传说中汲取材料，并预言会出现一个斯拉夫称霸时期。《主子的忠仆》(1828年)把我们领进中世纪的匈牙利，《森多米尔寺》(成为格哈特·豪普特曼的剧本《埃尔加》的蓝本)写的是波兰贵族社会。但是，特别吸引诗人的却是皇族的历史，它的兴起和危机。在剧本《国王奥托卡尔的盛衰枯荣》(1823年)里，大概波希米亚的奥托卡尔这个人物比理想化了的哈布斯堡的鲁道夫更加使诗人感动；这个剧本遇到了检查机关设置的重重障碍。它不仅骄傲地道出了对奥地利祖国的 389 竭诚拥护，也表述了对具有奥地利特色的国家思想的忠实信仰。在格里尔帕策看来，各种民族主义，无论来源于德意志或斯拉夫，都是令人担忧的；他在1849年写出的警句："晚近的教育之路从人道出发，经过民族主义而通向兽性"，就表达了这种思想，今天看起来就象是预言。《哈布斯堡的内讧》是诗人的戏剧杰作，对该剧的题材他曾作过长时间的构思。他觉得与剧中的鲁道夫二世国王在精神上颇有亲近之处。他以自传式的笔触刻划了这个人物，并通过他，把自己对克制和悲观保守的见解褒誉为具有政治家式的明智

的格言。在格里尔帕策的精神态度中明显地有一种反教士的特征;当这个特征在《罗马的坎波·瓦奇诺废圩》(1819年)一诗中表达出来的时候,诗人的官职似乎一度保不住。格里尔帕策固然对于"梅特涅制度"对奥地利文化生活的监督感到厌倦懊恼,但,他对革命也未曾期望什么积极的结果;他既不信任统治者,也不信任被统治者;人们当然说不上他错了。

在奥地利诗人当中,地位仅次于格里尔帕策的,应为阿达尔贝特·施蒂夫特尔(1805—1866)。德意志波默森林之子施蒂夫特尔的一生大部份是在上奥地利——作为克雷姆斯明斯特的弟子和林茨的督学——和在维也纳度过的。他比较晚才成为诗人,出过一些中短篇小说集,从《习作》、《花石子》到《故事》,都能证明他是个擅长描写大自然和人物的大师。他的长篇小说也同样属于德文散文名著之列,其中如《季夏》向读者介绍了玛丽安妮·施瓦岑贝格侯爵夫人,即那位解放战争统帅①的遗孀周围的人物,而《维蒂科》的情节则发生在中世纪的波希米亚。这些长篇小说由于篇幅浩繁,喜爱它们的读者范围较窄。值得注意的是,在描述波希米亚历史时,任何民族仇恨均已排除。施蒂夫特尔作为风光描绘者是不同凡响的,他在生前默默无闻,而今天,他的意义却早已被人们所重视。

成功的喜剧作者爱德华·冯·鲍恩菲尔德(1802—1890)要比格里尔帕策和施蒂夫特左倾得多,他的杰作《表白》(1834年)、《资产阶级的和浪漫主义的》(1835年),尤其是讽刺三月革命前政治制度中的拖延策略的《成年》(1846年),表明了他的世界观立场;在风暴之年,鲍恩菲尔德属于激进派,后来他也趋于温和。在写诗的妇女中,蓓蒂·保利(真名为巴贝特·格吕克),作为抒情诗人和

① 解放战争(Befreiungskrieg),参见本书474页注。奥地利曾参加欧洲五国联军,大败拿破仑于莱比锡,其统帅指卡尔·菲利浦·施瓦岑贝格。——译者

中短篇小说作家，而且还由于她的译作，而颇负盛名。

方言在文学上也获得了应有的权利。维也纳人弗兰茨·卡斯 390 特利，首先是作为有才华的方言诗人而占有重要地位，他也改写过浪漫派作家的命运悲剧。在这方面表现出最强大的创作能力的，却是因菲特尔的格罗斯皮森哈姆地方的弗兰茨·施特尔茨哈默（如，《奥布德伦斯方言歌谣》，1837 年）。

奥地利的文学成就，至少在本时期的下半叶，如果给予公正的评价，必定会显得相当突出，但是，在后世人的评判中，甚至在许多当代人的评判中，与音乐创作的无与伦比的发展相比，就有点相形见绌。在这里，对此只能作些简短的评论，与其说这是音乐史述评，不如说是文化史陈述更为恰当。

在音乐方面，超越意大利的范本要迟于造型艺术，但，要坚决些。生于上普法尔茨的克里斯托夫·维利巴尔德·格卢克（1714—1787）的作品总是同奥地利和维也纳联系在一起，他的生命也是在维也纳结束的。德意志歌剧音乐的胜利进军是随着格卢克的出现才开始的。1762 年，在克恩滕门剧院首次演出了《奥菲乌斯和欧里迪斯》，1767 年，首次演出了《阿尔塞斯特》；仿古的改革歌剧，在音乐表现上力求古雅、淳朴，与值得注意的风格变换相适应，而达到了意大利的巴罗克和罗科科歌剧的境界。维也纳人卡尔·迪特尔斯·冯·迪特尔斯多夫是一个有才能的作曲家，与格卢克和海登很接近，为教会的和世俗的贵族显要演奏和作曲，他的轻松歌剧、圣乐和协奏曲很受人欢迎。

约瑟夫·海顿（1732—1809），生于下奥地利的罗劳，先后在维也纳和埃斯特哈齐侯爵的艾森施泰特宫堡充当乐队指挥。在杰出人士中，他是第一个放弃传统的意大利旅行的，他的风格得自故乡。他所设计的室内音乐采取弦乐四重奏的形式，他的为数很多

的交响乐，他的圣乐(《创世》，1799年，《四季》，1801年)，使海顿的名声远驰祖国疆界之外，作为著名的大师，他两度赴英旅行，受到热烈的欢迎。在维也纳参军和爱国主义情绪首次迸发之年(1797)，他创作了《皇帝之歌》，利奥波德·洛伦茨·哈施卡为它撰写了朴素的、带有民歌色彩的歌词。约瑟夫的兄弟米夏埃耳主要在萨尔茨堡工作，作为教会音乐改革家而具有重要地位。

沃尔夫冈·阿马德乌斯·莫扎特(1756—1791)，成长于侯爵兼大主教的驻节地萨尔茨堡(亦即他的出生之城)那种喜爱艺术的气氛里，在童年时代，作为音乐神童就已随父亲利奥波德周游整个391 欧洲。侯爵虽然提倡文艺，但，对莫扎特却未加赞助，莫扎特曾同希罗尼穆斯·科洛雷多大主教发生过一次猛烈的冲突。他在维也纳(从1787年起)当过皇家内府的作曲家，境遇也不见得特别好；在维也纳时代，作曲家找到了自己的古典风格，摆脱了以前的范本，从而获得伟大的歌剧成就：《诱出土耳其后宫》于1782年，作为德语演唱剧上演，《费加罗的婚姻》于1786年配以意大利歌词在宫廷剧院上演。随后，《唐·焦瓦尼》(《唐·璜》，1787年)在布拉格首演，《魔笛》(1791年)则在埃马努埃尔·席卡奈德尔的维也纳郊区剧院首演。

莫扎特早逝。不久，路德维希·范·贝多芬(1770年至1827年)，从他的故乡波恩城(那时玛丽亚·特蕾西亚的小儿子马克西米利安大公爵就住在该城)来到维也纳，他在这里结束了他的音乐课程，尽管脾气暴躁，在洛布科维茨、利希诺夫斯基和金斯基的贵族圈子还是得到谅解和鼓励。鲁道夫大主教大力支持作曲家贝多芬，贝多芬以后为他在奥尔米茨就任大主教职而写出《庄严弥撒曲》。贝多芬热烈地参加了当时政治上和思想上的争论；后来(从1800年起)，他耳朵越来越聋，这使他更加同公众隔绝；他只是偶

尔在首都的社交生活中显露头角，如在维也纳会议期间的一次精采的文艺演出会上。此外，贝多芬也在维也纳住惯了，他那些奏鸣曲、交响乐和弦乐四重奏都是在这里产生的，1805年，他的歌剧“菲岱里奥”(初稿)首次上演。大师多次拒绝了外国的邀请，其中有威斯特伐利亚国王的邀请特别具有吸引力(1809年)。

贝多芬虽然是个自由艺术家，具有革命的和共和的世界观，如果说他仍然在爱好文艺的贵族氛围中活动，早年的重大进步应归功于这种氛围，那么，弗兰茨·舒伯特(1797—1828)的活动就完全在资产阶级的环境里进行，作曲家在维也纳就生在这种环境之中，父母是德意志摩拉维亚人。他的朋友，其中有施温德和鲍恩菲尔德，也感到自己从属于这种环境。这个“歌王”继承了古老的维也纳歌谣传统，但是，在旋律的丰富、情调内容和作曲技巧上却超过了所有的前人和同代人。他的交响乐和室内音乐也证明是不朽之作。广大居民群众的接受能力和对艺术的理解力也同巨匠们的创造力相适应。在维也纳会议期间，家庭音乐空前流行，无数业余的四人演奏组纷纷建立。人们在较大的范围内举办慈善音乐会和“心灵”音乐会；各种协会，如“维也纳声响艺术家协会”、“贵族妇女善举及公益促进会”，以及1812年成立的、大有前途的“音乐之友协会”，都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活动。1817年，维也纳音专成立，它是维也纳音乐学院的前身。从1843年起，“维也纳男子歌咏团”就专门从事歌咏活动。 392

此外，成立音乐团体和学院的倾向不仅仅限于维也纳；同样，在格拉茨、林茨和克拉根福都可以遇到这种倾向；在萨尔茨堡，1841年成立了“莫扎特学院”①。同样，我们也觉察到优质乐器工

① “莫扎特学院”(Mozarteum)，为音乐高等学校，附有莫扎特博物馆，1880年起改名为国际莫扎特学会，1931年起改为莫扎特研究中心，1955年起出版新莫扎特作品的版本。——译者

业和活跃的音乐出版商的活动，以及出版音乐杂志的端倪。尤其重要的是古典音乐和民间音乐的相辅相成。表现得至为明显的是舞蹈音乐。从阿尔卑斯各邦，即上奥地利的土风舞——从恩斯河上游的“Landl”产生了“Landler”①这个名称——在世纪交替时产生了维也纳的华尔兹；作为作曲家和乐队指挥，约瑟夫·拉纳（1829年起为宫廷舞会音乐指挥）和约翰·斯特劳斯·法特都取得了真正的胜利。把君主国所属各民族的旋律都介绍到首都来的则是军乐。

现在我们来看看造型艺术。十八世纪下半叶，奥地利巴罗克的光辉时代逐渐消逝；晚期的巴罗克还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作品，在这个时期的作品里，古典的影响一般地还占优势，对较轻松的罗科科② 形式则有时表示好感。尼古劳斯·帕卡西从事罗科科的研究，维也纳的霍夫堡的各个不同阶段，以及丽泉宫建筑得以继续施工都应归功于他。跑马道附近的皇家医院教堂(后为近卫队教堂)也出自帕卡西之手。洛林人让·尼古拉·雅多曾一度担任玛丽亚·特蕾西亚的宫廷建筑总管，采用西欧的罗科科式样，建筑了前大学旧址的礼堂(1753—1755)，现在的奥地利科学院即设在这个建筑里。在罗科科式教堂当中，应当提到因斯布鲁克的维尔滕教区教堂，它是在五十年代里按照弗兰茨·德·保拉·彭茨的图样修造起来的，它也是其他蒂罗尔教堂的典范。维尔赫林教堂的内部装璜应视为罗科科风格在宗教艺术中的最杰出的成就，它的感人力依赖于内部建筑术、雕塑术、绘画术和光的作用等的联合作用。

约瑟夫·埃马努埃尔·菲舍尔·冯·埃拉赫是古典派最突出

① Landler，一种四分之三拍的圆舞，为华尔兹舞的前身，流行于德国南部和奥地利。——译者

② 罗科科(Rokoko)，十八世纪流行的一种建筑和家俱设计风格，因装饰过多而显得堆砌、累赘，多使用曲线和岩状饰物。——译者

的代表，在独具匠心方面当然比不上他的父亲约翰·贝恩哈德，他在卡尔第六执政时就已从事建筑工作。其次，在特蕾西亚时代，应提到施太尔人约翰·戈特哈德·海佩格尔，他是圣弗洛里安教堂的完成者，以及阿德蒙特图书馆的修造者。经过一个世代以后，费迪南·冯·霍亨贝格以古典式样修造了维也纳约瑟夫广场旁边 393 的弗里斯宫(后为帕拉维奇尼宫)和丽泉宫中的得胜门(Die Gloriette)的柱列(1775 年)。在世纪末和三月革命以前，人们更崇尚简朴。在弗兰茨时代，国有的实用建筑，如兵营、政府机关、仓库等，都是以特别简朴的建筑式样建成。这个时代在破坏和亵渎圣物方面所造成的结果，几乎比建筑方面的更大。废弃了的寺院被改成学校、工厂和监狱，多余的教堂则被用于世俗的目的或被拆除。于是，克洛斯特新堡的“capella speciosa”①就被拆毁，而维也纳河岸的玛丽亚教堂差一点也遭破坏，令人印象深刻、但已“无用的”恩斯城塔也是如此，——人们担心，卖掉石料所得的钱不敷拆毁之用。加斯滕寺变成一个监狱，维也纳的方济各会教堂被夷为平地，那个用石头盖的教堂则改为烟草仓库，而克雷姆斯的多明我会教堂则被改建为剧场。

古典派在十九世纪的新建筑中继续发生影响。彼得·诺比尔根据这种建筑思想修造了维也纳的外城堡门和提修斯寺②(1820—1824)。萨尔茨堡的米拉贝尔宫堡曾遭回禄，破坏很重，它的重修(1818 年以后)和格拉茨的旧剧院(话剧院)的重修(1824/25)，都由诺比尔负责。三月革命以前最多产的建筑师是约瑟夫·科恩豪伊泽尔，他曾修建过赛滕施特滕巷的维也纳犹太城寺庙(1826

① 小教堂名，其拉丁文原义为“美丽的小山羊”。——译者

② 提修斯(Theseus)，希腊传说中的英雄，关于他的种种事迹见普鲁塔克所写的《传记集》第一篇。——译者

年)、约瑟夫城剧院,并在拆除哥特十字形回廊以后,于1826—1832年修建了具有古典风格的苏格兰人寺的新建筑。他还参加了旷日持久的克洛斯特新堡修道院建筑的收尾工程,在参加修整日趋繁荣的疗养胜地巴登的工作时,修造了市政厅、浴池、别墅和住宅。他受卡尔大公爵的委托,设计了魏尔堡的广袤的设施(第二次世界大战末全部被毁),这是当时最重要的奥地利城堡建筑。默德林附近的"骠骑兵寺"也出自科恩豪伊泽尔之手。保罗·爱德华·施普伦格尔的作品有,在费迪南时代修建的朴素建筑,如造币局、关税局和设在第三维也纳区公路上的邦财政署。

急剧增长着的城市里的住宅,具体而微地模仿着纪念碑式建筑的风格思想,住宅区段在空间上的规模扩大了;某种千篇一律的倾向是显而易见的。本时期终了时,出租的简易房屋已在咄咄逼人。在工业建筑中,表征性建筑的影响已经明显可见,同样,在当时的要塞设施中也是如此,如蒂罗尔的弗兰茨要塞(1833—1838)和林茨城防要塞的马克西米利安塔(1831—1836)。

394 在绘画中表现得特别明显的浪漫主义和历史主义思想,在十九世纪头几十年里,在建筑领域里也可以遇到。拉克森堡附近的弗兰岑斯堡的建设,是分若干阶段(1798—1836)完成的,它模仿一个中世纪的城堡;同时,有些建筑设施在约瑟夫时代撤销寺院之风中成为牺牲品,或因此而被损毁(佐伊森施泰因、瓦尔德豪森、克雷姆斯明斯特、克洛斯特新堡的"美丽的小山羊"),人们曾从中利用了教会的和寺院的建筑术,却几乎不管这些资料来自不同的风格时代。那个时候,在奥地利土地上出现了最初的新哥特式建筑,它们部份地受英国典范的影响,如萨尔茨堡附近的阿尼夫宫的新建筑(1838—1848)。那个时候,人们修造了一些艺术废圩,修造的宗旨在于,如同当时的骑士团体那样,表达浪漫主义对历史性时代的缅

怀，如黑塔(1810 年)和默德林附近列支敦士登天然公园中的六角“胡椒罐”(“Pfefferbüchsel”)。古典派有时也有类似的浪漫情绪发作——这两个风格流派决不是永远毫不妥协地互相对立的，例如，霍亨贝格在 1778 年就已在丽泉宫修造了一个“罗马”废圩。

在雕塑术作品中，也如同建筑创作一样，基本上也显示了同样的发展路线和流派。倔强的施瓦本人弗兰茨·克萨韦尔·梅塞施密特(1736—1783)的工作最初还与巴罗克有联系。他的创作完全是在奥地利土地上，尤其是在维也纳进行的。他的玛丽亚·特蕾西亚塑象(1766 年，巴罗克博物馆)和少女塑象(1767—68，萨伏伊妇女修道院)，尤其是那令人惊异的、神态往往颇为古怪的四十九个“性格头象”，证明一个终于显露病态征状的天才的多方面性，这个天才也受过当时那种人类学理论的影响。

在大公园的雕象、墓碑和喷水池人象，以及维也纳广场上王侯骑马的立象等形式中，逐渐显示出向古典主义的转变，就象在建筑作品中那样。巴尔塔扎尔·费迪南·莫尔修造维也纳嘉本遣会坟场中弗兰茨·斯特瓦和玛丽亚·特蕾西亚的双锡棺时(1753 年)，采用的还是巴罗克风格，他在城堡花园中的弗兰茨·斯特凡纪念碑(1781 年)就已显示古典主义特征，约翰·马丁·菲舍尔在方济各广场上的摩西喷泉(1798 年)也是如此。蒂罗尔人弗兰茨·曹纳的作品就是严格古典主义的，如约瑟夫第二纪念碑(1795—1807)和帕拉维奇尼宫的长衣女象柱装饰(1786 年)。安东尼奥·卡诺瓦在维也纳奥古斯丁教堂中为玛丽亚·克里斯廷大公爵夫人的大理石墓碣也是很有特色的。一个世代以后，约瑟夫·克利贝尔作为 395 建筑雕塑家颇崭露头角，科恩豪伊泽尔很愿意同他合作。

在巴罗克晚期的画家当中，在奥地利安家落户的博登湖畔施瓦本人弗兰茨·安东·毛尔贝奇(1724—1796)超过了一切同代人。

他大概曾受意大利楷模的鼓励，以及伦勃朗作品的影响，在教堂绘画中找到了热烈的表现力。维也纳的虔教派教堂、科尔诺伊堡的奥古斯丁教堂、哈尔布图恩宫堡（布尔根兰）、克雷姆西尔（摩拉维亚）的主教府等处的壁画，以及匈牙利聚美格乡村教堂中的一个瑰丽的晚期作品，都是应当提到的。毛尔贝奇也是一个绘画师和镂蚀家，确实具有全欧意义，应占第一位。就作品是否多产而论，格拉芬韦尔特人约翰·马丁·施密特（1718—1801，即"克雷姆泽尔·施密特"）超过了他，施密特的工场组织得很好，众多的帮工向下奥地利、施蒂里亚和萨尔茨堡的许多教堂供应祭坛画象。他的风格、特别是他的着色技巧显然是从伦勃朗那里学来的。作为重要的壁画家，还要列举克恩滕人约瑟夫·费迪南·弗罗米勒，他在克拉根福的邦议会大厅里制作了巨幅壁画。在蒂罗尔，首先是巴伐利亚的晚期巴罗克和罗科科的影响比较显著。科斯马斯·达米安·阿萨姆制作了因斯布鲁克教正教堂中的壁画。这一流派的特点是，偏爱小人象和模拟建筑①。

在世纪递嬗之际，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菲格尔采用古典风格，作画时又考虑到巴罗克传统。他作为造形艺术学院的院长，可以影响比较多的弟子，但，在浪漫派当中却遭到非议。约翰·彼得·克拉夫特（1780—1856）也是一个古典派，他曾在该派的法国主要画家路易·达维那里学过画。克拉夫特是个已成为维也纳人的黑森人，他的题材选自解放战争，以及弗兰茨皇帝的生平——由于这种接近时代的态度，而与较老的古典派发生冲突，后者往往喜欢选取古代的或圣经上的材料。1830年前后，克拉夫特用三幅巨制的壁油画来装饰维也纳霍夫堡国务院大礼堂，壁油画表现了对法

① 模拟建筑（Scheinarchitektur），是建筑术中的一种手法，即在墙壁上或天花板上涂抹或作画，给人以一种宽阔宏伟的虚幻感觉。——译者

战争的激昂情绪。

一个天才的业余画家、蒂罗尔人约瑟夫·安东·科赫(1768—1839)，因表现罗马平原和瑞士群山而成为德意志山水画的革新家。他多半时间逗留在罗马，因为，他在维也纳不大吃得开。

绘画中的拿撒勒派① 艺术与浪漫派的宗教感情相对应，该派起源于反对盛行一时的学院古典理论的维也纳路加兄弟会，移居 396 维也纳的德意志波希米亚人约瑟夫·菲里希(1800—1876)是该派的最重要代表人物，他的圣经史组画颇获好评，但是，后来，同拿撒勒派作品一样，受到不应有的贬抑。德意志的神话和传说境界反映在维也纳人莫里茨·冯·施温德(1804至1871)的富于想象的雅致作品里。他本人还未充分达到他创作的顶点时，就离开维也纳前往慕尼黑，但是，仍然保持了维也纳的传统。

作为狭义的比德迈尔风格画家，作为三月革命前奥地利的、特别是维也纳的情调和生活方式的表述者，应提到克拉夫特的学生、风俗画家和肖像画家约瑟夫·丹豪泽尔、非常受欢迎的和孜孜不倦地从事工作的版画家约瑟夫·克里胡贝尔，许多维也纳上流社会人士都请他绘画作像。莫里茨·米夏埃尔·达芬格尔也同样获得成功，这个圈子中最有才华的则应推弗里德里希·阿默林(1803—1887)；他的青年时期作品——也大部份是人像——乃是他的天才的确切明证。

费迪南·瓦尔德米勒(1783—1865)的贡献真正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现实主义的和理想主义的特征在他的画幅中结合在一起；他的风俗画除了艺术价值以外，还具有文化史价值，使人们能

① 拿撒勒派(Nazarener)，参加路加兄弟会的浪漫派画家被称为拿撒勒派，该派力主对基督教艺术进行革新。拿撒勒(Nazareth)原系巴勒斯坦一小城，相传为耶稣的故乡。——译者

够广泛地看到当时维也纳的风貌。可是，瓦尔德米勒首先是一个地位崇高的风景画家，他早在法国印象派之前就已懂得令人信服地表现出阳光的绘画效果。瓦尔德米勒的毫不妥协的战斗精神使他两次与学院发生冲突。在他生前大概只有英国能充分认识他的作用。他在艺术史上的地位，在柏林的世纪画展(1906 年)以后，才得到普遍的承认。随着他得到承认，他那个时代的维也纳绘画也得到承认。维也纳绘画由于通俗历史画家的存在，曾长期受到冷遇。

奥地利工艺美术在本时期中也出了不少重要的作品。十八世纪下半叶的艺术锻工就是如此。在世纪更迭以后，它不得不逐渐让位于铸铁制品。在比德迈尔时代，极为重要的艺术木工发展了起来。由于广泛的资产阶级人士纷纷购买这种手工产品，它可以指望良好的销路。风格优美的比德迈尔傢具是三月革命以前资产阶级住宅陈设的一个颇为重要的组成部份；大艺术家，如约瑟夫·丹豪泽尔（本人就是一个木匠之子）就曾为傢具木工进行过设计。397 维也纳的窑业，尤其是在康拉德·冯·佐根塔尔男爵(1785—1805)领导下，在欧洲声誉斐然；佐根塔尔死后约十年，他的继承人能力不强，衰落就变得无法阻挡。

从十八世纪中叶至十九世纪中叶，在这一时期中，陈旧的、“封建的”、王朝和贵族所倡导和确定的社会秩序在欧洲丧失了根基。方兴未艾的工业化和技术化先后改变了村落和邦的面貌：资产阶级社会满有信心地形成为与王朝、贵族和教会并存的自治的生活共同体。在政界和军界的纷争中，古老的势力仍然再次获胜；不过，它们的时代正在消逝。宽容非天主教徒、产业工人的聚居于城市、农民的摆脱地主，这些都再也不可遏止，人们也不想这样做。在极其忠诚的、拥护奥地利国家思想的文武官员的启蒙主义思想、后来又是自由主义的思想中，一种新的精神已经形成。约瑟夫主义

曾设法把新思想同哈布斯堡君主国的生活法则协调起来，当然并未取得完满的结果。这种发展、潮流和逆流，在艺术领域中也有所表现。从事自由职业的艺术家逐渐地使雇员脱离宫廷、贵族和教士；在比德迈尔风格中，我们遇到一种就其形成和理想而论堪称资产阶级的艺术观。此外，国家和社会也利用艺术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以前主要是宗教的艺术，这时更多地转向世俗领域。在社会和精神采取新方向的危急时刻里，在旷日持久的、损失惨重的战争期间，以及在抑郁寡欢的、物资奇缺的战后岁月里，文学和造形艺术，尤其是音乐，居然能创造出真正有价值的、长时间站得住的作品来，这充分证明奥地利这块文化园地的肥沃，它使粗犷的天才得以克服重重困难，在不无可悲的例外的情况下，博得相应的钦佩。

九、弗兰茨-约瑟夫时代和君主国的衰亡

（1848 年至 1918 年）

新专制主义

398 1849 这一年本应为奥地利的君主保守势力带来彻底的胜利——当然先要经过严重的挫折，并且不能没有外来的援助。拉德茨基的军队当然很快就解决了撒丁。正当卡尔·阿尔贝特宣布停战的时候，他的军队却在莫尔塔拉(3 月 21 日)和诺瓦拉(1849 年 3 月 23 日）战役的十一天作战中吃了决定性的败仗，1849 年 8 月 22 日，威尼斯投降，奥属意大利各省中的最后抵抗被击溃。

在匈牙利，温迪施格雷茨一直挺进到蒂萨河畔，后来，在相当能干的阿图尔·格尔盖伊将军指挥下的革命军随即展开反击；温迪施格雷茨是一个搞政治的军官，有自己的见解，但不是一个指挥官，其次，接替他担任指挥官并曾尖刻地批评过国君的将级军械官路德维希·冯·韦尔登男爵也已无能为力，吃了几次大败仗，并被赶往西方。科苏特宣布共和国成立。1849 年 5 月，弗兰茨·约瑟夫皇帝访问了沙皇尼古拉，获得了俄国的武器援助。新建的皇家军队，在同样干练、又同样残酷的尤利乌斯·冯·海瑙男爵的指挥下，又重新向前推进，克罗地亚人向匈牙利南部进攻，而俄国人则侵入西本比尔根。1849 年 8 月 13 日，格尔盖伊在维拉戈斯(阿拉德附近)向俄国人投降。严峻的军事法庭判决许多人死刑，军队和警察分担镇压本土的任务，他们把西本比尔根、克劳地亚-斯洛文尼

亚和伏伊伏丁那(巴纳特和巴奇卡)和本土分开。匈牙利的剩余部份分为五个行政区，州郡管理体制被撤消。将级军械官哈瑙任总督，与维也纳政府协调得不好，于1850年7月被撤职。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措施并非不好，过于专横霸道的政权是不会受到少数民族真正拥护的，马扎尔人始终痛恨它。尤其是巴赫派来的、以捷克人为主的官员(巴赫骠骑兵)没有被人们所接纳。

这时，克雷姆西尔帝国会议的时代业已过去。1849年3月7日，政府利用军队把它解散了。这个会议的伟大功绩之一在于起草 399 了宪法。人们相当认真地讨论了中央集权制和联邦制，并寻求能满足各少数民族心意的有关奥地利政治组织问题的解决方案(匈牙利除外)。人们难道应当原封不动地保留历史上的各直属邦，并遵守那些犬牙交错的、往往难以确定的民族疆界吗？人们终于根据德意志波希米亚人路德维奇·冯·勒纳和捷克人弗兰茨·帕拉斯基的提案，一致同意德意志西里西亚人卡耶坦·迈尔的草案，该草案规定保持历史上的单元，但，它的下属则划分为民族区；除邦议会以外，则有区议会作为下属的代议机构。就宪法的行政划分而论，民主原则得到了维护，这表现在皇帝对帝国议会的决议只有延期否决权，此外，还确定了大臣对帝国议会负责。

政府草拟了一个对应草案，其内容涉及对整个君主国实行中央集权制，而君主的绝对否决权和政府颁发紧急条例权(§14)被列入，就有可能把由两院组成的帝国议会排挤掉。议员们获悉政府要解散帝国议会的计划，就宣布准备接受政府的提案。于是，1849年3月7日，帝国议会被解散；人们根本不想要一个由人民代表机构决定的宪法，并以皇帝的文告来宣布政府草案为“强加的宪法”。实际上，这个宪法仅仅停留在纸面上，帝国议会从来没有召开过。只是成立了一个帝国咨政院(Reichsrat)，这个机构由指定的委员

组成，其职能是咨询性的，会议不公开举行。人们始终认为，真正的灾难在于，包含在克雷姆西尔草案中、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由各少数民族代表友好地达成协议的、适当的、合乎宪法的、至少是使哈布斯堡君主国西半部各族人民能和睦相处的形式，作为施瓦岑贝格专制原则的牺牲品，已经成为空谈。

新专制主义虽然还有别的缺点，但在一个主要的方面却极其有益地不同于三月革命前的政权的无所作为：它推行得很有魄力。在领土行政管理范围内，县被划分为政治区和司法区，县的界线参照克雷姆西尔宪法草案的精神多半与语言界线相符。自治区乡是国家行政区划中的最小单位。在区乡法公布后不久，它的创制人施塔迪翁就因病而不得不把内政管辖权移交给巴赫，后来新式的区乡法被除夕特许令所废除。从此区乡长不经选举产生，而是任命的。一般地，依附于政府和各邦的官僚仍然在地方行政机关中掌权。无论如何，五十年代的官员的情况要比三月革命前要好得多，有责任心、勤勉和廉洁。警察在这个专制统治的国家里自然起着很大的作用。为了改善乡村里的治安状况，于1849年成立了宪兵队作为新的执法机构，它被置于总督约翰·冯·肯彭男爵的指挥下。军队则按照拉德茨基的总参谋长赫斯的计划加以整顿，但是，在深受皇帝赏识的侍从武官格吕内——一个高傲自负、讲究食喝穿戴的人的不利影响下，虽然耗费了可观的钱财，只获得有限的结果。由克劳斯男爵着手、由卡尔·路德维希·冯·布鲁克继续施行的财贸政策所获得的效果却要好得多；重大措施有：撤消那条把奥地利和匈牙利各邦割裂开来的关卡线，以及，为弥补贵族地主的损失而由国家帮助农民支付补偿费，还有，普遍征收地产税和所得税。由于实行错误的贷款政策，自从五十年代中期以来，财政困难越发严重，甚至布鲁克也无法克服。教育部长利奥·冯·图恩-

霍亨施泰因伯爵所推行的教育制度的改造和革新，无疑应属于新专制主义政权最成功的改革之一。他继承了他那个有宪法思想的前任佐马鲁加的事业。后来，文科中学、实科初级中学和高等学校的整顿颇见成效，关于这一点以后还要谈到。

莱奥·图恩伯爵还作为努力争取政府与天主教会实行密切合作的主要人物之一而从事活动。1850年4月13日和23日的皇家法令宣布撤消各种被教会方面认为是特别严峻的约瑟夫主义措施；允许教士与罗马教廷自由来往，教会对学校的影响增强，主教的惩戒权也同样如此。"Placetum regium"①取消了，统治者对教会颁发文告的控制也随之取消。从此教会主要谋求的东西，首先是婚姻法。最后，所有涉及教会和国家的问题最好以共同约章的形式解决的见解得以实现。维也纳新主教约瑟夫·奥特马尔·冯·劳舍尔，作为国家全权代表同罗马进行了谈判，历时两年半，谈判顺利结束，其结果于1855年11月13日以皇家特许令的形式公布。共同约章完全按照教会的旨意规定了婚姻法，包括婚姻裁判权在内，教育制度则按天主教的信仰办理，宗教经费移交给教会。共同约章由于是罗马的胜利而被国内外的自由主义人士所拒绝，老约瑟夫派，其中如警察大臣肯彭，心情也很不痛快。教会后来受到了指责，说它由于共同约章而把自己的事业与专制国家结合得太紧密，而对于国家，人们则责备它从一开始就迁就罗马教皇的外交。 401

离共同约章的缔结还有一段时间，专制政权就已受到最初的震撼：1852年4月5日费利克斯·施瓦岑贝格侯爵去世；从此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就照着屈贝克的主张去直接处理政事，屈贝克

① 拉丁文，"需经皇家批准"的规定。——译者

当然也就逐渐隐退。新任外交大臣卡尔·费迪南·布奥尔-绍恩施泰因伯爵尤其努力迎合这位君主的心意，而君主固然坚定和自信，但在外交经验方面尚感不足。同俄国的矛盾变成了命运攸关的问题，1849年时，人们还受到俄国的支助，但，在巴尔干难以避免的利害冲突却把他们同俄国分开了。在1852—1853年期间已经发生纷争，奥地利干涉了土耳其与十八世纪末才独立的小国门的内哥罗之间的冲突。野心勃勃的门的内哥罗国君达尼洛·彼得罗维奇情不自禁地对土耳其地区采取了不明智的侵略行动；土耳其政府组织了有力的反击，只是奥地利的干涉才挽救了这个侯国的存在。俄国要求单独保护土耳其帝国境内的一切基督教徒，特别是正教徒，而受到人们怨恨。俄国的扩张计划对于土耳其海峡包含着危险，当西方强国英国和法国怂恿土耳其反对这项计划、奥地利从中撮合之时，矛盾就变本加厉起来，俄国本来是希望奥地利支持自己的立场的，奥地利这一来却又引起了俄国的不快。令人忧虑的是，奥地利无法同普鲁士和其他德意志联邦国家达成协议。西方国家向俄国宣战（1854年3月27日），后来又在土耳其人的配合下，此外，还在一个撒丁军团的支援下，派军队在克里米亚登陆，而部署于君主国东部疆界的奥地利军队终于占领了多瑙河侯国（摩尔道①和瓦拉几亚），牵制了强大的俄国兵力。此外，在初步进行和谈联系时，人们极易为西方强国所利用，它们的强硬要求由奥地利转交，并得到奥地利支持。在俄国，人们对于奥地利以自己的武器援助匈牙利一事所采取的态度感到气愤，可是，哈布斯堡国家却没有赢得西方国家的信任，这是最终结束克里米亚战争的巴黎和平谈判所清楚地表明了的。俄国不得不把比萨拉比亚的南部

402

① 摩尔道（Moldau），在今捷克斯洛伐克伏尔塔瓦河（Vlatava R.）一带。——译者

交给新建立的、理论上仍然依附于土耳其政府的罗马尼亚公国(1881年起为王国),从而丧失了它在多瑙河下游的属地,这件事有一定的意义;在和约中还保证了多瑙河的自由航行。也许奥地利能够取得多瑙河诸侯国,但是,西方强国对于这样的领土扩张附加了放弃伦巴底-威尼斯的条件,对此维也纳却下不了决心;没有一个国家肯放弃开发得很好的地区,即使那里的居民采取敌意的政治态度也吧,以换取贫困的和被榨取尽净的地带;而且,由于合并这些侯国,俄国的敌意会变得更大。于是,东欧和中欧的三个保守的君主国之间的合作也就完结,对于哈布斯堡国家,一个相对的外交安全的时期也就随之完结。

至少争取到普鲁士的机会又一次出现。1848年,诺恩堡——既是霍亨索伦王朝的侯国,也是瑞士联邦的州——解除了与普鲁士的盟约,一次保皇党暴动于1856年秋被镇压下去。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第四想为了他的附庸而出兵进行军事干预,请求奥地利支援,并许下在意大利战争中自己将给予援助的诺言。奥地利宫廷和政府表示拒绝,普鲁士只好放弃了他在诺恩堡的权益。这个解决法本身是合情合理的,它结束了诺恩堡那种不稳定的和危险的中间地位;但是,柏林从此非常恼恨奥地利。

拿破仑第三在巴黎谈判期间试图把意大利问题摆到桌面上来。在同撒丁大臣卡富尔(于普隆比埃尔,1858年7月)秘密谈判时,他答应从军事上支持意大利的统一事业,但这应允并不是完全无私的。在给奥地利驻巴黎公使亚历山大·冯·许布纳男爵的挑衅性新年致辞中,法国皇帝的侵略意图就表现得很露骨。法国皇帝使俄国采取了友好的态度,英国试图居间调停没有成功。普鲁士的政策要照顾俄国,因而讨厌奥地利的支持,这时奥托·冯·俾斯麦的影响在普鲁士的外交中开始有所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德意志 403

联盟的中等国家[1]的对奥友好态度未能起决定性作用。奥地利国家潜在着的款项奇缺也发生了灾难性影响；在仓促向撒丁发送最后通牒和过早缔结和约一事中，款项奇缺也起一定作用。1859 年春，撒丁和奥地利集结大军于国境线上；由于考虑到在财政上难以维持较长时期的动员，奥地利于 4 月 22 日发出最后通牒，这个通牒被撒丁所拒绝。于是，奥地利宣战并被认为侵略者，虽然对方的政策只不过是虚张声势地加剧紧张局势而已。

这时，法国站到了撒丁一边，派出强大的战斗部队向上意大利开发。奥地利的作战行动从一开始就凶多吉少；总司令弗兰茨·吉乌莱伯爵优柔寡断，贻误军机，没有在法军抵达之前进攻撒丁人。在初战失利之后，1859 年 6 月 4 日，奥地利军和法撒联军在马让塔地方展开大战，战斗过程中互有胜败，但却以联军胜利告终。奥地利人撤出伦巴底，退回到明乔河后面；援军抵达后，人们又发动了一次攻击，血战异常酷烈，这场索尔费里诺战役(1859 年 6 月 24 日)又再次以失败告终。虽然如此，奥地利军队仍拥有"要塞方块"，即佩希拉-曼图亚-莱尼亚诺-维罗纳这样一个坚强的后援阵地，而且普鲁士在德国舆论压力下似乎更加倾向于进行干预。在法国阵营内部，人们看到继续打下去有困难。于是达成了停战协议和维拉弗兰卡预备和约 (1859 年 6 月 8 或 15 日)；在这里达成的协议在苏黎世和约(1859 年 11 月 10 日)中得到了肯定，并作了几项涉及财政问题的补充。拿破仑做到争取撒丁国王同意降低获取领土的要求；对一些匈牙利移民首领所作的允诺在巴黎完全被忽略了。奥地利把伦巴底割让给拿破仑（由奥军占据着的曼图

[1] 中等国家(Mittelstaaten)，尤指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黑森-达姆施塔特、汉诺威、萨克森等，因位于大国奥地利、普鲁士和其他小国之间，采取一种独特的政策。——译者

亚和佩希拉两要塞不在其中),拿破仑则把它移交给撒丁。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希望哈布斯堡王朝重返摩德纳和托斯卡纳,但是,人民投票决定与撒丁合并,撒丁军队不久也就占领罗马尼阿(Romagna)。教会国从此仅以台伯河两岸的昔罗马教皇领地为限。加里波的的一次行动最终推翻了意大利南部的波旁王朝。这样,亚平宁半岛的绝大部份就都统一在萨伏伊王族的统治下,但是,王族却不得不把它的本土和尼斯让给法国。不消说,拿破仑对意大利宁愿选择一个联邦解决方案——即一个由罗马教皇担任名誉首领的联邦,因为中央集权体制更符合英国人的主张。此外,很清楚,意大利民族国家迟早会索取威尼斯的。 404

从索尔费里诺到科尼格雷茨

战场上的败北对于奥地利的国内政治必然招致不可避免的后果。专制政权没有残留到意大利败北以后,在这期间连某种稳定的民主化也没有获得。最先发生人事上的变动。布奥尔、巴赫、肯彭和格吕内相继被撤换。雷希贝格伯爵接管外交工作的领导,内政管辖权则归波兰人阿格诺尔·戈卢霍夫斯基伯爵。戈卢霍夫斯基和教育大臣利奥·图恩在政治上倾向斯拉夫人;他们的各种措施引起德意志奥地利人的不信任。1859 年的席勒纪念会就具有明显的民族性质;在大学里,学生会以前是明令禁止的,现在则公开活动。民族纷争开始变得尖锐起来。皇帝受偏爱马扎尔精神的伊丽莎白皇后影响颇大,本想略为迁就匈牙利人。五个行政区的划分被取消,州郡制重新施行。单靠这些措施当然还不能争取马扎尔人。现在的当务之急乃在于,在奥地利皇家直属行政区里也试行向立宪制度转变。不用说,负责人经过长时期的争论以后才达成一致意见。1860 年 10 月 20 日,政府公布《十月文告》。这个文

件开头有一个皇帝声明，声明中指出，国事诏书是君主国统一的基础，并提到 1848 年保证过的基本权利。

此外，《十月文告》的内容还意味着联邦倾向和中央集权倾向之间以及以前实行的专制倾向和新自由民主倾向之间的妥协。《文告》通常被认为具有联邦主义特征，但，它仍具有全国中央集权主义色彩，因为它规定成立一个帝国代表会议，该会议包括斯特凡皇冠① 辖下的各邦，财政和军事方面的立法也归该会议执掌。至于公共生活的其他方面，邦议会则拥有比较广泛的处理权限。把405 匈牙利各邦包括到帝国代表会议之中，以及附属国西本比尔根、克劳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直接附属维也纳，这都使马扎尔人感到冒犯；不久情况就表明，人们既不能满足他们，也不能再压抑他们。当他们采取抗税手段的时候，情况再一次证明，宫廷赖以为顾问的匈牙利老保守分子再也不能被视为该国活跃的政界人士的代议制代表。除马扎尔人以外，在财政大臣伊格纳茨·普莱纳领导下的德意志自由主义者也在进行反对活动。由于除政治忧患以外，又发生了财政危机——爆发的原因是行政变动所引起的费用和匈牙利抗税行动所引起的国家收入减少——于是《十月文告》和国务大臣格卢霍夫斯基的命运也就注定。后者于 1860 年 12 月引退，他的职位由首要的德意志自由主义者安东·里特尔·冯·施默林接替。

由于《十月文告》被视为“不可撤消的宪法”，人们赋予《1861 年二月特许令》以《十月文告》的“最后”文本的性质，人们想今后就按照这个特许令来改造国家。很多人认为这两个宪法文件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其实并非如此。帝国代表会议所获得的章程强调了

① 斯特凡王冠(Stephanskrone)：圣斯特凡(975—1038)从 1001 年起任匈牙利第一个国王，从此匈牙利王冠被称为斯特凡王冠。——译者

狭义的代表机构与广义的、也包括匈牙利在内的代表机构之间的区别（这在«十月文告»中已暗示过），并扩大了这些机构的权限。奥地利的邦议会章程则是划一的。虽然奥地利各邦，由于对于匈牙利而言的"狭义"帝国代表会议仅存在于它们之上，而被定为低级的单位，它们的邦议会只保留着极其有限的职权，奥地利和匈牙利之间的二元体制表现得相当强烈，从此由干练的政治家弗兰茨·戴阿克领导的匈牙利反对派却加强了。在匈牙利的行政管理工作，只有激烈地运用行政权力才得以维持。匈牙利少数民族对于已经明显地显露出来的马扎尔人统治欲的反抗提供了一些可能性，但是，正如1859年以前那样，奥地利人方面并未相应地加以利用。

宪法改革的民主性质极其有限，因为国会议员是由邦议会选派的，而邦议会却是根据极其有限的、袒护有产者的选举法选出来的。此外，马扎尔人，有时西本尔比根人和克劳地亚人，不肯参加投票。当施默林争取到西本比尔根的罗马尼亚代表和萨克森代表一道工作时，捷克人和波兰人又纷纷退出，他们拒绝了他的大德意志政策。帝国代表会议的结构呈现出一幅颇有意义的景象。民族成份当时已经起着很大的作用，但还不是象几年以后那样占主导地位。所谓"分权"的概念是指这样一个利害关系的共同体，它从封建贵族的代表，经过帕拉斯基和里格尔领导下的捷克人、斯莫尔卡领导下的波兰人，一直达到多半出身于阿尔卑斯山区的德意志教士。在"德意志左派"或"宪法党"中，有好几个派别在活动，如温和的自由派和强大的德意志民族"自治主义者"，前者以卡尔·吉斯克拉，后者以莫里茨·冯·凯泽斯菲尔德为最主要的发言人。鲁特尼亚的代表作为唯一值得一提的斯拉夫集团，支持了德意志左派。德意志、匈牙利、波兰和波希米亚的事务越来越成为主要问

406

题。1864年，同讲究现实的和有责任心的弗兰茨·戴阿克所领导的马扎尔人和解的端倪已经可以看得出。

统治集团的主攻方向是共同约章；它仍然有效，只是那个承认福音派成员享有充分平等权和自治权的1861年新教徒特许令，以及不准犹太人从事教育活动的若干决定，都暗示教会政策的官方路线也在改变。由于施默林和宪法党的反教会倾向不合皇帝的心意，这位政治家的地位就越来越恶化，此外，他本人还被视为同匈牙利和解的主要障碍。虽然如此，他还是坚持到1865年6月为止。但是，当戴阿克在《佩斯报》(1865年复活节)发表的著名文章中生动而温和地阐述了匈牙利的观点时，皇帝就让施默林下台，委托波希米亚总督里夏德·贝尔克雷迪伯爵出来领导政府。1865年9月，贝尔克雷迪暂停那时仅由少数人派有代表的帝国代表会议的活动，实行专制统治。

在这期间，德意志的结盟政策作出了重大的决定。无疑，那个1859年以后负责奥地利外交工作的人贝恩哈德·雷希贝格伯爵正在尽力争取一个同普鲁士协作的政策，另一方面，又暂时放弃与德意志中等国家或非德意志势力的合作。1862年，发生了一个危机，那时普鲁士与法国之间缔结的自由贸易协定不可误解地透露出反奥地利倾向。此外，1862年10月，奥托·冯·俾斯麦这样一个自信的、努力为目标奋斗的政治家起来领导普鲁士的对外政策。他从一开始就致力于消除德意志联邦中不稳定的平衡状态，以利于建立本国的霸权，同时，并不回避与哈布斯堡国家发生武装冲突。在德国的舆论中，对奥友好的情绪占优势，而大部份欧洲强国，首先是俄国、意大利，以及——错误估计局势很出奇的——拿破仑第三的法国——都倾向普鲁士。在联邦议会里，普鲁士人通常都获得多数票，因为小国都害怕它的扩张行动；1863年，奥地利

407

在弗兰茨·约瑟夫皇帝的有力倡议下，按照他的意旨试行联邦改革时——他力求恢复皇帝的威严——，但，由于普鲁士的拒绝而失败。在法兰克福国君会议上以大多数票通过的奥地利建议，规定成立一个以奥地利为首的五人执政团、一个联邦法院和一个拥有实际全权的联邦议会。对此，俾斯麦提出反建议作为回答，要求产生一个以普选为基础的德意志人民代表机构，但，被政治问题和民族问题弄得混乱不堪的奥地利却不能接受。普鲁士的步骤之所以被采取，大概是为了破坏奥地利的计划，而不是为了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

一个现实的德意志政策和欧洲政策问题，即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问题，导致普鲁士和奥地利在德意志联邦范围内实行最后一次的暂时合作，后来又成为决定性破裂的机缘。1848—49年时，这两个公国和小小的劳恩堡的占压倒多数的德意志族居民已经奋起反对丹麦实行统一的努力，可是，德意志强国在短促而成功的军事干涉以后，却又弃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于不顾。到1863年，丹麦政府不慎自己破坏了1852年对丹麦极为有利的伦敦条约的条款，这个条约到底还肯定过这些公国在丹麦王家所属各邦的联盟中享有特殊地位。这时德国的舆论就力促为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而战斗。其实，德意志联邦已实行军事进攻，当然德意志的中等国和那两个大国[①]是分开来进行的；丹麦希望取得英国的援助，可是落得一场空，最后不得不在维也纳和约中割让这两个公国。在这次征战中，奥地利军队在厄弗赛和法伊勒战胜了防守得很严密、但绝望地处于劣势的敌人。在海上，丹麦比在陆上强得多，尽管如此，特格特霍夫海军上将麾下的一支奥地利-普鲁士分舰队，于1864年5月9日赫尔戈兰海战中表现得很光彩。

① 指普鲁士和奥地利，参见上文第510页脚注。——译者

408 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问题的难处，在战场上决胜以后才充分显露出来。胜利者必须就易北河公国① 达成协议。这两个公国的居民最愿意看到一个在储君奥古斯滕堡的弗里德里希第三统治下的、自己的德意志联邦国家的建立，储君有充分理由可以提出统治权要求。普鲁士起初只得到劳恩堡，后来又想为自己保留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施泰因，以扩大它在北海和波罗的海海边的阵地。奥地利极力阻挠此事。人们想参加决定，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人们曾经参加过战斗。俾斯麦倾向于在意大利迎合奥地利的要求，据说，还准备支援伦巴底的收复，但是，在奥地利看来，在德意志联邦中的地位更来得重要，这是不错的。这位普鲁士政治家起初还想使同奥地利的协商解决似乎显得行得通；由于要哈布斯堡君主国同意普鲁士合并易北河公国显然无法办到，人们于1865年8月在加施泰因达成一项实行分治的条约，荷尔施泰因由奥地利管辖，石勒苏益格则由普鲁士管辖。当然，这只是一时之计。1866年春，矛盾重又尖锐起来，奥地利的对德政策领导人路德维希·冯·比格勒本并非全然无错。他是一个真正具有大德意志思想的黑森人，在外交上能力堪与俾斯麦相比。1866年4月8日，普鲁士与意大利缔结了一个针对奥地利的同盟，这就破坏了联邦的文约。普鲁士外交官安东·冯·加布伦茨，奥地利荷尔施泰因驻军的司令官的兄弟，曾试图从中调停，但没有成功。为召开一次欧洲会议而进行的接触也毫无结果，法国和意大利本来想在这次会议上商谈威尼斯问题。奥地利违反加施泰因条约的规定，将关于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的决定交给德意志联邦，于是，普鲁士就占领荷尔施泰因。在这种紧张形势下，奥地利与拿破仑三世谈妥了一项离

① 指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施泰因，因为易北河下游流经这两个公国的西南侧。——译者

奇古怪的条约，该条约规定，即使奥普战争打出个好结局来也把威尼斯割让给法国，而法国只不过答应保守中立而已（1866年6月12日）。

在这期间，普鲁士公布了一个《联邦改革纲要》(6月10日)，在《纲要》中要求把奥地利开除出德意志联邦；在联邦议会中，奥地利要求动员起来反对普鲁士的提案，表决时以九票对六票被通过(6月14日)，普鲁士公使立即宣布联邦宪法失效，于是战争就开始打起来。在一方参加战斗的有奥地利和大部份中等国，如北方的汉诺威、萨克森、赫森-卡塞尔，南方的巴伐利亚、巴登和符腾堡，在另一方参加战斗的有普鲁士、汉撒城市①、北德小国和已结盟的意大利王国。从一开始就很明显，战局决定于北战场。在这里，奥地利 409 军队要攻打的敌人无论在训练和武装上都很优越，萨克森人能够打开一条路，与奥地利军队会合，而汉诺威人却不得不投降，南德各国在美因河地区同普鲁士的特遣部队作战，战事进行得并不顺利。

若干年以来，普鲁士步兵已经装备有后膛枪，即撞针发射枪，其发射速度比奥地利的前膛枪要快得多；可是，奥地利骑兵同普鲁士骑兵相比毫不逊色，而炮兵所使用的器材则更要好些。由于征召后备军，普鲁士军队终于在主战场上也享有——当然是微弱的——数量上的优势。它们尤其指挥得好，其总参谋长赫尔穆特·冯·毛奇既有高超的战略决策，又有坚定不移的毅力。奥地利在北战区的司令官、军械官路德维希·冯·贝内德克更象是豪德根那种类型的人，精明能干，在军中颇受爱戴。此外，他还十分熟悉意大利战场上的地形地物（在那里负责指挥的是阿尔布雷希特大公爵）。

① 汉撒城市(Hansestädte)，指汉堡、吕贝克和不来梅等。——译者

在南战线，战斗的进行对奥地利有利。1866年6月24日，奥地利人在库斯托扎战胜了未能集结优势兵力的敌人；后来，由于北方的进展不利而不得不放弃威尼斯，南方军团的大部份军队被运往多瑙河。普鲁士军队并非象奥地利总司令部所臆测的那样开往摩拉维亚，而是开往波希米亚。在战役的开头几次战斗中，普鲁士人总是旗开得胜（在波多尔、许纳瓦塞尔、施魏因舍德尔、斯卡利茨、纳霍德），只是，1866年6月27日，在特劳特瑙附近，加布伦茨将军才打败过一个普鲁士军团。贝内德克由于已经遭受重创，对好转的可能性产生怀疑，打电报向宫廷建议言和；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却明显表示，期望接受一次主要战役。于是，1866年7月3日，在科尼格雷茨附近发生了战役的决战。奥地利人在以赫卢姆村附近为枢轴的坚强阵地上顶住了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麾下的普鲁士军的进攻，直至一个不慎的行动暴露了右翼，普鲁士王太子的新援军决定了战役的胜负。由于奥地利炮兵和骑兵肯于用命，一场大灾难得以避免，可是渡过易北河撤退时却损失惨重，许多士兵淹410死。费了很大的劲才把残军带回多瑙河一线。贝内德克被撤去兵权，认为自己应当保持沉默，在战争以后，却被最难堪和最不负责地当成替罪羊来揭露——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不管某些“贝内德克故事”怎样言过其实地描绘了科尼格雷茨事件的前后经过。7月22日签订了停战协定，8月6日签订了尼科尔斯堡预备和约，8月22日正式签订布拉格条约。四十八岁的卡拉普卡将军领导下的匈牙利兵团挺进匈牙利北部，至七月底时仍无战果，因为斯洛伐克居民不肯参加这个行动。此外，入侵的普鲁士人向“光荣的波希米亚王国的居民”发表了宣言，意在试图争取已经高涨起来的捷克民族主义的合作，但没有得到响应。

在南方，海军上将特格特霍夫于7月20日，在达尔马提亚的

利萨岛海面，坚决采用冲撞战术，战胜了海军上将佩尔萨诺麾下的一支优势的意大利舰队，战果辉煌；这次胜利对于战争的进程自然是无足轻重的。奥地利把威尼斯让给了拿破仑，南蒂罗尔和伊松佐防线却防守得很好。俾斯麦驳回了拿破仑软弱的调停尝试和他的赔偿要求，他还抑制了国内的好战派所提出的过份要求，放弃了奥地利和萨克森的割地赔偿。关于萨克森的生存，弗兰茨·约瑟夫曾当面向萨克森国王发誓，予以保证。在领土方面，普鲁士由于获得汉诺威、黑森选侯国、拿骚、法兰克福、自然还有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因而弥补了损失，莱茵区和古普鲁士各邦之间的空隙也堵住了，同仍然存在着的德国北部各国，包括萨克森在内，达成了建立北德意志联邦的协议；同时，还确定德国南部独立。意大利战争迟迟未能结束，因为意大利除了威尼斯，还想获取南蒂罗尔和海岸地带；只是在俾斯麦表示不肯再支持，以及奥地利的援军重又得以向南开拔时，人们这才让步。

有了1866年的决定，成立普鲁士和小德意志的民族国家的主要条件就已具备，1866年还标志着意大利统一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个事态发展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是很有意义的，在后代人则长期认为理所当然。奥地利失去在德国和意大利的阵地，当然是不容易甘心的。阵地的丧失的直接后果是，匈牙利问题的解决成了主要问题。此外，情况将会表明，意大利对多瑙河君主国的要求还没有全部提光，这些要求还指望得到某种共鸣，虽然在君主国范围内居住着的意大利人只有几十万。另一方面，对于一千万德意志奥地利人来说，德意志联邦的解散不能把使他们同黑黄色界桩另一边的德国人联系在一起的所有传统一笔勾消。人们比以前更强烈地感觉到，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只是一个少数，对于德意志联邦尽管软弱仍然给予他们的支持，他们仍然很怀念。 411

奥匈协议

施默林引退以后，维也纳同匈牙利政治家进行的谈判比较有希望了。贝尔克雷迪宣布暂停实施宪法的行动，在莱塔河彼岸也是人们所盼望的，那里的人不久就明白，按照1848年精神提出来的一切要求并不都能实现。这时，另一方面，宫廷却不得不抛弃那个宣布匈牙利由于1848—49年的起义而丧失一切国家法特权的所谓"权益丧失理论"(Verwirkungstheorie)。1866年上半年，协议已经相当有眉目，后来战争使谈判再次中断。1867年初，奥地利发生政府更迭。不同意那个逐渐得势的二元体制的分权主义者贝尔克雷迪引退，代替他的是费迪南·冯·博伊斯特男爵，前萨克森总理大臣，他在1866年底，在贝尔克雷迪底下已经主持过君主国的外交事务。博伊斯特同匈牙利人谈判得很巧妙，领导匈牙利人的，除弗兰茨·戴阿克以外，从巴黎侨居回国的、热情洋溢而又善于词令的尤利乌斯·安德拉西伯爵表现得尤其突出；匈牙利政治家有一个热情的代言人，就是伊丽莎白皇后，她在科尼格雷茨以后的危机日子里就已央求她的丈夫去迁就匈牙利人。诚然，在打败仗以后，维也纳宫廷的地位已大为削弱。另一方面，戴阿克和安德拉西——不同于科苏特和及其后继者——已经清楚地看出，马扎尔人要求对斯特凡皇冠统辖下的各邦实行统治，这只能在哈布斯堡君主国这个较大的范围内才能实现。在谈判过程中，彼此十分了解的博伊斯特和安德拉西结成一个激进集团，审慎的戴阿克和弗兰茨·约瑟夫对于他们反而起了抑制作用。在君主一旦对于政治家们的协议表示同意以后，尽管斯拉夫人暗中捣乱，协议还是有了保证。在戴阿克的影响下，协议事业在匈牙利国会中稳当地取得了多数票。在匈牙利方面，那时(后来也是如此)人们把协议

412

看成是匈牙利与它的国王而不是与奥地利所达成的条约。到1867年年底，协议才和其他为建立奥地利的帝国那一半[①]的新宪法秩序而制订的法律一起，被奥地利帝国代表会议的两院所接受。皇帝于1867年6月批准了相应的匈牙利法律条款(XII)，同年12月对奥地利法典表示同意。

协议的主要内容怎样？国事诏书作为唯一比较老的、匈牙利方面也认为是有约束性的国家法，应当构成协议的基本条件。协议法律规定，属于"共同国事"的，除统治者本人(奥地利皇帝兼匈牙利国王)以外，还有外交、军事和财政，财政指共同事务经费的筹措。相应地，有三个共同的、帝国的和王国的(k. u. k.)部，简称为帝国部，即帝国外交部、陆军部和财政部。各部大臣向特派代表团(Delegationen)负责，即，向由两个议院分别选出的各六十名代表组成的小组委员会负责，这些小组委员会通常另外单独开会。代表团的决议不得互相抵触，经过皇帝批准后才具有法律效力。协议的财政条款的调整常常很费周折。其中如，有关各种"约定共同事务"的协议必须制订，如国债(匈牙利承担其中的一部份)、商业和关税、间接税、货币(由一家共同的国家银行发行)和国境铁道。每十年举行一次的协议谈判中的实际重大问题是双方对筹措共同事务费用所应负担的份额。围绕着分配率，即所谓"Quote"，大家争得很激烈；1867年，对匈牙利的份额确定为百分之三十。匈牙利承担的费用份额虽然小得多，但，基本上享受着平等权利，并且实际上由于比较明显的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而显得比奥地利优越，这一点很能说明以后的君主国政治的特点。确实，是否谈得上有一个"奥地利"，这都成了问题；从法律上说，同"匈牙利王冠所

① 奥匈帝国是由奥地利和匈牙利组成的二元君主国，所谓奥地利的帝国的那一半(österreichische Reichshälfte)实际上就是指奥地利。——译者

属各邦”相对的是“在帝国代表会议中派有代表的王国和各邦”，后
413 者非正式地称为“Zisleithanien”，即莱塔河这边的国家。奥地利这个名称在官方使用的语言中仅见于全称“奥地利-匈牙利君主国”和君主的称号“奥地利皇帝兼匈牙利国王”；从1915年起才有一个“奥地利的”国徽。

由于匈牙利境内民族状况的恶化，对于协议产生了一个颇值得忧虑的后果；经过考验的军事边界设施等，被遗弃给马扎尔人，这些设施到1873年被废除；边防军被皇帝和国王的军队所接替，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奥地利后备军和匈牙利国防军（Honvéd）。克劳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与匈牙利的关系另有自己的协议来调节，它在匈牙利内部保有自治权，这种自治权扩及行政管理、司法、宗教事务和教育。达尔马提亚的地位仍未确定，它往昔与克劳地亚同属匈牙利，在中世纪时已为威尼斯所征服，于1797年或1815年并入奥地利。该国在1867年以后仍处于奥地利管辖之下，不过，匈牙利和克劳地亚仍坚持自己的要求。

自由的时代

二月特许令至少在原则上适用于整个君主国；现在人们不得不创制一些仅涉及君主国西半部的宪法法律；1867年，忠于宪法的左派德意志自由议员，在人数和个人影响上，都具有特殊的意义，由于捷克人在策略上极不明智地退出帝国代表会议，这个意义就变得更大。德意志资产阶级的要求符合自由主义的政治传统；问题的焦点在于限制共同约章条款、确定政府的紧急条例权力，以及国家公民权的保证。

人们在排除了种种困难以后，终于通过了所谓“十二月法律”（根据被通过的时间或1867年12月21日被国王批准的时间而得

名)。在这些法律中，有两项涉及审判权（或帝国法院)，有一项确定了与匈牙利的协议，另一项则论述人民代表机构，该机构划分为两院(即代表院和贵族院)，根据当时流行的阶级选举权选出。对于政府的紧急条例权力(§ 14)作了某些限制。关于国家公民的一般权利的法律则确定了国家公民的权利平等、宗教信仰自由、财产的不可侵犯，以及其他"基本权利";在法律条款中应特别指出第十九条，它一开头规定:"国家的一切民族都享有平等的权利，每一个民族都享有不可侵犯的保持和维护自己的民族和语言的权利";这个条文和它的解释对奥地利各民族权利具有中心意义。另外一项法律具体明确了皇帝的权力，在他的权限中特别强调了对军队的最高指挥权和对外交政策的指导权。 414

1868 年初，卡尔("Carlos")·奥尔斯佩格侯爵被任命为奥地利总理大臣，参加他的内阁的有著名的自由派人士，如约翰·内波穆克·贝格尔、伊格纳茨·普莱纳、特别是——当司法部长的——最孚众望的、但过于教条主义地进行思考和鼓动的德意志波希米亚政治家爱德华·赫布斯特。陆军部长爱德华·塔弗伯爵理应被视为皇帝的心腹。

在议会里，制宪工作结束后，围绕着赫布斯特的三个法律草案立即展开了斗争，这些法律主要解决国家与教会关系这一棘手问题，它们特别涉及到婚姻、学校和宗教信仰间的关系。婚姻法撤销了共同约章所规定的广泛取消一般公民法典中关于天主教徒婚姻的条款;现在又由国家来负责审理，而不是教会。然而，人们继续忽视天主教徒必须向户籍机关办理结婚手续的规定。教育法强调国家而不是教会对学校的监督，教育大臣、阿尔塔骑士利奥波德·哈斯纳提出的"帝国国民学校法"(1869 年 5 月 14 日)对教育法作了补充，国民学校法贯彻各宗教共同的八年国家义务教育。它

同其他国家的世俗教育立法不同之处在于，它并不否认宗教道德教育的意义，还保留了必修的宗教课。1868年五月法律中的第三项法律处理的是各宗教间的关系(通婚、宗教的改变等)。

"五月法律"，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意味着破坏共同约章，它不可避免地遭到教会方面最激烈的反抗。教皇庇护十一世谴责了这个"可恶的法律"。勇敢的林茨主教弗兰茨·约瑟夫·鲁迪吉尔，在一封主教书翰中表示反对改革，被判以八天的监禁，当然立即就被皇帝所赦免。

皇帝由于良心上的原因对于这里所叙述的事态发展，根本就不高兴；虽然他对宗教政策始终是信守的，但是，他对自由主义却没有真正的好感。卡尔·奥尔斯佩格的"平民内阁"的地位，由于君主国首要政治家个人意见分歧而变得岌岌可危。尤其是国务415 总理(和外交大臣)博伊斯特和奥尔斯佩格很不协调。博伊斯特在与匈牙利达成协议以后，又想在一年以后与捷克人达成协议，他这样做多少可以说是擅自作主的。他低估了捷克领导人的教条主义的劣根性；他们要求与奥地利实行纯粹的合一君主制，甚至有权在必要时选出一个非哈布斯堡的国王。持现实态度行事的波兰人总算得以采用波兰的内部官方语言，并给予加利曾以特殊地位。

在外交上，1866年以后的几年都受到拿破仑三世的所作所为的影响，这就是遏止普鲁士在欧洲的势力的日益增长，或者至少为法国获取补偿。当然，他仅仅做到使卢森堡中立，卢森堡原属德意志联邦，在那以前它的首都还驻扎着一支普鲁士驻屯军。法国驻维也纳宫廷的大使格拉蒙公爵，于1867年春就已提出建立同盟的建议，但由于博伊斯特持审慎而冷淡的态度而未获成功。当人们在巴黎试想旧话重提的时候，墨西哥皇帝马克西米利安遇难的消息传来，法国结盟的希望又破灭了。弗兰茨·约瑟夫的可爱而又

有才华的弟弟马克西米利安大公爵，在伦巴底任总督时，实行一种和解政策；从1859年起，他在的里雅斯特附近的米拉马雷城堡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1863年，他在这里收到一个保守的教会政党要他接替墨西哥帝位的建议，这个政党在法国的帮助下似乎有可能战胜它的自由派敌人。马克西米利安在放弃了在奥地利的一切权益以后，接受了那个建议。他于1864年5月抵达墨西哥，但，拿破仑三世感到美国的态度日渐咄咄逼人，把法国军队撤回，于是马克西米利安就站不住脚。他自己的势力不久也就被压倒，他的最后避难所夸雷塔罗要塞由于有人告密而陷落，1867年6月19日，根据军事法庭所判的死刑，马克西米利安在这里与他的党羽米古埃尔·米拉蒙和托马斯·梅吉雅两将军同时被枪决。马克西米利安的妻子、比利时公主夏洛特虚荣心颇重，曾试图获得欧洲的援助，但枉费心机，她的丈夫还没有覆灭，她的身体就垮了；1927年她才死于高龄，死时神志异常昏乱。

由于奥地利舆论把拿破仑三世看成是墨西哥悲剧的主要罪人，这就更有理由在1867年8月的萨尔茨堡会晤时回避结盟的建议。奥地利统治者于1867年秋访问巴黎，尽管很讲究排场，却没有获得具体的结果。1869年，拿破仑打算同奥地利和意大利订立三国同盟，但由于意大利的领土要求过高而未成。在维也纳，在阿尔布雷希特大公爵领导下，最早坚决反普鲁士的军界人士和宫廷人士都赞成对普鲁士打一场报复性战争，不过，人们还需要时间来进行陆军改革。于是，1870年春，阿尔布雷希特在巴黎和法国将军勒布伦在维也纳进行谈判时，仅仅提出了一些没有约束性的建议。1870年7月19日，格拉蒙内阁向普鲁士人宣战，这时它当然是希望奥地利和意大利介入的。在这期间，奥地利宫廷的意见绝非一致，最后，弗兰茨·约瑟夫皇帝没有采纳阿尔布雷希特大公爵 416

和博伊斯特的意见，而决定保守单纯的（即“不武装的”)中立。德国南部合并于普鲁士、德意志奥地利人的情绪，尤其是德国军队的迅速致胜，凡此种种都不利于在法国一边参战。9月1日，第二个拿破仑帝国在色当之役的打击下溃崩，于是再也没有人想为了法兰西共和国进行干涉。布拉格和约的第四条本身谈的仅仅是德意志联邦，但，这个条款还可以提供反对成立新德意志霍亨索伦帝国的可能性，不过，为此奥地利还需要其他势力的支持；博伊斯特认识到，这是无法办到的，他作为一个现实政治家，也就安于既成事实。这样一来，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就没有希望恢复奥地利在德国的优越地位。可是，德意志奥地利人的政治思想纷争已经激化起来。到那时为止，谁要是有“大德意志”思想，他就赞成君主国在德意志范围内的政治要求，这时奥地利的大德意志人，作为德意志民族党人，就势必成为那个时常被不加批判地美化了的小德意志普鲁士国家的政治附庸国；大德意志思想，原本产生于同普鲁士精神的权力欲念所发生的矛盾，这时却成了普鲁士精神的奴才。在另一方面，奥地利的国家思想迄今有一种强烈的德意志色彩，现在对于这个多民族国家，一种超民族的“大奥地利”思想无疑会成为既成事实——但，对于它的实现，二元体制和马扎尔人对帝国东半部各民族的统治是有妨碍的；不久越来越清楚的是，在君主国各民族成员当中，民族意识就强烈程度而论通常要超过奥地利国家思想，这种情况至少在政治上处于领导地位的资产阶级当中是如此。

在这期间，哈布斯堡君主国的政党结构不能简单地按民族来划分，社会的和宗教信仰的区划线与民族的区划线互相交错。政治化已经遍及广泛的阶层，虽然限制性选举权暂时还不准它们去投票。在六十年代后期，对外日益发生影响的德意志自由主义已

经开始分裂。1867年，在格拉茨，在一个有利于民族思想的土壤上，以及在维也纳，建立了第一个当时还往往被称为"自治的"德意志民族运动的组织形式。纲领除了按照约瑟夫主义传统强调德意志思想以外，还有着强烈的反教会色彩，不久，与老自由派相反，又有排犹色彩，最后还染上反议会制色彩；人民代表机构已经不再被视为宜于实现"民族利益"的沃土。加利曾、布科维纳和达尔马提亚被划出奥地利帝国的半壁河山之外，人们希望由此而实现在阿尔卑斯和苏台德残存地区的德意志优势。

老侯爵温迪施格雷茨领导下的保守分子发表了论战性言论，反对1848年的思想和德意志自由主义，戈卢霍夫斯基和贝尔克雷迪很同情他们。重要的是，人们从这些封建集团那里找到了接近广大人民群众的路子。1875年以后，卡尔·冯·福格尔桑，一个来自梅克伦堡的天主教改宗者，把一个新的特色带进保守运动，此人把《祖国》日报为自己办成一个适当的喉舌。福格尔桑希望进行基督教社会改革，强调行会观点；他在政治上的主要心愿是保存中产阶级，在这个阶级范围内，他也得到某种共鸣；共鸣在农民当中更为强烈，自由派中的大资产阶级的和城市的领导人通常对农民不大关心，并由于他们持反教会态度，对他们也没有好感。在蒂罗尔和斯拉夫农业地区，保守派比自由派更有影响，此外还可以指望他们有一天不得不自动向一个更年轻的、忠于教会的运动让步。

自由派、德意志民族派，以及保守派对工人却没有取得什么成果；天主教的职工联合会在奥地利所得到的共鸣要比在莱茵和鲁尔少得多。奥地利工人大多数都倾向社会民主党人。工人教育协会和专业工人协会通常都具有社会主义倾向；工人报刊还办得很活跃。社会民主党最初更多地受费迪南·拉萨尔思想的影响，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影响。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从一开始

就在公众当中颇显露头角；在1869年，他们派往艾森纳赫代表大会的代表很多，在前一年，他们在维也纳新城开了一个盛大的工人代表大会。1870年，奥地利工人在举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游418 行以后，争取到"结社权"，从而争取到合法罢工的权利。当然，工人同小资产者和小农一样，还没有选举权，不久社会主义运动分裂为"温和派"和"激进派"，因而大大削弱。

1870年4月12日，波托基内阁接替因选举改革问题而倒台的卡尔·奥尔斯佩格政府。新政府成立只有十个月，就采取了一项最重要的措施，即宣布取消由于1868年立法已多次被违反了的共同约章。博伊斯特伯爵最初在1869年曾试图让罗马教廷自动放弃共同约章，但没有成功。在梵蒂冈主教会议上曾宣布教皇不会犯错误的教条，当时大多数奥地利主教表示反对，这就为提出如下论点提供了众所企盼的借口：共同约章由于缔约一方的性质发生重大改变而无效。皇帝在1870年8月30日的御前会议上同意了这种认识。但，在与罗马教廷的外交来往中，人们仍然彬彬有礼，皇帝给教皇的严厉的照会不会不产生它应有的印象；在哈布斯堡君主国还没有产生象德国那样的教会与政府的斗争。

在1870年的选举中，自由派的宪法党遭到决定性的损失，自由派的左翼（"进步"党）较前略有进展。自由派的衰微自然是德法战争的一个结果，对保守派和斯拉夫人有利。1871年2月，封建保守集团的领袖卡尔·西格蒙德·冯·霍亨瓦尔特男爵受命组织政府。在秘密谈判中，争取到捷克反对派与政府合作。

新任总理大臣被视为德意志自由派和中央集权倾向的敌人，因此，奥地利德语区的报纸对他并不好。不久就可以看到，在那些新人物当中，祖籍施瓦本的国民经济学教授阿尔贝特·舍夫勒占据着关键性位置。他受托主持商业与农业部，可是，大臣的盘算绝

不仅限于他那个可以说是不熟悉的管辖范围。舍夫勒代表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他的思想已经预示了一些不久以后福格尔桑，以及后来卡尔·卢埃格尔所要宣布的东西。他关于奥地利新秩序的思想已经用书面和口头向皇帝禀报了，并且得了君主的批准。政府的组成和施政纲领于1871年2月7日，以近乎突击和令人吃惊的方式向公众宣布。

内阁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执行一项与捷克人达成的协议。为了防范人民代表机构的德意志多数，人们把议会推迟；人们设想以波希米亚邦议会为实际谈判对手，这个邦议会的选举法已经改变。摩拉维亚邦议会采取了冷淡的态度，西里西亚邦议会则表示拒绝。波希米亚邦议会于1871年10月10日公布了"基本条款"，德意志人和马扎尔人的反应并不友好，因为这些条款规定波希米亚与匈牙利地位平等，以及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奥地利部分实行完全的联邦化。其他历史上形成的单位(如蒂罗尔)或少数民族（如斯洛文尼亚人和鲁特尼亚人）的代表随即要求享有与波希米亚人同等的权利。安德拉西宣布匈牙利的协议事业已面临危险，他同国务总理博伊斯特联合起来，成为无法克服的阻力。皇帝本来就由于捷克关于陆军制度方面的要求(征兵的许可）而感到怏怏不乐，这时在一项敕谕中拒绝了基本条款。捷克人原以为接受是稳当可靠的，这一来却感到受到侮辱。霍亨瓦尔特内阁于1871年10月30日辞职，它的倒台自然也使霍亨瓦尔特的敌人博伊斯特被解除了国务总理的职务，被派往伦敦担任大使，这就大大激化了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之间的矛盾。

419

霍亨瓦尔特垮台的不可避免的后果是，吸收德意志自由派参加组织政府。阿道夫·奥尔斯佩格侯爵("卡洛斯"的兄弟)成了总理大臣，拉赛尔男爵接掌内政部，卡尔·冯·施特雷迈尔博士接掌

教育部，同时，大学教授格拉泽尔博士则被委以司法部，霍斯特男爵被委以国防部、班汉斯被委以商业部之职；无任所大臣约瑟夫·翁格尔所起的作用并非不重要。奥尔斯佩格-拉赛尔内阁的执政年数还是达到可观的七年。

政府的第一项政绩乃是实施一种新的选举法，据此，帝国议会不再高踞于邦议会之上，而是由大地主、城市、商会和小城镇这四个选举团——当然大约仅占人口的百分之六——通过选举产生；考虑到需要照顾德意志多数的稳定，虽然联邦派方面有些阻力，这个法令还是执行了；反对派再度由于捷克人的缺席而遭到削弱。后来，1873 年年底的新选举，对于执政党来说，搞得很成功，联邦派甚至取得了决定性的加强，其原因首先与当代财政史上最富戏剧性的事件之一有关，即 1873 年 5 月 9 日这个“黑色星期五”的大“恐慌”，这时许多经营不善的银行和商业机构纷纷倒闭。不少或大或小的知名自由派政治家，曾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多半是作为420 董事)参加了这些机构。仅仅由于实行有限的选举法，才没有酿成政治上的大崩溃；但是，城乡的贫苦阶层转向反自由派势力方面，有的转向社会民主党，有的转向宗教的和排犹的集团，则是相当明显的。在军界和在宫廷，人们已在认真考虑，将已陷入窘境的宪法制度束之高阁，而代之以专制政体。当然事情还没有达到这个地步；政府仍然站得住。

为取消共同约章而制订的种种执行法，于 1874 年，在皇帝的影响下，以对教会尽可能调解的方式撤销了；关于国家对寺院实行监督的法律也推迟执行。关于协议的谈判每十年举行一次，因而 1876—77 年又到期，这一次对份额作了有利于奥地利的微小改变(68.6%:31.4%)。另一方面，国民银行(今后称为奥匈银行)，按照二元体制的形式予以改组。在有些人看来，例如在那个毫不妥

协的爱德华·赫布斯特看来，政府在关于协议的谈判中的态度过于软弱；内阁的困难增大，但它的倒台到了出现波斯尼亚问题时才注定。

二元君主国的外交政策，在博伊斯特的继任者尤利乌斯·安德拉西伯爵主持下，就已决定地转变为同德意志帝国合作。人们还同俄国和意大利接触，1873 年，在世界博览会开幕时，这三个皇帝和意大利国王在维也纳会晤。但是，安德拉西害怕俄国的影响过于强大，俄国开始在巴尔干表现得更加咄咄逼人，因此，他在外交上加强了与俾斯麦的合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尤其是自从那时以来德国宰相由于个人的和政治的矛盾越来越同俄国外交大臣戈查科夫分道扬镳。法国，特别是英国方面试图破坏奥地利与德国的合作，遭到安德拉西的反对。

在有信奉基督教居民的巴尔干各省中，尤其是在保加利亚，1876 年发生了起义；塞尔维亚人向土耳其人进攻，但被击败。1877 年，俄国向土耳其政府宣战，尽管土耳其人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这场战争最终导致得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起义者支持的俄国军队的大捷。奥地利面对这种局势不能无所作为。人们对战争有着不同的想法，最后得势的思想是，同德国和英国一道，在外交上对付俄国所策划的新秩序，这种新秩序已经在圣斯特法诺和约(1878年 3 月 3 日）的条款中已有所显露。在 1878 年 6 月 13 日柏林会议得以召开以前，还有一些危险尚待克服。柏林会议将决定巴尔干的领土新秩序。 421

持续大约一个月之久的谈判后来获致妥协，这些妥协更多地符合大国而不是小国的需求和愿望，而且毕竟还可以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全面地和平解决欧洲问题的最后一次。俄国不得不缩小它好高骛远的目标；它获得迄今属于罗马尼亚所有的南比萨

拉比亚，罗马尼亚得到多布罗加的补偿，而同样扩大了的国家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则在法律上独立。圣斯特法诺条约规定保加利亚独立并取得直至爱琴海的广袤地区，但是作为附属的公国仅以巴尔干山脉以北的地区为限，山脉以南则为"东鲁梅利亚"("Ostrumelien")①，那是一个土耳其省，由一个信奉基督教的行政长官统治，居民主要为保加利亚人。

关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决定，对于奥地利-匈牙利最为重要。这两个省构成达尔马提亚的天然腹地，居住着操塞尔维亚-克劳地亚语的居民，在信仰上则不划一。信奉正教的塞尔维亚人是人数上最大的集团(百分之四十以上)，然而，政治和经济力量却掌握在穆斯林手中(百分之三十以上)，特别是在大地主(Begs)手中。只有信奉天主教的克劳地亚少数民族(约百分之二十五)从一开始就希望合并于奥地利，穆斯林宁愿土耳其统治继续下去，正教徒则愿意合并于塞尔维亚。安德拉西和戈查科夫早在俄土战争爆发前，在波希米亚北部的赖希施塔特的一次会晤中已经讨论过波斯尼亚问题，如果土耳其在巴尔干的统治发生崩溃的情况时，二元君主国至少可以稳当地保住波斯尼亚，照安德拉西的见解，还可以保住那个较小的黑塞哥维那。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自然也觊觎这两个地区。后来，在柏林确定了，奥地利可以占领并统治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安德拉西在与土耳其政府的秘密会商中宣布，土耳其苏丹的宗主权继续存在——其实这当然是无意义的。奥地利还占据了战略要冲诺维帕扎尔行政区，这个行政区把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隔开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占领，虽然预言是比较乐观的，但是却需要在军事上花费很大的力气，在马格拉伊、

① "东鲁梅利亚"，历史上为保加利亚的一个地区，位于巴尔干和罗多皮山脉之间，主要的马里查冲积平原，沃土千里，首府为普罗夫迪夫(Plowdiw)。1878年经柏林会议确定，成为土耳其的一个省。——译者

亚伊采、巴尼亚卢卡等地，同伊斯兰义勇军发生过激战，直到所有抵抗全都被打垮为止。

一个出类拔萃的行政机构有时通过军事部门，有时通过民政部门，在克服草创伊始时不可避免的困难以后，做到使占领区的大多数居民同奥地利统治相和解，这个地区的经济力才有可能迅猛地发展，有效率的教育和卫生事业才得以建立。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斯拉夫的和西欧的报刊文章往往喜欢贬低或否定奥地利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文化的贡献，但是，奥地利的贡献并不因此而减色。 422

结盟政策与保守主义。塔弗政府

柏林会议结束后不久，二元君主国的内政和外交新方针就开始呈现。宪法党把波斯尼亚的占领看成是斯拉夫成份在哈布斯堡君主国中地位的加强，因此反对获取该地，可是，该地的获得却使皇帝感到满意，因为，皇帝自从执政初年遭受损失以来，这才第一次看到自己起着“帝国版图扩大者”的作用。奥尔斯佩格内阁由于遭到吉斯克拉和赫布斯特周围那帮人不断地反对，而不得不辞职。先是成立了一个由施特雷迈尔领导的过渡政府，又经过一次使“联合左派”重又失去不少地盘的新选举，终于在 1879 年 8 月 12 日成立了爱德华·塔弗伯爵领导的新内阁。这个政府依靠封建保守的霍亨瓦尔特俱乐部，以及捷克人和波兰人，这个联合政府证明是能够持久的，人们用一个体面的名字称呼它，叫做“铁环”。它得以维持十五年之久。

此后不久，在内莱塔尼亚[①] 的国内政策中，保守的、对斯拉夫

① 内莱塔尼亚(Zisleithanien)：莱塔河为多瑙河支流，为奥地利与匈牙利的界河，以西为奥地利，以东为匈牙利。内莱塔尼亚即指奥地利，外莱塔尼亚(Transleithanien)则指匈牙利。——译者

友好的派别占了上风，在外交方面，二元君主国与德意志帝国的联系更加紧密，三年以后就结成了一个包括意大利在内的三国同盟。

在柏林会议以后，俄国政府中的人士对俾斯麦和德国的怨恨情绪表现得比以前更加清楚可辨，彼得堡政策越来越多地被泛斯拉夫的、大概还有，泛正教的感情所支配，这一政策对于二元君主国产生了压力，凡此种种都必然使维也纳和柏林接近起来；有时，德国宰相甚至还害怕同沙皇帝国发生战争。俾斯麦想把同奥地利-匈牙利的同盟关系尽可能搞得密切些，他甚至想把这一点载入两国宪法之中，并且还补充以经济协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的中欧计划，似乎在这里已经有所预示。人们终于达成一项防御同盟，俾斯麦的广泛计划则为安德拉西所拒绝。1879 年 10 月 7 日缔结了维也纳条约，其中最重要条款申明，如遇到俄国进攻缔约双方中的一方时，则彼此有互相援助的义务；如果遇到第三国进攻时，人们应保守善意的中立，一旦这个侵略者得到俄国的支持，善意的中立就变为积极的援助。这条约是保密的，但其内容可以通知俄国，以便警告它不要发动进攻。1888 年 2 月 3 日实际上发生了这样的透露，那时，奥地利与俄国的矛盾更进一步尖锐化了。1879 年的盟约以五年为期，如不宣布取消，则自动延长三年。实际上，这个条约一再被延长，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仍然原封不动地有效；1881 年的三国同盟并没有代替“两国同盟”，只是补充了它。在草拟 1879 年条约时，下述情况是很值得注意的：安德拉西没有承认，遇到德国所不能不考虑的法国发动进攻的情形时，奥地利有援助的义务；人们根本不想被牵连到德法对抗之中。

安德拉西被奥地利内政的新方针所激怒，两国同盟条约签订后，他紧跟着就辞职；继他担任外交大臣的是海因里希·冯·海默勒男爵，1881 年 10 月，在他早逝之后，继任的是古斯塔夫·卡尔

诺基伯爵。卡尔诺基工作一般地做得比较谨慎，不总是很巧妙，但算得上巧妙，在他履行职务期间，1882年5月20日，二元君主国、德国和意大利签订了第一个三国同盟条约。发起签订这个条约的是意大利的外交官，在意大利，人们正由于罗马问题，新近又由于法国占领突尼斯，因而毫不掩饰地仇视法国，而法国昔日曾大力援助过意大利的统一。三国盟约由八条构成，其中以二、三、四条的规定具有决定性意义。意大利得到保证，如果法国未经冒犯而发动进攻，它可以得到两个缔约国的援助，它对德国也承担了相应的义务。当缔约的一方或两方被两个或若干个强国（条约文字中未具体指明）进犯时，盟约的义务亦属有效。最后，当缔约国之一由于自身安全的原因而被迫发动战争时，其他缔约国应允保守善意的中立。根据意大利的愿望，在补充声明（"曼齐尼声明"）中规定，该条约并非针对英国。意大利期望从这个国家得到对它的非洲政 424 策的支持，并且还由于它那可遭受危险的海岸，它害怕与主要的海上强国发生任何冲突的可能性。

意大利从新条约中明显地取得最大的好处，它得到两个缔约国的援助来抵挡法国的侵犯，而在俄国侵犯奥地利时，它只承担保守中立的义务。此外，意大利的加盟，无论在奥地利政府人士中，还是在人民当中，都不受欢迎；对这位新盟友的不信任始终都没有消除，它的建国正在进行，但有损奥地利的利益，由于争取合并运动[1]在韦尔施蒂罗尔[2]地区和滨海地区的活动，人们理所当然地

---

① 争取合并运动（Irredenta），意大利独立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争取凡居住有意大利少数民族的邻近地区合并于意大利，Irredenta 后泛指各国争取合并于祖国的政治活动。——译者

② 韦尔施蒂罗尔（Welschtirol），即 Trentino（特兰提诺），指前奥属蒂罗尔的意大利语地区，位于萨卢恩和加尔达湖之间，其首府为特兰托，从1919年起成为意大利的特兰托省。——译者

认为，对奥地利领土的野心还没有得到满足；意大利对奥地利的情绪很可能还是不友好的。

1879 年的两国同盟始终没有变动，一直有效，而三国同盟却已修订过两次。1887 年，意大利在两项补充协定中获得参与决定权的许诺，如果“巴尔干地区或亚得里亚海和爱琴海地区的奥托曼帝国的海岸和岛屿”的现状发生变动的情形时，二元君主国和意大利应在互相谅解和互不损害的条件下协同行动。外交大臣卡尔诺基在接受这些条款时表现得很笨拙，尤其是意大利最初只不过要求提到海岸和岛屿，未要求提到巴尔干，奥地利的切身利益在巴尔干，意大利的巴尔干政策更多地属于民族威望的问题。在 1891 年，对于意大利在北非的野心（昔兰尼加、的黎波利和突尼斯），德国表示允予支持一个“按照先前协议”所采取的行动。正如人们所看到的，三国同盟条约后来的补充结果是完全有利于意大利的。

三国同盟的明显的防御性质使别处的独立结盟政策有可能产生，意大利后来就充分利用了这种结盟政策。就涉及德国之处来说，俾斯麦一向强调同俄国友好相处的价值，1887 年，他与俄国缔结了一项相互保证条约，这条约保证在法国侵犯德国时，俄国保守中立，作为遇哈布斯堡侵犯俄国时，对德国保守中立的酬谢。三国同盟还得到另外一个补充，就是奥地利与罗马尼亚的攻守同盟，签订于 1883 年，重申于 1913 年。德国参加了这项协议。

自从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奥地利的巴尔干政策的脆弱性越来越明显，受奥地利保护的塞尔维亚国王米兰刚刚于 1885 年主动向哈布斯堡帝国提出塞尔维亚愿意归并，结果徒劳无功，他本人在与因合并东鲁梅利亚而扩大了的保加利亚的战争中身亡。只是奥地利为了塞尔维亚而进行干预时，保加利亚这才放弃领土要求，被迫言和。其后不久，获胜了的保加利亚统治者亚历山大·冯·巴滕

贝格被推翻;他的继承人、国王费迪南是个狡猾多端的政客，掌权比较牢固，采取一种在大国之间随机应变的政策。1889 年，塞尔维亚国王米兰逊位于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从此俄国的影响就在该国增大起来。

在这期间，塔弗时代的奥地利国内政发生了种种命运攸关的变化。这位总理大臣，保守的天主教徒和封建的"波希米亚人"，即狭隘的爱国者，并不觉得自己是个捷克人或德意志人——他的家族出身于爱尔兰——他首先是皇帝的心腹，但是，作为政治家，他得到的评价应高于德意志民族主义或自由派厌恶情绪所长期愿意给予他的评价。无论如何，塔弗可以说是一个巧妙的策略家，尽管也作些微小的让步，他还是设法维护原则性的东西。1880 年的语言法令规定，外部的捷克官场语必要时可在苏台德地区的纯德意志地区内使用。塔弗通过这个法令就使通常独自通晓所有两种语言① 的捷克人易于进入官界。由于布拉格大学的分散（1882 年），捷克人上了本民族的高等学校，司法大臣普拉日阿克的活动对他们也有利。但，无论如何，塔弗处事不象后来他的后继者巴德尼那样粗暴，人们不得不承认，塔弗的语言法令是相当有道理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捷克民族的政治和文化发展所造成的必然结果；达尔马提亚的塞尔维亚克劳地亚人 (Serbokroaten)——这个邦的居民的大多数——也表示了他们在语言上的愿望。从广泛的见地来判断，塔弗的和解政策自然是失败的。波希米亚的民族斗争规模越来越大；1890 年一月，塔弗在维也纳进行关于协议的谈判时，这项工作由于遭到民主主义的，但也是民族主义的青年捷克人党的反对而失败，该党在前一年的邦议会选举中战胜了因循守旧的老捷克党人，这时又提出了塔弗所无法满足的要求。于是，他

① 按即捷克语和德语。——译者

就设法接近过去他曾激烈地反对过的德意志自由派。

塔弗的保守的改革性社会政策比较起来最为成功，在某些方面很象俾斯麦的范例。农民的继承顺序解决了，实现了有限但总算是有效的工人保护立法(工商业监督、劳动时间的限定、事故和疾病保险)。工人阶级的大部份希望当然没有能实现，八十年代中期一再发生工人闹事和激进分子和无政府主义分子的暴力行动，人们想试用警察权力和禁令立法来对付。1888 年底，社会民主党的最重要领袖维克托·阿德勒在海因菲尔德党代表大会上克服了把工人运动分裂为温和派和激进派的行动。为了在人民代表机构中更显出他们得到群众拥护，当然需要把选举权扩大到最贫穷的居民阶层。这件事似乎 1893 年就要发生。

426

1882 年时，塔弗对选举权的民主化已经略有贡献，那时赋税限制(即选民的最低限度纳税能力)从十盾降至五盾，于是一部份农民和小资产者就得到了选举权。1893 年 7 月，社会民主党举行争取选举权的大会，塔弗在帝国代表会议上提出一个议案，这提案虽然没有带来普遍、平等和直接的选举权，但是，在城乡选区内实行的选举团选举权的范围内，选举权扩及一切国家公民。为了反对这个提案，迄今执政的联合力量组成的重要集团、霍亨瓦尔特的封建派和波兰人都同自由反对派结合了起来。选举提案没有通过，政府也就跟着垮台，这个政府技艺精湛地推行一种零星的策略性让步政策——被人恶意地称之为“依旧笨拙地蛮干”。后来发生的就是二十多年的奥地利政治危机，这些危机后来汇合于世界的大浩劫之中。

还要提一件在塔弗当政期间发生的悲惨事件：1889 年 1 月 30 日，王太子鲁道夫在迈尔林猎狩别墅自杀；他还带着他的情妇玛丽·维泽拉男爵夫人一同去死。关于“迈尔林悲剧”已经写得非常

之多，当然写得极不严肃，还有很多揣测，但，事件的直接原委依然未得到澄清。鲁道夫在政治中没有能活跃地从事活动，他个人与其父的冲突，因与比利时公主斯特法妮极其不幸的婚姻而引起的失望，无论如何与此有关。鲁道夫个人倾向德意志自由派和马扎尔人，他持有反俄态度，并且还反对与德国合作得过份密切，尤其是在威廉二世亲政以后；此外，父亲对军服的偏爱，对于王太子却格格不入。于是鲁道夫的堂兄（Cousin）弗兰茨·费迪南·冯·哈布斯堡-埃斯特大公爵就成了王位继承人，此人后来却显出是个喜好荣誉和努力奋斗的政治家，同皇帝也不能合得来。在世界观上，弗兰茨·费迪南与鲁道夫完全不同，他的立场是严格的保守天主教的立场。鲁道夫的下场特别震动了他的母亲伊丽莎白皇后，她大部份时间都同弗兰茨·约瑟夫分居，她度过不宁静的一生以后，自己也死得很惨，1898 年 9 月 10 日，她在日内瓦湖畔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笨蛋的毫无意义的暗杀的牺牲品。 427

政治危机与民族斗争(1894—1914)

在塔弗的“铁环”① 被炸坏以后，君主国注定还有二十个和平的年头可过，在这期间，这位皇帝大臣的德意志自由派敌人确实被人斗倒了，当然不是被塔弗那一类的保守派所斗倒的。德意志民族派的起源前已述过，该派的激进领袖是格奥尔格·冯·舍纳雷尔，瓦尔德菲特尔的罗泽瑙宫的所有者，曾相当露骨地宣扬过，他的最终目标在于把德意志奥地利地区，包括苏台德区在内，合并于德国。德意志民族派盛赞俾斯麦的政策，但却很不理解。在他们的偶像俾斯麦那里，他们的热爱没有得到应有的答谢，因为俾斯麦把

① 塔弗的联合政府执政时间比较长，被人称之为“铁环”(Eisener Ring)，参见前节第一段。——译者

多瑙河君主国的存在看成是德国安全必不可少的条件，甚至也是德国文化在中欧东南部发生影响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德意志民族派的反教会情绪到了世纪交替时才采取比较猛烈的形式，而排犹主义早就成为他们的世界观和政治概念所注意的主要对象。1882年的大德意志的“林茨纲领”部份地是犹太人起草的，这个纲领差不多同以前的自治要求相符，主张与德国最密切地合作，以及德意志国语在奥地利使用，它还包含一些社会要求；后来的社会党领袖维克托·阿德勒和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弗里德容也参加了起草。将近八十年代中期，舍纳雷尔努力争取一种激烈的排犹方针，谁要是不能或不想参加，就必须退出“联合基督徒”运动，德意志民族派和基督教社会派暂时仍在这个运动中合作。1888年，一个鲁莽的越轨行动使舍纳雷尔被捕入狱并失去他的后备役军官的衔级，“联合基督徒”的党羽大多数从此就追随卡尔·卢埃格尔博士的基督教社会运动，而德意志民族派自己也在闹分裂。舍纳雷尔留下 428 的只是一个分裂出来的小团体（“全德派”）；“德意志激进派”的领袖卡尔·赫尔曼·沃尔夫开始活动时比较有成效，直至私人的丑行最后使他在政治上声败名裂为止。读到这一些，人们不应忘记，大德意志思想的吸引力不仅局限于激进民族主义集团，它在自由派和天主教阵营里也有拥护者，而且在民族斗争中，德意志团体，如1880年成立的“德意志教育协会”，曾展开过活跃的争取边疆及岛屿德意志人的活动；斯拉夫人和意大利人也有类似的组织。

在世纪更替前后，在倾向基督教或天主教的政党当中，是基督教社会党把保守分子从首位排挤掉的。保守派在西部阿尔卑斯各邦，首先在蒂罗尔，已真正成为一个人民党，而在维也纳和奥地利多瑙河各邦，基督教社会运动才为具有基督教色彩的反自由派势力建立起一个群众基础。他们的最重要领袖卡尔·卢埃格尔博士

就是以自由派政治家开始他的生涯的，但是，不久，在区参议伊格纳茨·曼德尔博士的影响下，便走上自己的道路。他同福格尔桑和下奥地利的自由派领袖阿洛伊斯·列支敦士登亲王发生联系；1887年，他参加了由路德维希·普森纳和亚当·拉奇卡建立的"基督教社会协会"，从1891年起，在政治斗争中，"基督教社会党"在卢埃格尔领导下发展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卢埃格尔懂得利用蛊惑人心的词藻去争取人，尤其是维也纳的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在他的宣传鼓动中，有宗教信仰色彩和经济因素的排犹主义起着一种相当大的作用。与舍纳雷尔不同，卢埃格尔表示毫无保留地矢忠于奥地利的国家思想，可是很长时期未能消除保守的宫廷和军界人士以及高级教会人士对他的不信任。后来，基督教社会党被它的敌人，如布拉格的枢机主教申博恩和维也纳人、多明我会神父阿尔贝特·玛丽亚·魏斯在罗马宣布为异端；但是，教皇使节安东尼奥·阿格利阿迪站在他们那一边。列支敦士登亲王参加了他们的运动，主要的基督教社会派理论家弗兰茨·马丁·申德勒教授，一位德意志波希米亚出身的神学家，为基督教社会党争取到十分关心社会改革的教皇利奥十三世的善意的关怀（1895年）。在这期间，对政治颇感兴趣的、又有组织才干的鞍匠帮工利奥波德·孔沙克于1892年开始争取基督教工人，当然没有象社会民主党人那样能争取到那样多的追随者。

社会民主党是由维克托·阿德勒统一起来的，它的群众基础在下奥地利、施蒂里亚和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工业区的工人之中；自从1890年以来，它每年都举行五月庆祝活动，在公众中已经很突出。在世界观方面，他们早就离开拉萨尔的学说转向马克思的学说，并在政治实践上常常不得不修改它（当然不承认就是了）。发生过热烈的理论性争论，在其中，卡尔·考茨基尤以纲领性论著 429

著称。在反对政敌的斗争中，恩格尔贝特·佩纳施托费尔，是阿德勒的最得力的战友，他曾长期动摇于德意志民族派和社会主义思想之间。由于他为社会主义文化运动所从事的活动，他变得很重要。

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在原则上采取国际的立场，但它不得不去亲身体验民族斗争；这个统一的党必须改变成一个由各民族党组成的联盟，这个联盟后来又由捷克的社会民主党所破坏，该党的政策有时也具有近乎民族主义的性质。具有完全不同性质的超民族的团体自然也遭到同样的命运。1896年，保守的霍亨瓦尔特俱乐部在议会中分裂为斯拉夫-基督教联盟和德意志的、保守的人民党，前者尤其被视为鲁特尼亚人、克劳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的代表。在塔弗时代以后的政府统治下所发生的事件的过程表明，民族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君主国的主要政治问题。

继塔弗政府接任的是阿尔弗雷德·温迪施格雷茨侯爵主持下的内阁，这个内阁依靠自由的联合左派、霍亨瓦尔特的党羽和波兰人的联合力量；自己队伍里的阻力简直是太大了，尤以波兰人为甚。温迪施格雷茨之所以垮台，是由于1895年预算中的一个具体问题，即在施蒂里亚南部的齐利城的德意志中学里成立斯洛文尼亚平行班的问题。在马尔堡已经有过类似的解决法，小城齐利的资产阶级却感觉到来自四周斯洛文尼亚乡村的人缓慢渗入的威胁；正当温迪施格雷茨想兑现早已向斯洛文尼亚人许下的诺言时，联合左派却抛弃了他。

在基尔曼斯埃格伯爵短命的过渡内阁下台以后，成立了加利曾总督卡西米尔·巴德尼伯爵领导下的、为皇帝所盼望的“强硬政府”，除巴德尼以外，参加奥地利内阁的还有两个波兰人，爱德华·里特纳和莱昂·比林斯基，而小阿格诺尔·戈卢霍夫斯基伯

爵早就从 1895 年起担任帝国和王国的外交大臣。巴德登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他解除了因发生恶劣的越轨行为而在布拉格宣布的紧急状态，因而争取了青年捷克党人。在维也纳存在着特殊的困 430 难，基督教社会党在市议会里取得多数，卢埃格尔被选为市长。重新选举结果也是一样，对于两次市长选举，皇帝都没有表示同意；结果是卢埃格尔的拥护者在街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第三次选举卢埃格尔还是胜利者；皇帝劝他放弃一个短时期。卢埃格尔的党内朋友施特罗巴赫任市长之职一年，1897 年 4 月，维也纳基督教社会党的首领终于接受了这个显职，次年就开展了积极的、意义重大的市政活动。煤气和电力厂，跟有轨电车一样，都被市区所接收，第二个高山泉自来水建成以供饮用(第一个还是自由派管理市政时所建)，城市卫生工作有很大的改进。在二十世纪头十年里，维也纳市的经济有很大的发展。令人不愉快的是卢埃格尔的有党派色彩的人事政策，它有计划地排斥一切异己分子。这个先例以后就有人效法。

1897 年，总理大臣巴德尼把塔弗和温迪施格雷茨所没有做到的选举改革付之实施。四个代表团 (Kurien) 以外又补充了第五个，属于这个代表团的所有男性公民(二十四岁以上)都有选举权，共 425 个议员职只有七十二个分配给这个“总代表团”。1897 年 3 月进行新选举时，在这个选举团中，头十五个社会民主党人进入奥地利帝国代表会议；基督教社会党人共选出二十六名议员，德意志民族党四十七名，德意志自由派团体共七十七名。由于根据纳税能力决定议员的比重过大，群众性党派无法按照人数在人民代表机构中相应地表示出来，不过，它们还是派出了几个很活跃的议员。

在选举改革成功以后，巴德尼由于他的语言法令而倒台。第一个法令要求波希米亚的所有文职官员在履行职务时使用两种语

言①，第二个法令规定，所有官员在今后三年内都要彻底通晓这两种邦语言。类似的规定也向摩拉维亚颁发了。这些法令当然首先涉及全体德意志官员，然而，巴德尼却避免与德意志议员作任何接触。反应是相应地激烈的，在维也纳和别的城市发生了严重的街头示威游行，在帝国议会里发生了混乱的场面。反对派发表冗长的演说，力图阻止政府提案的通过——这种"阻挠"方式还是最温和的——甚至还大打出手，于是，巴德尼根据在骚乱不堪的会议上强行通过的"法尔肯海恩法案"(lex Falkenhayn)，叫警察把几个议员赶走。动乱有增无已，1897 年 11 月 28 日，皇帝下令关闭议会，罢免巴德尼。

431

这位波兰伯爵留下了吃力不讨好的遗产。他的继任者高奇·冯·弗兰肯图尔恩男爵，巴德尼领导下的教育大臣，依靠政府的紧急状态法(§14)进行统治，帝国代表会议变得无能无力。高奇想用按民族垦殖的界线重新划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区县，借以争取苏台德区德意志人；这又使他遭到捷克人的反对。高奇以合理的、但可以作不同解释的措词来修改巴德尼的语言法令，措词是这样的：每一官员必须通晓在工作中必需的语言。继高奇内阁于 1898 年 3 月就职的是弗兰茨·图恩-霍恩施泰因伯爵领导的内阁，此人是一个波希米亚封建贵族，中立于各民族之间，但实际上倾向于捷克人。图恩想通过谈判的途径来解决讨厌的语言纠纷，但，同他的前任一样，成效甚少，斗争又重新搬到街头。民族的激愤已经被大大地鼓动起来，连有见识的政治家都无法走谈判的路，因为他们不想身上承担出卖民族的污点。此外，各个民族集团不仅由于党派政治的差异，而且也由于地区的差异而分开。苏台德区的德意志人力争按照民族来划分行政区，而施蒂里亚人、克恩滕人和蒂罗

① 按即捷克语和德语。——译者

尔人则坚持他们邦的整体性，而对蒂罗尔内部的特兰提诺则承认其自治。不同于韦尔施蒂罗尔人，格尔茨-格拉迪斯卡、的里雅斯特和伊斯特里亚的意大利人，甚至达尔马提亚的微小的意大利少数民族，都坚持他们历史上形成的特权不放。波兰人想扩大他们在奥地利西里西亚的少数民族权利，但又要维持他们在加利曾的霸权，在那里，他想压制鲁特尼亚人。纷争的程度也因地而异，在波希米亚则比在摩拉维亚或西里西亚猛烈，在多语言的布科维纳则比较地小。在高级官僚中，在现役军官中，在高级教士以及部份贵族中，黑黄色的[1] 国家爱国主义情绪仍很活跃，而下级官员、后备役军官和低级教士则更多地感到自己对本民族，而不是对国家负有义务。而受骗的等级集团的态度则因民族而异。在波兰人和捷克人那里，特别是在斯洛文尼亚人那里，教士往往领导着民族运动，而德意志民族集团则怀疑在民族问题上操德意志母语的天主 432 教教士是靠不住的，而天主教的政治代表人物则无论如何是靠不住的；这种心理加强了，因为阿尔卑斯山区各邦的保守的天主教人民党在议院投票时暂时同斯拉夫人合作。所以，在巴德尼公布语言法令时，被舍纳雷尔支持的"脱离罗马"运动就发生了，这个运动虽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成就，但却使七万人改信新教或旧天主教。大多数民族主义集团都持有排犹的态度。这一事实不能不反作用于犹太人的态度。维也纳的作家和编辑特奥多尔·赫茨尔发起了一个犹太民族的郇山运动，当然只是在少数他的信徒中才受到欢迎；维也纳犹太人多半坚持同化思想。排犹主义潮流尤其取决于经济条件，民族斗争有时在经济领域里也很明显，如，有时这样宣扬，商务交易应优先与本民族的成员进行，或者，应在边境地区或有民族争议的地区购买房地产，以便巩固自己的地位。

① 黑黄色是奥匈帝国的国色。——译者

无论如何，指出共同的经济利益固然不能克服民族主义，但却可以避免尖锐的民族斗争。这至少是君主国后期的一个最有才干的政治家的见解，他叫埃内斯特·冯·克贝尔，他在克拉里-阿尔德林根过渡内阁和短命的维特克内阁以后，得以在1900年1月18日提出他的内阁来。克拉里-阿德林根内阁撤销了语言法令，把份额降低到百分之六十五点六，从而成功地进行了关于协议的谈判，当然，谈判不是在帝国代表会议内结束的。克贝尔任职将近五年。他不久就看出，他也不能在试行波希米亚行政区划新秩序方面有什么突破，因为波希米亚行政区划已经成为民族纠纷之源，于是，他就着手制订大规模的经济计划，计划的要点是大力扩充交通联络，办法是修建铁路和开凿运河，为此拨出了巨额资金。实际上，至少铁路方案的大部份已经实现。关于协议的谈判拖沓了好几年，终于在1902年结束。另一方面，克贝尔和弗兰茨·约瑟夫皇帝的关系也不见得特别好，他无法迎合各民族主义集团的心意，于是，敌意不久就从捷克人和波兰人扩大到德意志人，匈牙利人尤其对他表示不欢迎；因此，克贝尔于1904年年底辞职。

433 帝国两个半壁河山的关系变化多端，二十世纪初，经过几个比较平稳的年头以后，又重新发生尖锐的危机。在进行协议谈判期间，匈牙利总理大臣科洛曼·塞尔提出非常广泛的要求，此外，匈牙利议会又拒绝增加军队限额的要求。在匈牙利人看来，尤其是在坚持科苏特传统的独立党，以及阿波努伊伯爵的保守的党羽看来，一支共同的军队不啻是他们的眼中钉，目中刺。对于共同军队所遭到的猛烈攻击，皇帝以1903年9月16日的著名的赫洛皮（一个加利曾操练地）军令作答，“朕之军队仍应一如现在那样，既是共同的，又是统一的。”尽管这些词令很是有力，但是要不了多久，在军队问题上又继续迁就匈牙利人（成立一支国防炮兵和语言上的让步）。

变得越来越冷酷无情的匈牙利民族政策成了君主国内部结构的一个沉重的负担；人们有系统地使那个社会地位上升的阶层疏远各民族。这个政策当然并不具有种族的侵略倾向，相反地，人们接受了凡是愿意合并于马扎尔的人，不少人自愿地采取了这样的步骤，特别是在德意志人（西本比尔根的萨克森人例外）、犹太人和鲁特尼亚人当中是如此，而罗马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的反抗，由于他们依靠正教教会或联合教会，而变得更加猛烈；斯洛伐克人采取中间立场。克罗地亚人由于该邦的特殊位置多少有些保障，但是，颇受马扎尔或"亲马扎尔的"(magyaronische) 总督，如库恩-黑德尔瓦里和丘瓦伊的恐怖主义激情之苦。在国外，人们对二元君主国的复杂的宪法关系几乎没有好评，匈牙利的民族政策的过错往往被推到奥地利人身上。皇家为了不致得罪于马扎尔人而避免同克罗地亚人作认真的联系，显然是个大错。有时也有达成特殊结盟关系的，如1905年秋，一部份克罗地亚议员对维也纳的态度不满，在"阜姆决议中"表示赞成独立党和阿波努伊的要求以及塞尔维亚的愿望。

在1905年这同一年里，再度有可能冲破在人数上不太强大的匈牙利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人士的统治，这些人士无论在科罗曼和斯特凡·蒂萨的自由执政党内，还是在较年轻的科苏特和阿波努伊的追随者当中，影响都很大。该年1月，独立党取得选举胜利，随即提出一个毫不妥协的要求纲领。斯特凡·蒂萨不得不辞职，统治者就委托盖扎·冯·费耶瓦里将军组织政府。内阁的真正首脑是内政大臣约瑟夫·克里斯托菲，他建议实行普遍选举制来彻底改变匈牙利人民代表机构中的多数比例制。1906年2月，议会甚至被解散，并由军人来腾清。看来建议似乎有可能贯彻；人们讨论过一项妥协，匈牙利的联合力量放弃其广泛分散军队的军事纲领，而保留了政权。他们没有实践他们的选举改革诺言，主要

434

是顺利地继续推行马扎尔化。

其实，1905年的匈牙利危机的意义在于它对帝国的奥地利部份所引起的后果，因此应予详尽的评价。克贝尔政府下台后，保罗·高奇男爵又重新受命组阁。在匈牙利实行普选的建议，使奥地利也产生了同样的愿望；下述情况大概起了一定的作用：在俄国，作为1905年在不同情况下失败了的革命的结果，成立了人民代表机构“杜马”——人们当然不甘心落后于沙皇帝国。在奥地利，有些集团担心政治势力会缩减，它们有力的反对当然妨碍了普选的推行；封建贵族的，以及一些德意志的和波兰的阶层已预见到在社会和政治斗争中，他们的地位会发生动摇。对于选举权建议得以最后实行起决定作用的，应当是皇帝的态度。宫廷和政府人士希望，普选能加强宗教的和社会主义的群众性政党，削弱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集团，从而缓和民族斗争；这些希望后来并未完全实现。1906年，高奇提出了选举权提案，但未能贯彻执行。在霍亨洛厄的过渡内阁以后，跟着就是马克斯·弗拉迪米尔·冯·贝克男爵的能干的内阁，它贯彻了1906年的选举法。德意志人和意大利人在为选举提案斗争时，要求考虑他们较高的赋税，斯拉夫民族则仅希望接受他们的选民人数；如通常在奥地利那样，后来达成了妥协，妥协自然更符合人数原则。德意志人负担着内莱塔尼亚地区赋税的百分之六十三以上，但只占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五，取得了席位的百分之四十三，因为德意志地区的选区一般地较斯拉夫地区的选民为少。意大利人和布科维纳的罗马尼亚人情况也类似，在人数上略有照顾，鲁特尼亚人则略有吃亏，但恰恰是他们，同以前的情形相比，获得的好处最多。由于一度盛行的赋税思想所产生的影响，不能低估选举改革；1907年5月，第一次按照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的选举权选出了议会，而三十年以前男性人口有选举权的不超过百

435

分之六。妇女则到了共和国时才享有选举权。

照新选举法举行的头几次选举就使群众性政党获得了预期的进展。社会民主党人出了八十七个议员（其中四十九个德意志人），基督教社会党与很好地坚持下来的最后的保守派一起，达到九十六个议席。属于德意志民族联盟的有各种流派的九十个议员，多半为温和集团的党员，如德意志人民党、德意志农民党和德意志进步党，但也有 K·H·沃尔夫领导下的十三个德意志激进派，舍纳雷尔分子当选的只有三个人。舍纳雷尔本人落选，他那个党是这次选举的真正失利者。

在这次竞选斗争中，民族谅解政策获得地区性的，但并非不重要的成就。在 1905 年，"摩拉维亚协议"在该邦的捷克人和德意志人协同合作下缔结了。从此，邦议会的选举就以选民地籍册为基础，按照民族选举团制来进行，德意志人和捷克人的议员数是固定的，只是在民族选举团内各党派为议席而斗争。固然，按照这个原则，一个德意志人只能选德意志人，一个捷克人只能选捷克人——但是，别的情况再也不能预料会发生。类似的民族协议于 1910 年还在讲四种语言的布科维那达成；1914 年，在加利曾，协议在波兰人和鲁特尼亚人之间已经谈妥，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这样看来，民族矛盾不是不可克服的；如果没有外界的影响，谅解就容易取得一些，如在俄日战争之前和战争期间，那时俄国的兴趣集中于东方，泛斯拉夫主义暂时失去了它的现实紧迫性。这种情况后来在 1905 年以后又改变了。

二十世纪初年，在奥地利，人们在一些严肃的理论著作中研究了哈布斯堡君主国的民族问题。在社会民主党方面，特别是党后来的领袖卡尔·伦纳(1899 年，1902 年)和奥托·鲍威尔(1907年)发表了纲领性著作；伦纳以"西诺普提库斯"和"鲁道夫·施普林

格”的笔名发表政论文章，提出职工自治论的原则，从而创造出一个新的讨论基础。1917 年以后，苏联的民族政策利用了这些论著，使这些论著的不同部份就获得某种实际意义。接近王太子的西本比尔根罗马尼亚人奥雷尔·波波维奇的著作《大奥地利合众国》(1906 年)颇受人注意，该书为君主国的十一个民族定出十五个民族的和国家的单位，德意志、意大利和马扎尔的垦殖区在地域上的分散已被考虑到。所有这些用意良善的、足以证明致力于尽可能公正地解决奥地利民族问题的建议吃亏就在于：实际政治事实的阻力极大地妨碍着它们的实现，而且，此外显示出来的东西是更多地属于对人们经常盼望的解决方案的描绘，而不是获致这种结果的途径的描绘。

在 1907 年选举后得到人员补充的贝克政府还做出一些成绩来，协议谈判以有利于奥地利的 63.6%:36.4% 的份额告终，奥地利的预算、征兵方案和北方铁路的国有化都相当顺利地获得批准。在为解决波希米亚内部的紧张局势而进行的谈判中，贝克虽有良好的摩拉维亚范例，但仍然劳而无功。贝克同他以前的恩人——大公爵兼王太子的冲突也是令人担忧的，其根由在于选举改革和所谓在协议谈判中过于迁就匈牙利政府的问题。最后，还有“瓦尔蒙德事件”也是非常不愉快的，那是围绕着因斯布鲁克的教会法教授路德维希·瓦尔蒙德个人而进行的争论，因为他声色俱厉地发表了反教会的意见。天主教会在教皇使节支持下，要求撤他的职；反教会人士却看到教学和学习自由受到威胁。后来，教育大臣马尔歇以妥协来解决了这个事件，瓦尔蒙德被调往布拉格。激动情绪仍未消除，贝克和马尔歇越来越不受宫廷宠爱，1908 年 11 月 15 日，贝克被撤职，那时二元君主国正好处于严重的外交危机之中。

在意大利和德国的阵地丧失以后，巴尔干似乎成了活跃的奥地利外交政策的唯一活动场所；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占领可以从这个意义上得到解释。自从小阿格诺尔·戈卢霍夫斯基伯爵作为卡尔诺基的继任人，接掌君主国的外交事务以来（1895 年），保持现状当然就成了奥地利巴尔干政策的适中目标。同塞尔维亚的关系成为主要问题，而这一关系发展得绝不是顺利的。塞尔维亚军官在贝尔格莱德宫谋杀国王亚历山大·奥布雷诺维奇及其夫人(1903 年 6 月 11 日)，卡拉乔治耶维奇王朝的彼得国王的就职，437 尤其是尼古拉·帕西奇领导下的亲俄的激进党在塞尔维亚政治生活中占据优势，凡此种种都使二元君主国和这个比邻的巴尔干国家之间的关系增添越来越多的紧张因素。这种危急的事态发展，随着奥地利-塞尔维亚商约满期后发生的 1906 年的"猪战"，而达到令人忧虑的尖锐状态。塞尔维亚依靠向奥地利出口农产品，而匈牙利地主对这种出口自然不欢迎，因为它同自己的产品的销售发生竞争；德国的经济政策使奥地利的牲畜出口变得困难起来，也起着不良的作用。无论如何，在君主国和塞尔维亚之间发展成一种经济战，君主国封闭了自己的市场，而塞尔维亚则不久在别的国家里找到了补充市场。在这个时候，塞尔维亚民族的广大农民阶层反对奥地利-匈牙利的仇恨之火才熊熊燃烧起来。

在戈卢霍夫斯基以后，有一个具有另外一种思想、又肯定具有非凡才干的政治家成了奥地利对外政策的领导人：阿洛伊斯·莱克萨·冯·埃伦塔尔男爵(1906 年)；他和那个几乎同时接掌俄国外交部的亚历山大·伊斯沃尔斯基成了巴尔干问题中的重要对手，两人都追求胜利，而他们除了互相作对以外是无法获取胜利的。埃伦塔尔大概比较更有才干，他在上演他那个拿手好戏，即合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时候，居然蒙骗了伊斯沃尔斯基——

当然还有一些附带情况，这些情况几乎引起一场欧战。奥地利计划修造一条经过诺维帕扎尔区到达萨洛尼卡的铁路——建成的只是从维也纳到阿斯庞这一小段，但，这个计划在俄国引起极大的震动，人们甚至想打仗，可是，这个问题被解决了。埃伦塔尔的第二个计划涉及改变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宪法地位；这两个邦在法律上应与哈布斯堡君主国结成一体，这样，占领就变成了合并。青年土耳其革命者①的计划对此起了极大的作用，他们在推翻阿布杜勒·哈米德苏丹以后想实行议会制度，也想在形式上仍处于土耳其苏丹最高权威下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地区进行选举，而这却是奥地利所不能允许的。同大国合作以解决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法律地位也许是可以办得到的，埃伦塔尔担心合并问题与种种其他问题混淆，他先是在布赫劳(摩拉维亚)的一次会晤中，非正式地向伊斯沃尔斯基提起合并问题，然后就想突然宣布合并。由于奥地利驻巴黎大使粗枝大叶，合并的消息比预定向公众宣布的时间提前三天透露出去(1908 年 10 月 3 日)。同时，人们当然也获悉，奥地利-匈牙利放弃了对诺维帕扎尔地区的占领权。俄国和塞尔维亚发出战争的警报，土耳其当然提出抗议，连英国也作了极不友好的反应，甚至盟友德国和意大利也怏怏不乐起来。埃伦塔尔到底还是避免了好战行动的扩大，土耳其得到了赔款。由于俄国从远东战争和革命中还没有缓过气来，德国坚决帮助二元君主国，法国没有参加它的盟友掀起的愤怒风潮，因而和平得以维持，最显露头角的塞尔维亚也就不得不退却。合并的危机以埃伦塔尔和伊斯沃尔斯基在英国《半月评论》杂志上发表激忿的论战文章而告终；依旧不变的是，同俄国和塞尔维亚的关系继续恶化。

438

① 指 1908 年促进脱离德国、争取民族独立的土耳其革命运动，凯末尔曾参加于其中。——译者

同意大利这个三国同盟伙伴的关系也受到了影响，这影响也差不多同样不利。意大利那时同法国已有广泛的联系，法国恰恰也就是三国同盟给意大利支持，以便予以防范的那个国家。意大利于1900年由于它在的黎波利的利益而与法国联合一致，两年以后，意大利外交大臣普里内蒂在与三国同盟的伙伴们谈判的同时，与法国缔结了广泛的协议，其中规定，如果法国为了“保护自己的荣誉”而向德国宣战时，意大利保守中立。同时，意大利强行实施它的巴尔干政策，他们特别觊觎的是阿尔巴尼亚，而控制了阿尔巴尼亚就可以完全掌握奥特朗托海峡。因奥地利在巴尔干地位的增强而给予意大利以“补偿”的问题现在表现为这样：意大利可以索取奥地利的领土或者通过固守阿尔巴尼亚而封锁亚得里亚海。在合并危机期间，埃伦塔尔当然很少照顾到二元君主国的盟友，在这次危机之后，意大利当时的外交大臣蒂托尼，在沙皇访问意大利时，与俄国政府联系并缔结了拉科尼基条约，这个条约特别涉及巴尔干问题，并有意识地遏制哈布斯堡帝国的任何扩张，而他们却同意对自己那些涉及土耳其海峡和的黎波利的扩张计划互相支持。除此以外，与母国合并运动这个问题依然存在，并且是又一个负担。奥地利的疑虑在增大，帝国和王国军队的总参谋长康拉德·冯·赫岑多夫一再研究对意大利发动一次“预防性战争”的设想，当然，埃伦塔尔并没有听取他的意见。

在奥地利内政中，在贝克倒台后，组成了里夏德·冯·比纳特-施默尔林男爵领导下的内阁，他任期的特点是在帝国议会内，阻挠议案与真正工作奇怪地一再反复交替。在波希米亚，获取德捷协议的尝试又再次失败，然而，一些经济政治提案却获得通过。1911年春，议会举行新的选举——以普选为基础的第二次，也是在君主国内的最后一次。在卢埃格尔去世(1910年)后，基督教社 439

会党由于阿尔贝特·格斯曼和恩斯特·费尔加尼的党羽发生内讧而削弱，在这次选举中遭到惨败，尤其是在维也纳。社会民主党人则坚持得比较好，但，由于他们的捷克党内同志的过火行为而受损，而德意志自由的和民族的集团由于合并成德意志民族联盟而得到好处。在德意志奥地利议员中，有九十九个是这个联盟的成员，基督教社会党议员的有七十四个，社会民主党议员的有四十四；十四个无党派的议员则代表各种流派。经过一个以高奇为首的短命的过渡内阁以后，接替比纳特的是一个卡尔·施蒂尔克伯爵领导下的内阁，他的政府坚持了好几年，直至他们的首领死于非命(1916 年)时为止。德意志捷克协议谈判又再举行，人们创造了这样的说法：现在这两个民族只不过隔着一堵"薄得象纸那样的墙"。在 1913 年夏季导致波希米亚邦议会休会的那次危机发生后，该年秋天，两个人民集团及其代表的态度是相当和解的，由于长时期龃龉，民族主义词藻已经用得破旧不堪，人们渴望着谅解。情况象是，宫廷和政府在煞车，别的人甚至揣测，王太子把波希米亚的协议保留下来，作为他亲政后的第一个大有希望的序幕。政府的防务提案被议会通过了；自从 1914 年初起，施蒂尔克在重新对第 14 条进行抵制以后，就进行着没有帝国代表会议的统治。1913 年 2 月 12 日，公众因一个怪人的血腥行为而震惊，此人枪杀了为人民爱戴的社会民主党议员弗兰茨·舒迈尔。不久以后，阿尔弗雷德·雷德尔上校事件又引起极大的不安，此人是布拉格军团的总参谋长，前皇家陆军情报部的军官，他因 1913 年 5 月底被揭发为间谍而被迫自杀。

在匈牙利，政府与国会之间也发生了冲突。被操纵的选举于 1910 年保证斯特凡·蒂萨的自由党取得多数，但该党的首领暂时满足于担任众议院议长，组织政府则由他的追随者拉迪斯劳斯·

冯·卢卡契承担。1912年秋，得到皇帝支持的防务提案被通过，440 采取拖延态度的反对派被警察撵出国会。1913年夏，蒂萨终于亲自组织政府。有一个短时期，他似乎会迁就除克罗地亚和西本比尔根的萨克森人外在帝国议会几乎没有代表的那些少数民族（在四百十三个议员中，只有五个罗马尼亚人和三个斯洛伐克人），可是，他却坚持马扎尔人的绝对最高权威。这样蒂萨固然激怒了君主国弱小民族的恩人、王太子弗兰茨·费迪南，但是，布达佩斯的新的铁拳政权在维也纳宫廷人士当中却很得人敬重。蒂萨尤其得到老皇帝的信任，对1807年一度制订的解决方案的坚持，把他和老皇帝的关系维系起来。在奥地利人口当中，匈牙利的统治阶层当然得不到多少好感；基督教社会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和德意志民族党人都同样谴责马扎尔化政策，1907年奥地利帝国议会一致通过的抗议决定就是针对这一政策而发的。

在外交方面，与意大利这个三国同盟伙伴总是一再发生紧张事件。1911年9月，意大利以莫须有的借口，开始对土耳其发动战争，以便攻取的黎波利和昔兰尼加。意大利本身从其他三国同盟国家和其他举足轻重的欧洲国家那里得到默许，可以放手地实现它的北非计划，恰恰在德国和土耳其开始接近的时候，意大利正在与三国同盟的盟友进行谈判，却没有征求他们的意见，这种行事方式不能不令人不快。康拉德·冯·赫岑多夫又想对意大利发动预防性战争，他由于埃伦塔尔和皇帝的反对而未果，因而有一段时间不得不离开总参谋长的职位。与俄国接近，在当时也许是办得到的，俄国由于意大利的做法正在为它的海峡① 计划忧心忡忡，而在法国和意大利之间恰好存在着一定的紧张关系。意土战争首

① 这里所说的“海峡”（Meerengen）显然是指黑海与地中海之间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译者

先提供了使巴尔干局势和力量对比发生后果重大的变化的机缘，因为巴尔干国家正想利用土耳其的困难来推行他们自己的民族扩张政策。

1912年春，塞尔维亚、保加利亚、门的内哥罗和希腊，经过较长时期的谈判以后，缔结了盟约，盟约照例首先谈到保全自己的领土和权益，但也规定了对土耳其的欧洲部份的瓜分，并对"也想占领土耳其地区的"的任何大国共同讨伐；这一段条文实际上是指哈布斯堡君主国。盟约的实际缔造者是俄国驻贝尔格莱德公使尼古拉·哈特维格。在奥地利-匈牙利，埃伦塔尔过早地死去，利奥波德·贝希托尔德伯爵接管外交事务的领导权。他为保持巴尔干和平而建议大国进行干预，这个创议，正如奥地利和俄国在君士坦丁堡采取共同行动的主张一样，都没有结果。门的内哥罗于1912年10月开战，其他巴尔干同盟国家随即参加，在几个星期的战役中就使土耳其遭到毁灭性打击。这时，俄国和法国商定阻遏奥匈取得领土的协议。实际上，贝希托尔德更关心建立一个阿尔巴尼亚民族国家，这个国家可以封锁塞尔维亚通往亚得里亚海的道路，并基本上能阻止意大利立足于亚得里亚海对岸。他居然争取到意大利伙伴赞成他的阿尔巴尼亚计划，意大利也盼望能在阿尔巴尼亚发生主要的影响。正当门的内哥罗军队占领阿尔巴尼亚的边境城市斯库台里时，发生了一个严重的危机，不过奥地利在亚得里亚问题上还是顺心的。这时，塞尔维亚向保加利亚要求赔偿；它同罗马尼亚和希腊结伙，共同对付保加利亚，保加利亚烦躁起来，就向塞尔维亚开战，但是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于1913年夏，把大部份夺来的东西都丧失了。贝希托尔德力图为保加利亚进行干预而未果，对此只有罗马尼亚感到不快，它与三国同盟的松散关系归根结蒂只有年事已高的国王卡罗尔一世的个人态度可以依靠。

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的进程和结果重新使奥地利的政治和战略地位恶化起来。王太子弗兰茨·费迪南尤其对事态发展的进程感到不安。他在外交方面的考虑经常倾向于与沙皇俄国建立比较好的关系，远大的目标是恢复三帝同盟以防革命力量的兴起。弗兰茨·费迪南还要求与罗马尼亚友好相处，他对俄国的体恤阻止了对塞尔维亚采取过于咄咄逼人的态度。然而，在这个国家里，人家为这位王太子的态度而担忧。经过一个以旧式的行政区联邦主义为标志的时代以后，三元体制[①]在王太子改组哈布斯堡君主国的改革计划中起过一定作用，这个思想是以第三个国家成份来补充二元制的国家形式，第三个国家成份则由君主国的南斯拉夫各邦构成，为此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特殊地位可以成为起点的基础。同时，王太子尤其想依靠信奉天主教的、传统上忠于哈布斯堡的克罗地亚人民。这些想法在塞尔维亚已为人所知晓，被认为与大塞尔维亚观念不相容，并且在这样一个时候(1912 年)，即，当王太子已经倾向于为了对君主国实行联邦制改组起见，既考虑到民族原则，又(至少暂时地)保留二元体制的时候，大抵因其对自己的国家的生存有危害而被人们所畏惧。在奥地利，由于老皇帝无所作为，广大的国民阶层把希望寄托在有魄力和有觉悟的王太子身上，在他的邸宅贝尔维德雷宫，可以观察到繁忙的政治活动；有些少数民族代表和政治家非常爱护他们同王太子的联系，尤其是基督教社会党人士与贝尔维德雷宫的关系已是众所周知。 442

1914 年 6 月 28 日，王太子和他的妻子索菲在参观军事演习期间在波斯尼亚逗留，被塞尔维亚族的年轻的波斯尼亚凶手谋杀于萨拉热窝，于是上述所有未来的希望——并因此而使整个欧洲

① "三元体制"(Trialismus)主张哈布斯堡君主国不再分为奥地利和匈牙利(这是二元主义)，而是分为三个独立部份(即再加上南斯拉夫地区)。——译者

的和平——都就受到致命的打击。

弗兰茨·约瑟夫时代的人口流动

1857年，君主国的总人口（包括伦巴底-威尼斯），据也许不大可靠的估计，达32,261,000人；1869年，由于人口剧增，统计为35,812,000人（不包括这期间已失去的那两个省）；1900年，居住在二元君主国（不包括占领区在内）的有46,974,000人，到1910年时，这个数字（包括在这期间合并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上升为51,390,000人。这些数字反映了工业时代人口的发展；不言而喻，君主国的各邦、各城镇人口增长不是平均的，而是在大城市和工业区的跳跃性增长中达到它的最高点。1851年，维也纳（包括郊区）有431,147个居民；到1890年时，这个数字上升至827,567人。与城区连在一起的、自1857年以来分为八个区、1874年以来分为十个区的近郊区①，虽然在地域上为瓦尔、格拉本和格拉西斯所隔开，在法律上几百年来都一直属于维也纳，1890年，以前为处于那条"线"另一侧的独立区镇、现在其总人口为562,745人的远郊区②，作为11—19区（后11—20区）而纳入大维也纳。在世纪递嬗时，这个急剧扩大的城市人口为1,891,000人；1905年，多瑙河以北的广大的第21区弗洛里茨多夫又增添进来，443 1910年又附加了马希菲尔德的施特雷贝茨多夫区。由于区镇的划入、移居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难民流入，城市人口继续上升，1916年时居民为2,239,000人，达到了最高水平。此时，人口的重点越来越转移到城外各区，由于"城市建设"，市中心的人口越

①② 在维也纳有一条宽57米，长4公里的"环形路"(Ringstrasse)，第二条外环形路称为"带形路"(der Gürtel)，在"环形路"和"带形路"之间的地方，称为"近郊区"(Vorstädte)，"带形路"以外，称为"远郊区"(Vororte)。Vorstadt 和 Vorort，在德文中本为同义词，在维也纳则略有不同，在这里姑且译为"近郊区"，"远郊区"。——译者

来越减少，在这里，住宅避开了商店和机关。

林茨和格拉茨也显示了类似的景象，不过规模较小。1850 年，这个上奥地利首府有居民 26,600 人，在世纪交替前后，已有 83,400 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已超越十万大关，在这里也有区镇并入。1849 年有格拉茨人 52,000 名，但，在 1880 年统计人口时，格拉茨已处于第一个十万的边缘(97,800)，1910 年时，已经达到 151,700 个居民；在阿尔卑斯山各城之中，它无可争辩地位居第一。小城市的人口增长百分比往往甚至更大。在特里斯廷谷地的贝恩多夫，在弗兰茨·约瑟夫时代，居民从几百人上升到七千人，令人印象同样深刻的是上施蒂里亚各工业区(多纳维茨、卡普芬贝格、克尼特尔菲尔德等）人口的增长。工业区人口的增长是由人口逃离主要经营农业的地区所造成的。在下奥地利的工业城市，包括维也纳在内，以比前五十年更大的规模，迁入了来自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移民。这些移入者有三分之二来自捷克各区，自从世纪更换以来，对捷克学校的需求在维也纳市民中曾引起一些激动情绪。大多数移入者倾向于语言同化。这同这些斯拉夫裔的新维也纳人多半祖籍民族主义不十分强烈的摩拉维亚有关，也同他们的社会地位有关——他们主要是工人和手工业者。在维也纳的鞋匠当中，以及在略小的规模上，在木匠和裁缝当中，有许多捷克学徒、帮工，也有师傅。苏台德德意志移民大部份属于工商界的中产阶级，他们也出了很多官吏和教师。在弗兰茨·约瑟夫时代，犹太人有了绝对的增长，同整个人口比较则有了很大的增长；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犹太人的比重约为百分之九，而在战争期间，由于难民而暂时又继续增长。在维也纳的经济和文化生活中，犹太人，尤其是作为商人、医生、律师、作家和新闻工作者，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尽管排犹之风有增无已，他们同占多数的基督教居 444

民仍有许多密切的社会联系，通婚的事也比较地多。

维也纳的强大同化力几乎可以说是一种例外现象，进入波希米亚德意志地区，也就是，进入波希米亚西北部的褐煤产区的捷克移民再也不容易失去他们的民族特点，在其他各行政区，内部移民把一个新的方面带入君主国的民族问题之中。民族问题有一个可以从数字上去理解的侧面，它反映在1880年至1910年的人口统计数字上。这里只能简要地讨论一下总人口内的百分比变动。从变动情况可以看出，再也谈不上日耳曼化了，德意志人在帝国的奥地利那一半中很难保住他们的百分比（1880年:36.8%，1910年35.6%），捷克人与此相仿，也难以保持(分别为23.8%，23.0%)，还有鲁特尼亚人(分别为12.8%，12.6%)，斯洛文尼亚人损失略重些(分别为5.2%，4.5%)和意大利人(分别为3.1%，2.7%)，波兰人的进展大些(分别为14.9%，17.8%)，在绝对数字上，则各个民族集团都有所增长。在匈牙利，马扎尔人有一个巨大的，也可以说是粗暴的突进（在匈牙利，包括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从41.2%升为48.1%），损失最重的是德意志人(12.5%至9.8%)和斯洛伐克人(11.9%至9.4%)；在斯洛伐克人那里，也许是由于很多人出境所致，但，决定性的是强制的马扎尔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或以后，广阔的欧洲地带由于移民出境和灭绝性措施而发生人口结构的彻底瓦解，与此相比，也同1918年以后的重大变化相比，上述的差异就显得微小，问题的关键在于个别民族集团不同的高出生率的影响，其次在于边缘阶层的增长或脱离，其原因是国内移居、学校、教会和社会分化，在帝国的匈牙利那一半肯定还有国家因素的影响。

再稍微谈谈移民出境。奥地利过剩居民有很大一部份找到了到海外去的出路。1867年的国家根本法包含了移民出境自由的

原则。移民自由使所有离开二元君主国出外重谋生计的人有90% 以上进入美国。1903 年,在迁出奥地利-匈牙利的222,000个移民中，有206,000人前往美国。君主国总出境人数中赴美的百分比,从1861年至1890年为4.2%，从1891年至1920年不少于20%。当然，要确定有多少人来自今天这个蕞尔小国奥地利，几乎是不可能的。总之，重要的是，1900年从外国来到美国定居 445 的人当中，“奥地利人”为276,000人，“波希米亚人”为157,000人,“匈牙利人”为145,000人。

农　业

革命决定解放农民、废除和清算土地管辖关系,必要措施的执行则由专制主义负责。在奥地利(不是在匈牙利)，人们仅限于将查出的清偿值的三分之二实际付给地主,在这笔减少了的款项中,国家和农民各出一半。在解决时，人们使用百分之五的土地清偿债券，清偿金对于农民——不同以前在普鲁士和后来在俄国——通常不算苛刻,对于地主则足够了;有些地主就把由此而获得的收入投资于比较大的工业和金融企业。也进行了改良土地。几百年来的依附关系的废除给农民带来的肯定不仅仅是好处；有些人缺乏主动精神，而大家都缺乏如何正确利用这种新的迁徙自由的经验。尤其危险的是轻率的出售和过细的分遗产。在这里，国家应当出面干预,可是疏忽了。于是,有些农家产业就成了投机倒把分子的活动的牺牲品；沉重的抵押债务丛集。非农民分子购买的农庄数之大,在个别的邦里,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于是,在世纪的下半叶，奥地利农民就发生了危机现象，这种现象当然不能单纯或者首先仅仅归之于1848年的新秩序。有一次,阿尔卑斯地区的“粮农”(Köındlbauer)对廉价的匈牙利谷物产

品的重压采取了极强硬的立场。匈牙利的磨坊征服了奥地利的市场，后来甚至还征服了奥地利的北方和西方的出口伙伴的市场。供屠宰的牲口也是大部分由匈牙利提供给奥地利工业区的。海外国家的竞争变得越来越明显，小麦从加拿大、美国和阿根廷运来——尤其是六十年代末期，肉类罐头从南美洲运来，本国的牧羊业把内地的羊毛市场输给了澳大利亚的进口货，或者牺牲给其他丰 446 产的农产品。十九世纪末，处境最为困难的是山地农民，他们多半都要为谋生存而艰难地斗争。由于实行现代农业经营方式，利用机器力和购买人造肥料和现代饲料，因而农民，恰恰是保守的、要同较大的耕地困难作斗争的山地农民就落后于大地主，后者的土地比较广袤，利于合理经营，他们也有投资所要的钱，外国的季节工人（多半为斯洛伐克人）为他们提供必需的劳动力。

后来，农民在主张革新的国民经济学家援助下，找到了自立的适当办法。贷款基金，以及大约1890年以来的农贷合作社金库提供了更坚实的金融支柱。除了这种农民贷款合作社组织以外，还出现了销售和经营合作社。自从六十年以还，又有一些或多或少带政治性的农民联盟。蒂罗尔和下奥地利的农民联盟（成立于1904年或1906年）意义最为重要，下奥地利的“中街”（“Mittelstrasse”，1877年）同盟可以视为前驱。除了这些天主教保守的同盟以外，还有一些较小的、与舍纳雷尔关系密切的组织。

国家也振作起来，采取行动。经过多次试验以后，1883年，通过了合并法，以利于农业土地的归并；消除了耕地中的混乱状况，农民省时又省力，有目的地使用机器也就有了可能。实施法律当然要长时间的测量和估价，村里的耕地的各种土质要计算在内，可以理解的农民疑虑要打消。

此外，还进行了农业技术的改良。谷物轮种制继续推行，购置

了机器，经营转到最有前途的生产上，于是，在福拉尔贝格，人们照着瑞士的榜样，加强了畜牧业，而牺牲了农业。受种种虫害威胁的葡萄种植业，由于采取了合适的措施和防范手段，尤其是引入了不怕葡蚜的美国葡萄秧，而得到挽救，免遭毁灭。最后，使许多地区，特别是萨尔茨卡默古特、南蒂罗尔、萨尔茨堡和克恩滕的农业人口的经济情况得到改善的，乃是旅行游览事业的兴旺。

到城市去找工作，就其本身来说，是奥地利和欧洲历史上几乎每个世纪都有的一种现象，在高度工业化时代，范围自然更有所扩大。与昔日人口流动的情景不同，统计数字向我们显示农业区镇 447 的数目减少了，区镇里的人口数目降低了。脱离农村的现象对山区农民的影响极为明显。没有希望继承财产的农家子弟，还有仆役和使女们都渴望到城市里去，那里找工作不受季节的限制，自由比较多，娱乐比较价廉，而且经常需要劳动力。下级军官团也吸引着青年人；解除现役的“持证者”（“Zertifikatist”）在录取参加国家公务时，优先照顾。至于除城市和军队以外，移民国外这条出路，前面已经讲过了。

工 业

在本时代各个经济部门中，工业部门由于它令人眼花缭乱的发展自然应当特别注意。在农业基础上工作的工业当中，如前所述，奥地利磨坊业遭受到匈牙利和外国的压价竞争之苦，这竞争自五十年代末以来就已有所表现，而在八十年代里则变得很尖锐，以致人们陷入一种严重而又持久的危机状态之中，再也不能自拔。连大企业，如在埃本富尔特的装备着最新设备的舍勒蒸汽磨房（从1853年起）也受这种事态发展的影响。

然而搞得最成功的是啤酒酿造业。啤酒世家德雷埃尔甚至能

够在典型的产酒国意大利和匈牙利站稳脚根，在那里开设生产淡啤酒的大酿酒厂并扩大其业务。由于利用制冷技术的成就，做到了继续改进自己产品的耐久性和质量。除了德雷埃尔的酿酒厂以外，由阿道夫·伊格纳茨·毛特纳·冯·马克霍夫兴办或接办的企业(维也纳-圣马克斯、弗洛里茨多夫、施维哈特)发展得十分好，尤其是可以进行干酵母、醋和酒精的制造。

制糖工业办得特别兴旺发达。本国的甜糖能够把殖民地的蔗糖排挤出去，在君主国的晚期，奥地利的糖成了它最重要的出口商品，虽然本国的消费也在不断增加。诚然，无论甜菜种植还是制糖工业的重点都在苏台德区，二百十八个工厂中只有六个开设在现今的奥地利土地上：迪恩克鲁特、霍亨瑙、马希菲尔德的利奥波德斯多夫和下奥地利莱塔河畔的布鲁克、希尔姆和在布尔根兰的西448根多夫——除迪恩克鲁特以外，均为弗兰茨·约瑟夫时代所兴办，企业主多半来自德国。

十九世纪中叶，造纸工业由于已造出可用的木纤维纸而转移到本国林业所能提供的广阔的原料基础之上；七十年代以来，人们过渡到植物纤维素纸；在艾森厄茨的利奥波德施泰因有一个工厂不久被焚于火，第二个建在格洛格尼茨附近的施图帕赫(1872年或1876年)，它们都采用了新方法。从破布改用木制品后才可能大规模生产，才能满足报刊、学校、机关、出版社和各经济部门的需要。新的大工厂挤掉了古老的造纸坊，纸和植物纤维素也成了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和多瑙河各邦的重要出口商品。

在大兴土木的时代，建筑木工和家俱业也繁荣起来，足以说明家俱业的特点的是，批量生产的需要与争取结实的、手工的和符合工艺界人士要求的设计所作的种种努力之间存在着对立。用弯木做成的奥地利家俱占有首要地位。

从世纪中叶以来，采矿业和依附于它的重工业有着极其广泛的发展。1848 年，全奥地利采煤达八百七十万 Meterzentner①，1904 年达三亿三千八百六十万 Meterzentner。强化的生产，尤其是在蕴藏丰富的摩拉维亚-西里西亚煤区，掌握在擅长财政的企业主罗特希尔德和古特曼手里，他们在资本市场上有相应的靠山。在煤烟方面，人们当然总是依靠从德国的进口。阿尔卑斯山区的采煤业，无论质量和数量都不能同苏台德区竞争。在中施蒂里亚矿区，至少还有些丰富的优质亮煤煤层，在烟煤方面，格林巴赫的小规模开采可以同西里西亚的大煤层（奥斯特劳-卡尔温）相比。但是，在褐煤和亮煤方面，阿尔卑斯各邦只占总开采量 12%。

采煤部门的不利状况一度导致施蒂里亚矿石冶炼的改变。阿尔卑斯山各邦的矿石开采量两倍于波希米亚（努尔奇奇）。1863 年以来，奥地利的冶炼业开始使用比塞麦法②；自从 1879 年以来也同样采用托马斯-吉尔克里斯特法③，使人们可以更好地利用含磷丰富的波希米亚矿石。阿尔卑斯的制铁业由于费用较高，无法同苏台德区、德国和英国相竞争，因而发展受到阻碍，但是，在总的向上发展之中仍起相当的作用，尤其后来有了西门子高炉，用褐煤炼钢就成为可能。 449

所有权状况发生过变化：因斯布鲁克矿业总公司从国家转入信贷公司(Creditenanstalt，1868 年)手中，但，后来，所有数得上的施蒂里亚和克恩滕的冶炼厂于 1881 年都合并到“奥地利阿尔卑斯采矿公司”，从而成立了最大的阿尔卑斯工业康采恩。它经营了最大规模的钢铁生产，多纳维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已经成为欧

① Meterzentner，旧奥地利重量单位，相当于 100 公斤。——译者

② Bessemer Verfahren，即酸性转炉炼钢法。——译者

③ Thomas-Gilchrist-Verfahren，即碱性转炉炼钢法。——译者

洲大陆上最大的钢铁厂。阿尔卑斯的卡普芬堡工厂于1894年转归伯勒尔兄弟公司所有。不久,"伯勒尔钢"赢得一种优质的奥地利特殊钢的美名。马克斯·毛厄尔曼先是独立地工作,后来为舍勒及布勒克曼工厂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1913年,他已经在维也纳举行的亚得里亚展览会上第一个展出了不锈钢。不过,在利用这项发明方面,人们落后于德国西部的工业。

同铁和钢相比,有色金属在奥地利的采矿业和工业中并不居于显要地位。阿尔卑斯山的铜矿(布里克斯列格、基茨比海尔、米特贝格),由于军队(用青铜制炮)和发电业的需要而具有一定的意义;克恩滕的铅矿被布莱贝格矿业联合公司所充分利用,这两种金属都需要进口。石墨的开采变得相当重要,尤其是君主国占世界产量的三分之一,这种矿物在南波希米亚开采,以较小的规模在下奥地利和上施蒂里亚开采。锌在克恩滕和南蒂罗尔提炼。在法伊奇的阿尔卑斯山粗菱镁矿(从1881年起)具有巨大的意义,后来在克恩滕的拉登泰因附近也开采这种矿(1904年开发);菱镁矿是高炉炉衬所不可缺少的。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加利曾的石油生产扩大了,但,多瑙河一带的油层仍未被人所知。

金属加工业充分开工,而且经常扩大,传统的施蒂里亚镰刀业一直在提供它的三分之一产品以供出口,工具业也很令人满意,但是不如雷姆沙伊德和佐林根①。机器工业提供了火车头,尤其是山地火车头,以供奥地利铁路使用。在维也纳(锡默林、弗洛里茨多夫)、维也纳新城和格拉茨,建立和扩大了大型的机车工厂和铁路工场。在本时代之初,草创伊始的发展工作大部份还是由外国专家,如英国人约翰·哈斯韦尔或普鲁士-西里西亚人威廉·冯·

① 雷姆沙伊德(Remscheid),在德国西部的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是工具工业中心。佐林根(Solingen),十五世纪以来,为德国刀剑业生产中心,十九世纪时,其产品远销欧洲各国,中东和美国,其不锈钢刀叉尤其有名。——译者

恩格尔特去做的。在特尔尼茨出现了一个大轧轨厂。符腾堡人卡尔·路德维希·冯·赖兴巴赫男爵投入巨额资金，但由于奥地利 450 政府对于英国的竞争给予关税优惠而失败了。继赖兴巴赫而起的是弗兰茨·约瑟夫时代的最伟大的工业先驱亚历山大·舍勒，一个莱茵实业家家族的后代，他在维也纳、赖歇瑙、诺恩基尔兴，在采矿业和金属工业方面的匈牙利和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工厂中从事领导工作，此外，在制糖和磨粉工业中还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活动。来自佐林根的亨因里希·布勒克曼接管了在米尔茨楚施拉克的一个老工厂，把它改造成一个重要的工具和兵器厂。来自施太尔的约瑟夫·韦恩德尔是君主国的大兵器制造家，他的企业（从 1869 年起称为"奥地利兵工厂公司"），主要生产步兵武器和狩猎武器。毫无疑问，重工业（不仅是兵工工业）的繁荣大部份仰赖着古典帝国主义时代欧洲外交上的持久危机，以及由此而起的军备竞赛、战略公路、铁路和桥梁的修建，以及类似的现象。

当新的大公司发展得越来越迅猛的时候，经济上软弱的、因袭旧传统的锻铁工场和小铁匠作坊就逐渐衰亡，这种趋势在临近三月革命的几年里已经可以感觉得到。当然，有些矿业世家能够及时转向大企业经营，如迈尔-梅尔恩霍夫家族，多纳维茨就是它扩建的。在技术时代，特殊机器和仪表的制造具有极大的重要性。1852 年，在这方面建立了三个重要的企业。克姆雷斯人弗兰茨·韦特海姆造出不怕火的铁箱，他是铁甲柜的发明人，后来，他那个工厂转而制造升降机和输送设备。赫森人康拉德·舍姆贝尔在阿茨格多夫建了一个制造各种大小的优质天秤的工厂。塞格德人约瑟夫·克勒西开设了安德里茨机器制造厂，该厂后来专门制造矿山设备和涡轮机。莱茵兰人海因里希·洛纳在三月革命前的维也纳以制造马车开始他的活动，他的子孙制造和出口那饮誉欧洲的

豪华汽车，后来又制造和出口汽车车身和电瓶车。1900年以还，费迪南·波尔舍，在为洛勒工厂和维也纳新城的奥斯特罗-戴姆勒工厂服务时，研制了他第一种最重要的汽车设计方案。一个格拉茨钳工约翰·普赫，于1899年创造了格拉茨自行车厂，这些厂不久也开始生产摩托车，并上升为大工厂。

用代替贵重金属的各种合金来制造工具、餐具、罐头盒、装饰品等，这在金属工业中起着重大的作用。在贝恩多夫的克虏伯企业里进行过铁的电镀(即所谓"阿尔帕克"制造法)，还利用白铜，一种铜镍锌合金，来制作各种消费品、线和包头。

451

发电业发展得很快；发电主要仰仗烧煤的热电机，阿尔卑斯山区的水力由于过分考虑到煤矿而被迫停止发展。至少有几个小铁路是用电力驱动的，维也纳的街车就改用电。工业中应用了电解法和电热法，电动机越来越多地用作驱动手段，电气照明进入公共设施和私人住宅。一些大公司(首先是西门子与哈尔斯克公司，其次是通用电气公司等等)装配电设备并生产电机。

奥地利的化学工业，尽管开端良好，成绩不坏，但仍显著地落后于德国和西欧的发展。在这个工业领域，小企业屈服于大公司；二十世纪初，这个工业部门非常景气；从本国的原料(例如盐)，以及更多地从进口的原料(硫磺、黄铁矿、智利硝石)中制造出酸、漂白粉、碱和氧化钠。

奥地利的玻璃制造在世界市场上占有优异的地位，在这期间，它的重点在苏台德区，尤其是波希米亚。在玻璃制品方面，在世纪更替前后，君主国的出口大约十一倍于进口。深凹玻璃、玻璃板、镜面玻璃、灯泡和其他照明体、瓶子和加布隆玻璃器皿远销国外。国家关税政策迎合了工业的需求。对于产品的艺术装璜，与维也纳工艺博物馆的合作是很重要的。在玻璃工业中，举足轻重的生

产存在于狭义的奥地利，特别是蒂罗尔、施蒂里亚和下奥地利，大公司的总办事处都设在维也纳，而陶瓷的制作几乎全部都挪往波希米亚，在这一发展中，卡尔斯巴德地区的大陶土层的开发起着一定作用。维也纳的国营陶瓷工业于1865年敌不过波希米亚的竞争。君主国产品的大约三分之二是供出口用的。作为磁器的补充，出现了在多瑙河和阿尔卑斯地区制作的陶器制品，第一个生产这种不久就广泛使用的产品的工厂，于1870年成立于弗洛里茨多夫。

奥地利的光学工业本来是有条件顺利发展的，因为人们利用 452 了约瑟夫·佩茨法尔的基础研究，在1841年时，彼德·威廉·弗里德里希·福格特伦德根据他的资料在维也纳首先研制出"肖像物镜"，物镜的镜头直径与焦距之比可供瞬时摄影之用，并使摄影发生了革命。但是，佩茨法尔和福格特伦德为发明权而争吵起来，在六十年代，福格特伦德把他的生产从维也纳全部转移到不伦瑞克的第二个工厂中去。第二个杰出的维也纳光学精密仪器制造者西蒙·普勒斯尔死后并无继承人。所以，奥地利的光学工业落后于德国、英国和美国。直到世纪交替之时，才由卡尔·赖歇特赶上了几步。但是，应该提到，施蒂里亚教士奥古斯特·穆斯格尔是最先设计速摄缓映机（即时间延伸机）的，他于1904年提出专利申请。

一般地说，奥地利的纺织工业发展得很成功。当然它的某些因袭传统的部门也有显出相反倾向的。维也纳的丝绸工业，在本世纪中叶过后，当保护性关税取消时，就丧失了销路，许多工厂迁往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德意志地区；在这里，尽管有强烈的外国竞争，仍可得到一定的休养生息。亚麻业发展得也不大顺利，不过，优质布的出口仍能维持。毛纺业从使用未梳的粗毛线转而改用梳过的毛线，作为原料，澳毛逐渐挤掉了本国羊毛。个别地说，

在阿尔卑斯各邦还有比较重要的出产(维克特林、克恩滕),但同摩拉维亚的出产相比，就相形见绌。棉纺织业增加了它的销售量。在恩斯河上游的那个邦①，在林茨和克莱因明兴有织布厂，但，奥地利的棉纺业中心始终是在下奥地利菲特尔的维也纳森林，此外还要提一下哈兰德(在圣珀尔滕)和特鲁毛(在瓦尔德菲特尔)。在福拉尔贝格,也是棉纺业占优势，在那里，纺织业一直在安谧的环境中发展,而且几乎全部为本国人所有,此外,在卢斯特瑙,刺绣业越来越崭露头角。在下奥地利，大西格哈茨(黑策尔父子公司)是一个重要的刺绣业中心。奥地利的内衣被单等浣洗物的出口，特别是棉质浣洗物的出口,在约瑟夫·弗兰茨时代有很大的发展,男式的成衣(普罗斯尼茨和维也纳),以及在较小的规模上,维也纳的女式时装都远销国外。

维也纳出的优质皮革制品驰名欧洲，软贱的商品在国外当然不能与奥芬巴赫相匹敌。在手套制造方面，布拉格和维也纳名列453 前茅;奥地利鞋匠主要是向西欧,尤其是向英国出口坤式皮鞋。

地毯的制作依靠波希米亚和下奥地利的大公司，在埃贝加辛的菲利浦·哈斯地毯及羊毛制品厂应当提到。在苏台德区和下奥地利(维也纳、珀希拉恩)有重要的黄麻制造业。

在一个人口大量增殖和大兴土木的时代，建筑业的各个部门都有很大发展。此时出现常见的集中现象。制砖业从分散在下奥地利各地的无数小砖窑转移到维也纳附近的大企业之中。在这里聚集着社会地位极其恶劣的无产阶级。新建筑材料的发展采用了工业的方式，1885 年,在佩尔莫斯开办了第一个奥地利混凝土厂,这是一个大企业的萌芽，因为混凝土的制造很快就兴旺起来。钢筋混凝土的引入是建筑部门的重大成就之一，它由入籍奥地利的

① 即上奥地利。——译者

原符腾堡人古斯塔夫·阿洛伊斯·魏斯，参照了巴黎园艺家莫尼埃的第一次试验，作了决定性的改进，利用和推广。

这个时代的大工业尽管经受过种种危机和挫折，总的说来仍然呈现一派令人印象深刻的兴旺发达的景象。同时还必须指出，这一事态发展大都有利于苏台德区，它在资源上得天独厚，又有工业传统和国家的促进，因而遥遥领先。这应当着重强调，以免发生错觉，因为，在这里主要是谈的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和多瑙河各邦。在帝国的奥地利那一半，1900年时，在三千一百个大工厂中不下一千八百四十六个都把厂址设在苏台德区。

我们再来看看工业发展中的不愉快的附带现象，首先应当指出的是小企业求生存斗争的日益尖锐化。这里涉及的当然是欧洲的、绝不是仅限于奥地利的现象；大资本几乎无处不获胜，而倒霉的却是陷于贫困的中小企业。它们的业主当然要对它们的命运负责任，因为他们长期对现代招徕术和劳动合理化漠不关心，以致为时已晚，无法补救。1859年发布了充满自由主义精神的"工商业条例"，这条例给予几乎毫无限制的经营自由；只有对极少数工商业还规定要有资格证明和特许权。结果是商品质量恶化，以及粗制滥造现象有所发展。但是，手工业只有用坚实的劳动才能敌得住廉价的大规模生产的竞争。1883年，工商条例附则把特许经营的 454 工商业数目大大提高，资格证明要求严格并且增多了。那时出现了某种变化。塔弗的社会立法不仅有利于产业工人，而且还有利于小企业，选举权的继续民主化加强了"卑贱者"① 的政治地位，在经济中现在要更多地考虑到他们。

也许小商人的地位比手工业者的地位更加可虑；许多维也纳

① Kleiner Mann，在三联书店出版的《奥地利简史》中译为"小人物"。——译者

和外省城市的"小杂货商"对于局势已不能应付裕如。如果小商人能顺应时代,他们还是有发家致富的可能,尤利乌斯·迈因尔家族的发达当然可以为此作证,该家族的创始人于1862年在维也纳当过小商人,专门经营优质食品,特别是混合咖啡,不久征服了维也纳市场,最后,在君主国布下了一个分店网。

虽然国家和私人的救济措施逐渐增加,但,工业企业中的工人的社会状况很难令人欣慰,即使在本时代终了以前情况有所好转也罢。除掉个别的例外,劳动条件相当恶劣,对有损健康的劳动的防护工作往往做不到;迅速增涨的大城市无产阶级的居住条件是可怕的。在世纪更迭前后,工人阶级的一般状况的改善已是不可否认。在六十年代,人们还认为警察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合适工具,自从象舍夫勒① 和福格尔桑② 那样的人出现以来,这种情况就改变了,年轻的自由派人士对于贫困的居民阶层的生活问题比父辈们更感兴趣,社会主义运动逐渐增长的影响对工人阶级的要求给予了为获致成功所必需的强调。

下述情况对于本时期的经济生活中的许多不良现象起了一定的作用:不仅仅稳健的、有责任心的企业主的有效活动与奥地利工业的扩大有直接联系。"滥设公司时期"③ 的特点在于,不仅仅是一些暴发户的不学无术和毫无风格,再加上以新发来的横财来显示豪华气派的做法;这更多地是一个兴致问题。一帆风顺的投机活动导致严重的危机,往往使法院不得不进行干预。1873年5月的

---

① 舍夫勒(Albert Schäffle),曾任商业与农业大臣,有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译者

② 福格尔桑(Karl von Vogelsang),天主教改革家,在政治上主张保护中产阶级。——译者

③ "滥设公司时期"(Gründerzeit),指1871—1873年,德国和奥地利的经济虚假繁荣时期,那时滥设基础不稳固忽起忽落的公司之风甚炽。——译者

“大危机”特别可以说是狂热的、往往完全欠缺考虑的证券交易和银行业务投机所造成的结果；奥地利经济生活受到这种破产后果的影响前后约达四年之久。不断发生着不愉快的诉讼案件，有罪者和替罪羊往往很难分开。

交通、贸易、金融与信贷制度

455

铁路网的扩大，在三月革命前才刚刚开始，在约瑟夫·弗兰茨时代继续进行，并且在主要方面也已结束；当然，国家从铁路上有所收缩；人们不再具备必要的资金。南方铁路中难筑的塞默林段的修建是在卡尔·冯·格加的出色领导下还在国家经营管理期间1848—1854年就已完成的，其后，1859年，该铁路卖给一家私营公司。这就出现了欧洲第一条遍布隧道和旱桥的山地铁路。奥地利工业也相应地供应了效能大的山地机车。南方铁路公司扩建了于1867年开辟的布伦内罗铁路。伊丽莎白皇后西方铁路的修建起源于私人的倡议，先是从维也纳修至林茨（1858年），后又修至萨尔茨堡（1860年），此外还修了从韦尔斯至帕绍的支线（1861年）。南方铁路至1924年为止一直在私人手里，而西方铁路则于1882年就由国家接管，并从阿尔贝格向西延伸。1867年至1874年修建的弗兰茨·约瑟夫铁路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成为国有财产，该路把维也纳同布拉格和埃格尔联接起来。在六十年代，主要修建了地方铁路，到了克贝尔政府时代才把注意力重又集中于主要干线。在1900年以后的十年内，发生了陶恩、卡拉万肯、沃赫艾纳和菲恩铁路的大规模修建活动。沃赫艾纳铁路又延长到的里雅斯特。最初几条地方电气铁路也敷设了；修造了一条波希米亚线以后，又接着修1904年的施图拜塔尔铁路，1912年的米滕瓦尔德铁路。从1896年起有了一个专门的铁道部，在它的领导者当中，尤以海因

里希·冯·维特克(1897年至1905年)以专业知识和积极主动见称。

巴黎条约宣布,在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多瑙河也实行自由航行,但首先需要大力整治河道。在奥地利,工程于1856年开始,维也纳段于1869年动工,多瑙运河则修有堤防和节制闸。多瑙河汽船的航行促进了客货运输。克贝尔的运河修造计划,尤其是多瑙-奥得运河仍然停留在计划上,并未付诸实行。

虽然奥地利不属于传统的海洋国家,但它的航运业在弗兰茨·约瑟夫时代发展得还是令人相当满意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它拥有的吨位数是一百万净登记吨。苏伊士运河的开凿是按照南蒂罗人阿洛伊斯·内格雷利·冯·莫尔德尔贝的计划进行的,那个幸运地修成运河的雷赛布当然执意不提这个奥地利人所起的作用。1869年,运河修通,通往印度和东亚的新联络线打开,456 这些航线如同地中海的航线一样,均由奥地利轮船公司行驶,而科苏利希航运公司则专门从事北美洲的货运和移民运输。的里雅斯特港扩大了;它的重要性,在通往内地的高效率铁路线建成以后,就更加增长。该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最后几年里,经历了它在经济上的黄金时代,1913年的转口贸易数字几十年再也不曾达到。尽管如此,要求合并于祖国的运动却发展得很蓬勃。

在新专制主义时代,在奥地利人们重又想到殖民事业和殖民基地,但只作过一次进入红海的探测航行(1857年)。在八十年代,工业界和航运界人士对南洋的所罗门群岛发生了兴趣.然而,远征队(1896年)始终没有取得持久的成果。

君主国的对内和对外贸易都扩大了交易额。君主国各邦的天然情况不尽相同,但多半都得天甚厚,当交通条件允许较前更快地和更多地运送货物时,各邦在经济方面就能更好地互相补充。国

内厘金取消了。奥地利各邦与匈牙利之间的关系(从 1867 年起)才成为君主国经济生活中一个特别的篇章。1851 年，专制主义取消了中间关税线，从此在工业化程度高的西半部与富饶的匈牙利农业区之间商品交换更加频繁。这样的关系对于有些比较弱的经济部门当然有其消极的一面。在较贱的匈牙利农产品的价格压力下,阿尔卑斯山区的农民遇到销售上的困难,但匈牙利的工业和该国的银行资本却不能与奥地利竞争。帝国的两半的利益各不相同,要用一个使双方都能满意的对外贸易政策维系起来,自然是艰巨的。所以,匈牙利独立党力争经济上分治,而“郁金香运动”则要求实行对匈牙利产品原则上优先于奥地利产品的做法。从匈牙利运进奥地利的最重要商品是谷物、面粉和供屠宰的牲畜,其次是蛋类、羊毛、酒和烟草,而运往匈牙利的首先是纺织品(包括衣服)、机器、皮革制品、木材和木材制品。

君主国对外贸易的问题反映在国家的关税政策和贸易协定上。1853 年与普鲁士缔结的协定,由于关税降低和出口税取消,一般地起了良好的作用，贸易额增大，最后甚至关税收入也增加了，457 因为走私活动已丧失其重要性。1862 年,《普通德国贸易法典》生效，适用于加入联邦的各国，从而也适用于奥地利，可是，另一方面，同年签订的普鲁士法国关税协定却意味着对奥地利权益的重大损害。奥地利的工业仍然需要保护，带有西欧色彩的自由贸易倾向对于它不会有帮助。1866 年,奥地利在德意志联邦内的经济地位结束,但是,人们于 1868 年却与北德联邦缔结一个贸易协定,该协定后来变为与新德意志帝国的协定。此外,随后几年的贸易政策的特点是，匈牙利争取自由贸易的努力与奥地利的工业争取保护性关税的愿望这两者之间力求达成协议，因奥地利工业不得不同极其强大的德国、英国和法国的竞争作斗争。1878 年,人们改用

"自动关税保护",规定对谷物和面粉的进口实行免税,对牲畜则实行低关税。君主国的大多数关税飞地(Zollexklaven)和自由贸易港(的里雅斯特和阜姆除外)于1880年被取消,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被纳入奥地利关税地区。俾斯麦时代的德国关税政策对奥地利不利,高额的谷物关税以及对奥匈牲畜出口的阻拦或刁难妨碍了二元君主国的对外贸易。在俾斯麦的后继人卡普里维统治下,在经济方面,两国同盟的伙伴之间关系很协调,这种协调关系又得到了与意大利、瑞士和比利时签订的条约的补充。在八十年代,同罗马尼亚发生过一场关税战争;德国的市场对奥地利的畜牧业实行关闭,奥地利为了保护自己的畜牧业起见,在自己那方面也就停止从罗马尼亚运来牲畜。在世纪更迭后与塞尔维亚发生"猪战"时,情况也相仿,不过政治性质的附带现象也更为尖锐。与德国、意大利和东部毗邻的小国的贸易结算是有盈余的,这对于二元君主国的贸易总结算也是有利的,因此,在弗兰茨·约瑟夫时代,出口值超过了入口值。由于匈牙利的农产品贸易的兴趣面向另一个方向,强化向东南欧的工业品输出没有成功。

在最重要的奥匈出口商品中,谷物的市况不佳,但供酿造啤酒的优质大麦则除外。在牲畜出口方面有过很大的波动,但是,供屠宰的牲畜和供拉车的牲畜的出口则仍然具有重要意义。木材的出口颇为重要,为数很大。工业品的输出有所增长,虽然其规模不及德国和西欧的工业出口。糖的出口有巨大的增长,纺织品(包括现成商品)的输出也很盛,其次是玻璃和玻璃制品。在铁制品方面,出口有盈余,但在机器方面并非如此。木制品、纸张和皮革制品属于重要的出口商品,而原皮则需要入口。

在金融和信贷方面,有过一些重大的改变。1848年,人们为争取德意志的统一时,也曾试行过货币关系的统一,但只是采取过

的措施极不彻底。1866 年，奥地利退出德意志货币联合会，真正的新秩序和向金本位的过渡——不是完全顺利的——到 1892 年才能做到，那时克朗作为币制单位代替了盾。由于按照格奥尔格·科赫体系，利用 1882 年建立起来的邮政储金局进行支票往来和票据交换，商业上的支付往来就大大简便得多。工商业对资金的需求越来越多地由大银行来满足。在这些大银行中，发展得最蓬勃的是工商信托银行(1856 年)，该行是罗特希尔德家族在资本雄厚的贵族，如菲尔斯滕贝格、施瓦岑贝格和奥尔斯佩格的合作下成立的。在典质和汇兑往来方面，主要依靠法国资本的奥地利普通土地信贷银行，以及从伦敦筹办的、对交通和采矿业颇感兴趣的英奥银行(两行均成立于 1864 年)，都求助于工商信托银行。后来，在 1880 年，保罗·欧仁·邦图的巴黎总财团兴办了万国银行。万国银行和 1881 年由同一财团成立的阿尔卑斯矿业公司一样，得以避免总财团的大灾难(1882 年)。

教育与科学

在 1848—49 年的许多计划中，也有国民小学改革计划；然而，这些计划却并未实现。1885 年的共同约章强调了国民小学的宗教性质，以及，教学人员不仅负担人们多半乐意承当的儿童唱诗班，而且有时还要做些教堂执事的工作，这就引起很多的不满。义务教育的效果，由于工厂里童工的长期存在和农家儿童参加田间劳动而受到影响。1869 年 5 月 14 日颁布的帝国国民小学法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开设各教派共同的公立国民小学和义务教育定为八年，这都是很重要的。为了监督学校，根据一些法案规定，建立了邦、区和地方教育委员会。义务教育的实施仍有待改进之处。459
文盲的百分比，尤其是在南斯拉夫和鲁特尼亚居民中，依然很高；

德意志人和捷克人的情况则要好得多。打破国民小学的各教派共有的性质和缩减义务教育期限的种种尝试，基本上都失败了。帝国国民小学法的种种规定，由于创办高等小学(1883 年)和颁布师范教育新法规而得到补充。自从七十年代以来还出现了许多国立的工艺学校。

在新专制主义时代，中学从六个级扩大到八个级，从此还接受了原来属于哲学系所承担的职能。师资的培养进行得很仔细，人们还聘请能干的外国中学教员。此外，很大一部份中学是各个教会举办的，1856 年，耶稣会教士接管菲尔德基尔希的中学(Stella Matutina)，他们把它扩建为他们主要培训教员的学校。在以后几年所采取的措施中，应提到教育大臣古斯塔夫·马尔歇领导下设立的实科中学和改革实科中学(1908 年)；后来，实科中学成了学生最多的学校类型。马尔歇对毕业考试条例的改革也是行之有效的。

为妇女教育进行的斗争是本时期教育制度的一个特色，这个斗争只不过是妇女争取权利平等的总奋斗中的一个阶段。在这个总奋斗中，自七十年代以来，玛丽安妮·海尼施(原姓佩格尔)，作为组织者和宣传家，起着最重要的作用。1866 年，维也纳妇女职业协会成立，1892 年，维也纳有了第一家女子中学；世纪结束前，妇女也取得上大学的权利。

1848 年革命为奥地利的大学带来了大学生和大学教师所热烈追求的教学自由和学习自由；但是，为了克服奥地利高等学校众所周知的缺点，需要进行真正的改革，这改革，高等学校是得到了，如同中等学校一样，都是在教育大臣利奥·图恩-霍恩施泰因任教育大臣时搞的（1849 年 9 月 30 日，高等学校校务机构暂行组织法）。大臣得到来自布拉格的哲学家弗兰茨·泽拉芬·埃克斯纳

和什切青的语言学家赫尔曼·博尼茨的支持，他们也参加了中学的改革。人们赋予大学以广泛的学术和行政自治，把哲学系放在与其他系平等的地位，在这以前，哲学系仍保留着很多原有的预备的和先修的性质。同以前着重职业教育相比，科学研究工作更被着重强调，尽管压力很大，研究和教学相得益彰的关系已经成为可能。建立了许多新讲席，非正式讲师[①]的授课补充了教授的不足。整个大学与教会的联系在遴选非天主教的教务长时曾导致纠纷，这种最后的、更多地是原则上的联系于1873年被一个单纯为补充图恩改革而制订的新组织法所取消。1884年维也纳迁入环形路新址，1895年格拉茨大学的新校舍竣工。 460

技术和工艺、农业和林业以及商业的培养工作，要求兴办许多专业学校；其中有些已扩大为高等学校。维也纳技术高等学校就是从三月革命前的技术专科学校发展出来的(1866年)，后来，格拉茨的技术高等学校合并于该校(1872年)。1872年，农业大学成立，设在玛丽亚布龙的老林业学校合并于它。福拉尔贝格的原市立采矿学校(1840年)作为国立专科学校迁往莱奥本，1861年发展成为采矿学院，该院于1895年取得“矿业高等学校”的地位，1904年终于取得这样的名称。兽医专科学校（从1852年起，以前为皇家动物医院)于1897年升格为高等学校。

据各界人士估计，以及外国学者的专业判断，在奥地利科学界中，维也纳医学院享有特殊地位，往往可以从名言“维也纳即医学的麦加”[②]得到说明。维也纳第二医学院的开办可以上溯到三月

① “非正式讲师”(Privatdozent)，是德国、奥地利、瑞士所特有的教席，在学校没有正式职位，其报酬由学生所交的学费中支付。这个词在我国有译为“编外讲师”的。——译者

② 麦加(Mekka)为伊斯兰教始祖穆罕默德“升天”之地，回教徒视为圣地。此处喻为最高学府之意。——译者

革命以前，它在解剖学家卡尔·冯·罗基坦斯基、比他年轻的同事约瑟夫·许特尔、内科医生约瑟夫·斯科达——比尔森斯科达工厂的创始人的兄弟——皮肤病的先锋研究者费迪南·黑布拉、生理家恩斯特·布吕克的协助下，发展得令人印象很深。产褥热病因的发现者和消毒论的鼓吹者伊格纳茨·泽梅尔魏斯曾在维也纳工作过几年，一向被人们尊敬地称为“母亲的救命恩人”，他的生平事迹是极为悲惨的。在外科医生当中，来自吕根的特奥多尔·比尔罗特的人品，令人钦佩，作为大胆而又成绩斐然的手术家，他指出了新道路，在担任学院教席时，由于非凡的教育天才而取得独特的成就。内科医生和神经科专家赫尔曼·诺特纳格尔也是一个优秀的教师。

整形外科医生阿道夫·洛伦茨、比尔罗特的学生安东·冯·艾泽尔斯贝格和精神病医生尤利乌斯·冯·瓦格纳-姚雷格属于年青的一代；后者是一个同样进行基础理论研究的鲁道夫·冯·克拉夫特-艾宾的学生。著名的伦琴射线学者吉多·霍尔茨克内希特牺牲于他的职业。在格拉茨工作的人中有，奥地利育婴及育儿学的创立者特奥多尔·埃舍里希。维也纳医学院的学生在欧洲各国，也在美洲和近东，有做大学教员的，有做专科大夫的，有做开业医生的。

461

自五十年代以来，奥地利各大学的法律系都有人数众多的优秀教师。在这里只要提一下鲁道夫·冯·伊尔林的名字，他生于弗里斯，是当时罗马法的最重要代表，当然，他留在维也纳的时间不算太长，或者提一下约瑟夫·翁格尔的名字，他是私法理论的改革家，但也从事政治活动。埃米尔·施特罗哈尔和约瑟夫·冯·沙伊男爵是杰出的民法教员，尤利乌斯·格拉泽尔创立了一种新的奥地利刑事诉讼法，威廉·埃里希·瓦尔贝格被认为优秀的刑

法学家，爱德华·贝尔纳齐克是国家法的模范代表者。海因里希·拉马施是个重要的国际法教员，也在海牙法庭从事处理国际争端，一个勇敢的和平运动先锋。社会学国家理论创始者路德维希·贡普洛维茨的声誉和学说在国外也发生影响，特别是在东南亚。

在国民经济学家中，最先突出的是才华洋溢的洛伦茨·冯·施泰因，后来特别是卡尔·门格尔，边际效用学说的创立者，从而也就是拥护这一见解的奥地利国民经济学派的奠基人，他的理论由于三位优秀的学者弗里德里希·冯·维泽尔、欧根·冯·伯姆-巴韦克和欧根·冯·菲利波维奇的活动，而获得了真正世界性的反响。

在哲学家当中，生于巴伐利亚的弗里德里希·约德尔名列前茅，他的主要著作《伦理学史》使这位对政治生活也很感兴趣，虽然并不囿于党派政治的著者得以成名。恩斯特·马赫，"经验批评主义"——一种唯感主义实证论——的宣布者，也是一个有地位的物理学家。亚历克修斯·冯·迈农，作为实验心理学的代表，在格拉茨从事工作。弗兰茨·布伦塔诺（克莱门斯和贝蒂纳·布伦塔纳的亲戚），作为认识论者和心理学家展开了长期的研究活动，其中有二十多年在维也纳大学任教。布伦塔诺以他的心理现象的"意向本质"学说影响了广大的学生。他的弟子埃德蒙德·胡塞尔祖籍旧奥地利，他的现象论学说后来变得十分重要，一度几乎成了时髦的哲学，要是没有布伦塔诺，那是很难想象的。

奥托·魏宁格的著作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最初轰动一时的研究和论断，均同属临近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本时代末期，后者不久就受到猛烈的非议。弗洛伊德的学说讨论了无意识的心灵过程，并认为人的成就起源于性的因素。他的心理分析及其令人惊愕的定论从一开始就遭到内行人士的反对，并且更多地 461

遭到外行人士的反对；积极的反响在西方国家要比在奥地利大得多。弗洛伊德还为现代分析心理学和心理疗法创造了极为重要的条件。

语言学家的研究和教学活动是在和平气氛中进行的。在日耳曼语言学者当中，特别突出的有文学史家威廉·舍雷尔和雅各布·米诺尔，以及克恩滕语言学家普里穆斯·勒西阿克，在维也纳斯拉夫语言学者当中，瓦特罗斯拉夫·冯·雅基奇和康斯坦丁·伊雷切克都享有盛名，受到类似评价的，还有东方语言学家莱奥·赖尼施和约瑟夫·卡拉巴切克，罗曼语学者阿道夫·穆萨菲阿和威廉·迈尔-吕布克。在古典语言学者中，大约以威廉·冯·哈特尔首屈一指，卡尔·申克尔也是一个杰出的古希腊语学家。英语学家卡尔·路易克获了欧洲声誉。

奥地利的历史撰述和历史研究，尽管在三月革命前有过一些令人欣喜的成绩，但在 1848 年还有许多有待急起直追之处。教育大臣图恩伯爵曾经提出成立奥地利历史研究所的倡议（1854 年）；人们期望奥地利历史的研究和教学能加强国家公民的忠君爱国的思想。实际上，该学院的教员和学生也写出了一些有关奥地利史的重要论文；在风暴之年和君主国灭亡之间的时期里，海因里希·蔡斯贝格、海因里希·弗里德容和奥斯瓦尔德·雷德利希的著述应当提到，虽然这些学者决不是仅仅研究奥地利历史。拿破仑传记作家奥古斯特·福尼埃和伟大的意大利史和普通经济历史专家卢多·莫里茨·哈特曼——他还是组织完美的奥地利国民教育制度的开路先锋——早就致力于研究中世纪和近代通史中的主要问题。历史辅助科学（尤以古文字学和文献研究）是该研究所的研究重点，并且被一个入籍奥地利人、生于德国北部的特奥多尔·冯·西克尔置于一个有条不紊的新基础之上。现代科学的世系学创始

人奥托卡尔·洛伦茨出身于维也纳学派。最后，与艺术史的联系是独特的，在其代表人物中，突出的有弗兰茨·维克霍夫、阿洛伊斯·里格尔和已成维也纳人的捷克人马克斯·德沃夏克。在古代史方面，欧根·波尔曼成绩最为显著，在考古学家中则为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本多夫，在希腊和小亚细亚的大规模发掘活动的发起人。在因斯布鲁克，尤利乌斯·菲克尔作为法学史家、中世纪史家和辅助科学家，起了激励和前驱的作用；奥地利历史得到后来来到维也纳的阿尔方斯·胡贝尔极好的阐述。在格拉茨，弗兰茨·克罗内斯和卡尔·乌利尔茨介绍了奥地利的历史，约翰·洛塞特介绍了中期和近期的历史、在法律和宪法史家中，阿诺尔德·卢申·冯·埃本格罗伊特很杰出，并且作为古钱币家，也是一个有地位和有名气的学者。 463

在地理学内部，依照专业化的一般倾向，地形学和文化地理学比以前更加合不到一起了。它有象高山研究大师弗里德里希·西莫尼，以及爱德华·里希特和阿尔贝特·彭克这样杰出的名字可以提出来。1856年，奥地利地理学会成立，该会为研究工作的组织和资助做些服务性工作。在海外研究方面，三桅帆船诺瓦拉号环游全球(1857—1859)是应当提到的，这次航行取得了许多科学成果。在北极水域，卡尔·魏普雷希特和尤利乌斯·派尔探险队开辟东北航道的尝试，由于汉斯·维尔切克伯爵爽试不爽的赞助才得以成行，虽然于1872—73年冬季失败，但于1873年夏季却发现了广袤的弗兰茨-约瑟夫地群岛。魏普雷希特还提议统筹组织国际北极研究工作，据此，奥地利在扬·迈恩岛上设立了一个研究站(1882—83)。非洲是奥地利的另一个研究领域。在七十和八十年代，埃米尔·霍卢布多次作过穿越南非的长途旅行，带回很多动物搜集品。鲁道夫·斯拉廷在替埃及服务时，在苏丹工作过，被

起义的马赫迪分子[①]俘虏，但后来自己解救了自己。为了开发苏丹，他做了伟大的工作。奥地利登山运动员路德维希·普尔切勒同德国研究者汉斯·迈尔第一次登上了乞力马扎罗山(1889年)，奥斯卡·鲍曼发现了尼罗河的一个河源(1892年)。安德烈阿斯·赖舍克从1877年起就参加了新西兰的开发，以及毛利族的人种调查。

奥地利人对十九世纪自然科学无可比拟的发达作了十分卓绝的贡献。特奥多尔·奥波尔策把维也纳天文学派的传统发扬光大，他的日月蚀资料汇编时至当今仍然是奠基性作品。1876—1883年，埃德蒙德·魏斯修建了维也纳大学天文台，这个天文台当时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约翰·帕利萨作为成功的"小行星猎手"，在狭窄的专业范围以外名声斐然，他一共发现了这种天体一百二十个，他还是一个很热心的人民教育家。约翰·霍勒切克是一个出众的彗星识别者。

464

理论物理学在分子和原子研究方面，有一个开路先锋，就是约瑟夫·洛施密特(洛施密特常数)，他的最初几篇论文就是在一家维也纳国民与初级实科学校中当微贱的教员时发表的。约瑟夫·斯特凡，一个温迪什[②]克恩滕人，文盲双亲之子，是重要的奥地利物理学派的奠基人，他注定有一个迅速而成功的学术生涯。斯特凡特别从事研究热辐射和气体的导热能力的问题。在比较年轻的人当中，路德维希·博尔茨曼很出色，他曾在格拉茨、维也纳、莱比锡

① 马赫迪(Mahdi)，本为伊斯兰教徒所盼望的救星。十九世纪时，阿拉伯托钵僧穆罕默德·艾哈默德被视为马赫迪。1883年，他在埃及苏丹领导了马赫迪起义，抗击了英国殖民主义者的侵略，1898年被英国将军基切纳(Kitchener)所血腥压迫。——译者

② 温迪什(Windisch)，斯洛文尼亚语的旧称。温迪施克恩滕就是指克恩滕邦讲斯洛文尼亚语的地区，斯洛文尼亚人是该邦的少数民族。——译者

和慕尼黑任教，他关于热磁学、动力气体理论和动力热理论的著作得到全世界的钦佩，并且对下一步的研究工作指明了方向。博尔茨曼在维也纳大学的后继者弗里德里希·哈泽内尔，一位优秀的教师，由于死在意大利前线，使科学过早地丧失了他(1915年)；他关于运动体辐射——在一个较窄的研究范围里——比爱因斯坦更早地取得了一些成果。

在机器制造业的先锋当中，应提到维也纳技术高等学校的力学和机器理论教授亚当·冯·布格男爵及其学生约翰·拉丁格尔，在电工学专家中，特别应提到许多电气铁道和其他设施的设计者卡尔·霍亨埃格，他是著名的外科医生和肿瘤研究者尤利乌斯·霍亨埃格的兄弟。对于无线电技术这一新领域，继承海因里希·赫茨的基础研究的恩斯特·勒歇尔和早死的罗伯特·冯·利本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利本是电子放大器管原理的发现者，这种管在利本死后得到继续发展，并使无线电发生了革命。

安东·施勒特尔·冯·克里斯特利是本时期重要的化学家序列中的第一人，他改革了维也纳工科大学的化学课，并由于指出生产火柴用的无毒、无定形的红磷而创造了新的可能性。弗里德里希·罗赫勒德尔被认为植物化学之父，在有机化学方面，阿道夫·利本和茨登科·汉斯·斯克劳普都立下了特殊的功勋。鲁道夫·韦格沙伊德在生理化学方面很有成就。在君主国的最后几十年中，弗里茨·普雷格尔和弗里德里希·埃米希发展了奥地利的微生物化学。宫廷与国家印刷厂厂长阿洛伊斯·奥尔是一个卓越的印刷技术改良者，他的儿子卡尔·奥尔·冯·韦尔斯巴赫，1895年把“稀土”利用于他那点起来特别亮的煤气白热灯，1898年制造出第一盏功能良好的金属丝电灯（锇线所制），还发明了自动打火机。 465

在矿冶专家中应首先举出彼得·图纳尔的名字，他先是在福尔登贝格，后来在莱奥本任钢铁冶金学教授，他既是一个出色的专业学者，又是出色的组织者。彼得·里廷格尔对于洗矿技术的进步作了重大的贡献。在地质学家当中，爱德华·聚斯获得了赫赫声誉。

如前所述，在弗兰茨·约瑟夫时代的研究重点已转移到高等学校。但是，有些开创性发现却发生在学院的范围以外。来自海因岑多夫的德意志摩拉维亚人格雷戈尔·门德尔神父，在他的布尔诺奥古斯丁寺的花园里，根据他的植物杂交试验，从他坚持不懈、井井有条的特征分析中，找到了后来以发现者命名的遗传定律。被发现的规律性最后以“显性法则”和“分裂法则”为最高顶点。1865 年，门德尔把他的结果报告给布尔诺自然研究者协会，次年，他的论文出版，可是，还要等三十五年他的发现的意义才被人理解，才被科学所接受。

手工业方面的发明家也不可忘记。在这里，首先应指出彼得·米特霍费尔，这个来自美朗附近的帕琴斯的家具木匠和建筑木匠，于 1866 年制作了切实可用的打字机，该机器为皇帝所购买。但是，人们看不到用工业方法制造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这样，打字机过了几年以后，从美国，不是从奥地利，凯旋似地走遍全世界。另一个南蒂罗尔人、来自拉纳的约翰·克拉福格尔所发明的“电轮”(1867 年）也没有得到继续研究和工业利用，他把他的机器，亦即电动机和发电机的前身，送到了巴黎万国博览会上展出，引起了理所当然的轰动。

来自梅克伦堡马尔兴地方的西格弗里德·马尔库斯二十二岁来到维也纳，在那里开了一个机工工场，1864 年制造了世界上第一个汽油发动机，一年后这个发动机已经能开动一个当然很原始

的"汽车"，1875年，马尔库斯造出一辆大大改进了的汽车；这个事例也没有达到象十年以后根据戴姆勒和本茨的发明而搞起来的工业生产。马尔库斯作为发明家还在其他一些方面从事研究。

奥地利发明家往往得不到公众的赞赏和官厅的支持，这并非绝无仅有，同时当然也应该考虑到，向政府提出来的建议不能用的 466 实在太多，而必然表示出来的冷淡对于真正的成绩却很容易变得非常有害。有时，人们却是十分慷慨，如对于法国的居里夫妇，为了他们那导致发现和精制镭的决定性试验，奥地利当局无偿地提供了巨额的约阿希姆斯塔尔的沥青铀矿。

文学、戏剧和新闻学。音乐生活

1848年以后的头十年，弗兰茨·约瑟夫时代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三月革命前已经居于领导地位的作家的影响，如格里尔帕策、施蒂夫特尔、鲍恩菲尔德、安纳斯塔修斯·格林和内斯特罗伊。弗里德里希·赫贝尔那时在维也纳度过他的晚年。但是，年青的一代已经涌现。

路德维希·安岑格鲁贝尔(1839—1889)，一个原籍奥地利的维也纳人，写过严肃和欢快的大众戏剧和短篇小说，情节大都发生在农民或小资产阶级的氛围里，语言刚健有力，带有明显的自由思想和为文化而斗争的倾向。同年龄、但不幸早逝的弗兰茨·米夏埃尔·费尔德尔，布雷根茨森林的小农之子，短篇小说部份地用福拉尔贝格家乡的方言写成，证明自己是奥地利农村史方面的天才非凡的描述者。出身于维也纳郊区的费迪南·屈伦贝格，最初试写过剧本，属于风暴之年的革命者和逃兵；他作为报纸知识文章和时评文章的写作者而发挥他的真正的精湛技巧。罗伯特·哈

默林,瓦尔德菲特尔[1]之子,一生都患有重病,在格拉茨从事工作。他是一个成功的带有晚期浪漫主义色彩的叙事诗人,他同样受希腊古典理想和日耳曼理想的影响,作为剧作家,他并不成功。施蒂里亚人彼得·罗泽格尔(1843—1918)的作品则通俗些。他的短篇小说将长期保持它们的文学上和人道上的价值,此外,还可以视为那个时代施蒂里亚的重要的文化史资料。作者力求教育大众,这是很明显的,但从不强求于人。罗泽格尔有着显著的德意志民族意识,但是,他又把民族意识与同样明确的倾向宽容的主张联系起来,不仅在民族利益上如此,就是在宗教信仰上也是如此。他用上阿贝尔斯贝格人约翰·黑芬派费尔这个人物,尖锐而中肯地刻划了反奥地利的、狂热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及其信徒。福劳寺僧奥托卡尔·克恩施托克的民族意识则要强烈得多,他是一个很有天才的抒情诗人和并非不重要的日耳曼语学者。心胸开阔的蒂罗尔467人、来自埃尔地方的阿道夫·皮希勒比上述几个人年纪大得多,他原是因斯布鲁克大学的卓绝的地质学家和教授,在晚年才开始从事文学写作,他以诗体故事描述了他故乡的农村里令人欢欣的生活景象。作为戏剧家,尽管他得到赫贝尔欣赏,但却不成功。

两个年轻的蒂罗尔自然主义作家弗兰茨·克拉内维特尔和卡尔·舍恩黑尔的大部份创作仍发表在弗兰茨·约瑟夫时代。克拉内维特尔的主要著作是一套描写农民环境的《七个死罪》,而在卡尔·舍恩黑尔的丰富著作中,历史剧颇为突出,它的素材取自蒂罗尔的历史。这位作家的现实主义喜剧《大地》及其突出的有力人物格鲁茨老头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本时期最重要的女故事作家无疑是玛丽·冯·埃布纳-埃申

① 瓦尔德菲特尔(Waldviertel),地名,在下奥地利,系一花岗岩、片麻岩地带,森林遍地,林牧业极盛。——译者

巴赫(1830—1916),原为杜布斯基·冯·特热博米斯利茨女伯爵,为斯拉夫裔的摩拉维亚贵族,迁往维也纳,在这里结婚,用德文写作,另外一个生于维也纳的女子贝阿特里克斯·潘克尔,作为波热娜·涅姆佐娃也许成为了最重要的捷克女作家。埃布纳写的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语言完美,叙事有力,有明显的社会感,这保证她在奥地利文学中永远享有杰出的地位。上奥地利女子恩里卡·冯·汉德尔-马泽蒂的历史小说以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为历史背景;这位天主教女作家以《耶塞和玛丽亚》(Jesse und Maria)创造了自己最佳的不朽之作。

有些作家,他们的生命和创作远远超越了君主国的灭亡,但,他们的主要作品仍属于弗兰茨·约瑟夫时代,在他们当中,里夏德·克拉利克在天主教保守阵线中居于领导地位。作为文化哲学家①、剧作家、历史作家、文学批评家,甚至还作为教会政治家,他从事令人惊讶的多方面活动。他同莱茵区的天主教现代改革派②的先驱者卡尔·穆特的论战已经载入德国文学史;"现代派论战"在世纪交替前后震撼了整个天主教,克拉利克参加了这个论战,当然是本着极端的全改主义③思潮去参加的,这种思潮甚至使维也纳枢机大主教也产生了怀疑,但它本身也没得到梵蒂冈的批准。在政治方面,克拉利克主张一种黑黄色的爱国主义④,由浪漫色彩的德意志意识予以补充。

① 文化哲学(Kulturphilosophie),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在德国和奥地利,文化与社会往往同义。那时有些哲学家,如赫德尔,从哲理上去分析、研究社会文化,以求了解社会生活的规律,并宣扬资本主义的社会理想。——译者

② "天主教现代革新派"(Katholische Moderne),天主教内部主张自由和提倡科学的革新派别,1907年为教皇庇护十世所谴责。——译者

③ "全改主义"(Integralismus),一种天主教观点,主张按照天主教教义来改造人生的各个方面。——译者

④ 即奥匈帝国的爱国主义。——译者

林茨人赫尔曼·巴尔，在青年时代广泛地游历，到过一些欧洲国家，涉猎过各种世界观，最后来到大城市维也纳，皈依了天主教。468 他由于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支持文学、造形和表演艺术中的年轻的、新兴的天才，而立下了很大的功勋。作为文学评论家和具有强烈的奥地利思想的政论家，他所具有的意义要比作为叙事诗人和剧作家要来得大，不过，他还是写出了一些可以在舞台上演出的剧本。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年(1910年)，路德维希·冯·菲克尔在因斯布鲁克成立了"布伦纳社"，该社为从基督教的人生观出发进行文化改革而奋斗。这个团体的最重要的首领是特奥多尔·黑克尔。

布拉格人赖纳·玛丽亚·里尔克（1875—1926)的作品，——不仅由于其形式的流畅易读，这保证了快速的成功——是本时期抒情诗中最重要的作品，远较他人为优。他是军人之子，因对军事毫无兴趣，不久就顺从了自己的文艺禀赋。他虽然出身于波希米亚首都的那种激越的氛围，但仍能保持一种无条件的民族的和宗教的宽容，因此可以对他给予高度评价；在欧洲的广泛旅行，行程远至俄国，以及与国际艺术界人士的交往，尤其能增强他的天下一家的意识。

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1874—1929)的首批文学习作就已经显露出天才上的早熟，他也是一个卓越的形式大师；在他的戏剧习作中，抒情的段落特别令人喜爱。在文化史上，他对恢复巴罗克戏剧所起的作用很重要，尤其是他从罗曼语译出的东西，以及他对中世纪圣经剧的改革。他作为改写古代题材的诗人，也被证明是优秀的。霍夫曼斯塔尔曾为里夏德·斯特劳斯写过许多有价值的歌剧唱词。从所有的作品都可以看出哈布斯堡帝国末期有教养的

社会阶层那种高贵的和受压抑的生活方式。

工人阶级除了从其他阶层得到文学上和报刊中的援助者以外，自己的队伍中也出了一个优秀的诗人，这就是死得年轻的阿尔方斯·佩措尔德，他有着非凡的，尤其是抒情的诗才。

医生兼作家阿图尔·施尼茨勒属于维也纳的犹太中产阶级，他由于"阿纳托尔"组剧的连续场景和剧本《卖弄风情》而获得受人尊敬的美名。作为长篇小说家和中篇小说家，他也是很成功的。从施尼茨勒作品中的人物来推断，他对于与自己常常来往的那个社会阶层绝不尊重。对于社会问题、两性关系，还有犹太问题和排犹主义，他都以一种往往令人感到不快的现实主义手法去表现。作为业已沉沦的加利曾和波多利亚[①]犹太人世界的表现者，具有改良主义倾向、对德意志精神怀有同情心，本人又有着极大的叙事天才，老卡尔·埃米尔·弗兰措也值得一提。布拉格人弗兰茨·韦菲尔和维也纳人斯特凡·茨威格出身于与施尼茨勒相似的环境，他们的创作和文学成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才达到顶点，不过他们的青年时代的作品已经引人注目。 469

皇家军队的军官中也出了几个优秀的作家，如感情细腻的、举止高雅的小说家和抒情诗人费迪南·冯·萨尔，其次斯特凡·冯·米洛，也同样是个优秀的抒情诗人；在比较年轻的人当中，我们要提出鲁道夫·汉斯·巴尔奇，他的长篇小说流传很广，情节都发生在他的施蒂里亚故乡和维也纳社会，还有弗兰茨·卡尔·京茨凯，他的中篇小说和抒情诗都很有水平。

安东·维尔德甘斯、里夏德·绍卡尔和埃尔温·吉多·科尔本海尔的初期创作都属于这同一时期。

---

① 波多利亚(Podolien)，地名，在波克兰西部，位于德涅斯特河和布格之间。——译者

作为和平主义的女作家和和平运动的热情组织者，贝尔塔·冯·祖特纳(原为金斯基女伯爵)，名声很大。她的长篇小说《放下武器！》(1890年)被译成世界各种文字。1905年，祖特纳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金；这个不知疲倦的和平思想的先锋战士死于1914年6月，世界大战爆发前几个星期。类似的思想鼓舞着阿尔弗雷德·赫尔曼·弗里德，一个维也纳人，他去了德国，努力给和平主义思想以科学的论据，并勤奋地从事新闻活动；他也取得了诺贝尔和平奖金(1911年)。顺便还要提到约瑟夫·波佩尔-林科伊斯，一个才思敏捷的政治和哲学上的怪人，他致力于一项根本的社会的和国家的改革，其原则是实行"普遍的义务抚养"，而不是义务兵役。

弗兰茨·约瑟夫时代也是奥地利戏剧的繁荣时期，尤其是它的第一个舞台——维也纳的城堡剧院的繁荣时期。风暴之年不久、西里西亚人海因里希·劳贝负责指导这个舞台直至1867年，无论艺术上和组织上都很成功。劳贝对此有着非凡的感觉，懂得如何才能取得舞台效果和公众的欢迎，但又不必牺牲文学价值。他上演的古典戏堪称楷模。他尤其是一个伟大的人才发现者、提携者和培育者。约瑟夫·瓦格纳、贝恩哈德·鲍迈斯特、阿道夫·宗南塔尔、路德维希·加比隆、约瑟夫·勒温斯基，以及著名的女演员玛丽·泽巴赫，夏洛特·沃尔特和策林内·维茨堡-加比隆等人，在他的指导下，都有出色的进步。在劳贝时代以后，弗兰茨·丁格尔施泰特和阿道夫·维尔布兰特保持了城堡剧院作为首要的德语舞台的地位。在当时争取到的工作人员中，鲁道夫·蒂罗尔特、弗里德里希·米特武策尔、马克斯·德夫林特、施特拉·霍亨费尔斯和卡塔琳娜·施拉特尤其表现突出。1888年城堡剧院迁入环形路新址。现代派在马克斯·布克哈特主持下，为自己开辟了这个舞台，约瑟夫·凯因茨就是在那时来到城堡剧院的，而在

470

继布克哈特以后的保罗·施伦特尔时代，剧院已显出有点停滞。

维也纳的通俗戏剧在卡尔剧院和维也纳剧院经常上演；在这个剧院里，杰出的演员有约瑟菲妮·加尔迈尔和玛丽·盖斯廷格；但在名气方面，土生土长的通俗戏剧演员亚历山大·吉拉迪超过了所有的同行；他在维也纳剧院和雷蒙德剧院演出过，最后被城堡剧院所聘请。

尽管城堡剧院具有出类拔萃的意义，但是，把全部注意都集中于维也纳的剧院显然是完全不适当的。在"外省舞台"当中，格拉茨邦剧院一向具有很高的水平，苏台德德意志舞台对年轻的天才演员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排演场所。1902 年在因斯布鲁克附近维尔滕地方建立的埃克斯尔舞台大大促进了农民的大众剧。

本时期的新闻写作、报刊文字和时评独自构成一章。在风暴之年，在暂时的新闻自由的保护下，新闻业一时极为繁盛，在复辟时期，机关报的数目有所减缩，但是，一些重要报纸仍能坚持下来。首先应提一下 1848 年由奥古斯特·仓开办的«新闻报»，一家有自由进步倾向的报纸。在该报编辑部发生过一场冲突以后，马克斯·弗里德伦德尔和米夏埃尔·艾蒂安兴办的«新自由报»(1864 年）成为该报的劲敌，直到那个比较老的机关报于 1894 年停刊时为止。在独裁的总编辑莫里茨·贝内迪克特主持下，«新自由报»办得远较君主国内其他报纸为好；它的经济新闻和文艺副刊具有非同寻常的水平。当然，拥有读者最多的还是«新维也纳日报»(从 1867 年起)，尤其是在莫里茨·塞普斯的领导下，此人与王太子鲁道夫关系十分接近。在有党派色彩或世界观上具有明显特色的机关报当中，应当提到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报»（从 1884 年起)、恩斯特·费尔加尼的排犹的«德意志大众报»（1888 年)和保守的«祖国报»(1875)，此报于 1911 年合并于基督教社会党的«帝国邮报»，从

而实际上停刊。同维也纳报纸相比，外省的报纸就明显地落后，较重要的有苏台德区的德文机关报和在匈牙利的《佩斯劳埃德报》(Pester Lloyd)。

"大报"——人们不把党报计算在内——发生着重大的影响，虽然它们的读者一般地不接受别人向他们提出来的政治处方。自由主义的《犹太报》自然受到基督教社会党人和德意志民族党人方面的抨击，社会民主党人也不是他们的朋友；政论上的主要敌人是无党派作家和文化批评家卡尔·克劳斯，一个卓越的语言大师，不过，在世界观方面往往动摇不定。他的杂志《火把》无情地抨击各大机关报的弱点。在大战期间，克劳斯更加大胆地起来反对仇恨心理。

在1800年前后的十多年里，奥地利音乐达到了独特的高度；后来出现的作品，仍然有相当的重要性，足以保持维也纳和奥地利作为音乐强国的地位。如果说，奥地利一再成为外国音乐家所选择的故乡，那么，另一方面，它不久就把优秀的音乐大师和交响乐作者、来自赖丁的弗兰茨·李斯特丧失给外国；在政治方面，李斯特的感情同匈牙利人一样。他是一个布尔根男子和一个下奥地利女子所生的儿子，在维也纳曾拜卡尔·切尔尼[①]为师。

安东·布鲁克纳(1824至1896)是一个来自安斯费尔登的普通下奥地利乡村学校的教师和圣弗洛里安教堂里的风琴手。他那些充满深邃的虔敬精神的交响乐作品历尽种种斗争和多次的失望才得以成名。

约翰·布拉姆斯(1833—1897)，以他的古典交响乐、室内音乐和歌曲作品去博得批评家和公众的钦佩就要容易得多，他来到维

① 卡尔·切尔尼(Karl Czerny,1791—1857)，奥地利钢琴演奏大师、作曲家贝多芬的弟子、贝多芬作品的演奏者。——译者

也纳时，已经是一个公认的作曲家。恰恰是维也纳的大批评家爱德华·汉斯利克——瓦格纳的猛烈反对者、布鲁克纳的死对头——曾大力支持过布拉姆斯。围绕着瓦格纳的作品，在奥地利也不可避免地发生过争论，但是，瓦格纳的作品得以征服维也纳歌剧院乃是特别由于奥地利的乐队指挥汉斯·里希特——他还奠定了管弦乐队的声誉——和费利克斯·莫特尔的推荐所致。维也纳歌剧院从七十年代起就开始了一个荣誉的时代，1869年新厦落成，特别是威廉·扬的领导时期可以说是一个成功的时期。古斯塔夫·马勒尔曾有十年担任过剧院的院长，为人勇敢无畏，他的作品继承了布鲁克纳的风格。从1877年起，萨尔茨堡举行莫扎特节，它巩固了萨尔察赫河首府(Salzachmetropole)① 的音乐传统。

南蒂罗尔人胡戈·沃尔夫改造了歌曲，他为默里克、艾兴多夫和歌德所谱的歌是很优异的。在上奥地利人威廉·金茨尔的歌剧创作中，至少大众歌剧《朗诵福音书的人》(1895年)和《赶牛歌舞》(1911年)是能站得住的，在老卡尔·戈尔德马克的作品中，大概他的《萨巴女王》(1875年)能站得住。极端现代派的最早端倪也可追溯到弗兰茨·约瑟夫时代，该派曾部份地受过马勒尔的影响；阿诺尔德·申贝格的早期作品也是那时候产生的。

在世纪的下半叶，维也纳成了欢乐的小歌剧的乐园。小约翰·施特劳斯(1825—1899)② 在音乐喜剧中名声也很盛，他作为“华尔兹之王”名声胜过他的父亲和兰纳③，除了他以外，弗兰茨·冯·絮佩、卡尔·米勒克尔、里夏德·霍伊贝格和卡尔·米夏埃尔·齐 472

① 此处指萨尔茨堡，该市濒临萨尔察赫河，故名。——译者

② Johann Strauß Sohn，即华尔兹作曲家老约翰·施特劳斯之子，他的华尔兹舞曲，如《蓝色的多瑙河》和《南方的玫瑰》，十分有名。——译者

③ 约瑟夫·兰纳(Joseph Lanner)，除老约翰·施特劳斯以外，最被人喜爱的维也纳华尔兹大师。奥地利有名小提琴手、乐队指挥和舞曲作曲家。——译者

勒尔也深受群众欢迎。奥芬巴赫的优势被维也纳小歌剧所压倒。世纪更替以后，年青一代的小歌剧作曲家开始他们的胜利进军，为首的是弗兰茨·勒哈尔，他同齐勒尔或捷克人卡尔·孔扎克和奥斯卡·内德巴尔一样最初都当过军乐队指挥。

民歌灿烂多采，经久不衰，在大城市里自然由于不再真挚的作品而有所退缩。不过，即使在这里也有粗犷原始的作品，如施拉美尔音乐。①

毫无疑问，在音乐方面，比在其他方面，更难于区分多瑙河君主国的其他民族在给予和接受上所起的作用。那时，他们也曾经有过自己创作的极盛时期；只要提一提捷克人弗里德里希·斯美唐那和安东·德沃夏克的名字就够了。

造型艺术

在奥地利的造型艺术中，十九世纪下半叶的特征是各种强调历史的风格的共存，或者，如同人们所贬抑和错误地评说的那样，是所谓“无风格”。后来，在世纪递嬗前后，出现了一种比较客观的追求风格的新风气。这种情况反映在青年艺术家的装腔作势的退出维也纳艺术家协会(1897 年)和“分裂”的形成。激进分子最后组成了哈根同盟。造型艺术学院于 1850 年有了新章程，1872 年起升格为高等学校，它也受到这些变动的影响。无论如何，弗兰茨·约瑟夫时代在风格史上并未显示出整齐划一，不过，除了巴罗克以外，这个时代的特征对整个奥地利艺术史的面貌所给予的影响也最深。

① 施拉美尔音乐(Schrammelmusik)，流于维也纳民间，是一种四重奏，计有两个小提琴，一个吉他琴，一个手风琴(以往多为小号)，因维也纳音乐家约翰和约瑟夫·施拉美尔而得名。——译者

这种提法特别适用于建筑，因为，那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修造得更多，城市的增长、许许多多显示气派的建筑和工业建筑、大城市交通的要求，都提出了巨大的任务。过于强调历史的建筑运动的序幕可以说是维也纳的老莱兴费尔德教区教堂的兴建，该教堂是在施普伦格尔的设计方案被拒绝以后，由约翰·格奥尔格·米勒采取新浪漫主义形式修建的(1850 年)。

1857 年 12 月 20 日，皇帝特许令晓谕维也纳人，将内城周围业已无用的城廓、濠沟和斜坡平毁；1865 年 5 月 1 日，围绕着气宇轩昂的林荫道和绿面积的环形路通车。在构筑宽阔的马路时，与欧斯曼[①]在巴黎筹建林荫大道时情形相仿，怕革命和怕街垒的情绪起了一定作用，大马路几乎无法用临时构成的障碍物封锁或者能够抵挡前来进攻的军队。环形路两侧显示气派的建筑当然还需要一些时候(至 1888 年)才得以完成。尽管有种种抗议，要求以熟悉的巴罗克风格进行设计，以求划一，这些建筑还是按照艺术家们的考虑，并注意到一定的象征，保持着不同的风格。歌剧院的建筑式样受到公共舆论的非难最多，它由维也纳人爱德华·范德尼尔和奥古斯特·冯·西卡茨堡于 1861—1869 年期间，以文艺复兴式样建成；参加内部装璜的有莫里茨·冯·施温德和卡尔·拉尔。作为环形马路的主要设施，按照戈特弗里德·泽姆佩尔的设计，从霍夫堡到御马厩要修一个连成一片的广场。这个计划只是部份地完成。在环形路的另一侧出现了艺术史和自然史博物馆两个并排的建筑，属于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风格，按照泽姆佩尔和卡尔·哈泽瑙尔 1872—1881 年的设计方案所建。霍夫堡一侧的两个翼状建筑，

473

① 欧斯曼(Baron Georges-Eugène Haussmann, 1809—1891)，在法国第二帝政时代曾任塞纳省长十七年，在巴黎大兴土木，尤其是林荫道(Boulevards)，使巴黎的面貌改观。——译者

在世纪更替以后，只有带有“主楼”的太子楼（Thronfolgerbau）兴建了起来；在另一侧（挨着英雄广场对面的人民花园围垣）对称的建筑段的设施则未修建。值得欢迎的是，从英雄广场到市政厅和议会的视线没有受到大设施的阻挡。城堡剧院兼有新巴罗克和文艺复兴的特色，连同它那翼状建筑和豪华的楼梯间(1874年至1888年)，均出自泽姆佩尔和哈泽瑙尔之手。1873—1883年，维也纳大学按维也纳人海因里希·费斯特尔的方案建成，属于文艺复兴式建筑。

1873—1883年期间，丹麦建筑师特奥菲尔·汉森，以仿古希腊风格修建了议会大厦，在这以前，他已经为维也纳修过肉市场旁边的希腊教堂，于1849—1856年，与路德维希·弗尔斯特一道修建了陆军博物馆，该馆设在兵工厂内，该厂原在1849—1856年期间设计为俯瞰该城的兵营。希腊人恰恰是古代讲究民主的民族，所以，选用他们的风格来修造人民代表机构，并被认为对艺术和科学，文艺复兴式特别有代表性。为了强调维也纳作为一个德意志城市的特点，它获得一个新哥特式风格的新市政厅，带有高耸的中央塔，那是弗里德里希·施密特的作品(1872—1883)；哥特式当时被视为特定的德意志风格，这当然是不正确的，但，新教堂建筑却很喜欢采用它；施密特也是圣斯特凡大教堂的建筑师。新哥特式已474经被年轻的海因里希·费斯特尔选用来修造福蒂夫教堂，这个教堂为纪念弗兰茨·约瑟皇帝被谋杀未遂而依大教堂的式样修成。在本时期为数众多的新哥特式教堂建筑中，应当特别提到其中最大的新林茨大教堂，它是鲁迪吉尔主教发起，按照科隆大教堂建筑师文岑茨·施塔茨的方案着手修建的，但在共和国时代才竣工(1862—1924)。阿德蒙特修院和教区教堂是在一场大火(1865年)以后，作为新哥特式建筑出现的。

在比较小，但成长迅速的城市里，受维也纳范例的影响，也建设了一些新城区，如萨尔茨堡的安德烈区和格拉茨的歌剧院周围。就单个的建筑物而论，应提到古斯塔夫·古吉茨的作品克恩滕的邦立博物馆，以及小格奥尔格·豪贝里塞的格拉茨耶稣之心教堂的粗砖建筑，他们两人都是他们制作主要作品时所在的那个城市的子弟。

象克罗伊岑施泰因(从 1874 年起)和列支敦士登（从 1873 年起)这样的城堡之得以重建或新建，应归功于新浪漫主义的和着意强调历史的思想，以及阔绰的贵族赞助者们的鼓励和资金，上述两城堡的修造主是汉斯·维尔切克伯爵和列支敦士登的国君约翰第二。

如同在造型艺术的其他分支里一样，本世纪末在建筑术中，也显然可以看到一种新精神。奥托·瓦格纳以新文艺复兴风格开始(维也纳万国银行)，后来又以极其独特的石板盖面建筑术修造了邮政储金局、市营铁路局和施泰因霍夫附近的教堂。在阿道夫·洛斯的建筑和论著中，“新的求实精神”起来反对历史主义；这个建筑师在论战中反对一切在建筑结构中毫不起作用的装璜。他在米夏埃尔广场宫廷城堡对面的住宅建筑，由于正面光溜溜而受到一阵激烈的抗议。约瑟夫·霍夫曼首先是一个室内装璜师，但他在布鲁塞尔也建造过斯托克莱宫，古斯塔夫·克利姆特参加了它的装饰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还应该提到的是反对因循守旧的艺术家分离派的绘画陈列馆，该馆有一个别致的圆顶，上有桂枝形的铁雕孔细工；修建者是约瑟夫·奥尔布里希特，他后来去了达姆施塔特。这个新流派尽管遭到种种攻击，但在世界大战打断了它的进一步创造时，它已经基本上站稳了脚跟。

十九世纪中叶以来，雕塑艺术也发展得很盛；从来没有这样多

纪念碑点缀着新旧广场，以纪念古往今来的伟大人物。图林根的雕塑家和铸铜匠安东·费恩科恩于1840年前后来到维也纳；出自他亲手制作的，有欧根亲王和卡尔大公爵的纪念碑，维也纳霍夫堡前的英雄广场因此得名，还有阿斯佩恩战场的雄狮雕象。由于威特伐利亚人卡斯帕尔·楚姆布施，首都才有玛丽亚·特蕾西亚、拉德茨基、阿尔雷希特大公爵以及贝多芬等人的纪念碑，后者大概是这位艺术家的最重要作品。普雷斯堡人维克托·蒂尔格纳在世纪末时就已在维也纳制作了莫扎特、马卡尔特和布鲁克纳的纪念碑，在施太尔则制作了约瑟夫·韦恩德尔的纪念碑。维也纳市公园里的美观的多瑙河少妇像，则出自魏玛的维兰德纪念碑的制作者、克恩滕人汉斯·加塞尔。埃德蒙德·黑尔默观摩了加塞尔的作品，维也纳的歌德纪念碑就是他亲手所作。独创自己道路的卡尔·孔德曼建立了议会前的帕拉斯·雅典娜喷泉，以及普拉特施特恩的特格特霍夫纪念碑。此外，在这里提到的人也都参加过纪念碑建筑物的雕塑装饰。苏台德德意志人弗兰茨·梅茨纳、制作莱比锡大会战纪念碑的大师，在林茨制作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弗兰茨·施特尔茨哈默的纪念碑。威茨多夫的英雄山，由它的修造者、阔绰的军需供应商戈特弗里德·约瑟夫·帕克弗里德，以浪漫主义精神和两百个铸铁的和石质的半身雕像装饰着。1849年以来各种人才曾参加过这项工程，它与其说是一项艺术成就，不如说是一项罕见的珍品。它至少是拉德茨基元帅的坟墓所在地。

在可以代表1900年前后的新风格的作品当中，有在维也纳工作的德意志摩拉维亚人汉斯·巴尔维希的动物雕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同样来自摩拉维亚的安东·哈纳克，由于象征性强的大型人物塑像而开始成名。应当提到的还有雕铁和雕钢艺术的新提倡者、施太尔人米夏埃尔·布吕梅尔胡贝尔。

在绘画方面，维也纳的重要性也许不如在建筑和雕塑方面那样突出，尽管这个首都吸引了这个专业方面的许多优秀人才（不仅仅是奥地利的）。

卡尔·海因里希·拉尔虽然是一个保守的、囿于巴罗克典范的画家，但也是一个有革命思想的公民，这使他丢掉了艺术学院教授的职位。以后，他常常忙于装饰维也纳的纪念碑建筑物。拉尔的学生汉斯·卡农（原名斯特拉希日普卡，1829—1885）的艺术表现了类似的特点和更为浓烈的自然感，他抛弃了军官生涯，改行从事造型艺术。萨尔茨堡人汉斯·马卡尔特（1840—1884）的上升有如彗星；“马卡尔特风格”盛行于七十和八十年代。作为1879年庆祝（皇帝伉俪的银婚纪念）游行的导演，马卡尔特象一个凯旋者那样出现于公众之中，他也是维也纳巍峨建筑物的主要装饰者。他的巨型画颜色浓烈，令人感觉愉快，但是，在他死后不久，却被认为是戏剧性的和感觉贫乏的。人们力争很快就忘掉那一度被人称颂 476 的艺术家，并对于以前热中于马卡尔特感到羞耻。卡农和马卡尔特应当视为一种新巴罗克的最重要代表、特别是受鲁本斯培养过的艺术感觉的最重要代表。

不如马卡尔特的成就那么显著，但更为持久的是多愁善感的怪人安东·罗马科，他今天被评价为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奥地利画家中最重要的能手。

蒂罗尔人埃德蒙德·冯·韦恩勒以浪漫主义风格绘制风景画。比他年轻的同乡弗兰茨·德弗雷格尔、皮洛蒂的一个弟子，表现了他家乡的历史和农民的日常生活，他的后期作品已经显示出从重历史的观点向自然主义观点的过渡。他本人最初颇为艺术界公众所喜爱，但却被紧跟着的下一代傲慢地拒绝，有类似马卡尔特那种情况。

奥古斯特·冯·佩滕科芬和埃米尔·雅各布·申德勒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与法国印象主派相并行的现象；一个是风景画家，另一个是风俗画家和人像艺术家，都作出了重要的成绩。阿尔特家族的画家在十九世纪维也纳艺术史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法兰克福人雅各布·阿尔特在三月革命前，在造型艺术学院任教时，已享盛名；在他的儿子当中，鲁道夫（1812至1905）特别由于忠实描绘维也纳建筑的风景水彩画以及他的石版画而出名；弟弟弗兰茨所创作的作品内容和技巧配合得很好。蒂罗尔人特奥多尔·冯·赫尔曼曾在维也纳和巴黎学习过，但，由于他的城市画和风景画采用醒目、浓烈、被认为过份夸张的颜色，终生都受到艺术批评家的激烈的诘难；在维也纳艺术家之家举行了一次遗作展览会（1895年），才使他的成就最后获得积极的反响。

在分裂派画家中，古斯塔夫·克利姆特(1862至1918)引起了最大的轰动。他的装饰性的、色彩欢快的风格把西方和东方的意见结合起来，并引起种种象征性的解释，但，也引起激烈的争论，尤其是他为维也纳大学的新建筑所设计、但又被驳回的象征哲学、法律和医学的比喻画。在埃贡·席勒的作品和奥斯卡·科柯施卡的青年时代作品中，欧洲的表现主义风格浪潮留下了它的相当重要的奥地利印记。阿尔宾·埃格尔-利恩茨从他的蒂罗尔环境中汲取灵感，他取材于农民生活的图画就象是有力的、粗犷的雕塑。他的世界大战画象征性很强，令人印象深刻。埃格尔-利恩茨在宣传文字中英勇地捍卫了他的艺术观。

477 美术工艺对于本时代的创造所作的贡献是很重要的。最初的局面当然不很顺利，因为机器的批量生产似乎有排挤结实的艺术手工艺的昂贵产品之势。1864年，英国的南肯辛顿博物馆这个典范促成了在维也纳施图本林的奥地利艺术与工业博物馆亦即欧洲

大陆上第一个艺术工艺博物馆的兴建（1868—1871），以及奥地利艺术工艺学校的兴建。从这两个机构产生了强大的动力。奥地利的创造性的结晶玻璃的制造，尤其是经过路德维希·洛布迈尔的创造，获得了显赫的声誉。洛布迈尔把其父在三月革命前建立的公司扩大成为全欧闻名的企业，它的维也纳工厂与波希米亚的玻璃磨光厂合作。陶瓷工艺保持了自己的名声，尽管国营的陶瓷业停办，不过，如在上文其他地方所提到过的，领先地位完全转给了波希米亚。在弗兰茨·约瑟夫时代，在同样传统丰富的维也纳家俱艺术中，"第二个（和第三个）罗科科"，以及后来的"新比德迈尔"都很受人们的推崇。

维也纳工场（Wiener Werkstätte）和奥地利实用工艺协进会[①]（1913 年）的成立，对现代艺术工艺的发展给予了新的推动。那时人们正在设法以现代的、"货真价实的"制作法，在艺术家和灵巧的工匠的合作下，制造日常生活用品，此外，还设法弥补工业和工艺之间的鸿沟。后来，1914 年，在科隆举办的德国实用工艺协进会展览会上，奥地利的工艺表现得很突出。室内装璜、家俱艺术、金属和陶瓷器皿、水晶玻璃、毛毯织造、衣料和糊墙布，也同样成为在达戈贝特·佩歇、约瑟夫·霍夫曼、弗兰茨·奇热克、阿尔弗雷德·罗勒尔等人倡导下的新工艺产品。在临近第一次世界大战那几年里，讲究工艺无论如何是奥地利艺术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

弗兰茨·约瑟夫时代的全貌显示了，一方面政治演变连同它的为数众多的决裂、逐渐增长的悲观、愚蠢的民族主义者的过火行为、由于周期性阻挠行动而引起的议会的自我抵消，与另一方面

---

① 1907 年德国成立实用工艺协进会（Deutscher Werkbund），其宗旨在于促进各种美观、实用、实惠的商品的生产。参加该会的有手工业者、艺术家和工业家。1913 年，奥地利成立类似机构，其宗旨相仿。——译者

令人印象极深的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之间的奇怪的矛盾。毫无疑问，君主国处于严重危机之中，不过，在它的漫长的历史中，它只是享受着少有的、暂时的真正安宁而已。人们已习惯于艰难困苦。为了确实把那古老的建筑摧毁，这才需要1914年至1918年战争这样的世界灾难，其结果不仅带来了君主国的结束，也带来了对欧478 洲民族和国家体系那种深刻的改变，从这次改变中欧洲大陆再也恢复不过来，欧洲也就随之开始从它那统治世界的地位上不可挽回地衰落下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

促使奥地利-匈牙利向塞尔维亚宣战，从而触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种种事件，我们已经很熟悉，可是，在对有关史料的评价方面却存在着广泛的意见分歧，这些史料仅由于语言上的原因通常就研究得不够充分。即使对档案的状况了解得极其透彻，毕竟也只能得出一个不完全的概念。不言而喻，民族情绪和政治意图往往影响着研究的客观性，尤其是在"澄清战争责任问题"这个主要方面进行研究时。

如果我们仅局限于近因，即萨拉热窝的谋杀事件，那么，就是这个事件也没有彻底澄清。在投掷炸弹失败以后，王储和他的妻子被一个年轻的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加弗里洛·普林西普用左轮手枪击毙。首先可以肯定的只是，这不是怪人一时冲动那一类的行为，而是一个有目的的行动，有一个八个凶手的小组在活动，这些凶手曾在塞尔维亚的土地上受训，他们所装备的武器来自克拉古耶瓦茨军营，塞尔维亚现役少尉沃亚·坦科希奇和塞尔维亚铁路工人米兰·齐加诺维奇曾参与其事。同样清楚的是，有一个秘密组织"不联合毋宁死"，又名"黑手"，以及它所隶属的"青年波

斯尼亚”小组在幕后指使这些凶手。这次凶杀与1910年至1914年间的前五次有显著的相似之处；最后一次是1914年5月20日针对巴努斯① 斯克莱奇的。

在战后才得知，塞尔维亚总参谋部情报部部长、“黑手”的领导成员德拉古廷·迪米特里耶维奇，又名“阿皮斯”，曾策划过这次谋杀(此人于1917年6月，在萨罗尼加举行极其值得怀疑的审讯以后，被塞尔维亚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并被枪决)，而且据他供称，他的部下、那个曾在奥地利土地上组织过情报网的拉德·马洛巴比奇也曾策划过这次暗杀。事先，迪米特里耶维奇在俄国武官阿尔塔曼诺夫那里证实，如发生冲突，俄国不会抛弃塞尔维亚。迪米特里耶 479 维奇当然也保证，他不会把暗杀计划透露给阿尔塔曼诺夫。虽然现在已经没有疑问，暗杀组织曾通过达拉古廷·迪米特里耶维奇打入塞尔维亚总参谋部，但是，有关此事的证据，尤其是有关1914年塞尔维亚政府知情的证据却无法提供，由皇家外交部派往萨拉热窝的公使馆参赞维斯纳认为，这种知情是几乎不可能的；关于在塞尔维亚土地上的策划，以及坦科希奇和齐加诺维奇所起的作用，人们当然已经清楚；实际上，塞尔维亚方面，为帮助澄清罪行，什么也没有做。无宁说，奇加诺维奇逃往阿尔巴尼亚是得到了方便的，而且还试图使奥地利人认不出他的身份来；门的内哥罗当局则使另一个密谋犯穆哈默德·梅默德巴西奇的逃亡得以易于进行。

在萨拉热窝暗杀事件发生时任塞尔维亚内政大臣的留巴·约瓦诺维奇，在1924年发表了文章，这才为塞尔维亚政府的参与问题带来某些变化。他在一篇回忆往事的文章中声称，在暗杀发生前的几个星期，首相帕西奇谈到有几个人准备在萨拉热窝暗杀王

① 此处巴努斯(Banus)，斯拉夫语，指旧匈牙利的总督或司令官，又简称为班(Ban)。——译者

太子；但是，没有能够阻止他们越境到波斯尼亚来。然后，约瓦诺维奇肯定说，"虽然我知道在那里正在酝酿着的事情，"萨拉热窝谋杀案的消息还是使他感到震惊。从这些证明材料中可以看出，贝尔格莱德政权至少犯了轻率的疏忽罪。约瓦诺维奇的文章在南斯拉夫的西方朋友中引起了极大的激动，他们以前断言否认塞尔维亚政府参与预谋；可是，人们不久就一致同意，认为约瓦诺维奇的揭发是一时仇视帕西奇的表现，因而否认它们的重要性。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塞尔维亚外交部的政治档案里发现了帕西奇亲笔写的一个没有日期的便条，它给人的印象是，把密谋者行径的最初的概况作了记载。

据说，塞尔维亚驻维也纳公使向皇家财政大臣比林斯基曾发出警告，这个警告的事实和性质始终没有弄清；关于这个警告，那位塞尔维亚外交官自己所作的陈述也是自相矛盾的，它顶多暗示塞尔维亚族的奥地利士兵可能有行刺的打算——那个消息说的完全不中肯。按照我们所知道的，顶多可以作如下的设想：塞尔维亚当局对于暗杀计划有所风闻，它大体上曾设法阻止密谋者转移到奥480 地利土地上，并且，当他们一旦到了波斯尼亚，人们却又不敢把情况通知奥地利警察，如果通知就会导致及时的缉捕，而人们不想把这些青年人交给奥地利当局惩处。很可能人们把密谋者看成"爱国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肇事地点立了一个表彰的纪念碑——或者，人们惧怕"黑手"；实际的问题大概是，抛弃密谋者对于大力进行着的南斯拉夫宣传和大塞尔维亚思想会有毁灭性后果。在波斯尼亚的奥匈皇家当局应负某种责任，因为他们为保护王太子所做的准备工作很不充分。

1914 年 6 月 28 日以后，在奥地利到处盛行的看法是，塞尔维亚应为萨拉热窝的谋杀事件负责。对于外交大臣贝托尔特具有决

定性的是，他派了一个由亚历山大·霍约伯爵率领的使团前往柏林，取得德国政府对如何对待塞尔维亚的赞同。在维也纳，匈牙利首相蒂萨反对出兵解决与塞尔维亚的冲突。这种情况，以及俄国公使哈特维格在一次访问奥地利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时突然中风死亡一事，都使塞尔维亚和奥地利报纸上的激烈论战变得更加尖锐起来——这时，在塞尔维亚，人们奇怪地断言，他是被谋杀的。蒂萨终于不再表示反对。由于法国总理潘迦赉正在俄国逗留，人们把递交“有限期的照会”的日期推迟到7月23日。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实际上已被排挤到一边。最后通牒中的关键性段落涉及到前言，前言中要求塞尔维亚在官方报纸中发表一项措词已经规定好了的声明和一项国王的命令，还涉及到第六点，该点规定由奥地利派出的机关参加暗杀事件的调查。如果“答复令人难以满意”（人们无疑已预见到这一点），就以断绝外交关系相威胁。看来塞尔维亚是在俄国影响下才给予答复的，但对上述段落却有某种保留；看来它最初准备作全面的让步。于是，奥地利于7月25日断绝了外交关系；根据特梅斯-库宾附近发生战斗的消息，贝托尔特敦促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在宣战书上签字，其实，那次战斗充其量不过是一次无关紧要的射击，据说，接着还对多瑙河上的奥地利船只进行了一些侵犯。

由于奥地利肯定会得到德国的支持，塞尔维亚会得到俄国的支持，而俄国又会得到法国的帮助，这无疑就使冲突变得危急和尖锐起来。人们偏偏非要一次世界冲突不可，或者有计划导致这场冲突，但是，对于它也决没有畏缩。从某一时刻起，为阻挠事情的进程，需要的倒是十分坚决的意志和高明的政治家手腕，这两者都没有——不仅在奥地利-匈牙利方面是如此。不消说，人们不曾预料到欧洲和世界面临的这场灾难会有这样空前的规模。 481

1914年7月28日，向塞尔维亚递交了宣战书；从这场奥塞冲突中还不一定会酿成世界大战，正如两次巴尔干战争也没有发展成为遍及全欧的战斗。其实，冲突的扩大决不符合奥地利的利益。德国政府来电报建议要克制，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提出从中调停的建议要求，前往占领贝尔格莱德的奥地利军队“停止前进”，对此贝希托尔德伯爵和他周围的人都没有妥善地处置。

在俄国军界对沙皇施加相应的压力以后，同日，即1914年7月30日，俄国军队实行总动员，这就意味着在走向世界火灾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步。次日，奥地利才实行总动员，8月1日，德国和法国相继迅速地实行动员。同日傍晚，德国向俄国宣战——无疑为时过早。人们想抢在俄国动员尚未完全实施之前，但，两线作战似乎已无可避免，为应付这种情形，规定在西线采取攻势，而在东线则实行长期的防御，8月3日，德国向法国宣战；德军根据“施利芬计划”①，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开入中立的比利时，因此，8月4日，英国跟着向德国宣战。门的内哥罗的议会已于1914年7月31日决定予塞尔维亚以军事援助，然而到了8月5日才向奥地利宣战。继这些行动之后，8月6日，二元帝国才晚得令人奇怪地向沙皇俄国宣战。世界大战已经开始。

哈布斯堡君主国对于这场大战准备得怎么样？它是由于那些负责它的外交政策的人们的笨拙而陷入这场大战之中的。1912年，曾将三年兵役制改为两年，当然，同时增加了征募人数。步兵固然训练得好，但装备不足，尤其是在机关枪的装备方面，不如盟国和敌国，机关枪在这次战争中杀人无算，令人生畏。炮兵连同它的火炮器材，普遍地大大落后于德国、法国或者俄国的陆军；

482

① 施利芬（Graf Alfred von Schlieffen, 1833—1913），普鲁士元帅；1891—1906，总参谋长；1905年，拟定了一个两线作战计划，即所谓施利芬计划。——译者

只有一种装有自动膛线的重型炮是例外(30.5 厘米臼炮),它利用了费迪南·波尔舍的设计方案。相反地,工兵却装备精良。骑兵尽管拥有良好的器材,但是关于如何使用骑兵的观点却是陈旧的,长期的太平盛世使他们没有重视别国陆军的经验,如俄军对付日本人的经验或布尔战争中英军的经验。海军舰队有优良的军港(波拉①、塞贝尼科②和卡塔罗③)可用,它拥有几艘新式的战斗舰,它们应当拥有更为重要的装备和一些小的部队单位才是。短小精悍的多瑙河舰队却能够作出很好的成绩。空军发展得不好,在战争期间也不如其他强国那样得到加强。

使敌人感到极其惊讶和不愉快的是军队的士气高昂,不仅德国和马扎尔的部队是如此,斯拉夫人和罗马尼亚人打得也很英勇。波斯尼亚士兵在为奥地利进行的第一次和最后一次战斗中,获得良好的声誉,使敌人闻风丧胆。捷克部队从 1915 年起,鲁特尼亚部队也一度(1916 年)极易为敌方宣传所动摇。如在其他国家里一样,战争开始时,大多数居民阶层都普遍有一种非常乐于战斗的情绪,即所谓万能的"1914 年精神",志愿从军的人为数很多,认购战争公债的为数很大,还存在着出自爱国心的、对于速胜的盲目相信,这表现在一些愚蠢的口号和诗文中。

奥地利的作战计划规定对塞尔维亚采取一个速战速决的攻势,人们想通过决定性的胜利来争取保加利亚。于是集中了比较强大的兵力攻打塞尔维亚,一部份兵力在攻势中不得不拨归俄国

① 波拉(Pola,现名 Pula),欧战时为奥地利的主要军港,现为南斯拉夫港口,位于伊斯特里亚南端,濒亚得里亚海湾。——译者

② 塞贝尼科(Sebenico,现名 Sibenik),位于克劳地亚的达尔马提亚海岸,现为南斯拉夫城市。——译者

③ 卡塔罗(Kattaro,现名 Kotor),位于门的内哥罗海岸,周围地势崎岖,现为南斯拉夫城市。——译者

战区。奥地利于1914年秋天和冬天，先后越过德里纳河发动两次攻击，均告失败；第二次进攻虽然导致暂时占领贝尔格莱德（1914年12月2日），但是，在阿兰杰洛瓦茨战役中，由于密集的土耳其军队的兵力在决定性的战场上占据优势，终于以惨败告终。奥地利损失极大，它的威望一落千丈。两个中欧同盟国[1]都要进行两线作战，两国都想迅速打倒同一个敌人，两国都想错了，因为德国的西线攻势开始时虽然很成功，但在1914年9月在马恩河被击退。

奥地利1914年在加利曾的作战行动进行得也不顺利。有四个奥地利军可以使用，有一个军刚从塞尔维亚战区开来。奥地利483 的骑兵侦察效果甚微，而飞行员又太少。因此，对于俄国敌人的部署和兵力摸不清楚。在8月底，由于丹克尔的第一军在克拉斯尼克附近和奥芬贝格的第四军在科马罗夫附近获胜，因而取得战果，可是，布鲁德曼的第三军在伦贝格却失败惨重，第二次战役在伦贝格（或格罗德克，1914年9月4日至11日），几经反复，也以撤退告终。撤退虽然进行得井井有条，但是对于严重减员的奥匈部队的信心和战斗力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影响。在八、九月的战斗中，奥匈皇家军队往往进攻凶猛，但，流血的代价却非常高；损失最严重的恰恰是最精锐的部队和现役军官团，这是无法弥补的。

1914年10月，俄国人包围桑河要塞普热梅希尔，但再次被击退；11月，奥地利军队退回西加里西亚的克拉科夫地区，在利马诺瓦-拉帕诺夫战役（1914年12月7日至10日），他们从该地区略向前进；同时，德国人却在罗兹附近告捷。俄国人随后试图强行穿越喀尔巴阡山口，如同奥地利在1月和2月底的两次反攻一样，这些进攻都失败了。这一回，普热梅希尔之围无法突破，该要塞在粮

① 此处指奥地利和德国。——译者

尽弹绝之后，于 1915 年 3 月 23 日投降。守军约十二万人为俄国人所俘。漫长的俄国战线拴住了许多奥地利和德国的有生力量，在激烈争夺的喀尔巴阡山诸山口之南，匈牙利经常受到威胁，所以，人们决定搞一个大的攻势突击，该突击于 1915 年 5 月由德国和奥地利军队，按照康拉德·冯·赫岑多夫的计划，在戈尔利采和塔尔诺夫地区予以发动，取得了完全成功；加利曾的大部被解放，位于加利曾和东普鲁士之间的“波兰口袋”之敌被肃清。1915 年 6 月 3 日，普热梅希尔重又落入奥地利之手，6 月 22 日，攻克伦贝格。另一个夏末攻势导致华沙、科弗诺和维尔纳的占领；这样，在东部，从北到南建立了一条笔直的前线。

在这期间，意大利的“善意的中立”变成了公开的敌对。贝托尔德对塞尔维亚所采取的行动没有得到意大利的赞同，意大利政府于 1914 年 8 月 1 日宣布，同盟的情况已不存在，在三国同盟——一个防御同盟——条约的条文面前，毫无疑问，它是对的。人们在观望，一旦对战争局势看出某些趋向，萨兰德拉首相就准备参加协约国，在 1914/15 年之冬，它的运气显然比较顺利；“干涉派”力主参战，大多数居民简直不支持他们，但是，在街头，他们那些大声鼓噪的党羽却很得势，其中以加布里勒·邓南遮和贝尼托·墨索里尼特别突出；后来，法西斯宣传的明显特征已经不可否认；焦利蒂率领下的不干涉派退却了。德国力图从中调解，而不考虑奥地利的利益，在维也纳，人们最初拒绝了德国的步骤，后来也拚命争取意大利不要参战。在 3 月里，人们还希望由于割让特伦提诺，意大利就能保持中立，后来还提出给予阿奎莱亚和格拉迪斯卡；允许的里雅斯特取得自由城的地位。但是，1915 年 4 月 26 日，意大利表示要在协约国一边参战。作为酬谢，伦敦条约把丰厚的一份奥地利战果许给意大利，即南蒂罗尔、格尔茨、的里雅斯特、伊斯特里亚、达

434

尔马提亚的大部份，甚至还有阿尔巴尼亚地区。这项交易的结果是，1915年5月23日意大利参战，因此，协约国答应迅速结束战争。在奥地利，抵抗精神象火焰一样猛烈地迸发；蒂罗尔人、克恩滕人、斯洛文尼亚人和克劳地亚人竟相出力，来保卫他们那受到威胁的家乡。边防军、民军和一些从塞尔维亚和俄国前线调来的野战部队参加了战斗。人们还拥有一些边境要塞，边境的走向对意大利的进攻行动不利，因为从蒂罗尔这个棱堡可以进行反击。意大利军队暂时还缺乏作战经验，它的领导犯了很多错误。但是，意大利士兵无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要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更乐于牺牲。从1915年6月至1917年10月，十二次伊松佐战役向两军提出了极高的、人力和物力上的要求，并且造成巨大的牺牲。这次战役中的四次是在1915年打完的，它们全都起源于总司令卡多纳将军的意大利的进攻战，他所期望的决定性的胜利却始终没有得到。

1915年秋天，中欧同盟国征服了塞尔维亚，前一年，土耳其已经同它们联合，现在又得到保加利亚的支持；不久，门的内哥罗陷落，阿尔巴尼亚北部被占领，不过，塞尔维亚军队的残部终于逃到亚得里亚海岸，上了盟国的船只。与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的陆上联系建立起来，但是，贻误了萨洛尼加的占领，这后来证明是灾难性的。

1916年，中欧国家争取在军事上决胜负。不幸，人们选定了不同的进攻目标。康拉德从蒂罗尔山区向"七区乡"①发动进攻，德485 国总参谋长法金汉导演了向凡尔登的总攻。预期的胜利落空了；凡尔登向德国人和法国人索取了巨大的流血代价，伊松佐的战斗，在1916年继续猛烈地进行（第五次至第九次伊松佐战役）；

① "七区乡"(Sieben Gemeinden)，地位，在意大利维琴察的阿齐亚戈，居民讲德语。参阅本书212页。——译者

8 月 9 日，意大利人攻克格尔茨，取得决定性胜利。康拉德在蒂罗尔前线的尝试最初似乎大有希望，但在攻下阿齐亚戈以后不得不停顿，那时，布鲁西洛夫将军麾下的俄国人在沃利尼安，在奥利卡和卢克地区，于 1916 年 6 月 4 日发动攻势，在加利曾的奥地利军队有被粉碎之虞。尤其严重的是，捷克和鲁特尼亚军队大批拒绝作战、投降或者不战而被俘；于是，1916 年夏，人们在沃利尼安丧失了三十万俘虏，战线被深深地突破。

奥利卡-卢克之灾间接引起的后果是罗马尼亚的参战。这个行动（1916 年 8 月 27 日）大大延长了中欧同盟国的东方战线，需要迅速采取对策。拥有兵力约六十万人的罗马尼亚军队虽然装备良好，但是没有作战经验，它的试进攻失败了，在一个部署得好、又战果辉煌的秋季战役中，德国、奥地利、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的军队占领了罗马尼亚的大部份。

在攻下布加勒斯特以后，中欧同盟国采取了正式求和的第一个步骤，这个步骤成功无望，因为它没有解决比利时问题，而且先于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和平呼吁只不过几天，这个呼吁同样被协约国所拒绝。

1916 年年底，奥地利的国内政治发生重大改变。卡尔·施蒂尔克伯爵领导的内阁，从战争开始之日，就依靠第十四条实行专制统治。人们一再要求召开帝国议会，未果；1916 年 10 月 21 日，温和的社会民主党领袖维克托·阿德勒的激进儿子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在维也纳迈斯尔与沙登旅馆枪杀了首相。这个行为引起极大的哄动；被告在法庭面前很技巧地为自己辩护。这时，恩内斯特·克贝尔重又受托组织政府，但是，在年底以前不得不推辞。

另一个变动则更为重要：1916 年 11 月 21 日，皇帝法兰茨·约瑟夫薨逝，终年 86 岁。今天，这位老皇帝的形象已经成为他那

个时代的象征,1914 年以前漫长的和平年代常常被直截了当地称为“昔日美好的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专写这位统治者的为人、家庭和环境的出版物纷至沓来，表现了这种想法的强烈和顽486 强。君主的责任感,他的军人作风、家庭生活的悲剧,使得许多人对他的同情显得合乎情理;另一方面,有许多同代人认为这个上了年纪的人悲观、害怕采取行动,是他那个帝国没落的原因之一。在世界大战爆发之际,这位统治者心里没有幻想,但已再没有力量来抵抗他周围的人的压逼。

新皇帝、奥托大公和玛丽亚·约瑟法公主之子卡尔,在亲政前就有一个为人友善、甚至和蔼可亲的年轻人的名声;政治经验他必然是欠缺的，但对于他的坚决的和平愿望大可不必怀疑。奥地利要担心的是怕被联合起来的敌人所消灭,但是,如果中欧同盟国获胜,德国的优越地位所带来的前景也不怎么令人愉快。

捷克贵族克拉姆-马蒂尼茨继克贝尔为首相,但他未能使他的同胞在君主国的范围内进行合作，而且德国人也反对他。1917 年6 月,恩斯特·冯·赛德勒领导下的一个文官内阁接任,这个内阁接近各德意志党派,也想以广泛的大赦来争取捷克人；因此,因叛国罪名被捕和判决的捷克政治家卡尔·克拉马日和阿洛伊斯·拉辛得以释放。面对着从国外、由托马斯·G·马萨利克和爱德华·贝奈斯周围的人供给材料的宣传活动，这些措施再也收不到重大的效果。

自 1916 年以来，粮食明显地缺乏，尤其对帝国西半部的城市和工业区有影响,因此,公众的情绪大大恶化。靠发卡片来分配粮食的做法不能令人满意;一些有剩余的农业区,如加利曾和布科维纳,由于战争进行而一再无法接济粮食。劳动力的不足、匈牙利人的自私和有意识的怠工，尤其在斯拉夫地区缺乏任何有份量的进

口物资，凡此种种都使困境变本加厉，使用质量低劣的代用品——玉米面面包、战时咖啡、干菜、战时果酱、糖精——都无济于事。从1917年起，辛勤经营起来的小园艺（即所谓"施雷贝尔花园"）[①] 往往捎带着养羊、养鸡，只能有限度地减轻大城市的负担。

美国以战争物资供应协约国，这是协约国，亦即美国的债户所不想放弃和不能放弃的。由于这种供应很有意义，德国于1917年1月8日宣布实行无限制的潜艇战。皇帝卡尔和外交大臣奥托卡尔·切尔宁看到这个措施所包括的风险，他们还觉察到，在柏林，人们对于美国的生产能力存在着危险的幻想——尽管如此，奥地利在军界的影响下到头来还是赞同德国海战的加强，这可能带来危险。果然，如所预料，美国于1917年4月6日向德国宣战。 487

1917年春天的第二个重大事件就是俄国的三月革命。沙皇尼古拉二世被推翻。他最后曾力主媾和。沙皇政权被一个忠于盟约的、主张共和制的左翼资产阶级政府所取代，这个政府继续进行战争，这就使它完全失去因流血牺牲惨重而奋起斗争的国民的同情，并终于导致共产党的十月革命。

1917年，奥地利倡议的和平步骤获得了意义，这个步骤的开端还应追溯到前一年。皇帝卡尔的妻子齐塔的两个兄弟，克萨维尔和西克斯图斯·冯·帕尔玛-波旁亲王，居间维持奥、法接触。卡尔皇帝在一封——大概由西克斯图斯亲王执笔的——信件中，表示准备支持法国收回阿尔萨斯-洛林的要求，后来和谈终于由于遭到意大利的反对而失败。1918年4月，谈判被发现，二元帝国极为不快，不完全知情的外交大臣切尔宁声称，与法国的接触由于拒绝法国对阿尔萨斯-洛林的要求而告吹，但，法国政府公布了来往

① "施雷贝尔花园"("Schrebergarten")：即德国医生施雷贝尔所提倡的近郊小型自种的植物园。——译者

信件的内容，而卡尔皇帝则不得不昧着良心矢口否认。1917年在奥地利和法国之间还有各种其他和平试探，法国想离间哈布斯堡君主国和德国的盟友。这些谈判，以及一次奥英接触因此而失败，在这次奥英接触中，充当联系人的有南非政治家史末资将军和前奥地利驻伦敦公使门斯多夫-普利伯爵。

1917年，奥地利前线的局势发展得并非不顺利。俄军已经大为削弱；7月初对奥地利人的反攻开头获得的胜利不算小，但俄国人却不得不撤退，尤其是在德国的压逼下；罗马尼亚人在东线的极南端打得比以前好。1917年11月7日（旧历为10月25日），在俄国，布尔塞维克战胜了克伦斯基政府。新主人立即提出和平建议。1917年12月以来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和平谈判进行得极为冗长，因为在中欧同盟国之间存在着意见分歧，而在另一方面，乌克兰代表团脱离了由莱奥·托洛茨基巧妙地领导着的俄国代表团独立行事。1918年2月9日，与乌克兰缔结了单独和约，人们期望粮食状况会因此得到改善。这个希望只实现了极微小的一部份。同苏维埃的谈判被他们中断了；后来德军继续推进，俄国政府才让了步，于1918年3月3日签订了符合德国军界愿望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它的条款是严峻的，堪与凡尔赛条约相比，虽然它没有触动大俄罗斯移民区。遭受主要损失的是芬兰、波罗的海各省、波兰和乌克兰。

波兰和乌克兰之间疆界的划法，激怒了波兰人，这次划分把布格河以西语言混杂的霍尔姆兰让给了乌克兰人。从1916年起，“波兰问题”成为中欧同盟国考虑缔结和约和部署战后秩序时最难办的一个问题，因为波兰人在自己国内，理所当然地倾向于组成一个由俄罗斯-波兰地区组成的民族国家。于是，人们想设法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把新成立的波兰同中欧同盟国联系在一起，但是，在一

个“奥波”解决法，还是“德波”解决法之间游移不定。1916 年 11 月 5 日，波兰国家宣布成立时，对此还没有作出最后决定。志愿兵预期要报到,但却没有实现；在战争开始之初,波兰军团的建立在加利曾获得很多人的响应。在对霍尔姆兰作出有利于乌克兰的决定,以及同时商定将加利曾划分为两部份以后,波兰就离开了中欧同盟国；波兰军团不得不解散。从此波兰人民就把一切希望寄托于协约国的诺言,在协约国那里也有些波兰部队。

1917 年晚秋，意大利战线出现了一个未曾料到的变化。1917 年 5 月至 8 月的第十次和第十一次伊松佐战役仅仅使意大利人得到微少的土地,奥地利的伊松佐前线的后备军已经完全用光;人们无法摆脱这样的忧愁,即意大利要是再来进攻,那就会带来灾难。于是自己先发制人,以减轻前线的压力。攻势于 1917 年 10 月 24 日开始,与戈尔利采进攻战相似,首先在伊松佐河上游的弗利奇和托尔明地区发动“侧角突击”，施放毒气和使用迫击炮。成功出乎意料之大,原定的最高目标——塔利亚门托线被超越,达到了皮亚韦河。当然,还没有做到在伊松佐河下游断绝意大利军的后路。总之,俘虏了大约三十万人,在皮亚韦河建立了一条大大缩短了的新前线;缴获的储备品使军队有一个时间不必仰赖于粮食的补给。 489

因此,1917 年底，中欧同盟国的军事局势，总的来说，是相当严重的,但并不是前途无望。当然,要把在西伯利亚的无数战俘调来补充中欧同盟国的军队，没有能办到，因为白俄罗斯军队的顽抗和在这期间茁壮成长的捷克军团在西伯利亚阻止了这样做。1918 年 1 月，产业工人的广泛罢工可以视为国内危机的信号。2 月初,在卡塔罗的几艘战舰上发生了哗变,一些激进社会主义份子和另一些斯拉夫的亲协约国分子在这次哗变中崭露头角。

那时德国的陆军领导人还相信，在彼岸的美国人能够大批投

入以前，有可能在西线取得有利的战绩。西线的三月攻势，即所谓“米夏埃尔”行动，初战很成功，但后来却陷于血泊和泥泞之中。还不如以进攻相要挟，来进行和平试探。在7月马恩河的战斗中，美国人已经以强大的兵力出现；德国人却丝毫没有取胜。奥地利韦尔施蒂罗尔和在皮亚韦河畔都遭受重创。法国前线形势继续恶化，有几个奥地利师被派往西线。

在后方，情况越来越悲惨，饥饿使平民的抵抗力比军事组织的抵抗力更早地软化。1918年4月30日，粮食委员会主任奥托卡尔·兰德韦尔将军没收了德国的谷物拖船，以供应维也纳，那里的粮食储备即将罄尽，这时局势达到极其尖锐的地步。1918年5月，卡尔和威廉两皇帝在施帕的德国大本营会谈，缔结了一项密切经济和政治合作的协定。弗里德里希·瑙曼周围那群人所宣传的由德国领导“中欧”的思想在协定中写了下来；无疑，施帕条约大大增强了协约国阵营内极端仇视奥地利的集团的地位，尤其是捷克移民集团的地位。人们开始比以前更多地听到“Détruisez l'Autriche-Hongrie!”①。1918年年底，巴黎的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被法国承认为一个结盟国家的政府，后来其他盟国也追随了这个步骤。

490 在奥地利，政府逐渐威信扫地，斯拉夫族议员在议会里随便讽笑国家，也不受惩罚。1918年8月20日，赛德勒辞职，接任的是一个以基督教社会党政治家马克斯·胡沙雷克-海因莱因男爵为首的内阁。大约同时，军事战线上的危机现象变得尖锐起来；在8月8日，那个“阴沉的日子”里，英国人突入德国的西线；9月，法国的萨罗尼加军的挺进后果更为严重。保加利亚战线崩溃，1918年9月26日，保加利亚要求停战；奥地利和德国的援军再也无法重

① 法文：“摧毁奥地利-匈牙利!”——译者

建这条战线；10 月 18 日，土耳其也请求停战。

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内部结构开始瓦解。敌人所预期的“被压迫民族”的起义固然没有发生，但是，战争损失、饥馑和敌人宣传的后果逐渐地显著起来。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计划具有极大的宣传作用；其中的第十点仅仅规定了“奥地利-匈牙利各族人民发展自治”，但是，事态在继续发展。1918 年 10 月 4 日，德意志资产阶级政党支持了维克托·阿德勒提出的决议案，这个决议强调哈布斯堡君主国的所有民族均享有自决权——当然也为德意志奥地利人提出了这种权利要求。在近乎最后的时刻里，1918 年 10 月 17 日，卡尔皇帝发表了一个宣言，宣布内莱塔尼亚将划分为若干民族国家，但，由于匈牙利首相韦克尔勒猛烈反对，匈牙利才不得不被排除于这个国家改革方案之外，这个方案无论如何是制订得太迟了。在这期间，波兰人已经宣布把他们的各个地区合并为一个民族国家，匈牙利固执地拒绝给南斯拉夫人以任何让步，于是南斯拉夫人就接近塞尔维亚；诚然，正式的合并要到 1919 年 12 月 1 日才实现。10 月 28 日，布拉格发生了革命，捷克民族委员会掌了权，10 月 30 日，宣布组成全国代表大会，斯洛伐克人亦将参加。当卡尔皇帝委托已参加社会民主党的米夏埃尔·卡罗利组织政府时，匈牙利却决定脱离奥地利。旧匈牙利的代表斯特凡·蒂萨死于暗杀。

奥地利皇家军队仍然在意大利前线作战。1918 年 10 月 24 日，意大利攻势开始，人们在格拉帕地区阿索隆山和佩尔蒂卡山争夺战中还赢得最后一个防御战胜利，后来匈牙利军队被他们的政府召回，当英军联合意大利军队强渡皮亚韦河时，许多非德意志军团都拒不服从指挥，战线开始瓦解。11 月 3 日下午，在接受协约国的苛刻条件下，缔结了停战协定。停战条件特别包含了撤 491

出南蒂罗尔，一直撤到布伦内罗、连同塔尔维斯在内的运河河谷、卡斯特地区、伊斯特拉和北达尔马提亚，此外还规定，协约国军队在整个国家范围内可以根据战略和政治的需要自由移动，德国军队撤出，奥匈军队复员。

在奥地利方面，人们再也不能向军队宣布，停战要等到次日15时才生效，敌对行为立即就停止了，于是有三十万人以上，尤其是在蒂罗尔前线，由于不了解形势，不战而为意大利所俘。这个事件在意大利过去和现在都被欢呼为决定战局的维多利奥-威尼托大捷。奥军和陆军分遣队的残余多半都利用铁路运输返回祖国。

在这里，在10月末尾的日子里，事态发展也没有停顿下来。1918年10月21日，君主国德语地区的居民的代表，亦即1911年最后一次选出的帝国议会议员，齐集在下奥地利邦议会的会议厅里，援引自决权，自行成立"独立的德意志奥地利国家临时国民议会"。胡萨雷克政府辞职，10月22日取代它的是被设想为代表整个内莱塔利亚的内阁，它以基督教社会党人海因里希·拉马施为首，对于此人作为国际公认的国际法教师所享有的威望，人们还抱有一些希望。尤利乌斯·安德拉西伯爵被委任为最后一任皇家外交大臣，他在卡尔皇帝同意下，解除了同德国缔结的盟约，这个步骤几乎没有实际意义。10月27日，他在致威尔逊总统的照会中表示赞成按照协约国的条件缔结单独和约。各党派的德意志奥地利议员对于这种做法提出了最尖锐的非难。

11月初，就国体作出了决定。卡尔皇帝没有放弃皇位，他不象威廉皇帝那样逃往荷兰，而是暂时留在国内。11月11日，他还是发表了一项声明，表示不再参加政务，承认关于国体的任何决定。次日，1918年11月12日，临时国民议会一致宣布德意志奥地利共和国成立。多瑙河上的哈布斯堡帝国的历史从此完结……

十、从第一共和到第二共和

492

(1918年至1955年)

共和国之初　和约、边界问题和合并问题

年轻的德意志奥地利共和国从一开始就受那些咄咄逼人的政治和经济困难的影响,1919年时,这些困难与其说减少了,不如说是更严重了。1918年11月12日以后,政府的权力由一个国务委员会来行使,该委员会由国民议会议员组成,事务的实际处理则委托国务秘书。各邦发表表示赞成的声明。1919年2月16日举行了选举,根据选举的结果,社会民主党人取得七十二席,基督教社会党人六十九席,德意志民族党人二十六席,以及小党派的三个成员也获得了议席。在其居民表示拥护德意志奥地利的敌占区,特别是在克恩滕、施蒂里亚的部分地区和南蒂罗尔,后来在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的德语地区,都没有能进行选举。1919年3月4日,维也纳国民议会成立,苏台德区德意志人为争取自决权举行了游行,捷克的军人在卡登等地向人群开枪,伤亡多人;1919年1月27日,斯洛伐克人在南施蒂里亚的马尔堡已经做出了榜样("马尔堡的血腥星期日")。国民议会由于有被任命的阿尔卑斯占领区代表而补充齐全,人们认为对于苏台德地区这个措施并不适用。

3月15日,议会选出了一个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社会党的联合政府,以卡尔·伦纳为国务总理,奥托·鲍威尔为外交国务秘书,尤利乌斯·多伊奇为陆军国务秘书。福拉尔贝格的基督教社会党

人约多克·芬克为副总理。政府几乎说不上当家作主，因为此外还有工兵苏维埃在活动。新成立的共和国陆军——民防军（Volkswehr）暂时纪律还很差；并入民防军的“赤卫队”听命于那新建立的、人数肯定微不足道但很活跃的共产党。1919年3月在匈牙利，同年4月在巴伐利亚建立了苏维埃专政，这样的转变在奥地利似乎也是可能的。1918年11月12日，赤卫队在议会前开枪一493 事已经发生，1919年4月17日和6月15日对人民代表机构和警察局采取了类似政变的行动，死了一些人；在2月里，在格拉茨发生了过火行为。所有这些突击行动都归于失败，奥地利始终没有成为苏维埃共和国，共产党统治在匈牙利和巴伐利亚相继垮台以后，奥地利在这方面就有了保证。此外，事态的发展相当凄惨，特别在涉及国界方面。

1919年5月，德意志奥地利和谈代表团前往圣日尔曼昂莱（在巴黎附近），在那里，他们有点象是被拘留。他们被召来不是进行谈判，而是只能够呈递书面的建议，至于建议是否被研究，完全没有把握。代表团团长、国务总理伦纳对和平会议抱有悲观的看法，结果完全被证实。人们把希望寄托在德意志奥地利代表团某些成员的国际威望上；弗兰茨·克莱因和海因里希·拉马施终究是国际公认的法学家，鲁道夫·施拉廷-帕沙自从在苏丹工作以来，颇为英国人士所器重。

在苏台德德意志问题上完全失败。捷克人占据苏台德的德意志地区，只是局部地发生过微弱的抵抗，萨克森和普鲁士政府拒绝对德意志波希米亚和北摩拉维亚—西里西亚地区给予某种可能的军事援助。主要由于上奥地利缺乏兴趣，南波希米亚丧失了；在南摩拉维亚，人们坚持得长久些，但这里主管当局缺乏主动性，而维也纳给予的支持又太少。捷克人要求维持——程度非常不同的旧

——"历史边界",这些要求很成问题,因为人们也要求处于匈牙利历史边界以内的斯洛伐克地区。此外,在西部,人们也进行边界更动——当然仅仅对德国和奥地利不利。人们拒绝给三百多万苏台德德意志人以自决权,同时却又把普鲁士西里西亚的胡尔钦小邦(Hultschiner Ländchen)的居民——完全违反他们的意愿——由于他们的斯洛伐克语言,而并入捷克斯洛伐克,还把下奥地利的边陲地区夺走,部分地考虑到交通联系,如格明德周围(该城终于留在奥地利)和费尔茨贝格的情形,部分地由于罗滕沙亨和特梅瑙的捷克和斯洛伐克居民成份而考虑了"民族的动机"。在马尔赫-塔雅三角地带也修改了边界。反之,几十万操德语的南摩拉维亚人和南波希米亚人,却不顾他们的民族,被划归捷克斯洛伐克。因此,边界的划法乃是胜利者的武断的产物;只有捷克的过分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如一条用以分开奥地利和匈牙利而穿过布尔根兰的走廊——关于它以后还要谈——以及要求割让魏因菲特尔的一部分。和会对捷克的要求大部分都同意了,但是他们在三个备忘录中所陈述的理由是非常不充分的,这些备忘录的全文后来发表了;这些备忘录包含着许多不正确的地方和小心翼翼的歪曲。这些阴谋同捷克斯洛伐克国徽上的格言"真理必胜!"以及西欧关于马萨利克和贝奈斯的传说全不相符,但是,它却获得了最广泛的成功,则是无可否认的。起决定作用的是,捷克斯洛伐克的要求一般地并不妨碍其他战胜国的利益;对于奥地利的论据,人们几乎未加理睬。 494

奥地利代表团在调整对意大利的边界划法上也完全失败:南蒂罗尔丢掉了。重要的蒂罗尔政治家活动得并不很顺利;人们希望强调邦的独立性来保全受到威胁的南部,在协约国方面,人们是这样解释南方的:蒂罗尔人同样既反对奥地利,又反对意大利。协

约国曾在伦敦条约(1915 年)中把南蒂罗尔许给亚平宁王国[1]，在这期间，意大利却又不得不在划定与南斯拉夫的界线时，同意那个与伦敦协议相去甚远的划法，意大利的殖民地愿望并未实现。南蒂罗尔的情形则不同。在奥地利，人们对威尔逊总统曾寄予很大的希望，他却很快就把整个德意志南蒂罗尔让给意大利人，虽然他的十四点中的第九点规定“意大利边界的新划定应沿着可以清楚辨认的民族界限”。美国的和会代表团已经偏离这个原则，它的方针至少曾同意，南北蒂罗尔之间经过普斯特尔河谷和布伦纳的直接联系仍然保持在奥地利的国家领土上。促使美国总统牺牲他自己庄严地宣布过的提纲的，不是如后来威尔逊为了开脱所说的那样，缺乏专业知识，相反地，却是这样的想法，即，以南蒂罗尔来弥补意大利的一再失望，以及照顾美籍意大利人的情绪。英国的外交官和政论家对于意大利的合并愿望很不感兴趣，无奈英国——不同于美国——曾在伦敦条约上签过字，于是，他们就同意抛弃南蒂罗尔，虽然也说了几句无关痛痒的话表示遗憾。法国人也知道，意大利人的要求没有道理，但是，由于法国和意大利素有矛盾，495 这些矛盾曾导致三国同盟条约的缔结，现在又由于意大利与法国的南斯拉夫盟友之间在亚得里亚海东岸的摩擦，矛盾就更加扩大，因此，通过满足意大利对南蒂罗尔的愿望，从而在意大利一方和奥地利、德国另一方之间制造一个新的争吵之的，似乎是适宜的。

意大利以分水岭为“天然界线”的主要论据，就本身而言，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分水岭的原则在其他欧洲边界上几乎没有被考虑，而且人们还在分水岭的另一侧将东蒂罗尔的塞克斯滕、因尼申和菲尔沙赫等区镇给予意大利。恰恰是在南蒂罗尔，由于语言边界与

[1] 亚平宁王国 (Apenninenkönigreich)，即意大利王国，因意大利半岛从北到南绵延着亚平宁山脉。——译者

从奥特勒经萨卢恩隘口至多洛米特的地理边界广泛地吻合，寻找到一种公正的、简便的政治边界划定法是有可能的；一万一千个拉定人[①]把自己看成蒂罗尔人和奥地利人，他们可以同二十二万德意志南蒂罗尔人一齐留在奥地利。从战略观点来看，这种边界划法对意大利决不是不利的；要求一条布伦纳边界线，不是产生于真正的军事动机，而是民族主义动机——在意大利首要的和狂热地鼓吹合并领土的政治家埃托尔·托洛梅的言论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意大利所得到的东西不多，不过是一条边陲地带，它那些源远流长的居民由于互相厌恶始终是分离的，奥地利却失去了它最美丽的一个邦，蒂罗尔被弄得支离破碎；即使东蒂罗尔和北蒂罗尔留在奥地利，但再也不能联系在一起。

克恩滕的运河河谷也归意大利所有；这时，在划定塔尔维斯和戈高时，置奥地利的利益于不顾，又超越了分水岭的原则。

奥地利在维护它对南斯拉夫的要求上是成功的——当然仅仅在克恩滕的边界段落上。战后，斯洛文尼亚的部队占领了克恩滕的一些南部边境地区。由于侵犯的范围越来越扩大，1918 年 12 月 5 日，尽管维也纳政府劝阻，在克拉根福，人们还是进行了抵抗。在组织防御方面，做得特别出色的是邦司令官路德维奇·许尔格特上尉，以及部队指挥官和宣传员汉斯·施泰纳赫中尉。1919 年停战谈判获得成功；一个由谢尔曼·迈尔斯率领的美国考察团访问了有争议的地区，提出了一个有利于奥地利的情况报告。1919 年 4 月 29 日，南斯拉夫人破坏了停战，实行侵犯；最初，他们被击退得很远，塞尔维亚正规军干预后才扭转这个局面。克拉根福被南

① 拉定人(Ladiner)，指古里提亚省(Rätièn)罗马化了的民族群，分布在格劳宾登(瑞士)、南蒂罗尔和弗里奥尔一带。参阅本书第 56 页。——译者

斯拉夫人占据，但是，协约国出面干涉以后才不得不重又撤出。在和约中规定有两个地区要举行投票。在南边的A区，投票应于1920年10月10日举行，到临近投票的日期，南斯拉夫军队才撤出，有百分之五十九的投票者表示加入奥地利，虽然在1910年的人口普查中载明，这个地区的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以斯洛文尼亚语为交际语。语言和政治上的表态在这里恰恰是不一致的。由于A区进行的投票搞得无懈可击，其结果有利于奥地利，在北边较小的B区(克拉根福及其周围)就没有举行投票，因为其结果从一开始就是毫无疑义的。尽管人民投票的结果很成功，克恩滕还是不得不忍受三个较小地区的损失。运河河谷，如前所述，划归意大利，米斯谷地连同下德劳堡未经投票就划归南斯拉夫，至于克拉万肯以南的上泽兰地区，则早已放弃。

不利于奥地利的是和会关于施蒂里亚边界段落的决定。在这里，斯洛文尼亚人在一个倾向南斯拉夫的军官迈斯特将军领导下，造成一个既成事实，马尔堡城、南施蒂里亚的德意志郊区被武力占领，在有些地方，他们还侵入一些纯德语地区，如穆尔河以南的阿布施塔尔盆地。有一个时期，存在着在马尔堡举行人民投票的前景，因为意大利主张这样做，它喜欢通过投票来解决边界问题，自己的边境当然不在此例；后来法国的不赞成观点获得通过。在有争议的地区中，仅拉德克尔斯堡城留给奥地利。只是在这个城市的周围，在施蒂里亚土地上，对南斯拉夫人的军事行动进行过抵抗，这一情况对于和会的决定并非无足轻重。在别的地方，来自东部边境由于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而变得严重起来的危险，使施蒂里亚对南斯拉夫的抵抗意志衰退了。

布尔根兰问题的解决以妥协告终。在匈牙利西部的四个州，即普莱斯堡、维泽尔堡、厄登堡和艾森堡（“布尔根兰”即由此得

名)①，讲德语的居民占很大一部分。普莱斯堡州为了使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完整而被判给了后者，后者就在多瑙河以南有了一个桥头堡，这就是通往亚得里亚海的斯拉夫走廊计划中被公认的残余。在布尔根兰的德意志荒地农民(Heidebauern)和"小农"("Heinzen")当中，在君主国崩溃后，曾发生争取与奥地利合并的运动；1918年12月17日在马特斯堡成立了一个"海因岑兰共和国"(Republik Heinzenland)，可是匈牙利军事当局把这个运动镇压下去了。奥地利的和谈代表团据理力争有几个孤立的小块克罗地亚 497 语地区穿插其间的德语区，在圣日尔曼和特里亚农的和约中，终于采纳了关于将德意志西匈牙利部份合并于奥地利的决定。在北部，新的边界划法把很大一部份荒原仍留给匈牙利；普莱斯堡-阿格拉姆铁路应经过匈牙利地区。可是，将布尔根兰让给奥地利一事要推迟到匈牙利和约被批准以后才实施，而和约迟迟未获批准。苏维埃共和国崩溃以后，匈牙利曾试图改变同奥地利边界有关的条约条款。要想协约国交出那怕是许给罗马尼亚的一百五十万马扎尔人的一部分，许给捷克斯洛伐克的八十万人的一部分，许给南斯拉夫五十万人的一部分，似乎是没有希望的——但是，对付奥地利，人们就觉得自己更强一些，虽然在布尔根兰马扎尔人只占居民的很小的一部分。维也纳有些资产阶级政治家和政论家非常同情匈牙利的合法政府，他们的态度具有一定的意义，他们似乎准备必要时放弃奥地利对布尔根兰的要求。后来到了1921年8月底，奥地利的宪兵开进布尔根兰(协约国禁止联邦陆军参加)，匈牙利的义勇军，还有在著名的反革命者海姚斯、普罗内和奥斯滕堡领导下的正规部队进行了激烈的抵抗。在意大利影响下，和约条款作了

① 这四个州的语尾均为 burg(堡)，所以说，Burgenland(布尔根兰，直译的含义为"城堡之邦")即由此得名。——译者

修改;在厄登堡及其周围地区应举行人民投票,然而投票的实施却操纵在当地匈牙利当局手里,而由亲马扎尔的意大利将军卡洛·安东尼奥·费拉里奥监督。奥地利由于情况所迫,把自己的代表从投票委员会中撤出。投票的日期于1921年12月12日确定为1921年12月14日,投票带来了匈牙利所预期的胜利(百分之六十四),乡区[1]大多数还是投奥地利的票,但是,在厄登堡城投匈牙利票的占压倒多数,结果对奥地利不利。投票前或投票期间的事件令人很不愉快,因此,人们也用不着否认,在布尔根兰的老一辈人当中,存在着对匈牙利的同情。正如后来事态的发展所表明的,这些感情并不很深;人们不能认真地试图在布尔根兰成立一个对匈牙利友好的(即"magyaronischc")政党。居民的政治觉悟增长得很快,他们经常选举在全国家范围内进行竞选活动的奥地利政党的代表。此外,布尔根兰地区不合并于下奥地利和施蒂里亚,而是自成联邦中的一个盟邦,证明是一个正确的政治决定,该地区于1921年12月被最后占领,在布尔根兰的各地市长投票中,艾森施塔特被选定为首府。

498

在复杂的奥地利领土问题中,福拉尔贝格问题自成一章。福拉尔贝格最初实现了从因斯布鲁克总督辖区中分离出来,在君主国内,这个辖区的权限不仅扩大到蒂罗尔,还扩大到阿尔贝格以西地区。1918年11月3日,福拉尔贝格邦议会宣布暂时加入德意志奥地利,可是从该邦的一些地区出现了合并于瑞士的倡议,搞得相当活跃,尤其是在1919年春,奥地利的经济和政治情况极不稳定,巴伐利亚和匈牙利的苏维埃共和国对它的包围已经显得咄咄逼人。1919年5月,在一次非正式的民意测验中,百分之八十选票赞成合并于瑞士。虽然参加这次投票的并不很多,但,人们不可怀

① 乡区(Landgemeinde):人口小于二千的区。——译者

疑，在这个时刻，多数福拉尔贝格人的情绪对合并于瑞士有利，人们感到自己与瑞士的阿拉曼族居民有亲姻关系，瑞士的经济和它明显的分权制宪法特别吸引人。然而，在圣日尔曼，福拉尔贝格问题没有被讨论，在瑞士，兴趣是有限的，人们屡次害怕瑞士联邦的民族结构发生紊乱，更怕那个十分平衡的宗教结构发生紊乱。在协约国方面，尤其是在法国，流行着这样的忧虑：福拉尔贝格如合并到瑞士必然会引起奥地利的其他阿尔卑斯邦合并到德国这样的后果。随着奥地利的情势趋于巩固，在维也纳成立了几届资产阶级政府，福拉尔贝格的分裂运动不久就消失；这个运动的保护者之一，邦行政长官奥托·恩德尔，于 1930 年甚至成为奥地利的联邦总理。那个独立的小公国列支敦士登，在 1852 至 1919 年期间，由于关税同盟而与奥地利相联系，在君主国瓦解以后，则倾向西方，于 1923 年与瑞士订立关税同盟。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舆论界讨论"合并问题"，即奥地利与德国联合的努力，比讨论边界问题更为起劲。与宣布共和国成立同时，1918 年 11 月 12 日，德意志奥地利国民议会一致宣布同意合并于德国。协约国开头对这个问题没有采取共同的立场；法国坚决反对，美国、英国和意大利则动摇不定，最后，1919 年 4 月，法国的观点得势。在和会上，合并问题没有被认真地提出来讨论，奥地利代表团也没有着重地强调；人们希望在其他方面得到让步。在最初交给奥地利代表团的条件中没有明文规定禁止合并；最后定下来的和约第 88 条采用了一种令人惊奇的冗长写法："奥地利的独立是不可改变的，除非国际联盟理事会（它的决议需要一致通过）同意改变"；显然，人们考虑到协约国宣布的自决权，所以就没有采取明确的禁止形式。

几乎用不着指出，和约虽然妨碍合并的实现，但是不能消灭合

499

并的思想，反而更助长了它。1921 年就合并问题举行了两次说明性的投票(附有这样的限制，就是仅仅为了探知民意而举行)，结果表明，在蒂罗尔和萨尔茨堡，赞成合并的占压倒多数。在协约国的压力下，又由于国家、尤其边境地区的克恩滕，以及事实上仍未合并于奥地利的布尔根兰面临着严重的危险，人们才没有考虑进一步举行各邦的公民投票。从此，合并运动主要地仅限于文化政策上的讨论。

今天，合并问题已经没有现实意义，奥地利的居民都赞成他们的国家独立；实行合并所引起的各种困难，如联邦奥地利纳入德意志联邦的困难，人们就几乎没有考虑到，而这却是需要以放弃奥地利国家的统一，或者以放弃奥地利各邦的权利为先决条件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合并运动之所以搞得很热闹，其原因可以这样来说明：对战胜国那种蛮横武断的政策的厌恶感必然使人们对那个同样受到严峻对待的德国更多地产生休戚与共之感，因为人们在整个战争期间与德国并肩战斗过。此外，协约国不仅有意识地促进波兰人组成国家，而且还有意识地促进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和喀尔巴阡乌克兰人、然后是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以及彼此并非互相全心倾慕的一些民族和民族群组成国家，因为这样的联合对于协约国的目标似乎是有利的，而别人之所以反对奥地利与德国合并，显然首先是因为这个合并与他们的目标相冲突。人们为捷克斯洛伐克的生存而担忧；对奥地利的同情没有起多大的作用，在拟定圣日尔曼和约的要点时，很难感觉到有这种同情心。

500 为了支持二十年代的合并运动而常常被引以为理由的是（卡尔·伦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还是这样认为），合并的实现可以被视为政治上的成功，因而有助于巩固奥地利和德国的民主制度。

这些论据多少有些道理，虽然还不能证明合并实际上会妨碍国家社会主义在德国取胜，从而也就不致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并带来它的种种可怕的后果。但是，人们无论如何不能把君主国崩溃后的那个真诚而民主的合并运动和后来国家社会主义的合并宣传和扩张政策混为一谈，否则就无法看清这个现象和那个现象。

圣日尔曼和约的条款，于 1919 年 9 月 10 日，被德意志奥地利国民议会所不得不接受。条款还规定国防军被限定为一支不大而又耗钱的雇佣军，其兵力为三十万人，这个兵力实际上从未达到，这样，武装被限制了。此外还有清算存在敌对国家中的财产，要求交出商船队和放弃海底电缆和电报电缆（这些要求实际上是无的放矢）、以及协约国对奥地利全部国家收入享有苛刻的抵押权等条款；最后，人们还责成在挨饿的奥地利交出活牲畜。这些条款的执行，以及其他战争赔偿，后来当然不得不作罢论。供应上的困难局面，甚至一度是绝望的局面曾多次成为捷克和意大利方面，在布尔根兰危机期间也成为匈牙利方面企图施加政治压力之的。一再以断绝粮食进口相威胁，或者，供应的增加要与俯首贴耳的政治态度相联系。与这种动机全然不同的是，北美人和中立国家，如瑞士、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无私的自发救济活动，这些活动使维也纳这个大城市的人口得救，而不致于饿死。

根据和约规定，国名也改了，从此不叫“德意志奥地利共和国”，而是叫“奥地利共和国”。在协约国方面，人们不仅在国名上尽量避免与德国发生亲戚关系，而且还首先强调了小小的奥地利共和国对于君主国西半部的连续性，以便能够使这个共和国和它的居民对世界大战负责，并由此相应地引出和约中的推论。不连续性的论点本身是正确的，至少从国际法看来是如此；不久人们就 501 普遍地持有这样的看法，在奥地利以后也是这样：君主国已经分析

为几个新国家，奥地利共和国就属于其中之一。

与和约相联系，随后几年就奥地利的现存档案进行了谈判；新的疆界使相应的调整已成为必要。这次调整按照档案制度中通常比较重要的“来源原则”，而不按照“涉及原则”来进行，这对奥地利是有利的，这样一来就可以防止档案的散乱。关于奥地利的艺术财富，尤其是丰富的维也纳蒐集品，曾展开过激烈的争论，在这个事例上，由于有影响的法英美法律工作者委员会主持公道，因而人们能够妥善地维护了自己的权利。意大利早在和约缔结以前就在维也纳独断专横地没收过维也纳的蒐集品，即使同这个国家也达成了条约上的一致。

在对圣日尔曼和约（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其他条约）作出总结性判断时，人们必需避免采取过于简单的片面性立场。无论是战后初年德国、匈牙利和奥地利那种一味拒绝的病态心理所引起的政论性产物，还是近几年的痉挛性的“挽救尝试”都不能经得住客观的历史评审。当协约国的政治家正处于民族主义的、完全陶醉于胜利之中的各国公共舆论的压力下的时候，在战后不久那种艰难条件下，要出现什么杰作是不可能的；在好几个事例中，战胜国的负责任的政治家竟然容许自己缺乏冷静的判断，有时甚至缺乏善意。他们的科学专家或者假科学专家的作用往往令人不快，他们多半被他们那出于对所宠爱的民族的同情心所支配，而不是被那务求客观的意志所支配。因此，在领土问题上曾作出一系列错误的决定，对德国赔偿的处置搞得不妥可以想见，而战争责任问题则最好交给历史家们去研究，这种研究后来获致了不同的结果。条约的其他成份，如保护少数民族（可惜仅以新成立的国家为限）、裁军和建立国际联盟的思想，尽管在实施中有缺点，但仍应给予积极的评价。最可虑的一个方面大体上产生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只

有在落后国家，尤其是德国的民主代表，以政治上可行的方法来争取宽大时，和平事业才能维持，而采取军事独裁的粗暴方法，和平事业就很快衰亡。就多瑙河地区而言，1918年诞生的假民族国家，在危急的时刻所显出的抵抗力就远不如那个古老的多瑙河君主国，尽管君主国存在着种种无可争辩的缺点。 502

从和约到1927年危机

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社会党的联合政府，在这两个执政党内部并不是很得人心的。这个政府产生于共同克服战后初期多方面的困难的迫切必要性，它由于不能控制住局势而垮台。1919年10月17日，伦纳-芬克政府的改组获得通过，人事上只作了微小的变动；公布了一个"总纲领"。

1920年6月10日，国务秘书尤利乌斯·多伊奇颁发的一项法令，经过议会中大德意志党人的质询以后，导致政府危机；联合政府被社会民主党人和基督教社会党人的"比例内阁"所取代，在那里没有相互合作，只有同时并存。人们取消了国务总理，蒂罗尔基督教社会党人米夏埃尔·迈尔作为宪法和行政改革国务秘书主持内阁。这个比例内阁终于制订了1920年9月宪法，它是由大学教授汉斯·克尔森和几个精通国家法的政治家起草和修改的。这部宪法是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思想之间的一个妥协，它规定实行两院制；民族院被作为代表各邦的联邦院所补充，该院对于民族院的决议只拥有延期性否决权。联邦总统是国家元首，权限不大，他由联邦议会（民族院和联邦院）选举产生。

宪法还规定把维也纳和下奥地利分开。"红色维也纳"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成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的中央阵地；联邦首都应成为社会主义的模范城市。维也纳的地方政治家雅各布·罗伊

曼、卡尔·赛茨、胡戈·布赖特纳和尤利乌斯·坦德勒在奥地利党中占据首要地位。

1920年10月17日，举行了新选举，以基督教社会党人获胜告终，该党获得七十九个议席，大德意志党十二个，德意志农民党代表六个、社会民主党六十二个、资产阶级民主党一个。新内阁由503基督教社会党人和官员中的中立派专家组成，领导者仍然是米夏埃尔·迈尔。在第二届迈尔政府执政期间，被公认的无党派国民经济学家米夏埃尔·海尼施当选为联邦总统。情况不久表明，国家和政府无法对付恶劣的经济状况。通货膨胀现象有增无已，争取外国贷款的努力失败。1921年6月21日，维也纳警察局长约翰·朔贝尔博士接替迈尔，担任联邦总理以后，令人忧心忡忡的奥地利货币继续贬值，而且变本加厉。维也纳的广大居民阶层对于靠通货膨胀发财的奸商的所作所为，尤其是对想在奥地利过廉价生活和得到享受的外国寄生虫的无耻而又残忍的表现极为愤怒；1921年12月1日，在联邦首都发生了重大的越轨行为和抢劫。后来，一个大概无法避免的外交步骤对于朔贝尔政府的存亡具有灾难性影响。1920年2月，与匈牙利的共同矛盾使奥地利在某种程度上接近捷克斯洛伐克；1921年夏，奥地利和捷克的政治家进行了个人的接触，1921年12月16日，朔贝尔缔约了拉纳条约，条约的内容是，承认边界线，也就是重申放弃苏台德德意志地区，这样的放弃自然是不得人心的，不过，另一方面，这个条约却又带来了一笔比较大的捷克斯洛伐克贷款。大德意志党人退出了政府，不久就与社会民主党人一道，把朔贝尔政府推翻；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对于同法国及其中欧仆从国的经济联系过于密切所引起的猜疑。

1922年5月31日，以维也纳基督教社会党的教士议员伊格纳茨·赛佩尔博士为首的新政府成立。这样，在政治舞台的最前

面就出现了一个人，他在自己党内被视为在思想上最为重要的人物，迄今以前更多地在幕后活动。在共和国成立初年，上奥地利的主教约翰·豪泽尔和福拉尔贝格的大地主约多克·芬克决定了基督教社会党的方针，其主旨是对左派采取谅解的政策，而赛佩尔则由于世界观的和个人的动机，从一开始就倾向于同社会民主党人比较疏远，在以后的几年中，这种倾向甚至有所加强。具有意义的是，赛佩尔是基督教社会党的"维也纳派"的代表，该党在奥地利首都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多数派地位，并相信只能采取尽可能坚决有力的国策才能坚持下去。类似的发展路线在社会民主党内也变得明显可见，在那里，左派的理论家挤掉了以卡尔·伦纳为首的右派。由于强调阶级斗争的纲领要点，社会民主党人得以击退共 504 产党人的竞争，甚至几乎把他们排挤掉——奥地利共产党在第一共和时期，无论在民族院，还是在维也纳市议会里连一个议席都没有取得——但是，这两大党之间的鸿沟也被左派所扩大。

1922 年，一个粗具轮廓的不祥的政治发展才刚刚开始。当时的主要问题是国家的财政状况令人绝望。有一点人们是一致同意的，就是这种状况必须消除，如果奥地利还要继续生存的话——至于走什么路，意见当然是分歧的。赛佩尔最初试图为国家争取到国内信贷，从而稳定币制。西方的外国却想直接控制奥地利的财政，所以，依赖法国和英国的金融机关万国银行(Länderbank)和英国银行(Anglobank)就没有支持自助计划，自助计划就必然告吹。起初币制没有得到稳定，奥地利克朗①的贬值越来越可怕。大国对奥地利的直接呼吁不予理睬，在秋天里，赛佩尔终于在国际联盟的帮助下，找到"整顿"奥地利国家财政的办法。1922 年 10 月 4 日，

① 克朗(Krone)，1892—1924 年间奥匈货币单位，相等于 100 分(Heller)。——译者

以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为一方，以奥地利为另一方，缔结了日内瓦议定书。这个议定书重申合并的禁令有效二十年，允予六亿五千万金克朗的借款。一个改革和整顿计划竟然稳定了奥地利的财政状况，国家财政由国际联盟的一个总特派员来掌握。

在接受日内瓦议定书以前，议会里曾经有过颇为激烈的争论；11月27日，人民代表机关批准了整顿法令。荷兰人阿尔弗雷德·齐默尔曼博士担任国际联盟的总特派员之职，他的任期一直延长到1926年6月30日。1923年，大多数协约国都放弃了和约中的总抵押权。整顿计划要求广泛裁员，财政部长维克托·金伯克博士非常令人满意地稳定了币制，但是，直至第一共和结束时，充分的劳动就业问题还没有解决，几年以后变得大为严重。尽管整顿行动实行得不彻底，它采取的形式有损奥地利主权，使奥地利蒙受"国际联盟殖民地"这个不大好听的名声，但是，人们不得不对 505 它给予肯定的评价，因为它挽救了国家的灭亡。奥地利舆论也无法完全脱离这种局面，在1923年的新选举中，民族院的议席分配如下：赛佩尔领导的基督教社会党获得八十二席，社会民主党六十八席，大德意志党十席，国家联盟党五席。赛佩尔估计他的党会取得绝对多数，但是却差一个席位。整顿计划对于广大职员的残酷，以及房租问题（"房租保护"）的讨论，都使基督教社会党人失去选票，使社会民主党得到增强。

人们原来希望，日内瓦的控制在两年后，即1924年年底会取消，可是情形却不是这样，当赛佩尔不得不就涉及到联邦所属各邦的财政问题向国际联盟作出保证的时候，他就遭到他那个党的各邦代表的反对。总理引退，改由萨尔茨堡的基督教社会党人鲁道夫·拉梅克博士负责同大德意志党人组织联合政府。还在1924年年终以前，联邦总统海尼施重新当选，那时他的第一届任期已满。

拉梅克体面地当了将近两年的联邦总理(从 1924 年 11 月 20 日至 1926 年 10 月 20 日)。外交部长海因里希·马塔雅就不是那么成功,他那些考虑不周的旅行、讲说和会晤记者都是为了防止不安宁的发生。财政部长雅各布·阿雷尔也暴露了缺点，舆论界把金融机关的不愉快事件归咎于他; 那个时候,历史悠久、信誉卓著的德国中央储蓄银行倒闭了,邮政储金局也损失很大。阿雷尔,这个施蒂里亚邦行政长官安东·林特伦博士的同乡和宠儿受到抛弃，他于是向古巴移居。有一件事比上述事件更令人愉快：总特派员齐默尔曼的活动于 1926 年 6 月 30 日结束; 当然,如果发生危机,国际联盟的监督重新实施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拉梅克政府在同联邦的职员发生薪金冲突以后辞职; 由伊格纳茨·赛佩尔组织新内阁;他想同另外两个资产阶级政党,即大德意志党和国家联盟党密切合作，以此来挤掉社会民主党。对于定于 1927 年 4 月 24 日举行的选举，他只做到同大德意志党人拟定出一个"统一名单"; 为安排共同名单上的候选人就需要进行冗长的、艰苦的谈判。社会民主党人的选举宣传活动又集中于房租保护,他们的鼓动颇为成功。基督教社会党人丧失了九个议席,他们的盟友大德意志党人却获得了两席,这样后者就有十二个议席,而他们单干就无法达到。国家联盟党人获得四个议席，他们派出九个代表进入议会。社会民主党人由于赢得三个议席，议员共达七十一人。赛佩尔由于迅速地组成包括国家联盟在内的政府，从而弥补了选举中的失败。 506

奥地利民主的衰亡

1927 年，奥地利的民主政治发生严重危机，它从此再没有恢复过来。国家的政治生活由于各党派的"自卫队"(Selbstschutz-

formationen）或者接近它们的队伍相互发生冲突，有时甚至造成死亡，而一再受到干扰。这些半军事队伍在人数上比联邦陆军强大得多，在民防军（Volkswehr）中，社会民主党人的成分一度占统治地位，几乎达成了称王称霸的地步，但由于陆军部长卡尔·伏古安的活动目的性明确，使他们越来越多丧失地盘。问题不是象接近部长的人士所断定的那样，在于陆军的"非政治化"，而是在于陆军的"政治改造"（Umpolitisierung），以及特别强调前奥匈皇家军队的老传统。在右派的自卫队中，最初起领导作用的是"前线战士团"（Frontkämpfervereinigung），他们逐渐被"保国军"（Heimwehr）所超过，它的开端应当追溯到克恩滕的自卫战和其他邦的地方武装。国社党的军队（"祖国保卫同盟"、"德意志卫队"）[①] 当时还很弱。在社会民主党方面，成立于1924年的"共和国保卫同盟"（Republikanische Schutzbund）接替了较老的工人自卫队。在沙滕多夫，布尔根兰平时政治上相当安静的一个地方，保卫同盟和前线战士发生了冲突，1927年1月23日，社会民主党方面死了两个人；一个残废者和一个小孩被击毙。陪审员宣布肇事者无罪（甚至在可能超越正当防卫的问题上也如此），1927年7月15日，在维也纳发生了纷乱的游行，怒气发泄为严重的行动；司法大厦被焚。这件事本身是一个明确的错误反应，因为做出那个激起事变的无罪判决的不是职业的司法工作者，而是人民陪审员，而恰恰是社会民主党人曾经一再为陪审法庭辩护，虽然它在政治案件中明显地一再犯错误。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尤其是市长卡尔·赛茨，曾试图使群众安静下来，但未果；于是用枪枝把警察武装起来，并且开了火。这个流血日死了九十人，其中就有政府中的五个成员。一天的总罢工和随后的交通业罢工，不仅没有如所期望地达到使

① 即，"Vaterländischer Schutzbund"和"Deutsche Wehr"。——译者

赛佩尔政府辞职，反而使它终于控制住局势。在联邦所属的各邦里，"保国军"参加了对付交通业罢工的措施，从此它就比以前更 507 多地在国内政治方面出头露面——虽然在人数上，它并不太多，领导人又不团结。充当联邦领导人的是蒂罗尔律师里夏德·施泰德勒博士，其次，起主要的作用的有恩斯特·吕迪格尔·施塔海姆贝格侯爵（上奥地利）、华尔特·普夫里默尔博士（施蒂里亚）和埃米尔·法伊少校（维也纳）。卫国军和与工业家阶层关系相当密切。由卫国军组织起来的"独立工会"不仅受到社会民主党人的抵制，而且还受到追随利奥波德·孔沙克的基督教工人的抵制。卫国军与外国有种种联系，特别是与法西斯意大利。自从1927年春天以来，赛佩尔就因为南蒂罗尔人受虐待而与这个意大利发生过外交纷争，这场纷争导致意大利驻维也纳公使一度被召回国。奥地利国内政治的当务之急应当是，在1927年7月15日那次信号以后，将那些保卫组织都解除武装，可是那个骚乱时期的倾向所显示的恰恰是与此相反的方向。

在7月15日以后，被骂成"谋杀工人的凶手"的维也纳警察局长朔贝尔、以及联邦总理赛佩尔，在比较长的时期内，受到社会民主党人四面围攻。赛佩尔拒绝实行大赦，人们对他的话断章取义、片面解释，给他扣上"残酷无情的大老爷"的帽子。不少人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而退出天主教。这种情况在赛佩尔内心里引起了严重的斗争，1929年春，联邦总理引退可能与此有关。在文化政策和人事政策上与大德意志党人发生摩擦，在高级官职的安排上，基督教社会党和大德意志党发生利害冲突，以及卫国军和国家同盟党之间的龃龉，都同样要加以考虑。1928年年底，早在新政府成立之前，基督教社会党人威廉·米克拉斯博士就被联邦议会选举为联邦总统，以接替那个完美地履行自己职务的海尼施。

继赛佩尔出任联邦总理的是他的同党恩斯特·施特雷鲁维茨，前奥匈陆军总参谋长。他同卫国军保持一定距离，在通过房租条例修正案和维也纳、各邦和联邦之间的赋税分担方面，在议会里取得了成功，但是在无懈可击的几个月施政(1929年5月4日至9月25日)以后却不得不下野。一般人都猜测，赛佩尔和朔贝尔曾合谋推翻他。朔贝尔组成了新政府，维持了一年（1929年9月26日至1930年9月25日)。他的内阁得到基督教社会党、大德意志党和国家同盟党的支持。在内阁中专家占压倒优势；卫国军原先期望在那个自从7月15日以来被称为“坚强的人”的联邦总理统治下，在人事和意识形态上取得一定的影响，但是都落空了。朔贝尔取得两项重要成就，经过反复争议的保护劳动自由和集会自由的法令被通过，宪法改革也完成了议会手续。这次对1920年宪法的改革扩大了联邦总统的权力，总统从此就由人民选举产生。此外还规定，将第二院即联邦院改为邦和等级议院。但是没有实行。

508

反民主的时代倾向越来越明显。国卫军对朔贝尔的政策感到失望，它的1930年5月18日的科尔诺伊堡誓言明目张胆地决定采取一个法西斯纲领。以不同说法传布开来的誓言包括断然拒绝议会制度和宣布要掌握政权。前联邦总理赛佩尔于1929年7月16日，在对蒂宾根大学发表的演说中，以文雅的方式谈到了实行议会制的多党国家的缺点。

朔贝尔虽然遭受过种种挫折，但是还是有一些显著的政绩可言。他的政府就职后不久，公众听到久著声誉的土地信托银行倒闭的消息感到震惊；由于联邦总理强行使它与奥地利信托银行和罗特希尔特家族的维也纳大银行合并，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但不久以后情况表明，更多的是表面上得到了解决而已)。十分重要

的是，朔贝尔在荷兰首都进行了艰苦的谈判，排除了捷克斯洛伐克方面的重大阻力，赢得了一切战争债务的免除、总抵押权的彻底取消，以及同意大利的接近；法西斯对南蒂罗尔的压力当时似乎有所减轻，在德国，国家社会主义不久就开始大发展，它公然宣布对南蒂罗尔不感兴趣，这种情况很快就导致局势的恶化。

陆军部长沃古安希望委任邦行政长官林特伦周围的人弗兰茨·施特拉费拉博士为奥地利联邦铁路公司总裁(当时的情况是，施特拉费拉在一项违反出版法的诉讼中，个人威望已大受损失)，遭到朔贝尔的拒绝，这个事件就其本身来说不大重要，却造成了政府的倒台。

沃古安政府接替朔贝尔内阁，赛佩尔领导外交事务。这个政府正处在好斗的"反马克思主义"的高潮中，由于大德意志党和国家联盟不肯参加，它在议会中只好依靠少数派。因此，人们在人民代表机构中避免提出异议，而定于1930年11月9日举行新选举。509 这次选举以政府的失败告终。基督教社会党只得到埃米尔·法伊领导下的卫国军少数派的支持，失去了七席，社会民主党获得一席，成为议会中最强大的党。一个独立的卫国军名单，即所谓"祖国集团"的名单，提出了八个议会后选人，但是所获成绩甚微。大德意志党和国家同盟，在朔贝尔领导下，组成一个"民族经济集团与国家同盟"，争得十九席。国家社会党人虽然所得票数有所增长，但达不到基本议席所需的票数，因此在分配议席时一无所获。考虑到未来的事态发展，应当指出，他们在奥地利选举以前，1930年9月14日在德国的选举中，已经取得第一个大胜利，获得了一百〇七个议席和百分之十八·五的选票。而在奥地利，他们在1930年11月9日，大约两个月以后，只得到百分之三的选票。

联邦总统米克拉斯委托福拉尔贝格邦行政长官奥托·恩德尔

博士组织新政府，基督教社会党人和朔贝尔集团都参加了这个政府。朔贝尔接掌外交部，国家同盟分子温克勒尔接掌内政部。值得注意的是，蒂罗尔人安德烈亚斯·塔勒不久辞职，农业部落到了恩格尔贝特·陶尔富斯手中；这个政治家就是这样开始当上了内阁阁员的。恩德尔政府在法律界并非很得人心，赛佩尔有意识地避开。但是，恩德尔最初还做到，在调整负担这个棘手问题上，取得了社会民主党人的谅解。维也纳市承担了某种财政牺牲。卫国军的内部分歧从这个方面瘫痪了反对派。

经过几个月以后，外交上的失利和奥地利最大的银行机构的灾难，注定了恩德尔政府的命运。奥地利深受经济危机之苦，危机虽然并不局限于奥地利共和国，但这里感受影响最深；人们想通过与德国订立关税同盟，来弥补经济危机的不良影响。也许在国外做些巧妙的准备工作，并吸引外国参加可以获得成功；计划的宣布令人惊讶，在英国和美国反响并非不利，但，却遇到法国和小协约国[①] 的顽强抵抗。这个纠纷被转到海牙国际法庭，法庭以多数票（8:7）裁决，关税同盟虽然不违反圣日尔曼和约，但却违反1922年的日内瓦议定书。1931年9月3日，在海牙法庭作决定性表决前两天，人们放弃了关税同盟计划。在这期间，维也纳的主要510 银行——奥地利信托银行于1931年6月倒闭。国家不得不进行干预，弥补外国债权人的要求花费了巨额款项。英国的贷款减轻了支持的行动，但是不足以消除危机。在三个部长引退以后，恩德尔政府不得不于1931年6月16日辞职。

建立一个以赛佩尔为首的联合政府的尝试未能成功；相互的不信任太大，赛佩尔的大联合不是为了使政治路线彻底改观，而是

---

① 小协约国（Kleine Entente），1921年，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三国在法国指使下建立的同盟。——译者

被当作对付异常窘迫的局势的应急措施。社会民主党人担心，在同意那些必然极其不受欢迎的整顿措施以后，重又被人排挤掉。最后，基督教社会党的农业专家卡尔·布雷施组织政府成功，他得到大德意志党和国家同盟的支持。布雷施确实遵循议会途径，通过了联邦整顿法令，但是由于经济危机持续紧张，总的局势始终是极不愉快的。

在这种气氛下，1931年9月13日，施蒂里亚的国卫军指挥官、尤登堡人瓦尔特·普夫里默尔妄图搞暴乱，他那时虽然是国卫军的联邦首领，但在大多数邦里威信却很低。行政机关和联邦陆军几经踌躇才进行干预，另外，国卫军和防护同盟却又发生局部的武斗，造成了伤亡。普夫里默尔的暴乱在头一天就失败；除了在施蒂里亚以外，没有发生过重大的骚乱。对为首闹事者进行了叛国罪起诉，但陪审官一般地未加说明就宣告无罪释放告终。这时在国卫军内，保守的合法派对于民族派占据了优势。

1932年年初，政府实行改组；朔贝尔和大德意志党人退出内阁，蒂罗尔基督教社会党人库尔特·舒施尼格成了新政府的司法部长，他曾组织过一个新的防卫武装，叫"奥地利风暴队"(Ostmärkische Sturmscharen)。此外，1932年是受塔迪厄计划影响的一年，那个计划意在密切多瑙河国家之间的合作。不久就证明，法国固然很强大，足以拆散德奥关税同盟，但是，它几乎得不到英国支持，无法克服德国和意大利的反对。在这种政治和经济上都动荡不定的局势下，1932年4月24日，在维也纳、下奥地利和萨尔茨堡举行了邦议会选举，在克恩滕和施蒂里亚举行了市镇选举。这些选举已经处在国社党的突破的影响下，它的势力在1932年7月31日的德国选举中已经大大增强。从选举结果中至少可以得 511 出结论，在全奥地利，国家社会党人在民族院选举中所得的票数到

不了百分之二十，当时他们在德国的百分比却达到百分之三十七点八。因此，奥地利的事态发展远远落后于德国，但是，国家社会主义却掌握了越来越多的社会阶层。大德意志党人、国家同盟和祖国集团受到毁灭性打击；奥地利的"民族阵营"从此就主要处于带钩的十字旗[①]的支配下。基督教社会党在联邦所属各邦中蒙受一些损失，但不惨重，然而在维也纳却受了很大的挫折。社会民主党人在各邦里的地位有所巩固，但在首都只有勉强维持原状。共产党人微不足道的票数有所增加。在重要的基督教社会党人士中，这次在维也纳的败北被看成是由于对该市社会民主党的多数采取了松弛态度所致；维也纳的党魁利奥波德·孔沙克不得不放弃他的职位。从此，基督社会党人尽可能避免参加民族院的新选举。

1932年5月6日，布雷施的少数派政府辞职；迄今的农林部长恩格尔贝特·陶尔夫斯受命组织新内阁，这个内阁依靠基督教社会党、祖国集团和国家联盟，在民族院中只有一票的多数，在联邦院中则处于少数。而且，无论在政府方面，还是在反对派方面都有不可靠的人，他们的选票不能计算在内。经过议会的激烈辩论以后，政府以微弱的多数，获得民族院同意它所签订的关于从国际联盟借贷它所迫切需要的三亿先令借款的日内瓦议定书，这笔借款又附有政治条件，规定合并的禁令再延长十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由于对法国社会党人施加影响，使法国议会接受了洛桑议定书(他们曾在维也纳议会中投票予以反对)，因此，对维也纳政府间接帮了忙。可是，1933年1月，由于希尔滕贝格军火走私事件，国内政治又进一步紧张，那时社会民主党方面的公众揭露了意大

① 带钩的十字旗(Hakenkreuz)，国家社会党(纳粹)的党旗，呈卍字形。——译者

利军火非法越过奥地利地区运往匈牙利，后来，在西方和小协约国极其强烈的干预以后，奥地利政府答应运回，但又试图贿赂铁路工会的主管职员，终于使这次军火交易得以做成。

议会中偶然发生了一件小事，即意外地就 1933 年 3 月 4 日激烈混战中进行投票时一张选票是否有效的问题展开了争辩，这场争辩导致民族院的三个议长的下台（即社会民主党人伦纳、基督教社会党人拉梅克和大德意志党人施特拉夫纳），政府就利用了这次偶发事件排除了民族院，因为民族院的多数它已无法掌握。次日，德国的希特勒政府利用了神秘的国会被焚一事，取得了选举的胜利，这个胜利虽然没有给国家社会党人带来多数，但是却使他们不久有可能施用强大的压力，完全接管政权。 512

议院的排除与等级制国家

从 1933 年 3 月 4 日起，奥地利政府就阻挠由最后下台的那个议长重新召开民族院。联邦总统本来有权根据紧急法令——这个紧急法令，政府当然不得不同意——召集民族院开会，但是，他没有利用这种可能性，他还放弃了 1929 年宪法的修正案（第 29 条）所规定的办法，没有解散民族院和宣布进行新选举。

陶尔富斯政府发布了为办理国家事务所必需的法令，他根据的是 1917 年的战时经济授权法，在共和国时代，这个法令一再被引用，无论如何它从未被宣布废除。严格地说，这个法律仅仅涉及经济和供应问题。后来维也纳的邦政府向宪法法院控诉联邦政府所发布的紧急法令，陶尔富斯设法使基督教社会党为这个法院所提名的成员下台，并以此为借口，宣布这个在宪法问题上的最高裁决机关不能做出决定，从而把它排除。这种做法应追溯到处长罗伯特·黑希特博士的主意，陶尔富斯政府利用了它，又排除了一个

障碍，但是它自己却大大地违反了奥地利宪法的精神，因此，它在道义上的权威受损极大。

在这期间，国家社会主义已全力以赴地投入进攻，它努力的目标是在德国获得胜利，在奥地利掌握政权。在激烈的广播攻讦以后，德国司法部长汉斯·弗兰克去奥地利作一次挑衅性的旅行，可是联邦政府却设法使他被召回。德国以“一千马克限制”来回答：德国公民凡去奥地利旅行的必须支付一千马克的费用；由于采取513 这种非同寻常、类似敲诈勒索的措施，旅行交往实际上已经被迫停顿。人们希望，以此来消灭奥地利的旅游业，从而破灭整个奥地利经济，逼使这个国家屈膝投降。但是，由于在西欧大力为旅行奥地利进行了宣传活动，漏洞至少得到部分的弥补。在克雷姆斯附近发生一起对政府所征召的志愿辅助团的一支队伍投掷手榴弹的严重事件以后，1933年6月19日，国家社会党的任何活动全被禁止。许多年轻的国家社会党人越过边界前往德国，他们在那里被编成一个军事组织，叫做“奥地利军团”。一般地说，这些活跃的、部分地也是恐怖主义的分子的逃亡，其实反而巩固了奥地利政府的地位；国境得到联邦陆军、行政机关和志愿防卫队的守护。虽说存在着种种纷争和紧张关系，1933年5月和10月，然后又在1934年1月，联邦政府一再同国家社会党的代表人物有所接触。在炸药谋杀事件的气氛中和在激烈的宣传战声中开始进行接触，自然不会获得切实的结果；情况已是十分明显，国家社会党人只不过在寻求适当的途径，以取得决定性的地位，然后把中央党和巴伐利亚人民党那样的命运赋予奥地利的保守派。

比较简便的方法是，向左寻找谅解的道路；关于这一点几乎还未谈过。共和国保卫同盟已于1933年3月被解散，人们预料社会民主党会采取报复行动，然而却没有。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大会决

定，只有在维也纳的社会民主党的邦政府和区镇行政机构被取缔、党或自由工会被解散时，才进行抵抗。随后，卡尔·伦纳先后与基督教社会党的代表和联邦总统进行了会谈；人们最后准备同意一项紧急法令，授予政府以为期五年的全权；作为条件，人们要求再次召集民族院；这些尝试必然会失败，因为陶尔富斯在1933年8月18日和19日在里奇奥内与墨索里尼会晤时，已经同意承担广泛的义务，要建立符合宪法精神的职业等级新秩序，而墨索里尼则曾要求对社会民主党采取严厉的方针，这可以从战后发表的他与陶尔富斯的通信中看出。这也就是施塔海姆贝格和法伊领导下的卫国军所公开宣布的纲领。无论如何，对于陶尔富斯人们必须承认，那种职业等级方针也是符合他自己的心意的，在意识形态上，514 它并非直接与法西斯传统相联系，而是与社会保守的、由赛佩尔继承下来的传统相联系，同时，人们还特别乐于强调与罗马教皇利奥十三世的"Rerum novarum"通牒[①]和庇护十一世的"Quadragesimo anno"通牒[②]的精神实质在原则上的一致性。

"祖国阵线"是作为联邦总理及其顾问们进行政治活动的工具而建立起来的，他们的努力一方面基于职业等级思想，另一方面又特别强调奥地利的独立和特殊使命。从1933年起，该阵线公开活动。国家联盟的领袖、副总理温克勒尔曾试图成立一个"全国等级阵线"——等级思想在国家同盟的圈子也有长久的传统——但由于坚定的信徒人数不足，又由于与卫国军有矛盾而成立不起来。温克勒尔只好退出政府，公然反对政府的方针。

1934年2月，政府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发生了早就预料到的

① "Rerum novarum"，拉丁文，字义上为"新事物"，但通常译为《劳工通牒》。——译者

② "Quadragesimo anno"，拉丁文，字义上为"第四十年"，但通常译为"重建社会秩序通牒"。——译者

公开和流血的冲突。序幕是各邦里的卫国军的最后通牒。随后，2月4日，施塔海姆贝格在因斯布鲁克发表咄咄逼人的演说，2月11日，法伊在格罗森策尔斯多夫发表一篇更加尖刻的演说（我们明天就去上班，全部工作都由我们来做……）。同时，伦纳周围的人与接近政府的人物的最后接触毫无结果，1934年2月9日孔沙克在维也纳市议会上发表了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说，却又没有被人们听取。

1934年2月12日，林茨的保卫同盟领导人里夏德·贝尔纳舍克对警察搜查武器的行动进行了武装抵抗；社会民主党号召举行总罢工，在各个工业中心都发生了政府机关、联邦陆军和防卫武装为一方，与共和国保卫同盟为另一方之间的斗争。最残酷的战斗行动发生在维也纳、林茨、施太尔和上施蒂里亚工业区。社会民主党的起义是一种绝望的行动，毫无取胜的希望。据官方资料，二月份的事件共造成死亡三百人，并且还处死保卫同盟成员九人，其中有上施蒂里亚的议员科洛曼·瓦利施和维也纳消防队官员、工程师格奥尔格·魏赛尔。贝纳尔舍克从拘留中逃出，奥托·鲍威尔和尤利乌斯·多伊奇则逃往外国。

这时，社会民主党的信徒，同国家社会党人一样，都转入了地515下。该党的被取缔完全符合墨索里尼的心愿，意大利对奥地利的影响继续增强，这表现在1934年3月17日"罗马议定书"的签订之中，虽然那些协议主要涉及经济事务。此外，还规定在外交问题上进行协商，并且秘密地达成军事协议，协议涉及到，遇奥地利发生内乱时，意大利进行干涉，而且还适用于意大利-南斯拉夫的冲突。同意大利合作首先加强了奥地利对于第三帝国的地位，可是却很不得人心，因为意大利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合并南蒂罗尔以来，尤其是在这个邦里采取了法西斯的压迫措施以后，在几乎

各个奥地利居民阶层里，都唤起了拒绝和敌视的情绪。这种情绪暂时产生了某种对付国家社会主义的免疫作用，因为它的领袖一向毫不掩饰地主张完全放弃南蒂罗尔，这种态度已于1928年在与最憎恨南蒂罗尔人的埃托雷·托洛梅的会谈中已经得到过证实。然而，这时却发生了一个奇异的转变，恰恰是国家社会主义能够从大多数奥地利人对意大利政策的厌恶感中汲取了新的力量，国家社会主义在德国的崛起和掌权大概曾阻止意大利在南蒂罗尔问题上作出让步。1934年2月12日的事件似乎为国家社会党人展示了有利的前景，因为人们不必考虑保守力量和社会民主党力量的共同抵抗，从而可以寄希望于愤懑的左派分子的蜂拥而至。

陶尔富斯政府于1934年3月改组；保国军的影响增强。从1933年7月起，福拉尔贝格的政治家和邦行政长官奥托·恩德尔就致力于扩大等级制宪法，它的条文表明，人们对于很可能支持并容忍政府的那些居民阶层，总是力求赋予更大的重要性。依照新宪法，联邦总统不是由人民，而是由奥地利的市长产生。代议机构、国务院、联邦文化委员会、联邦经济事务委员会和各邦的委员会的成员是任命的，仅有咨议的职权；联邦议会（共有议员五十九人）投票决定政府的建议。职业等级被设想为宪法大厦中的决定性结构成份，除了农业和公共事务这两个职业集团以外，从未实际组织过。"1934年的五月宪法"以相当特殊的方式生效；先是由政府发布法令，然后由残缺议会（Rumpfparlament）[①]进行投票，参加投票仅为过去当选的一百六十五位议员中的七十六人，其中七十四人投票表示接受。也就是说，出席的旧议会议员不超过半数； 516

① 残缺议会，原指1849年在斯图加特聚会的法兰克福国民会议的残余部分；此词的更早起源则在英国，指1648年经过克伦威尔赶走长老会议员后残存的英国下议院。此处借作比喻，因为出席的议员很少，有点七零八落，残缺不全。——译者

如果人们设法满足(在社会民主党人被排除以后)残缺议会的三分之二多数，这样必然是很令人尴尬的。议会的召开就已给许多国内外的观察家以恶劣的印象，因为在下议院人数还很齐全之时，人们就已长期反对重新起用人民代表会议。此外，在 1929 年的宪法修正案中规定，彻底改变宪法(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此)需要人民投票来决定(第 44 条)，因此就谈不上维持宪法的连续性。1934 年 5 月 1 日，早就准备好了的与罗马教廷的共同约章公布并开始生效。

1934 年 5 月，国家社会党的新炸药攻势开始，于是重又进行了种种接触。在德国发生了 1934 年 6 月 30 日的事件，随后未经法庭宣判处决了大批人，这使第三帝国的威望蒙受巨大的损失，准备打击奥地利政府的工作继续进行。1934 年 7 月 25 日，非法的党卫军旗队 (SS-Stundarte) 一百五十四个穿着制服的暴乱分子闯入维也纳联邦总理办公室。陶尔富斯被一个袭击者、被释放的联邦陆军卫队长奥托·普拉内塔——据他后来供称，是在交手时——开枪击中，因重伤致死。对于垂死者，既拒绝给予医生救助，也没有请教士来料理后事。部长法伊和国务秘书卡尔文斯基被抓走。袭击维也纳广播电台也取得了暂时的成功，人们宣布由安东·林特伦博士接管政府，此人曾任施蒂里亚行政长官，不久以前被派出任驻罗马公使，在暴乱期间——当然并非事出偶然——曾在维也纳逗留。在出事前，政府曾被多次警告，甚至还通过巴伐利亚和奥地利的冲锋队头子发出过这种警告。由于行政机构混入不可靠分子、以及难以理解的疏忽之罪，特别是由于扮演了一个并不光彩的角色的部长法伊的专擅行为，联邦总理办公室终于被袭击。联邦总统正在韦特湖畔费尔登地方逗留遇刺未遂，大多数部长们都及时离开了维也纳网球场广场大厦。教育部长舒施尼格担任了他

们的领导。在联邦总理办公室里与暴乱分子进行了谈判，并向他们保证，如被抓走的人安然无恙，就让他们撤走，并派人予以护送。后来，当然宣布了陶尔富斯之死。这样逮捕煽惑者就有了借口，德国公使库尔特·里特曾设法为他们进行干预。为首闹事者弗兰茨·霍尔茨韦贝尔、奥托·普拉内塔以及行政机关中的五个积极成员均被处决。林特伦同样被捕，曾试图自杀未遂，后被判处无期徒刑。有几个幕后牵线人躲在国境的另一侧，奥地利司法机关无法抓到。 517

维也纳事件消息传来，在联邦各邦，尤其是克恩滕、施蒂里亚和上奥地利，国家社会党人闻风掀起骚动，它们完全失败了，但有的曾经过激烈的战斗。奥地利军团的一支先头部队在米尔菲特尔的科勒施拉格越过了德奥边界，但被逐回。由于意大利在布伦内罗集结军队，墨索里尼扬言要进军，奥地利军团的进一步行动才没有实行。

1934 年 7 月 25 日国家社会党的暴乱就这样失败了，但对于政府来说，它比二月战斗更为凶险，它夺走了政府的领导人陶尔富斯的生命。总理在与国家社会主义斗争中死亡，以及为唤醒奥地利国家意识而进行的斗争获得部分成功，这意味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奥地利的总帐多了一笔有利的资产。陶尔富斯采取独断专横的政策，他那种做法常常是很成问题的，无论如何已经不再具有现实意义，自不待言。

国家社会主义在 1934 年 7 月 25 日吃了一次败仗，但是，在随后的岁月中，时间对它有利。在萨尔区投票中获胜（1935 年 1 月 13 日），大批人参加康拉德·亨来因的苏台德德意志党（1935 年 5 月 26 日），凡尔赛条约的军事条款开始被突破（1935 年 3 月 16 日实行普遍兵役制），凡此种种都增强了国家社会党政权的威望和力

量，以前的敌人对它比对昔日的民主德国① 更加卖力奉迎。这种事态发展对奥地利和许多奥地利人的思想必然产生不可避免的后果。

应当在这里客观地探讨一下，国家社会主义在奥地利是由于什么条件才兴旺发达起来的。发展的可能性在这里比在德国更为不利(1930—1932 年的选举结果清楚地表明这一点)，因为民族的和民族自由主义的阵营，它的党派虽然繁多，选民往往动摇不定，很易屈服于国家社会主义宣传的吸引作用，但是，这个阵营在人数上较弱，而两个大党，即保守的和社会主义的政党，如同德国的"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一样，对于右派的激进宣传却有着更大的抵抗力，它们在奥地利拥有将近百分之八十的选票。奥地利的左派518实际上实现了统一，这对国家社会主义是不利的，如所周知，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间的激烈斗争曾经为国家社会主义获胜铺平了道路。然而，国家社会主义的党羽在奥地利的增长却受到一定的限制，虽然社会民主党人和资产阶级的"反马克思主义分子"之间的激烈斗争提供了某些可能性，这无宁说对于卫国军或——在温和的民族资产阶级阵营中的——朔贝尔集团有好处。缺乏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有组织能力的领袖人物，是奥地利国家社会主义的一个弱点——生于上奥地利的希特勒在政治上的飞黄腾达完全是在德国实现的。只有维也纳律师华尔特·里尔博士具有政治才干，他喜欢独立思考和行动，这就使他不可避免地、不可弥合地与慕尼黑党的领导发生冲突。

国家社会主义一旦在德国取得政权，它在奥地利也就有了更大的活力。一度产生过这样的后果：在比较大的德意志经济范畴内，只要有一个能干的政府，解决失业问题起来就比在奥地利容

① 指魏玛共和国。——译者

易些。其实已宣布的灾难地区——如维也纳的工业郊区和维也纳新城地区——决不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中心，他们在工人阶层中的追随者一般地说比较少。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奋斗的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失业的或用非所学的知识分子易于接受国家社会主义。

另一个因素是排犹主义，它在奥地利自从舍纳雷尔和卢埃格尔时代以来已经有了政治传统。就事情本身而言，大半集中定居于维也纳的犹太人与其他居民之间的关系，自从二十年代以来没有发生过足以为排犹倾向的增长辩护的变化。由于犹太人对于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的民族主义的排犹倾向心存疑窦，尤其是由于回想到古奥地利那种兼收并蓄和宽大为怀的精神（与沙皇俄国简直不能相比[1]），一时犹太人从东欧纷至沓来，但是现在这种暂时的涌流早就过去了，出生率较低的大城市犹太人在全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以前当然没有目标如此明确的排犹宣传，而消除犹太人的竞争和清算他们的财产后可能产生就业 519 和提升的机会却引起相当广泛的人士们的注意。无论如何，排犹宣传的影响是有限度的；它固然吸引了许多人，但，它的一帆风顺却令许多别的人产生反感。

比其他一切力量更起作用的是第三帝国无可争辩的、那些已经提到过的政治成就，特别是外交上的成就。它取得了那种渴望已久的国际上的平等地位，这是魏玛共和国没有达到的。那种虽然模糊不清但却是年代久远而令人肃然起敬的帝国思想，其次，近年来的合并于德国的主张，虽然条件已变，但实现的前景重又呈现出来；小小的奥地利曾经受过它的邻邦粗暴对待，而现在有可能生活在一个受那虐待过它的邻邦充分尊重、甚至畏惧的大国里，正如过去几百年那样，是令人十分向往的。几乎大多数奥地利人都

觉得自己是德意志人，虽然在深浅的程度上有所不同，虽然就大多数人来说，他们不想否认，或者至少不想完全否认他们的特殊性。陶尔富斯（他与一个东普鲁士女子结婚）和舒施尼格并未宣布奥地利与德意志本质有何矛盾；人们甚至把奥地利人看作是比较“表面上日耳曼化了的”普鲁士人更好一些的德意志人；人们不无道理地相信自己那种基督教的保守世界观植根于德意志传统，较之新兴的激进的国家社会主义，根也植得更深。国家社会主义具有神秘的性质，尽管往往表现得咄咄逼人，但是还是教人看不透，它特别对于好斗的、易于接受民族理想的青年人具有吸引力。

挽回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在许多人看来是可能的，甚至是可以预料的。前反战者的联合早已分崩离析，日本和俄国各走各的路，美国才缓慢地脱离二十年代的与欧洲疏远的孤立主义态度。波兰与第三帝国签订了一个互不侵犯协定，波兰驻维也纳公使扬·加弗龙斯基与新任德国公使弗兰茨·冯·巴本密切合作，后者是 1934 年 7 月 25 日接替里特的。把奥地利合并于第三帝国几乎成了既是国家社会主义党的、也是波兰的外交政策，人们希望把德国的扩张从自己敏感的西部疆界转移到南部，此外还相信，如果波兰外交部长贝克得遂心愿，捷克斯洛伐克真的瓦解，那就还有领土可以获得。南斯拉夫政府人士与第三帝国的合作也相当密切，也是在那个担任驻维也纳公使职务的乔治·纳斯塔西耶维奇的积极参与下进行的。在 1934 年 7 月的战斗中，克恩滕的国家社会党人进入了南斯拉夫边界上的一个后援阵地，越过南斯拉夫地区的暴乱分子可以在瓦拉斯丁兵营里完成他们的军事训练。陶尔富斯的继任者舒施尼格的合法主义倾向、克罗地亚移民在奥地利居留（他们在奥地利人数远不是那么多，得到的支持也远不如在

520

匈牙利，尤其是在意大利那么充分），这无疑促使南斯拉夫更倾向采取敌视奥地利的政策。

英国的右派人士极其同情国家社会主义，在维也纳热心为发行量极大的《每日邮报》写稿的政论家沃德·普赖斯就是这种观点的突出代表人物，他称颂了非法的奥地利国社党人。奥地利政府与意大利的紧密关系似乎提供了某种保护，舒施尼格-墨索里尼会晤于1934年8月22日，以正式肯定互相合作而告终；1934年9月27日，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第二次）发表关于奥地利独立的三国声明。共同采取积极行动来对付希特勒重整武装的政策一举并未见诸实行，因为英国打退堂鼓。1935年4月的斯特雷扎会议再次宣布三国一致时，墨索里尼已在准备他的阿比西尼亚行动，这个行动他于同年10月发动了，这就使他与英国彻底决裂。国际联盟决定对侵略者实行经济制裁，与国内的公众舆论全然相反，奥地利出席国际联盟的代表近乎示威似地采取了亲意大利的态度，这样就失去了英国本来就微不足道的同情。

阿比西尼亚冲突使希特勒轰动一时的向非军事化的莱茵区进军有可能实现。由于英国和波兰所采取的态度，对于这个行动没有进行反击，只是提出软弱无力的抗议，这就鼓励了进一步的行动：奥地利的地位变得十分令人忧虑。补充1934年罗马协定的议定书于1936年3月23日签订，大大限制了奥地利外交上的行动自由，1936年6月，舒施尼格在罗卡·德莱·卡米纳特拜访墨索里尼时，不能不注意到意大利与德国亲近这一事实；罗马-柏林轴心的政策已经昭然若揭，不久在西班牙内战中就变得明显可见。在这种条件下，经过巴本和舒施尼格的同事特奥多·霍恩博斯特尔和吉多·施密特作了相应的准备以后，1936年7月11日，德奥协定签字。

经过缔约双方口头声明补充过的七月协定中陈述说，德国政
521 府完全承认奥地利的主权，两国内政（"包括奥地利国家社会主义问题"）的演变应视为内部事务。奥地利政府表示，它的政策原则上承认奥地利为一个德意志国家。德国则放弃"一千马克的限制"①。奥地利抑制反国家社会主义的宣传，并答应大赦被投入狱的国社党人。由于这种让步，人们当然就更有可能对付奥地利国社党人今后的非法活动。维也纳战争档案馆馆长埃德蒙德·格莱泽-霍斯特瑙，作为国民阶层的突出代表而被接纳入阁，出任无任所部长。七月协定在各国报界和外交界人士中反应都很好，但是，约瑟夫·利奥波德上尉周围的激进的奥地利国社党人，以及祖国阵线中的保守派和合法派中坚决反对国家社会主义的人却采取了拒绝的态度。因此，新政府方针，即所谓"德意志道路"实行起来困难重重，尤其是一再发生国社党人的游行示威，这又反过来使大赦迟迟没有执行。从1945年以后的观点看来，七月协定也受到尖锐的抨击，问题就在于，为了争取较多的喘息时间，奥地利政府在当时那种国内形势下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可取。

1936年，国卫军终于被彻底取缔。在阿比西尼亚战争结束以后，施塔海姆贝格给墨索里尼去了一封贺电，肆意诋毁西方国家和民主体制，因而不得不离开政府。在七月协定以后，出身于国卫军的外交部长埃贡·贝格尔-瓦尔德埃格男爵被一直不大显露声色的福拉尔贝格人吉多·施密特博士所代替，一般认为此举是对德国的让步。施塔海姆贝格与他在国卫军的主要竞争者埃米尔·法伊上校本来就有矛盾，这矛盾在随后几个月中演变为这个防卫组织内部的激烈斗争，这场斗争终于由舒施尼格于1936年10月9

① 纳粹德国为阻挠公民前往奥地利旅游而故意定下交费一千马克的限制，参见上文第646页。——译者

日下令解散国卫军而告终。它的党羽在人数上虽然并不起决定性作用，但是，政府这样做等于放弃了一部分还敢公开抵抗国家社会主义的积极分子，可是又争取不到任何其他力量来代替他们。

1937 年，奥地利的经济状况虽然没有很大改进，但失业人数锐减，与此同时，外交局势的不利却越来越明显。自从前一年的秋天起，柏林-罗马轴心范围内的合作更趋紧密。1937 年 9 月，墨 522 索里尼访问德国，此行使希特勒在奥地利得以享有行动自由。要从西方取得某种有效的支援是很难的。英国驻柏林大使内维尔·亨德森对奥地利公使表示过，并且在别的场合上，也表示过不满意奥地利反对合并和统制（Gleichgechaltung）①，认为这种反对不必要地使中欧局势复杂化。1937 年 11 月，当时的英国外交副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在贝希特斯加登对希特勒声称，欧洲应该有某些改变，他列举但泽、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英国报界也越来越多地发出这种腔调。

自从七月协定以来，奥地利内政上的大事就是试图争取"民族党人和国社党人"在祖国阵线的范围内合作，这种尝试进行过多次，在 1937 年曾有所加紧。从事这项任务的有好几个组织，如德意志社会人民同盟、祖国阵线内的人民政治报告会和维也纳的七人委员会(Siebener-Komitee)。政府此时致力于离间激进的和温和的国社党人，对方则争取国社党活动的合法化。利奥波德上尉领导下的激进积极分子以前在人数上较多，无论如何比较喧闹，最为崭露头角，而现在"民族强调派"（"Nationalbetonten"）在政治上变得更为重要，他们那时已经或多或少地委身于国家社会主义。在他们当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咨政院参议、维也纳律师阿图尔·赛斯-英夸特；在政治舞台上，他当然要比格莱泽-霍斯特瑙更灵巧，

① 指纳粹统治下，对思想、文化、经济等的强求划一。——译者

并且,如以后所表明的,也更不择手段。1938年初,由于塔夫斯计划(因策划者利奥·塔夫斯而得名)被揭发,冯·巴本所插手的种种来往被遏阻,按照塔夫计划,国社党人准备在下一个月举行武装暴动,其中包括对德国外交官采取挑衅性行动;

决定性转变的直接动力却是来自外部。1938年2月4日,希特勒击败了国防军中的反对派;紧接着,巴本就设法使舒施尼格与希特勒进行会谈,会谈于2月12日在贝希特斯加登举行。在会谈中,奥地利方面答应澄清局势,但是,德国方面以军事干涉相威胁,促使联邦总理签订了一个协定,这个协定导致以后几个星期事态急遽发展。赛斯-英夸特被任命为公安部长,政府已有脱离舒施尼格掌握之势,从此奥地利国社党人大体上已毫无阻碍地公开活动。来自社会民主党阵营的国务秘书阿道夫·瓦泽克被接纳入政府一事似乎说明,政府想向左扩大它的基础;社会民主党人和那个微小的共产党人集团已经看得出,与“奥地利法西斯主义”相比,国家社会主义却是一个恶劣得多的祸害。尽管1934年2月发生过种种伤心事,他们还是表示要支持奥地利的独立斗争。这样就举行过一些会议和示威游行,都有助于使左派活跃起来;互相不信任和由于长期被禁而产生的组织上的虚弱妨碍了这些努力。舒施尼格感到政府权威有完全瓦解的危险,他仓促选定一条出路,就是期限短促(于3月9日决定于13日举行)几乎无法控制的人民投票,这个办法只能加速灭亡。

有一阵子谣言四起,恫吓交加,舒施尼格只好于1938年3月11日表示要收回成命,不举行人民投票;这时德国军队已陈兵奥地利边境,在个别邦首府里,国社党人竟占了上风。在军事干涉迫在眉睫的压力下,联邦总理辞职,3月11日傍晚,联邦总统米克拉斯经过长期的抗拒以后,在同样的压力下,委托赛斯-英夸特组织

新政府；在这个关头，希特勒下令德国军队进军，进军于次日早晨开始。联邦总统米克拉斯引退以后，新内阁于3月13日通过了关于奥地利合并于德国的法律。这样，事实上已经实现了的奥地利并入德国之举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合法化。

在说明那个专横的等级制政权的被清算时，谈一下它的历史地位也是适当的。它没有能做到把一切敌视国家社会主义的和肯支持国家的力量都联合起来。1933年和1934年以后，三大政治营垒仍继续存在，其中两个转入地下。保守派和社会党人的边缘分子参加了国社党或者暂时同情他们。但是，据我们判断，这三个集团都没有掌握奥地利居民的大多数，因为没有举行过选举。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只是代表着少数。一个实行民主制的奥地利，那里的国社党人本来已有可能自由发展，它又被夹在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之间，处境维艰，同民主大国没有共同的边界，从西方只能得到精神上的同情而没有其他援助，这个奥地利显然不可能长期地对 524 第三帝国进行更有效的抵抗。但是，人们到底还是坚持了五年。

第三帝国中的奥地利。第二次世界大战

奥地利合并于第三帝国一事，大国已经注意到，但并未提出异议。在西方国家中，美国表现了最冷淡的态度。意大利的赞同促使希特勒回了一封夸张的感谢电，这封电报在维也纳引起了一个突兀的、迅速辗转相传的谣言，说是墨索里尼已把南蒂罗尔让给了希特勒，直到海因里希·希姆莱出面断然否认，谣言才收敛。南斯拉夫是第一个最先和最谦卑地对合并表示承认的国家，它的总理米兰·斯托雅迪诺维奇以热烈的词句表达了他对事态发展的喜悦心情。波兰和匈牙利方面的官方和半官方的态度则大同小异。只有少数远方的国家公开表示了抗议。

在奥地利，国社党人欢呼若狂，其他人士也认为可以乐观，在他们看来，在长时期的不稳定以后，最后的决定终于做了出来。人们在谈论“欧紫罗兰”①。奥地利的主教们希望通过积极的表态，使教会的危急局面稳定下来；这种希望未能完全如愿，发生过一阵退教的浪潮——大约三十万人左右，在维也纳和东部各邦最为强烈，在西部逐渐平静。教会是一个国家无法应付的因素，采取象1938年10月8日一群啸聚的希特勒青年团向维也纳主教府冲击那样的恐怖行动不行，采取警察监视也不行，在精神和道德方面最不起作用。

在三月的日子里，种种现象只具有暂时的意义。卡尔·伦纳发表了一个赞成合并的声明，其动机首先在于想对被捕的社会民主党人（尤其是罗伯特·丹内贝格）的命运起一种有利的影响。这是一种幻想，再说，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群众对于迅速解决失业问题印象很深，但是对于强制介绍职业和分发到“古老帝国”去就业则不大同意。

1938年4月10日的人民投票带来了几乎全相一致的结果，这种情况在厉行专制的国家里是司空见惯的；这种结果当然不能勉强视为可靠地表达了民意。德国秘密警察的横行霸道起到了某种促使人们清醒的作用，当然也就是恫吓的作用，过不了多久，第525 一批被押送达豪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人就出发了。许多人被捕（据称有六万人）。不久犹太人移民开始，他们的财产“被雅里安化”②。有些国社党的政敌同样得以逃亡到外国。

① “欧紫罗兰”(Märzveilchen)，1933年，希特勒上台，该年3月5日的德国选举纳粹党获胜，使奥地利的国社党人得到鼓励，故称之为“欧紫罗兰”（按德文原义为“三月的紫罗兰”）。——译者

② “雅里安化”(arisieren)：雅里安人原系印度和伊朗的古民族，其语言属印欧系；纳粹掌权后实行残暴的种族政策，滥用这个词来指日耳曼血统的人，以区别于犹太人。此处“雅里安化”的含义即“为纳粹德国所充公或没收”。——译者

新政治组织的特点在于力图消灭奥地利这个名字和概念。在1938年5月24日，“奥地利邦”就已经被分为七个行政区(Gaue，即维也纳、下多瑙、上多瑙、蒂罗尔-福拉尔贝格、萨尔茨堡、施蒂里亚和克恩滕)。人们最初谈的是东部边疆区(Ostmarkgaue)，1939年4月14日的东部边疆法(Ostmarkgesetz)就是针对这个区而制订的，后来1942年元首发表命令，宣布采用“阿尔卑斯和多瑙行政区”(Alpen-und Donaugaue)这个新提法。边界多处发生了变化。维也纳包括了一些边缘区镇而扩大多了，布尔根兰分别划归施蒂里亚和下多瑙，奥斯泽地区划归上多瑙、东蒂罗尔则属于克恩滕；在这个事例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这样做是讨好意大利和墨索里尼。由于东蒂罗尔在地理上孤立一隅，常常不由得使人想起蒂罗尔的肢离破碎，因此它被合并于克恩滕。南蒂罗尔被放弃，1939年6月23日，达成了德意南蒂罗尔协定，协定达到了使布伦纳山口以南的德意志蒂罗尔民族集团放弃他们世代久居的住所并移居德国的目的。

关于奥地利事务的新法令在组织上的实施，由萨尔普法尔茨行政区长官约瑟夫·比克尔这个专管“奥地利重新联合于德国的专员”的办事处负责，而充当“德国在奥地利的总督”的赛斯-英夸特则无所事事，他的职务于1939年5月1日被撤销。最初他被任命为国务部长，这是没有实际意义的，要等到战争期间，赛斯-英夸特作为1940—1945年荷兰被占领期间的德国总督，才得到一个重要的、对荷兰人极为不愉快的职位，他履行职责时遭到人们的严重阻挠。

在这期间，历史继续前进。盛气凌人的希特勒取得了人们一度不肯给予那个毫无防卫能力的德意志奥地利共和国的苏台德德意志区，还附加了几个捷克人占压倒多数的县。南波希米亚在行

政上划入上多瑙，南摩拉维亚（以及普雷斯堡附近的特本和恩格劳）划入下多瑙。希特勒并不满足于这样的胜利，不惜撕毁1939年3月那个对他极为有利的慕尼黑协定，清除了那个残留下来的捷克斯洛伐克，攫取了大量捷克军事物资；建立了“波希米亚与摩拉维亚保护国”和斯洛伐克保护国。从此人们再也不能维持这样虚构的说法，似乎国家社会主义仅仅致力于德意志民族的国家统一。

526 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从而触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那些事件详加评述是不必要的；在这一事例中，人们自然不必费神去弄清战争的责任问题。就涉及奥地利而论，存在着第二个侧面，即一方面不存在一个奥地利国家，它并不参战，另一方面，奥地利人不是在紧密的队伍中，而是被分散到不同的部队单位中，作为德国国防军的成员而进军，在以后的几年中在各个前线作战并流血牺牲。显而易见，战争的进程大大影响了奥地利的情绪。同1914年相比极其不同的是，在这次战争爆发时，完全没有自发的热情；老百姓默不作声，气氛更为凄惨。在波兰战役迅速结束以后，这种景象并未改观，到了法国崩溃时，很多人才相信“最后胜利”。巴尔干战役似乎最先证实了这种看法。在对苏战争中，德国初战告捷，战果辉煌，以后损失数字上升，国家社会主义的说服力大不如前，他的拥护者大为减少。大多数居民都不赞成对犹太人采取越来越严厉的措施，不赞成逼令他们佩戴侮辱性标志，以及随后开始的大规模的放逐。对于在统治和管理东欧和东南欧的占领区中采用残酷手段，他们也同样不赞成。从国防军休假人员口中，人们了解到许多情况。关于集中营里面的暴行的消息被点点滴滴地渗透出去；在奥地利土地上，在毛特豪森花岗岩采石场上，从1939年以来就有一个大集中营，迄至战争结束时，死亡囚犯达十二万人。

1938年时已有抵抗小组建立，它们的数目和意义逐渐增长。它们在目标的确定上自然没有协调一致；属于“敌人”之列的，有各种不同世界观的人、合法派、天主教徒、其他教派的人、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甚至还有德意志民族党人和国社党人。由于政府、秘密警察不知疲倦地活动和卑鄙的告密行为，抵抗小组伤亡很大；死亡和集中营随时在威胁着人们。“人民法庭”的血腥判决先是暂时保密，后来又以粗暴残酷的方式公布出来，以儆效尤。在国外，在盟国的集中营里，第三帝国的奥地利敌人也在活动，但是在这里，不同派别的活动也很难协调统一起来。奥地利流亡政府也成立不起来；与此有关的努力，1940年由于法国的投降而化为乌有。在战争以后的进程中，盟国与奥地利国内的抵抗运动进行了接触。同德国的抵抗小组当然也有种种联系。奥地利人曾突出地和积极地参加了1944年7月20日的行动，这个行动最初在维也纳警备区司令部曾取得成功；应特别提到的是埃尔温·拉胡森和罗伯特·贝纳迪斯中校。在卡尔·格德勒博士为这个行动进行准备时，情况就已经表明，奥地利抵抗小组的大部分成员，不同于密谋的军官，希望奥地利重建自己的国家。 527

实际上，国民的情绪对一切来到奥地利的德国人越来越反感；1941年10月，维也纳行政区长官巴尔都·冯·希拉赫针对他那些——同他一样——来自“古老帝国”的同胞所公开发表的意见，虽然令人觉得有点哗众取宠，但是却表明人们多么不得不考虑到这种情绪。其实，在战争期间，维也纳行政区的最重要的政治的和行政的职务都由德国人担任。这当然使人不痛快，来自莱茵兰的市长菲利浦·容，平时很少在公众中露面，他被素来强调维也纳特性的本地人汉斯·布拉施克所取代，这件事说明，作决定时是考虑到国民的情绪的。

在这期间，战争的转变已经越来越明显。斯大林格勒的灾难使许多维也纳人和下奥地利人死亡和被俘，德军部队在突尼斯投降、意大利的叛离、以及，最后敌军在法国登陆成功，凡此种种都使得结局和失败显得不可避免。战场上的死亡人数有增无已，此外还有粉碎性的空袭的压力。空袭从 1943 年起，尤其是在 1944 年以后，使长期幸免的奥地利受到严重损失。维也纳、格拉茨、菲拉赫、维也纳新城、克尼特尔费尔德等城市都遭到广泛的破坏。居民越来越不听国家社会主义的宣传，人们从盟国或中立国的广播中收听最重要的消息。因此，1944 年 9 月，国家安全总局局长恩斯特·卡尔滕布鲁纳就下多瑙和维也纳行政区的民情和盛行的“奥地利倾向”发表了一个十分悲观的局势报告，那是极其有根据的。

1945 年春，奥地利本身也成了战场；红军部队从东边开入，英国人从意大利向克恩滕挺进，美军突入蒂罗尔、萨尔茨堡和上奥地利，法国人则进入福拉尔贝格。抵抗运动在蒂罗尔、在萨尔茨卡默古特[①]和在施蒂里亚的科拉尔佩[②]尤其显得突出，它的行动大大缩短了已经变得毫无意义的战斗，阻止了蹂躏的扩大。希特勒原来有一个“阿尔卑斯堡垒”计划，打算在奥地利地区一直战斗到底，这个计划幸而没有实现。维也纳警备区司令部中的奥地利军官试图通过与红军建立联系而加速交出那个已被宣布为堡垒且有毁灭之虞的维也纳市，他们虽然取得了部分的成功，但是，卡尔·比德曼少校、阿尔弗雷德·胡特上尉和鲁道夫·拉施克中尉却落入了秘密警察的毒手，他们为了执行由卡尔·索科尔少校所领导的行动而付出了自己的生命，那个行动从奥地利和维也纳的立场来看，

① 萨尔茨卡默古特 (Salzkammergut)，在上奥地利萨尔茨堡的北阿尔卑斯山区。——译者

② 科拉尔佩(Koralpe)，在奥地利中部阿尔卑斯山区，在拉凡塔尔(Lavantal)以东。其山脊为克恩滕和施蒂里亚的分界线。——译者

无论如何是完全合理的。

人们可以期望，第三帝国的崩溃将导致奥地利独立的恢复；国家社会主义的奥地利敌人和盟国的广播宣传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虽然还出现了其他的复杂现象。例如，斯大林和丘吉尔曾考虑重新起用较旧的法国愿望，计划成立一个南德意志-奥地利的“天主教国家”。可是，现在已经不是讲究信仰的时代，无论对于信奉新教的英国人，还是对于不信神的苏维埃政策的领导人来说，这个在1944年还有时讨论过的办法绝非衷心所愿，这种想法主要是为削弱和肢解德国的原则所决定的，此外也许还由于多少还怀疑奥地利是否有生存下去的能力。在奥地利和巴伐利亚居民中，这个思想没有得到共鸣。1943年9月1日的莫斯科声明的内容却重要得多，在声明中，盟国的外交部长艾登、赫尔和莫洛托夫提出了重建奥地利国家的前景，当然也谈到了“某种共同责任”，关于这个共同责任，人们只要想想1938年英国和法国的态度，或者1939年夏苏联的态度，自然可以想见，盟国也是难辞其咎的；人们还要求奥地利人为自己的解放作出贡献。从情况来看，这种贡献是有一定限度的，抵抗运动的牺牲也已经够重了。在大崩溃的日子里，与德国迅速分离被视为理所当然，这尤其应当归功于抵抗运动的活动和在国外的奥地利人的活动。分离是不可避免的和必要的，而且根据最近几年的经验看来，完全符合奥地利居民的心愿。

奥地利共和国的重建。占领体制和为国家条约而斗争。

529

在第三帝国的最后几个星期里，在它临近垮台的时候，奥地利的情况一片混乱。军事和政治局势的澄清来得比较快，后来经济也慢慢地恢复过来。

从1945年5月中开始，盟国占领奥地利全境，它们先后在1945年和1946年签订了关于管制奥地利的协定。1945年7月，就占领区的最后边界等问题达成了协议。法占区包括福拉尔贝格和蒂罗尔邦(不包括东蒂罗尔)。东蒂罗尔、克恩滕和施蒂里亚属英占区，萨尔茨堡和上奥地利多瑙河以南部分属美占区，而苏占区则包括上奥地利的米尔菲特尔、下奥地利和布尔根兰。此外，在位于苏占区内的维也纳市，四国各占领一个地段。内城则共同(轮流)占领。至1945年9月1日为止，已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在第一个管制协定中规定，盟国委员会为最高占领当局，它的决定需要一致通过，该委员会于1945年9月11日开会。

早在1945年4月，奥地利的政党已经开始筹备。奥地利人民党(ÖVP)是1945年新建的，在某种程度上当然可以说它继承了基督教社会党的传统，但是，与该党不同的是，它放弃了宗教信仰的标签。由较老的政治家为了在纲领上明确规定天主教方向作了种种努力，并提出了倡议，但没能唤起多大的反响，不久这些努力和倡议就被抛弃了。奥地利人民党的领导集团大部分来自抵抗运动，如卡尔·格鲁贝尔、费利克斯·胡德斯和洛伊斯·魏因贝格尔；其他领导成员，如工程师利奥波德·菲格尔等人，1938年至1945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作为集中营囚犯度过的。也有些自由传统的代表人物，多半来自经济界，如前国家同盟议员文岑茨·舒米，都比较崭露头角。奥地利人民党从一开始在组织上就分裂为有等级倾向的联盟，其中菲格尔领导下的农民同盟和工程师尤利乌斯·拉布领导下的经济同盟，在势力和影响上都大大超过工人和职员同盟。奥地利人民党的决策人拒绝了第一共和时代的“市民集团政策”，从一开始就准备在国家政府和邦政府中同第二大党社会党携手合作。

奥地利社会党(SPÖ)于1945年在卡尔·伦纳和阿道夫·舍尔 530
夫的决定性倡议下重建。除了他们以外，比较突出的有奥斯卡·黑尔默和布鲁诺·皮特曼;起领导作用的,尤应指出的有前社会民主党的右翼代表人物，也就是主张谅解的政治家。中间派的杰出代表人物卡尔·赛茨在议会中一再充当发言人，而维也纳市长之职则由特奥多尔·克尔纳担任。在左翼杰出人物中,奥托·鲍威尔1938年死于巴黎流亡期间,尤利乌斯·多伊奇不再起相应的作用。由于以上事实，作为对左倾的积极分子集团、即禁令时期(1934—1945)的"革命社会党人"的让步,把党的名称改为奥地利社会党一举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共产党人力求实行协同行动,于1945年年底被拒绝。过去的文化战斗精神衰退了，人们争取天主教会的合作，可是教会却禁止教士们从事积极的政治活动。维也纳在社会党阵营中的优势减缩了，虽然联邦首都仍然保持着一个传统的社会党多数。在第二个邦,即克恩滕,许多民族党阵营的成员加入社会党，社会党就在该邦议会中取得了一个相对的和暂时的绝对多数。工人和职员一如既往地构成社会党选民的主要成份,不过,人们越来越多地争取"边缘阶层"即中产阶级和小农阶层的成员。

奥地利共产党(KPÖ)在1934年以后,由于因二月事件而变得激进的社会民主党人纷纷加入，从而使他们的地下追随者得以增加;从1945年起,奥地利共产党不同于在第一共和时期,已经有一个议会代表团，虽则是小，在各邦的议会里也有个别共产党人出席。在为民族院选举而进行的投票中，共产党所掌握的票数总共不超过百分之五。老共产党员约翰·科普莱尼希是党的领袖，前社会民主党人恩斯特·菲舍尔则作为最坚强的机智人物，尤其是作为优秀的演说家而置身前列。虽然苏联占领军不去大力干涉奥地利的内政,但是,它对共产党人则给予某种支持，俄国人管理下

的几个企业被视为共产党人的最坚固的据点。

盟军进入后，上述三党的积极分子接管了地方和地区的行政机构。这些政党的代表自然而然地参加了第二个奥地利共和国的第一届政府。1945 年 4 月 27 日，卡尔·伦纳博士组成临时政府，参加这个政府的，除联邦总理伦纳以外，还有奥地利社会党、奥地利人民党的各九名成员、七个共产党人和三个无党派人士，他们担任国务秘书或副国务秘书。政府公布了以前由三党领导机关发表过的独立声明，这个声明宣布了奥地利民主共和国的重建，并答应按照 1920 年宪法的精神来规划共和国事宜。苏联承认了在它那个占领区内成立的政府，而西方国家对此却有保留。在它们看来，比较强大的共产党成份无论如何都是令人忧虑的，因为奥地利共产党经管内务部(弗兰茨·霍纳尔)，也就等于控制了政府，——马上就有很多共产党人在警察中任职——他们还掌管人民启迪、教育、培训及宗教事务总局（恩斯特·菲舍尔），因而拥有坚强的地位。

531

政府颁布了宪法联系法，根据这个法律，民主宪法的 1929 年修订本立即生效，还颁布了一个由政府暂时执行在正常情况下归议会和邦议会行使的权力。

当时的主要问题是，把政府的职权扩大到西方国家占领下的各邦。那时存在着这样的危险：成立一个对抗的政府，从而使已经是很小的幅员，由于占领区的边界而变得更为割裂。1945 年 8 月和 9 月，在萨尔茨堡举行会议，由西部各邦派出代表参加，准备在伦纳政府吸收这些邦的代表以后承认这个政府。政府的扩大在 1945 年 9 月 25 日维也纳会议上得到实施。新政府由奥地利人民党成员十三人、奥地利社会党十二人、奥地利共产党十人和无党派(专家)四人组成。

进行了民族院和各邦议会的选举筹备工作，选举于 1945 年11 月 25 日举行。纳粹党① 和保卫组织“党卫军”和“冲锋队”的成员仍被排除于选举之外。选举的结果是奥地利人民党获胜，它以八十五席获得民族院的绝对多数，而社会党人则获得七十六席。共产党人受到广泛打击，仅获得四席而居于末位。新选出的民族院立即表示赞成 1945 年 4 月 27 日的独立声明。根据选举结果，政府进行了改组。最后确定的政府于1945年 12 月成立，由联邦总理、工程师利奥波德·菲格尔来领导。阿道夫·舍尔夫博士为副总理，八个部长属于奥地利人民党、六个属于奥地利社会党、两个无党派专家担任部长(财政和司法)；共产党人交出了教育和内政部，接受了一个新成立的能源管理部。在民族院中只有执政党派出的代表，没有反对派。在组织政府以前，奥地利人民党和奥地利社会党之间曾为搞联合而进行过协商，协商期间曾决定政府的组成、以及各邦各区镇的行政机构的组成都采用比例原则。这个原则——根据以后进行选举的结果而在数字上有所变动——以后继续有效，而且在公务人员和国有化企业的雇用工作中多次被考虑到。 532

1945 年国内政治的发展的真正意义乃在于如下事实：第一次做到了，在苏占区成立的政府在国家全境得到承认，从而使在整个奥地利得以进行不受占领军影响的选举，这种选举又使立足于西方民主制的大政党取得对于共产党人的巨大胜利。所以，以后事态的发展就可以采取完全不同于德国，大体上也不同于捷克斯洛伐克的方向。

联邦议会于 1945 年 12 月 20 日选举卡尔·伦纳为联邦总统。各党派同意伦纳为总统人选，以便为国家在短期间内节省第二次

① 纳粹党(NSDAP)，其全称为：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党卫军(SA)和冲锋队(SS)均为纳粹党所属的武装，即所谓保卫组织。——译者

公民投票的费用，于是就没有进行公民投票。1945年新选出的人民代表机构需要解决重大的立法任务。在1946年6月28日的第二个盟国管制协定中，必需由盟国委员会对宪法法律表示赞同的规定受到限制，这在后来证明是对奥地利有利的。其他法律，如在三十一天以内没有军事当局的异议，即行生效，但是异议的成立需要军事当局取得一致，而由于在一些问题上苏联和西方国家平时就存在着分歧，一致性通常总是达不到。1946年确定的解决法无论如何缩小了危险的世界政治紧张局势对于奥地利国内政治的影响，使奥地利免受盟国对它的立法可能施加的更大的、甚至是破坏性的影响。

处理前国社党成员的问题需要经过冗长乏味的、难以令人满意的立法手续和裁判手续。1945年5月8日，政府颁布关于禁止纳粹党的宪法法律，该法律规定"有罪行的"和"罪行较轻的"国社党人必须登记。1946年7月25日，议会通过了内容丰富的《第一个国社党人法》，这个法律经过多次修改，多半是改重了的，后来，才获得盟国委员会的同意。它涉及大约五十二万四千个必须登记的人。1947年2月17日，通过《第二个国社党人法》竟然得以制订出一种暂行解决法。一般地说，在这些法律中规定的罪行后果首先影响到公务员，其中很多人被迫提前退休。受影响最大的是那样一些人群，他们的成员往往是在或强或弱的压力下才参加纳粹党或其保卫组织的。于1948年4月21日生效的大赦令使"罪行较轻者"，共四十八万二千人，免受法律所规定的赎罪义务。由于总统的赦免令和1953年对"有罪者"实行大赦，这个问题逐渐地得到解决。很明显，对于一群为数极大的人群，象通过国社党人法所尝试过的那样，用一种干脆的办法来解决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其实，重要的不是正式加入纳粹党，而是单个分子在1938至1945年

期间的实际表现。在德国实行一种比较麻烦的个别解决法，也未能完全切合要求。各种罪行，其中包括令人不快的战争罪行类别，由奥地利人民法院（暂时也由占领军的军事法庭）审理。一般地说，人民法院的裁判并不总是很理想的；它开始判刑过严，最后部分地实行颇成问题的无罪释放。

1946 年夏，7月26日，通过了关于大银行和关键性工业国有化的法律，对奥地利经济极为重要。在秋天里，9月 5 日，两个有关国家的外交部长卡尔·格鲁贝尔和阿尔奇德·德·加斯佩里缔结了关于南蒂罗尔的巴黎协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使南蒂罗尔问题重又具有现实意义。1944 年，一群意大利民主人士要求割让意大利北部和东北部有密集的异民族聚居的地区。奥地利未能为南蒂罗尔争取到自决权。意大利的东北边境上有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居住的地带(其中在伊斯特里亚，有些城市自古以来就由意大利人居住着）划归南斯拉夫，多德卡尼斯群岛归希腊所有，阿尔巴尼亚人、利比亚人、埃塞俄比亚人，最后还有索马里人获得了他们的自由，尽管如此，盟国却决定意大利继续保留布伦纳边界，从而把南蒂罗尔继续留给意大利。在原子弹时代，战略边界的论据已经不再具有意义，分水岭的原则对于南斯拉夫已经抛弃——现在，伊松佐河谷的上部属于南斯拉夫，下部属于意大利——在向意大利提出领土要求的所有国家当中，奥地利最弱，它处于四国占 534 领下，它的未来似乎仍未肯定。奥地利平时有许多事情应当感谢美国，但是，美国在对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所有敌对国家当中，总是主张对意大利予以优待，在要求给南蒂罗尔以自决权这个问题上，在所有盟国中，美国表示最坚决反对，后来对南蒂罗尔人和奥地利人的鄙微愿望也是如此。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对奥地利也是不利的。1946 年 5 月，奥地利外交

部提出将普斯特尔河谷和伊尼申-布伦纳铁路让给奥地利，这样一来留给奥地利的蒂罗尔部分(即北蒂罗尔和东蒂罗尔)在领土上就可以连成一片，可是这个要求于1946年6月被巴黎外长会议所拒绝。

在与意大利的双边谈判中，人们不得不试图至少要阻止法西斯方式的重复运用，并多少设法保证有遭到强制移民危险的南蒂罗尔民族集团的生存，这个民族集团在自己的乡土里有变成少数的危险。于是就缔结了1946年的巴黎条约。在这个协定中，不仅规定了以母语进行学校教学，在官厅中德语享有平等地位，南蒂罗人享有担任公职的平等权利，修改以希特勒-墨索里尼协定为基础的国籍选定法，在第二点中还规定了"区域性立法权和执行权的运用"。实际上，1947年6月27日成立了一个共同的特兰提诺-蒂罗尔的埃奇兰地区(博岑省)[1]，在那里，意大利人占大多数。在区域内部，南蒂罗尔(博岑省)得到一个邦议会和邦政府，其立法权有严格规定，这个立法权由于意大利政府一再提出异议，又进一步受到限制。意大利人不断地迁入；同1910年的七千人相比，1953年在南蒂罗尔的意大利人的人数达到大约十一万五千人，南蒂罗尔人选择德国和奥地利国籍者(约七万人)只有一小部分迁回来。

这样，1919年人为地和故意地制造出来的南蒂罗尔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奥地利和意大利之间的关系自1945年以来逐渐趋于正常，但这个问题却影响着两国的关系，令人颇为不快。然而，在1918年所有表示要参加德意志奥地利共和国而没有参加成，反而违反它们的意愿，被合并到其他国家去的德语民族集团之

① 特兰提诺-蒂罗尔的埃奇兰(Trentino-Tiroler Etschland)，在意大利北部的博岑省(Bozen)，埃奇(Etsch)本为意大利第二条大河流的名字，即意大利文的Adige(阿迪杰河)。——译者

中，南蒂罗尔人的命运比较地说是最顺遂的。南斯拉夫的德意志族人由于被驱逐和流血行动，几乎全部被消灭，南施蒂里亚人和克恩滕的米斯塔尔人[①]也都惨遭同样的命运。除此以外，南斯拉夫还向奥地利提出了地区要求，这些要求超出1920年的投票区域，除克拉根福以外，还涉及菲拉赫，以及包括拉德克尔斯堡在内的施蒂里亚边陲地带。后来这些要求减缩为盖尔和德劳[②]以南的地区。幸而这些地区属于秉公履行职务的英国占领军管辖下的地区，英军阻止南斯拉夫人使用暴力。居民愿意留在奥地利，那是毫无疑义的。由于斯大林和铁托发生冲突，南斯拉夫失去苏联对它的要求的支持，这个问题就被作出有利于奥地利的决定。 535

在被逐出祖国的前奥地利人当中，苏台德德意志人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他们同旧匈牙利的喀尔巴阡德意志人一样，于1918年受捷克斯洛伐克统治。他们的命运是西方国家的三个错误的决定所造成的，即圣日尔曼（1918年）、慕尼黑（1938年）和波茨坦（1945年秋）；最后提到的这次会议使三百万苏台德和喀尔巴阡德意志人丧失了他们的家园。不消说，驱逐行动早在1945年春就已开始，也就在大国实行“合法化”之前。回到奥地利的，尤以喀尔巴阡德意志人、南摩拉维亚人和南波希米亚人为多。1945年5月底，布伦纳德意志人实行了一次真正的死亡进军，伤亡数千人，他们先是走向国境，然后又前往下奥地利和维也纳。人们常常责备苏台德德意志人，说他们易于听信国社党的宣传，可是，匈牙利的和波兰的少数民族也同样不满，他们被违反心愿地归并于捷克斯

① 米斯塔尔（Miesstal），在南斯拉夫斯洛文尼亚共和国的东卡拉万肯地区。米斯河（Miess）为德劳河（Drau）的支流，有大铅矿和大钢厂。1918年，米斯塔尔由奥地利割让给南斯拉夫。——译音

② 盖尔（Gail，斯洛文尼亚称为Zilja），为德劳河支流，在奥地利的克恩滕，源出克恩滕阿尔卑斯山北坡，在菲拉赫流入德劳河。下盖尔河谷现属斯洛文尼亚。——译者

洛伐克国家;这一点也适用于斯洛伐克人的一部分,对于他们的民族独立性,人们曾有所争论。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使工业化程度高的苏台德德意志地区尤其受到影响,这危机加深了人们的不满情绪,如同自己的移民区受到捷克人颇有计划地渗入,也加深了人们的不满情绪那样。苏台德德意志的社会民主党人最初居于领导地位,他们从1929年起就执政,由于在当时的民族斗争和社会斗争中屡受挫折,并且在它在德国和奥地利的兄弟党垮台的影响下,拥护它的人大大丧失。强调民族主义的苏台德德意志党,虽然开头与国家社会主义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1935年该党占了上风,最后变成了国社党扩张政策的工具。尽管在西方,特别是在英国,人们认为苏台德德意志人争取民族自决的愿望是正当的,但是,慕尼黑协定签订以后不久,软弱无力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残存部分被536 消灭,这个被保护国中的暴力统治,以及后来爱德华·贝奈斯及其集团的技巧的而又毫无忌惮的宣传,最终导致大规模驱赶行动的认可。驱赶行动当然绝不是在"人道的"形式下进行的,它是人们在波茨坦所要求的,并且涉及到始终不渝地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积极反对希特勒进攻的那样一些德意志人。

迁徙的措施也涉及到匈牙利德意志人,这些措施一般地执行得比较温和得多,并且后来中止了。布尔根兰人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他们由于把故乡合并到奥地利,得以逃脱多么不愉快的、无论如何也是不可靠的命运,尤其是许多德意志人不得不离开他们在匈牙利西部边境地区和厄登堡楔形地(Ödenburger Zwickel)的家乡。罗马尼亚没有效法其他东欧国家采取驱赶行动,不过,在战争后期,有许多德意志人,尤其是内斯纳兰① 西本比尔根的萨克森

① 内斯纳兰(Nösner Land)为西本比尔根萨克森人移民区,在罗马尼亚西本比尔根北部比斯特里察周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那里的西本比尔根萨克森人大部分都已迁走。——译者

人,在德国的党、军机构动员下被撤出,这些人后来再也不能回到他们的家乡。他们中有很大一批人流落在奥地利。

被驱逐出境的一千三百万人中持续来到奥地利的只占极少数,约四十万,但是他们的被接纳和他们的活动对于共和国的经济却具有完全积极的意义。最初,广大人士对德裔归侨的苦难了解不够,过了很长时期,各政党和报界才敢于比较着力地为被驱赶归国的人说话。

1947年以来,奥地利内政的特点是,两个大党与共产党人的关系恶化。共产党人试图更多地影响国家的外交和内政,未果。但是,内阁还是一致——也就是说,在共产党的能源管理部部长卡尔·阿尔特曼博士的合作下——通过决议,奥地利加入马歇尔援助计划,这援助对于重建国家经济具有决定性意义。国家警察的共产党领导人被调到次要的岗位上,以及内政部长奥斯卡·黑尔默所采取的其他措施,这些都说明当时存在着困难,1947年11月,共产党人完全退出政府。奥地利共产党拒绝当时在议会里通过的货币保护法,以及其他一些原因,造成阿尔特曼辞职的契机。从此奥地利社会党和奥地利人民党的两党联合政府成了奥地利政治的主要特征。

1949年10月9日,民族院选举如期举行。在这些选举中,那些"罪行较轻"的必需登记者已有了选举权。除了两个分裂派别以外,"独立选举党"(WDU)第一次出现;新成立的"独立者联盟"(VDU),就以这个名称参加奥地利选举。独立选举党接纳了民族阵营中凡是不想结合于两大党的分子;这个新的由赫伯特·克劳斯博士和维克托·雷曼博士成立的党,其主要据点在萨尔茨堡,一度在上奥地利和福拉尔贝格,最弱是俄占区,在那里,一切非共产党人都希望联合政府的地位尽可能巩固。在这次选举中,比社 537

会党人更能站得住的奥地利人民党获得七十七席，奥地利社会党六十七席，独立选举党十六席，左翼集团五席，这个集团是共产党人和左翼社会党人的选举联盟，左翼社会党从社会党分裂出来，人数极少，以埃尔温·沙尔夫为首。工程师利奥波德·菲格尔领导的政府根据选举的结果进行了改组，内有来自奥地利人民党的部长七人，来自奥地利社会党的六人。

第二共和国内政的格调有别于1918年以后的，尤其是1927年以后的事态，那时已经没有各政党的自卫组织，人们普遍地放弃武装纷争，这是起了有益作用的。一个恶劣的例外是，1950年10月，紧接着工资物价协定签订以后，共产党方面发动了骚乱，其规模在俄占区，特别是在维也纳新城地区，尤其令人忧虑。那个工资物价协定是旨在用以在1952年以前保持国民经济平衡的协议之一，但并不总是成功的。在上奥地利，在共产党采取的这个行动的最初阶段，出现了与右翼激进分子的合作。经过几个震撼人心的日子以后，绝大多数居民的，尤其是工人和农民的抗拒情绪和坚定态度导致共产党人行动的销声匿迹。

1950年12月31日，联邦总统卡尔·伦纳逝世，他两次在艰难的局面下承担了领导奥地利共和国的责任，作为和解和稳健的政治家而经受了考验。新联邦总统将由人民选出；选举于1951年5月举行。如所预料，第一轮选举没有带来任何决定。无党派的、但是得到独立选举党支持的候选人布克哈德·布赖特纳，一个知名的内科医生，达到了引人注目的六十六万二千票，然而进入重选的是两个执政党的候选人，即上奥地利邦邦长海因里希·格莱斯纳博士（奥地利人民党）和维也纳市长特奥多尔·克尔纳（奥地利社会党）。独立选举党指示它的党羽，可以按自己的意思投票。实际上，在第二轮选举中，布赖特纳的选民似乎对这两位候选人都投

538

了差不多同样多的票，而第三个较小的集团则放弃投票。左翼集团支持特奥多尔·克尔纳。克尔纳以十六万八千票领先而获胜。所以，仍然维持以前对最高职位的分配法，由奥地利人民党产生政府首脑，由奥地利社会党产生国家元首。

1952 年菲格尔政府改组，人事有些变动，赖因哈德·卡米茨博士出任财政部长；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成功地稳定了货币。在立法期尚未届满时，1953 年 2 月就举行了民族院选举；选举结果表明，两大党在议会中的代表实力获得某些平衡。奥地利人民党以七十四席，勉强领先于社会党的七十三席，可是奥地利社会党却多得三万七千票。反对派丧失了席位，人们曾预料独立选举党可以得到较好的结果，但它只得到十四席，“人民反对派”(奥地利共产党和左翼社会党)得到四席。

一般地说，第二共和国的选举是在平静气氛中进行的，虽然还附带有一些哗众取宠的宣传。1949 年，奥地利人民党提出了所谓“红猫”①，并把社会党人说成是人民民主的倡导者，1953 年奥地利社会党以“年金钳子”进行报复。这些选举口号显然起了很大的作用。动摇不定的选民在投票时，表示出对一党统治的不信任，他们显然努力不使一个执政党能够大大压倒另一个执政党。奥地利人民党提出让独立者联盟参加组织政府的建议遭到社会党人拒绝以后，两党联合政府继续执政，由尤利乌斯·拉布(奥地利人民党)任新总理，奥地利人民党共有八名部长，六个部长来自奥地利社会党队伍，还有一个无党派的司法部长约瑟夫·格罗博士。外交部长暂时仍由卡尔·格鲁贝尔博士蝉联，此人 1953 年 11 月由工程师利奥波德·菲格尔接替，人们期望他能够同苏联外交官更好地接

① “红猫”(“rote Katze”)，这个词含有贬义，把社会党人骂成“红猫”，意为“赤色幽灵”，说他们嘴喊革命，实际并非革命。——译者

触。格鲁贝尔则出任大使，前往华盛顿。

改组是在为争取签订奥地利国家条约、为恢复奥地利的主权和撤退占领军而斗争的气氛下进行的。这场搏斗持续了几乎十年，人们不只一次对于在可预见的时间内是否能取得成功都产生了疑问。在 1946/47 年间，已经开始着手试探，争取有一个积极的539 结果。1946 年春天，后来又在 12 月，在纽约的一次大国的外交部长会议上，讨论了国家条约，当时可望在短时间内得出结果来，可是由于西方国家和苏联之间存在着矛盾，无论在 1947 年年初，外交部副部长在伦敦，还是 1947 年 3 月和 4 月，外交部长在莫斯科，对条约的内容都未能取得一致意见。主要的矛盾在于"德意志财产权"问题和当时苏联还出面支持的南斯拉夫对奥地利的大量领土要求。法国外交官谢利埃于 1947 年 10 月提交了一个解决"德意志财产权"的计划，该计划在 1947 年年底的伦敦外长会议上没有获得通过，但有些条款后来可以成为讨论的依据。

1948 年和 1949 年，人们继续就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谈判，重要的是，1949 年夏，苏联不再支持南斯拉夫的领土要求。这样，似乎很快就可以达成协议，在一项公报中提到，协议可望在 1949 年 6 月 21 日至同年的 9 月 1 日期间签订。但，不久以后又产生了那种司空见惯的麻烦，苏联最后把奥地利国家条约和的里雅斯特问题扯在一起讨论，它显然对于目前就签订国家条约不感兴趣。1952 年 3 月西方国家提出一个国家条约"概要"，写得对奥地利相当有利，但从一开始就没有被俄国接受的前景。

根据巴西的动议，1952 年 12 月，联合国全体大会向各大国呼吁结束对奥地利的占领。重要的是，次年，在印度的斡旋下，奥地利把准备以具体的形式宣布奉行中立政策的决心通知了苏联。斯大林去世后，出现了一系列和解的态势，1953 年 8 月，苏占区终于

废除了书报检查，西方国家撤回了国家条约概要，苏联、英国和法国放弃奥地利对占领费用的偿付——美国于1947年6月已经走在前面。1954年1月，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在柏林的一次会议上虽然许诺了缔结国家条约，但是由于他提出条件，即占领军在对德和约签订以前仍然留在奥地利，而使这个前景黯然无光。外交部长菲格尔正式宣布，奥地利愿意在军事上保守中立，但是，人们拒绝一个没有规定占领军撤退期限的条约。

540

莫洛托夫似乎还想坚持那个陈旧的俄国对奥政策，但是另一些见解在莫斯科已经盛行。人们希望，以和解的态度对待中立的奥地利，可以影响参加西方的北大西洋公约的小国，还可以影响西德，西德刚刚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约。此外，一个中立的奥地利（与瑞士一起）可以把西方在德国南部和意大利的军队分开。总之，苏联对于（苏联自己建议的）关于奥地利中立性质的维也纳三点声明反应良好；1955年4月，以联邦总理拉布和副总理舍尔夫为首的奥地利政府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从1955年4月12日至15日进行了谈判。这次的结果在“莫斯科备忘录”中记载下来。主要之点是，苏联取得适当的赔偿后放弃了它已取得多年的石油租让权、探矿权，以及在奥地利的其他财产。这样坚冰就被击破了。

在奥地利国民密切注视下，大使会议于5月2日至12日在维也纳举行，这次会议终于就条约的所有条款达成了企盼已久的协议。1955年5月15日，在维也纳贝尔维德雷宫，国家条约由外交部长莫洛托夫、麦克米伦、杜勒斯、比内和菲格尔签字。国家条约包括一个序言、九个部分三十八条、两个附件和五个清单。

原来在序言中提到奥地利对于战争负有某种连带责任，这种提法被删去了，这是很重要的。条约正文的第一部分包括政治和领土条款；在条款当中，第四条谈到禁止从经济上和政治上与德国

合并，第七条涉及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少数民族的权利。第二部分包括军事和航空条款，第三部分规定了盟国战斗部队的撤退，第四部分论及源出战争期间的要求，其中特别提到德意志财产权（第二十二条）。第五部分涉及联合国和各少数民族集团的财产、权利和利益，以及奥地利在盟国地区内的财产。这些财产，除在南斯拉夫境内的贵重物品以外，一律发还。第六至第八部分同样主要处理经济问题，第九部分包括有关解释和批准条约事宜的结尾条款。在两个附件中，第一个为国家条约中使用的名词战争物资下了定义，更为重要的是第二个，由于苏联放弃了许多贵重财产，使第二十二条发生根本变化，并使附在条约后面的五个关于此贵541 重物品的清单的内容成为不必要。关于这些贵重物品的抵偿办法，莫斯科备忘录中已有规定；预定的交付物包括价值一亿五千万美元的货物，以及一千万吨石油，作为石油企业的补偿费在十年内交付。在1958年7月奥地利政府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期间，对这些规定作了有利于奥地利的更改。对西方石油公司的赔偿则由1955年5月10日的两个维也纳备忘录作了规定。

按照以前的声明，1955年6月7日，执政党向国民议会提交了一项决定，为国民议会所一致通过。在这项决定中，宣布了奥地利的永久中立；关于中立的宪法法律亦由国民议会通过。国家条约的签字国——以及后来许多其他国家都对奥地利的中立表示承认。1955年9月和10月，最后一批占领军离开奥地利国土。经过十七年外国统治和监护以后，这个国家重又完全恢复独立。在将来保持这种独立，现在——不同于第一共和时代——已成为绝大多数奥地利人民的坚定意志。

1918—1955 年的人口状况

在奥地利最近这段历史时期中，影响这个国家的人口面貌的是两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困难所造成的后果。阵亡将士、失踪者、归国很晚的战俘、荒年、瘟疫和政治迫害的牺牲者、纷至沓来和到处乱窜的难民、由于经济或政治动机而出境移居的人，都使人口面貌增添了令人不快的特征，财产和物资的广泛破坏对这些特征还作了补充。此外，社会结构还发生了深刻的、往往可以直接了当地称为是革命的变化。人们坚韧不拔地致力于弥补损失，重新建立已被破坏了的东西，虽然采取的形式多半有所不同，使这个光景绝不致欠缺较为明亮的色彩，尤其是奥地利境内并不象欧洲其他地区，它没有由于采取激烈的出国移民措施而使人口状况发生翻天复地的变化。

1918 年决定性变动对于奥地利历史的重要意义已经从下述审慎的比较中看出：二元帝国的居民为五千一百三十九万，帝国的奥地利这一半为二千八百五十七万二千人，而 1923 年第一次共和国人口统计则为六百五十三万四千七百四十二人。自从这次人口统计以来，人口有些增加，但是较之弗兰茨·约瑟夫时代却慢多了。1951 年的人口统计表明，定居人口为六百九十三万三千九百零五人，从那时起，七百万的界线已被突破。国家的幅员，依照和约的规定，从整个君主国的七十六万七千平方公里（或内莱塔尼亚的三十万平方公里）降为共和国的八万三千八百五十平方公里。 542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后来共和国所属的疆域遭到约十九万人死亡，平民的损失同军人的损失相比，并不重要。由于战争而决定的流产估计为二十六万。在前陆军的最后战斗中，德意志奥地利人的损失所占的百分比最大，除他们以外，就是马扎尔人和斯洛文尼

亚人。在德意志奥地利人中，德意志摩拉维亚人，其次，克恩滕人、德意志波希米亚人、福拉尔贝格人和蒂罗尔人阵亡数字最高。许多战俘回国很晚，尤其是从俄国遣返的，尽管和约签订较早，但由于内战、距离遥远和交通困难等原因，被长期拖延下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损失更大，几乎每一个集镇的纪念碑都可以读得出数字，那上面列出了两次战争死难者的名字。并入德国的奥地利疆域的人口损失（据 1955 年的一次官方统计）为十七万零八百个军事死亡者，当时记载的七万六千二百名失踪者几乎全部应算在其中。此外，由于空袭和作战行动而丧命的平民有二万四千三百人（仅维也纳就有一万二千三百五十六人），这样，损失总人数为二十七万一千三百人，比第一次世界大战高得多。这一次下奥地利和上奥地利的损失相对地最高。战俘数字也很高，从东方遣返也再次拖了很长时期。1955 年，活着的战俘几乎全都回到祖国，为数大约五十万。

战争期间的人命损失主要落在男人身上，因此，同 1914 年以前的平衡状态相比，在第一共和国，尤其是在第二共和国，女性人口部分占据了很大的优势。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传染性疾病，特别是 1918 年和 1919 年的西班牙流感造成很多人死亡。两次大战以后，婴儿和儿童死亡率很高，不过采取了有力的对策。奥地利医生的积极主动和外国的援助，特别是美国供给食物的行动和儿童的前往瑞士、瑞典、挪威和丹麦，渐渐地使苦难得到克服。奥地利儿童福利事业一直维持到 1924 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供应状况长期都不好，可是，人们已经有了经验，救济行动很快就开始了。

543

惨遭政治斗争和迫害的牺牲者为数之巨构成奥地利人口总结中的一个黯淡的篇章。关于集中营中的死亡，以及经过和未经过

政治审讯所进行的处决几乎没有可靠的数字可言，然而死亡者却数以千计。对犹太人的迫害造成了许多人的牺牲。六万犹太人被放逐，和因经受毁绝性措施——尤其是在奥施维茨、卢布林、明斯克、里加和特雷布林卡①——而失去了生命；有些人得以迁徙出境或逃亡，但后来死于沦陷区，这种人的数目就难以估计。在奥地利，有信仰的犹太人的数目在 1938 年年初共有十八万五千二百四十六人，而在 1951 年人口统计时却只有一万一千二百二十四人。

除了战时那些戏剧性现象以外，奥地利人口结构发展得也并非顺利。在第一共和国，同以前比较，奥地利的总人口出现出生率大为下降的情况，而在 1935—1938 年期间，甚至出现死多于生的现象，这不仅是在维也纳如此，维也纳如同大多数大城市那样，总是出现出生率逆差，只是由于人口流入才得以弥补。1938 年以后，人口数字有短时间的增长，随后由于战争而出现退缩，以后才缓慢地回升。

入境、出境和国内迁徙对于 1918 年和 1955 年期间的人口景象也发生很大的影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中欧虽然没有采取过大规模的出国移民措施，而这种现象却伴随着第二次大战的全过程，在战争结束后，其规模更是空前巨大。总之，当时有大约二十六万德意志人迁出苏台德区，多半为城市各居民阶层的成员，其中大部分迁入奥地利。还有许多来自前君主国其他地区的前公务人员迁往那个残存的奥地利；当然，只有少数人被安排的工作能与以前的地位相称。另一方面，不少弗兰茨-约瑟夫时代的移民，如捷克人，又从奥地利共和国回到他们的祖国去。

在君主国时代移居海外之风甚炽，而在战争的间歇时期这种

① 在这些地方，纳粹分子曾用毒气、焚烧等惨无人道的手段绝灭犹太人。——译者

迁移则在较小的范围内进行。美国的份额制限制了厌倦欧洲的人移民进入传统的目的地的可能性，不过，美国仍然多半居于被追求的国家的头一名，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澳大利亚超越美国和544 加拿大而居于首位。在奥地利所属各邦中，布尔根兰由于不良而又趋于极端的农村占有制状况和微不足道的工业，其出境移民最多，有好几年甚至超过奥地利总数的一半。当然，也有许多出境者重又返回的。

至于国内人口迁徙，它反映在奥地利人口重点的向西移动之中，这种倾向尤其是在1938年以后可以看得出来。向西部迁移随着西部各邦，特别是上奥地利的加紧工业化而开始，在1945年则由于难民象浪潮翻滚似地来自奥地利东部而大为增强。同1923年人口统计时的水平相比，下奥地利各城市的人口数字保持稳定，有时甚至下降，如巴登和维也纳新城。布尔根兰由于传统的迁徙出境，人口出现下降。联邦首都维也纳的人口，在二十一个老区(二百七十八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从1923年的居民一百八十六万六千人，经过微弱的上升以后，于下一次1934年人口统计时达到一百八十六万七千四百人，而在1951年则减少到一百五十三万三千人；大维也纳市，包括1938年并入的区镇(共一千二百十五点四一平方公里)，1951年有居民一百七十四万四千人。1954年通过了行政区域变动法，“边缘区镇”交还给下奥地利，剩下的维也纳区镇(四百十九点九二平方公里)则仍有一百六十一万六千居民。由于1938—1945年的种种事件，人口明显地下降，后来这种下降趋势才逐渐为轻微的人口增长所代替。1918年以后，后继国家的政界和科学家人士，还有奥地利各省的惯常酒客都曾幸灾乐祸地预言：首都将不可阻挡地衰微，可是，衰微并未出现，该城的生命力即使在两次世界大战以后那样残酷的条件下还是挺过来了。

在联邦东部,人口运动的趋势是停滞的,或者倒退的,与此相反,西部则呈现另一派光景。上奥地利,尤其是它的首府林茨,由于地处共和国中心位置,且有现代工业设施,人口增长绝对值最大,而萨尔茨堡则人口增长相对值最大。在施蒂里亚,人口的增长集中在传统的上施蒂里工业区,特别是在卡普芬贝格及其周围。在克恩滕,菲拉赫由于交通便利,人口增长速度快于邦首府克拉根福,该城仍然是克恩滕人口最多的城市,而且遥遥领先。蒂罗尔和福拉尔贝格得益于人口的西移,因此而相应地增加了人口。在萨尔茨堡跨过了十万大关以后一个时期,因斯布鲁克作为奥地利第五个城市跨过了这个大关。对数字作总结比较就可以看出,联邦 545 西部的六个邦,在 1934—1951 年期间,人口数字增加了五十六万,而维也纳、下奥地利和布尔根兰则减少了三十九万。在共和国,在整个联邦范围内,农村人口不断流入城市,这几乎不必着重叙述了。

1952 年,奥地利共有来自苏台德区和东南欧的德裔难民三十八万八千人,这些人已部分地取得奥地利国籍。在战争期间,根据第三帝国缔结的条约,德侨纷纷从东加利曾亚、布科维纳、比萨拉比亚、多布罗加、波斯尼亚和戈特舍[①]来到奥地利,此外还有许多南蒂罗尔人;从 1945 年起,被驱赶回国者的大浪潮开始掀起。难民是一项宝贵的劳动潜力、在农业中恰恰是不可缺少的,正如在另一个地方曾经提到过的,人们总是不懂得把他们保持在乡间。在五万非德意志流离失所难民当中,只有一小部分留在奥地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服劳役者或战俘而居留在奥地利的外国人约有五十万,后来几乎全都回国。从 1945 至 1959 年,大约有

① 戈特舍(Gottschee),今为南斯拉夫的科切维(Kocevje),在斯洛文尼亚(克赖因),以前该地居民操德语。——译者

一百六十万各种国籍的难民时间或长或短地在奥地利居留过。

我们还要提到寻找各种职业者的季节性流动，首先是帮助收割者和建筑工人，其次要提到从1945年起，成千上万就业者在工作地点和离得很远的住家之间每天或每周往返交通的大为增加，最后还要提到旅游事业，它对奥地利具有特殊意义。在本世纪内，战争、政治、经济、现代人对休息的需要和对旅行的乐趣，引起了本世纪的人口移动，较之从前被人们习惯地称为狭义的民族大迁徙的那些远征，它们使更多的个人经常流动和不得安宁。

再者，自1918年以来的几十年历史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奥地利人口的社会状况和职业状况有了很大的变动。对1910年、1934年和1951年人口统计时所作的职业集团的归类作一番比较，就可以看出，在主要类别，即以农业、林业为一方、工业和工艺为另一方之间的明显移动。农业人口从31%（1910年）下降为27%（1934年）和22%（1951年），而工业和工艺却是明显地从32%上升到 546 33%和37%。差役和家庭佣工的百分比显著地从4%降到1%，而退休者和领年金者的百分比则从10%（1910年）上升到15%（1951年）。此外，商业和交通部门的某种下降趋势也是明显的，其原因应归之于实行越来越多的节省人力的技术化，而不是经济意义的减少，此外公务人员和自由职业者的增多也很明显。职业妇女的高百分比是职业统计数字的另一个特点，它虽然有波动，但包括就业人员的百分之四十。

民族问题始终是哈布斯堡君主国的主要问题，一直到最后都没有得到解决；众多的少数民族使君主国的大多数后继国大伤脑筋。不过，奥地利共和国在语言方面还没有举足轻重的少数民族。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少数民族，尤其是匈牙利和捷克少数民族，在人数上不多，由于同化和出境移民人口更加减少。1951年，大

约有三万零六百人(全奥地利共有三万四千人)自报属于最大的少数民族,即布尔根兰的克罗地亚人。

共和国的经济史

考察第一和第二共和国时期奥地利经济发展，首先不可避免地发现,君主国时幅员辽阔，共和国时疆土狭小，以及两次大战的影响和后果得到克服，这两个问题应当是主要着眼点。1918 年以后,奥地利人，以及它的邻居、专家和其他阶层人士都提出这样的问题,新成立的小奥地利究竟能否生存;尤其是不仅多瑙河地区的政治和经济一体性已经破裂,而后继国,特别是得天独厚的捷克斯洛伐克,都实行严密的闭关政策。这样提问题时,明显地存在着心理因素;共和国受到战胜国和它的仆从国的虐待,又受到不愉快的时代现象之苦，它的收入微小，手头拮据，这是令人很不舒服的。这种思想加重了合并问题中的经济政策困难。在二十年代末期，这些声调逐渐消失，在 1930 年的经济危机中却又可以重新听到，这次危机在奥地利的影响特别强烈和持久。无论如何，怀疑者长期占着上风,到了第二共和国时期,人们对奥地利的经济能力才比较有信心，正如政治上的国家意识抬头那样，虽然 1945 年的开端困难还要比 1918 年的大，破坏、拆卸和占领区都使情况变得更为严重。 547

农业状况似乎受 1918 年的变动影响最小。匈牙利的强有力竞争的消除使生产谷物的农民的生存斗争变得容易些，山区农民的状况也略有改善。农庄被迫拍卖的数字迅速下降。随着布尔兰根的归还，奥地利有了一个对供应维也纳颇为重要的农业盈余地区。虽然 1919 年以来进行过种种改土工作,以争取更多的可耕土壤,但是，奥地利的耕作面积却在减少，因为用于其他目的的设施

和建筑要占用土地，这就不利于耕作地的扩大。不过，这种损失由于公顷产量的增加而得到弥补。在两次大战期间，畜牧业由于征用和供养政策上的引导措施不当而造成损失，但经过一段时间，损失得以克服。本国的牛奶业在供养人民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奶制品终于成为出口商品。在合并(1937年)以前，奥地利农业生产供应奥地利全国人口所需的食物的81%，而在占领结束时(1955年)，则达到85%。

1919年以来，农业机械化有所改进，速度最初缓慢，后来迅速。特别是自从1946年以来，拖拉机、摩托收割机、收割脱粒机、电动机的装备获得巨大的进步。在通货膨胀年代里，农民所受的影响一般地小于城市居民，农业合作社虽然处境也很困难，但从那时以来却能够继续有力地发展。工业的扩展、普遍的机械化、在民主和专制时期政治势力对农业人口的重大影响，征召人员参加防务和战时勤务，旅游事业，凡此种种因素都突破了农民与其他居民隔绝、与城市生活方式无涉的状态。到处都提出了这样的任务：要维持和保护农民的传统价值，但是也应让他们享受当代技术和教育所提供的种种便利。农业专科学校的活动开始逐渐取得成果，虽然在这方面奥地利还是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如瑞士和丹麦。

林业的作用在奥地利共和国也是很大的。木材仍然是奥地利经济的最重要原料，木头和木制品(包括纸张)都是最重要的出口商品。在两次大战期间和后来的战后年代里，森林的存木量都被548 充分利用。曾多次警告人们防范滥伐林木的危险，不允许无法弥补的损害发生。

在第一共和国成立之初，工业和农业就其对奥地利国民经济的意义来说，是接近平衡的，这种情况从就业人数和生产数字中可以探测出。在第二共和国，工业以快于农业的速度恢复和繁荣起

来，尤其是工业生产由于采取了援助措施而大大得到了方便。破坏和拆卸，在生产一度大为衰落以后，得到了克服。把1918年以后的工业发展和1945—1955年的工业发展作一比较，对比完全有利于第二共和国。这个共和国没有那种——不仅限于工业，但是在工业范围内影响最大的——大批失业现象，以及因危机而引起的，如同1931年所发生的那种生产大幅度下降。除了1952/53年的稳定危机和季节性波动以外，人们反而逐步达到全面就业的水平。不同于第一共和国时的情况，1945—1955年期间，人们多半不使用罢工这种工会斗争方式，仅限于进行艰苦的谈判，谈判通常以妥协告终。足以说明特点的是，共同的工会联合会取代了政治上有倾向性的派别工会。由于西部各邦的工业化，工业的布局在整个国家范围内就比较以前均匀些，虽然维也纳盆地仍然是最大的工业区。1918年财政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亏空，1945年以后由于外国给予极为慷慨的援助，尤其是美国在马歇尔计划范围内所给予的援助，才得以弥补起来。另一方面，1946年6月27日，苏联接收了它所属的占领区内的“德国财产”，交由“苏联驻奥地利财产管理局”[①]管理。在这样被攫取的贵重物中，工业企业和石油企业占主要部分，虽然也有许多农业企业被攫取。“苏联驻奥地利财产管理局”的活动(特别是在进出口方面)几乎无法检查，因为它纳税不足。“苏联驻奥地利财产管理局”的企业不受1946年和1947年的国有化法令的影响。对“苏联驻奥地利财产管理局”所起的作用自然不能估计过高，它所经营的企业仅仅占整个奥地利工业生产的5%。

由于上面提到的国有化法令，奥地利工业的所有制关系发生

① USIA，俄文：Uprawlenije Sowjetskowo Imuschtschestwa w Awstrii(苏联驻奥地利财产管理局)。——译者

了很大的变化。法令涉及到"关键工业"(矿冶企业、钢铁及其他金549属大工业、原油提炼和加工、交通业和电子工业企业)以及大银行。企业的经营以后按商业原则进行。国有化企业在整个奥地利工业生产中所占的份额,在采取了必要的重建措施和收回前"苏联驻奥地利财产管理局"的企业(1955 年)以后,大约达到 25%。

总之,人们可以这样说,1918 年和 1945 年的经济恢复是在不同的条件下进行的,并且在这两年以后奥地利经济的发展和结构也相应地发生很大的区别。决定这些区别的若干因素已经提到过,此外,自 1945 年以来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在第一共和国时代往往互相仇视的大政治阵营这时携手合作了,在经济领域里也是如此;并非没有尖锐的矛盾,可是仍有联合的倾向。结果是,奥地利的工业生产 1955 年比 1937 年增长 119%,也就是,两倍还多。

在第一共和国期间,奥地利铁矿石的开采呈现一派令人不快的景象。阿尔卑斯矿业公司虽然大大改善了它的企业的技术装备,但是产权一再易主,从意大利人手中转入德意志人手中,工人为数众多,但大多数不熟练,在政治上倾向于走极端,而企业的领导却充满自信,他们代表着非奥地利集团的权益。战前的生产数字没有达到。与采矿业关系密切的钢铁工业取决于世界市场上的波动的程度颇大,相应地,从 1930 年以来,经济危机带来灾难性的影响,虽然后来欧洲各国相继扩充军备,产生了某些新的刺激。总的说来,炼钢工业落后于铁矿的开采;然后就发生有利于原料的生产重点的改变。在战争期间,投入了外国工人,生产上升了,等到后来盟国飞机来空袭,生产又呈现倒退的趋势。除了上奥地利的钢铁工业区以外,战时新成立的林茨工业区具有特殊意义。国有化法令涉及所有大钢铁企业,如,首先是阿尔卑斯矿业公司、伯勒

尔兄弟公司、舍勒与布勒克曼公司，以及合办“联合奥地利钢铁厂”的林茨集团。有了马歇尔计划的资助，企业得以重建、现代化和扩充。一种新的炼钢法特别适合奥地利的原料状况——生铁充足，550 而废铁却很少——这种林茨-多纳维茨法（即 LD 法）后来也被奥地利其他邦所采用。它使奥地利的钢有可能进入世界市场。

除了铁矿业和仰赖于它的工业以外，铅和铜矿的开采利用也大大落后；这两项开采不足以完全满足奥地利的需要。在第一共和国的危机时期，开采铜矿甚至一度停顿。然而，施蒂里亚和下奥地利所开采的石墨却大部分输出国外。历史悠久的采盐业由于技术装备陈旧而备受影响；人们仅限于满足国内的需要。产量高的奥地利菱镁工业，无论在开采矿石和对它的加工方面，得以大大扩充其能量，因而它作为出口工业所具有的意义在第二共和国时期变得更为重大。由于建立了兰斯霍芬冶炼厂，铝生产的发展令人印象深刻，1954 年产量达到 1937 年的十三倍。

在现代经济中，对热值的需求极其巨大，能源部门就获得特别的意义。对于奥地利，有三种主要能源具有特别意义，这就是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以及电。

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大煤矿无一例外地都位于日后的共和国国家领域以外；但是，它在施蒂里亚还有不容忽视的褐煤矿层；在上奥地利、克恩滕，在布尔根兰都有可利用的开采地。奥地利煤的需求量的大约六分之一（以硬煤为基础计算），在二十年代在国内可以得到满足，而且还不必加紧开采。在第二共和国时，本国的采煤业实行现代化并大大扩充；在国家条约时期，褐煤的年产量超过六百万吨，几乎高于 1919 年以后几年的两倍。

自从第一共和国末年以来，到那时仍未被利用过的宝藏——下奥地利石油，后来又加上天然气，使能源经营部门如释重负。起

初共和国没有自己的油田，但是，1930年在魏因恩菲特尔探出了油储藏，1934年和1935年先后在格斯廷和齐斯特尔斯多夫进行开采，1949年，开采的重点转移到马岑大油田。上奥地利的开采活动仅导致微小的结果。在第二共和国时，天然气的开发有很大的意义，以前却是未加利用就放掉了。开采出来的石油——总产量从1937年的三万三千吨上升到1955年的三百六十六万六千吨——对奥地利自然没有好处，因为从1938年起，加紧开采首先为德国的战争经济所利用，1945—1955却又主要为苏联所经营的“OROP”公司[1]所利用。1955年以后，根据国家条约，作为向奥地利交还石油企业的补偿，大量石油不得不交给苏联，西方的石油公司也提出赔偿损失的要求。

551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已经是应当较前更多地利用阿尔卑斯山的水力来发电的时候了。实际上，由于缺乏资金，大概还由于过多地照顾到采矿资本家的利益而没有大力进行，终于在1937年时，本国的电力生产的大部分由水力来承担。在并入第三帝国时，人们就设法为鲁尔区的工业而扩建奥地利的水力发电厂；福拉尔贝格的罗东德大水电站就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1945年，由于战争损失，大部分发电厂都停顿了；电力的分配就成了问题。大项目均适用于国有化法令条款的规定，1938年以后决定了的建设计划继续执行，还新创建另外一些。在卡普龙、普鲁茨-伊姆斯特、约亨施泰因、赖赛克-克罗伊策克，以及恩斯发电厂群就是这样产生的，多瑙河的伊布斯-佩森博伊格发电厂也开始建设。若干个（烧煤的）热电厂也建立了起来。这样，本国最重要的能源——水力，在第二共和国时代得到了相应的利用，1955年发电量为8,417百万千瓦

① OROP，俄文缩写，意即“苏联驻奥地利石油产品贸易股份有限公司。”——译者

小时，而 1937 年仅为 1,883 百万千瓦小时，可是，奥地利的总耗电量大约增长了四倍。在水力利用方面，奥地利总是落后于它的西邻瑞士。

以本国农、林业为基础的加工工业，如木材加工业（包括植物纤维素和纸的制造）、制糖和酿酒等，对于两个共和国的经济都起着相当重大的作用。在二十年代中期，纸张和植物纤维素的制造很快就达到战前水平，而且不久就大大超过了这一水平。这个工业部门很少受破坏和征用的影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得很好。甜菜在第一共和国时有几年歉收，以后却产量大增；又兴建了两个新厂，恩斯（1929 年）和图尔恩（1937 年）。1932 年，人们就已不仰赖于从捷克斯洛伐克的进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初期也发生过很大的困难，后来恢复工作进行得很快，尽管生产增加 552 了，急剧上升的国内需求仍未完全满足。

化学工业的某些产品，尤其是植物毛的制造，与本国的木材加工业有一定的联系。奥地利在伦青有一个世界上最大、生产能力最强的植物毛工厂。化学工业的另一个生产领域——肥料的制造，构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兴建的林茨氮肥厂的主要部分，该厂多半为出口而进行生产药品、颜料和漆的制造，在奥地利化学工业范围内，具有重大意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就业人数众多而对国民经济颇为重要的纺织业需要克服一些特殊的困难。在君主国，多瑙河地区和苏台德地区的企业之间存在着极其协调的合作关系，这种关系在 1918 年以后部分地消失。人们必须寻找新的方向。1923 年以来，纺织业的发展很令人满意。在危机期间，产量自然减少了一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纺织业又要克服很大的开端困难；1955年，人们的生产大大超过 1937 年，虽然纺织业、制革和制鞋业

没有别的工业部门的产量提高得那样可观。除了棉产品以外，纱线和植物毛做的商品越来越多地崭露头角。在两次大战以后，福拉尔贝格的花边和刺绣业很好地弥补了挫折，在第二共和国时期，约占纺织业出口量的四分之一。成衣业的妇女服装、浣洗衣物和帽子，在制造和出口中经常占有重要份额。

建筑业从1918年以来大部分任务都来自公共机关或工业，移民村和住宅建筑合作社也参加进来，而私营的住宅建筑则由于房租收入低微而了无生气。这种趋势在第二共和国时仍然不变。1932年，维也纳市通过了一个庞大的住宅营建计划，至1934年，从营建税款项中修造了不下六千四百套住宅。战后，在第二共和国，许多地方都要建筑业大力进行修建，以弥补广泛的战争损失。553 如果说，在联邦领域内，有二十多万所住宅毁于炸弹、炮火和局部的作战行动，那么，工业和交通建筑，以及公共建筑的损失也同样惨重。在从战争结束到国家条约签订这十年里，在奥地利大约有三十四万七千所住宅得到修造、恢复和装璜。

在1918年以后缩小了的奥地利，玻璃工业起了一定的作用；与波希米亚工业的有限度的合作逐渐又恢复起来。蒂罗尔的玻璃装饰品的制造占有很重要的地位。1945年以后，玻璃的需求大大增加，这个工业必须既为建筑业，也为出口的目的而开工。久已驰名的加布隆茨工业①的一部分在奥地利已经立足，最初存在着很大的困难，但后来却能够为出口进行重要而紧张的生产。光学仪器的生产，特别是显微镜和窄胶卷照相机的生产也发展得很顺利。

在机械化不断增长的时代，交通工具工业具有巨大的意义。

---

① 加布隆茨工业(Gablonzer Industrie)，即玻璃器皿工业，加布隆茨，德文地名，即现在的捷克斯洛伐克的雅布洛内茨(Jablonec)。——译者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已有许多奥地利公司从事汽车制造。格雷夫与施蒂夫特公司成立于1902年（它的前身已成立于1895年）；后来，该公司以出产性能强的大型卡车而出名，出产这种卡车的还有奥地利绍雷尔工厂（1906年）和弗罗斯-比辛工厂（1908年）。战争结束时，施太尔工厂改而从事交通工具的生产，1926年，它与另外两家有名的公司合并成为施泰尔-戴姆勒-普赫股份公司。1925年，维也纳新城的戴姆勒工厂不得不停工。这家大企业的产品极其广泛，其中有自行车、载客和载货汽车，后来又有拖拉机、摩托车、轻便摩托车、和摩托自行车。奥地利-菲亚特公司（1907年）与意大利总公司密切合作，经常起着重要的作用。二十年代初期以来，奥地利的两个最重要的设计师汉斯·勒德温卡和费迪南·波尔舍离开本国的工业，这对奥地利的汽车工业发展当然是不利的。后来，波舍尔的设计工作因建造大众汽车而为众所周知，1945年以后曾想使他的设计工作在克恩滕安家落户，但没有取得持久的成功。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交通工具工业获得了巨大的高涨，这一点从拖拉机、摩托车和载重汽车的出产数字猛增之中尤其可以清楚地看出，而在第一共和国时期，主要的载客汽车生产曾一度停顿。

奥地利铁路由于1919年的和约而丧失了它的铁路网的百分之七十五，其中有很多是繁忙的平原线路，但是，造价昂贵的山区铁路大部分都保留了下来。留给奥地利的铁路设施，由于接受了后继国的工作人员，人员总数大大增加。奥地利联邦铁路从1923年起作为独立的经济单位经营，在收支上大抵都是入不敷出的，后来由于厉行节约，大力裁减人员，情况也就好转起来。1938年以后，人员重又增加，战争的进行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后来就是长时期的破坏；三百八十一座桥梁，由于全部被毁或破损严重而无法

554

使用，损失的火车头有半数以上，以及可用车厢的大部分。在第一共和国，电气化进行得很迟缓，在第二共和国则大大扩大，战争创伤的消除、早就需要进行的更新工作，尤其是过分的养老金负担，凡此种种都导致巨额的财政赤字，尽管经营和交通效率提高了。

1919 年以后，交通状况的一个主要因素是，由于载货和载人的汽车运输增加而出现了铁路和公路之间的竞争。在第一共和国和等级制国家里，公路建筑的成绩是值得称赞的，特别应当指出，在弗兰茨·弗里德里希·瓦拉克领导下修造的大格洛克纳阿尔卑斯高山公路和维也纳高山公路。第三帝国的大规模的公路修造计划在战争爆发前已经停顿，在奥地利却几乎没有发生影响。1945 年以来，在消除战争创伤以后，由于机动车辆大增，公路上的交通频率大幅度提高；事故之多证明，人们未能完全适应机动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奥地利成了一个内陆国家，它失去了它的远洋船队。在欧洲内海的运输线上，只是偶尔有几只船挂着红白红旗帜。然而，在多瑙河上，第一多瑙轮船公司虽然损失了许多船只，仍然是航运方面的主要企业，它保有它的匈牙利煤矿和布达佩斯船坞。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了新的船只损失，以及被纳入苏联索取德国财产的范围内。在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财产全然丧失殆尽。后来，国家条约又使多瑙河航运有了新的前途；今后这条河流对于煤和石油的运输，以及对于林茨和维也纳工业区的货运，仍然很重要。奥地利湖泊上的航运主要为旅游业服务。

欧洲的航空事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开始发展，奥地利由于所处的位置，在欧洲航空事业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自从 555 1923 年以来，奥地利也有了自己的航空公司（ÖLAG），该公司 1938 年被清算。1945 年以后，空中交通大为频繁，在国家条约签

订前,航空完全由外国公司经营。

在第一和第二共和国的经济中,旅游业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此外,它对于国家在全世界和欧洲的政治和文化地位也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不仅美丽的风景、矿泉疗养地、夏季和冬季运动场吸引外国人来游览,而且专供从事艺术和科学活动的文化胜地也是如此。旅游事业除了作为赚取外汇而具有国民经济意义以外,它联系各国人民的作用无论如何也是不容忽视的。

第一共和国的旅游业和第二共和国的旅游业之间,在结构上存在着某些显而易见的变化。从频繁的程度来看,蒂罗尔、萨尔茨堡和克恩滕仍保持着传统上的优先地位;但,从外国观光者的国别来看,君主国的后继国和东欧已普遍地减退,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则达到旅游业频率的百分之七十左右。

现在我们来看看贸易。在君主国时代,对外贸易就其规模来说虽然具有重大意义,但是同奥地利-匈牙利这个大范围内的国内商业相比较,却是大大落后了,而奥地利共和国象几乎所有的小国那样,在很大的程度上都依赖对外贸易。不用说,人们在 1918 年时曾经遇到严重的开端困难。和约中关于最惠待遇的片面性条款,特别是后继国的封锁政策,使得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不能通畅无阻地进行。后继国之间的贸易只达到君主国的国内贸易的百分之十五左右。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设法唤起国内外对奥地利经济的兴趣;1921 年的维也纳交易会就是从这些努力中产生的,这个交易会发展得相当令人满意。

此外,第一共和国的奥地利对外贸易曾经发生过极大的波动,而从 1945 年至 1955 年期间的对外贸易却具有稳步上升的特点。输入值还是大于输出值,不过数额当然有所不同,1920—1929 年期间亏损额很大,从 1931 年至 1937 年则减少,可是在危机年代

里，整个对外贸易量锐减。对外贸易的亏损主要表现在谷物、食品，以及矿物原料（煤、石油和石油产品）的入超方面。工艺原料和556 半成品方面的对外贸易也是有亏损的，而制成品的对外贸易却有盈余。此外，木材、木材制品、铁、钢、纸、纺织品，在第一共和国和第二共和国，无论从数量和数值方面来讲，都是最重要的出口商品。在各输入品的出产国当中，1927 年以前，先是捷克斯洛伐克占首位，第二位是德国，德国后来占据领导地位。就出口而言，德国从一开始就占第一位，跟着是捷克斯洛伐克，捷克斯洛伐克后来退居第三位或第四位。对外贸易中的其余地位则由匈牙利、意大利和波兰交替地分占。在第二共和国，对外贸易总量持续增长，无论进口还是出口都是如此。从地理方面看，第一共和国时期，东西方贸易接近平衡，而在第二共和国时代则明显地倾向西方。作为贸易伙伴，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只不过起着微不足道的作用，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则占据远为重要得多的第一位。

1918 年以后，奥地利货币最初呈现一种极其令人厌恶的景象。世界大战时，特别由于货币流通量大增经费才得以筹措；君主国崩溃以后，发行了应急货币，后来那在战争期间已经贬低了的币值就跌入无底深渊之中。在这场灾难里，恶劣的投机倒把活动也扮演了自己的角色。外汇的经营运用失策，财政崩溃。1:14,000 的贬值率，与德国的通货膨胀相比，还是远远不如，可是，自然而然的后果是，所有储蓄存款都变得毫无意义。国债在战争期间曾大为增加，但由于它没有同黄金价值相联系，而变得极大地缩小，私人债务亦复如此。后来，由于采取了 1922 年日内瓦整顿行动所规定的以 1:10,000 为基础的先令对克朗的比值，重建工作才得以进行。新发行的先令后来却证明是一种相当稳定的货币。土地信托银行和信托银行的倒闭，当然动摇了人们对奥地利货币制度的信

任。由于采取了一种通货紧缩政策，重新巩固了先令的地位——人们骄傲地称之为"阿尔卑斯元"(Alpendollar)。人们没有努力去增设工作位置，而去大力稳定币制，人们显然畏惧通货膨胀更甚于畏惧失业。

第三帝国垮台以后，货币状况也是一片混乱；1945 年 12 月，重又采取先令为货币，但是，情况仍一如既往，钱钞泛滥，商品则奇缺。1947 年底的货币改革很成功，可是，赖以维持工资和物价结构中的合理关系的五个工资和物价协议体系只是奏效于一 557 时。1952 年初，做到了币制的普遍稳定，人民对货币又有了信心，存款开始大量增长。

在第一共和国，银行和信托事业发展得很不顺利。维也纳在君主国中起着资本和金融中心的作用；最大的银行的总行都设在首都，一个分行形成的网遍布君主国所属各省。1918 年以后，共和国以外的分行都被系统地停办了。试图扼守或夺回难以据守的阵地，曾使奥地利付出很大的代价；由于后继国在经济上非常自私，奥地利的尝试无全成功的希望。短期的外国借款徒然使债台高筑，每一次外国外汇的撤回都威胁着奥地利银行机构的生存。在通货膨胀时期，新成立了几家投机性银行，但不久就全都消失。声誉卓著的机构也有倒闭的；如 1924 年，总存款银行(Allgemeine Depositenbank)，1926 年，德意志中央储蓄银行(Zentralbank Deutscher Sparkassen)。1926 年，英奥银行被强行合并于信托银行，1927 年，交通银行被强行合并于土地信托银行；这家银行本身于 1929 年又不得不合并于信托银行，后来，1931 年春，这家奥地利最大的银行不得不关门，由于联邦采取了开支浩大的整顿行动才得以挽救过来。国营银行，如邮政储金局（1926 年）和国民银行(1931 年）均陷于极大的困境。在等级制时代，"凤凰"保险公

司的倒闭是极不幸的，该公司不同于那些银行，1918 年以后还能保存它在国外的分行网。在这一事例中，国家也不得进行挽救。

1946 年，三个最大的奥地利银行，信托银行团、奥地利万国银行和奥地利信托银行，由于第一个国有化法令而被接管，成为奥地利共和国财产；它们在战时和战后都失去了很大一部分资本，只有国家才能继续经营它们。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战胜国多半踌踌蹰蹰而且往往是在苛刻的政治条件下才给奥地利以贷款的援助——在资本比较雄厚的外国，人们简直就缺乏政治远见，看不出长期经济危机会带来何等灾难性的后果——而第二共和国却在马歇尔计划范围内，特别从美国得到了强有力的、不必偿还的援助，援款从 1945 年到 1955 年达到一亿六千万元之钜。必须着重指出这个援助对于重建奥地利经济的意义。

558 在第一共和国和等级制国家里，币值稳定是做到了，但是在就业问题上却失败；在危机时代，那怕是接近全面就业都达不到。在复兴时期，失业曾一度大为增加，恰恰是在通货膨胀时期，失业却显著减少；在随后的二十年代，增长的普遍倾向至为明显。1933 年冬天，失业人数达四十万，夏天达三十七万五千人，创造了可悲的纪录。后来又缓慢地回跌，但 1933 年的水平仍然是，受救济的失业者，在冬天里仍然有三十九万八千，在夏天里有二十八万一千。此外，还有数达三十万没有救济的“停发补助金者”（Ausgesteuerte）。受影响最大的是重工业（冶金工人）、建筑业和广大职员。从经济政策上试图克服失业现象没有取得彻底的成功。在第二共和国，失业人数大都有限；在 1952—53 年的“币值稳定危机”，失业人数上升，但不久就被克服。季节性波动自然是很大的，广泛

的充分就业状况到了1955年以后才能达到。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在西里西亚纺织工人之子、国务秘书费迪南·哈努施倡导下所进行的有力的社会立法建设，毫无疑问，应属于第一共和国立法活动的积极成就之列。那些法律涉及到的，其中有维持失业者生计的救济措施、以及关于调解处和集体契约、八小时工作日、工人局的成立和疾病与意外事故保险的法规等。在危机年代，人们自然倾向撤销部分社会立法。1945年以后，扩大了对老年人的救济和对家庭的帮助。

在1918年以后的年份里，经济困难、个别的和较大的集团的生存所遭到的危险，与政治上的不快结合在一起，使那个由于关系紧张，以致人们在境内不能互相团结的国家受到来自外部的威胁而难以为生存而进行斗争。1938年以后的经历唤醒人们对第二共和国这个奥地利国家采取比较积极的态度。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顺利，这种态度又得到加强和巩固。

精神生活。科学和艺术

在共和国成立初年，尽管眼前存在着种种艰难困苦，但是，超越当前苦难而进行谋划的主动精神并不缺乏。就制宪工作和社会立法来说是如此，就教育和培养事业方面的努力来说也是如此。争取实行教育改革的努力，与副国务秘书兼维也纳市教育委员会主任奥托·格勒克尔的名字关系尤其密切，在教育界和政界经过长期而又颇引人入胜的争论，最后终于迎来了1927年8月的教育法。比组织工作更为重要的是初等和中等教育中的方法革新和教学革新，这种革新获致一种儿童既易于接受的、又易于诱导独立思考的劳作及体验教学。人们把联邦教育机构办成新型的中等学校。理科高等学校增添了一种国际贸易学院（以前称为出口专科 559

学校)。大众高等学校①网也扩大了。第一共和国(还有第二共和国)的教育工作的另一个特色是,对幼儿园和托儿所以及特种学校的关怀。此外,在教学大纲和教科书中很清楚地反映了时代的世界观和政治倾向。经过1938—1945年的插曲以后,出现了艰巨的重建任务,首先是脚踏实地地紧急修建许多被摧毁的学校建筑。新建专科学校和职业学校、扩建艺术高等院校、促进极为活跃的青年组织照料校外青年的工作,这些都是在整个1918—1955年间值得注意的。

青年运动的活动尤其值得特别注意。它的开展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已开始,在1918年以后,它的发展速度更快,往往迅猛得象暴风骤雨。天主教的、民族的、社会主义的,以及中立的团体并肩而立。尽管在其他方面存在着种种差异,但是,它们的共同点是,争取改革公私生活方式,对当代问题采取感情用事的态度,更重要的是有可能认真讨论民主的联邦结构。这个等级制国家力图建立一个共同组织("奥地利青年人"),但又允许宗教团体和童子军存在。在希特勒青年团范围内,这种统一才做到了彻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和政党联系着的青年团体无论在成员人数和重要性上都大不如前;怀疑多端代替了以前青年人那种不妥协的战斗精神;似乎只有教会的青年团体保持了比较有力的宣传作用。如同在大多数欧洲国家里,奥地利的体育运动开始得较早,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巨大的高涨,这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学校和青年团体大力提倡运动,运动也吸引了成年人。教育、医学560 和商业因素在这个过程中很起作用。最有群众性影响的是足球;对于人民健康具有更大意义的则是冬季运动、旅行游览和水上

① 大众高等学校(Volkshochschule),一种供成人进行业余高等教育的学校。——译者

运动。

共和国的科学成就颇令人印象深刻；在精神财富上富有创建性的人才方面，小小的奥地利并不乏人。对他们的评价自然毁誉不一，漏洞难以避免；最好还是不要一一枚举如此繁多的人名。在这里予以简短评述的某些学者，由于其家世或其以后的生涯，也应当算在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成就的总帐上，从较高的意义来说，肯定也属于全人类。总的看来，由于境遇比较艰难和政治事态的发展，奥地利学者的外流自 1918 年以来非常之高。

医学在 1918 年以后仍保持了它的杰出的声誉。无论在科学研究上，还是在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实际医务工作上，都做出了重大成绩。1927 年，尤利乌斯·瓦格纳-姚雷格因发现接种疟疾对于慢性瘫痪症的医疗作用而获得诺贝尔奖金。他还借鉴了瑞士研究者的工作，组织了用经过碘处理的食盐来医治甲状腺肿的工作。卡尔·兰德施泰纳的毕生医学事业成果异常丰富。1930 年，他因发现人的血型而获得诺贝尔奖金。这个人出生于维也纳，起先在祖国的大学里当副教授，1922 年前往纽约，继续他的研究工作，这工作的最初成果早在 1901 年就已发表。按照“罗猴因子”对血型再分类的方法也是起源于他。有了兰德施泰纳的工作，输血才有保障。当兰德施泰纳的生活道路把他从奥地利引向外国之时，出生于法兰克福的奥托·勒维在格拉茨进行最重要的研究工作，他从 1909 年至 1938 年一直在格拉茨工作。勒维也同样获得了诺贝尔奖金；他于 1936 年获奖，奖金表彰他的先锋性试验：以蛙心制剂进行神经冲动的化学传递试验。

克莱门斯·皮尔盖男爵作为研究者和实践者，为自己留下了不朽的名声。1906 年，他就经过深入的研究，表述了过敏的概念，不久以后他研究出结核菌皮内试验，这对于早期发现结核传染病，

从而对它的及时治疗具有决定性意义。皮尔盖从1911年起主持维也纳儿童医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作为美国儿童救济工作的主任医师，工作成绩卓著。特别是由于他的不疲倦和有目的的工作，成千上万大城市儿童得以免于因饥饿和疾病引起的死亡。除了比尔盖以外，还有出色的外科医生安东·冯·艾泽尔斯贝格，此人激励着一大群学生，以及先驱的整形外科医生阿道夫·洛伦茨、解剖学家费迪南·霍赫施泰特尔和尤利乌斯·坦德勒，作为研究者和教师所从事的工作获得举世钦佩。正当较大和较富的国家都具有不同于奥地利共和国的物质条件时，维也纳医派仍然维持了它的标准。此外，格拉茨和因斯布鲁克也都做出了重要的成绩，也出了一些人才。在外国工作的杰出医师也有在维也纳受过培养的，这里只提一下土生土长的维也纳人罗伯特·巴拉尼，他于1915年由于在耳科领域中的研究工作而获得诺贝尔奖金，在随后的二十年间，他卓有成效地在瑞典的乌普萨拉大学任教。

1945年，奥地利医生面临异常艰巨的任务。诊疗所和医院在战争期间被改作陆军医院，科学设施已经陈旧，购置新设备最初还缺乏资金；因此，面对着设备较好的外国，要保住维也纳医派的名声很不容易，因为人们与外国隔绝已经多年。所以，战后年代的恢复工作十分艰苦。

奥地利在实验物理学和理论物理学方面的研究成绩重要非凡。维也纳人薛定谔的学者生涯颇沛流离，漂泊不定，他从故乡先后到过耶拿、斯图加特、布雷斯劳、苏黎世、柏林、牛津、格拉茨、都柏林，然后又回到维也纳。他属于这样一些研究者，这种人对于用古典的光波理论再也解释不通的各种现象重新另作解释，并以数学方法来证明；他获得1933年的诺贝尔奖金，以表彰他所发展的波动力学对原子理论所具有的意义。施蒂里亚人、德意志-法伊

施特里茨地方的弗兰茨·维克托·黑斯在1912年时就已发现宇宙线;他的成就的意义,在进行补充观察以后,很晚才被承认,1936年才得到诺贝尔奖金。他在格拉茨、维也纳和因斯布鲁克当过大学教师,后来迁往美国。物理学家沃尔夫冈·泡利,一位大化学家的儿子,在德国和瑞士工作过。1945年,根据他在原子物理学中的研究成果,他被授予诺贝尔奖金,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关于电子运动状态的"排后原理"概括了这项研究成果。其他的工作涉及热动力学和原子裂变。最后,在先锋原子物理学家当中,还有维也纳女子莉泽·迈特纳,她先后在柏林的威廉皇帝研究所和斯德哥尔摩工学院工作过。

在奥地利的数学家当中,我们要提到下奥地利人威廉·维廷格尔,他专门研究代数函数理论,得到欧洲的专业人士的钦佩。出生于汉诺威的菲利浦·威廉·富特文格勒,1912—1938年间在维也纳工作过;他被认为是主要数学理论家之一。约翰·拉东在德国工作过几十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来到因斯布鲁克和他以前求学的地方维也纳教书;拉东的研究工作主要涉及群函数、变数计算和微分几何。 562

在化学家当中,这里还要再次提到弗里茨·普雷格尔、这个在格拉茨大学工作的莱巴赫人,因他在定量有机显微分析领域中的研究,获得1923年的诺贝尔奖金。人们常常指出,在第一共和国期间,格拉茨大学的教员中有四个得诺贝尔奖金的(普雷格尔、黑斯、勒维和短期间任教的薛定谔)。还有两个奥地利化学家里夏德·席格蒙迪和里夏德·库恩因他们的工作而获得诺贝尔奖金。席格蒙迪由于他在胶体化学方面的研究论文,于1925年得到这种表彰,不过他在格拉茨的研究工作只是短期间的,他的工作主要在哥廷根进行。里夏德·库恩同席格蒙迪一样都是维也纳生人,因

他对维生素和胡罗卜素所作的研究，于1938年得到这笔奖金；他曾在苏黎世和海德尔堡工作过。

汉斯·莫利施是同样著名的尤利乌斯·冯·维斯纳的学生，有了莫利施，维也纳大学就等于有了一个出类拔萃的植物生理学家，他的论文论及微量化学和微生物学。莫利施作过远程的研究旅行，短时间在印度和日本工作过。另一个有地位的自然科学家、气象学者海因里希·菲克尔对阿尔卑斯山的芬风[1]和贸易风[2]进行过重要的研究。

设计师和发明家的工作与基础科学研究或多或少地密切联系着。施蒂里亚人维克托·卡普兰曾在维也纳求学，从1913年起在布鲁诺的德意志技术大学工作。他是低压运转发电厂的大涡轮机的创造者，这个机器是他主要在1919—1922年间研制出来的；他的工作使涡轮机制造发生了革命；现在世界各国都在使用卡普兰涡轮机。由于马克斯·海廷格尔在对于细胞研究极为重要的萤光显微镜方面所作的设计，光学仪器的传统得以发扬光大。海廷格尔与赖歇特光学仪器厂合作，该厂曾研制出一系列模范的研究显微镜。

563 奥地利大地测量家爱德华·多勒察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已经在大地和空中摄影测量方面进行了工作，他的工作不久就得到国际公认，他继承了特奥多尔·沙伊姆普弗卢格所发明的摄影透视仪（1907年）的研究工作，并于1921年成立了奥地利联邦测绘局。

钢筋混凝土建筑在维也纳有着良好的传统，他在维也纳技术

---

① 芬风（Föhnwind），温暖和干燥的山风，尤常见于阿尔卑斯山坡。——译者

② 贸易风（Passatströmmungen），在南北纬三十度之间，因地球自转而恒定地向赤道吹去的风，又称为信风。——译者

高等学校的优秀代表人物是鲁道夫·扎利格尔；应当提到奥古斯特·乌姆劳夫，那个冷拧的扭结钢筋的发明者，以及卢道夫·施密特，那个同样冷拧的扭转钢筋的发明者；他们的工作大大地促进和发展了钢筋混凝土建筑术。

在奥地利的研究旅行家中，应特别推崇默德林附近的圣加布里尔传教会学校的教员。威廉·施密特、马丁·古辛德、威廉·科佩斯、保罗·舍贝斯塔，研究了原始民族的文化状况和信仰形式，为此曾经远征过南美(火地岛)、中印度和非洲内陆。由于奥地利对研究阿尔卑斯山有很多经验，它对欧洲以外的高山研究(高加索、安德斯、喜马拉雅、喀拉昆仑)所起的作用很重要。不少初攀七、八千米高峰的活动都和奥地利登山运动员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格拉茨地球物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韦格纳进行了对北极地区的研究，尤其是格陵兰，他于1930年就死在这个辽阔的北极岛屿上。在高等学校的地理教师中，应特别提到各国地理志的代表人物胡戈·哈辛格尔和诺贝特·克雷布斯，作为地貌学家应特别提到较老的阿尔布雷希特·彭克和约翰·泽尔希。

在哲学工作方面，主要在1918年以后就从事工作的哲学家当中，莫里茨·施利克继承了前人尤其是恩斯特·马赫的努力和研究，他所成立的维也纳学社构成了某种左派。属于这个团体的还有鲁道夫·卡纳普、维克托·克拉夫特、奥托·诺伊拉特，后者以维也纳图表统计学的创立者著称；路德维希·维特根施泰因一度与他们很接近。心理学，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在维也纳大学，有卡尔和夏洛特·比勒这样优秀的人物作为代表；他们的研究主要涉及表达和语言理论或儿童心理学。罗伯特·赖宁格尔在认识论研究方面继承了英国的启蒙思想家洛克、休谟，尤其是贝克莱。里夏德·迈斯特尔作为教育家、古典语言学家和科学事业的

慷慨组织者而进行活动。

564 费迪南·埃布纳在维也纳森林的加布利茨这个远离学术研究场所的地方,研究了一种基督教人生哲学的基础,这种哲学的某些观点先于存在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个几乎被人遗忘了的怪人又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鲁道夫·卡斯纳生于奥地利,他作为文化哲学家、诗人和成功的翻译家,在祖国和瑞士工作过。人类智慧学(Anthroposophie)的创立者鲁道夫·施泰纳,犹太宗教哲学家、虔诚主义(Chassidismus)①学说的解释者马丁·布贝尔,也都出生于奥地利,不过他们的生活道路很早就把他们引导到外国。

里夏德·N·库登霍弗-卡勒基伯爵出身于一个已扎根于奥地利的弗兰德尔贵族家庭,生于东京,父为奥匈帝国外交官,母为日本人,他以哲学和历史习作开始他的精神生涯。1923年起,他在维也纳出版泛欧联盟中央机关刊物《泛欧》杂志,该联盟的第一次大会1926年在奥地利首都举行。这个欧洲经济和政治联合组织的纲领是库登霍弗在民族国家思想盛行的时代提出来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其形式虽有所改变,但重又具有现实意义。

二、三十年代的奥地利法学和国家科学拥有许多十分出色的人物。有两个截然不同的英才产生了也许是最深远的影响。汉斯·克尔森一生动荡不定,从出生城市布拉格先后到奥地利、德国、瑞士、捷克斯洛伐克和美国,担任一系列大学教席,他是1920年奥地利宪法的草创人,又是"纯粹法学理论"的主张者,他在维也纳国家法学派中的弟子就是这种理论的代表;他的体系乃是一种尝试,旨在将国家和法律同历史的、政治的和社会的事件分离开来观察,以便把握它们的假定的最原始的本质。

① 虔诚主义,一种流行于东欧的犹太神秘教;十八世纪时,由巴尔舍姆(Baal-schem)创立,强调虔信宗教,积极和负责。——译者

奥特马尔·施潘在维也纳大学生的热烈支持下，维护他那个同自由社会主义观点正面尖锐冲突的“真正国家”的学说。关于国家和社会的一种职业等级新秩序的思想，都被各种不同的政治派别据为己用，但是多半得不到这位学者的赞同。无论奥地利等级制国家，还是亨来因运动之初，都曾援引过奥特马·施潘的话。他同国家社会主义虽然有些论点相似，但终于发生猛烈的冲突。

法学史家利奥波德·文格尔和保罗·科沙克尔，两个克恩滕人，罗马法的杰出代表人物，德国法学史大师海因里希·米泰斯，以及国家法教师路德维奇·阿达莫维奇和阿道夫·尤利乌斯·默克尔，他们的学术研究工作虽然默默无闻、不大轰轰烈烈，但是真正的科学成果却很丰富。 565

在社会学家的工作中，政治阵线很分明。活跃的政治家如卡尔·伦纳和左翼社会党人马克斯·阿德勒，以及另一方面的伊格纳茨·赛佩尔和天主教的局外人安东·奥雷尔也都发表过重要著作。埃里希·弗格林和约翰内斯·梅斯纳，作为植根于西方传统的社会观的代表者而负有盛名。陶尔富斯时代维也纳市副市长恩斯特·卡尔·温特尔的名字，是同把天主教保守派和合法派思想同社会党人的论点联合起来共同向国家社会主义作斗争的尝试联系在一起的，这一尝试并未取得完全的成功。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作为社会学家，主要作为国民经济学家，获得优异的名声。他的科学生涯把他从格拉茨，经过波恩引导到哈佛大学。这个学者，1919 年在伦纳内阁当过几个月的财政国务秘书，后来在美国成了他那个专业领域中也许是最重要的权威。

在历史研究和历史著述方面，1918 年以后在维也纳大学，最有效的代表人物先后有古历史学家阿道夫·威廉和鲁道夫·埃格尔，以及约瑟夫·凯尔，后来又有社会和科学史家阿尔方斯·多普

施。多普施关于古代和中世纪之间的生活内容的著作引起很大的轰动。此外还有中世纪史学家汉斯·希尔施和近代(和奥地利)史的代表者海因里希·冯·斯尔比克。最后提到的这个人在学术上的名声首先是他的纪念碑式的著作梅特涅传奠定的，他是"全德"历史观的创立者和主要代表人，这种历史观弥合了"大德意志"和"小德意志"之间的由来已久的鸿沟，它还把奥地利爱国主义与德意志民族意识和基督教保守派的人生观结合了起来。斯尔比克和与他思想上相近的日耳曼学者约瑟夫·纳德勒可以认为是主要代表了奥地利学术界中这样一些人，这些人是民族派和保守派双方为了教育自己而力图争取，但又不属于这两个阵营中的任何一个的。尽管党的机关和激进国社党人对他们怀有不信任，人们还是为第三帝国的文化政策的名誉而乐意利用这个中间集团代表人物的崇高名字，因此，这个在奥地利有着重要传统的流派中比较出色的成员在1945年以后就不再吃得开了。

在艺术史家当中，全然相反的两个人，尤利乌斯·施洛塞尔，马克斯·德沃夏克的继承者和倾向历史及博物馆(museal)观点的代表者，同富于战斗精神的、讲究多面性和系统性的约瑟夫·斯特尔齐戈夫斯基处于激烈的、不可克服的矛盾之中。

566

在古代和现代语言学这个复杂的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中，这里只提一下斯拉夫语言学家尼古拉·塞尔盖耶维奇·特鲁贝茨科伊，古典语言学家路德维奇·拉德马赫尔、印欧语学家保罗·克雷奇默尔和阿拉伯语学家汉斯·科夫勒。主要的英语学家卡尔·路易克，一本洋洋大观的英语历史文法的作者，已经提到过。

在维也纳天主教神学院中工作的有伊格纳茨·赛佩尔（道德神学）和以后任枢机主教的特奥多尔·伊尼策尔（新约全书）。因斯布鲁克的哈特曼·格里萨尔是一个重要的教会史专家。维也纳

的福音神学院的喀尔文研究者约瑟夫·博哈特茨是一个杰出的、国际公认的宗教改革史的代表者。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奥地利文学在很大程度上仍受下列作家影响：赫尔曼·巴尔、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阿图尔·施尼茨勒、卡尔·克劳斯、赖纳·玛丽亚·里尔克、弗兰茨·韦菲尔、安东·维尔德甘斯和卡尔·舍恩黑尔，他们在大搏斗前几年或几十年前就已经成名。世界大战和君主国的崩溃，在他们的所有作品中都留下了明显的痕迹。卡尔·克劳斯在他的长篇巨著《人类的末日》中描绘了一些关于战争及其往往在后方引起的怪现象的现实主义景象。弗兰茨·韦菲尔，在崩溃、苦难和革命的影响下，最初抱有左派激进的和平主义观点，后来又在咄咄逼人的世俗的假宗教的压迫下，改而相信天主教思想。霍夫曼斯塔尔在《难以满足的人》(1921年)和《铁面无私的人》(1923年)里，刻划了古老奥地利日趋沉沦的世界中的人物，他觉得自己同那个世界存在着广泛的联系。安东·韦尔德甘斯把他的史诗《基尔比施》(1927 年)塑造成一幅反映战时下奥地利的时代图和人物图，他在他的《谈谈奥地利》(1929 年)中，表现了一个诗人对奥地利的历史和政治独立性，以及对其文化使命的态度，寓意深长。在维尔德甘斯的作品中，对时代的苦难和社会紧张关系的描写也是很重要的。

约瑟夫·罗特的作品大部分描写旧奥地利，尤其是他的长篇小说《拉德茨基进行曲》(1932 年)，那里写到那行将灭亡的君主国的一个军官家庭的命运。罗伯特·穆西尔的独特的未完成的长篇小说（1930 年，1932 年，1943 年）分析了君主国后期的种种问题("Kakanien"①)，除此以外还分析了普遍的社会和文化的危机。赫

① "Kakanien"的原义为 kaiserlich-königlich(帝国的和王国的)，指奥匈帝国而言。——译者

567 尔曼·布罗赫在精神上与穆西尔在很多方面关系密切，这个“违反意志的作家”在自己生命的末年，试图以长篇小说《维吉尔之死》来经过理性思考的领域进入那神秘和空想的领域。

一个在维也纳生了根的南施蒂里亚马尔堡人马克斯·梅尔，以民族保守的传统和工整的形式，创作了一些模仿中世纪宗教剧的笔调的、并具有真正宗教思想的舞台剧本。作为表现主义戏剧体裁的代表者，作为成功的中短篇小说家，弗兰茨·特奥多尔·乔科尔值得一提；他在剧本《1918 年 11 月 3 日》里，为君主国、它的悲惨的结局和它的军官团的精神树立了一个有水平的文学作品纪念碑。弗兰茨·卡尔·京茨凯，生于旧奥地利海军要塞普拉，是旧陆军的许多能写作的军官之一，作为短篇小说家和抒情诗人而继续从事他那多方面的工作。弗兰茨·纳布尔从波希米亚森林来到维也纳和格拉茨，他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短篇小说家。他如同因菲特尔的短篇小说家和常常得以在宫堡剧院上演的剧作家里夏德·比林格尔一样，曾一度获得极其广泛的读者群。萨尔茨堡人卡尔·海因里希·瓦格尔也是这样，他是细致的宗教思想解释者和农民生活刻划者。海米托·多德雷尔以规模宏伟的长篇小说，证明自己是讽刺和描述奥地利社会、特别是维也纳社会及其问题和生活方式的能手。生于布拉格的弗兰茨·卡夫卡的叙事诗和剧作，在著者死后几年，甚至十几年，才得到巨大的反响，别的人都没有象他那样道出了人类生存的不安全、生活的恐惧和绝望。他的晚年是在基尔林度过的。

克恩滕人、来自特雷芬的吉多·策尔纳托是一个有才华的抒情诗人，在等级制时代作为祖国阵线的总书记在政治上也居于前列；1943 年，他年纪轻轻就客死在纽约。在有地位的乡土作家当中，也许还应当提到策尔纳托的同乡约瑟夫·弗里德里希·佩尔科

尼希和施蒂里亚女子保拉·格罗格尔。奥地利最重要的抒情诗人肯定是约瑟夫·魏因黑贝尔，他最初以长篇小说的形式写出他在默德林地方的希特尔孤儿院时的童年回忆，后来作为韵律大师和具有稳健的语言感和优美的音乐感的文字艺术家，以古典的风格形式（«贵族与没落»、«姗姗来迟的王冠»、«神鬼之间»，1934—1938 年）和通俗的民间形式(«字面上的维也纳»①，1935 年)，创作了具有长远价值的诗集。保拉·冯·普雷拉多维奇是克罗地亚军官兼诗人彼得·普雷拉多维奇的孙女儿，她以抒情诗解释天主教的世界观和奥地利的国家思想著称，新的奥地利联邦国歌的歌词就出自她的手笔。

米尔科·耶卢西希常写历史小说，他写的«凯撒»一书尤其成功，而在布鲁诺·布雷姆的作品中，应当特别指出他那描写旧奥地利衰亡的三部曲。埃贡·弗里德尔应被评定为才华洋溢的批评家、胶守成见的文化史家和成绩斐然的剧作家(有时与阿尔弗雷德·波尔加合作)。 568

在写出好作品和拥有广大读者群的成功著者当中，可以列举许多长篇小说和动物故事的作者费利克斯·扎尔滕和讽刺家罗达-罗达，他虚构或者记载了奥匈帝国军队中的逸事，尤其是前军事边境一带的逸事趣闻。广为传诵的长篇小说的女著者维基·鲍姆也是奥地利人，她先后在德国和美国居住和写作过。

1918 年以后，新闻学的各种变种都可以在奥地利报刊作品中看到，卡尔·克劳斯成功地抨击了附庸风雅和敲诈勒索，两大党的日报(«国家邮报»和«工人报»)拥有象弗里德里希·冯德尔和弗里德里希·奥斯特利茨这样很有才华、但笔锋犀利的政论作家；1945 年以后，冯德尔在天主教周刊«犁沟»中采取了一种主张民主合作

① 原文为 Wien wörtlich。——译者

的温和路线。等级制国家通过行政命令进行了很大的限制，而与德国的合并却完全取消了新闻自由。在统筹和战争经济措施的影响下，机关报的数目缩减了。于是，从 1938 年至 1945 年，维也纳日报的数目从二十二家降至四家。1945 年以后，占领军出版自己的机关报，以便对奥地利的舆论施加宣传上的影响。一个三党合办的机关报作为第一家奥地利日报出版。后来，各邦报纸的分量明显地加强，同维也纳的优势相抗衡。

1918 年以后，奥地利音乐部分地继承了前一世代的伟大音乐家的创作。弗兰茨·施雷克尔的歌剧作品，同尤利乌斯·比特纳的多样化的创作一样，曾受过古斯塔夫·马勒尔的影响。此外，这两人的创作同样属于 1918 年以前的时代，而那些伟大的音乐家则属于 1918 年以前的时代。约瑟夫·马克思负有歌曲作曲家以及室内音乐和歌剧音乐创作家的盛名。在普雷斯堡人弗兰茨·施密特的作品里，可以感到明显的斯拉夫和马扎尔成分，由于他的风琴曲、歌剧和交响音乐，尤其是由于他的圣乐《盖有七个印章的书》而当之无愧地受到人们赞赏。埃里希·沃尔夫冈·科恩戈尔德作为音乐神童曾轰动一时，他的作品，如小提琴协奏曲、歌曲和歌剧曾受批评界的猛烈攻击，但是绝大部分都很受听众欢迎。最后，里夏 569 德·施特劳斯，还有汉斯·普菲茨纳的生平和创作同奥地利及其音乐文化的渊源之深，几乎是用不着一提的。

阿诺德·申贝格以插入十二音技巧的无调音乐结构，迈上了激进的新道路。在他的学生当中，尤以阿尔班·贝格（《沃采克》，1926年）和安东·冯·韦贝恩影响最大，特别是在外国，如同一切重要的革新家一样，也引起了公然的反对。

为维也纳小歌剧的快乐女神服务的，除了很受观众好评的入籍奥地利人勒哈尔和卡尔曼以外，还有埃德蒙德·艾斯勒、莱奥·

法尔和奥斯卡·施特劳斯——这里只提几个最著名的名字。

共和国的巨大财政困难，必然影响到兴建糜费的国家剧院；不过，无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都很知道这些舞台对于发扬奥地利文化所具有的意义，而这些剧院也能保持自己的水平。为特殊政治目的而设立的艺术游乐场，以及戏票的预订都能吸引可靠的观众群，并减轻财政上的负担。

宫堡剧院在第一共和国时期曾拥有一系列杰出的演员，有些已经长期演出，有些则是新聘请的，如格奥尔格·赖默斯、奥托·特雷斯勒、劳尔·阿斯兰、阿尔贝特·海涅、保罗·哈特曼和埃瓦尔德·巴尔泽，以及女演员海德维希·布莱布特罗伊、罗泽·阿尔巴赫-雷蒂、埃尔赛·沃尔格穆特、安娜·卡利纳、莉莉·马尔贝格和阿尔玛·赛德勒。经理常常都更换得很频繁，就中以弗兰茨·赫特里希和赫尔曼·勒贝林任期最长。

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的问题也与宫堡剧院的大同小异，它的影响范围甚至更大，另一方面，它的活动总是耗费极大。这个机构拥有优秀的艺术导演和乐队指挥，如里夏德·施特劳斯和弗兰茨·沙尔克，两人当然是很难协调的，以及克莱门斯·克劳斯、费利克斯·魏因加特纳、卡尔·伯姆、赫伯特·冯·卡拉扬，它还拥有维也纳乐团这样一个出类拔萃的交响乐队。维也纳歌剧院的名声很响，它的报酬虽然完全不能同外国的机构相比，但是它仍然能保持一批出色的歌唱家在歌剧院里；只要提一下以下的名字就够了：莱奥·斯勒察克、里夏德·迈尔、阿尔弗雷德·耶格尔、阿尔弗雷德·皮卡弗尔、黑尔格·罗斯万格，以及女歌唱家玛丽亚·古特海尔-朔德尔、洛曼·勒曼、伊丽莎白·舒曼、泽尔玛·库尔茨和玛丽亚·耶里察。

在国家剧院里，在较小的程度上，也在 1922 年成立的宫堡剧

院的"小戏院"——"学院剧院"里，可以说保守精神占主要地位，而在德意志人民剧院里，鲁道夫·贝尔却代表着现代路线。一度由570 马克斯·赖因哈德领导的约瑟夫城剧院奠定和保持了它作为具有奥地利特色的有素养的话剧舞台的良好名声。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维也纳的艺术生活和创作有过独特的发展，因为有几个主管官员和鉴定专家，几乎毫不掩饰地与占主导地位的方针发生矛盾，而以谅解和公正的态度对待 genius loci(地方风气)，这尤其对于舞台，以及一般地对于造型艺术产生了积极的作用。1944 年秋天以前，该市比较长时期地未受空袭，那里还有过重要的演出、展览会和演讲会。斯尔比克作为科学院院长，对柏林的干涉曾予以抵抗。后来，由于行政区长官希拉赫和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之间闹私人矛盾，维也纳得以保持一种特殊地位，从而免受彻底的统筹措施的影响，此外，专横和偶然事件还是起了作用的；维也纳乐团就比该市的其他大交响乐队更好地度过了战争难关，音乐堂协会就比音乐之友社度过得更好。

战争将近结束时，国家歌剧院和宫堡剧院被炸，破坏极为严重。于是不得不修建一个多年用的临时演出棚，一直用到庞大的恢复工程完工为止，这个工程简直等于新建。1955 年秋，这两家剧院重新搬入原址，在奥地利人民巨大的关怀下重新开演。

除维也纳以外，萨尔茨堡市在共和国的艺术创作的代表性方面具有特殊意义。1917 年夏，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同马克斯·赖因哈德、阿尔弗雷德·罗勒尔、弗兰茨·沙尔克和里夏德·施特劳斯一道，成立了萨尔茨堡联欢演出协会，并宣布筹备每年一度的联欢演出，该城对于演出节目确实提供了一个优异的环境。音乐节在十九世纪时就已举行过。战争结束后，人们着手实现联欢演出节目单。劳苦功高的，除了艺术家以外，还有邦行政长官弗兰

茨·雷尔和剧场经理埃尔温·克贝尔。除了歌剧，首先是莫扎特的，他的音乐在他所出生的城市的节日联欢节目里占主要地位，还有里夏德·施特劳斯的，以及除了协奏曲和歌曲晚会以外，还演出说唱节目；由马克斯·赖因哈德在教堂广场上演的霍夫曼斯塔尔的《人人》赋予联欢节目的特殊的光彩。

表演艺术在二十世纪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舞台上的演出。不少著者、导演和演员转向能产生巨大广阔效果的电影拍制活动，或者把这种活动同舞台工作结合起来。不久，电影院的数目就超过剧院的数目大约四分之一；小城市里的说唱舞台大多只有放弃竞争。571 奥地利电影界在第一共和国时曾做出一些优异的成绩；应当提一下《化装跳舞会》，主要演员为保拉·韦塞利，导演为维利·福斯特。在三十年代中期，对德国的电影业和文化政策的依靠自然就变得越来越明显。

完成文化任务的，除了新闻的发布以外，当然也还有奥地利广播，可是，在听众的愿望、政治活动、各邦和各行各业的兴趣这样的压力之下，要维持一个在艺术和科学上都具有完美价值的节目单子总是颇为困难的。自从1924年起，由于经常更换节目，听众的数目就不断增加。1924年广播收听许可证为94,322个，而1955年则为1,735,584个。经历过种种由于被占领的局面而产生的困难和拖延以后，1954/55年终于建立起电视节目。

在奥地利的造型艺术方面，在1918年以后，自从世纪更迭以来变得有影响的那些力量继续发挥作用。最有成绩的是绘画。克恩滕人赫伯特·伯克尔和已在克恩滕安家落户的摩拉维亚人安东·科利希，首先同奥斯卡·科科施卡一起，代表了表现主义绘画；格拉茨人威廉·特尼也可以属于这个流派，此人一生作品繁多，大部分在纽约被焚于火。上述这些画家都没有始终不渝地死守这个流

派。科科施卡先是转向彩色镶嵌风格(Mosaikstil),后来转向变幻不定的、有时是印象派的、有时是空想的彩色画。图画的内容往往具有寓言性质。伯克尔的画色彩浓艳，继承了罗马的和巴罗克的传统。

版画家阿尔弗雷德·库宾，作为富有幻想和空想的插图画家具有突出的重要地位,他也从事写作,成绩斐然。奥斯卡·拉斯克的作品的特点是异域山水画和场景画充满挚爱，有时甚至带有故事气氛。从安东·法伊施陶尔的风景和场景画可以看出后期印象派风格的影响。他在萨尔茨堡联欢演出厅中的壁画并非这位艺术家的最佳之作，但在 1938 年以后被以极其独特的方式剥取了下来。弗兰茨·维格勒、格哈特·弗兰克尔和泽吉乌斯·保塞尔的作品也有相近的特点。在 1938 年以后,多次开展了对“退化了的”艺术的斗争，而等级制国家却比较宽大为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突然遇到了西欧的超现实主义和后期立体主义流派,这些流派立刻在一些比较年青的艺术家中引起了热烈的共鸣。

572 在雕塑家当中，布尔根兰艾森施塔特人古斯蒂努斯·安布罗西,由于他的浪漫主义与表现主义相结合的、形式严谨的作品而获得国际上的赞赏。同库宾和科科施卡一样，安布罗西把雕刻家和作家的才能结合在一起，他的作家才能在他的十四行组诗中表现了出来。在年轻人当中，弗里茨·沃特鲁巴以他那粗犷的石刻体现了艺术家对材料与人象的艺术分析，这种分析的特点是不讲究现实主义细节和试做超人的本质解释。

建筑比雕塑和绘画目的性更强，它经常受到最广阔阶层的批评，因此不能毫无保留地致力于追求现代派的努力之中。所以多半避开极端的先锋主义的解决办法。维也纳区住宅建筑活动频繁，既产生了象海利根施塔特的卡尔·马克思大院这样的大建筑

群，也产生了维也纳南郊佩尔·阿尔宾·汉森新村这样松散的边缘村落。红山的实用工艺协进会新村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1945年以后，维也纳当代最重要的大建筑是作为文化和体育活动中心而修造起来的市立会堂(1953—1958年)，修造时有意识地利用了钢筋水泥建筑上可以发挥的艺术可能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奥地利的现代教堂建筑也有巨大的高涨。一般地说，这个时代结束时的建筑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倾向，就是为了护墙而使用昂贵的材料(水磨石、镶嵌细工)。

在奥地利的建筑师当中得到国际公认的有蒂罗尔人克莱门斯·霍尔茨迈斯特，他先后在奥地利、德国和土耳其工作过，以及奥托·瓦格纳的学生里夏德·诺伊特拉，他去了美国，自己在那里形成了学派并成为人们的楷模。

在两次战争之间的时期里，奥地利的美术工艺创作承袭了奥地利实用工艺协进会的传统。

* * *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肯定它的结局并使之恶化的媾和活动中，老大的奥地利崩溃了。当时成立的新秩序并没有长存，但是就奥地利的边界而论，它却是比人们所预料的持续得更久些。在缩小了的国家里，过了1918年以后不久就非常缺乏合作共事的精神，在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中也是如此。由于周围的世界没有表示谅解，也不肯帮助，这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虽然有一些值得赞赏的成就，但是成就还是极其微小。在精神文化方面，甚至十分粗略的概观也表明，奥地利共和国决不是一个寒酸可怜的小国；它不仅从过去的遗产中吸取养料，但也不象瑞典、荷兰或者丹麦那样；这些国家在政治上强盛发展的时代早已结束了。 573

欧洲的地图在两次大战以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君主国的问

题不再是共和国的问题。历史学家不敢妄测未来。毫无疑问，在一个世界政治和意识形态大冲突的时代里，需要保持一种开明的、宽容的和名符其实的世界公民思想，这种思想符合自古以来奥地利的优秀传统。在发生了巨大的灾难以后，以及在当代人类的生存面临不祥的威胁之时，为了保全欧洲历史上，从而也就是奥地利历史上具有永久价值的东西，为了创造新的价值，这种思想是必要的。

索　　引

（译名后的页码为原文页码，请参阅中译文该页切口处的页码。）

译 后 记

这本书洋洋五十万言，叙述的范围极广，光是人地名就不下四千个，此外还有大量历史官职、机构、爵位、奥地利特有词汇和科学技术术语。这给我们增添了很多困难。尤其奥地利历史上的特有词汇，我们虽然尽了很大努力，也未必能译好。需要作注的地方很多，我们限于篇幅和知识程度，也未能全做。

在结束本书的翻译工作时，我们要特别感谢在京的奥地利专家魏璐斯 (Ruth Weiss) 和蔡思克 (Walter Zeissberger)、西德专家伊丽莎白·施泰尔-博伊尔勒博士 (Dr. Elisabeth Steil-Beuerle)。他们在百忙中给我们解决疑难，否则我们的工作是难以完成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马香雪同志、新乡师范学院申文林同志，也协助了本书的翻译工作，我们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前言、导言、第一至第四章由杜文棠翻译，第五、第六章由林荣远翻译，第七至第十章由李澍泖翻译，全书由李澍泖负责总校。由于我们的中外文水平有限，历史知识贫乏，译文未能尽善尽美，恳切地希望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